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4月(上)
总第195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6 年 4 月 上
总第 195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4 月 15 日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SHE HUI YU GONG YI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哞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马强 / 马贵荣 / 万沣毅 / 王红 / 王保峰 / 王德立 / 王守红 / 王国权 / 王坚松 / 王政 / 王哲
王德兵 / 白浩扬 / 布朋印 / 冯军伟 / 田瑞建 / 卢莎 / 邓富友 / 布宏雷 / 石恒平 / 田野 / 闫新勇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长鹏 / 刘漩 / 孙明 / 朱红艳 / 任璐 / 辛福 / 吴春华 / 吴雪燕 / 何书一
何宗尉 / 李卫华 / 李永华 / 李梓英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斌 / 李军 / 肖玲 / 苏芬芬 / 陈炎松 / 陈勇 / 陈承
谷学亮 / 杨航 / 杨会民 / 杨同喜 / 杨雨 / 杨高磊 / 杨扬 / 杨威 / 邵佳 / 张鼎 / 张燕蕊 / 张冬 / 张汉英
张金霞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范娱艳 / 侯军旺 / 侯俊勇 / 赵燕成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胡刚 / 徐志昌
高蕾 / 高云辉 / 郭保生 / 郭晓利 / 耿庆山 / 柴宏 / 秦一杰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 鲁兵库
裴凯峰 / 联凡 / 惠熙玲 / 蒋红超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裴旭峰 / 臧忠燕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慈善信托新规：以法治和透明筑牢信任基石

2026 年 4 月 1 日，由民政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4 月 2 日，民政部发布的《2025 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进一步明确，通过出台《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已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及本办法，深入实施“阳光慈善”工程，促进慈善组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制，持续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

慈善信托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灵活高效、财产独立、长期存续等独特优势，在助力乡村振兴、帮扶特殊群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慈善信托备案数量持续增长，已成为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公益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重要载体。

然而，伴随着慈善信托的快速发展，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公开渠道分散、公众查询不便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信托公信力的提升与社会参与的深化。《办法》的出台，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构建了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制度框架，明确了各方责任、公开内容与平台载体，是补齐制度短板、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

《办法》共二十六条，围绕“谁来公开、公开什么、在哪公开”三大核心，构建了覆盖受托人、民政部门及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公开协同体系。文件明确以“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为统一渠道，要求慈善信托的事务处理情况、财务状况、重大事项等全面、及时向社会公开，形成程序衔接、内容互补的“大公开”格局，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

从短期来看，合规性要求的提升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适应成本。但从长远看，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信息公开，将极大地增强慈善信托的透明度与社会信任度。当善款流向可追溯、项目成效可评估，捐赠人的信心与公众的认同必将随之增强，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持续、理性地向善而行。

信任，是慈善事业最宝贵的资产。而法治和透明，正是筑牢这份信任的基石。随着《办法》的落地实施，“阳光慈善”理念将深度融入行业发展。一个更加公开、可信、高效的慈善信托生态正在形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展望未来，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初心的坚守，也离不开制度的守护；既需要情感的温度，更呼唤专业的深度。法治化进程，恰是这一切的坚实底色——为每一次向善之举提供最有力的支撑。这底色，正如窗外蔓延的春意，静默无声，却让每一寸土地都获得生长的力量。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6 年 4 月 上
总第 195 期

专题报道

以画读心：房树人测验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中的应用 …… 陈志平 于文涛
融合式康复：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构建——基于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多站点实践
…… 黎红珊 于文涛 吕巧英

心理茶馆

当“东方智慧”遇见“AI 之眼”：团体心理咨询的数智化新篇章 …… 韦志中 姚洪敏 刘艳芳 吴 颖 / 01
本会团体视角下的多系统干预：一例割腕自残案例的家庭重塑与协同实践 …… 一苇渡心 张宇娟 杨 玲 石 榴 / 02

公益慈善

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状与智慧助老服务优化研究 …… 申雨轩 王宏烨 马雪梅 / 04
社会工作介入先心病患儿及家属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路径探究 …… 王 焕 李福玉 * / 07
“互联网 + 公益”模式下青年群体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 …… 伽 凯 林昱君 / 10
医院团组织如何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以普仁医院为例 …… 韩 奈 / 13
我国公益慈善专业化：概念、特征与发展现状 …… 田 园 / 16
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的“新引擎” …… 刘明瑞 / 19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模式探索——以中华女子学院“汇爱”志愿服务队为例 …… 李 阳 / 22
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视域下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研究 …… 张 明 / 25
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及其献血动机的调查研究——以新疆第二医学院为例 …… 孙雅茹 杨锦仪 李 娜 刘佳纯子 * / 28
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 郭燕玉 / 31

一老一小

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实践探索 …… 黄嘉超 / 34
流动儿童歧视感知与心理健康及其心理调控机制 …… 杜立萍 / 37
基于智能技术的留守老人居住环境改造设计构想 …… 吕 倩 / 40
关于老年身心健康的“医教养”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 邹海镕 陈垣烨 韦瀚岚 洪紫静 * / 43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老年临终关怀中的角色探究 …… 王钦正 石 震 * / 46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实践研究 …… 邱涛华 / 49
基于社工理论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 马 旺 / 52
成都市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冯双双 王佳琳 马月玲 / 55
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再生产：非遗传承中老年社会参与的价值重构与机制研究 …… 张启浩 王振萍 / 58
儿童权利视角下的福利机构困境儿童保护路径探索——以 G 市社会福利院对两名事实无人抚养残疾儿童的保护实践为例
…… 符凯君 / 61
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影响机制研究 …… 柳思宇 李 诺 / 64
基于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模式的社区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深化研究 …… 杨福彪 崔 岩 徐西林 周金砚 何一诺 / 67
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基于青州 W 村的田野调查 …… 李晓琪 窦一岚 逯海勇 * / 70
艺术健康视角下社会美育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研究 …… 陈媛骅 / 75
综合支持体系管理在孤独症儿童中的效果评价 …… 桑方方 李建梅 龙丰穗 韦 荣 / 78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的研究进展 …… 李宣萱 / 81

百家争鸣

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的理论逻辑及运作机制 …… 章一多 / 85
“拓展—建构”分析模型下“红色家书”的情感驱动与行为自觉研究 …… 白　静 / 89
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多维探索与优化策略 …… 张颖颖 / 93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困境与突破——基于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的分析 …… 龚　佳 / 96
数智时代异化现象的现实表征、生成根源及扬弃路径——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 张莫晗 / 99
社会需求导向下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方法研究 …… 马　娟 王秀平* 孙蓓蓓 于俊丽 / 102
社会变迁背景下女性生活满意度研究 …… 任　瑞 / 105
论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对工资的监督检查 …… 喻湘忠 / 108
癌症引发的社会文化思考 …… 王　爽 魏　磊 牟　琳 宿胜男 / 111
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影响及干预对策 …… 杨春艳 / 114
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的适配性评价与改进研究 …… 盛　冬 卢　艳 / 117
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路径研究 …… 裴达峰 / 12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创新模式探索 …… 陈　虹 李　巧* / 123
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和特质焦虑的作用 …… 安义飞 / 126
数智化时代红色文创产品传播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的“三维四驱”模型构建
…… 王嘉隽 李　丽 邝洪波 单连良 袁　博 / 129
企业改革期间信访稳定工作路径探索 …… 龙美勤 / 132

教学研究

“大思政课”理念引领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与实证研究 …… 曹晓莉 / 135
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路径建构研究 …… 谭　勇 魏卓理 胡　莉 / 138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 王鎏燚 / 14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职“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以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为例 …… 姜晓静 / 144
沉浸式体验视角下“MDT 联合 SST”教学法在“老年常用照护技术”课程中的行动逻辑与优化策略 …… 陈午艳 / 147
正念训练融入高中心理课堂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 朱馨忆 / 150
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师自身发展路径探析 …… 杨瑶瑶 / 153
叙事重构策略：财经类专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的三重维度 …… 张凯雯 丁春丽 / 156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力学”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 王　博 / 159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三维服务体系构建与实践 …… 赵良辰 / 162
数智赋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研究 …… 苗园园 尤澜涛 苏文燕 / 165
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研究 …… 白金莉 程丽杰 / 168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与教学管理协同机制构建研究 …… 何采霏 林咏君 / 171
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路径——以华为公司案例融入数字化教材为例 …… 王汝泉 王贤辰 何健标* / 174
“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究——以山东省村（社区）干部学历教育为例 …… 刘炳男 / 177

思政论坛

思政引领下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 …… 秦　奇 吴　媛 / 180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理论支撑和内化路径 …… 王　蒙 陈　旭 / 183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施策略 …… 杨　佳 / 186
大思政格局下心理育人的路径探索 …… 秦　霖 / 189
大数据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探析 …… 王静静 / 192
智能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实践探析 …… 王晨瑄 / 195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创新探索 …… 汪秀霞 / 198
人工智能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开放教育思政课研究 …… 蔡焕培 / 201
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 陈彩云 / 2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 李　青 / 207
分析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实效性 …… 符敏霞 / 210
教育家精神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实践探索 …… 孙维佳 / 21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的协同优化研究 …… 于　菲 / 216
艺术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 张丛丽 / 219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策略探究 …… 曹正春 / 222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探讨 …… 聂　娟 唐凌云 * / 225
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 何　静 赵亚军 / 228

学海探骊

健全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格局的路径探析 …… 柴　斐 / 231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分析及对策 …… 孙　宁 / 234
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对个体身体欣赏的影响：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 石　怡 黄　辛 * 艾靖爵 李武恒 石子帆 / 237
数字化赋能高校学风建设途径探究 …… 宋伟皓 / 240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下高校劳动教育路径探析 …… 张　楠 / 243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呈现出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 翟洪利 / 246
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 梁惠媛 / 249
“1+4+N”校社协同模式下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析 …… 曾　勋 / 252
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 李崇馨 / 255
强基工程视域下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优化路径研究 …… 刘　平 / 258
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研究 …… 徐吴缘圆 / 261
高校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及影响因素探析 …… 郑思佳 赵　帅 * / 264
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效果评估 …… 师昊华 刘茂盛 陈光英 / 267
中学生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情绪知觉的中介作用 …… 解　卉 / 270
高校辅导员法治教育路径研究 …… 张锦绣 / 273
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优化与心理育人策略探析 …… 叶慧伶 / 276
由孤独引发的危机：大学生心理风险演化的内在机制与预防措施 …… 郑嘉木 / 279
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关联路径研究 …… 宋维维 / 282

艺术长廊

五体兼擅 别具风姿——记著名书法家陈羲明 …… 邓剑昆
笔绘山川 宏大高远——观衣惠春山水画创作有感 …… 席小平

以画读心：房树人测验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中的应用

陈志平 于文涛

一、应用背景

严重精神障碍是大脑机能活动紊乱引发的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障碍的总称，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六大类。随着精神卫生政策完善与医疗技术提升，疾病检出率持续提高，康复者数量不断增加，其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对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常规临床服务中，对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的评估多依赖精神状况检查、结构化临床访谈及标准化心理量表。这类方法虽具备系统性、客观性优势，但应用于该特殊群体时局限性显著：康复者普遍存在认知功能受损、情感表达障碍、人际沟通困难等问题，语言表达能力不足、配合度较低，导致外界难以精准把握其内心真实状态。临床实践中，许多康复者因病情无法清晰描述自身情绪与认知感受，易造成评估结果偏差，进而影响康复干预方案制定与康复效果跟踪。

在此背景下，精神卫生领域亟须一种能弥补结构化评估工具缺陷的辅助手段，其需满足四大核心要求：可绕开言语沟通屏障，通过非言语渠道获取信息；威胁性低，降低受测者心理防御，以自然易接受的方式开展评估；能触及潜意识，深入揭示康复者内心世界；兼具评估与干预双重功能，在评估心理状况的同时发挥疗愈作用。

房树人测验作为投射性绘画测验，恰好契合上述需求。该测验操作简便、无文化限制，能有效降低受测者防御心理，受测者仅需在白纸上自主绘制房子、树木、人三大核心要素，画面大小、物体距离、额外元素添加均由作画者决定。其作为潜意识的外化载体，可绕过防御机制，减少表达障碍，直观呈现康复者在自我认知、家庭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状况及深层次心理特征。随着表达性艺术治疗与康复理念的普及，房树人测验已从简单的诊断筛选工具，逐步整合到精神卫生服务全过程，在辅助评估、建立治疗关系、康复期自我探索与社会功能重建等环节均能发挥重要作用。

二、实践应用

房树人测验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中，可根据康复者不同病程阶段开展个性化个案服务，也可通过团体活动形式实现群体心理疏导与问题筛查，二者结合形成全方位的服务应用体系。

（一）分阶段的个案服务

针对康复者病情波动期、个人成长期、个人稳定期的不同心理状态与需求，房树人测验能精准切入，为服务开展提供方向，助力康复者实现心理状态改善与个人成长。

1. 病情波动期：探寻根源，纾解情绪

服务对象 S 为 33 岁男性精神分裂症康复者，其发病与父母相关，但始终不愿过多提及过往。社工先通过尊重隐私、持续关注病情、链接关怀资源等方式与 S 建立初步信任联系，初期 S 仅被动回应，对主动沟通存在反感。在 S 转入社区约 10 个月后，社工从精神卫生防治系统发现其新增用药种类，及时跟进后得知，其因亲子关系问题出现情绪波动、失眠等症状，在 S 同意见面后，发现其情绪低落且无法清晰地表达内心感受，遂引入房树人测验。

S 对测验产生兴趣，称 10 年前曾参与过类似测试，在社工引导下完成画作。在结合画作的沟通中，S 坦言画中房子表达了自己对与父母欢聚的期待，而现实中这一期待无法实现，进而倾诉了儿时缺少父母关心、母亲强势偏心、父亲管教粗暴的往事。其内心始终纠结于原生家庭的伤害，既怨恨父母，又渴望获得关爱与认可，这也是导致其情绪波动、失眠的主要原因。

社工运用专注倾听、鼓励表达、摘要总结等谈话技巧，结合举例说明、自我揭露等方法，引导 S 理解父母当年的婚姻困境与自身局限，让其意识到原生家庭的伤害并非自身过错。待 S 情绪平复后，社工运用想象技术引导其回望儿时的自己，感受自身的成长与强大。

同时，社工引导 S 根据记忆，尝试绘制了 10 年前的房树人画作，对比发现，10 年前的画作单调矮小、元素缩在一侧、人物躲在树下难以辨认，而当下的画作已呈现出明显的状态改善。

通过画作对比，S 清晰地看到自身 10 年间的变化，坦言妻子的支持是重要转折点，如今自己已拥有美满的事业与家庭。社工借此引导其接受人生的不完美，放下对原生家庭的执念，珍惜当下、放眼未来。咨询后，S 的负面情绪显著缓解，对父母的怨恨逐渐减轻，病情趋于稳定，与社工也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关系，从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倾诉困惑。

2. 个人成长期：打破执念，重建信心

康复者 T 因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每日需服用十几种精神类药物。长期以来，其主观上放大身体不适的痛苦，对康复失去信心，甚至放弃了爬山等原本喜爱的活动。社工在了解其工作与用药情况后，邀请其绘制房树人画作，通过分析画作发现，T 因过度担忧身体状况，无意识中为自己设置了诸多心理限制，其身体实际状况并未如自身想象般糟糕。

针对这一问题，社工建议 T 相信自身身体潜能，避免过度焦虑放大不适感，在身体状况允许时多亲近自然；通过“白熊实验”让其理解，强行回避问题并非合理的处理方式；同时普及精神疾病知识，让其知晓经规范治疗后，患者可与正常人一样生活，引导其摆脱病耻感的束缚。此外，社工协助 T 回顾以往喜爱的活动，鼓励其重新尝试，并结合自身肠胃疾病调理经验，分享规律饮食、加强锻炼的重要性。经疏导，T 意识到自己被固有观念束缚，承诺将调整心态，重新尝试走出家门、与人交往。

3. 个人稳定期：挖掘优势，促进社交

康复者 W 由社工督导的同工负责服务，初次接触时，W 存在自卑、退缩表现，伴有被害妄想，不敢外出，其房树人画作也直观反映出这一心理状态。但 W 能按要求完成绘画，且表现出了解自我、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意愿。

经过一段时间的个案服务后，同工再次运用房树人测验对 W 进行评估，从后测画作中发现，尽管 W 身患疾病、历经磨难，但其内心仍怀揣美好向往，渴望与人交流、拥有朋友，画作同时反映出其善良热心、愿意主动付出、具备基本沟通能力的特质。通过前后画作对比，服务成效清晰显现：W 的心理状态发生明显转变，对自身优势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与人交流的自信心显著提升。

（二）房树人测验团体辅导活动

结合国家及深圳市有关精神卫生的相关政策要求，为促进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社区融入，社工在

N 社区针对康复者及家属开展了房树人测验主题团体辅导活动，旨在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调节身心平衡，增进自我了解、推动自我成长。

活动伊始，社工为参与者讲解压力产生的常见原因，普及基础心理知识，介绍实用解压方法，随后引入房树人绘画环节。初期，不少参与者因担心画得不好产生心理顾虑，在社工的耐心鼓励下，所有参与者均完成画作，部分康复者甚至在绘画过程中不自觉地大笑，实现了情绪的自然释放。

在画作分享环节，社工引导参与者从自身作品中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内心的期待，现场氛围轻松愉悦，有参与者幽默的分享引得众人阵阵欢笑。参与者均表示，此次活动有趣且富有意义，能引发自身深度思考。活动后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者活动整体满意度达 90% 以上。

活动过程中，社工通过观察画作发现，一位康复者的画作尺寸偏小、笔迹存在反复涂抹情况，推测其当前心情不佳，经后续沟通证实，该康复者因长期失业与父母矛盾频发。针对这一情况，社工为其制定了个性化跟进服务计划，实现了潜在问题的及时筛查与针对性干预。

N 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房树人测验团体活动能有效筛查康复者的潜在心理与生活问题，为后续跟进服务提供依据。在实际工作中，精防社工可先通过房树人测验初步判断康复者心理状态，再结合其情感状态、自我认知、社会支持体系等情况制定个性化服务计划，切实解决康复者实际问题，稳定其病情。

三、实践反思与未来展望

在社会工作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笔者结合个案会谈技巧，让服务对象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取得了良好的服务效果。实践证明，房树人测验不仅可作为临床评估工具，还能充当疗愈工具。它也印证了，即便深受严重症状困扰，康复者的内心依然存在被看见、被倾听的需求。这种人文关怀视角，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服务关系，促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

尽管房树人测验具备诸多优势，但在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服务中的实际应用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一，测验结果解读缺乏统一标准。目前国内尚未形成针对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的专项评分标准，解读过程易受评估者的经验、主观判断影响，导致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不足；其二，评估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部分评估者受训时间有限，难以准确识别绘画元素背后隐藏的心理投射，进而影响结果的有效应用。

展望未来，房树人测验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应用需在以下方面持续深耕：一是构建本土化标准化评分体系。结合我国精神康复者的心理特征与文化背景，细化各类绘画元素的评分维度与判断标准，提升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二是加强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训。将房树人测验纳入社康精防医生、精防社工的继续教育内容，通过系统扎实的培训，提升其专业解读能力；三是探索房树人测验与数字化技术的融合应用。例如，开发房树人绘画智能分析系统，以提升评估效率与准确性，为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更全面、个性化的精神卫生服务。

房树人测验以非语言的独特方式，搭建起通往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内心世界的桥梁。在精神卫生服务不断精细化、人性化的发展趋势下，唯有持续完善其应用体系、提升专业应用能力，才能让这一“以画读心”的工具发挥更大价值，为严重精神障碍康复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

融合式康复：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构建

——基于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多站点实践

黎红珊 于文涛 吕巧英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是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非住院化的社会支持与专业干预，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减轻家庭照顾负担、增强社区包容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各地逐步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建设，在政策引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探索。然而，服务碎片化、专业力量不足、部门协作不畅、社区接纳度低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社工机构如何构建可持续、专业化、本土化的服务模式，成为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

广东省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自 2023 年起承接韶关市多个县区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与复制性的服务模式。本文以其在武江、翁源、乐昌、南雄、新丰等地的服务实践为案例，尝试提炼其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运作逻辑与实践成效，以期为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一、服务理念与整体框架：全人康复与生态视角

中心的服务模式建立在“全人康复”（Recovery-oriented）和“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不仅是症状控制，更是其在生活、社交、职业、认同等维度的整体性重建。该模式将患者置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多层系统中，注重各系统之间的互动与资源流动，推动形成支持性康复环境。

服务框架以“九大康复模块”为核心，涵盖服药训练、预防复发、躯体管理、生活技能、社交技能、职业康复、心理康复、同伴支持、家庭支持，形成从基础服药依从到高层次社会融入的阶梯式服务链条。这一设计既回应了患者多维需求，也体现了服务递进的逻辑性。

二、多维介入方法体系：整合性社会工作手法的运用

在具体介入方法上，中心采用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相结合的三维策略，体现社会工作的整合实践取向。

（一）个案管理：精准化与持续性

针对高风险、高需求或处于危机状态的患者，中心实施“一人一档”个案管理模式。社工通过需

求评估、服务计划制定、资源链接、定期跟进与效果评估，提供个性化支持。例如，在武江区，社工为一名独居的抑郁症状青少年提供了持续的心理疏导、学业支持链接及居室环境改善协助，充分展现了个案管理在危机介入、资源整合与长期陪伴中的关键作用。

（二）小组工作：治疗性与发展性并重

中心围绕特定康复目标设立结构化小组，如社交技能提升小组、职业康复小组、心理成长小组等。小组内容设计注重体验式学习与同伴互动，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手工制作、团体讨论等方式，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认知能力。例如，“同伴手牵手”社交技能小组通过共同策划购物、合作准备餐食等贴近生活的任务，在真实情境中锻炼参与者的现实交往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三）社区康复与倡导：营造包容性环境

社区层面，中心通过精神卫生宣传、主题游园、健康讲座、社区活动等形式，普及精神障碍可防可治理念，减少公众歧视与患者病耻感。例如，借助世界精神卫生日等契机开展大型社区倡导活动，或在传统节日邀请患者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游园互动，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患者与社区的良性互动，逐步构建起理解、接纳与关爱的社区支持网络。

三、跨专业团队建设：以社工为核心的多学科协作

高质量的服务离不开专业的团队。中心构建了一个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核心，有机融合精神科医生、精防医生、心理咨询师、康复治疗师、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在内的跨专业服务团队。为保障团队专业能力持续提升，中心建立了包括定期内部培训、疑难案例研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外部先进机构参访学习等在内的多元化团队成长机制。例如，组织团队骨干赴深圳学习复元模式先进经验，邀请粤北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进行定期专题督导，开展模拟癫痫发作等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演练等，这些都体现了团队在实践中学习、在协作中进步的专业发展路径。

四、多部门协同机制：政策衔接与资源整合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工作涉及民政、卫生健康、残疾人联合会、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个职能部门，有效的跨部门协作是服务得以可持续推进的关键保障。中心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主动参与政府组织的项目协调会议、牵头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沟通机制、联合各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服务活动等方式，积极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格局。例如，在新丰县项目启动会上，中心促成多部门负责人共同出席并明确各自职责；在武江区日常服务中，社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医生、社区残联专员组成联合小组入户探访，实现了康复服务、医疗支持、社区关爱的“康—医—社”有效联动。

五、“中心—站点—居家”三维服务网络

为最大限度覆盖不同需求与处境的服务对象，中心创新性地构建了“定点服务中心 + 社区流动站点 + 居家上门服务”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服务网络：

中心康复：依托固定的服务中心，开展需要特定设施或长期跟踪的系统化康复训练、深度小组治疗及专业评估。

站点轮动：遵循“就近就便”原则，在多个乡镇、社区设立临时服务点，定期开展主题康复活动、健康讲座及初级咨询服务，将服务送至居民“家门口”。

居家康复：针对因病情严重、出行不便或地处偏远等原因无法到达服务场所的高需求患者，由社工协同精防医生、社区工作者提供一对一的上门评估、康复指导、心理支持及家庭护理培训。

该三维网络不仅确保了专业服务的深度与系统性，也极大地增强了服务的空间可及性、形式灵活性并扩大了人群覆盖范围。

六、服务成效与模式反思

根据各服务站点的工作数据与评估反馈，该模式在提升患者服药依从性、显著改善其生活自理与社会适应功能、有效增强家庭照护能力与心理支持、逐步降低患者及其家庭的病耻感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服务对象总体满意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证明了该模式在系统性、专业性和本土适应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许多挑战：跨部门协作中仍存在沟通成本较高、部分领域协作深度不足的问题；社区层面可供使用的康复场地与设施时常受限，制约了服务容量；部分患者及家属因疾病认知或社会压力导致参与动机不强；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受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影响较大。展望未来，需要进一步在政策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以促进部门衔接，整合利用更多元的社会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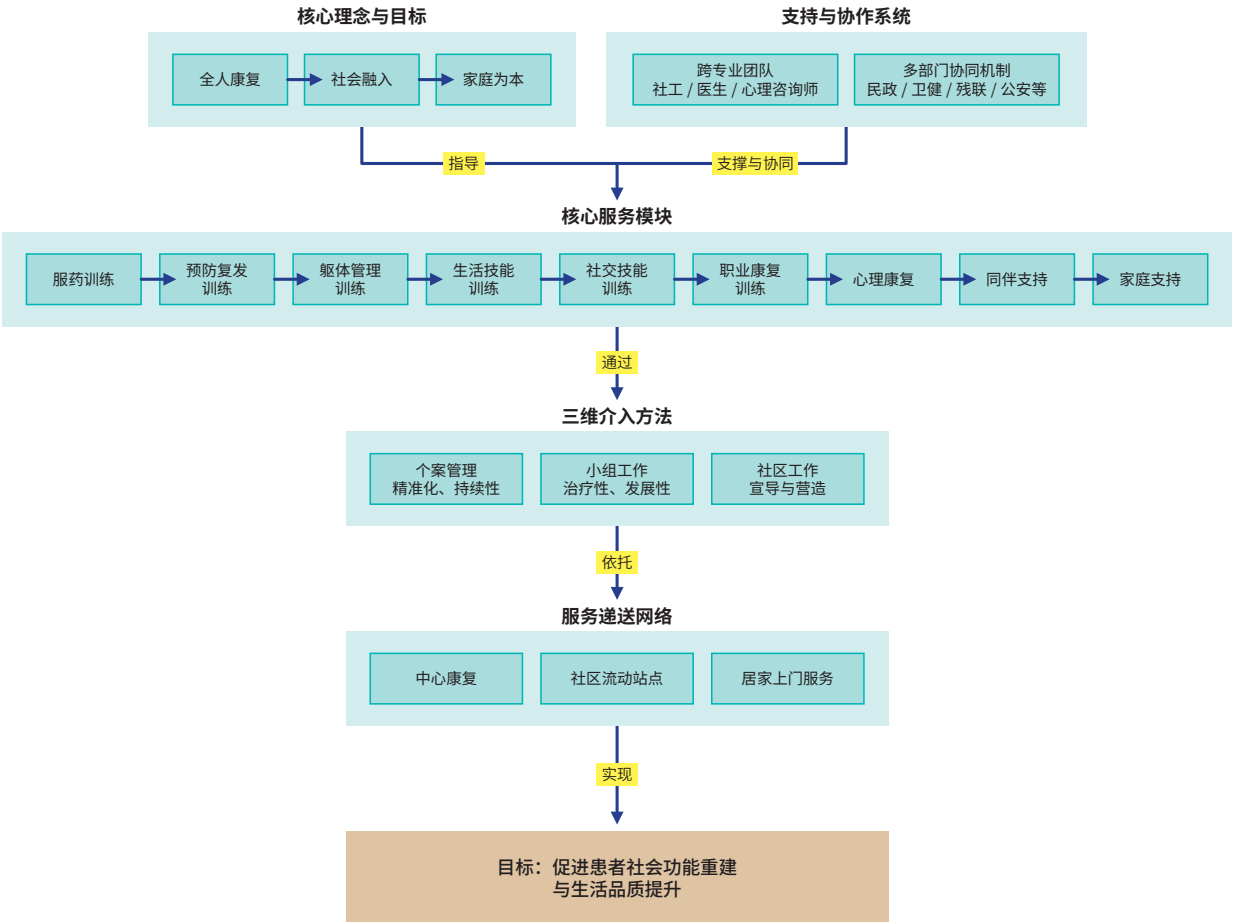


图 1 精神障碍患者的融合式康复模式

探索引入数字化管理工具以提升效率，并着力深化“医院—社区—家庭”之间的顺畅转介与衔接机制，从而不断增强服务的精准性、协同性与长效性。

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全人康复为导向、以九大模块为内容、以三维介入为方法、以跨专业团队为支撑、以多部门协作为保障”的融合式服务模式（见图 1）。

这一融合式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工作在资源整合、需求评估、系统干预和关系构建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朝着更加专业化、系统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范例。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踪模式的长期效果，并探索其在城乡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的优化与推广路径。

（作者单位：黎红珊，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文涛，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吕巧英，韶关市百善孝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当“东方智慧”遇见“AI之眼”：团体心理咨询的数智化新篇章

韦志中 姚洪敏 刘艳芳 吴 颖

在团体辅导室里，十几位成员围坐一圈，彼此分享着近来的情绪起伏。带领者一边倾听，一边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姿态和互动中的微妙变化——有人低头反复搓手，有人话说一半又咽了回去，还有人嘴角上扬，面带笑意，眼神却毫无温度。这些未曾说出口的情绪信号，需要依赖咨询师的经验去捕捉，而经验再丰富的人，也难免会有顾及不到的角落。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实时“看见”每位成员身体层面的反应，如谁的心跳在加快、谁的手掌心开始出汗、谁表面平静却已经进入了应激状态等，那么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会不会有所不同？这正是北京中科心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心研”）等科研机构正在尝试的方向：把多模态AI感知技术与本土化的“本会团体心理咨询”模式结合起来，为团体心理工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本会团体：根植东方智慧的“心”路径

本会团体心理咨询模式，是心理学家韦志中提出的一套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团体咨询体系。它的理论底色是一种东方整体观——不把人的困扰拆解成孤立的“问题”，而是把人放回到关系网络、家庭脉络、社会情境乃至文化传统中去理解。其核心理念是“成为一个人”，意思是心理咨询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地消除症状，而是帮助个体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人格层面的再生长。

该模式在实践中常通过三条路径推进实施。一是体验式团体心理教育，通过设计具体的活动，让成员在“做”的过程中自己有所感悟，而不是坐在那里听道理。二是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成长，借助绘画、黏土、心理剧等，甚至韦志中提出的“石头的故事”这类载体，让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找到安放之处。三是文化动力团体心理治疗，通过调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符号、仪式和集体记忆，让团体内部自然生成疗愈的能量。本会团体心理咨询模式的优点在于，它比较贴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人们普遍在意关系的质量，对权威有微妙的感受，情绪表达上往往含蓄内敛，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更容易产生共鸣。

但即使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团体带领者，也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怎样精准把握每一位成员在团体互动中的即时状态？十几个人同时在场，有人在讲述、有人在流泪、有人长时间沉默，单靠人眼的观察，总是会有盲区的。

AI的“读心术”：从观察到量化

人工智能的优势恰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量化的、客观的补充。以中科心研研发的多模态人因感知终端为例，在咨询过程中，除了搜集录音、生成咨询报告之外，还能够实时精准采集佩戴者的生理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脉搏、皮肤温度、心率、手汗等。这些指标，都是直接与人的情绪波动起伏相关的。即使是肉眼看起来不明显的微小起伏，甚至是佩戴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绪波动，在AI科技的检测下，也难逃咨询师的眼睛。这将大幅提升团体咨询的效率和准确率。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统支持“超扫描技术”，也就是可以同时对多位团体成员进行数据采集，进而生成团体情绪的“热力图”。哪一个环节成员更投入、哪一个环节团体情绪更高，彼此间的信任达到顶峰，相关信息通过数据直观呈现，一目了然，为提升团体带领效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当“本会团体”遇见“多模态AI”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次表达性艺术团体成长工作坊中，成员们正在专注地选择代表自己“内在小孩”模样的石头。没有AI终端支持前，团体带领者完全需要依靠经验和观察来判断团体成员是否被触动、在哪个时间点情绪流露更明显，团体成员一多，难免会有遗漏和偏差。

而现在，有了AI终端的支持，团体带领者能实时看到成员的生理数据反馈。当某位成员心率突然上升、皮肤温度升高，即使这个成员表面看起来是镇定自若、毫无波澜的，系统也会自动识别出这个“关键时刻”。带领者就能准确抓住时机，适时邀请成员表达内心感受，进行支持性干预，从而让参与者更加坚信心理学或者本会团体的精妙和神奇之处。

同时，作为团体带领者，保证团体成员都投入进来产生“共鸣”，也是尤为重要的。借助（下转02页）

本会团体视角下的多系统干预：一例割腕自残案例的家庭重塑与协同实践

一苇渡心 张宇娟 杨 玲 石 榴

家庭心理危机一旦严重到需要拨打110，说明个体心理问题已经演变为公共安全事件，家庭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痛苦也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心港湾·心理茶馆” 曾接诊过一名21岁的女性来访者小雅（化名），她多次割腕自残，父亲为此报警，随后由社区与民警转介，进入专业心理咨询流程。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也暴露出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司法、社区、心理干预三个系统同时介入时，怎样有效整合资源，把家庭危机转变为修复与成长的机会？

长期扎根社区的心理服务团体，在处理这类高危个案时，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诊室咨询模式，而要成为连接司法部门、家庭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键纽带。本文以小雅的个案为实践样本，探讨心理服务团体在多系统协同干预中，如何同时承担破局与修复的双重任务，为同类家庭危机干预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思路。

一、破局：化解司法介入带来的家庭张力，重建信任关系

小雅这个案例最突出的特点，是父亲报警这一行为，直接打破了原本封闭且僵化的家庭互动模式。父亲的初衷是借助法律力量制止女儿伤害自己，但在小雅看来，这意味着被家人抛弃、被外界贴上标签。此时心理服务团队最紧要的工作，不是立刻开展深度治疗，而是先稳住危机局面，修复家庭与专业力量之间的信任。

本会团体在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以下两项做法。

（一）中立承接转介，营造非评判的干预环境

民警作为危机干预的第一道关键防线，能够及时制止自伤行为、保障人身安全，避免危机扩大。但对于家庭沟通、孩子情绪问题处理、深层心理原因探索

（上接01页）AI采集技术，带领者能精准把握在哪些环节团员是“同频共振”的，而在哪些环节部分成员是处于“游离”状态的。生理指标数据的“诚实”，避免了成员的“假投入”，团体咨询师也可以根据数据反馈，提升自身带领技巧，达到自我督导的目的。

人机协作：技术的边界与伦理的底线

当然，技术再先进，也需要明确它的边界。技术的引入注定会面临一些伦理层面的挑战。隐私保护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心理数据比财务数据更敏感，因为它承载着一个人最脆弱、最隐秘的部分。中科心研的系统支持局域网本地化部署，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但使用者在采集数据之前，仍然需要获得团体成员的知情同意，并明确告知数据的用途和销毁方式。

其次，需要警惕的问题是技术偏见。如果训练AI的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那么AI的判断也会偏离实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具有差异性，有人喜怒形于色、有人习惯内敛克制等，AI需要具备足够的文化敏感性，才能真正服务于多元的群体。

未来展望：让心理服务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

技术的目的不是取代人，而是帮助人更好地理解人。多模态感知终端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为什么发生”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仍然需要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判断。本会团体心理咨询强调“技术、导师、场”的“三位一体”，当AI作为技术的一部分介入时，它可以帮助导师更好地把握团体动力的“场”，但它终究无法替代导师在“场”中的真实在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AI感知技术与心理咨询的结合，与其说是一场“替代”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赋能”的进化。它让心理咨询师多了一双可以看清情绪脉动的“AI之眼”，也让本会团体这套根植于东方智慧的实践体系，在数智时代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

（作者单位：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大湾区本会团体心理咨询研究院）

等，是无法干预的。“心理茶馆”恰好能补充这部分需求，作为一个中立部门，我们与小雅的家人共同坐下来，说明解释干预不是批判谁，更不是确认谁对谁错。核心目标是保护生命、缓解情绪冲突，帮助小雅家人从紧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二）搭建安全保障机制，降低再次危机风险

在司法警示的基础上，和小雅及其父母共同签订“零自伤约定”。这份约定不只是约束小雅的行为，也是给其父母吃了一颗定心丸，避免父母过度应激，强化孩子的情绪表达。咨询师会作为稳定的支持力量，在孩子情绪失控、家庭崩溃边缘时能够及时介入，提供专业支持。这样一来，家庭就不会因为恐慌而再次报警、扩大影响，也能为后续干预打开通道。

二、修复：从关注个体症状，转向整体家庭系统调整

危机暂时平稳后，我们发现小雅的割腕自伤行为，并非表面看到的是个体情绪调节障碍那么简单，深层原因是家庭关系的病态纠缠、彼此控制。母亲因自身童年创伤过度控制女儿，父亲因无力应对冲突而选择回避，父母又都在孩子割腕自残后过度妥协、关注，家庭长期陷入“指责—自伤—愧疚—更激烈试探—指责”的死循环中。结合系统式家庭治疗思路，本会团体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修复工作。

（一）用直观方式打破“以爱为名”的情感捆绑

在家庭治疗中使用“家庭雕塑”“循环提问”等技术，让家人更直观地感受彼此互动状态。当母亲看到自己紧紧抓着女儿、小雅却蜷缩在角落的画面时，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为在自我牺牲，拯救孩子，其实是在向孩子索取安全感。这种视觉化的冲击，比单纯的语言分析更有说服力。

（二）引导父亲回归家庭角色，强化支持功能

父亲一直的应对模式是回避冲突，被无力感笼罩，觉得自己劝不住妻子，更安慰不了孩子。但这样的方式，在小雅心里，却是冷漠和不关心，她不确定父亲是不是真的在意自己。通过双向沟通与澄清，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他从慌乱之下“报警求助者”的角色，转变为家庭规则的维护者和安全守护者。同时，加强夫妻之间的沟通合作，让母亲转变“指责”的沟通方式，能够自然地邀请丈夫提供支持，让小雅跳出家庭冲突旋涡。

（三）处理代际创伤，减少焦虑投射

母亲童年有被抛弃的经历，加上觉得丈夫“不靠谱”，进而把全部安全感寄托在女儿身上。我们借助支持性团体的安全氛围，扩大母亲的社交圈，帮助母亲面对自身创伤，看到自身优势，逐步实现自我独立。当母亲不再把生存焦虑强加给女儿，她对女儿的失望和指责也随之减少，小雅也就不需要再用自残的方式，反复确认自己是否值得被爱。

三、护航：联动多方系统，支持小雅回归正常生活

小雅的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心理问题外溢到社区的典型，她的康复只靠本人和家庭是不能实现的，还需要社区、司法、学校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不仅要帮助小雅调整情绪，改善家庭沟通，还需要切实恢复其社会功能。

（一）与社区、司法部门保持顺畅沟通

家庭危机的干预和处理，是一场持久战，也离不开社区的持续跟进。定期把小雅的情况及时反馈给社区工作人员，从高危干预逐步调整为稳定观察，不定期地与社区讨论有效的跟进策略，同时创造机会，让小雅参与社区志愿者工作，逐步恢复其社会功能。

（二）协助沟通学校，争取复学支持

学校的支持和接纳，对于青少年的康复至关重要。当然，学校也要为其他学生负责，担心小雅自伤会给其他学生带来影响，或者在学校情绪失控。我们从心理专业角度向学校说明孩子情绪失控原因及其目前恢复状况、突发状况处理，并提供心理状态评估说明，为小雅成功争取到试读适应的机会。

（三）构建同伴支持圈，缓解孤独感

小雅在休学之后，基本陷入了“零社交”状态，不出门、不与朋友联系、不交新朋友，把所有心理需要都寄托在父母身上，让父母不堪重负。我们推荐其加入心理人际交往团体，在和同龄人的交流中，她逐渐敞开心扉，并意识到有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情绪困扰，不是自己“不正常”。渐渐放下了病耻感，逐步尝试回归正常生活，对家人的情感依赖也明显减少。

四、启示：搭建“心理—司法—社区”协同干预模式

回顾整个案例不难看出，很多看似突发的家庭危机事件，其实是家庭心理问题的社区型外溢，只有心理、司法、社区多方的通力合作、持续跟进，才能有效、彻底地解决问题。结合本次实践，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建议。

（一）设立基层危机缓冲站点

在派出所、社区建立类似“心理茶馆”的过渡服务点，警情处理完毕后，心理团队立刻跟进，补上司法处置与家庭疗愈之间的空白，避免家庭因为羞耻感拒绝帮助。

（二）从一对一咨询扩展到团体支持

单一的个案咨询容易陷入家庭内部矛盾，效率也偏低。发挥团体辅导的优势，开设父母成长小组、青少年情绪小组等平行团体，借助同伴之间的互相支持，加快改变速度。

（三）推动心理服务与基层治理融合

司法层面负责保障安全，心理层面负责修复情绪。建议将家庭关系改善、风险等级下降等（下转 04 页）

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状与智慧助老服务优化研究

申雨轩 王宏烨 马雪梅

摘要：我国深度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加速转型的矛盾日益凸显，城市社区老年群体面临显著数字困境，其生活、公共服务及社交信息获取均受到影响。在生活、公共服务、社交信息场景中，老年群体面临数字化操作难、服务获取受阻、沟通与信息辨别能力弱的问题。该困境源于个体生理心理制约、社会支持体系短板及技术适老化滞后，当前智慧助老服务还存在供给碎片化、内容同质化、协同低效等问题。对此，需构建“社区为核＋多元协同”服务体系，创新场景化实操培训与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完善政策、资源及评估保障机制，以缩小数字鸿沟，助力适老型数字社会建设。

关键词：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智慧助老服务；服务模式优化

我国深度老龄化进程与数字社会的全面渗透形成叠加态势，城市社区作为老年群体日常活动的核心空间，成为数字适配与需求满足的关键场域。移动支付、线上政务等数字服务重塑生活方式，却使部分老年群体陷入“想用不会用”的困境，影响基础生活便捷性，削弱其公共服务享受与社区参与能力，加剧社会融入难题[1]。《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明确提出数字包容导向，而摆脱上述困境的核心在于社区层面的服务供给与模式创新。当前社区智慧助老实践中，服务碎片化、内容同质化、协同低效等问题较为突出，难以精准匹配老年群体的分层需求。基于数字鸿沟的现实挑战与深层成因，探索以社区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的智慧助老服务优化路径，并配套完善保障机制，既是推动数字包容理念在社区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增强老年群体数字生活获得感、构建适老型数字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研究基础与理论建构

（一）研究背景与价值定位

人口深度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建设的协同推进，使城市社区成为老年群体数字生活适配的关键微观场域。老年群体在社区场景中的数字服务使用障碍，已延伸至基础生活服务、公共事务办理、社区社交互动等核心领域，直接影响其生活便捷性与社会参与度，构成数字时代民生保障需重点回应的现实议题[3]。政策层面，国家出台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与数字包容相关实施方案，明确将社区作为推动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核心实践载体，智慧助老服务的完善程度直接关联政策落地效能与民生保障质量。学术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对策提出或单一现象描述，对社区层面数字鸿沟的形成机制、服务落地路径的系统性探讨存在空白，相关论述可填补数字社会学与老年服务领域的交叉研究缺口，为社区智慧助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逻辑指引。

（上接 03 页）指标纳入社区治理效果评价，真正实现法理与情理兼顾、身体与心理的共同守护。

五、结语

小雅的康复还在进行中，但这个曾经濒临破碎的家庭已经有了明显变化：遇到矛盾时，不再把报警当作唯一办法，而是愿意说出心里的脆弱，用拥抱和沟通代替指责。

这一案例让我们更加确信，本会团体的价值不只是疗愈个体的伤口，更在于修复家庭这个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当司法守住安全底线，心理给予温暖支持，社区提供成长环境，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人，都能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单位：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大湾区本会团体心理咨询研究院）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

这里的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指居住于城市建成区、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日常活动半径以社区为核心且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呈现差异化特征的群体，可细分为数字适应型（能独立操作基础数字服务）、数字依赖型（需外部协助完成数字操作）、数字排斥型（无数字技术接触意愿与行为）三类。社区老年数字鸿沟指该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使用—转化”全流程中呈现的差异化差距，具体包含接入鸿沟（数字设备持有率不足、网络覆盖不均衡）、技能鸿沟（数字操作能力欠缺）、素养鸿沟（数字信息甄别与风险防控能力薄弱）、转化鸿沟（数字技能难以转化为生活便利）四个维度。社区智慧助老服务模式是以社区为空间载体，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资源，依托数字技术与线下服务协同，提供数字技能培训、适老服务适配、数字风险防护的系统性服务体系，核心在于实现“技术适老”与“服务助老”的深度联动[4]。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以数字鸿沟理论为核心，该理论从早期聚焦“接入差距”演进至关注“多维能力差距”，可为解析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使用、转化各环节的障碍提供精准理论视角[5]。融合社区共同体理论，其强调的社区在老年支持网络中的纽带功能，为确定服务场景、整合多元资源提供理论依据；结合服务设计理论，其倡导的需求导向原则，为优化智慧助老服务内容与流程提供方法论指导，三者协同构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采用“定量+定性”混合研究范式，定量层面通过问卷调查开展，覆盖不同建设类型的城市社区，旨在通过数据量化表征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整体现状；定性层面通过深度访谈与案例分析推进，访谈对象涵盖老年群体、社区工作者、助老志愿者，案例选取典型社区智慧助老实践，二者结合可实现对数字鸿沟形成的深层归因与老年群体真实服务需求的精准挖掘，保障结论的科学性。

二、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状与成因剖析

（一）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

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在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社交与信息三大核心场景中呈现差异化且显著的特征。生活服务场景中，老年群体面临数字化操作能力与日常需求的适配失衡，移动支付作为基础数字工具，其使用障碍导致部分老年群体在社区商超、农贸市场等场所遭遇交易不便，线上水电燃气缴费、社区生鲜团购等便民服务的操作门槛，进一步限制其自主获取生活便利的能力。公共服务场景下，数字渠道的主导性与老年群体操作能力的落差尤为突出，医疗领域的线上挂号、缴费系统与政务领域的养老金认证、社保查询平台，因界面设计复杂、操作流程烦琐，使老年群体难以独立使用，而线下服务窗口的缩减则加剧了“数字排斥”现象，出行领域的网约车、线上购票等服务同样因数字门槛形成使用壁垒。社交与信息场景中，老年群体的数字脱节表现为沟通渠道受限与信息甄别能力薄弱，视频通话、社区社交平台的使用障碍影响其与子女及社区的互动，对数字信息的辨别能力不足则增加了误信虚假信息的风险，整体呈现“想融入却难融入”的数字生存状态。

（二）数字鸿沟形成的多维成因

城市社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形成是个体、社会、技术多维度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个体层面，生理机能衰退构成基础制约，视力下降、手指灵活度降低、记忆力减退直接影响数字设备的操作准确性与效率；心理上的“数字恐惧”与“习得无助”情绪普遍存在，前者源于对操作失误导致财产损失的担忧，后者则因多次尝试失败形成的自我否定，双重心理障碍削弱了老年群体的数字学习意愿；在认知方面，低学历老年群体对数字术语、操作逻辑的理解能力较弱，学习效率较低，进一步扩大与数字社会的差距。在社会层面，支持体系的短板形成外部制约，家庭方面因子女工作繁忙导致的数字帮扶缺位，使独居老年群体缺乏持续指导；社区的智慧助老服务多为阶段性活动，缺乏长期稳定的培训机制与服务阵地，难以实现技能巩固；公共服务领域“线上优先”的导向忽视老年群体需求，线下服务资源的压缩加剧了数字排斥。在技术层面，适老化设计的滞后与数字环境的复杂性构成直接障碍，多数常用App的“老年模式”仅停留在界面简化，未针对老年群体需求优化操作流程，弹窗广告、专业术语则进一步增加了使用难度。

（三）社区智慧助老服务的现存问题

当前城市社区智慧助老服务在供给机制、内容设计、协同效率三个维度存在显著问题，难以有效应对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现有服务多以节日活动、短期培训等形式开展，缺乏常态化、系统化的服务机制，导致老年群体“学后忘、用不上”，数字技能难以转化为日常使用能力，服务效果难以持续。服务内容存在同质化倾向，未根据老年群体的数字能力差异（数字适应型、依赖型、排斥型）设计分层服务，部分培训内容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脱节，同时对数字安全、防诈骗等核心需求的关注不足，服务针对性与实用性较弱。服务协同呈现低效化态势，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缺乏统一的协调平台与联动机制，企业的适老化技术资源与社区的服务需求难以有效对接，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因流动性大、专业不足导致服务质量不均，整体服务体系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优势。

三、社区智慧助老服务模式优化路径与保障措施

（一）“社区为核+多元协同”智慧助老服务模式构建

以社区为核心载体搭建“1+N”智慧助老服务体系，

其中“1”特指社区智慧助老服务站，作为固定物理阵地具备数字设备体验、常态化技能培训、实时问题咨询等基础功能，同时整合社区现有空间资源（如老年活动室、便民服务中心），嵌入“数字+健康”便民模块，协助老人预约家庭医生、解读电子体检报告，形成“一站式”服务节点；“N”则涵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协同主体，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导向、统筹公共资金与监管服务质量，企业聚焦适老化技术研发（如简易操作设备、语音交互系统）与社区场景适配，社会组织承担志愿者招募培训、服务流程运营与需求调研反馈责任，家庭发挥日常数字帮扶与情感支持作用，通过明确权责边界实现资源高效整合。在此基础上建立“分层分类”服务响应机制，针对不同数字能力老年群体实施分层服务：对数字适应型，提供智慧社区深度应用培训（如使用智慧养老平台预约上门护理）；对数字依赖型，建立“1对1帮扶档案”，每周固定1~2次上门或线上协助，同步记录老人技能提升进度（如从“需协助缴电费”到“能独立操作”）；对数字排斥型，通过“数字体验日”（用简易设备与子女视频通话、查看家庭照片）搭配“银龄同伴分享会”（数字适应型老人讲述使用心得），逐步消除数字恐惧，实现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匹配。

（二）社区智慧助老服务内容与形式创新

从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与使用习惯出发，推动服务内容与形式的场景化、融合化创新。在服务内容上，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在社区超市、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在超市练习移动支付，在卫生服务站实操线上挂号缴费，在党群服务中心学习社区通知查询，通过“边学边用”强化技能记忆；同时编制“图文+语音”双版本《社区老年数字技能指南》，标注关键步骤与风险提示，降低学习难度。在服务形式上，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体系，线下设立“智慧助老体验区”，配备大字体手机、简化版电脑等适配设备供免费练习，安排专业志愿者驻点指导；线上搭建“社区银龄数字课堂”，上传“步骤拆解式”教学短视频（如“线上买菜三步法”“社保查询五流程”），支持语音播放与字幕放大功能，满足老年群体碎片化学习需求。同时，引入“银龄数字伙伴”机制，遴选社区内数字适应型老年群体作为同伴导师，经专业培训后与数字依赖型、排斥型群体结对帮扶，借助同辈沟通的情感认同优势降低学习心理壁垒；建立同伴导师考核机制，通过定期技能测试与服务反馈评估，保障帮扶质量的稳定性。此外，增设数字安全专项服务，联合公安、金融机构、法律工作者开展“数字防诈骗”系列讲座与案例模拟，讲解虚假链接识别、仿冒App辨别等实用技巧，同步开通“社区数字安全热线”，提供实时咨询与应急问题处理服务，增强老年群体数字使用安全感。

（三）智慧助老服务落地的保障机制

从政策、资源、评估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保障机制，确保智慧助老服务长效落地。政策与制度保障层面，将社区智慧助老服务纳入地方政府老龄事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明确街道、社区的服务责任与量化标准（如服务站建设覆盖率、培训频次），同时出台《社区智慧助老服务规范》，统一服务流程、志愿者资质要求与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服务随意性。资源与资金保障层面，设立社区智慧助老专项基金，整合多元资金来源，用于服务站建设、适配设备采购、志愿者交通补贴与技能培训；建立“城市社区智慧助老资源库”，分类整合适老化技术方案、专业师资信息、优秀服务案例等资源，实现跨区域、跨社区资源共享，降低服务成本。评估与反馈保障层面，设计“三维度评估指标体系”，从“数字技能提升率”（如独立操作频次变化）、“数字服务使用率”（如线上政务、生活服务使用占比）、“老年人满意度”（如服务便捷性、专业性评分）开展季度评估；开通“多元反馈通道”，包括社区意见箱、子女协助反馈小程序、老年群体专属语音反馈热线，根据反馈动态调整服务内容与形式，形成“需求—服务—评估—优化”的闭环机制，确保服务持续贴合老年群体需求。

四、小结

深度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全面叠加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愈发突出，在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社交信息三大核心场景中，均呈现显著的数字使用障碍，源于个体生理心理制约、社会支持体系短板、技术适老化滞后三维因素，且当前社区智慧助老服务还存在供给碎片化、内容同质化、协同低效的现实问题。对此，需以社区为核心搭建多元协同服务体系，通过分层分类机制匹配不同数字能力老年群体的需求；创新场景化实操培训、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及数字安全专项内容，提升服务实用性；依托政策考核、专项基金、闭环评估等保障机制，确保服务长效落地。这些优化路径可有效弥合数字鸿沟，助力适老型数字社会构建，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获得感与社会融入度。

参考文献

[1] 刘德瑜，曹慧敏，陈静. 新质生产力赋能社区智慧养老模式探究 [J]. 国际公关，2025(16): 48−50.

[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34): 20−25.

[3] 德邵蕊. 智慧养老服务优化路径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J]. 今日财富，2025(14): 1−3.

[4] 孙晨博. 适老化视角下跨越智慧养老“数字鸿沟”的路径 [J]. 四川劳动保障，2025(12): 108−109.

[5] 帮助老人跨“数字鸿沟”，广东从这几方面下功夫 [J]. 大社会，2021(06): 56−57.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介入先心病患儿及家属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路径探究

王　焕　李福玉*

摘要：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病”）患儿及家属在应对疾病的过程中，普遍面临沉重的心理压力与社会融入障碍，亟须系统性的专业支持。基于生态系统视角，构建针对患儿及家属的差异化服务策略：对患儿，通过适应性运动游戏、角色扮演、叙事疗法、朋辈支持及学业辅导等方式，促进其生理康复、心理调适与社会融入；对家属依托政策资源链接、照护技能培训、情绪支持网络构建等方法，缓解其经济与照护压力，提升家庭抗逆能力。创新点在于强调对患儿与家属进行既区分又联动的小组干预，并借鉴“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构建社工主导、医护指导、志愿者辅助的跨专业协作机制。本文旨在探究可推广的先心病群体心理社会支持实务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先心病患儿；患儿家属；生态系统视角；心理社会支持

一、引言

先心病在全国多地均位居新生儿出生缺陷首位。先心病检出率存在地区差异，多为2.9‰~16.0‰。2011年8月至2012年11月，一项对全国18家医院连续出生的共122765名新生儿的调查显示，中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为8.98‰[1]。这一特殊群体不仅面临复杂的医疗挑战，更承受着独特的“生理—心理—社会”三重困境。患儿因心脏功能受限、活动耐力低下、自我认同危机及社交隔离等问题，严重影响其身心发展与社会融入；同时，家属不仅承受着因手术风险与高昂费用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更持续体验着可能失去子女的恐惧、长期照护的疲惫等多重心理痛苦。这种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极易引发其焦虑、抑郁等严重情绪问题，而家属的消极情绪又会反过来加重患儿心理负担，影响治疗依从性与康复进程[2]。本研究主要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索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工作介入先心病患儿及家属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路径。

生态系统理论（Ecosystems Theory），由系统理论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该理论把人类生存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作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及宏观系统。他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3]。选择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是因为先心病患儿及其家庭的困境绝非单一的医疗问题，而是受家庭、医院、学校、社区政策、社会文化等多层次系统的综合影响。基于此视角，社会工作介入需同时回应个体发展、系统互动、资源可及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议题。具体而言，即从针对患儿及家属的直接服务，到协调其核心生活场域（家庭、医院、学校）的关系，再到链接外围支持资源，最终推动有利于该群体发展的宏观政策与社会观念变革。

在服务模式方面，王晶等学者在住院先心病患儿的护理过程中提出“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即由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多维介入的服务模式，在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缓解住院患儿及家长焦虑等负面情绪、提高患儿家属的照顾能力、改善住院患儿及家属的住院体验、提高患儿治疗的配合度、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等方面，结果显示效果良好[4]。本文基于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借鉴该模式的跨专业协作框架，构建由社会工作者主导并链接资源、医护人员提供医学指导、志愿者作为辅助力量的协作机制，旨在整合不同系统的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院内外为患儿家庭提供全程支持的专业优势，提供更具针对性、连续性与可持续性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

二、对先心病患儿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一）生理层面：心脏功能受限与活动耐力低下

患儿因心脏结构异常（如室间隔缺损、法洛四联症等）导致血流动力学异常，表现为活动后心悸、气促、乏力，严重者甚至出现晕厥，以致无法参加剧烈运动。同时，因心功能不全，血液运输效能差，胃肠功能弱，使营养素摄入障碍，加之这类病人能量消耗增加，营养供给不足，导致生长发育落后[5]。针对这些问题，社工可以从适应性活动训练和营养管理支持两方面入手。

在适应性活动训练方面，社工可以和医疗团队协

作为患儿定制兼具个性与趣味的运动方案。例如，在智能手环监测下，进行“小乌龟赛跑”慢走竞赛、吹气球呼吸训练等活动，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开始，随着患儿耐力的提升逐步增加运动量，同时通过定期评估及时调整方案。

在营养管理支持方面，社工可以设计多元化的干预策略。设计“心脏小卫士”绘本，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画和故事，向患儿传达健康饮食知识；开展“小营养师体验日”角色扮演活动，让患儿在模拟情景中学习食物分类和搭配原则；设立“营养打卡墙”，运用行为主义理论的强化原理，通过即时奖励鼓励患儿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培养患儿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此外，还需要定期评估患儿的生长发育指标，与医疗团队保持密切沟通，确保营养和运动方案的科学性，改善患儿的身体状况，从而为患儿的全面康复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心理层面：因身体限制产生自我认同危机

先心病患儿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1. 自卑心理

患儿因不能参与正常体育活动而导致自我价值感低下，常有“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上体育课，一起跑跳”等想法；对外表瘢痕的焦虑，“这个刀疤好难看，别人会怎么看我”等担忧，影响社交自信。

2. 疾病焦虑

患儿对身体的细微变化往往过度敏感，“心跳好快，是心脏病发作了吗”；对未来治疗的恐惧，“我以后还需要再做手术吗”等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

针对这些疾病焦虑与创伤记忆，可以采用叙事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对患儿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通过绘画、日记等叙事方式引导患儿叙述“我与疾病的故事”，帮助其将“疾病经历”从“自我身份”中剥离，重构对疾病的理解。此外，社工可配合医生开展健康教育，将医学知识转化为患儿可操作的自护技能，引导患儿学习并掌握简单的自我监测日记，记录每日活动量、心情和身体感受，从而提升对身体的掌控力，能在出现异常时及时与家属或医护沟通，真正成为自身康复的积极参与者。

针对自卑心理与社交回避，社工可协同专业体育老师，共同设计融入性体育课方案，让患儿在体育课中扮演裁判、计分员、器材管理员等角色，减少体力消耗带来的挫败感，使其在体育活动中承担明确角色，获得同伴认可，提升课堂参与感与归属感。在此过程中，患儿得以探索适合自身的互动方式，将“不能跑”的生理限制，转化为“我能观察、能组织”的心理优势，帮助患儿接纳身体限制，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提高自我效能感。

（三）社会层面：学业中断、社交隔离

因频繁的住院治疗和门诊检查，先心病患儿往往面临学业中断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与同辈群体的社交隔离问题。部分重症先心病儿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正常上课，经常缺课或休学，即使正常上学期间也难以和同学一起进行需要消耗体力的游戏和各类运动，因而成为同学中的“被边缘化的对象”，老师眼中的“需要特殊关注的学生”。

面对学业困境，社工可以构建多层次的学业支持体系。组织师范院校志愿者提供一对一课业辅导，重点补习住院或休学时错过的关键内容；与学校教师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利用线上学习平台，使患儿在医院或家中也能参与课堂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解决知识衔接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持患儿的学习习惯和能力，为重返校园做好准备。

关于社交隔离问题，社工可以协助患儿构建包含同学、朋友的“朋辈支持网络”，通过组织五子棋、积木、乐高、拼图等低体力消耗的团体游戏，在安全、愉悦的互动情境中，促进患儿与同伴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从而有效缓解患儿康复期的孤独感。

三、对患儿家属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一）政策资源梳理，居家就业，缓解经济压力

家属因患儿频繁治疗与照护投入，常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部分家长（尤其是母亲）为此被迫中断职业发展。社工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供支持：一是资源政策整合与申办协助，建立政策资源信息库，详细梳理医保报销、大病救助、低保等社会保障政策的申请条件和流程，提供“一站式”的政策咨询服务；二是慈善资源对接，帮助家庭链接基金会项目，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佑童心”儿童心脏病救助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等，协助家庭准备申请材料，提高救助成功率；三是拓展经济来源，为居家照护的家属链接手工艺品制作、电商运营等灵活就业技能培训与机会，在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减少居家照护的孤独感，平衡好工作与照护的关系，提升自我效能。

（二）教授护理知识，提高照护能力

针对家属护理知识与技能缺乏问题。首先，社工向家属分享科教片《心脏历险记》等，认识先心病；其次，可以邀请医院心外科的医护人员，为家属讲解先心病发病时的常见症状、术后护理技巧和注意事项、术后的营养补充食谱，以及急救技巧并通过模型进行演习，同时总结归纳家属在护理孩子时遇到的困难，请医护人员进行解答；再次，教授家属“非否定式沟通”，如用“妈妈知道你很勇敢”替代“别怕”等，这种共情式的沟通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焦虑，建立安全感；最后，开展患儿家属经验分享会，鼓励家属倾诉照护过程中的困惑和挑战，再采用头脑风暴法集体讨论解决方案，并将成功经验汇编成《互助手册》。

（三）心理赋能，社会融入

家属面临着照护压力、经济负担、社会隔离等多

重挑战，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对此，社工可以构建多层次的情绪支持体系，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每月开展“康复之路”茶话会，一起分享在陪伴孩子康复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开心的事情，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形成长期的社会支持网络。此外，教授正念呼吸疗法，帮助家属通过专注于呼吸减少“灾难化想象”，将注意力拉回当下，学会快速平复情绪，降低焦虑水平，既能保护自身心理健康，又能通过情绪传导，促进孩子的康复。

四、家庭协作

（一）营养大厨争霸赛

社工可以组织先心病患儿及家属开展亲子游戏活动，让患儿制定食谱、挑选食材，并和家属一起完成备菜和烹饪，从营养搭配、团队合作等角度设立多个趣味奖项，鼓励家庭从不同角度参与竞争，将枯燥的饮食控制转化为有趣的家庭活动。以此更为直观地理解饮食禁忌与需求，内化营养知识，有效地提升患儿和家属的协作能力，培养患儿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家属在照护过程中的阻力。

（二）21 天家庭挑战

社工组织患儿和家属集思广益，设计系列渐进式亲子微任务，将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该挑战以游戏化机制将庞杂的照护责任分解为可达成的小目标，帮助患儿累积成功体验、缓解病弱感，同时助力家属预防照护倦怠。最终形成的家庭纪念相册，将康复历程转化为可视化的成长叙事，帮助家庭将挑战期间养成的良好习惯固化为日常生活方式。

五、社会倡导与宏观系统支持

推动政策信息的普惠与下沉。针对许多家庭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充分享受现有福利政策（如大病救助、慈善基金申请）的问题，社工可将服务中积累的政策要点、成功申请案例汇编成通俗易懂的《先心病家庭资源手册》，并通过医院、网络等渠道发放，化被动咨询为主动宣传，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推动包容性环境建设。为在社会层面构建包容环境，社会工作应推动多系统联动。倡导将先心病科学认知纳入公共卫生宣传体系，制作公益科普资料并通过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同时，推动民政、教育、残联等部门协作，共同制定并推行清晰的、可操作的校园支持指引，营造接纳氛围。

六、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基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及家属的“生理—心理—社会”多维困境，设计了差异化服务方案。前期在 C 市儿童医院的实践表明，双路径协同干预能有效提升患儿康复依从性，增强家庭抗逆力，并初步形成“医疗—社工—家庭”的支持闭环。核心经验如下：（1）分组干预与联动结合。患儿与家属需求差异显著，需分别设计发展性活动与支持服务，并通过亲子协作实现有效联动。（2）跨专业协同服务。王晶等学者提出的“三位一体”模式为跨专业协作提供了实证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社工为核心，整合医护专业力量与志愿者辅助的协作机制，精准回应患儿家庭在各系统层面的复杂需求，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院内外全过程服务。（3）本土化与个体化适配。服务需根据患儿病情、家庭资源与文化背景进行灵活调整，以提升干预的适宜性与有效性。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实践样本规模有限，服务效果的普适性需进一步验证；长期跟踪机制有待完善，难以评估服务的持续效果。未来研究，应当加强与更多医疗机构、社区、学校的合作，积累多地区的干预经验；建立长期的跟踪评估机制，关注患儿社会融入和家庭功能的持续改善；探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开发线上支持平台，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模式。

参考文献

[1]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1 概要 [J]. 中国循环杂志 , 2022, 37(06): 553−578.

[2] 刘雁 . 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患儿家属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研究 [D]. 长沙 : 中南大学 , 2010.

[3] 师海玲 , 范燕宁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 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04): 94−97.

[4] 王晶 , 李燕君 , 徐芬 , 等 . 护士与医务社工及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的应用 [J]. 护理学杂志 , 2022, 37(13): 29−32.

[5] 柯雪琴 . 先天性心脏病对学龄期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J]. 中国学校卫生 , 2000(04): 313−3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儿童及家属的社会心理支持服务方案——基于小组工作的运用”（S202410205056）。

（作者：王焕，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李福玉，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讲师）

“互联网 + 公益”模式下青年群体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

伽　凯 林昱君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与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互联网 + 公益”从单纯慈善募捐工具演变为新型社会动员机制与青年亚文化形态。其低门槛、高互动、社交化公益模式，重塑了当代青年社会参与方式与价值表达逻辑，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契机与载体。但当前网络公益与思政教育融合仍处于自发探索阶段，面临内容泛娱乐化、平台监管滞后等挑战。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育人观，剖析二者内在契合逻辑，提出构建思政话语体系等策略，推动网络公益转化为“心间信仰”，实现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目标。

关键词：“互联网 + 公益”；青年群体；网络思政教育；创新策略；实践育人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技术深度重构社会关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改变经济生产方式，影响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格局。“互联网 + 公益”模式诞生，打破传统慈善时空壁垒，将公益嵌入日常生活碎片化场景。对青年群体而言，参与网络公益成为社交货币与生活方式。高校思政教育需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网络公益是思政教育重要的资源库。如何转化资源、避免泛娱乐化、植入家国情怀是时代课题，本文从三个维度探究青年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

一、“互联网 + 公益”与青年网络思政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互联网 + 公益”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青年参与特征

“互联网 + 公益”模式的核心是“连接”与“赋能”，其去中心化传播结构大幅降低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报告》显示，青年群体已成为网络公益捐赠与传播的绝对主力军，其参与特征体现出显著的“微公益”与“社交化”倾向。一方面，青年倾向于“轻量级”参与，以点赞、转发等微小行为表达善意，契合碎片化生活节奏，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分享公益，完成爱心传递，构建积极自我形象。这为思政教育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从情感需求引导青年走向理性担当[1]。

（二）公益精神与思政教育价值目标的深度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为立德树人，其核心内容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公益精神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与生活化呈现。网络公益的扶贫济困、生态环保等议题蕴含深厚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如参与乡村振兴网络助农项目，青年接受国情教育，参与环保云植树活动，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行为习惯。“互联网 + 公益”构成思政教育“隐性课堂”，将政治理论转化为道德实践，帮助青年自我提升，与思政教育价值内化目标高度一致。

（三）“互联网 + 公益”作为网络思政新载体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思政教育常面临话语体系僵化、灌输痕迹过重、互动性不足等问题。“互联网 + 公益”作为新型载体，具备独特育人优势。它具有天然的渗透性与感染力，网络公益以真实感人的故事为内核，借助图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直击人心，能迅速引发青年情感共鸣，打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心理隔阂。它还具有极强互动性与主体性，青年在网络公益中从被动受教者转变为参与者、传播者和发起者，激发主观能动性，主动思考社会问题并探寻解决方案。技术赋能使公益具有公开性与透明度，区块链保障善款可追溯，是开展诚信与法治教育的优质素材[2]。

二、“互联网 + 公益”模式下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公益内容娱乐化倾向削弱思政教育严肃性

为争夺用户注意力，部分网络公益平台过度迎合受众娱乐心理，采用大量游戏化机制与营销手段。这种“泛娱乐化”倾向虽在短期内提升了流量，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方面，过度包装的“卖惨”文案与过度娱乐化互动游戏，易使公益行为异化为廉

价心理消费，让青年学生忽视背后的社会苦难与道德责任，导致道德体验肤浅化，消解思政教育的严肃性与深刻性。另一方面，“娱乐至死”氛围会使青年对社会议题脱敏，以旁观者心态审视社会痛点，背离思政教育培养时代新人的初衷[3]。

（二）网络公益平台监管缺失带来价值引导风险

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与匿名性，导致网络公益领域泥沙俱下。近年来，网络诈骗、虚假募捐、善款挪用及“罗尔事件”等负面舆情时有发生，这些乱象透支社会爱心信用，对青年群体价值观造成剧烈冲击。青年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社会阅历浅、鉴别能力有限，参与公益却遭欺骗利用时，易产生心理落差，滋生不良社会心态。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借网络公益平台渗透意识形态，若高校思政教育缺乏监测引导机制，网络公益或成为错误思潮温床，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三）线上参与同质化导致实践育人效果浅表化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明确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当下“互联网＋公益”模式大多聚焦于线上资金捐赠或流量贡献，参与形式呈现出同质化与简单化特征。对于多数青年学生而言，这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轻公益”，缺少身体力行的现实体验与汗水付出的深刻感悟。他们或许在屏幕上捐助贫困山区儿童，却未真正走进乡村了解贫困根源；或许在网上转发环保倡议，现实中却依旧浪费资源。这种线上线下割裂的状态使实践育人效果停于表面，难以触及灵魂，易造成知行脱节[4]。

（四）教育主体与公益组织缺乏长效协同联动机制

在当前网络思政教育格局里，“孤岛效应”普遍存在。高校思政教育部门、互联网公益平台、社会慈善组织与企业之间，缺乏系统性沟通与协作机制。高校常把网络公益当作学生个人课外活动，缺乏统一规划与指导，未将其纳入人才培养主渠道；互联网平台基于商业或企业社会责任逻辑运营，缺乏对青年思想引领的主动设计和教育维度考量。双方在资源共享、议题设置、活动组织等方面，缺乏长效协同联动。这致使高校难以利用社会优质公益资源，社会平台难以精准触达青年思想需求，“互联网＋公益”育人效能无法最大化释放[5]。

三、构建有温度的“互联网＋公益”思政话语体系

（一）挖掘网络公益典型案例，丰富思政教育素材库

高校应立足思政教育目标，系统挖掘网络公益领域的典型案例，构建多元化思政教育素材库。重点筛选兼具思想性与感染力的案例，既包括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等彰显家国情怀的公益项目，也涵盖邻里互助、公益支教等体现平凡善意的微公益故事；既挖掘青年群体发起的优秀公益案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也梳理公益实践中的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对案例进行思政化解读，提炼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将案例转化为可融入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的思政素材，让思政教育摆脱空洞说教，以真实案例传递温暖与力量，增强教育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二）结合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强化社会责任感教育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心态放大器，也是检验与培育公民意识的最佳契机。在地震、洪涝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关键时刻，网络公益平台会第一时间响应，成为物资调配与信息沟通重要枢纽。思政教育应紧抓这些特殊“窗口期”，开展即时性、针对性社会责任感教育。教育者要引导青年通过正规网络渠道有序参与捐赠、信息转发等活动，将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具体行动；还要引导其分析互联网公益展现的制度优势与文化力量，通过“危机教育”让青年感悟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强化使命担当。

（三）创新公益叙事方式，提升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

在“去中心化”网络语境里，传统宏大叙事常陷入“失语”困境。构建“互联网＋公益”思政话语体系，需推进叙事方式创新，从“高高在上”的姿态转为“平视对话”的交流模式，从“政治说教”方式变为“情感共鸣”的互动途径。借鉴网络公益“微叙事”策略，关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讲述公益暖心故事。把握叙事基调时注重情感激发，用真情打动受众。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公益点滴增强代入感，合理运用网络流行语和亚文化符号“转译”主流价值观，提升其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力与感召力，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四、打造智慧化的“互联网＋公益”思政教育平台

（一）利用大数据算法，实现公益思政内容的精准推送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大水漫灌”式教育难以满足青年个性化需求，高校应依托智慧校园建设，整合学生网络空间浏览偏好、关注议题及过往公益参与记录，构建多维度学生画像。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精准识别不同群体思想动态与兴趣点，进而实现思政内容精准推送。比如，对于经常关注流浪动物保护的学生，可向其推送生态伦理与生命教育深度文章或相关公益项目，对于关注乡村教育的学生，则重点推送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解读与支教志愿者招募信息。通过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不仅能提高信息触达率，更可确保思政教育内容与学生内在需求精准对接，从而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避免因信息过载使学生产生排斥心理。

（二）开发公益类功能游戏与应用，增强互动体验感

“功能游戏”指的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其将游戏的娱乐性与教育的严肃性进行了有机结合。高校可联合互联网企业或者科研机构，开发具备思政教育功能的公益类游戏或 App。例如，可以开发一款模拟长征路线的运动公益游戏，学生通过日常跑步积累里程，在虚拟地图上解锁长征历史节点并学习党史知识，同时积累的步数能够兑换为现实中的扶贫资金，也可以开发一款模拟村干部经营策略游戏，让学生在经营管理乡村的过程中，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发展特色产业，深刻理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脱贫攻坚的艰巨性。这种“寓教于乐、寓教于行”的模式，能让青年在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中，既完成公益任务，又接受党史国史教育与国情认知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无缝衔接。

（三）构建融媒体矩阵，拓展网络思政教育的覆盖面

单一平台难以形成强大舆论声势，高校需树立全媒体思维整合资源，应整合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B 站账号、抖音号与校内新闻网等平台资源，构建互联互通协同发力的“互联网 + 公益”思政融媒体矩阵。一方面要加强议题设置能力，联合知名互联网公益平台发起全网话题挑战、公益直播带货、云端接力等活动，利用社交网络裂变传播效应打破校园围墙，形成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舆论场；另一方面要注重不同平台差异化运营，在微信端侧重深度理论解读与感人故事推送，在抖音、B 站端侧重短视频传播与互动参与，在微博端侧重话题讨论与舆论引导，通过多渠道立体化传播布局，最大限度扩大网络思政教育覆盖面并提升影响力，抢占网络意识形态高地。

五、完善立体化的“互联网 + 公益”育人长效机制

（一）建立“线上募捐 + 线下服务”的 O2O 双向转化机制

针对网络公益参与浅表化这一问题，需构建 O2O（Online to Offline）双向转化机制，以此打通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壁垒。高校应充分利用线上平台高效的信息集散功能，发布招募信息、筹集公益资源并进行前期培训与动员，之后，引导青年走出网络，深入社区、农村、敬老院等基层一线，开展实地志愿服务与社会调查。在此过程中，青年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与手把手的服务，能够获得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社会认知。活动结束后，要引导学生将线下的实践成果、心得感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分享与二次传播，形成“线上发起，线下实践，线上反馈”的闭环。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既发挥了互联网的便捷优势，又保留了传统实践育人的深度优势，确保思政教育既有“流量”更有“质量”。

（二）完善网络公益志愿服务认证与学分转换制度

制度激励是激发青年参与网络公益热情的关键要素。高校需要打破传统评价体系，把学生参与网络公益的行为正式纳入“第二课堂”成绩单与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之中。高校要制定科学、量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利用技术手段记录学生网络公益时长、捐赠记录、项目贡献度及影响力等相关数据，并且建立相应的学分转换制度。比如，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发起或深度参与的公益项目，经过审核之后可折算为志愿服务工时或社会实践学分，对于表现优异的学生，在评奖评优、推免研究生、入党推优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激励与认可方式，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学生内在动力，引导青年从“要我做公益”转变为“我要做公益”，促使参与网络公益成为常态化的自觉行为。

（三）构建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协同的共育体系

网络思政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其中，应打破教育孤岛的现状，构建“校—企—社”协同育人的共同体。高校要发挥理论指导与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为网络公益提供智力支持并做好价值把关，互联网企业需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技术平台、流量资源与数据支持，同时开发适合大学生的公益产品，社会公益组织要提供专业的实践项目、培训指导及实习基地。三方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共同开发“互联网 + 公益”思政课程，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联合开展课题研究。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合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公益生态，助力青年的健康成长。

六、结语

“互联网 + 公益”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凭借独特的连接力与感召力，重塑青年道德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对高校思政教育而言，这是技术迭代带来的挑战，更是借生活化实践化路径实现价值引领的历史机遇。推进融合，要拥抱红利、搭建平台创新话语，更要坚守底色、防范异化风险。构建话语体系、打造教育平台、完善长效机制，可引导青年从“点赞者”变为“行动者”，成长为时代新人，这是网络思政的创新之义与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所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2019-03-19(01).

[2] 王喆 .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的三个维度 [J]. 继续教育研究，2017(12): （下转 13 页）

医院团组织如何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以普仁医院为例

韩　奈

摘要：志愿服务是动员一切社会资源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加强医院系统志愿者队伍建设是团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志愿服务不断推进，如何建好、用好志愿者队伍是医院团组织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普仁医院志愿者队伍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运行、管理，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志愿服务工作日趋成熟、服务内容更加专业化、受众范围扩大化，医院团组织在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如何在志愿服务中通过团组织强化服务者及服务对象的思想引领，建立长期规划进一步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完善评估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如何让百姓在志愿服务中真正受益、提升幸福感，让志愿者在活动参与中增强沟通能力，传递社会正能量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医院；团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志愿服务是动员一切社会资源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注册志愿者达 2.36 亿人，普仁医院志愿者达 1000 余人。随着志愿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不断推进，如何建好、用好医院志愿者队伍，是团组织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主要探索以普仁医院志愿者为骨干力量，以社会爱心人士为补充的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一、加强医院系统志愿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志愿服务是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引导人们尽自己所能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送去温暖、带去便利，这对激励人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细、落小、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需要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随着医疗服务领域中社会问题、医患矛盾日益凸显，医院在满足患者需求方面仍存在一定瓶颈，仅依靠医务工作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医院志愿者的服务来进行补充。医院志愿者通过为患者提供就医帮助、心理抚慰、人文关怀、生活互助、文明倡导等服务，缓解医务人员压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医疗工作。同时，志愿者通过与患者互动，可以促进医患沟通，疏导患者情绪，缓解其就医时的紧张情绪，为其营造安全友善的就医环境。

（三）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需要

志愿者通过参与医院开展的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为大型赛事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参与传染病防控等公益活动，可充分发挥医院特色和自身专业技能；在助医、恤病、扶老、济困、救孤、助残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专业能力，也增强了作为医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医务工作者更多地关注社会公益事业，更加地关爱他人，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上接 12 页）
89−91.

[3] 杨青山，马云天．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4): 62−63.

[4] 欧阳光明，刘秉鑫．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及其建构维度 [J]. 思想教育研究，2016(06): 49−53.

[5] 竺照轩．试析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06): 64−66.

（作者单位：南阳科技职业学院）

二、团组织在志愿者队伍建设中发挥作用的现状

（一）医院团组织是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不断发展，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为志愿服务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医院党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多年来，普仁医院团组织注重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进取、与时俱进，拓宽工作思路，不断探索志愿服务工作的新方法。2013 年 4 月，医院建立志愿服务队，52 名成员由 35 岁以下的青年党员组成；2018 年以来，团组织探索扩大招募范围，一方面将全院党员、团员、部分职工纳入服务队中，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力量，在寒暑假招募学生、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参与导医服务。志愿者队伍逐年壮大，目前在“志愿北京”平台上有 1000 余名志愿者，普仁医院的志愿服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1]。

（二）医院团组织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制定者和指导者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团组织注重根据医院适时指导制定志愿服务的范围和项目。成立之初，服务范围仅局限于医院及周边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医院为门诊患者进行导医服务、开展义诊咨询，为住院患者修剪指甲，到辖区街道送医上门的简单服务。近几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度不断提升，团组织结合“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主题，根据卫生健康领域的特点，以及对口帮扶工作的需要，将志愿服务的范围扩展到京郊偏远山区及内蒙古、西藏等地，使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目前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达 38000 小时。

（三）医院团组织是志愿服务活动的保障者和管理者

医院团组织注重强化志愿服务队伍的组织管理工作，确保志愿者队伍稳定和志愿服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一是明确组织机构。志愿者服务领导小组设在医院党委办公室，团组织负责管理工作，按照“1+2+N”即一条管理主线、两部分志愿服务人员、N 个志愿服务项目，结合医院特点开展一系列志愿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明确服务流程和标准，使志愿服务工作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三是开展各类培训，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志愿服务概况等内容，不定期组织志愿者参加线上、线下培训，不断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四是严格服务程序。每年年初，团组织负责在“志愿北京”网站上发布志愿服务项目，按照百姓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志愿活动。五是加强人员管理。开展活动前夕根据报名情况，将志愿者编组管理，活动中要求统一着装、使用文明用语、规范专业服务，自觉维护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和声誉，活动结束后主动为志愿者录入志愿积分。

（四）医院团组织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引领者和宣传者

医院团组织注重志愿服务的引领和宣传，对有影响力的活动，及时与媒体联系，先后得到央广网、光明网、人民网和《健康报》《北京日报》，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和宣传报道。2024 年，医院团组织开展的“心系百姓学雷锋 情暖社会‘医’家亲”志愿服务，宣传信息累计点击量超 100 万次，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使更多的人关注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吸引了 300 余名有爱心、有奉献精神的人士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向社会传递健康理念、信心、正能量。

近年来，志愿服务队在团组织的管理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社会肯定。2020 年，服务队被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评为“北京市青年突击队”；2020 年申报的“抗击疫情，战‘疫’有我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北京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获得 2020—2021 年度、2022—2023 年度“北京市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在 2022 年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五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中，获得“首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2024 年，在北京市卫健委举办的首都卫生健康系统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崇文争先 健康同行”项目荣获铜奖。

三、医院团组织在志愿服务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一）对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医院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和资源，围绕医疗服务过程提供无偿的、非职业化的帮助。在发达国家，医院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健康照顾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步入了组织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轨道，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体系[2]。志愿服务在我国出现晚、时间短，公众常把社会救济当成志愿服务[3]。公立医院平时对志愿服务精神的宣传较少，再加之医院的工作性质是三班倒，工作忙、压力大，部分医护人员对志愿服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认同感，参与热情不高。虽然医院团组织在积极宣传、广泛动员和招募志愿者，但是依然仅限于部分人员参与其中，缺乏广泛性。

（二）缺乏长期可持续性规划

近年来，普仁医院团组织先后开展了“服务共建志愿牵手”“崇文争先 健康同行”“抗击疫情有我”等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影响力，但这些项目多侧重于短期内的响应式服务，活动形式单一且多为一次性开展，缺乏对服务项目系统、长期的规划和有计划的深度推进。这种短期行为导致服务流于表面，缺乏广度、深度和持续性，难以真正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三）项目评估反馈机制不完善

在普仁医院团组织所制定的管理办法中，虽然对志愿者的管理和活动安排有相关规定，但缺乏对志愿服务项目效果的科学评估标准和方法，使得志愿服务的成效难以客观衡量，无法准确了解志愿服务项目对受益者和社会的实际影响，不能及时调整和改进服务方案，缺乏及时的反馈机制。即使进行了评估，若未

能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相关责任人和志愿者，也难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一些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和改进，从而影响志愿服务工作的长远成效。

（四）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志愿者是指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在不获取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服务的人。团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多为医院组织的公益活动，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四大特征。以精神奖励为主，缺乏其他的激励机制。志愿服务的公益属性决定了不能用报酬、物质等方式进行激励，需要在精神层面给予鼓励。当前医院尚未搭建促进志愿者自我实现的平台，还未形成长效的服务机制，志愿者的服务热情难以充分激发。

四、团组织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管理的对策

（一）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连接党组织和青年之间的桥梁纽带。在志愿服务中团组织在医院党委领导下，充分认识党建引领在志愿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志愿服务者队伍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不断提高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利用普仁医院院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平台宣传志愿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服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共识，进一步营造全院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4]。

（二）建立长期规划进一步强化科学化管理

志愿服务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建立长期规划对于明确服务目标至关重要。首先，团组织通过对社会需求的深入研究和对志愿者队伍的充分了解，制定志愿服务的方向和目标。通过与社区、养老院、偏远乡村等多方合作，精准定位服务对象，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建立长期战略可以更好地规划志愿服务项目。医院团组织要在服务中实现深度和延续性，通过战略布局对项目进行科学、有序的规划。这包括项目的持续性开展、不同项目之间的有机衔接以及对志愿者队伍的培训。通过对项目的战略性规划，医院团组织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从而在服务中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果。长远规划与战略布局，还能更好地激发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归属感。当志愿者清晰地了解组织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便能在志愿服务中切实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助于拓展志愿者队伍，提高志愿者的忠诚度和活跃度，使医院团组织在志愿服务中更具凝聚力[5]。

（三）完善评估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在医院团组织的志愿服务中，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机制，是提升服务工作质量和长期影响力的关键一环。通过建立明确的评估指标、评估周期和及时的结果反馈机制，医院团组织可以更好地了解志愿服务项目的实际效果，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志愿服务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建立明确的评估指标是科学评估的基础。通过科学而全面的评估指标，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服务项目的整体表现，为制定改进计划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医院团组织不仅要在服务项目结束后进行总结性评估，更应当设立周期性的季度评估和年度总结。这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随时调整服务策略，确保服务的有效性。定期对项目进行评估，不仅能及时发现开展的志愿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为志愿者提供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四）探索激励机制进一步营造服务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医院团组织要注重探索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一方面，引导他们主动参加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中体现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和价值，提高医院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探索积分制管理，借鉴北京市“五星志愿者”评定机制，志愿者通过参加志愿服务，累计时长，获取相应积分，并为评选为“爱在普仁”志愿者服务队的“星级”志愿者，授予相关证书。对每年在志愿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团支部和个人，可参与评选优秀志愿服务团队和优秀志愿者，并将志愿者服务作为晋升晋级及各类评优评先的考核指标，搭建促进自我实现的平台，强化激励机制在志愿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完善院内志愿服务的管理认证制度和工作机制，对推动志愿服务工作规范化、阵地化、特色化、长效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孟颖飞，刘萌萌．新时期下医院团组织打造品牌青年志愿者服务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J]. 经济师，2021(05): 236−237.

[2] 吴韬，吴皓，孙大麟．上海某公立医院开展志愿者活动的调查与分析 [J]. 中国医院，2008, 12(05): 14−16.

[3] 谷晓阳，甄橙．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当代启示 [J]. 中国医院管理，2014, 34(12): 77−79.

[4] 常欣强．山西省 S 医院志愿服务管理研究 [D].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2020.

[5] 冀术明，王挺，沈惠芝，等．医院团组织青年志愿者工作的探索 [J]. 中国卫生人才，2017(06): 76−79.

（作者单位：北京市普仁医院）

我国公益慈善专业化：概念、特征与发展现状

田　园

摘要：专业化是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本研究以专业社会学为理论支撑，厘清公益慈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区别，界定其概念，并从知识体系、伦理建设、服务效能、从业人员规模与素质、专业共同体、职业资格准入、社会地位七个方面探析我国公益慈善专业化发展现状。研究发现，我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化已取得伦理治理延伸、从业规模扩容等阶段性进展，在专业知识体系完善、职业资格建设、社会认知培育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需通过深化专业知识排他性与学历教育发展、推进法律与伦理衔接、完善职业资格体系、强化专业共同体协同、提升社会认知与职业认同，推动公益慈善行业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关键词：公益慈善；专业化；专业社会学

一、研究的缘起

我国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公益慈善事业同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改革、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民生福祉增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专业化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但当前行业普遍存在内部治理不完善、公信力与透明度不高、从业者专业性有待加强、行业机构人员流失率较高、负面舆情易发、社会认知度不足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厘清公益慈善专业化的概念与特征，结合行业实际分析其发展现状。

二、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专业社会学理论，探讨专业化的概念、属性及发展机制。赵康界定了专业化的核心内涵与六条核心属性[1]；刘思达分析了专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的张力[2]；柯长城等指出我国学界存在专业与职业化概念使用混乱的问题并提出规范建议[3]。二是聚焦多行业职业化与专业化实证研究，覆盖法律、社会工作、公安、高校辅导员等职业领域，但尚未深入研究公益慈善行业。三是从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与发展角度开展的专门研究。李长文指出社会组织人才职业化面临权益保障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困境[4]。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公益慈善专业化的现状与问题关注较少，缺乏基于专业社会学理论结合行业实际的专门分析。

（一）公益慈善专业化还是公益慈善职业化

专业化与职业化在日常使用中常被混用，但核心内涵存在本质区别。职业是指社会分工中相对稳定、以特定劳动获取报酬的工作门类及从业者群体；专业则是建立在系统高深知识基础上、经过专门教育训练、具备明确伦理规范与行业标准的特殊职业形态。专业化是职业不断提升知识系统性、伦理规范性、服务排他性并逐步走向成熟专业的过程。二者核心差异在于：专业化更强调知识体系、专业技能与伦理规范，职业化更侧重从业形态的稳定性与专职化。二者相互促进——专业化推动职业成熟，职业化为专业化提供载体。

本研究聚焦公益慈善专业化，基于两点：其一，“专业化”是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强调知识体系化、技能标准化、伦理规范化及排他性服务能力的获取，契合公益慈善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本质，无须纠结于“全职身份”的表层界定；其二，对专业化的研究自然涵盖职业化发展规律，可构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伦理—职业形态”的完整理论框架，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

（二）专业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公益慈善专业化

专业社会学聚焦知识含量高的特殊职业，研究其社会功能、外部关联及发展规律。成熟专业需满足六项核心条件：全日制职业属性、专属行业组织与伦理规范、系统知识体系与教育培训机制、显著社会与经济价值、国家特许市场保护、高度行业自治。公益慈善专业化的核心，是传统志愿性、经验性、零散化的

慈善活动，向契合专业社会学理论的成熟专业形态转型的过程，演进路径围绕上述六项条件展开，并兼具公益领域的特殊属性。

三、公益慈善专业化概念界定与特征内涵

基于职业化与专业化概念比较及专业社会学理论，对比其他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特征，将公益慈善专业化的概念界定为：公益慈善领域逐步形成和发展出的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独特的公益慈善科学知识体系，遵循共同的公益价值伦理，从事公益慈善全职工作的群体日益壮大，并逐步形成职业资格准入机制，建立起专业共同体，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益慈善服务并获得社会认可，职业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

公益慈善专业化特征主要表现为：

1. 公益慈善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日趋完善并形成相应的专业教育培训体系。
2. 公益慈善领域逐步形成统一的专业伦理价值。
3. 提供高质量的公益慈善服务，充分满足个体及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4. 从事全职公益慈善工作的群体规模扩大。
5. 公益慈善专业共同体逐步形成发展。
6. 公益慈善职业资格准入标准建立并趋于完善。
7. 公益慈善职业社会地位提升并逐步被社会知晓和认可。

四、我国公益慈善专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公益慈善专业化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深深植根于时代发展的新需求。面对近年来我国慈善领域出现的各类问题，通过强化慈善领域规范管理、加大非法社会组织打击力度，引导各类慈善组织主动提升规范运营能力与合规意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建设。这些针对性举措，推动公益慈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断补齐制度短板，为慈善组织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知识体系的交叉性、应用性与高等教育的起步探索

公益慈善专业知识具有跨学科、交叉性与应用性特征，按专有性程度可分为四类：一是通识基础类知识（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二是专业领域基础知识（公益慈善概论、伦理、政策法规等）；三是实务操作知识（项目管理、筹款、传播、资助、保值增值、财务、评估等核心业务模块）；四是拓展类知识（社区治理、社会工作方法、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创新等）。其中，专业领域基础知识与实务知识是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核心。但整体知识体系的交叉性，削弱了行业的专业性与排他性，相较于法律、社会工作等成熟专业，公益慈善缺乏专属的深奥知识与独特技能，专业排他性相对不足。其核心特质在于以公益伦理为引领，整合多元方法并动员多方资源实现公益目标。

我国公益慈善高等教育处于起步阶段。2016 年“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列入高职专业目录，2021 年教育部增设“慈善管理”本科专业。目前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有限，多数院校依托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设立培养方向，独立成熟的教育体系尚未形成。

（二）从筹款伦理到全链条治理的价值伦理发展演进

慈善伦理是规范慈善活动的道德原则与体系，我国相关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近年来行业机构合作推进伦理建设取得一定成效。2019 年行业组织联合制定《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确立合规、诚实等六大价值观。2020 年腾讯公益联合多家机构发起《99 公益日透明守信共建公约》，禁止伦理失范行为并持续升级完善。2024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伦理原则，将伦理要求转化为刚性制度。同时，行业发起“公益筹款伦理自律行动”，推动伦理规范从筹款延伸至项目评估、资助管理等全链条。

总体而言，我国公益慈善伦理建设处于初步探索期，形成了一些公益慈善伦理共识，进行了一定的公益慈善伦理共建行动实践，但统一规范的慈善价值伦理体系仍在逐步构建中。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法律与伦理的协同衔接，深化传统慈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构建统一权威的伦理治理体系。

（三）社会治理赋能与运营效能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公益慈善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在党和政府的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下，公益慈善事业稳步上升。社会捐赠总额持续增长，社会组织规模不断壮大，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公益慈善组织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从汶川地震到抗击新冠疫情，从扶危救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提供科教文卫体等多元公共服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重大突发事件及提升民生福祉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4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 1297.9 亿元，慈善信托合同规模 69.6 亿元（同比增长 31.2%）。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募捐能力有待加强，组织运营与内部治理的规范化建设还需逐步完善，慈善服务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也有待持续提升。

（四）从业群体的规模扩容与专业化发展诉求

在政策引导与行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社会组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

至 2024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1133.8 万人，较 2016 年的 763.7 万人增加了 370.1 万人，增幅达 48.5%。2022 年 7 月，民政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工作的通知》，将社会组织纳入吸纳就业的重要组织类型。随着社会组织就业群体的扩大，公益慈善领域对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需要日益凸显，只有不断提升行业专业水平和就业吸引力，才能实现人才队伍持续稳定发展。

（五）专业共同体多元格局与协同发展

专业共同体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已形成多元分层、功能互补的共同体，依据核心定位与服务范围可划分为四类。一是以从业者专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共同体，围绕筹款、资助、人力资源、财务等细分业务领域凝聚从业者，形成细分赛道专业支撑网络，如方德瑞信、资助者圆桌论坛等。二是全国性行业共同体，侧重行业内外协同与发声功能，兼具交流合作与行业倡导属性，如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等。三是地区枢纽型行业共同体，聚焦本地资源与链接外部支持，赋能区域行业发展，如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等。四是垂直服务领域专业共同体，则聚焦特定社会议题与服务群体，凝聚同领域组织与力量深耕细分赛道，如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等[5]。四类共同体各有功能侧重，在职能衔接与协同联动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行业资源的整合效能尚未充分释放，整体发展合力的凝聚仍需加强，规范引领的作用发挥有待进一步深化。

（六）公益慈善职业资格准入标准初步建立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是行业专业排他性的重要体现，我国公益慈善领域资格准入标准发展相对缓慢。2015 年劝募员（2025 年调整为“劝募师”）与社团会员管理员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版）》，成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国家职业，对应的职业技能标准分别于 2022 年与 2025 年逐步颁布实施。从进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到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国家职业标准的制定颁布耗时长、推广慢，行业认可与社会认知度不高，整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一方面，准入标准仅覆盖少数核心职业，大量公益慈善细分岗位（如项目执行、公益传播）仍无统一准入规范，多数从业者仅靠经验上岗；另一方面，标准落地进度差异大，劝募师技能认证尚在试点阶段，教材题库建设、考评团队培育仍需时间。

（七）慈善文化普及与公益慈善职业认知亟待深化

提升公众对公益慈善职业的认知，建立在对慈善组织的了解与认可基础上。当前我国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多受媒体影响，个别负面新闻的放大效应进一步影响了行业形象。我国慈善文化普及正处于从“少数人参与”向“全民化、生活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公众对公益慈善职业的知晓率有待提高。提升职业社会地位，需强化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与品牌传播，普及学校与社会层面的慈善文化教育，增强公众参与体验，逐步提升行业认可度。

五、结语

我国公益慈善专业化正处于阶段性演进、多维协同推进的发展阶段，核心特征体现为专业知识跨学科融汇与高等教育初步发展；伦理建设从筹款单一规范延伸至项目全链条治理；公益服务的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凸显；从业群体规模扩容，与专业化发展诉求形成良性呼应；专业共同体呈多元发展格局，但仍需进一步提升协同水平；职业资格标准初步建立，需推进其成熟完善；慈善文化普及与公益慈善职业认知有待提升。未来需以系统思维多维突破，通过深化专业知识排他性与学历教育发展、推进法律与伦理衔接、完善职业资格体系、推动共同体协同、普及慈善文化、夯实职业认同根基，助力行业实现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康 . 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 2000(05): 30−39.

[2] 刘思达 . 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 [J]. 社会学研究 , 2006(01): 197−221.

[3] 柯长城 , 田霞 . 职业化还是专业化——专业化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及其规范 [J]. 法制与社会 , 2010(05): 238−239.

[4] 李长文 . 我国社会组织人才职业化成长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J]. 中国非营利评论 , 2016, 17(01): 30−48.

[5] 张帆 . 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 [R]. 北京 : 资助者圆桌论坛 , 南都公益基金会 ,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 202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中国慈善联合会 2025 年中国慈善研究“十大课题”立项项目“慈善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HT118020202509000216）。

（作者单位：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的“新引擎”

刘明瑞

摘要：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队伍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其融合发展对于激活基层治理效能、促进社区和谐、增进居民福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明晰二者的概念内涵，深入剖析其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现实需要及内在逻辑，提出构建制度化合作框架、打造智能化支持平台、培育本土化运作模式的举措建议，旨在探索“专业引领志愿”“志愿反哺专业”的双向赋能路径，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专业社工；志愿服务；基层治理

一、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的本质特征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内涵与核心要素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工作是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英文为 social work，是指在社会服务与管理领域，遵循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社会工作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门专业，具有独立的专业课程体系，是一种落实社会政策、传递社会服务的现代专业服务体系。在国际上，社会工作已经是成熟的专业，有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其核心特征包括：“助人自助”的理念；依托个案管理、小组动力、社区营造等专业技术的干预方案；规范的职业伦理守则。我国有比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底蕴，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现代化转型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发展本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1]。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启了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并从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首次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党的六大类主体人才队伍之一，并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求。截至 2025 年，我国已有持证社会工作者超 150 万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实践探索不断深入，在提供专业服务、解决群众困难、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志愿服务核心要义和显著特点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志愿服务条例》将其定义为“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的行为”。其定义主要阐释了三个维度：第一，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志愿服务的目的始终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无论是扶贫济困的直接援助还是环保倡导的间接服务，终极目标都是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第二，行为动机的纯粹性，志愿者的服务不以谋求物质回报为导向，这种无私性使其区别于市场交易中的等价交换；第三，参与方式的自主性，志愿行为基于个人自由意志作出选择。其核心特征表现为自愿性、公益性、实践性与无偿性。在现代社会，志愿服务已成为新时代党引导动员人民群众贡献智慧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奋斗目标的生动实践。志愿服务的价值也在发生转变，即从道德示范到制度参与，不再局限于个体善举，而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承载着公民责任的实践意义[2]。相较于专业社工，志愿者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来源广泛性，涵盖不同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群；二是参与灵活性，可根据个人特长选择服务项目；三是成本优势明显，能有效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但同时也存在专业度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三）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二者的关系辨析

总的来说，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构成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双轮驱动系统，它们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不同。相似之处包括：都是

为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服务，都认同为他人服务的价值观，都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积极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职业，侧重于技术赋能与质量把控，后者是业余活动，可以不经受专门训练而为之，但更擅长资源动员与社会连接。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的融合，本质是“专业理性”与“民间活力”的结合。理想的合作模式应如“齿轮传动”——社工作为“轴心”统筹规划服务项目，志愿者如同外围齿轮将政策意图转化为具体行动；同时，志愿者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又能反馈至社工团队，推动服务策略优化及专业实践创新。

二、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融合发展的背景与必要性分析

（一）政策驱动下的制度创新机遇

近年来，中央层面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两者协同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鼓励专业人才参与志愿服务”；民政部发布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也将“社工 + 志愿者”联动机制列为重点任务。2024 年底，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开展党建引领“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融合试点的通知》，要求各地坚持党建引领，把社区作为志愿服务的主阵地、主场景，聚焦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探索“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专业社工”的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志愿服务在助力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湖北省委社工部随后也印发了《湖北省“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并在全省选取了 30 个社区作为试点。试点社区武汉市武昌区张家湾社区将“银发力量”与“环保需求”相结合，培育出“绿叶社”。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滨湖社区联合滨湖街道社工站以“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双轮驱动为路径，通过系统性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构建“教育—服务—治理”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这些地方实践均为全国性政策落地提供了鲜活样本。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党对社会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工作的格局更加完善。也为专业社工和志愿服务两者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环境 [3]。

（二）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需求

随着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发展，目前我国基层治理正处于从传统的“管理型和权力型”政府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型期。受基层党建形式化、治理思想固化、减负工作不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加之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传统行政主导型的管理模式面临挑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遭遇瓶颈。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仅靠政府兜底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增加导致社区归属感弱化，亟须重建社会资本网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在此背景下，专业社工的技术优势与志愿者的人缘优势形成合力，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治理协同性、增强政务服务效能，破解“有温度却低效”的志愿困境与“专业化却悬浮”的社会工作服务困局。

（三）服务对象多元化需求的倒逼机制

新兴领域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双职工家庭的带娃难题、失独家庭的哀伤辅导、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入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服务供给必须更加精细化。单一主体难以应对多元矛盾，而多学科交叉的合作团队才能设计出综合性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项目，既需要特教老师制定训练计划（专业职能），也需要普通大学生定期陪伴互动（志愿补充），只有二者通力协作才能达到最佳干预效果。此外，数字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人们获取服务的方式。在线咨询平台的兴起使得远程指导成为可能，但也对线下执行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掌握数字化工具的年轻志愿者可以协助老年社工完成线上建档工作，实现代际优势互补。这种基于技术变革的新型合作关系正在重塑传统服务模式。

三、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实现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建议

（一）构建制度化的合作框架

1. 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制定《志愿服务能力建设指南》，明确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培训标准。参照医疗机构“全科医生 + 专科专家”的模式，建立社工主导下的志愿者分级管理制度。初级志愿者负责基础性事务（如物资发放），中级志愿者参与简单个案跟进，高级志愿者可独立承担小型项目策划。同时根据服务领域细分类别，如养老护理类、青少年辅导类等，确保人岗匹配。广州市越秀区的“星级义工”评定体系就是成功案例，通过设置青铜至钻石五个等级激励志愿者持续成长 [4]。

2. 完善双向培训机制

设计“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针对志愿者开办基础理论扫盲班，重点讲解沟通技巧、危机干预常识等内容；针对社工则开设领导力提升课程，强化团队管理和冲突调解能力。定期举办联合工作坊，围绕真实案例进行角色扮演和复盘研讨。构建“高校智库 + 行业协会 + 实务基地”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鼓励高校开设公益慈善管理硕士专业，推动职业院校开发志愿服务实训课程，形成多层次人才培养梯队。深圳市南山区推出“社工带徒计划”，每名资深社工结对指导三名骨干志愿者，半年内使后者的服务满意度提升 40%。

3. 形成激励机制闭环

除了精神表彰外，还应探索物质奖励与非货币化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建立志愿服务时长储蓄制度，

累计达到一定标准可兑换体检套餐或文化演出门票；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给予优先推荐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构建职业发展通道，优秀志愿者经考核合格后可转为实习社工，逐步实现身份转化。南京市鼓楼区的“青穗计划”已成功培育10余名志愿者考取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

（二）打造智能化的支持平台

1. 开发一体化管理系统

围绕“精准匹配、高效协调、赋能成长、可持续生态”四大核心目标，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发集需求发布、人员调度、成效评估于一体的智慧平台。系统自动匹配服务对象特征与志愿者专长，智能推送最适合的任务清单。后台实时监控服务进度并生成可视化报告，便于管理者及时调整资源配置。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的“公益云图”项目显示，接入平台后志愿服务响应速度提高65%，闲置人力资源利用率提升30%。

2. 构建虚拟学习社区

依托移动互联网建立线上社群，定期推送政策资讯、微课视频和经验分享材料。设置互动问答板块解答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邀请专家学者在线答疑解惑。还可以开展云端团建活动增强凝聚力，如线上读书会、技能挑战赛等。成都高新区创建的“益路同行”App注册用户突破万人，日均活跃量保持在千人以上，成为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社交网络。

（三）培育本土化的运作模式

1. 盘活社区存量资源

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社会网络结构。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其效能最大化的关键在于深度融入社区肌理，充分激活并依托社区本底资源开展服务。这种“深耕”并非简单的空间在场，而是通过精准识别、有机整合、动态培育社区内生的人力、物力、文化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核心要素，构建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服务体系。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工作时，应充分尊重当地习俗信仰，而在高校云集的区域则可借助师生智力资源开发特色项目[5]。贵阳市花溪区依托苗绣非遗技艺成立的互助合作社就是一个典范——社工教留守妇女产品设计原理，大学生志愿者帮助对接电商平台，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2. 创新项目孵化机制

构建“协同共生、优势互补”的生态孵化机制，将专业社工看成“骨骼系统”（提供结构支撑），志愿者作为“血液循环系统”（输送养分），二者形成动态互哺关系。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草根创新，采用“种子资金+能力建设+督导陪伴”的三阶培育模式。初期给予小额经费启动试验性项目；中期配备导师指导完善实施方案；后期协助链接外部资源扩大影响力。武汉市江汉区举办的“公益创投”大赛，凝聚社会组织、志愿团队、社区力量合力，聚焦“一老一小一新”等重点群体，以创新项目推动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精细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每年遴选优质提案给予万元资助，其中多个项目后来成长为知名品牌公益活动[6]。

3. 强化理论研究支撑

“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关键需要聚焦三大矛盾统一性命题：一是“专业性”和“大众参与”——如何在保持社工价值伦理的前提下激发志愿者的能动性？二是“服务标准化”和“灵活创新性”——怎样平衡制度规范与基层首创精神？三是“短期动员”和“持续培育”——如何实现志愿者从活动参与者到治理主体的身份转变？真正的融合是通过结构化的对话机制将差异转化为生产力。要鼓励高校等科研机构开展实证研究，总结提炼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7]。重点关注不同合作模式下的成本效益比、服务质量变化趋势等指标体系构建。清华大学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连续五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公益生态报告》，为各地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的双向赋能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化学反应般的有机融合，是服务理念、工作机制、技术手段的全方位革新，最终指向的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这种融合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也离不开基层实践的智慧创造。新征程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只有持续深化制度建设、善用科技赋能、厚植地方特色，在推进“专业社工+志愿服务”深度融合上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进一步激发和增强基层社会活力，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1] 陈霞 .“专业社工+志愿服务”双轮驱动机制建设 [J]. 中国社会工作 , 2025(16): 35.

[2] 景燕春 , 朱健刚 . 激活志愿服务 :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与路径 [J]. 学海 , 2025(04): 133−142.

[3] 王思斌 .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 [J]. 社会工作 , 2014(01): 3−10, 150.

[4] 徐道稳 . 浅谈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对我国现有社会工作发展体制的影响 [J]. 中国社会工作 , 2023(22): 25−26.

[5] 陈辉 . 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逻辑与善治路径 [M].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9: 242.

[6] 陈咏媛 . 企业志愿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4: 370.

[7] 贺志峰 . 中国志愿服务制度化研究 [M].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 2022: 251.

（作者单位：武汉市团校）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模式探索
——以中华女子学院“汇爱”志愿服务队为例

李　阳

摘要：本文从流动儿童家庭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出发，提出了高校志愿服务在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四大优势，即地理优势、人才优势、专业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中华女子学院“汇爱”志愿服务队家庭教育指导实践，提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高校模式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延长服务周期；第二，高校志愿组织进一步探索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等多方合作；第三，将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模式在其他高校进行推广复制。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高校模式

2022 年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儿童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弥足珍贵的群体。约占儿童总人口 1/4 的流动儿童群体[1]，成为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儿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是关键。然而，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陪伴时间少、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方式不当等问题。

全国妇联、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 年）》中指出，要努力构建多方参与、协同育人的家庭教育新格局。特别是“对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地、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地区，广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要“广泛吸纳热心家庭教育公益事业的教师、大学生为家庭提供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发挥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才优势，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专业、精准、持续、公益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既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补充，又可以实现高校立德树人、实践育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模式探索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流动儿童家庭需要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

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认为，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是使服务计划真正具有效率、效能的必要条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需要精准化、个性化，因此，了解家长对指导服务的真正需求和主动参与的意愿，才能更好地为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

通过对北京地区流动儿童家庭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情况和参与意愿、需求的内容以及服务途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一）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情况和参与意愿

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占 93.29%，90% 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时间允许是希望能够得到家庭教育指导的。

（二）对家庭教育指导具体需求的内容方面

流动儿童家长中，71.34% 的家长希望得到家庭教育科学方法的指导服务；56.71% 的家长希望得到如何进行自我能力提升的指导服务；55.49% 的家长希望得到如何培养儿童兴趣方面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59.76% 的家长希望得到如何形成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的指导服务；72.79% 的家长希望得到如何控制儿童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的指导服务；42.68% 的家长希望得到如何陪伴儿童顺利度过青春期方面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43.9% 的家长希望得到陪伴儿童阅读的指导服务；47.56% 的家长表示希望得到如何进行儿童心理疏导方面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三）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途径方面

99% 的家长表示，如果时间允许，并且没有任何费用，非常愿意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活动。57.48% 的家长提出希望与其他家长进行沟通交流、互相学习。46.52% 的家长希望专业志愿者提供“一对一”指导服务，47.56% 的家长提出希望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

以上需求调查的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服务有着相当大的、专业的、个性化的需求，高校的志愿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

二、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优势

高校作为人才资源、研究成果的重要聚集地，其具有地理优势、人才优势、专业优势及组织优势，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发挥重要的资源支持作用。

（一）地理优势

我国多所高校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以及省会城市，而这些城市又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较多的城市，能够非常便利地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以及为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以北京为例，北京拥有各类高等院校的数量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位于北京市五环外的昌平区，是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8.2%。区内有10余所高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中央财经大学等，师生志愿者可以较低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就近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服务，从而保障服务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二）人才优势

高校是人才资源的聚集地，有着无可比拟的人才优势。高校大学生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前提，是自身先要接受家庭教育相关政策和课程的系统学习，再以志愿者的身份，为流动儿童的家长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必然会得到双赢的效果。大学生志愿者不仅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了公益服务，还可以提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培训，有利于树立“家庭是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老师”的主体责任意识，增强家庭责任感，必然会非常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主动学习科学的育儿理念，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

（三）专业优势

家庭教育指导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复杂系统。高校目前开设的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应用心理学、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等专业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及实验条件、图书资料、学生志愿者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

通过链接校内家庭教育相关专业老师、校外家庭教育专家学者或具有相应资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师生定期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工作的专业培训，从家庭教育指导的目标、具体内容和指导方式进行整体设计，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能够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供保障与支持，形成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服务志愿者队伍[2]123。

（四）组织优势

全国妇联承担了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任务。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全国妇联的直属院校，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学院开设了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社会工作、人力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可以通过参加志愿服务与社会进行接触，实践所学。更重要的是，志愿服务可以借助妇联组织优势，充分联合妇联基层组织的力量，可快速精准锁定需要服务的流动儿童家庭。

三、家庭教育指导高校志愿服务的实践探索——以“汇爱”志愿服务队为例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提出，鼓励高等院校等机构面向家长提供专业咨询和服务，广泛吸纳教师、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开展常态化、专业化、精准化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华女子学院成立了“汇爱”志愿服务队，链接高校师生志愿者、社会公益组织、优秀企业等社会资源，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服务。

（一）志愿服务特色

1. 有力的专业支持

中华女子学院是我国首家开设家庭教育本科专业的院校，有着较为丰富的家庭教育相关专业资源，如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建设研究院培训平台，长期举办新时代家庭建设指导培训课程的公益培训项目。“汇爱”志愿服务队通过链接校内外家庭教育专家与培训资源，对参与志愿服务的教师和学生定期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工作的指导，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供人才保障与支持，形成一支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3]。目前，“汇爱”志愿服务队已有近百名教师和学生志愿者，通过98学时的学习和考试，取得了由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建设研究院和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联合颁发的家庭建设专业指导师培训证书。

2. 借助妇联基层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六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协同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并按照职责分工承担家庭教育工作的日常事务[4]，从而明确了妇联组织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要任务。中华女子学院为全国妇联直属院校，家庭教育、学前教育、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需要社会实践平台。“汇爱”志愿服务队充分联合妇联基层组织的力量，精准锁定流动儿童家庭。学生志愿者一方面通过参与“汇爱”志愿服务队为有需要的流动儿童家庭提供公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同时也实现了实践所学、服务社会的教育目标。

3. 与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合作

与长期服务困难家庭并有公信力的社会公益组织合作，有利于“汇爱”志愿服务队快速了解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和特殊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2013年成立的“暖暖爱心儿童之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多年来主要服务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耳蜗宝宝”，“汇爱”志愿服务队成员与众多在公益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优秀社会工作者一起学习，

共同探索如何更好地为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提供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二）志愿服务队的具体做法

1. 加强志愿者专业培训

“汇爱”公益创业项目的志愿者队伍，其成员包括来自家庭教育、社会工作、学前教育等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具有彼此互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良好的沟通能力、亲和力和责任心，以及丰富的相关项目的志愿服务经验。要通过为期6个月98学时的“新时代家庭建设指导培训”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后，方能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2. 需求调查

不同的家庭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也不同。以需求为导向，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汇爱”志愿者利用假期走访了北京、四川、广西、河北等地50余户流动儿童家庭，收回问卷200余份，形成了详细的需求调研报告，充分了解此类家庭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特点，为后期进行“一对一”服务方案的设计提供依据。

3. 建立受助家庭档案

通过志愿者走访调查，深入沟通，建立受助家庭档案。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组成、籍贯；家长受教育状况、工作状况、收入状况；家长和孩子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基本信息；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家长和孩子的动态情况和成长轨迹。

4. 设计个性化指导方案

根据不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制定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方案。“汇爱”志愿服务队考虑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文化程度、儿童的认知和情感特点等各方面因素，根据不同需求，与家庭共同制定详细的“一对一”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案[2]122。

表1 不同场景不同主题的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服务

活动场景	活动内容	活动目的
服务对象家中	一道家乡菜	破冰行动，了解服务家庭生活环境，与服务家庭建立平等互信的关系
中华女子学院	参观校园和校史馆；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	感受大学校园氛围，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项目实施效果的前测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参观“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展”	继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益图书馆	共读《宋氏三姐妹》	了解宋庆龄所接受的家庭教育
宋庆龄故居	参观宋庆龄故居	了解伟大女性崇高的品德、情操和光辉的业绩，激发崇敬之情
城市公园	家庭教育主题沙龙	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国家博物馆	家庭教育主题沙龙	建立文化自信、历史自信
暖暖爱心儿童中心	成长分享会	收获分享，完成项目实施效果的后测

5. 不同场景的主题活动

流动儿童的家长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自信心，不知道更无意识去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开展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汇爱”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不同场景的家庭教育主题活动（见表1），引导家长积极利用城市公共资源，激发家长学习兴趣，提高家长的自信心和学习能力，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与儿童共同成长。

6. 制作流动儿童家庭成长手册

“汇爱”志愿服务队还为流动儿童家庭制作《家庭成长手册》，记录家长和孩子在一年中的成长与变化，通过呈现可视化成果，巩固学习成效，为争做“学习型家长”提供内生动力。

四、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高校模式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延长服务周期，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提高家庭参与度。

第二，高校志愿组织进一步探索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多方合作的模式，争取更多的政府资源和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5]。

第三，将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的高校模式在其他高校进行推广复制，让更多的高校教师和学生成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领域的志愿者，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效果。

五、结语

高校模式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志愿服务中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利用城市“儿童友好”资源，覆盖更多有需求的流动儿童家庭，帮助家长们成为“学习型”家长，切实提高流动家庭教育能力，推动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EB/OL]. (2023-04-19)[2026-01-08]. https://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t20230419_1938814.html.

[2] 李阳. 高校公益创业的育人功能及培养路径研究——以“汇爱”公益创业项目为例 [J]. 就业与保障, 2023(06): 121-123.

[3] 杨文悦, 曾彬.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建设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8(02): 7-1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5] 王万奇, 陶光均. 新时代大学生（下转25页）

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视域下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研究

张　明

摘要：基于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职业院校加强对学生的公益精神培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具体体现。本研究结合职业院校特点，分析了当前职业院校开展公益精神培育面临的困境，即存在公益教育的理念认知偏差、课程体系割裂、实践活动的内容形式较为单一以及没有建立协同评价机制等问题，然后依托一体化思路探索破解之道，具体包括建立螺旋式上升的公益教育目标体系、开发以专业为载体植入公益元素的思政课程和实践项目、搭建立体化多通道并联方式的公益实践平台、创建多元化激励性评价机制，使得公益精神内化为学生的职业素养与道德品质。

关键词：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实践育人

公益精神是指社会担当意识、利他主义精神以及实践担当能力，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典型表现，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青少年公益精神培育是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之一。《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要求，这为我们面向不同学段的学生因材施教提供了行动指导。职业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学生是否具有公益精神对未来的劳动者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社会文明程度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职业院校在公益精神培育方面存在学时短、偏重技能而忽视素养、资源不充足、尚未融入大中小“一盘棋”等整体化谋划的问题，导致其培养学生公益精神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按照“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要求，明晰职业院校阶段公益精神培育的目标定位、培育内容、培育方法等问题，探索具有特色的、有效的培育方式。

一、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公益精神培育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主张人应该在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公益实践就是学生超越个人狭隘性向公共空间进军、实现社会价值的有效方式。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可以作为公益精神培育的方法论指导，他强调公益教育要基于现实生活并走向社会实践，要以培养人的观点为基础，在具体实施中更加强调行动本身而不是知识本身，这种思想正契合了技术职业学院对学生注重实操技能的培养需要[1]。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明确揭示了人从“前习俗水平”到“后习俗水平”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演进规律，指导我们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设计工作中，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根据学段（包含初中、中职、高职）的不同为学生成长设计差异性、连贯性的公益育人目标，才能保证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内容具有递进性与连贯性，促进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螺旋式上升。

二、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现状分析

当前，职业院校在学生公益精神培育方面取得了

（上接 24 页）志愿服务发展路径探究 [J]. 社会科学家，2022(12): 147−15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中华女子学院校级重点科研课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县域支持体系研究”（2023ND−0202）。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一定进展，如将志愿服务纳入学分管理、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活动等，但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视域下审视，仍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方面。

（一）培育理念存在认知偏差，一体化衔接意识淡薄

部分职业院校对公益精神培育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到位，把公益精神培育当作思政教育的“点缀”、学生工作的“附加项”，没有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统领来规划布局。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公益精神培育相对前序学段（初中、普高 / 中职）缺乏过渡衔接意识，前序学段培养学生公益认知启蒙和简单体验，而到达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后没能够适时把培育重心转向以服务公益、专业技能、职业发展规划等为内核的“专业化”“深度化”方向，造成公益精神培育存在“断档”、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缺少一体化设计中“螺旋上升”的路径导向。

（二）课程教学与实践割裂，未能有效融入专业特色

公益精神的培育多依赖于团委、学工系统组织的临时性志愿服务活动，与思政课课堂教学特别是与各专业课程教学关联度不高。思政课教师讲授公益理论，专业课教师专注于技能传授，两者“各吹各的号”，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公益实践往往停留在清扫卫生、简单慰问等浅层次，未能结合学院的专业优势（如电子专业学生义务维修、计算机专业学生帮助社区老人使用智能设备、幼教专业学生服务留守儿童等）设计具有专业特色的公益项目，导致公益精神培育与专业技能培养“两张皮”，实效性大打折扣[2]。

（三）实践平台资源单一，校内外协同机制不畅

很多公益实践活动仅限于校内活动以及某个纪念日活动等，没有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校社联、校企联的公益实践活动平台。校外的实践基地缺乏，而与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的联系大多是一次性的、项目式的合作，没有建立稳定的供方、需求方的对接及资源互享机制，学生开展公益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参与面窄，很难开展经常性的锻炼，更难获得较为深刻的社会体验感，公益精神的培养也就得不到巩固和强化。

（四）激励性评价机制缺失，学生内生动力激发不足

当前对学生参加公益活动进行评价多采用以工时记录等量化的方式，很少对学生在活动中的体验感悟及收获等方面采取质性评价，评价结果也没有与学生评奖评优或实习就业推荐挂钩，缺乏有效的激励作用。单一的评价模式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成长进步状况，难以达到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目的，一些学生并不是自愿地去参加这项公益活动，而是怀着某种功利性的想法。

从深层次来看，目前所面临的困境都反映了职业院校公益精神培育缺乏协同育人的制度性安排，思政教学部门、学生工作系统、专业院系与校外实践单位之间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公益育人协同沟通机制、合作交流机制和资源调配机制，校内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校外单位与学校的合作大多是临时性的合作，并未建立稳定的供需对接关系和评价反馈机制。在各个学校缺乏一个长期固定的公益育人大平台的情况下，就很难将公益教育全面纳入到人才培养主渠道中来，也难以统筹好各种资源为公益教育服务，更难形成一系列支持理念创新、课程建设、平台搭建与考核评价等工作所需的理论武器。要破解当前的职业院校公益精神培育发展困境，就必须以建立长效协同机制为抓手。

三、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现状，必须在一体化视域下，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改革与创新，构建符合职业院校特点的公益精神培育新模式。

（一）构建一体化目标体系，实现各学段有效衔接

按照“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要求，对于职业院校应确定以“深化认知”“实践内化”为重点，就是要在前序学段奠定的公益认知、公益情愫基础上，进一步将公益精神和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建立起内在关联性，并将公益服务作为未来职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内容上突出“职业性”“专业性”，结合专业设置开展公益服务活动。中学阶段开展“什么是公益”的知识普及和校园义工活动，高职阶段就可以变成“如何运用我的专业技能服务社会”的项目化实践活动。通过目标任务分层、目标内容递进，使公益精神培育在全程育人中不断得到深化，最终达到从“知晓”到“认同”，再由“认同”而“践行”的效果[3]。

比如，职业院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入学前学习过雷锋事迹，知道“不随意乱扔电池”；到职业院校以后，思政课教师可以讲解与职业道德有关的信息普惠和消除数字鸿沟等内容，组织学生开展“社区电器义诊”公益活动，让学生既可以学习怎样修理电器设备，还可以和社区群众进行沟通交流，宣传日常安全使用电器知识。在此过程中，学生将“抽象的公益”转换为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技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体验——“我的技术可以方便别人”，由此，逐步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职业认同感，最终目的是使学生由被动地参加到积极地争取用自己的技术去为社会做好事来体现公益精神，达到了“将外在的要求变成自己的内在需要”。

（二）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打破课程教学与实践的割裂状态的关键是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一方面，要让思政课成为公益精神培育的重要阵地，不仅要讲清公益课程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更要注重运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以及项目化学习法讲深、讲透、讲活公益理念。

另一方面，要加强专业课程中公益元素的开发，将公益精神培育渗透于专业课程大纲、教案的设计及实习实训中，学前教育专业的“公益早教进社区”、护理专业的“南丁格尔精神”与志愿服务、电子商务专业的“公益电商”“助农直播”等，都可以创设适合的公益环境，实现相关内容的教学目标[4]。

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可以设定某专业课程的教学项目为“为社区流动儿童设计并实施一次公益亲子活动”，学生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群体儿童心理特点，提供适宜的游戏活动并实践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适当参与，让学生思考教育公平、社会担当等问题，领会到思政课和专业课的统一，体会到学前教育专业的社会价值。学生在实习中得到“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个性化体悟，在公益性活动中生发出未来幼师行业的公益之心，在实现知识技能型培养目标的同时实现师德型价值观塑造，使公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公益精神培育达到“盐溶于水”的效果。

（三）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多元长效的实践平台

针对平台资源单一的问题，职业院校必须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多渠道开拓稳定的、开放的公益实践资源。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路径：一是加强与所在社区、公益组织的合作，建立一批固定的志愿服务基地，为学生提供公益实践的“根据地”；二是用好校企合作平台，与企业一起合作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活动，让学生参与；三是立足于打造虚实结合的实践平台，如基于新媒体进行公益宣传、线上支教等，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比如，根据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特点，学院可以与周边多家社区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依托“智慧助老”志愿服务站，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分批次入站对接，主动联系对应的老年人，一对一、手把手地教会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识别和防范网络诈骗、网上预约挂号等技能，开发线上教学的小程序以及制作一些简单的教学视频。这样，不仅能让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增进对专业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能让学生体会并深刻理解什么是“技术温暖”，如何更好地帮助老年人，最终形成持久化、有效化、有反馈的公益实践生态[5]。

（四）完善激励性评价机制，激发学生内生动力

建立科学多元的激励性评价体系，为激发学生内生动力提供保障。改变单一工时记录模式，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量化指标与质性描述并重的多元化评价方式；内容包括服务时长、服务态度、专业技能使用、团队协作及反思深度等方面；将公益实践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使其成为奖学金评定、入党考察、优秀毕业生评比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注重对学生精神层面的激励，如通过召开表彰大会、宣传典型事例、颁发公益证书等形式来激发学生积极参加公益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以“环保专业学生参与河流保护公益项目”为例，学校有关方面并不根据学生参加活动次数就下结论，而是让学生完成一项包含活动记录、活动时所用专业知识总结、问题反思和改进意见的实践报告，并且进行小组答辩，由教师打分。然后，根据实践报告以及小组答辩情况进行评审，最后再结合社区给出的反馈意见，作出最终评审。参与公益活动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额外的学分，有关方面授予“环保公益之星”的称号，并在校园媒体对其事迹进行宣传。这样的评价方式能够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促使学生从过去被动地完成工作转变为主动深度参与、创造性解决问题，从而认识到“我的行动可以产生影响”。当评价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教育过程与激励过程，使之能更长久地将公益精神内化为自觉行为。

四、结语

总之，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学生公益精神培育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具体需要破除以往散点化、碎片化的惯性思维，立足整合、创新，对学生公益精神的培育进行全面的设计。从核心出发，充分考虑职业院校类型的教育特点，使公益精神培育真正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过程，促进学生把公益精神内化到职业发展当中，并不断提高对专业的认可度，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做到以德养技、德技双馨，实现知行合一。进一步的探索是要从横向着手寻找各个学段有效衔接的方式方法，从纵向着手找出优化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路径策略，让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到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来，建立科学、完善的学生公益精神培育体系。

参考文献

[1] 纪驭亚，顾俊丽．把伟大抗战精神“种”进学生心里——浙江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引发热烈反响 [N]. 浙江日报，2025-09-19(01).

[2] 李炼．我省大中小学生共上伟大抗战精神思政课 [N]. 山西日报，2025-09-20(03).

[3] 李林霞．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N]. 山西日报，2025-09-19(01).

[4] 张雯婧．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做光荣自豪中国人 [N]. 天津日报，2025-09-20(02).

[5] 李知恩．生命教育融入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析论 [J]. 社会主义论坛，2025(09): 41-42.

（作者单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及其献血动机的调查研究
——以新疆第二医学院为例

孙雅茹 杨锦仪 李 娜 刘佳纯子 *

摘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疆第二医学院625名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旨在探究大学生群体对无偿献血的认知水平与参与动机。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的总体献血率较低，不同年级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参与行为差异。对献血基础知识的认知调查显示该群体总体认知良好，但认知缺乏深度，对部分具体医学标准存在认知盲区。在信息渠道方面，该群体主要依赖媒体宣传、街头献血设施与学校讲座等传统方式获取献血相关信息；在激励措施方面，“免费用血”政策与“血液检验结果告知”两项措施最受学生关注。而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促进献血行为的显著因素是外部激励与外部压力，而相较于干预内在心理因素而言，对医学生群体来说，减少参与的实际障碍则更为有效。基于此，可通过精准化动员、优化宣传策略、减少参与障碍及精细化知识普及等措施提升无偿献血参与度。

关键词：无偿献血；大学生；认知与动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而无偿献血则是确保血液安全、充足供给的核心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近三十年来，我国血站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然而，面对快速增长的临床用血需求，血液供应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1]。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身体素质良好、传染病风险较低，是稳定而优质的血源群体[2-3]。然而，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献血知识的认知不足与认知偏差，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制约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的障碍之一[4]。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系统分析大学生对无偿献血的认知现状与参与动机，识别其顾虑所在，为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新疆第二医学院625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均在充分知情后自愿参与），共回收有效问卷625份。

（二）调查内容

本研究采用《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情况及动机调查问卷》，该问卷基于既往文献《无偿献血动机评价量表》并经由小组集体商议修订而成[5]。问卷由三部分构成：1.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献血次数）；2. 献血认知水平（5个条目，1~5分正向计分，1=“完全不了解”至5=“完全了解”）；3. 献血动机调查（7个维度，共39个条目，1~5分计分，1=“完全不同意”至5=“完全同意”，经统一转换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水平或动机强度越高。

（三）信效度

本研究借助Cronbach’s α系数来进行信效度评估。从分析数据来看，整体量表α=0.928，N=39，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此外，整体量表的KMO值为0.861，且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0.001$），这说明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构效度良好。

（四）统计方法

SPSS 26.00软件是本研究进行统计的主要工具。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大学生无偿献血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人口学特征的比较分析则采用卡方检验。献血组与非献血组的组间动机差异及动机对献血行为的影响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进行揭示。上述所有分析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三、结果

（一）样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625份。结果显示，在625名被调查者中，有献血经历者共117人（占18.72%），

无献血经历者 508 人（占 81.28%）。从性别来看，男性中 16.67% 有献血经历，女性为 20.22%，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0）。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年级献血比例最低（10.69%），大二年级最高（27.24%），大四年级因样本量过小，未纳入结果分析，整体年级差异显著（p<0.01）。从专业类别来看，医学类学生献血比例为 18.46%，理学类为 36.36%，其他类无人献血，但专业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254）。总体而言，献血经历在不同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性别和专业上未见明显差异。

（二）献血相关调研信息统计

本研究对受访者了解无偿献血的途径及感兴趣的激励措施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信息获取途径方面，“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是最主要的渠道（81.28%），其次为“街头献血屋和献血车的宣传”（61.92%）和“学校举办宣传讲座”（60.48%），而“家人、朋友的宣传”占比相对较低（36.16%）。在感兴趣的献血激励措施方面，“享受免费用血政策”最受青睐（70.24%），超过半数研究对象对“告知血液检验结果”感兴趣（54.24%），近半数研究对象倾向于“给予宣传、表彰”（49.60%）和“赠送纪念品”（47.84%），而选择“其他”选项者则占比极少（4.80%）。

（三）大学生无偿献血动机分析

本研究对受访者献血动机进行了调查，t 检验分析结果发现：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献血经历的群体和无献血经历的群体在外部压力、外部激励、自我效能、反应代价、恐惧焦虑、严重性及外部阻力这几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有献血经历的群体的外部压力、外部激励、自我效能、严重性认知均大于无献血经历的群体。而在反应代价、恐惧焦虑、外部阻力三个维度，有献血经历的群体的数值则小于无献血经历的群体。通过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发现，献血动机对献血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而言：外部激励和外部压力是献血的显著正向预测因素，表明感知到的外部激励和压力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有过献血经历的发生比分别会增加 107.8% 和 53.8%；反应代价和外部阻力是献血的显著负向预测因素，表明感知到的献血不便和外部阻力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有过献血经历的发生比会分别降低 42.6% 和 37.1%；而自我效能、恐惧焦虑、严重性这三个因素对献血行为的影响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

（四）关于献血认知及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本研究调查了大学生对若干献血关键知识的认知情况。统计结果显示，“献血前饮食规范”“单次献血量”“献血最短间隔”以及“世界献血日”这几个条目的知晓率较为接近，基本知晓率均超过 50%。而所有调查条目中，知晓率最低的一项是“献血者的近视度数不得超过 700 度”，其基本知晓率为 40.96%。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新疆第二医学院 625 名大学生进行研究，以探究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现状及其献血动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发现。

（一）人口学特征：年级成为影响献血行为的关键因素

本次调查的 625 名大学生总体献血参与率为 18.72%，在献血意愿层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研究发现，在性别和专业两个维度上，学生的献血行为无显著差异，这可能说明大学生群体已对无偿献血具备一定的认知基础。然而，年级的差异对献血参与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大二年级学生的献血率显著高于大一年级。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与大一年级学生初入校园对献血渠道与相关信息接触有限等因素有关。而相比之下，大二年级学生校园生活融入度更高，参与献血宣传与活动的机会更多。这一结果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献血参与度，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低年级学生的献血宣传与组织动员。

（二）献血认知水平：基础良好，但存在知识盲区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献血的基本常识（如单次献血量、献血最短间隔、献血前饮食规范、世界献血日）认知平均值均高于理论中间值 3 分。然而，对“献血者的近视度数不得超过 700 度”这一具体健康筛查标准的认知度明显偏低，且是唯一中位数仅为 3（对应“不确定”选项）的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献血知识宣传在深度上存在不足。在本研究所聚焦的医学生群体中，即便他们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背景，对于相对细节化的献血健康标准也存在认知盲区。如今，献血宣传多聚焦于献血量、健康益处等核心信息，对诸如近视度数、近期用药史、特定慢性疾病情况等具体禁忌情形的普及不足，从而导致部分潜在献血者对这些细致条件缺乏清晰认识。这类关键信息的缺位，不仅可能使部分符合条件者因不确定自身状况而造成决策障碍，也有可能导致部分暂不适宜献血的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献血，进而影响献血安全和献血体验。由此可见，未来的知识普及工作有必要加强对此类具体、可操作的健康条件的宣传，以弥补认知深度的不足并进一步提高献血参与率。

（三）信息渠道与激励措施：宣传覆盖面受限且更注重政策实用性

对信息获取渠道的调查显示，相较于“家人、朋友的宣传（36.16%）”，“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81.28%）”“街头献血屋和献血车的宣传（61.92%）”和“学校举办宣传讲座（60.48%）”是当前大学生了解献血的主要途径。而在献血激励措施方面，70.24% 的学生选择了“享受免费用血政策”这一措施。这一结果直接反映出大学生对政策实用性及长远保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52.24%）表示对“告知血液检验结果”感兴趣。“告

知血液检验结果”这一举措，从微观层面来说，满足了个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知情权。同时，它也是对采血流程规范性和血液安全性的最有力的证明。就大学生群体来说，这一举措与其对自身健康知情和安全确认的双重需求不谋而合。因此，若想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献血积极性，可考虑从拓宽宣传覆盖面和强化激励措施这两个方面着手。

（四）献血动机的影响：外部环境与感知障碍的共同作用

研究发现，不同动机维度对献血行为的影响不同。具体来看，诸如“免费用血”“表扬”等外部激励，以及“社会期待”“同伴影响”等社会压力对献血行为的影响显著且正向。与之相反，反应代价（如占用时间、影响健康）和外部阻力（如家人反对、负面评价）则带来显著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效能”与“恐惧”（如对缺血后果严重性的认知）等变量在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中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这或许与调查对象的医学背景有关。通常来说，医学专业的学生具备更高的耐受性与认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上述心理变量对其行为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对于医学生群体而言，不应该单纯地将缓解其对献血本身或健康风险的忧虑作为提升献血率的关键，而应该在提升外部实际的便利性和社会支持度方面下功夫。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大学生（特别是医学生）的无偿献血参与率：

1. 精准化动员：献血动员应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从知识普及逐渐过渡到价值引导和内化。知识普及主要是针对大一新生，相较而言，他们的认知与接触较少，所以应在入学教育阶段系统融入献血科普，帮助其建立对献血的科学认知。例如，开展必修讲座、发放献血知识科普读物等，为其后续参与献血奠定一定基础。对于已融入校园生活的高年级学生而言，则更应强调价值引导，深化其社会责任感。例如，在“医学伦理学”“公共卫生学”等专业课程中嵌入献血伦理与价值的讨论。与此同时，也可通过开展经验分享会、交流会等形式，让高年级学生带动低年级学生，形成积极的同伴效应。

2. 优化宣传策略：对宣传策略的优化应从渠道、内容与形式三个维度共同展开。从宣传渠道维度来看，仍需重视传统媒体宣传和校园讲座的作用，同时积极探索创建知识科普社团这一形式。鼓励学生成为宣传的主体，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创作献血科普内容。在宣传内容维度上，则侧重宣传“免费用血政策”“血液检验结果告知”等激励保障措施。这些措施与学生切身利益高度相关，有助于增强吸引力和参与度。在宣传形式的维度上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献血者日”这一时间节点，策划“献血模拟体验”“献血故事分享”等活动，以增加学生的代入感，同时减少其顾虑。

3. 减少参与障碍：提升大学生无偿献血参与度需要扫除关键障碍。就本研究结果而言，关键障碍则指向“反应代价”与“外部阻力”。为实现降低“反应代价”这一目标，需要提升服务的便捷性与人性化水平，如推动献血车定期进校园、优化流程指引与预约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献血环境等。而在减少“外部阻力”方面，则应侧重于构建支持性的环境和氛围。加强积极的舆论引导，降低学生的心理负担。

4. 精细化知识普及：研究结果从侧面反映出，当下无偿献血相关知识的普及应该思考从“为什么献血”向“如何能献血”深化。因此，精细化知识普及的目的主要在于弥补学生在献血的具体健康标准（如近视度数要求）方面的认知盲区。要实现这一点，需重点普及健康条件、体检流程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这样一来，有助于以权威信息消除资格疑虑，从而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能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决策。此外，还可以通过组织无偿献血知识竞赛、答题等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从而强化认知。

总体来看，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探究了某医学院校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及其献血动机，并提出提升无偿献血参与度的针对性策略。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1. 样本均来自单一医学院校，在其他专业背景高校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2. 缺乏对动机与行为间因果关系的进一步探究。鉴于此，后续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并提高其代表性，开展跨院校、跨专业的比较研究。同时，拓展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献血行为的动态心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沈蓉，张利华，施东平，等. 启东市近十年无偿献血情况回顾性分析及策略研究 [J]. 黑龙江医学，2024, 48(06): 711−713.

[2] 顾文琴，张艺凡. 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4, 15(10): 158−161.

[3] 褚兴玥，金晓蓉，王石坤，等. 昆明市在校大学生无偿献血的认知及动机研究 [J]. 卫生职业教育，2022, 40(01): 147−149.

[4] 刘丽，马鸣骏，王淑荣，等. 认知行为干预对大学生无偿献血意向、行为及态度的影响 [J]. 当代护士（下旬刊），2024, 31(06): 87−90.

[5] 屠小明. 无偿献血动机评价量表编制及献血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南京：南京医科大学，20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大学生“启明星”科研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捐献‘青春热血’——大学生无偿献血认知及其献血动机的调查”（S202413560017）。

（作者：孙雅茹、杨锦仪、李娜，新疆第二医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刘佳纯子，新疆第二医学院讲师）

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郭燕玉

摘要：本文以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帮扶工作的实践现状与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帮扶政策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实证研究的数据和案例，发现当前的帮扶体系在运转过程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信息沟通不畅、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提升帮扶工作的效率与公平性，研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设计，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本文研究表明，构建科学化、精细化的长效管理机制，是实现对困难群体精准帮扶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困难群体；帮扶管理；乡镇街道；政策落实

一、引言

福建省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一个省份，近年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镇街道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群体，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教育支持、社会融入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由于技能缺乏、年龄偏大、身体残疾等原因，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稳定就业，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也常常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资源[2]。在此背景下，建立完善覆盖全面、响应及时、精准高效的困难群体帮扶管理机制，已经成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

目前，福建省已经初步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为主体，专项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3]。但基层实践中也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政策衔接不到位、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象。尤其在乡镇街道层面，由于财政资金、人员编制和专业能力受到限制，一些地方的帮扶工作还停留在应急性、补救性的层面，缺乏长效机制的支撑[4]。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灵活就业者等边缘困难群体容易被排除在现行救助体系之外，出现政策覆盖盲区[5]。

研究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的现实路径和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本问题包含政策执行、府际合作、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诸多方面，有利于加深对基层治理复杂性的认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精准识别并回应困难群体的多维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已有的帮扶机制运作逻辑及其取得成效展开梳理，能够为改良社会救助制度提供实证参照，从而助力塑造更为包容、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网络。

二、理论分析

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社会救助、公共管理、福利理论这三个理论体系，三个理论体系一起构成了政策设计、实践运行的学理支撑。社会救助理论认为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保障要实现“托底”功能。公共管理理论为基层帮扶机制提供协同治理和流程优化的分析框架[6]。B 乡对精神病患者、智障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就业帮扶和监护管理“三到位”服务，体现了基层政府在复杂社会治理环境中的精细化响应能力（见表 1）。

福利制度理论主要研究救助体系公平与可持续之

表 1 相关案例与理论分析

案例名称	帮扶对象	帮扶措施	投入资金（万元）	服务项目数量	特色做法
A 镇儿童关爱网	未成年儿童	微心愿征集活动、大学生志愿者陪伴服务	未提供	未提供	“微心愿”助困圆梦
B 乡特殊人群帮扶	精神病患者、智障患者	医疗救助、就业帮扶、监护管理	10	未提供	“三到位”服务
C 街道困难群体帮扶	低保户、残疾人	最低生活保障、公租住房、残疾人护理补贴	未提供	7	一站式社会救助服务站点
福建省低收入人口帮扶	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服务类社会救助	2.1	459	“物质 + 服务”救助模式

间的平衡。福建省推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以“物质 + 服务”的救助方式，开展 459 项服务项目，投入 2.1 亿元资金，具有制度化、常态化的福利供给取向[7]。目前部分乡镇还存在重资金下拨、轻绩效考核的现象，亟待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动态退出机制，保证救助资源投向真正需要的群体[8]。未来应当继续推进财政可持续与服务专业化双轮驱动，既要保证帮扶体系兜底的能力，又要激发受助对象内生发展的动力，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三、实证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考察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的实践机制与运行成效。调研对象分为三类，即困难群体个体及家庭、基层执行力量、协同参与方。调研对象的选择以龙岩市新罗区、泉州市部分辖区、南平市光泽县等为典型区域样本，兼顾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山区的差异；基层执行力量包括乡镇（街道）民政办工作人员、村（居）委会干部、一线社工；协同参与方包括县级民政部门管理人员、慈善组织代表、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抽样方法上使用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式，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行政管理效能等来进行分层，在每一层内随机选取 3 到 5 个代表性的乡镇，保证样本分布有区域均衡性、政策可比性。

数据收集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定量上设计结构化的问卷，内容涉及基本信息、致贫原因、政策知晓度、服务满意度、协同治理感知等几个方面，重点加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下的资源整合、跨部门协同的测量指标。问卷实施时注意语言适应性，对老年受访者使用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进行辅助理解，设置基于致贫类型的逻辑跳转路径，提高应答的准确性。定性层面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来获得深层次的机制信息，访谈提纲围绕政策落地瓶颈、资源统筹方式和数字化工具应用效果展开，访谈对象包括乡镇民政主管、村居干部和社会组织负责人（见表 2）。

为了保证研究质量，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前期在福州市选择一个街道进行预调查，修改问卷中存在歧义或者文化不适宜的题项。调查员统一进行培训，重点提高对敏感信息处理、方言沟通技巧和伦理规范的认识。数据录入采用双人独立录入并进行逻辑校验，剔除收入与资产明显矛盾等异常值。所有调查对象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保证其个人资料不被泄露，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伦理。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交叉分析和案例比较的方法，找出各区域、不同群体和服务模式的差异，总结出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为提出改进措施奠定坚实基础。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福建省乡镇街道在困难群体帮扶管理上探索多元化的途径，初步取得了成效。B 乡以就业安置、医疗救助、监护责任落实等方式帮助精神病患者刘某等特殊群体实现社会融入；C 街道以低保、公租房、节日

表 2 实证设计研究

内容概要	详细描述
帮扶步骤	1. 摸底：精准识别各类特殊困难群体，进行需求评估。2. 建档：形成特殊困难群体基本信息及帮扶需求数据库。3. 审批：及时审批认定符合条件的对象。4. 帮扶：综合运用救助政策，确保应助尽助。5. 监测：建立数据库，完善监测预警机制，落实动态管理。
工作措施	1. 统筹部门救助资源：建立困难家庭数据库，实现统一决策和管理。2. 优化救助管理流程：下放审批权限，建立基层经办管理平台和制度。3. 加强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党建 +”模式，建立“双结对”制度。4. 健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政府部门利用数据库和大数据发布救助信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数据收集方法	1. 个人申请：困难群众通过乡镇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进行申报。2. 全面摸排：发挥村（社区）网格员的协助作用，重点走访未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围的家庭。
调查方法和工具	方法：1. 家访：户主会被问及预先设定的问题，内容涉及职权范围中确定的具体主题。2. 直线观察：团队成员在该地区走动，观察情况和当地条件。3. 主要信息提供者访谈：小组就商定的问题与知情人士进行半结构化访谈。4. 焦点小组讨论：小组就选定的主题或问题与同质群体进行开放式讨论。5. 社区小组讨论：小组与来自社区、代表不同群体、家庭状况和特征的不同人士进行讨论。工具：1. 制图：与社区中的一群人一起设计一张地图，以标明具体问题和需求。2. 时间表 / 季节日历：与社区中的一群人一起设计时间表 / 季节日历，以标明相关活动、食物的季节性或其他与营养相关的问题。
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各乡镇（街道）认真采集录入信息，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表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乡镇街道	帮扶措施	帮扶成效	存在问题	案例描述
B 乡	1. 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工作机会；2. 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3. 建立档案，落实监护职责；4. 帮助特殊就业者联系工作	1. 实现就地就业，解决生活困难；2. 营造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	信息沟通不畅，需进一步落实监护职责	刘某，孤儿，精神病患者，通过 B 乡帮助找到放羊工作
A 镇	1. 困难儿童“微心愿”征集活动；2. 寒暑假大学生志愿者陪伴服务；3. 加大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力度	1. 实现百余名困难儿童的“微心愿”；2. 提升留守儿童幸福感	政策落实不到位，需要提供更多支持和关爱	20 名困境儿童得到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关爱
C 街道	1. 为特殊困难群众办理低保和公租住房；2. 节日期间送去慰问金等帮扶物资	1. 提升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2. 为特殊困难群众送去温暖与希望	资源分配不均，需加强部门联动	张银凤一家获得低保、公租住房和节日慰问
D 区	1. 网格排查发现需要救助的对象；2. 部门联动发现外来人员中需要救助的对象	1. 动态监测外来人员情况，及时进行风险预警；2. 救助帮扶外来人员	政策落实不到位，需要加强政策落实	通过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外来人员情况，及时救助
E 镇	1. 摸清困难底数，掌握群众需求；2. 开展冬季困难群体志愿服务活动	1. 全面摸清底数，精准掌握需求；2. 保障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信息沟通不畅，需加强志愿服务	医疗志愿者定期入户为特殊群体检查身体，提供医疗指导

慰问等方式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A 镇以“微心愿”征集和大学生志愿者陪伴的方式满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情感需求；D 区以网格化、大数据动态监测外来流动人口来提高应急响应能力；E 镇以冬季入户健康检查来保证困难群体安全过冬。基层帮扶正由单一的物质救助转变为综合化、人性化的服务，既解决生存问题，又重视社会融入和心理关怀，形成了物质帮扶和精神关怀相结合的模式（见表 3）。

帮扶实践中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十分明显，中心城市厦门、莆田依靠数字化平台高效治理，而农村偏远地区的财政投入少、基础设施差，无法复制城市中心的治理模式，如罗源县的空心村适老化改造缓慢就是反例。帮扶效果受到数字化基础、政策设计精准性、基层治理能力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技术应用水平决定治理效能，厦门“一网统管”实现事件闭环处置，欠发达乡镇人工走访效率低。政策制定脱离实际需求，容易出现错配，统一农业补贴标准不考虑作物差别，就会降低政策效果。缺少动态调整机制，不能应对突发事件，疫情防控期间临时救助流程复杂，降低了应急功能。基层协同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不明，办理低保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联动成本高。提高帮扶质量要搞好数据整合，改进政策设计，重视基层队伍专业培训，做到跨层级、跨部门协同治理。

五、结语

福建省乡镇街道困难群体帮扶管理近年来成效显著，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多元参与格局初步形成。通过出台《福建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等政策，放宽低保认定标准，将特殊群体纳入常态化救助，实现了从被动申请到主动发现的转变。D 区通过网格化加月滚动摸排的方式提高对象识别的准确度，南城街道通过红黄蓝分级管理加强动态跟踪，A 镇三级干部挂钩走访和定期研判机制推动多部门资源协同，提升综合救助效能。但帮扶管理体系仍有不足。政策覆盖存在盲区，非户籍常住人口、临时遇困流动人员不能享受属地化救助，急难型救助响应机制没有标准化的流程，时效性受到影响。基层执行层面人力缺乏、专业能力欠缺，社工站人员配置无法满足高频次走访和复杂个案管理的需求。部分一线员工对于政策理解出现偏差从而造成执行走样的问题，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落后，“信息孤岛”现象导致预警与决策的科学性受到影响。社会力量的参与仅停留在浅层的捐赠上，缺少稳定的合作机制，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不能满足困难群体日益多元的需求。

为了提高帮扶管理的系统性、可持续性，需要建立精细化、协同化、制度化的治理体系。政策设计上，细化边缘困难群体认定标准，“居住证 + 困难指数”准入、“绿色通道”临时救助。加强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防止出现重复或者遗漏保障的现象。基层能力建设方面，加大政府购买社工岗位力度，每一个乡镇（街道）配备不少于 3 名专职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加快省、市、县三级数据平台一体化建设，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多元共治方面，建立政社协同平台，鼓励社会组织承接救助服务项目，推广激励机制，推动志愿服务长效化，形成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协同的现代化帮扶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 左停，古丽尼尕热·阿里木．过渡期后农村帮扶政策调整优化与拓展创新 [J]. 甘肃社会科学，2025(04): 207−218.

[2] 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促进体面劳动和就业增收 [J]. 人力资源服务，2024(12): 19.

[3] 王燊成．共同富裕背景下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制度体系、政策实践与优化建议 [J]. 财贸研究，2025, 36(05): 1−10.

[4] 陈强．从“粗放”到“精准”：高职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帮扶体系研究——基于多中心理论分析的视角 [J]. 职业技术教育，2019, 40(31): 67−72.

[5] 苗政军．脱贫攻坚中特殊困难群体帮扶问题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J]. 行政与法，2020(12): 23−30.

[6]“三措并举”抓帮扶助力乡村同振兴 [J]. 就业与保障，2023(05): 9.

[7] 徐鸿宇，孙千．“五化协同”高校困难生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探析 [J]. 教育与职业，2020(04): 103−108.

[8] 赵静波．社会服务机构嵌入困难群体帮扶的实践限度与未来理路——基于可行能力的考察 [J]. 学海，2023(06): 69−76.

（作者单位：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

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实践探索

黄嘉超

摘要：社区互助养老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支持形式之一，社区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和实践路径已经成为老年社会工作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研究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出发，对社区互助养老结构逻辑和实践特点进行了探究，并剖析了社区互助养老组织治理、专业支持和资源整合的内在困境，指出了非正式互助制度化转型存在的结构性不足，提出了协同治理、专业嵌入和激励体系建设等优化策略。研究结论是：社会工作方法的导入可以重新构建社区层面养老服务体系运作逻辑，实现互助养老由情感互惠到制度理性的转变，形成基于社会资本和专业支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老龄社会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关键词：老年社会工作；社区互助养老；组织治理；专业支持

老龄化进程加快，社区养老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点课题。传统家庭照护功能减弱，社会支持结构放松以及公共养老资源吃紧等现实状况促使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社区互助养老是建立在邻里互助和社会资本基础上的一种养老方式，其灵活性、参与性和成本低廉的特点使其成为消除家庭照护和机构养老间隙的重要方式。老年社会工作以“需求导向”和“能力赋权”作为其核心思想，强调在服务过程中的专业评估、介入和协调功能，这在社区互助养老的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社会工作视角既注重养老服务表层供给，又注重关系网络重构、组织机制完善和制度环境优化，从而实现互助养老由自发性的社会行动向结构化的社会服务转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剖析了社区互助养老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逻辑，并寻求其内在结构优化之路，旨在为社区养老体系制度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社区互助养老的特点

（一）邻里互助性

社区互助养老内在逻辑是以社会关系延续和邻里情感再生为基础，以熟人社会网络为依托，以开展互助实践为核心特征，这一特点使得个体在老化时，仍然能够依靠原有社会联系来维护生活秩序和心理稳定。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被逐渐削弱，邻里互助关系成为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熟人网络的稳定性和情感黏性使得老年人可以在熟识的情境下获得生活照料、信息交流和精神慰藉等，从而形成一个有持续性和信任基础的支持体系。

这种互助形式不是单向供给关系而是循环互惠社会交换结构，老年人作为服务接受者和支持网络构成者的参与感和价值感因此持续存在[1]。邻里互助还有一层含义是增强社会凝聚力，从微观上推动代际之间和同龄群体之间的交往，使得社区生活表现出更高的情感密度和社会整合度。在社区治理结构不断变革的背景下，邻里互助在社会工作体系中逐步融入了实践的范围，作用也由简单的生活援助向心理疏导延伸、文化参与和重构社会认同转变，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既具有安全感又具有归属感的空间，进而实现了非制度化情景下社会支持网络功能性运转。

（二）非正式组织化

社区互助养老在组织形态上表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特点，在形成过程中大多是居民自发驱动、共同需求与共享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松散、弹性的结构特征。该组织模式的优点是参与门槛低，响应速度快，内部关系更加紧密，这使得该组织能迅速形成基层社会结构协作机制以适应特定人群即时性需求。与政府主导型养老组织或者机构经营型养老组织不同，非正式互助组织的运行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机制的作用，其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协商而不是制度约束，这一去中心化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机构的适应性和创新潜能。但其松散的治理结构也造成了规范体系和责任界限模糊、服务质量没有统一标准、资源配置及决策过程容易受到个体意愿和情绪波动等问题，因而在持续运行、规模扩展等方面陷入困境。社会工作介入框架内非正式组织化互助模式要求既要保持自身灵活性，又要引进部分专业指导和制度支持来规范化转化社会资本。它的运

作逻辑可以理解为由生活共同体到功能共同体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互信逐渐外化于社会规则和责任共识，建构了一个具有自治和规范双重属性的基层养老支持网络。这一组织形态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对社会治理体系起到了补位的作用，也为探索低成本、高参与的社区养老路径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资源整合性

社区互助养老是否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整合能力，而这一过程则涉及对社区内部多维度资源的发现、调动和再分配，它由人力资源、时间资源、空间资源和情感资源等诸多因素构成。人力资源以老年群体自身和社区志愿者为中心，在互助体系下担负着照护、陪伴、协调和组织的多重作用，使得服务供给具有灵活性和内生动力。时间资源表现在居民互助时段匹配机制上，以共享时间来交换和补充服务，构成非货币化社会支持网络。空间资源则体现为社区公共场所的功能转化，如活动室、广场或闲置空间在规划与使用上被重新赋予社会照护功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的交往与休憩环境[2]。

除了显性资源之外，社会信任、文化认同及情感纽带等隐性资源也对互助网络起着润滑和维持作用，这使得资源整合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重新组合，而是社会资本的累积和转换。社会工作介入使得资源整合过程更为系统化，它从需求评估到服务协调再到资源链接都形成了专业支持，并推动了社区自我运转、互惠共享支持体系的形成。在社会结构多元化和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的背景下，社区互助养老资源整合功能必然是包容型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支点，它的意义既体现在个体照护需求的满足上，也体现在基层社会协作逻辑和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塑上。

二、社区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组织与制度不完善

社区互助养老之所以在基层社会运行中表现出典型的“结构性脆弱”，根本原因是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不完善。非正式互助初期主要靠社会情感和邻里信任来维持，当他们努力走向规模化和制度化阶段后，治理能力差距越来越明显。没有统一制度框架和标准化管理机制使得组织运作过程中容易产生责任分工不明确、决策流程不透明和服务供给效率降低等现象，尤其在资源调配和利益协调上，因缺乏稳定制度支撑和规范化约束而常常靠个人威望或者人际关系来维持，造成治理结构不确定和实施层面随意。社会工作介入虽然可以部分弥补组织功能的缺陷，但是如果缺乏制度层面的负载，专业力量介入很难产生长期效应。组织建设脆弱也表现为权责体系不对称、一些社区互助组织虽然有一定服务能力但法律主体地位缺失等问题，致使它们在申请资源时，在项目承接和资金监管环节被边缘化。这一“半制度化”状态制约着组织发展空间，同时弱化社会资本制度转化能力。在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持续走向精细化的时代背景下，社区互助养老要想实现平稳运行，就需要形成一种以制度为载体的结构性依靠，使得非正式互助能够在规范化路径上得到治理能力提升和合法化地位确立。

（二）专业性与安全性不足

社区互助养老的本质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再生产，其核心价值在于互助与共享，但这种模式在专业性和安全性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多数互助组织依赖居民自愿参与，其成员缺乏系统培训与专业知识储备，服务内容多集中于生活照料与情感陪伴，而在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心理疏导等方面，因缺乏专业评估与标准操作流程，极易产生服务风险。志愿性特征虽能促进社区参与，但在面对突发情况或特殊需求时，缺乏应急响应机制与安全监管体系，使互助行为存在潜在的风险隐患[3]。风险管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服务执行阶段，也涉及信息管理与隐私保护领域，在老年人健康状况、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的处理上，若无规范化制度与专业伦理约束，极易引发信任危机与责任争议。服务质量的不稳定性亦是突出问题，部分社区因资源有限或人员更替频繁，导致服务过程缺乏连续性与一致性，老年人体验难以保障。社会工作理论强调以需求评估、过程监督与结果评估为核心的专业介入，而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在这方面的欠缺，使其难以建立起质量控制的闭环结构。

（三）激励与持续性存在缺陷

社区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有赖于稳定的参与基础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目前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激励不足和动力衰减问题。大多数互助组织都将志愿贡献作为其核心动力，而缺乏对物质和精神的系统激励机制，这就使得参与主体在投入的漫长岁月中容易产生倦怠和失落。资源稀缺造成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一些区域互助活动主要依靠零散捐助和临时项目资金而不能形成稳定资金支持，这一不确定性降低了机构长期规划能力。激励体系单一化也限制着社区成员积极性的发挥，过分依靠情感纽带来维持的格局很难适应人口流动增强和社会关系减弱的实际情况。持续性问题也表现为组织代际传承出现断层、年轻群体参与程度低、造成互助结构陈旧、创新能力不强、活动内容倾向单调、服务形态活力不强。社会工作理论重视正向激励和资源整合，但是在大多数社区实践中此环节还处在初级阶段。

三、社区互助养老的优化对策

（一）完善组织治理

社区互助养老组织治理体系作为保障服务质量和持续运行的核心因素，在构建过程中应以多主体协同和制度化框架为基础，使得非正式互助结构从合法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得到了稳定的支持。社区层面肩

负着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等基础功能，社会组织对专业运作和项目执行具有枢纽作用，而政府从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给予外部支持，这三方面协调互动构成社区治理基本逻辑。既有互助体系下治理模式仍然是松散参与型结构，没有系统责任分工和标准化流程，造成组织运行稳定性欠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构建制度化的运行框架，让各参与方在规则体系上权责对等、程序可控。优化治理结构需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制度嵌入，即把社区互助养老纳入地方养老服务体系，并在政策指引、资金支持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形成闭合机制；二是构建协同结构，即促进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和行政部门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从而实现治理网络中资源和功能的纵向和横向联动。

（二）提升专业支撑水平

专业支撑作为社区互助养老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既涉及服务供给技术化和标准化，也需要组织能力增长、志愿力量专业化等。社区互助养老最核心的特点之一是基于人际网络的非正式支持，社会工作专业的提出使得该支持体系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科学评估和精准介入的功能。社会工作者肩负着社区内的需求识别、资源链接、风险管理和服务协调的责任，他们的干预可以使得互助服务的规范性、安全性和连续性得到实质性的改善[4]。完善培训机制是专业支撑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系统化培训既要涵盖照护技能、沟通技巧及心理辅导等基本内容，还应将老年社会政策、风险控制及法律知识等制度性内容纳入服务实践，让志愿者和组织管理者具有相关专业素养和伦理意识。志愿者队伍建设需要遵循专业分层和持续激励原则，既要在服务供给广度上得到保障，又要在核心骨干上形成专业梯队结构。

（三）构建激励与资源体系

社区互助养老要想长久地运行下去，有赖于稳定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互助服务只有激励结构合理和资源配置充足，才有持续动力，形成良性循环。激励体系建设要以多元化原则为基础，综合运用社会认同、财政支持和荣誉激励等手段，让参与主体在精神上得到社会认可，并在物质上得到适度回报。社会激励可以通过设立时间银行和积分制度来进行，从而使得互助行为产生可量化的社会价值；财政刺激措施应当建立在政府的专项资金、社区基金和社会捐赠的基础之上，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资金流入路径；在荣誉激励方面，更注重社会的认同和精神的激励，例如建立表彰机制、示范项目和公开的评优制度，以确保志愿者和组织在集体层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归属感。建立资源整合体系需要突破行政边界和部门壁垒，实现社区内、外部资源的协同运行[5]。社区内资源由人力、场地和信息网络重新配置而成，外部资源涉及社会组织、企业和公共机构等合作联动。公共服务对接对资源协同至关重要，要重视并联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资源，使得互助体系具有服务层面的复合性和延展性。

四、结论

在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社区互助养老展现出其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其价值不仅是提供照护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和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表明，社区互助养老是否可持续依赖于组织治理是否制度化、服务体系是否专业化和激励机制是否有效。非正式互助走向制度化体系时，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深入介入才能消除自发互助和公共服务的功能裂隙。社会工作视角的纳入推动了养老服务由经验性向规范化的转变，使得服务供给具有了专业评估、过程监管和伦理约束等作用，进而实现了社会价值在平稳运行中再生产。

参考文献

[1] 朱轶琳，李洪君．“共享养老”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研究——以 F 县 L 村为研究对象 [J]. 民风，2024(01): 103-105.

[2] 沈立，杨雅岚，沈承．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基于老年人社会参与视角 [J]. 老龄化研究，2025, 12(01): 7.

[3] 李子哲，王景润．城市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社会工作分析视角 [J]. 理论观察，2023(07): 87-91.

[4] 常广财，丰义栋，陈雪．养老机构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以 G 老人院颐养园社区营造实务探索为例 [J]. 社会福利，2023(11): 50-57.

[5] 王家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的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J]. 民风，2023(07): 96-98.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流动儿童歧视感知与心理健康及其心理调控机制

杜立萍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流动儿童歧视感知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阐释心理学机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流动儿童面临着教育、文化、适应性的多重挑战，其中重要挑战是流动儿童的歧视感知。本研究结果表明，面对社会歧视，流动儿童出现较多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并具有远低于非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文通过分析歧视感知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发现，受到歧视感知伤害的流动儿童，通过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等方面的积极应对，会明显缓解其歧视感知带来的心理负向影响。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其自尊心、自我效能感心理机制对抑制这一影响的中介效应，本文尝试提出多途径综合干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方案，同时也建议注重对流动儿童的社会包容性和心理救助系统的建立，从而提高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流动儿童；歧视感知；心理健康水平

一、流动儿童歧视感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概述

（一）流动儿童的现状与社会适应的困境

一般意义上的“流动儿童”是指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其父母工作迁移变化等原因被迫远离原来的家庭生活环境的低年龄人群。他们的流动相比普通城市生活的定居人群而言，面临的是更多来自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适应性需求上的矛盾，在教育、医疗保健与住宅等诸多方面的条件远不及普通的城市定居者。不仅如此，这些儿童在求学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受歧视，而且会产生孤立的心理，因此他们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流动儿童自我尊重感与归属感都比较低下，这样就更容易使其在人际交往与人情关系中面临挑战[1]。

（二）歧视知觉的来源与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流转学生所遭受的非正义性，多来源于社会歧视、社会的不公平对待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流转过程中，由于方言、穿衣习惯、日常生活习惯等因素，在校园环境中，可能会遭受同龄学生忽视甚至无意识的偏见等现象。由此，外在的非正义感会对学生的人格自我评价以及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该研究指出歧视觉察能否与流转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呈现正相关性，尤其是在流转学生出现焦虑症状和抑郁情绪的情况下较为明显[2]，缺乏社会认同感、孤独感，心理成长环境相对处于更为严峻的形势，因此心理医生认为流动学生心理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流动学生对歧视的认知，使其失去自身自信以及归属感，导致流动学生心理处于更为危急的状态。

（三）国家政策和社会支持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为解决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重点加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和心理健康保障问题等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对流动儿童保护也有进一步加强，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建立了完善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保障机制，使得他们享有同城市儿童同样的学习、医疗服务及精神抚慰。这些政府支持政策使得社会帮扶网络逐渐健全，在家庭关爱、校园心理健康、社区服务三个重要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帮扶机制可以缓解流动儿童受歧视体验，帮助流动儿童增强自信与认同，从而改善其身心状态。

二、流动儿童歧视感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一）歧视感知加剧心理压力，降低心理健康水平

从流动儿童自身的角度看，流动儿童的歧视感来源主要包括学校环境、社会氛围以及体制不平等等方面[3]。流动儿童由于语言、衣着方式、生活习性等种种差异，在学校可能会受到当地其他学生的歧视，甚至遭受侮辱甚至攻击。因为与同伴的关系起伏不定，流动儿童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好朋友关系，会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社交压力和孤独感。有些老师也许是不经意间就持有对这些孩子的偏见，认为他们在学习方面基础薄弱以及缺乏自律，因此在教学时会较少关注这些孩子，从而造成孩子学习的信心受挫，并对自己进行贬低。

从社会的角度看，流动儿童面临的普遍的来自社会的歧视使得不少人对这类孩子的刻板印象是难以在城市社区生活中适应，造成这种社会误解可能会使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时遭受不公的对待，如在公共环境中特殊对待自己，在工作方面以及交朋友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障碍，可能会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歧视对待。

受到长期高程度的歧视的孩子更易出现焦虑症、抑郁症、社交回避等一系列问题，会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的孩子表现出攻击性、厌学等行为，这无疑为其长期发展埋下了问题的种子。这种被歧视的感受将会降低其情感安全感，并质疑自我价值感，建立起对自我的负面观感方式。

（二）社会支持有缓冲作用，减少歧视的负面影响

社会保护为个人的心理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缓冲作用，获得较多的社会保护的流动儿童将更为有效地缓解歧视带来的不利影响。来自家庭、同伴和师长的关心及来自社会政策保障的社会支持是对流动儿童的社会保护。

对被迁移儿童而言，其精神健康受到家庭的巨大影响[4]。温馨友爱的父母给予孩子安全感，可以减轻儿童被歧视产生的焦虑情绪，但大多数迁移家庭由于高额的经济压力导致父母劳动时间长，不能为孩子提供充足的精神关怀，可能会让被歧视的他们无处求助，加重了心理负担。此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也影响了其精神状态，过分责备或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会导致其自我否定、脆弱无力，适当沟通和表达爱意则能造就更强大的心灵韧性。

伙伴交友有助于流动儿童融入社会，友好、稳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缓解流动儿童的恐惧和自卑，提升他们的自信，减少流动儿童受排挤的现象，通过推行助人制度、小组任务和多元文化活动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流动儿童与周边同龄儿童的交流与交往，减少社会阻碍的现象。

教师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流动儿童在校的学习体验，如果教师给予更多的激励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流动儿童的自信心会极大提升。学校要进一步加大教师的培养力度，杜绝因无意识歧视行为而导致孩子被排挤的现象；提高心理救助水平，对流动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如定期的心理课、情绪管理训练等，帮助他们提升抵抗歧视的能力。

（三）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感知到歧视可以加重流动儿童的心理负担。经常遭遇社会歧视的流动儿童具有比较严重的自我价值感缺乏情绪，相比于当地同龄的孩子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较低，从而导致他们的负面情绪影响其自我形象。如果这些孩子缺乏自信心，当他们面对困境时就会感觉无能为力，缺乏积极地寻求发展机会或进行权益保护的热情，从而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融入社会的能力。

个人对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或完成某个目标能力的信念就是自我效能。如果流动儿童感觉被人排斥或者被否定、贬低比较多，就会产生“我做不到”“我不可能”的自我信念，会使他们的自我效能降低，从而影响到他们学习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积极性及主动性。例如，面对自己学习吃力或困难时，会因为“我学不会”而选择不努力去学习；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为觉得“人家都不喜欢我”而主动选择回避。这种自卑感和无力感既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又会使他们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的应激能力和承受能力下降。

促进流动儿童自我意识和自我效能的发展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应有举措。家长可以通过表扬、鼓励、建立亲子关系等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鼓励孩子探索未知的世界和相信自己的力量；学校可以进行培养发展型思维的教育如成长思维训练班、兴趣小组、社会交往技巧训练等帮助孩子构建积极心态，增强他们对自己的认同和抵抗力；同时社区组织或一些志愿者组织可以开展一些青少年培养计划，为流动儿童提供表现才能、锻炼能力的场所，减少流动儿童由于自卑无能带来的心理问题。

三、歧视感知影响心理健康的心理机制及干预策略

（一）营造包容环境，增强社会归属感

归属感属于重要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精神心理健康水平。在缺少归属感的未成年人群体中，普遍具有大量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自卑等。而对于流动儿童而言，由于身心所处环境变动、社会关系变动与文化差异，很容易产生“异类感”，在面对学校和社会时，都以一种“外地人”的身份出现，由于语言、服饰、习惯的不同可能被本地同学嘲笑为“外地人”，或者遭到同学的打压和排挤，父母与教师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偏见，如学习不好、行为不正等，因而会对其抱有较低期望等，如此必然会引发流动儿童产生孤独情绪，进一步引发精神损伤[5]。

针对此问题，学校应该营造更为包容、友爱的校园环境，例如实行“同伴帮扶计划”，让当地学生与外来孩子成为学习、生活上的伙伴，帮助他们加深相互了解、消除孤独感。同时，开展多元文化交融活动，如传统文化推介或文化交流节日庆典等，让外来学生有机会展示其自身传统文化，增进互敬互重。相关教师密切关注学生间的社会交往行为，一旦发现可能出现的偏见言论，及时介入，避免产生校园排挤现象。

一是建立社会支持机构，让流动儿童能够得到自己所属社区的课后托管、兴趣俱乐部、心理咨询等功能机构的服务，并增强归属感。二是举办社会综合项目，和社会组织创办“社区整合项目”，鼓励学生参加社区志愿者、体育比赛和文化展览等活动，提升其社会活动参与度，帮助其在本地文化的融入中减少排斥感，防止被边缘化。

（二）加强心理支持，提高抗逆力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得到的支持程度决定了其心理健康水平，流动儿童由于长期面临的身份认同困难、社交压力与学习压力等问题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况。研究者发现对于得不到适当心理支持的儿童，他们在被拒绝或是不成功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回避行为，甚至会导致其产生社交恐惧、抑郁等，从而对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增加心理支持，促进流动儿童的情绪管理和承受能力有助于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学校应当建立专门的心理辅助机制。聘任有心理辅导经验的教师或辅导员定期举办心理健康演讲活动，帮助流动儿童学会处理压力的方法。教师可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融入积极心理学理念，如利用每周设立的“感恩日”，帮助学生培育乐观心态，建立自信。

家庭的支持对这些流动儿童也十分必要。他们的父母由于生活的压力而忽视了对孩子心灵的关注，甚至怀着“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情对待孩子的问题，从而使得孩子得不到恰当的情感抚慰[6]。因此，家长要懂得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学会如何去与孩子沟通，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烦恼。还可以通过学校与社区联合举办“家园心理救助”活动，增强父母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孩子良好的心灵“避风港”。

（三）促进公平教育，减少制度性歧视

公平的教育是消除流动儿童歧视的重要手段，但现实中有很多流动儿童仍然因为面临“户籍障碍”“学籍难题”和“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而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挫败感，甚至对自身产生负面的认知或排斥。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完善目前的基础教育政策，确保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入读”的政策，给予异地学童享受优质教育的基础保障。要增强外地学童就读便利性，简化其户籍迁移手续，给予外地学童额外的学习支持，学校开设专项的学习帮扶计划，向异地学童提供免费补课班或建立学习帮扶小组等形式，帮助异地学童在学习成绩上与当地儿童齐头并进，减轻因学业过重压力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四）倡导社会共识，提升公众接纳度

对流动儿童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某个地方社会歧视“流民”，孩子在生活中就会受到不公对待，这样的社会环境歧视会打击流动儿童的自信心，也可能形成负能量的人格，而最终延缓他们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

为了提升社会接纳程度，政府及媒体应当引领舆论，大力倡导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感，比如通过报纸杂志、纪录电影、公共服务广告等来倡导宽容和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社区可组织社会融入活动，比如跨地域的体育竞赛或者志愿服务等，以此推动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的交流，减少误解和歧视。企业也可以设计一系列为青少年提供社会经验和社会认知的项目，帮助流动儿童更快认识社会，进而增强其社会适应性并树立自信。

四、总结

本研究是为了了解流动儿童感知到的歧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歧视如何危害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并且深入研究心理机制。研究表明，由于文化的差异、社会不适应和教育上的不平等，许多流动儿童常受到同学、教师的排斥或者社会的歧视，所以他们会有更大的心理负担，比如焦虑、忧郁、自卑；社会救助机构、家人的关心，以及自尊和自效能感的增强，都可以有效削弱歧视对流动儿童心理的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更加关注流动儿童的需求，推行更加公平的教育方式，努力给予他们有效的精神支持和治疗，从而可以让这些孩子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及生存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龙小红 . 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对策研究 [D]. 济南 : 济南大学 , 2022.

[2] 万增奎 .20 年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J]. 心理研究 , 2020, 13(06): 544−550.

[3] 万增奎 .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 META 分析 [J]. 生活教育 , 2020(10): 104−109.

[4] 韩毅初 , 温恒福 , 程淑华 , 等 .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J]. 心理学报 , 2020, 52(11): 1313−1326.

[5] 周向华 , 杨青松 . 我国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研究述评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 2013, 23(34): 104−107.

[6] 赖寒 . 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威胁探讨 [J]. 法制与社会 , 2010(14): 160−161, 183.

（作者单位：兰州市第八中学）

基于智能技术的留守老人居住环境改造设计构想

吕　倩

摘要：随着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与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且留守老人数量逐步增多，而当前留守老人的居住空间环境未随老龄化需求作出调整，针对这一群体的生活配套设施也明显不够完善。智能技术面向留守老人群体应用时，更侧重便利性、安全性与交互性的落地实现，为这一群体日常活动开展及精神生活丰富提供多方面支持。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智能技术在留守老人居住环境改造设计中的具体作用，进一步提出具备可实施性的设计构想，助力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切实提升。

关键词：智能技术；留守老人；居住环境；设计构想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留守老人数量也随之持续增多。这些老人大多居住在老旧房屋内，此类房屋在建筑结构、设施配备等方面存在楼梯陡峭、地面湿滑、照明不足等诸多不适老问题，既给老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也难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1]。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留守老人居住环境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契机，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实现对居住环境的实时监测与智能控制，为这一群体营造更安全、便捷且舒适的居住空间，进而推动养老产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技术应用路径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2]。本研究分析智能技术在留守老人居住环境改造中的应用，为打造更加智能、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提供创新思路，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发展。

一、留守老人现状

留守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导致身体功能逐渐下降。其视力、听力减退，可影响老人的物品识别能力，降低声音感知能力，加大意外发生风险；留守老人平衡能力、行走能力下降后易摔倒，故需进行无障碍设计、建立安全防护设施；关节、骨骼功能的逐步退化，可增加老人的弯腰、起身困难程度，需为老人配备合适的家具、扶手；留守老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可增加疾病侵袭率，故需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卫生，设置便利的医疗设施。留守老人长期与子女分离，缺失亲情陪伴，导致情感需求增加、精神世界空虚，日常生活中多通过看电视、听广播等单一方式打发时间，与他人的交流较少。有一部分留守老人，对未来存在担忧与焦虑，担心自己生病后无人照顾，牵挂子女的工作与生活，存在较重的心理负担；且留守老人的获取信息渠道较为单一、社交圈子小，日常生活中易产生失落感、自卑情绪，难以接受新事物，心理特征较为脆弱[3]。

随着留守老人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与心理负担的逐渐加重，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逐渐增加，设计居住空间时，要根据老人的身体体征设置防滑地面、扶手、无障碍通道，保证老人活动安全不受限制；设计室内布局时，要合理摆放家具，避免其影响老人活动，方便老人行走、转身[4]。为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需营造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加强留守老人与外界的交流，可以设置社区活动中心、邻里交流空间，为老人与他人的沟通、互动提供场所，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可通过语音通话、视频通话等工具帮助老人与子女沟通，加强双方的情感交流。

二、智能技术在居住环境改造中的应用分析

（一）智能技术概述

物联网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交互网络，可根据多种信息传感器将留守老人家中的电器、门窗、健康监测设备连接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换与通信。智能门锁集成指纹、密码及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精准完成用户身份验证后自动开启，同时向老人子女手机传送开锁记录，确保子女能随时了解老人出入状况。而智能摄像头则全天候监控家居环境，一旦检测到异常活动，立即向老人及其紧急联系人发送警报，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老人居住空间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借力物联网技术，居住环境内的多元设备得以实时捕获并传递数据信息，这些翔实数据为深度剖析与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切实增强了老人居住空间的安全性、便

利性及智能化程度。

人工智能技术依托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学习，可实现智能决策及自动化控制，为老人提供更具个性化与智能化的服务；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对智能健康监测设备采集的老人生命体征数据展开分析，能够及时识别异常情况并触发预警[5]。在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设备间的智能联动，为老人提供贴合实际需求的服务，进而提升其生活的便利性与舒适度。与此同时，该技术还可应用于智能语音交互领域，老人借助语音指令便能与各类智能设备完成交互，这一设计思路显著降低了老人操作智能设备的实际难度。

在老人居住场景中，传感器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老人生命体征监测、居住环境参数采集等领域，通过精准捕捉并传递这类关键信息，为后续智能系统开展数据分析、实现功能运行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进而保障系统服务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这类可穿戴设备内置多类传感器，能实时捕捉老人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及睡眠质量等生命体征数据，再依托蓝牙等无线通信技术将数据传输至手机 App 或家庭智能终端，便于家人与医护人员随时查看并掌握老人健康状况，若监测到数据异常，设备会即刻发出警报提示相关人员采取干预措施，为老人健康安全提供保障[6]。依托传感器技术，可对老人居住环境的各类信息开展全面且实时的感知工作，这种对环境信息的精准捕捉为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筑牢数据基础，使智能系统能够依据实际场景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最终为老人构建起更具安全性与舒适性的居住环境。

（二）应用效果评估

1. 提升生活便利性

智能技术在提升留守老人生活便利性方面成效显著，像智能照明、智能温控、智能窗帘这类设备，老人无须手动操作，仅凭语音指令或通过智能终端远程操控就能实现设备调节，这种操作模式大幅简化了老人日常生活中的设备操控流程，也切实降低了其日常活动中的操作负担[7]。智能家电控制功能支持老人轻松操控各类家电，比如智能洗衣机能依据衣物材质自动选定洗涤模式，智能电饭煲可提前设定煮饭时间，老人只需提前备好食材，便能按时享用可口饭菜，这种设计规避了因操作遗忘或操作不便引发的困扰，让老人的日常生活更显轻松自在。

2. 增强安全性与健康保障

智能手环、智能床垫在实践场景中，可及时捕捉老人生命体征数据，及时识别异常生命体征，帮助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管理；智能门禁、烟雾报警器及紧急呼叫按钮等智能安防系统，可保证留守老人处于安全的居住环境中；老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使用紧急按钮发出求救信号，使救援响应时间缩短，保证老人的生命安全。

3. 改善心理状态与社交互动

智能社交应用以视频通话、语音交流等便捷功能为依托，为老年人搭建与亲友即时沟通的桥梁，使其可随时分享生活琐事、倾诉情感，有效缓解孤独与思念；社区借助该应用广泛传播并有序组织线上线下活动，激发老人参与积极性，促进老人间深度交流、拓展社交范围；智能娱乐设备则凭借丰富多元的娱乐资源，精准满足老人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的日常增添乐趣，进而显著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与整体生活品质。

三、基于智能技术的留守老人居住环境改造设计策略

（一）设计原则

1. 安全性原则

在智能技术支撑下，通过布设各类智能安防设备可实现对居住环境安全状况的实时监测，同时搭配居住空间安全设计：地面采用防滑材料并铺设防滑地毯以规避老人滑倒风险，楼梯与走廊等区域安装符合人体工程学高度及间距标准的稳固扶手，方便老人抓握来辅助行走和维持身体平衡，消除门槛与台阶等障碍确保老人行动顺畅以降低跌倒发生风险，还对电气线路开展全面检查与更新、保障线路安全以规避线路老化引发的火灾隐患[8]。

2. 舒适性原则

智能空调与智能新风系统构建起精密联动机制，智能空调凭借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室内温湿度波动，智能新风系统则同步监测空气质量指标，二者结合老人身体耐受度与舒适需求，自动调节运行模式；新风系统持续引入过滤后的清新空气、排出浊气，保障室内空气品质。室内装修设计遵循人体工程学与色彩心理学，采用柔和暖色调渲染温馨氛围，家具选材注重环保无害与触感柔软，从环境感知与空间体验层面全方位提升老年人居住的舒适度与健康性。

3. 易操作性原则

以老人使用便利性为核心设计智能设备的操作界面，需具有易懂性，操作界面使用大字体，设置高对比度，保证老人可清晰地识别出屏幕内容，优化操作按钮，使其保持简洁性、布局合理性，简化设备的操作步骤，便于老人操作。老人与智能设备交互时，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具有重要作用，在设置语音控制系统时，需具有较高的识别准确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准确识别老人的指令，精准回应；在设计智能设备过程中，应考虑到老人容易出现操作失误，设置错误提示，设备在老人发生操作失误时进行提醒，并引导老人正确操作。

（二）空间布局优化策略

1. 室内空间改造

合理划分室内功能区域，保持动静分离，卧室为休息区域需保持安静；客厅、餐厅为活动区域，需保持简洁、宽敞、开放。客厅中摆放家具时应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拥挤，便于老人日常活动。家中常

用的沙发、茶几等家具，需与老人的身体体征保持相同的高度、尺寸，便于老人日常活动、起坐；设计卧室时，需保持私密性、舒适性，选择与老人相匹配的床具高度，并在床面预留足够的位置，放置助行器，设置方便老人取放衣物的衣柜深度与高度；根据老人的身高调整厨房操作台，保持老人站立时手肘呈微屈状态，距离台面 75~85 厘米，保证老人操作的便利性[9]。

2. 无障碍设计

在房屋入口处，设置宽度大于 1.2 米、坡度为 1∶12 的轮椅坡道，坡道采用防滑材料，并在坡道两侧安装 0.85~0.9 米的扶手，方便老人进出房屋；室内走廊宽度应大于 1.2 米，保持地面干净、整洁、平整，并消除门槛与地面的高差，使老人可自由通行。在楼梯两侧安装高 0.85~0.9 米的扶手，并与墙面空出 4~5 厘米距离，方便老人抓握，楼梯台阶宽度应超过 30 厘米，高度应低于 15 厘米，在表面涂抹防滑材料。在卫生间、浴室、卧室中容易跌倒处安装扶手，为老人的日常活动提供支撑，增强安全性。

（三）智能设备配置策略

1. 健康监测设备

针对留守老人健康监测需求，可选取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床垫、智能血压计及智能血糖仪等适配设备，其中智能手环与智能手表须具备实时监测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步数及睡眠质量等生理指标的功能，且数据须保障准确可靠，并能同步至手机 App 或家庭智能终端；智能血压计与智能血糖仪则应简化操作流程，老人依提示操作即可完成血压、血糖测量，测量数据可自动上传至健康管理平台，便于家人及医护人员随时查看并开展数据分析[10]。配置健康监测设备时，需结合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选取，对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应侧重配置适配监测设备，如为高血压老人配备智能血压计、为糖尿病老人配备智能血糖仪。针对睡眠质量较差的老人，则可配置智能床垫以辅助改善其睡眠质量。

2. 安防设备

安装监控设备时要选择具备 360 度旋转功能的摄像头，放置在入户门、卧室、客厅，全方位监控房屋的周边环境与室内，避免出现监控盲区；选择高灵敏度、低误报率的烟雾报警器，安装于客厅、厨房，安装时要与天花板保持 0.3~0.5 米距离；在厨房靠近燃气设备的位置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监测到燃气泄漏时即可发出高分贝警报声，提示老人离开，并自动关闭阀门；在门窗边缘安装门窗传感器，在门窗异常开启后，及时向老人、相关人员推送报警信息；在老人卧室、客厅、卫生间等显眼位置安装醒目的紧急呼叫按钮，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后使用按钮通知家人，或向急救中心发送求救信号。

3. 环境控制设备

留守老人居住环境中使用的智能空调，应具备智能控温、自清洁、低噪声等特性，根据老人的需求自动调节温度，保持舒适的室内环境；使用全热交换式的智能新风系统，引入室外新鲜空气时将室内热量排出，提升室内空气质量；采用高能效的空气净化器，去除室内甲醛、细菌、病毒等污染物，保持老人居住环境洁净。为留守老人配置相关设备时要依据房屋的面积、朝向、需求，选择合适的环境控制设备。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分析了留守老人的居住环境改造设计要求，坚持改造原则为安全性、舒适性、易操作性，从空间布局优化、智能设备选型配置层面构建具体的环境设计策略，实现对留守老人居住环境的改造。现有多种研究分析了智能技术的使用现状与应用成果，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涌现出较多新兴智能技术，在后续研究中，可持续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情况，积极探索改造留守老人居住环境的新方式，为其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邹杰 . 农村留守老人居住形态与适宜性环境设计策略构建 [J]. 设计 , 2021, 34(19): 110−112.

[2] 吴珊 .AI 智能技术在空巢老人厨房环境设计中的实践路径 [J]. 美与时代 (上旬刊), 2020(06): 86−88.

[3] 徐家鹏 , 张一珠 , 李鸟鸟 .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 : 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5(04): 85−93.

[4] 张巧莲 , 李燕婷 , 岳敬艳 , 等 .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及护理服务需求 [J]. 临床护理进展 , 2024, 3(08): 23−28.

[5] 刘安琪 , 王诗语 . 人工智能背景下老年智能家居设计研究 [J]. 艺术科技 , 2024, 37(02): 130−132.

[6] 郝波 , 于佳璐 , 胡函语 , 等 . 基于人工智能的养老安全系统的搭建研究 [J]. 科技资讯 , 2025, 23(05): 249−252.

[7] 马秋环 , 刘娜 .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互联网家居控制系统研究 [J]. 数字技术与应用 , 2019, 37(01): 17−18.

[8] 武惠斌 . 人工智能在山西乡村空间规划与改造中的应用 [J]. 数字通信世界 , 2025(01): 154−156.

[9] 张瑛 . 人工智能在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中的个性化服务设计 [J]. 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 , 2024, 8(09): 250−253.

[10] 方洁 , 徐小红 . 智能家居在现代居住环境中的创新与应用研究 [J]. 艺术科技 , 2024, 37(24): 116−118.

（作者系山东华宇工学院副教授）

关于老年身心健康的“医教养”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邹海镕 陈垣烨 韦瀚岚 洪紫静 *

摘要：在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双重背景下，老年健康陪护需求激增与相关人才匮乏的矛盾明显。本文从老年学、教育学与护理学交叉视角，结合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两种方法，依托小学教育专业转型实践，探究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干预机制，剖析“一老一小”照护服务的学科壁垒并构建融合型课程体系，旨在构建适配老年身心健康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发现，传统单一的专业人才无法满足老年健康防控的复杂需求，而以代际沟通、健康风险识别等核心素养的“医教养”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能有效弥补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短板。研究表明，“老幼融合”是老年健康非药物防控的有效途径，培养此类人才可提升社区老年健康管理质量，为健康老龄化筑牢人才支撑。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身心健康需求；老幼融合；“医教养”融合型人才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1. 国家政策支持老幼融合服务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小”的人口发展成为我国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难题。与此同时，国家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但“少子化”现象仍使得儿童数量增长缓慢，传统家庭养老育幼能力逐渐减弱。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一老一小”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每个家庭中的老年人会协助年轻人抚育小孩，这也让老年人面临高发的健康问题和共病风险。正如《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的要求，以及“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理念，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提升养老托育服务质量已刻不容缓。

2. 代际互动对阿尔茨海默病 / 认知障碍预防具有积极作用

相互包容和接受是社会关系的标志，代际互动的不断深化，有助于提高儿童对老年认知障碍的包容度，改变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对老年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等形成的刻板印象 [1]。与此同时，代际支持可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我国不断促进“代际共融”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断提高具有长期健康困扰、认知障碍等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提升其生活质量。

“老幼融合”模式并非简单的照料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干预疗法”。值得关注的是，老年阶段健康防控并非单纯依赖临床治疗，“生活方式干预”与“心理干预”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这正是培养“医教养”融合型人才的主要发力点。在代际融合的社会服务形式下，IGP（代际共融项目）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干预策略，对于缓解老年人孤独感、延缓认知衰退、促进不同年龄群体间的理解与互助具有非常大的益处 [2]。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文旨在打破传统儿童教育学、老年护理学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学科壁垒，深入探索“老幼融合”与“医育结合”这两个新兴交叉领域的人才培养理论。该研究将拓展小学教育专业的内涵与外延，培养“医教养”融合型专业人才，为构建面向积极老龄化社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提供新的思路，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

2. 实践意义

面对“一老一小”融合服务领域复合型人才短缺的痛点，本研究旨在培养一批兼具“教育 + 心理学 + 老年护理学”底蕴与代际服务技能的专门型人才，此举不仅是提升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与职业竞争力，更是促进其在新时代下进行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并能够为社区、养老机构、老年护理与康复中心等机构输送“医教养”融合型人才，进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构建老年人多元化发展的支持体系、

保障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

二、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是相应的养老护理人员懂护理相关的专业知识，但缺乏精神慰藉和认知训练的教育技能。另一方面，现有小教人才在老年人健康风险识别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失。老年人普遍存在各类健康问题，而相关从业人员不懂得在代际活动中依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及行为表现，精准识别跌倒高风险人群，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在老年人认知障碍方面，也不懂得借助益智游戏等活动，对老年人进行科学的认知功能训练，以延缓认知障碍的发展。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生理病理特点，现有小教人才并未形成相关的认知体系及应对能力培养的机制。这导致培养体系与当今时代的“老幼融合”需求存在一定的错位。

此外，在国家政策与社会需求的共同驱动下，社区老幼融合中心、代际学习乐园等新型服务机构开始萌生。相关理论表明，现阶段我国既需要开发完善的“老幼融合服务”课程体系，又缺乏既懂教育又能进行老年健康“护理 + 托育”的复合型人才，即新型“医教养”融合型的专业人才。这类人才其核心能力超越了传统单一专业的范畴，要求从业者能够做到：第一，深刻理解 0~12 岁儿童及 60 岁以上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社会发展的特点与差异性需求；第二，具备设计与组织实施能有效促进代际互动与情感联结的专业性活动的能力；第三，掌握基础的安全照护常识并拥有出色的跨代际沟通共情能力；第四，善于整合利用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资源，并能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化、高效化的利用。

三、问题与挑战

（一）代际互动健康干预人才的缺失

在当前“一老一小”背景下，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存在跨学科课程体系严重缺失的问题。当前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与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多局限于本专业范畴，呈现“精而专”的发展特点，缺乏跨学科的知识渗透与能力培养。护理专业课程以医学护理知识与技能为核心，重点培养学生的老年人身体护理、疾病预防等能力；小学教育专业则聚焦儿童教育理论、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心理学等内容，两者缺乏有效的知识融合与实践衔接。

小学教育的学生对于老年高血压与糖尿病等常见疾病的发病原理、症状表现及诊断方法了解甚少，缺乏系统的医学知识框架，难以准确识别老年人长期健康问题的早期症状，也无法满足老年人的营养指导与运动干预需求。而“一老一小”社区融养照料服务是涉及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复杂场景，迫切需要融合护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现有的课程体系的局限性导致学生难以适应未来老幼融合服务的工作需求。

（二）教育理念与方法的转变困难

小学教育的学生长期接受儿童教育理念与方法培养，已形成固定的教学思维模式，习惯以儿童的认知特点和学习方式为导向进行教学活动。而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认知方式与儿童存在显著差异。且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对老年认知障碍患者的生活环境、就医场景等服务场景较为陌生，导致其难以有效开展老年人健康普及、实践活动组织等工作，也无法与老年人进行高效的沟通交流，最终影响服务质量与效果。

四、对策与路径

（一）构建“医教养”融合型培养模式，培养具有慢病管理意识的复合型服务人才

为培养适配“银发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助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需打破传统教育、护理、老年学专业之间的壁垒，明确“医教养”融合型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求，构建完善科学的培养模式。

1. 代际发展规律协同沟通能力

在代际项目中，老年人和幼儿在有计划、有意义的互动中建立互惠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就要求学生跳出将老年群体与幼儿群体分阶段看待的惯性思维，去建立两者发展规律的关联性认知。这要求教育类的学生能够采用“小组式”互动与“结伴式”互动形式，协助老年人与幼儿建立亲密关系，精准理解并回应两者的表达与需求。从“一老一小”的互动细节中预判潜在需求，实现“老人被需要”与“儿童获成长”的双向共赢，进而促进老年人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3]。

2.“医教养”课程实施中的健康风险识别能力

在代际项目或相关活动的相关工作中，学生首先需扎实掌握老年阶段的健康特点，并需要在活动开始前期向老年人的家庭层面了解其相应的健康情况，为老年健康风险识别打下一定的基础。其次，在活动开展中密切关注所产生的不良情绪，及时通过多元化方式帮助其调节心理状态。最后，活动结束后需及时反馈给其家庭亲属、护理人员或相关机构社会工作者，联动多方力量构建老年健康风险防控体系。

3. 情绪价值疗愈能力

情绪价值疗愈能力要求学生通过积极的情感互助、心理支持和个性化关怀，对老年群体在服用相应药物后产生的各种情绪问题进行有效缓解，增强其心理韧性。老年人常见的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悲观、情绪不稳定、睡眠紊乱等。因此，学生需基于医养融合理念，努力成为专业代际疗愈师，熟练掌握起效快、疗程短的叙事疗法，切实改善老年情绪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减轻照顾者的情绪负担[4]。

（二）优化课程模块

1. 数智赋能——智慧养老与健康数据管理能力培养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 +”带来的网络互通、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对满足老年健康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课程需重点培养学生运用“互联网 +”辅助慢性病防控的能力，以此提升对老年人健康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智慧养老设备使用与指导上，需教授学生各类智慧养老设备的使用方法，使其能够根据这些仪器的数值来判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智慧养老平台与远程医疗服务运用中，要求学生熟悉各类养老平台的功能与操作流程，为老年群体提供持续的动态监测服务。

2. 全生命周期营养与慢病膳食管理课程模块

该课程模块需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全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营养特点，从婴幼儿期到老年期，系统掌握不同年龄段对营养素的需求变化。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模块需重点涵盖低糖、高纤维食物的选择方法，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合理分配比例，以此帮助老年人控制血糖水平；同时，着重讲解低盐饮食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重要性，以及通过饮食调节血压的具体方法，如增加钾、镁等元素的摄入。在慢性病膳食管理方面，需培养学生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膳食规划的能力，帮助老年人建立科学的饮食控制意识，从源头上规范饮食行为。

课程设计应包含三个核心环节：一是知识储备，重点开展食品卫生、营养与健康等相关知识训练；二是实践操作，组织学生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身体素质的老年人群进行调研，了解其饮食习惯并设计个性化营养食谱；三是技术赋能，在教学中引入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增强学生学习的互动性与趣味性，帮助其构建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5]。

3.“老年心理护理与认知干预技术”课程模块

该模块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老年心理护理专业能力，重点聚焦老年抑郁、焦虑的识别与干预，以及对认知症的早期干预和怀旧疗法的运用，通过非药物疗法实现老年人心理护理与认知干预目标。

学生需深入学习积极心理学知识，系统掌握常见老年心理问题的成因、表现与发展规律。针对老年抑郁和焦虑等精神障碍，需学会通过观察老年人的情绪、行为、言语等细微变化，准确识别心理问题的早期症状。同时，需运用教育专业化知识，借助艺术疗法、音乐疗法等非语言媒介，组织绘画、写作、音乐演奏等活动，引导老年群体表达自我，有效减轻焦虑、抑郁情绪，改善老年慢性病引发的负性心理状态。此外，学生需熟练掌握怀旧疗法，通过引导老年人回忆快乐过往，唤起积极情绪，增强其生命意义感。通过上述技术的系统学习，助力学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老年人积极面对疾病、改善不良心理状态，最终提高其生存质量[6]。

五、总结与展望

在“一老一小”的国家战略视野下，小学教育专业的转型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衔接的“必答题”。本文提出的“医教养”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核心在于打通专业壁垒，通过课程重构与实践创新，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赋予核心竞争力。

“医教养”融合型人才能够有效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作为社区健康服务的前沿力量，他们可解决许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减少老年人不必要的就医频次，推动医疗资源实现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同时，他们可搭建社区与医疗系统之间的沟通桥梁，将“医教养”理念融入老年日常生活中，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为健康老龄化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需进一步推动“医教养”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与数智化养老平台深度结合，让学生能借助数智化手段实现老年健康线上线下精准防控，及时发现潜在健康风险。总体而言，构建“医教养”融合型培养模式、培育专业人才，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姚俊，张文静，王浩，等．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22(01): 40−46.

[2] 陈茜，万霞，杨承桢，等．代际共融项目在认知障碍老年人中应用的范围综述 [J]. 护理研究，2025, 39(22): 3853−3860.

[3] 王海玉，王彦蓉．老幼结伴式代际互动对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J]. 社会建设，2022, 9(04): 45−59,71.

[4] 孟繁强，严子君，贺美玲，等．跨诊断小组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情绪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和照顾者负担的影响 [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22, 43(09): 834−838.

[5] 余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营养与膳食”课程教改探索 [J]. 食品工业，2025, 46(05): 255−258.

[6] 王守娜，黄丽萍．个体怀旧疗法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影响 [J]. 心理月刊，2023, 18(22): 164−166.

（作者：邹海镕、陈垣烨、韦瀚岚，广州华商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洪紫静，广州华商学院助教）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老年临终关怀中的角色探究

王钦正 石 震*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从中度向重度阶段加速演进的形势，以及临终关怀服务体系不完善、死亡质量指数偏低的现实要求加快推进临终关怀跨学科团队建设，既要增加安宁服务供给，又要提升服务质量，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在多学科协作过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充当的角色至关重要，只有厘清这一角色的丰富内涵才能充分发挥其自身价值。本研究以是否直接面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为标准，将医务社会工作者在老年临终关怀团队中的角色分为直接服务角色、间接服务角色与合并服务角色三大类，并分别进行探究，以期为医务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优化临终关怀服务效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为助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者；临终关怀；角色

一、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并呈现加速态势，对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提出迫切要求。2015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 亿人，预计 2020 年、2030 年分别为 2.5 亿人、3.6 亿人，占比从 15.8%提高到 17.5%、25% [1]；2020 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人，占比 18.7%，老龄化形势较此前预测更为严峻。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临终关怀领域专家施永兴指出，中度老龄化阶段的核心特征是高龄化与失能化叠加，我国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已突破 15%，且这一比例仍在快速提升，而高龄群体的临终周期普遍更长、照护需求更复杂。我国临终者有 72.3% 承受中度及以上疼痛，且近半数存在严重心理困扰，进一步凸显了临终关怀服务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至 79.0 岁、医疗水平提升和生活条件改善，老年期显著延长，但人终将走向死亡的生物规律并未改变，老年群体的临终关怀需求随老龄化加深而不断凸显。临终关怀在国内又称安宁疗护、善终服务、舒缓治疗等，是指对生命时间有限（6 个月之内）的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医疗及照料，为其生理、心理、精神及家属等各方面提供全面照护与护理，以使临终老年患者的生命获得尊重，生命质量得以提升，家属身心健康得以维护的专业化服务 [2]。自 1967 年桑德斯博士于伦敦郊区首创“宁养院”至今，临终关怀在西方国家已形成完整服务体系；美国近年来临终关怀研究聚焦跨专业团队协同，强调社工在生命质量提升中的核心中介作用。我国于 1988 年以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为起点，尤其是 2016 年“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和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临终关怀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成立，临终关怀在学术研究与实务体系建设上获得长足发展。2017 年以来，国家开展 3 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覆盖 185 个市（区）。《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首次将医务社会工作者纳入核心服务团队，标志着安宁疗护从单一医疗救治向多维关怀转型。医务社会工作者是提升临终关怀服务质量的关键一环，其角色功能的充分发挥直接决定着服务质量与体系效能。学界对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多学科团队中的角色认知仍较模糊，未能充分体现服务互动的复杂性与角色的多重性，因此厘清其角色集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对社会工作者在老年临终关怀中扮演角色的研究较少，对患者、照顾者和医护人员的心理研究文献较多 [3]，特别是灵性和死亡态度的研究、组织管理、沟通、临终关怀方法对生命质量的影响等研究内容成为热点。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中的角色呈现“三维演进”特征：从早期的“心理支持者”向中期的“团队协调者”再到“系统整合者”转变，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角色适配性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跨专业协作中的社工角色，Lan 等学者基于上海 1174 名医护社工的实证研究发现，社工在人际支持与信息协调中的介入，可使临终关怀服务质量评估得分提升 17.8%，这一研究为角色效能验证提供了量化依据。但相关研究仍缺乏对东方死亡文化背景的

考量，对角色的细分与本土化适配性探讨不足。

国内相关研究也不足，侧重于本土化路径分析、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伦理思考、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等方面的研究。相关度较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覃柳蓉认为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实践过程中因理想角色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角色能动性不足，进而产生角色困境；程明明通过深度访谈对16位美国临终关怀机构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角色研究，以期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临终关怀服务有所启示；黄晶认为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中扮演着心理支持者、灵性辅导者、个案管理者以及团队协调者四种角色。向艳从介入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对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这一跨专业团队中所扮演的六种角色进行了探讨。只是，以上学者对临终关怀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角色的分类比较粗略，不能体现社会工作者与跨专业团队成员、临终者及其亲友、周边环境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对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综合性、多样性以及承担角色的多重性讨论不够。基于社会工作者的直接、间接、综合三种服务类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可以分为直接服务角色、间接服务角色和综合服务角色，医务社会工作者自然也不例外。

三、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的角色

（一）直接服务角色

直接服务角色是医务社会工作者直接向临终关怀服务对象提供生理、心理、精神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服务和帮助时所扮演的角色。

1. 服务提供者

老年临终者面临身体机能严重衰退与多重健康问题的叠加困境，高龄老人多患有慢性病，身体抵抗力弱，同时承受拖累家庭、绝望、孤独、恐惧等负向情绪困扰，生命质量低下。施永兴等学者的临床调研显示，我国老年临终者最核心的三大需求为疼痛控制、心理疏导与家庭支持，这就为安宁疗护服务提供了明确方向。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服务需覆盖生理舒适维护、心理情绪疏导、社会支持构建等多个维度。在生理层面，可通过仪器控制室内温度、湿度、亮度，营造安静适宜的环境以帮助减缓痛苦，配合医护人员落实疼痛管理方案，这与《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版）》提出的“舒适优先”原则相一致；在心理层面，运用专业技巧疏导负面情绪，借助“五道人生”工具（道谢、道歉、道爱、道别、道祝福。该工具经国内学者本土化修订后，在哀伤辅导中有效率达67.8%），引导患者与家属表达真实情感，弥补内心遗憾；在社会支持层面，提供医疗政策信息、物质帮助等实务服务，协助解决现实困难。

2. 治疗者

这里的治疗不是为了延长临终者生存时间的过度医疗，而是为了提高临终老人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维护生命尊严，让临终者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临终老年人因活动范围大大收窄，运动量严重不足，再加上纤维食物的摄入困难，其中不乏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很可能出现便秘、褥疮、疼痛、意识不清甚至是完全昏迷等生存困境，医务社会工作者凭借自身的医学知识基础，在医生的指导下，与护士、养老护理员、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照顾者协作，共同为临终老人提供治疗服务。医务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怀旧的方式，帮助临终者回顾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来缓解自责和焦虑，调整心态，重新找回快乐、尊严和荣耀，感受生命的尊严与价值[4]。

3. 支持者

医务社会工作者需以客观立场支持临终老人作出积极改变，鼓励其通过真诚沟通诉说内心感受，采取可行措施弥补生命遗憾，如与关系紧张的他人和解、完成未了心愿等。针对老人无法接受与亲人分离等问题，通过生命回顾技巧引导其回忆与亲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引导老年人在自省中领悟生命意义，减少遗憾与对后辈的担忧。

4. 使能者

我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有着死亡禁忌的文化传统，乐生恶死是民众普遍心态，临终老人及其家属大多对死亡存在恐惧与回避心理。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赋能角色在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认知赋能，通过死亡教育帮助服务对象正确认识死亡，脱离死亡禁忌的束缚，树立理性的生死观，减轻心理上的恐惧与无助；二是行动赋能，引导身体条件允许的临终老人主动规划“身后事”，协助其梳理遗愿并推动实现，让老人在自主决策中获得掌控感，缓解其焦虑从而坦然接受生命即将终结的事实。

5. 关系协调者

临终老人可能因与亲属、医疗机构的关系冲突而陷入困扰，以至于妨碍临终期的安宁。医务社会工作者需主动介入协调：在家庭内部，通过家庭会议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妥善处理彼此对临终救治、安宁疗护的意见分歧，确保提供的医疗服务可以满足临终者需求并获得知情同意。

（二）间接服务角色

间接服务角色是医务社会工作者借助其他程序为临终老人及家属提供服务的角色，是为直接服务创造有利条件的，而非直接向案主提供服务。

1. 行政管理者

临终关怀服务由跨专业团队提供，医务社会工作者需担负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与管理职责。通过制定服务计划，明确成员分工，召开沟通会议，协调进度，解决冲突，建立服务质量评估机制等，对服务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团队高效运行和安宁疗护有序开展，提升服务满意度。

2. 资源链接者

资源不足是制约临终关怀服务可及性的一项重要因素。医务社会工作者需构建多元资源链接网络：对

接政府相关部门，协助申请医保报销、长期护理保险、社会救助、喘息服务等政策资源；联动社区、社会组织，争取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链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等专业资源，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一体化的照护网络，为老年临终者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提供全方位资源支持。

3. 政策影响者

我国临终关怀相关政策存在覆盖不全面、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成为制约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医务社会工作者凭借在一线的丰富实务经验，可从三方面发挥政策影响作用：一是总结实践中的政策痛点，如安宁疗护医保报销范围窄、基层服务机构准入标准不明确等，向相关部门提出针对性建议；二是参与地方标准制定，如北京市将医务社工纳入安宁疗护核心团队的规范完善过程，体现社工专业的政策价值；三是推动政策落地效果评估，反馈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实证依据。

4. 研究者

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研究者角色贯穿实务全过程，对推动临终关怀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施永兴强调，社工的研究角色应体现“实务导向”，聚焦实践中的真问题，避免纯理论思辨。在实践层面，需系统记录服务过程，运用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总结成功的服务模式与干预技巧，如家庭会议组织方法、哀伤辅导路径等，形成可复制的实务指南；在理论层面，需结合本土文化语境，探索适合我国社会的临终关怀社工服务理论框架，破解文化禁忌与专业服务的适配难题，回应王思斌提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构建”命题；在行业层面，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角色效能，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引入生命质量量表等工具开展效果评估，为社工专业在临终关怀领域的定位与发展提供支撑。

5. 倡导者

社会大众对安宁疗护服务的误解是制约该事业发展的又一障碍，一些人错误地将临终关怀等同于“等死”，视为“不孝”。医务社会工作者需主动担负起生死教育方面的宣教职责，依托多元渠道开展宣传[5]，让大众明白“临终关怀可以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善终为五福之一”的理念，推动“全生命周期健康”理念的普及，通过倡导“优生优逝”的社会理念，推动将生死教育纳入生命教育全过程，以及推广安宁疗护相关理念，让安宁善终成为社会风尚，为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社会环境。

（三）合并服务角色

合并角色是融合多种功能的综合性角色，核心特征是服务的跨界性与协同性，是医务社会工作者需要同多方打交道时扮演的角色。该角色涵盖三重协调维度：一是服务对象内部协调，即协调临终老人与家属之间的关系，促进情感沟通，达成决策共识；二是跨专业团队协调，整合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形成服务合力，落实“医—护—社”多学科协同模式；三是环境资源协调，统筹医疗资源、社会资源、政策资源，构建全方位支持网络。临终关怀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死两相安”：通过多维度协调、多专业协同，保障临终老人在安详、有尊严的状态下离世，同时帮助家属重建生活秩序，顺利开启新生活。合并角色充分体现了医务社工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的价值，是连接个体需求、专业服务与社会支持的关键载体。

四、结语

面对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加之死亡质量指数偏低的现实，我国的老年临终者迫切需要提升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而老年临终关怀服务正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临终关怀的核心并非放弃治疗，而是当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疾病、生命进入终末阶段时，将治疗目标从“延长生命”转向“提升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让患者在舒适、安详、有尊严的状态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同时为家属提供照护指导、心理疏导等支持，帮助其减轻情感负担并顺利度过哀伤期，让“逝者安详，生者安心”。临终关怀服务的高质量需要跨学科团队的通力合作，而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团队中的功能与价值，只有通过角色才能充分显现。医务社会工作者需深刻认识自身角色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充分发挥直接服务、间接服务与整合服务的多重角色作用，才能在临终关怀团队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推动我国临终关怀事业不断发展，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安宁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斌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辅导读本 [M].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7: 125.

[2] 刘博 , 芦恒 .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重塑路径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4(01): 65−73.

[3] 高璇 , 赵玉虹 . 临终关怀研究热点分析 [J]. 医学与哲学 , 2019, 40(06): 32−35.

[4] 刘青青 , 胡娜娜 , 袁雯 , 等 . 以生命意义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在终末期肺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J]. 医学临床研究 , 2025, 42(12): 2133−2136.

[5] 于和硕 , 彭希哲 .“中国式安宁疗护”的理念建构与发展思考 [J]. 南京社会科学 , 2026(01): 60−7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立项“新医科背景下社会工作融入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路径与模式构建研究”（NGJGH2025347）。

（作者：王钦正，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助教；通信作者石震，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实践研究

邱涛华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治理重心下移，探索可持续的基层养老模式成为重要课题。本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视角，聚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研究其作为平台发展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与价值。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探讨在党组织领导下整合辖区资源（特别是医学院校资源）、动员多元主体（如低龄老人与医学生志愿者）、构建“低龄助高龄、专业助健康”共同体的可行性。同时，分析模式在运营机制、人力、资金、设施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提出完善制度、强化保障、拓展资源等建议，以期为摆脱社区养老供需困境、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群服务中心；互助养老；医学生志愿者

我国已迈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其成效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呈现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与空巢化并存的特点。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面临资源与成本压力，社区居家养老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社区养老服务仍普遍存在供给不足、专业支持不够、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1]。探索成本可控、体现人文关怀、能激活社区内生动力的互助养老模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

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关键载体，已从传统党务平台拓展为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引领治理的综合性枢纽[2]。如何依托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阵地优势，打造支撑互助养老的核心平台，是推动党建与民生深度融合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党建引领下，党群服务中心如何整合社区养老资源？如何构建可持续运行机制，有效动员低龄老人、医学生等力量参与？该模式有何创新价值？面临哪些困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予以破解？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旨在为同类地区发展社区互助养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互助养老、社区治理及党建引领等相关议题已有较多研究。

1. 关于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西方学者较早关注“时间银行”“老年合作社”“邻里互助”等形式，强调社会资本与社区归属感的作用。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互助养老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具有成本低、灵活性高、情感慰藉强等优势[3]。研究多集中于模式类型（如“结对互助”“邻里互助”“老年团体互助”）、动力机制（利他、互惠、情感需求）、发展瓶颈（制度缺失、资金匮乏、可持续性差）及对策建议，但将互助养老深度嵌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框架进行系统性研究成果尚不充分；对如何制度化利用高校专业志愿者（如医学生）资源的研究更为少见。

2. 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学者们探讨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如政治引领者、资源整合者。党群服务中心被视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物理载体和平台，其“空间政治”与“服务聚合”功能受到关注[4]。但现有研究对其如何转化为可持续养老服务生产力的微观机制剖析不足。

3. 研究评述：现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空间：一是较少将“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核心枢纽，系统考察其在孵化、运营互助养老模式中的具体路径；二是对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精准对接社区老年需求与辖区内专业资源（特别是医学院校资源）的机制研究有待深化；三是针对特定城市（如抚州）的深入案例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补充。

（二）理论基础

1. 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政府职能应向公共服务倾斜，以满足公民需求为核心。在互助养老领域，政府（通过基层党政组织）的角色应从直接“划桨”更

多转向“掌舵”，即通过政策制定、资源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养老服务。党群服务中心是践行该理念的一线平台。

2. 社会治理理论：核心是多元共治，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等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党建引领下的互助养老模式，正是社会治理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生动实践。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养老服务的“治理共同体”。

3.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个人通过与其社会网络互动，能够获得物质、情感等多方面支持。对于老年人而言，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至关重要。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实质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有意识地为社区老年人构建和强化其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

二、党建引领互助养老的基层治理路径：以抚州市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抚州市面对老龄化加剧与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积极探索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支点，党建引领下的互助养老新路径。

（一）需求导向与资源清单：党建引领下的精准识别与统筹配置

精准识别需求与有效配置资源是服务模式成功的起点。在党建引领下，这一过程被赋予更强的组织力和系统性。

1. 党组织牵头，深入摸排需求：社区党组织将养老服务纳入社区重要议事日程，发挥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合力，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老年人数量、结构、健康状况、服务需求进行全面摸排。

2. 建立需求台账与资源清单：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分层分类的老年人需求台账。同时，发挥党组织的组织联结优势，对辖区内可供利用的养老服务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形成“资源清单”，包括医疗机构、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辖区内大中专院校（如医学院）的专业师生资源。

3. 党组织统筹，促进供需匹配：社区党组织成为供需对接的“调度中心”。通过党建联席会议等平台，将“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精准对接，协商确定服务项目与责任分工，体现党建引领下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与公正性。

（二）多元联动与资源盘活：构建互助养老的支持网络

党群服务中心的核心功能在于搭建平台、链接资源、构建网络。

1. 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党组织通过宣传发动、典型示范等方式，弘扬“尊老敬老、互助友爱”的价值观，营造“人人助老、老有所为”的社区氛围，为动员多元参与奠定思想基础。

2. 组织联动，盘活存量：在社区党委领导下，党群服务中心联动“正式”与“非正式”资源[5]。正式资源方面，加强与政府部门及辖区单位党组织的共建共享；非正式资源方面，扶持社区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等草根组织，将其纳入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3. 搭建平台，促进共享：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实体平台，提供活动场地、发布信息、组织培训，成为各类养老资源汇集、交换、共享的枢纽。例如，利用中心空间开设“老年课堂”“健康吧”“聊天角”；组织医疗机构定期来中心开展义诊；为志愿者与服务对象提供对接场所等。

（三）具体实践模式：以“双助”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基于需求与资源的匹配，抚州市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色化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1.“低龄助高龄”：织密邻里守望的志愿者服务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老年协会等组织，发动低龄老年人和党员志愿者，与高龄、独居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结成“帮扶对子”，提供助餐、助洁、陪同就医、代购代办、情感陪伴等服务。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高龄老人的实际困难，也让低龄老人在奉献中实现了“老有所为”，获得了价值感和成就感，形成了积极老龄化的良性循环。党组织通过荣誉激励、积分兑换等方式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2.“专业助健康”：链接医护资源，构建社区医养结合圈。党群服务中心发挥协调优势，从两个层面切入：一是链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等机构资源，提供家庭医生服务、健康讲座等；二是引入医学生专业志愿力量。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等高校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在社区组织下开展健康监测、专业咨询、康复陪伴、精神慰藉等服务，弥补社区专业医疗养老服务的不足，同时为医学生提供实践与成长平台。

三、模式创新的预期价值与多重意义

该模式尤其在引入医学院校专业志愿力量后，展现出多方面的创新价值。

（一）理论价值：丰富基层治理与养老服务交叉研究

提供“党建 + 养老”的微观运作案例，呈现党组织如何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将政治引领、资源整合等功能嵌入社区养老服务全过程。

拓展了互助养老的动力机制研究。传统研究多强调邻里情感或时间银行式的物质互换[6]。本模式凸显了在党组织引领下，通过荣誉激励、组织归属感塑造、共建共享社区理念灌输等政治与社会激励，能够更稳定、更广泛地激发居民（包括低龄老人）的利他行为和持续参与意愿。

本研究强调通过党组织系统的调研摸底与资源梳理，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精准画像与动态对接，

为破解养老服务“粗放式”供给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启示。

（二）实践价值：摆脱现实困境与创造综合效益

对社会与社区：以较低成本动员社区内外资源，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填补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空白；增强社区凝聚力，构建和谐基层社会。

对老年群体：实现更便捷、更贴心的生活照料与健康关怀；促进低龄老人“老有所为”，让所有老人“老有所乐”，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对医学生志愿者：强化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促进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深度融合；拓宽职业认知与就业视野；实现个人成长与价值升华。

四、现实挑战与存在问题

尽管潜力巨大，该模式在推广中仍面临一系列深层问题。

（一）运营机制的系统性与长效性不足

互助养老缺乏顶层制度支撑。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权益保障等缺乏规范流程。医学生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内容边界、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需建立稳定机制。

（二）专业人力资源短缺

社区工作人员身兼数职，面对专业养老服务工作力不从心。专业社工配备不足，导致服务难以向专业化、精细化提升，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三）资金保障的可持续性较弱

经费多依赖有限的社区工作经费或临时捐赠，缺乏稳定的财政投入。场地维护、设备添置、志愿者补贴等均需持续资金支持。

（四）服务设施与场地瓶颈凸显

许多党群服务中心面积有限，难以开辟专门场所用于老年日间照料、康复训练等服务，制约了服务项目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五、对策与建议

为促进该模式健康、可持续发展，需从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完善顶层设计，构建制度化运营体系

1. 制定标准规范：由市级层面牵头，制定《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指导手册》，明确服务内容、流程标准、志愿者管理等要求。

2. 健全法律与政策保障：探索制定地方性政策，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为志愿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针对医学生参与，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方协议机制，明确各方职责与保障措施。

3.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时间银行”制度，将志愿服务纳入党员评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体系。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支撑能力

1. 配强社区工作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区配备专职为老服务社工。

2. 加强人员培训：定期对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养老服务技能、急救知识等系统培训，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3. 深化校社合作：与医学院校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将社区设为社会实践基地、志愿服务基地甚至课程见习点[7]，学校指派教师指导，纳入实践学分管理。

（三）拓宽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投入保障

1. 强化财政主渠道：各级政府应将社区互助养老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补贴。

2. 创新筹资机制：引导慈善组织、企业社会责任资金投向社区互助养老。探索设立社区养老慈善信托。

3. 落实优惠政策：对企业、个人捐赠给予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激发社会捐赠积极性。

（四）强化统筹规划，优化设施布局与功能

1. 纳入城乡规划：在新建住宅区和老旧小区改造中，严格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套标准，保障设施供给。

2. 推动设施共建共享：鼓励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场所设施资源共享、功能互补，提升设施利用效率。

3. 推进适老化改造：对社区公共空间和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营造安全便利的养老环境。

六、结语

面对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命题，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证，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枢纽平台，发展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制度优势的创新路径。抚州市相关社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党组织的有效组织与整合，能够将分散的社区资源（尤其是医学院校专业资源）凝聚起来，构建“低龄助高龄、专业助健康、党群齐参与”的养老共同体[8]。这不仅缓解了基层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丰富了社会治理实践。

然而，该模式从“有效探索”走向“成熟定型”，仍需克服运营机制、人力、资金、设施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这需要党委、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区互助养老从“可选项”变为“优选项”。展望未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必将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为坚实的基层智慧。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 . 中国养老服务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21, 35(03): （下转 52 页）

基于社工理论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马　旺

摘要：借助实地走访多家养老院以及结合老年人个案访谈的方式，本研究以社工专业视角，运用家庭治疗模式、认知行为理论与优势视角以及社会支持理论与人际互动，对当前养老院存在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开展了分析，并且提出了重构亲情联结网络、强化机构生活认同以及搭建人际互动平台等相应策略。实施这些策略，能够帮助老年人缓解心理困扰，还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对提升养老院心理健康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家庭治疗模式；认知行为理论与优势视角；社会支持理论与人际互动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其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其主要缘由包括机构内部环境相对封闭、社交活动较为单调，并且容易受到同龄人健康状况变故的影响。尽管当前养老院的硬件设施正在逐步完善，但许多机构仍然把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忽视了，从而导致情感孤独、自我认同危机以及归属感缺失等问题普遍存在。本研究从社工专业的角度出发，结合家庭治疗模式、认知行为理论与优势视角、社会支持理论与人际互动等相关理论，探讨养老院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以及成因，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养老院服务的改进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支持。

一、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与社工介入基础

（一）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的共性特征

借助对 30 余家养老机构的实地走访以及个案访谈工作，我们发现老年人在养老院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共性。身体功能退化导致自我价值感下降是不少老年人面临的问题，一些老年人因为疾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依赖他人照料，容易产生无用的自我认知。亲情疏离容易引发老年人的孤独情感，不少老年人与家人的联系慢慢减少，部分甚至长期没人探望，由此滋生出被遗忘的负面情绪。人际互动的匮乏还让部分老年人难以融入机构生活，归属感明显缺失，他们多与他人维持基础服务关系，缺乏深层次的交往互动。这类问题在穆爷爷的个案中体现，并且更广泛存在于养老机构内，凸显出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普遍困境[1]。

（二）社工介入养老机构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支撑

养老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需依托社工专业视角下的家庭治疗模式、认知行为理论、优势视角及社会支持理论与人际互动。家庭治疗模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改变内部动力与组织方式，解决个人及家庭问题。

（上接 51 页）

15−25.

[2] 王浦劬，李程远．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J]. 行政管理改革，2020(08): 4−12.

[3] 杨菊华．互助养老：中国本土化实践及其理论内涵 [J]. 社会科学研究，2019(06): 104−112.

[4] 张雷，韩永乐．党群服务中心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 23(05): 83−90.

[5] 刘迟，刘佳．基层社会治理中资源整合的机制研究 [J]. 学习与探索，2020(04): 45−52.

[6] 陈友华，邵文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优化策略 [J]. 江苏社会科学，2022(02): 67−75.

[7] 黄晨熹，王薇．高校志愿者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与成效 [J]. 教育发展研究，2020, 40(11): 77−84.

[8] 潘璐，许静，姜丽想．低龄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J]. 社会福利，2024(08): 54−64.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认知行为理论可以改变错误认知、不理性想法与自我对话，探索正面思维。优势视角侧重挖掘老年人潜力与经验，如穆爷爷曾是技术骨干，社工根据其工作经历，帮助他重拾信心。社会支持理论强调家、机构、社区支持网的重要性，通过修复、加强、拓展支持，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强归属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二、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表现及成因

（一）亲情联结断裂导致的情感孤独问题

穆爷爷离婚多年，有一子，因病入住养老院已有9年，最初家人每月还能探望一两次，后来因工作繁忙与照顾压力等，近1年来仅在春节期间短暂停留，日常亦无电话联系。他常静坐在养老院窗边，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马路，偶尔自言自语："孩子怕是忙得忘了我。"整个人陷入"被遗忘"的情绪旋涡，对周围事物提不起兴趣，连以往喜欢的象棋也不再碰了。现代社会家庭结构逐渐向小型化发展，子女多为独生子女，面临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双重压力，难以兼顾对父母的日常陪伴。机构与家庭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无法及时传递老人的情感需求，也难以引导家人参与老人照顾过程，导致亲情联结逐渐断裂，像穆爷爷这样的情况在养老机构中并不少见[2]。

（二）机构生活适应困难引发的自我认同危机

穆爷爷因左侧肢体偏瘫，无法自主完成穿衣、进食等基本生活动作，需依赖护理人员协助。他常坐在床边盯着自己的左手发呆，对护理人员说："我现在就是个累赘，帮不上任何人。"养老院组织的手工课、唱歌活动，他都以"手脚不方便"为由拒绝，独自待在房间里，连以往喜欢的收音机都很少打开，整个人陷入沉默抑郁。身体疾病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让他从"自我照顾者"沦为"被照顾者"，这种角色转变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无用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机构日常服务更侧重生活照料，未充分挖掘他的能力——他曾是大无缝钢管公司的技术工人，擅长维修简单电器，但机构没给他提供发挥特长的机会，让他觉得自己"对别人来说没用处"。此外，他内心对"养老院居民"身份存在偏见，认为"只有没用的人才会住养老院"，这种负面认知加剧了他的自我否定，让他更难融入机构的集体生活。

（三）人际关系疏离造成的归属感缺失

穆爷爷因说话时嘴角歪斜、语速缓慢，常常没说几句就停下来，怕别人听不懂，所以很少主动和其他老人交流。他很少加入其他老人的聊天圈子，连养老院组织的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和护理人员的互动也仅停留在基本服务层面，比如护理人员给他送药时，他只是说"谢谢"，没有多余的话。他曾对社工说："我像个外人，没人愿意和我说话。"整个人显得孤独而疏离。身体障碍让他产生自卑心理，担心自己的说话方式会被嘲笑，所以不愿意主动与他人沟通。机构日常活动安排较为松散，没有固定的集体互动项目，比如没有定期的茶话会或手工课，让他没有机会参与其中，难以建立人际联系。其他老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的喜欢安静，有的互动意愿不高，他很难找到交流的对象，进一步加剧了归属感的缺失[3]。

三、基于社工理论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应对策略

（一）家庭治疗模式：重构亲情联结网络，缓解情感孤独

针对穆爷爷的情况，可从多方面推进亲情联结修复，改善其情感状态。家庭诊断，主动链接家庭资源是建立双向沟通渠道的基础。社工首先与其子取得联系，利用对方下班时间开展三次面谈。交流中，社工既倾听对方长期出差、工作繁忙、需照顾年幼孩子，以及老人离婚对其造成幼年心理阴影的情况介绍，也向对方传递穆爷爷的情感需求，告知对方父亲常坐在养老院窗边紧盯手机，还会念叨儿子是否已将自己遗忘。这样的双向沟通，让对方逐渐理解父亲的孤独，主动承诺以后会多抽时间探望，至少保证每月一次。组织家庭成员互动，能有效促进深度情感表达。追思往事，社工为穆爷爷精心安排家庭会议，地点选在养老院活动室，提前摆放好穆爷爷喜爱的象棋与他儿子幼时的照片。见面后，社工引导其子先分享工作中的趣事，提及近期项目顺利完成且获得领导认可；穆爷爷则回忆起他儿子小时候学骑车的经历，说起孩子当年摔倒多次仍坚持学习的模样。父子俩交流愈发投机，其子握住父亲的手承诺，以后每月都会来陪父亲下象棋，还会分享工作中的点滴。穆爷爷眼眶湿润，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总结新旧经验，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是维持亲情联结持续性的关键。社工与穆爷爷父子共同约定联系方式：每月第三个周末其子来养老院探望，日常则通过视频通话保持互动。其子每天晚上都会给父亲发语音，分享当天饮食或作息信息；穆爷爷也会主动告知养老院生活情况，比如参与手工课制作纸船，或是护理人员帮忙修剪头发等。这种常态化联系让穆爷爷切实感受到儿子的关心，不再像以往那般沉默，还主动和社工提及儿子最近虽忙却仍惦记自己，甚至计划带孙子来探望。通过上述策略，穆爷爷的情感孤独得到明显缓解。他开始主动参与养老院集体活动，会同其他老人下象棋，遇到护理人员也会主动打招呼，脸上的笑容日渐增多。这种基于家庭治疗模式的亲情联结重构，不仅修复了穆爷爷与儿子的关系，更为缓解养老机构老年人情感孤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路径[4]。

（二）认知行为和优势视角理论：强化机构生活认同，化解自我认同危机

社工对有需求的老人开展个案小组工作，给予情感

支持和缓解其内心压力，整合资源，倡导“以人为本、助人自助”服务理念影响他人。针对穆爷爷的案例，可通过多维度策略助力其重建自我认知，融入机构生活。回溯职业经历是重构身份认知的关键路径。面对穆爷爷因身体障碍产生的无用感，社工主动引导他回忆大无缝钢管公司的工作片段。社工坐在他身边，指着其抽屉里的旧工作证开启话题，询问他是否曾因修机床获得认可。穆爷爷摩挲着工作证，缓缓讲述起一次关键经历：某台机床突发故障，他人排查许久无果，他蹲在机器旁反复琢磨，最终发现线路老化问题，更换线路后机器恢复运转，厂长还在早会上称赞他为厂里的“活字典”。社工认真记录这些细节，协助他整理成简短的工作故事，支持他在养老院老职工分享会上讲述，帮助他重新意识到自身曾有的价值。搭建分享平台能够有效增强群体联结，帮助老人建立机构群体身份认同。养老院每月固定举办老职工故事分享会，邀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老人参与。穆爷爷首次上台时，声音略颤抖，但台下老人专注倾听、不时点头的模样，让他逐渐放松下来。分享结束后，同在养老院的李大爷主动上前，提及自己曾在钢铁厂从事轧钢工作，称赞穆爷爷修机床的技艺，并提议日后多交流厂区往事。穆爷爷露出笑容，欣然应允。这次互动让他切实感受到与其他老人的共性，对养老院的群体身份产生了认同感。

安排老人参与简单劳动，可帮助其实现价值传递，消解无用感。参与养老院日常工作，提升“社会参与”价值感，社工结合穆爷爷的身体状况，为他安排力所能及的任务：每日下午整理活动室图书，叠放桌上报纸，或协助护理人员将水杯送至各房间。他向社工表示，能为大家做事让他内心踏实。这种转变正是强化机构生活认同的成效，也为解决养老机构老年人自我认同危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

（三）社会支持和人际互动理论：搭建人际互动平台，提升归属感

搭建人际互动平台需以共同经历为纽带，社工整合各方资源，通过结构化活动促进老人间的情感交流，缓解因疏离产生的归属感缺失。针对穆爷爷的案例，可从多类活动设计入手，逐步帮助其建立社交关系、重塑群体认同。围绕共同困境成立康复互助小组，能让有相似需求的老人快速产生共鸣。穆爷爷因左侧肢体偏瘫存在沟通障碍与自卑心理，社工联合养老院护理人员，组建成员均为肢体行动不便或有康复需求的康复伙伴小组。每周二、四下午，社工带领老人在活动室开展慢走、手指操、握力训练等简单康复活动，过程中引导大家分享康复中的小进步。穆爷爷起初仅沉默跟随，直到同组王大爷分享自身偏瘫后从无法持筷到能夹菜的经历，他才小声提及自己手指操练习的进展。王大爷的肯定与鼓励，让穆爷爷逐渐放下戒备，开始主动与组员交流，康复伙伴小组也成为他在养老院的首个社交圈。设计合作性手工制作活动，可强化老人间的互动，让参与者在协作中感知自身价值。社工依据老人兴趣与能力，每周六上午开展手工创意坊活动，设置折纸、编中国结、做纸花等易操作项目，采用两人一组的合作模式。穆爷爷与李阿姨搭档，李阿姨擅长折纸负责制作纸船主体，穆爷爷则用右手协助递纸、涂胶水。李阿姨多次肯定穆爷爷递纸时机恰当，助力自己高效完成制作；穆爷爷虽担心自身速度影响进度，却也在李阿姨的认可中逐渐建立信心。两人合作的纸船被贴在活动室创意墙上并标注姓名，穆爷爷每次路过都会驻足观看，深切体会到自己对他人的作用与意义。

构建日常互动的固定场景，能深化老人的群体认同，让其在常态化交流中融入集体。社工在养老院大厅设置每日茶话角，每天下午摆放水果、茶点，邀请老人围坐聊天，并提前准备贴近生活的话题。穆爷爷起初仅在角落倾听，后在讨论饮食话题时，主动分享自己用冰糖炒糖色制作红烧肉的技巧，引发张大爷学习兴趣并约定后续交流做法。穆爷爷表示，如今的养老院于他而言如同家一般，身边有众多朋友，不再是外人[5]。这一实践不仅帮助穆爷爷重建归属感，也为解决养老机构老人归属感缺失问题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四、结语

本研究分析了养老院环境氛围对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提出了针对具体情况的干预策略，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老年人的情感孤独、自我认同危机以及归属感缺失问题。社工还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健全协作保护的机制，以此提高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些策略不仅为养老机构提供了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路径，还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把样本量扩大，去探索不同类型养老院的个性化应对策略，进一步提高其普适性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佟雨琪，刘子彧，殷可欣，等．老龄化背景下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服务优化路径分析 [J]. 老龄化研究，2025(04): 331−337.

[2] 凌文豪，刘超．社区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J]. 社会保障研究，2024(04): 62−71.

[3] 杜鹏，马琦峰．中国社区嵌入式养老：现状与问题浅析 [J]. 人口与发展，2024, 30(03): 113−124.

[4] 常红，王萱，刘梦娆，等．北京市社区老年人内在能力的网络分析 [J]. 中国护理管理，2025, 25(07): 978−983.

[5] 孙鹃娟，孙可心．子代支持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J]. 人口与发展，2024, 30(05): 15−26.

（作者单位：天津市东丽区民政局）

成都市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冯双双 王佳琳 马月玲

摘要：目的：了解成都市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为完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参考。**方法：**于 2024 年 1—3 月便利抽取 434 名成都市低龄老人，采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意愿调查问卷、社会资本量表进行调查。**结果：**低龄老人中愿意参与“时间银行”者 314 人（72.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自评健康状况较好、无配偶的低龄老人参与意愿更高；主要经济来源为子女赡养、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低龄老人参与意愿更低。**结论：**成都市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较高，受性别、自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低龄老人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2.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0%[1]，社会养老面临巨大挑战。“时间银行”是指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照料、陪伴等服务，且服务时长可转换为自身后期养老所需，实现服务成果的延期支付[2]。这种新型养老模式能够优化社会养老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弥补传统养老方式的局限。但目前“时间银行”尚未大规模普及，低龄老人的关键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低龄老人对“时间银行”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精准化养老政策、优化服务运营模式、完善互助养老体系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推动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4 年 1—3 月，便利抽取四川省成都市两个城区中符合纳入标准的低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 55~69 岁；意识清醒，沟通交流无障碍；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严重视力、听力或语言交流障碍者。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公式 $n=Z_{\alpha/2}^2PQ/d$ 估算样本量，设定 $\alpha=0.05$，$Z_{\alpha/2}=1.96$，P 指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率 77.35%[3]，Q=1–P，d=0.1×P，计算样本量为 113 例，考虑 20% 的无效数据，增加样本量至 136 例。

（二）研究工具

1.“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调查问卷

问卷由王亚婷[4]编制，共 36 个条目。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参与意愿。问卷信效度良好，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分别为 0.854 和 0.833。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效度进行考察，结果显示 P<0.001，KMO 值为 0.821。表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效度。

2. 社会资本量表

该量表由祝欢等[5]编制，最初源于以城市新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健康相关社会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后经不断修改完善用于测量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体社会资本（3 个条目）、家庭社会资本（3 个条目）和社区社会资本（5 个条目）3 个维度，共 11 个条目。本研究中量表的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8。

（三）调查方法

由课题组成员组成调查小组，遵循自愿原则。若低龄老人对问卷题目不理解，调查员需解释并协助完成。当场回收并复核，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460 份，最终有效问卷为 4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3%。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共纳入成都市 434 名低龄老人，研究对象平均年

龄（59.30±3.36）岁，其中男性 249 人（57.4%），女性 185 人（42.6%）。其余一般资料见表 1。

（二）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现状

本研究最终纳入分析的 434 名低龄老人中，有“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者 314 人，愿意参与“时间银行”的比例为 72.4%。

表 1 成都市不同特征的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情况比较

特征	分组	调查人数	愿意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χ^2 值	P 值
			人数（人）	构成比（%）		
性别	男	249	167	67.1	8.147	0.005
	女	185	147	79.5		
年龄	55~59	259	191	73.7	1.769	0.41
	60~64	147	101	68.7		
	65~69	28	22	78.6		
民族	汉族	297	228	76.8	9.178	0.003
	少数民族	137	86	62.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88	146	77.7	65.175	<0.001
	初中	157	81	51.6		
	高中及以上	89	87	97.8		
婚姻状况	有配偶	291	189	64.9	24.187	<0.001
	无配偶	143	125	87.4		
职业类型	公务员	39	33	84.6	18.509	<0.001
	事业单位	60	32	53.3		
	自由职业者	214	167	78.0		
	无工作	121	82	67.8		
子女数量	0~1 个	118	101	85.6	21.078	<0.001
	2 个	196	122	62.2		
	3 个及以上	120	91	75.8		
月收入	2000 元及以下	82	67	81.7	16.368	0.001
	2001~4000 元	170	107	62.9		
	4001~6000 元	151	112	74.2		
	6001 元及以上	31	28	90.3		
主要经济来源	子女赡养	118	65	55.1	41.46	<0.001
	退休金	95	60	63.2		
	再就业收入	209	180	86.1		
	政府接济	12	9	75.0		
居住方式	独居	117	91	77.8	37.11	<0.001
	与子女一起	147	80	54.4		
	与配偶一起	170	143	84.1		
自评健康状况	较差	67	53	79.1	34.701	<0.001
	一般	192	112	58.3		
	较好	175	149	85.1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了解程度	不了解	156	128	82.1	30.754	<0.001
	了解一些	147	82	55.8		
	比较了解	131	104	79.4		
亲戚是否参加“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有	144	112	77.8	3.632	0.16
	没有	193	132	68.4		
	不清楚	97	70	72.2		

（三）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子女数量、月收入、主要经济来源、居住方式、自评健康状况、对“时间银行”了解程度的低龄老人在“时间银行”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详见表 1。

（四）低龄老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意愿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社会资本总分为（38.59±5.62）分，个体、家庭和社区维度得分分别为（10.47±1.77）分、（10.95±1.84）分、（17.18±2.85）分。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与社会资本总分呈负相关（r=–0.186，P<0.01）。详见表 2。

表 2 “时间银行”参与意愿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变量	参与意愿	个体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总分	–0.186**	0.842**	0.797**	0.902**
社区社会资本	–0.209**	0.644**	0.570**	–
家庭社会资本	–0.030	0.595**	–	–
个体社会资本	–0.194**	–	–	–

注：**P<0.01。

（五）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实施 logistic 回归前，评估所有自变量间的共线性情况，方差膨胀因子值为 1.235~2.724，均 <10，提示所有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将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社会资本得分以原值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因素为性别、自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社会资本（P<0.05）。详见表 3。

表 3 “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E	Waldx^2	P 值	OR 值	95%CI
性别	1.219	0.293	17.338	<0.001	3.383	1.906~6.003
自评健康状况	0.409	0.190	4.612	0.032	1.505	1.036~2.184
婚姻状况	1.231	0.322	14.607	<0.001	3.425	1.822~6.438
主要经济来源	0.646	0.155	17.462	<0.001	1.909	1.410~2.585
社会资本	–1.062	0.313	11.495	0.001	0.346	0.187~0.639
常量	–0.510	1.550	0.108	0.742	0.600	–

注：自变量赋值，性别，男性 =1，女性 =2；自评健康状况，较差 =1，一般 =2，较好 =3，非常好 =4；婚姻，有配偶 =1，无配偶 =2；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初中 =2，高中 =3，大专及以上 =4；主要经济来源，子女赡养 =1，退休金 / 养老金 =2，再就业收入 =3，政府接济 =4。

三、讨论

（一）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总体较高，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本次调查中，成都市低龄老人对“时间银行”的了解程度较差，仅有 15 名（3.46%）老年人表示非常清晰，但经初步了解后，72.4% 的低龄老人表示愿意参与“时间银行”。这提示成都市低龄老人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整体较高，明显高于石家庄市[6]（57.9%）和西安市[7]（46.2%）的研究结果。原因可能是“时间银行”源于上海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广，各地区宣传力度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养老模式仍深植人心，这也制约了低龄老人对该新型养老方式的接受。

（二）女性、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更高

女性低龄老人的“时间银行”参与意愿高于男性。已有研究证明[8]，性别是影响老年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女性多承担家庭照护角色，这一观念深植人心并被女性自身所内化。因此女性老人在照护经验或共情能力等方面常具有“累积性优势”，相较男性更善于提供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参与“时间银行”也更有优势。自评健康状况越好，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越强烈，与既往研究报道一致[9]。可能因为健康老人精力和体质更佳，更易从事互助养老志愿服务，而患病老人则因自认缺乏照护能力而拒绝参与。

（三）婚姻、主要经济来源使低龄老人“时间银行”的参与意愿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无配偶低龄老人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有配偶的老年人可以彼此陪伴，而单身老人更易因缺少陪伴产生孤独感。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更可能倾向于参与“时间银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人沟通交流，降低孤独感，同时为未来养老储存资源，故参与意愿更高。此外，主要经济来源为子女赡养的老人参与意愿较低，因其常需照料孙辈，可支配时间较少，故参与意愿也较低。

（四）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越低

本研究表明低龄老人社会资本水平与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呈负相关（$r=-0.186$，$P<0.01$），即低龄老人的社会资本水平越低，“时间银行”参与意愿越高。社会资本指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及借此获取资源的能力[10]，可从个人、家庭与社会层面衡量。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代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外部支持越多，相较于参与“时间银行”，更倾向于参加更高层次的服务和活动来实现人生价值。而低社会资本水平的低龄老人，由于自身资源匮乏，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则更强烈。

四、结语

成都市低龄老人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知晓度不高，但经过宣传介绍后，低龄老人总体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较高，提示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老年人参与意愿。成都市低龄老人“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受到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社会资本的影响，但本研究未验证具体影响机制，今后需收集更多数据深入研究。由于人力及时间限制，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结论推广有一定局限性，后续应增加样本量并扩大研究区域，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EB/OL]. (2021-05-11)[2025-03-20].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2] WILSON K S L, MAN KIT C, MAN LAI C, et al. Swift trust develop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ime banking:A trust transfer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perspectiv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2, 129: 107137.

[3] 王思远，杨睿博，许婧睿，等 . 居民对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参与意愿的 Meta 分析 [J]. 循证护理，2023, 9(08): 1350-1358.

[4] 王亚婷，曹梅娟 . 低龄老年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调查 [J]. 护理学杂志，2017, 32(14): 95-97.

[5] 祝欢，高博，彭嘉怡，等 . 成都市丧偶老年人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健康教育，2022, 38(07): 583-588.

[6] 李重阳 . 石家庄市低龄老年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研究 [D]. 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9.

[7] 李菁菁，杜智民 . 城市老年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意愿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33(02): 75-81, 87.

[8] 刘惠丰 . 低龄长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22.

[9] 王琦，张冰蟾，张杰，等 .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徐州市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J]. 医学与社会，2021, 34(02): 89-93.

[10] 聂建亮，陈博晗 .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J]. 北京社会科学，2024(03): 101-1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四川省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分级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策略研究”（2023NSFSC0513）。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再生产：非遗传承中老年社会参与的价值重构与机制研究

张启浩 王振萍

摘要：全球老龄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际断裂构成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双重现代性困境”。老年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角色，往往被简单化或视为被动的“保护客体”，或被工具化为“健康促进”的手段，系统性遮蔽了其作为文化能动者的主体性价值。本研究旨在超越这一局限，通过构建“文化记忆能动性再生产”的理论框架，深入探究老年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核心作用，进而推动文化记忆理论与老年社会参与研究的范式革新，也为实现文化传承与积极老龄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创新性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文化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年社会参与；老年文化资本；“双向反哺”

一、问题的提出：“双重困境”下的主体性危机与理论局限

我们正身处于深刻的“双重现代性困境”之中：一方面，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老年红利”成为重要议题；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代际断裂日益严重，以活态流变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全球有超过 1/3 的非遗项目面临传承困境，其中传承人老龄化是最突出的挑战之一。在中国，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 70% 年龄在 60 岁以上，“人亡艺绝”的风险真实而紧迫。

在“双重困境”下，老年群体的角色定位往往存在明显的被简单化的倾向。在非遗保护领域，老年人常常被视为被动的“保护客体”，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承载的“濒危”知识和技能上，保护方式多以抢救性记录为主。在老龄工作领域，老年社会参与的价值往往被简化为促进身心健康、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这两种视角都系统性遮蔽了老年群体作为文化主体能动者的创造性角色，导致其深层的文化价值创造功能未能得到充分认识和开发。

理论层面的回应同样存在不足。首先，文化记忆理论虽然长于勾勒宏大的记忆共同体，但拙于剖析记忆在微观实践中的动态再生产机制 [1]。其次，老年社会学关于社会参与的研究多被困在“生产性老龄化”的经济学话语或“成功老龄化”的医学范式内，未能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文化价值创造领域的独特作用。最后，非遗研究则常常陷入“技艺本体论”的窠臼，缺乏对传承场域中复杂的权力动力学和代际互构关系的深入洞察。

因此，本研究旨在回应以下核心问题：如何超越现有的客体化与工具论范式，在理论上重构并在实践中发挥老年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核心主体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探讨：老年群体所承载的“存储记忆”通过何种社会机制被激活为“功能记忆”；代际互动中如何形成“双向反哺”的协商机制；技术制度环境如何影响这一再生产过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是摆脱非遗传承困境的关键，更是对积极老龄化内涵的深刻重构 [2]。

二、理论框架的重构：从静态保存到能动再生产

（一）文化记忆理论的范式转型：从“存储”到“再生产”

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通过符号、仪式和文本实现代际延续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这一理论早期过于强调“存储记忆”的稳定性和经典化，相对忽视了“功能记忆”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被不断调用、阐释和重构的动态过程 [3]。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虽对“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进行了区分，但仍未充分关注记忆再生产过程中的微观机制和主体能动性。

本研究引入“能动性再生产”概念，将文化记忆视为一个持续的、能动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一视角受到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启发，强调记忆的延续并

非简单地传递，而是通过每一次具体的传承实践被重新阐释和赋予新意[4]。同时，借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我们认为老年传承人既受文化传统的制约，又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重塑传统。

（二）老年文化资本：多维度的理论构念

为解析老年群体在文化记忆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本研究提出“老年文化资本”概念，将其定义为老年群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集中于文化传承领域的、可转化并可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复合体。这一概念借鉴但超越了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强调老年文化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其具身性、嵌入性和积累性。

我们将老年文化资本操作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一是具身化技艺资本：通过数十年身体力行所内化的、近乎本能的技艺技能与非正式知识，表现为“手感”“火候”等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

二是嵌入性社会资本：依托资深经历与技艺权威，在特定社区内部构建的以信任、声誉与关系网络为核心的社会资源。

三是制度化符号资本：社会对老年群体所拥有资本的集体承认与合法性授予，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师傅”等象征性头衔。

三维框架使我们能够避免将老年群体视为同质化整体，而是关注其内部的异质性和资本转化的复杂性。

（三）代际“双向反哺”作为协商性实践

本研究超越传统的“单向传递”模型，提出代际“双向反哺”概念。在这一框架下，传承不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而是一个充满协商的互动过程。老年传承人向青年传授技艺和文化内涵（技艺反哺），而青年则凭借其教育背景、技术能力和市场意识，为老年群体提供创新思路和传播工具（创新反哺）。

这一过程充满创造性张力，双方围绕“本真性”与“创新性”的边界进行持续协商。成功的传承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形成一种“协商性本真性”——在核心技艺和精神内涵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共同探索适应时代的表达形式[5]。

（四）技术制度环境作为赋能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与制度政策不是中性的外部变量，而是深刻影响传承生态的赋能基础设施。本研究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将技术制度环境视为由多元异质行动者（人、技术、制度等）构成的网络，关注其如何共同塑造传承实践的可能性条件。

我们特别关注技术制度环境的“悖论性效应”：数字技术在降低传承成本、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知识的“去身体化”和传统的商品化；制度支持在提供资源保障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行政化和标准化压力。这种辩证视角有助于我们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陷阱，更全面地评估外部干预的影响。

三、研究发现：文化记忆再生产的微观机制

本研究采用顺序性解释混合方法设计，结合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全面探究老年社会参与在非遗传承中的价值重构机制。

（一）老年文化资本的异质性及其转化路径

研究发现，老年传承人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聚类分析识别出三种典型类型：

一是技艺权威型：技艺资本突出，但在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方面相对较弱，多见于家族传承项目。

二是社区节点型：社会资本丰富，善于联结不同群体，在社区性非遗项目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是符号标杆型：符号资本突出，常获得官方认定和媒体关注，但社区嵌入性可能相对较弱。

这种异质性表明，政策干预需要从“一刀切”转向“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传承人的特点提供精准支持。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老年文化资本的三个维度对非遗活化成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作用机制不同。技艺资本是基础，社会资本是关键中介，符号资本则是价值实现的“催化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在调和代际关系、降低传承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代际互动的微观机制：从“单向传递”到“双向反哺”

代际互动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传统观念中的“师徒如父子”单向权威关系正在向“亦师亦友”的平等协商关系转变。例如，在宁波金银彩绣技艺传承中，老年传承人负责传授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青年学徒则主导产品创新和线上营销。这种分工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协商形成的。

互动过程充满微妙的权力博弈。青年对技艺的“简化”提议常遭老师傅反对，后者执着于对“本真性”的坚守。成功的传承社区往往形成了有效的协商机制，如定期举办的“创意研讨会”，为不同世代提供平等表达的空间。社会网络分析表明，那些在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连接不同群体的老年传承人，更善于驾驭代际张力，促进良性互动。

（三）技术制度环境的协同赋能效应

面板数据分析显示，数字技术与制度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拥有数字化档案、开展线上教学的非遗项目，其老年文化资本对活化成效的正面影响更强。特别是区块链溯源技术的应用，通过提升产品可信度，直接增强了老年传承人的符号资本。

然而，技术赋能效应高度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匹配度。研究发现，单纯的经济补贴对活化成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经济补贴 + 传承基地建设 + 媒体推介”的政策组合则效果显著。这表明，单一政策工具效果有限，必须多措并举，形成协同效应。

GIS 空间分析揭示了政策适配的重要性。非遗活

化成效高的区域，其政策工具包与当地非遗项目类型、老年文化资本优势维度呈现高度匹配特征。这为构建“动态适配”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发现，老年群体通过其具身化的技艺资本、嵌入性的社会资本与制度化的符号资本，在与青年一代的“双向反哺”中，实现了从文化记忆的“存储者”向“能动再生产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过程并非线性传递，而是充满了围绕“本真性”与“创新性”的权力协商和意义重构。同时，研究揭示了技术制度环境协同赋能作为外部变量的关键作用，但其效应具有悖论性：数字技术在降低传承成本、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知识的“去身体化”和传统的商品化。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强调“动态适配”与“精准治理”的政策工具箱，包括“老年文化资本评估体系”“代际共创平台”及“伦理导向的技术应用指南”，旨在为摆脱非遗传承困境、重构老年社会价值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四、讨论与理论启示

（一）理论贡献：从修正、突破到整合

首先，对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正和推进。提出的“文化记忆能动性再生产”模型，为理解记忆的当代转化提供了过程性分析框架，将研究焦点从“记忆是什么”转向“记忆如何被实践”，推动了该理论的微观转向和操作化发展。

其次，实现了老年社会参与研究的范式突破。通过“老年文化资本”概念，将研究从“工具性”视角解放出来，确立了老年人作为文化价值创造主体的地位，为积极老龄化理论注入了文化维度。

最后，促进了非遗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构建的“文化—社会—技术”三维框架，为理解非遗传承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元框架，打破了学科壁垒，推动了人文社科领域的“新文科”建设。

（二）实践启示：构建精准、动态、协同的治理体系

研究发现对政策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从“一刀切”到“分层分类”：政策干预需要考虑老年传承人群体的内部异质性，针对不同类型提供精准支持。对“技艺权威型”重点提供技艺传承条件，对“社区节点型”支持其组织社区活动，对“符号标杆型”强化其示范效应。

二是从“单兵突进”到“组合出击”：推行协同政策工具包，如将“非遗养老金”（经济保障）、“时间银行”（代际激励）、“区块链认证”（信任建设）等工具组合使用，形成政策合力。

三是从“静态管理”到“动态适配”：建立基于证据的政策调适机制，运用“动态适配指数”等工具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实现精准治理。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样本虽力求多样，但仍无法完全覆盖丰富的非遗门类和地域文化差异；其次，非遗传承与政策干预的效果需要长期观察，本研究的中短期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长期趋势；最后，对前沿技术应用的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未来研究可朝以下方向拓展：开展跨区域、跨类型的比较研究；采用长期追踪方法监测传承效果的可持续性；与技术专家深度合作，发挥技术创新应用的实际效果；将研究框架拓展至其他文化传承领域，检验其解释边界的拓展性。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文化记忆能动性再生产”理论框架，提出“老年文化资本”操作化概念，并以扎实的混合研究方法验证了其解释力，深刻揭示了老年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核心主体价值。研究证明，成功的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老年群体通过其多维文化资本，在与青年一代的“双向反哺”中，实现文化记忆创造性转化的能动过程。这一过程既需要代际间的良性互动和权力协商，也离不开技术制度的协同赋能。

将老年群体视为能动的文化再生产者而非被动的保护对象，这一范式转变不仅为摆脱非遗传承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开辟了新路径。未来的文化治理需要更加注重主体赋能、代际对话和生态建设，通过构建精准、动态、协同的支持体系，激活老年群体的文化创造力，共同守护民族的文化血脉。

参考文献

[1] 阿莱达·阿斯曼 .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 黄晓晨 , 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5.

[2] 冯骥才 . 非遗学原理 [M].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25.

[3] 冯亚琳 , 阿斯特莉特·埃尔 .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M]. 余传玲 , 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2.

[4] 皮埃尔·布迪厄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 布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

[5] 孙诗雨 . 革命纪念馆红色文化记忆建构研究 [D].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 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5 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文化记忆再生产：非遗传承中的老年社会参与价值重构研究”。

（作者单位：青岛市技师学院）

儿童权利视角下的福利机构困境儿童保护路径探索

——以G市社会福利院对两名事实无人抚养残疾儿童的保护实践为例

符凯君

摘要：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等政策的颁布，儿童福利机构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需要从传统的孤弃儿童保障模式向困境儿童的多元化服务方向拓展。本文以G市社会福利院对两名事实无人抚养残疾儿童的保护实践为案例，基于儿童权利的视角，探讨福利机构介入困境儿童保护的有效路径。福利机构通过“社区＋机构”协同的动态评估机制，精准识别儿童权利的缺失，构建多方协作的资源整合网络，提供“基础保障＋赋能发展”的分层服务，有效保障了困境儿童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及发展权。此项研究为同类福利机构开展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提供了实践参考，有助于推动儿童福利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

关键词：儿童权利；福利机构；困境儿童；保护路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一、研究背景

（一）福利机构转型：从“孤弃儿童保障”到“困境儿童服务”的拓展

我国儿童福利机构长期以孤弃儿童为核心服务对象，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接收流程与服务体系。然而，近年来，随着孤弃儿童数量的持续下降，以及困境儿童群体保障需求的日益凸显，国家层面多次提出推进儿童福利机构的转型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儿童福利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孤儿和弃婴，随着孤儿、弃婴明显减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权益保障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也逐渐由孤儿、弃婴拓展到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等[1]。

G市社会福利院作为区域内的核心儿童福利机构，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将服务对象从孤弃儿童拓展至多重困境儿童，尤其关注事实无人抚养的病残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此类儿童往往监护缺失、身心残疾或教育中断，需要福利机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保护服务，这也成为福利机构转型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向。

（二）困境儿童现实：小青、小云案例中的权利缺失困境

小青（男，8岁）与小云（女，7岁）是G市B区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两人分别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二级）和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三级），并伴有轻度孤独症和注意力缺陷等问题。其父母因犯敲诈勒索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在较长的服刑期间疏于履行监护职责，且存在常态化暴力管教行为。这导致两名儿童自幼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医疗和教育严重缺失：居住环境黑暗闭塞，多人共宿一床；两人均未接受义务教育，也未获得专业医疗干预。由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和情感忽视，他们出现了暴力伤人、情绪失控、模仿性行为异常等问题，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和发展权均面临严重威胁。

2024年5月，G市B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其父母的监护权，指定社区居委会为该孩子的监护人。同年10月，G市B区S街道办事处向G市社会福利院提出委托安置申请，福利院随即启动了对两名儿童的权利保护介入工作。

二、儿童权利视角下福利机构的保护路径实践

G市社会福利院以《儿童权利公约》为核心准则，构建了“社区协同评估、机构精准安置、专业赋能发展”的全链条保护路径，具体实践如下。

（一）社区协同：动态评估识别权利缺失，建立儿童权利档案

在接受小青、小云安置申请前，G市福利院已联合B区民政局、B区S街道社工站等机构，开展跨主体协同评估，形成“以儿童权利为核心”的评估体系，精准识别权利缺失的类型与程度。

一是多维度权利缺失评估。评估团队由福利院社

工、康复治疗师、医生、特教老师和护师组成，结合社区提供的监护记录和医院诊疗报告，从四大权利维度进行全面评估：

生存权层面：两名儿童虽享有事实无人抚养基本生活保障金，但费用仅能覆盖部分医疗支出，24 小时护工费用需依赖临时救助金。此外，存在“囤食抢食”行为，反映出早期生存资源匮乏导致的安全感缺失；居住环境长期恶劣，自理能力极差，需专人协助进食、如厕，生存质量未达到基本标准。

受教育权层面：小青 8 岁未接受义务教育，小云 7 岁无学前教育经历，兄妹二人认知能力远低于同龄儿童，仅能识别少数颜色和动物，数字认知因错过关键发展期而难以推进，受教育权利严重缺失。

受保护权层面：由于长期遭受父母家暴和情感忽视，导致两人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如小青情绪波动时会撞墙自残、小云会常常自言自语念叨“爸爸、妈妈”；存在无预期攻击他人行为（如小青、小云会无缘由攻击陪护阿姨），以及模仿性行为异常（如小青、小云会无意识相互亲吻），反映出其未获得安全的成长环境与情感保护。

发展权层面：因身心残疾和环境限制，两人社交能力薄弱，仅能与陪护阿姨、医护人员进行简单互动，缺乏同龄玩伴；兴趣特长未被发掘，发展潜力未得到有效激活。

二是建立动态权利档案。基于评估结果，福利院为小青、小云建立“一人一档”的权利保护档案，档案不仅包含基本信息、医疗诊断、教育进展，更以“权利实现进度”为核心维度，动态记录各项权利的保障情况：如医疗权利维度记录每次行为认知疗法、药物干预的效果；教育权利维度标注特教课程参与度与认知提升数据；受保护权维度追踪情绪失控次数、暴力行为改善情况，确保权利保护过程可追溯、可调整。

（二）机构安置：构建权利保障体系，落实精准服务

福利院在接收两名儿童后，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居住安置、医疗康复、教育支持三方面入手，构建起稳固的权利保障体系，弥补了前期的权利缺失[2]。

1. 居住安置：保障生存权，营造安全生活环境

结合两名儿童的医疗需求与自理能力，福利院先将他们安置到白云心理医院进行药物干预和康复训练，经评估改善后转回福利院“医疗康复融合班区”。该班区配备 24 小时护理人员和医疗应急设备，确保生存安全。随后进行精准化的生活照料，针对两人“随地大小便”和“需专人喂饭”的问题，制定了“生活技能阶梯培养计划”。该计划从定时提醒如厕、协助穿衣，逐步过渡到引导自主进食、简单整理个人物品，并每日记录饮食摄入量与营养搭配，避免因“囤食”导致的肠胃问题，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此外，还注重环境的人性化适应，班区布置采用暖色调装饰和软质家具，减少对儿童的感官刺激；设置专属“情绪安抚角”，配备熟悉的毛绒玩具等，帮助两人在情绪失控时自主调节，缓解因环境变更产生的焦虑，逐步建立安全感。

2. 医疗康复：保障受保护权，干预身心创伤

针对两名儿童的精神发育迟滞及创伤后行为问题，福利院联合院内精神科医师和外部心理治疗机构，制定了“医疗干预 + 心理创伤修复”的双轨方案。

在专业医疗干预方面，每月由福利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进行病情评估，并调整行为认知疗法方案。针对暴力行为和情绪波动，采用“正向行为支持疗法”，通过奖励机制引导替代行为（如用“抱抱小熊”替代“撞墙自残”）。近期评估显示，两人的自伤行为较入院时大幅减少，情绪失控频率从每日 3~4 次降至 1 次以内，甚至消失。

在创伤修复介入方面，社工运用“游戏治疗”和“叙事疗法”，通过角色扮演、绘画等方式，帮助两人表达对家暴和分离的恐惧。针对小云“想念母亲”的情感需求，社工通过“安全信件”活动，引导其以绘画形式向“理想中的母亲”表达感受，逐步修复情感依恋创伤，建立对成年人的信任。

3. 教育支持：保障受教育权，填补教育空白

考虑到两名儿童的智力残疾程度，福利院并未直接安排他们进入普通学校，而是依托院内的特殊教育学校，制定了“个别化教育计划”，以实现其教育权利的逐步回归。

一方面，福利院采用基础认知启蒙教育。特教老师以“生活化教学”为核心，通过识别水果、衣物等实物认知，以及“超市购物”情景模拟，提升小青和小云的认知能力。

另一方面，注重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福利院开设了“集体生活课”，引导两人学习与同龄儿童的互动规则，如轮流玩玩具、使用礼貌用语等。此外，通过“音乐小组”和“手工课”，发掘他们的兴趣和特长。经过一段时间的介入，两人在音乐活动中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度，已能跟唱多首儿歌（吐字仍不清），社会融入能力稳步提升。

（三）专业赋能：从“权利保障”到“能力发展”，激活发展权

在发展权保障方面，福利院通过社工的专业介入和资源链接，助力小青、小云提升自主能力，深挖发展潜力。

首先，实施行为干预与心理赋能。针对两人表现出的攻击行为和模仿性行为异常等问题，社工采取“个案管理 + 小组工作”的双模式介入策略。在个案管理中，运用“认知行为疗法（CBT）”，引导两人识别“情绪失控前兆”，并学习“深呼吸”“求助护工”等应对技巧。针对“抢食”行为，通过“食物分配游戏”培养“规则意识”，使其理解“按需获取”而非“争抢”，

从而逐步解决行为问题。在小组工作中，组织院内其他残疾儿童参与“同伴支持小组”，通过共同游戏和食物分享，提升小青、小云的社交能力。同时开展“自我肯定小组”，引导他们发现自身优点（如小云“会画画”、小青“能搭积木”），逐步建立自信心，减少因残疾导致的自我否定。

其次，推进资源链接与长期发展支持。福利院积极对接外部资源，为两名儿童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一方面，加强与慈善和社区资源的对接，针对两人高昂的医疗、护理费用问题，福利院联合B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所属街道，合力解决入院初期的医疗费用和24小时陪护费用，确保医疗及康复服务的及时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注重创造社会参与机会，邀请志愿者定期开展“绘本共读”“手工制作”等活动，拓宽两人的社会接触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等特殊节点，组织他们参与院内文艺表演，使其获得成就感与社会认可，全面激活其发展权。

三、保护路径的反思与优化建议

（一）社工“代言人”角色：填补儿童权利“失语”空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作为弱势群体，由于年龄幼小、认知能力有限，且缺乏家庭支持，往往无法主动表达自身权利诉求，陷入“权利失语”状态，也难以找到真正为其发声的“代言人”。在本案例中，社工秉持“以儿童权利为本位”的原则，主动承担起“代言人”角色，成为连接儿童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关键桥梁。从实地评估时为孩子的需求“建档立册”，到协调资源时为医疗、教育权利“据理力争”，再到个别化辅导时为孩子的心理需求“精准发声”，社工始终站在儿童立场，将抽象的“儿童权利”转化为具体的服务行动，使小青、小云的权益从“被忽视”走向“被保障”。这一实践表明，社工的“代言人”角色是破解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权利失语问题的核心力量，也是儿童权利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3]。

（二）多部门协作：以“儿童立场”凝聚共识，打破行政壁垒

在传统的儿童保护工作中，各行政部门往往依据自身职责范围独立运作，容易出现“各管一段、缺乏协同”的现象，甚至因“部门利益优先”而忽视儿童的实际需求。然而，在本案例中，社工通过构建“以儿童权利为本位”的协调议事机制，促使各部门跳出“自身利益”的局限，回归以儿童立场思考问题的轨道上[4]。例如，在协调医疗保障时，民政部门与医院不再仅仅关注政策规定和医疗成本，而是将焦点转向“孩子的治疗效果与康复需求”；在争取教育资源时，教育部门与特殊教育学校也不再仅考虑学位紧张问题，而是优先评估孩子的教育权利与发展潜力。这种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共识的协作模式，有效打破了行政壁垒，形成了“多部门联动、全链条保障”的工作合力，为儿童权利保护提供了高效的制度支撑。

（三）福利机构转型：从“被动等待”到“服务前置”，提升保护效能

以往，福利机构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救助往往处于“被动等待”状态，即需待儿童被认定、监护权被撤销后，才被动接收并提供照料服务[5]。这种模式常导致服务衔接滞后，错失儿童权益保护的最佳时机。然而，在本案例中，福利机构主动采取“服务前置”策略——在小青、小云仍处于社区干预阶段时，便提前介入，组织社工、医生等专业团队共同参与评估，深入了解孩子的权利缺失困境与需求；在接收儿童入院前，已制定完善的教育衔接、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配套计划，确保孩子入院后能迅速适应环境，实现服务的“无缝衔接”。这种“服务前置”的转型，不仅使福利机构的救助更具前瞻性与全面性，也让儿童在权益保护过程中少走“弯路”，有效提升了救助保护的效能，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保障。

四、结论

儿童权利的实现是困境儿童保护的核心目标，而福利机构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载体，在填补家庭监护缺失、保障儿童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G市社会福利院对小青、小云的保护实践表明，唯有秉持“儿童权利为本位”的理念，构建“社区协同评估、机构精准安置、专业赋能发展”的全链条路径，才能真正实现从“生存保障”到“权利实现”的跨越。

未来，福利机构需进一步推动转型发展，强化跨部门协作、完善长期支持体系、加强专业人才储备，使更多像小青、小云这样的困境儿童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与发展权，从而真正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文祥，马振铭，刘一锋．福利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递送的实现路径 [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5, 46(07): 90−97.

[2] 徐建中．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 努力为更多困境儿童服好务 [J]. 中国民政，2015(19): 10−13.

[3] 覃振模，殷一村．送养儿童继续安置在收养家庭：动因、理论与规范路径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5(03): 18−24.

[4] 梁海艳，陈金里．中国困境儿童收养制度调适与完善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5, 44(02): 12−19.

[5] 欧炜．困境儿童社会福利发展的困境与路径 [D]. 长春：吉林大学，2024.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福利院）

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影响机制研究

柳思宇 李 诺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内涵界定及其产生的背景，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在教师身上的体现，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教师道德认知、教育质量以及职业认同的影响；并从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中教师职业道德认知浅、教师行为不符合师德要求、教师的职业压力会影响教师的师德建设、幼儿园教师师德评价的不完善等方面分析现存问题，提出提升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认知、做好教师行为和师德要求的统一、缓解教师的职业压力、完善师德考核激励制度的师德建设对策。

关键词：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职业道德认知；教师行为

时代发展要求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随着时代发展新的教育理念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教师在幼儿成长过程中不仅扮演着传播知识的角色，还是幼儿德育思想和行为的启蒙老师，因此教师职业道德更是整个教师职业素养的核心要素，它影响着教育质量，进而影响着幼儿成长，但随着时代进步，教师职业“老的”职业道德范式也逐渐显示出不适应当下时代的需要，需要教师进行职业“新的”道德范式转型。教师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可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和师德修养。

基于此，在现有背景之下，本次研究拟从职业道德范式转型视角下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机理分析入手，探讨促进教师通过实现职业道德的范式转型，使得幼儿园教学中更加自觉践行职业道德、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问题。通过对职业道德范式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分析，寻求其对教育教学的启示及对未来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提升的有效策略。

一、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影响

随着当前的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也面临着新挑战。过去，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多是外部规范性力量的推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师德建设。这就意味着幼儿园教师需要遵照制定的行为规范。目前，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最大的挑战便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原生”而非“外在”机制的“规约”，也就是幼儿园教师不再是依循幼儿园外部力量或幼儿园自身的道德规范以及社会舆论的制约，而是由自身更为深刻的职业价值观、职业身份意识和行为意识所推动。

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迎来的机遇是在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将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的意义以及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更多专业挑战，从而自觉地遵循更高的道德要求。具体表现为道德力量的“内化”使得教师职业道德能够自觉地、自然地渗透于日常工作和教育生活之中，教师不仅仅按照外在行为规范从事教学、教育工作，而且有着内在职业道德的信念和责任，他们将自身的职业道德信念化、内化、制度化，从内心认同教育的天职与责任，并进而由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出道德选择引导教育工作，从而使教师的工作体现出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提升职业道德素质。教师对职业道德的认同与践行促使教师将职业道德融入自己教师生活，增强了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及责任感[1]。

（一）影响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关键机制分析

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关键机制涉及个体认知、教育环境、制度建设与集体文化等多层次因素。首先，教师的职业道德不仅源于外部规范的约束，更是内在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体现。教师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决定了其行为选择与道德判断，形成了内在驱动机制。其次，教育环境与社会文化在教师师德建设中起着深远的作用，良好的教育氛围能够促进教师道德认同的内化，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深化道德行为的实施。制度建设亦至关重要，完善的评估标准与激励机制能有效引导教师的职业道德行为，反之，缺乏合理制度支持则可能导致道德意识的弱化。最后，教师师德建设不仅是个体的努力，也依赖于集体合作与组织文化的共同作用。良好的组织文化能够通过教师间的相互激励与价值共识，推动道德行为的集体化，形成更为稳固的师德建设基础。

二、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认知的不足与偏差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认知的缺失和误识，是传统教育培养模式下对教师职业道德培养缺乏重视而导致的，缺乏正确认识其深厚内涵、范围和真正意义是主要原因。很多教师误认为“职业道德”就是严格要求孩子遵守课堂纪律、文明行为、教学行为标准与规范，却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教师职业道德是在幼儿园这个特殊环境里对儿童的行为习惯、心理和性格的塑造及其培养教师“德”和儿童“道”的责任，并以此为己任。这样一种对职业道德浅层片面的认识，使教师对在教学活动中产生的诸多道德问题、矛盾和冲突进行综合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道德决策将无所作为。尤其在教师长期承受严重工作压力的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认知还会变成“权宜性”与“形式”的标准要求，并缺乏“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化精神[2]。

（二）教师行为与师德要求脱节

当前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中常常出现部分教师行为与师德要求相脱离的现象，表现在教师的行为举止与师德认知不相适应。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行动中未能把师德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外部因素如园内过重的教学压力、幼儿园资源与物质供应问题，甚至学生家长的过分干预等，使得幼儿园教师在承担教育教学任务时“压力过大”，违反了自己内心应遵循的道德行为规范。教师职业道德的实际体现都是依靠教师的自觉遵守，而与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实际履行相呼应的制度缺失，容易导致一些幼儿园教师在面对较大压力时，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态度，忽略了教师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责任以及对教育不公的维护。

（三）教师职业压力对师德建设的负面影响

除了自身的内部工作压力因素，外部环境也不容忽视。幼儿园教师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要承受来自社会以及家长的关注压力，易将幼儿的学业成绩和教师的教学业绩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开展道德教育上，而是耗费大量的精力在如何向家长和学生传递学业压力上，甚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管理及应试教育中，致使教师在大量的教学任务以及与家长沟通交流中，产生职业倦怠感，在幼儿的认知与人格发育的塑造上缺乏应有的责任心。更有部分教师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丧失了从事职业的相关能力，影响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发展以及幼儿的道德认知培养与人格塑造。

（四）师德评估体系不完善

当前幼儿园教师师德评估体系的不完善，是制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师德评估往往侧重于对教师行为的外在评价，如课堂管理、学生纪律等，而忽视了对教师内在道德认知、职业责任感与教育情怀的综合评价。这种片面的评估体系导致教师在职业道德实践中，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符合规范，而非真正理解和履行教育的道德责任。缺乏多维度的师德评估，使得教师的道德行为得不到全面、客观的评价与反馈，无法有效激励其在实际工作中展现更高标准的职业道德[3]。同时，评价机制的单一性和不透明性也使得教师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压力，未能激发其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追求道德自觉与行为规范的动力，进而影响了整体师德建设的效果。

三、职业道德范式转型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升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认知

提升职业道德认知的环节主要是加强幼儿园教师对职业道德的理解及内化。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不仅是道德规范的遵守，还是教师基于学生身心的发展和教育的需要而体现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责任心，还体现了基于幼儿园发展、社会进步及孩子成长的责任认识。因此，提高幼儿园教师的道德认识，首先要对教师进行集中化的道德培训，增强幼儿园教师对师德的具体理解，即深刻理解幼儿园教师对学生身心发展负责、对教育公正公平负责、对幼儿园教育教学充满热爱等的重要意义。其次，幼儿园教师还要建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化的道德思维，如不同的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的伦理调整等。因此，教育管理部门要通过定期组织的职业道德培训、情境模拟等方式让教师在脑海中产生全面、立体的职业道德认知，在教育教学中能够有效践行职业道德要求，能自觉作出符合师德规范的行动。

（二）强化教师行为与师德标准一致性

促进教师行为与师德标准的一致性，是强化师德建设的实际意义。教师的行为受个人道德、社会文化和来自外界的权威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教师行为与师德标准的一致性应该从内外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方面，作为个体，教师需要自身产生内心对道德的认同感，作为教师道德产生的基础，亦是自身进行职业选择、行为选择的方式，将师德道德标准作为自身的道德标准，并内化为教师职业道德。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外部的督促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交谈、旁观者之间的评论、教师主体对自己工作产生的具体反思，教育部门都需要提供有效的方式来促使教师的道德自觉，使其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主动地去选择道德行为方式，保持道德标准的行为一致性。另一方面，外在的管理机制也是必要的[4]。借助明确的道德行为要求和教师的评介和监督机制，对外界范围内的人员施加压力，使教师意识到自身必须遵守师德道德标准，这一标准作为外在强制的要求，教师在具体的行为层面，其外部约束能力比较显著，内化为道德要求的效果会提升。这还要求制定的规范相对可操作，具体到教师教育教学行为、与学生交往、教师之间交往等具体方面的过程，

可以使得具体的规范能被执行。

（三）缓解教师职业压力

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大也是师德建设面临的“拦路虎”。教师尤其是幼儿园教师在面对过大的工作压力、扮演过多的角色的时候，极易造成其失去教育教学热情、偏移正确的师德观、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因此，缓解教师过重的职业压力也是加强师德建设的突破之策。具体来说，教师的管理层可以针对教学活动的开展，科学规划教师教学工作任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少过多的行政职责，杜绝无关教学工作的烦琐事务，从而减少教师压力，提高教学成效；对教师进行心理疏导，辅导教师提升职业价值，开拓就业前景，给予一定社会认同，缓解教师身心压力，重建教师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在相对较小的压力环境下，钻研教学工作，主动选择更加严格的职业道德作为基本准则[5]。

（四）完善师德评价与激励机制

完善的教师师德考核激励机制对于教师师德建设的展开至关重要。由于多数师德评价机制存在一种简单的、形式化的评价体系现状，忽视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多元性，故建立一种科学、全面且可操作性强的教师师德评价机制是进一步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基础。这种师德评价机制，一方面需要涵盖教师的教学业务、师德行为表现、学生反馈及同事间评价等多个因素，以保障师德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及有效性；另一方面师德评价的结果与奖励的机制挂钩，以一定的物质奖励与道德行为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舞教师持续重视职业道德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能促进其对教师职业道德的长期追求，还能增强教师职业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成就感。教育主管部门应以教师师德评价机制为基础，结合教师个体师德行为，对学生所反映的教师职业道德认知能力和践行能力情况及时反馈，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奖励或培训等，不断完善教师职业道德培育机制及激励机制体系[6]。

四、结语

事实上，教师师德建设的根本，必然要依靠教育管理者政策的支持、教师的个体自觉和相应社会文化的影响。未来教育改革进程中，职业道德范式改革必将为教师的职业建设与发展、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在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之下，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可持续地推进，必将为孩子创造更多、更好的成长与发展机会。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单向塑造过程，而是一个由制度规范、价值认同、实践反思与文化浸润共同构成的长期发展过程。只有将外在制度要求转化为教师内在的职业信念，将道德规范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具体行动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师德建设由“被动遵循”向“主动坚守”、由“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的转变。

在职业道德范式持续转型的背景下，幼儿园教师师德建设应更加突出专业性、人本性与时代性。一方面，要立足学前教育工作的特殊性，突出教师在儿童成长启蒙阶段的价值引领作用，使师德建设与保教实践、教师发展、园所文化建设形成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也要顺应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师德培育、考核、监督与激励机制，构建更加系统、科学、长效的师德建设路径。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增强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其以更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境界投入教育实践，为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丹 . 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方法探析 [J]. 新课程教学 (电子版), 2025(02): 165−167.

[2] 殷静怡 . 构建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J]. 好家长 , 2024(34): 14−15.

[3] 彭绘颖 . 幼儿园教师职业核心能力研究 [D]. 信阳 : 信阳师范大学 , 2024.

[4] 庞益 , 陈怡然 , 李树桐 .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提升路径 [J]. 新课程教学 (电子版), 2024(04): 36−38.

[5] 王秀丽 .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师德培养的问题与对策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 2024, 43(01): 76−79.

[6] 卢艳 . 农村幼儿园师德建设的实践探索 [J]. 早期教育 , 2023(48): 30−3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吉林省中小学教学研究会“基于职业道德范式转型的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系统构建研究”（YJKT2025−1378）。

（作者单位：长春人文学院儿童福祉学院）

基于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模式的社区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深化研究

杨福彪 崔 岩 徐西林 周金砚 何一诺

摘要：为探索中医药融入社区医养结合的有效路径，本研究以哈尔滨市6个代表性社区为调研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650名老年人）与深度访谈法（40名相关人员），系统分析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的供需矛盾与核心问题。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利用率偏低（仅23.1%接受体质辨识），但需求强烈（超85%需要中医食疗等服务），现存服务零散、职责模糊、资源短缺、标准缺失四大瓶颈。基于此，构建“一个中心、两个结合、四个体系”的“一二四”服务模式及配套《管理流程与指南》。该模式创新性整合“防—治—康—养—护”全链条服务，为社区中医药医养结合的规范化发展提供区域性实证依据与操作范式，对完善健康老龄化服务体系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医药；医养结合；社区养老；健康服务；管理模式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截至2024年末，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亿人，占15.6%[1]。老年群体面临多病共存、健康管理难度大的挑战，对高质量养老服务需求激增。《“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发展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强化中医药与养老服务衔接，推进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向农村、社区、家庭下沉。”[2]《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发挥中医药在老年人慢性病、重大疑难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和优势，增加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建成老年医学中医药高地。”[3]为中医药参与社区养老提供了政策导向。

当前社区医养结合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医养机构协作不畅，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硬整合”不足；二是中医药在社区医养结合中的“软实力”未能充分发挥，服务零散且无完整体系；三是管理缺乏统一标准与指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健康养老需求[4]。

（二）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于以下关键问题：社区老年人对中医药服务的真实需求究竟是什么？当前中医药服务在社区医养结合中的现状如何？如何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模式，并实现对其有效管理？

（三）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通过“实证调研＋模式构建”的路径，可以填补“中医药与社区医养结合”领域“理论探讨多、实证研究少”的研究空白，丰富医养结合模式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完善医养结合模式“重框架、轻管理”的缺陷，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深入剖析社区老年人的需求与现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医药在社区医养结合中的作用机制和价值。

在实践应用方面，本研究构建的“一二四”模式及配套指南，可直接指导哈尔滨市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开展：一方面帮助社区明确服务内容、流程与资源配置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为黑龙江省政府制定中医药养老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且模式可向东北同类老龄化城市复制推广，切实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全面深入调研社区老年人对中医药医疗服务需求现状[5]，探索目前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理疗等各类服务的需求程度、期望内容和服务方式偏好，以及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的环境因素。

2. 精准诊断当前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瓶颈，如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管理机制的有效性等。

3. 基于调研信息搭建科学适宜且落地性强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框架并细致规划配套执行方案，清晰界定服务范畴、环节、参与方及各自职责。

4. 编制完善《社区老年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管理流程与指南》并通过实际应用检验其科学价值与实

用性能，为服务规范化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哈尔滨市6个在地理位置分布、人口构成及经济发展程度上各有差异的典型社区为调研对象，保障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代表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650名老年人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23份，有效回收率95.8%。问卷涵盖老年人基本情况、健康状态、对中医药服务的认知程度、实际需求及使用频次等内容；对社区卫生服务站、养老机构等相关医养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及部分社区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总人数40人，深入掌握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实际情形、现存问题及改进建议。

（三）数据分析方法

借助SPSS 27.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明晰样本基本特征及各变量分布规律、相关性分析以探究不同因素间的关联强度、差异性检验，以判断不同老年群体在中医药服务需求与认知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差异；针对深度访谈资料采用主题分析方法，对访谈记录逐句梳理分析，提炼核心主题与关键观点，挖掘深层信息与潜在问题。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样本概况

本次调查的650名老年人中男性占48.3%、女性占51.7%，平均年龄72.4岁，其中60~69岁群体占35.2%、70~79岁群体占42.8%、80岁及以上群体占22.0%；85.5%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且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的患病比例与患病种类均呈上升态势。

（二）中医药服务供需现状

1. 服务使用频率低：调研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仅23.1%的老年人接受过中医体质辨识服务、30.6%体验过中医康复理疗服务、26.8%进行过中药调理，老年人使用中医药服务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不了解服务内容与价值（占45.3%）、获取服务不够便捷（占32.7%）、担忧费用过高（占12.6%）等。

2. 服务需求程度高：老年人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十分迫切，超过85%的老年人对中医食疗药膳指导、中医健康宣讲、中医康复训练等服务有较高期待，其中中医食疗药膳指导的需求率高达90.2%（老年人普遍认为合理的食疗药膳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预防疾病发生），中医健康宣讲的需求率为87.6%（他们希望通过宣讲学习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与疾病防治技巧）。

（三）核心问题剖析

1. 服务呈现碎片化：当前社区中医药服务缺乏系统规划且各项服务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处于零散分布状态，中医诊疗、养生保健、康复理疗等服务各自独立开展，未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难以满足老年人全面、持续的健康需求。

2. 职责划分不清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等在提供中医药服务时未明确各自职责边界，存在服务重叠或空白区域导致服务效率降低、资源浪费严重，老年人转诊过程中因缺乏明确的流程规范与协调机制，经常出现衔接不顺畅的问题。

3. 资源供给不足：专业中医药人才短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中具备中医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员数量有限且部分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中医药服务设备与设施不完善，如中医康复理疗设备陈旧、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康复需求。

4. 服务标准缺失：目前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与质量评价规范，不同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差异较大，无法保障老年人享受到规范化、标准化的服务，且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管机制导致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把控。

四、模式构建：“一二四”模式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构建以“一个中心、两个结合、四个体系”为核心的“一二四”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其中，“一个中心”指以老年人为中心；“两个结合”指医养结合与中西结合；“四个体系”包括服务内容体系、流程管理体系、资源配置体系与质量控制体系。该模式强调以老年人为核心，推动医疗、养老、中医药、社区、家庭等多方资源协同，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高质量的健康养老服务。

（一）服务内容体系

本模式提供“防—治—康—养—护”“五位一体”服务包，满足老年人不同阶段的健康需求：

1 防：通过中医体质辨识（将体质分为9种类型）、健康评估、养生知识宣传，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养生方案（饮食、运动、情志调节），预防疾病。

2. 治：由中西医结合医疗团队为患病老年人诊疗，发挥中医药（中药、针灸、推拿）与西医技术优势，提高治疗效果。

3. 康：为慢性病及病后康复老年人提供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蒸等中医康复理疗，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恢复身体功能。

4. 养：提供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运动指导，以及中医情志调节、中药茶饮、药膳食疗服务，帮助老年人调节身心、增强体质。

5. 护：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助餐、助浴等）与基础护理，定期健康监测与护理指导，保障其健康与生活质量。

（二）流程管理体系

建立“需求评估—方案制定—服务供给—效果评估—动态优化”闭环管理流程，确保服务精准有效。

1. 需求评估：老年人入住或接受服务前，专业评估团队用标准化工具评估其身体状况、健康需求、自理能力、心理状态，为后续服务提供依据。

2. 方案制定：根据需求评估结果，由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团队、康复治疗师、护理人员、营养师等组成的服务团队，为每位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和服务人员等。

3. 服务供给：各专业人员依据服务方案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健康服务，在服务实施过程中重视质量与安全保障，确保老年人获得及时、有效的照料。

4. 效果评估：定期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服务满意程度等进行评估，采用客观评价指标与方法对服务效果进行量化分析，掌握服务方案的实施成效与存在不足。

5. 动态优化：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服务方案，强化有效服务项目，改进存在问题的项目，满足老年人不断变化的需求。

（三）资源配置体系

1. 人力配置：构建“全科医生 + 中医师 + 护理员 + 社工”多学科服务团队，明确各成员职责（如全科医生负责日常医疗，中医师提供中医服务等）；加强团队培训与继续教育，提升专业素质。

2. 物力配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院标配“中医角”，配备针灸针、推拿床等中医诊疗与康复设备；设立中医康复室、养生室，营造舒适服务环境。

3. 财力配置：建立“医保 + 补贴 + 社会 + 个人”多元化筹资机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药服务纳入医保，政府加大补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引导个人合理承担费用。

五、预期成果与政策建议

（一）预期成果

1. 构建一套兼具创新性与实践价值的“一二四”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理论模型，为后续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2. 编制一份详细、实用的《社区老年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管理流程与指南》，为服务机构的日常运营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

3. 撰写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在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发表，分享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政策建议

1. 强化部门协作：组建由卫生健康、民政、医保、财政等多部门参与的专项工作小组，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以统筹推进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服务落地实施。

2. 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在中医药院校与职业院校增设老年医学、中医养老护理等相关专业，优化课程设置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人才，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提高人才待遇水平以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

3. 加快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完善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地方标准与行业规范，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人员资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6]，加强对标准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保障服务质量与安全。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系统实证调研揭示社区老年人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广泛且强烈需求与当前服务供给不足、碎片化现状之间的突出矛盾，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一二四”中医药特色社区医养结合健康服务模式兼具重要理论创新意义与较强实践指导价值，系统解答“提供何种服务、谁来提供服务、如何提供服务、如何保障服务质量”等关键问题，为破解当前社区医养结合发展难题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区域实践范例。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样本主要来源于哈尔滨市，所以结论在全国范围内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验证，模式的长期成效也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评估。未来研究可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模式验证工作，进一步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与管理水平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 2024 年全国人口总量降幅收窄 人口素质持续提升 [EB/OL]. (2025-01-17)[2026-05-11].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5/2025_sjjd/202501/t20250127_1958518.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2〕5 号 [EB/OL]. (2022-03-29) [2026-04-07].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29/content_5682255.htm.

[3] 国务院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3 号 [EB/OL]. (2023-02-28) [2026-04-07].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02/28/content_5743680.htm.

[4] 郑寒芝 . 成都市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需现状及对策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 2024.

[5] 田真 . 供需视角下的中医药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研究 [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 , 2019.

[6] 霍小龙 . 河北省“医养结合”模式优化及政府支持策略研究 [J]. 经济论坛 , 2017(11): 7-1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课题“基于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模式的社区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深化研究”（ZHY2025-004）。

（作者：杨福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主任医师；崔岩，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高级经济师；徐西林，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周金砚，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师；何一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师）

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青州 W 村的田野调查

李晓琪 窦一岚 逯海勇 *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与乡村空心化交织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农村养老服务陷入“各自为政”的困境，二者协同发展是破解双重难题的关键。本文立足文化自觉与统合型治理理论，结合二者内在关联及实践特征，辨析其协同发展理论逻辑并构建实践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二者协同发展可聚焦于空间载体、文化传承、主体参与及服务供给四大维度，据此提出以文化自觉为价值内核、统合治理为实践支撑、“保护—养老—传承”为核心目标的理论认知。实践层面，以四大维度协同优化为抓手，构建多维融合路径：通过盘活存量资源与优化服务布局激活空间载体，促进地域文化活态传承与养老场景深度融合以增强文化赋能，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以汇聚治理合力、激发内生动力，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完善服务供给、实现全方位覆盖。研究可为二者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传统村落保护；互助式养老；文化自觉；统合型治理

一、问题提出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保护工作与养老服务均面临现实挑战，为此，国家已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性框架来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自 2012 年实施保护工程至 2025 年，全国已有 8155 个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并完成挂牌，在政策上先后出台了指导意见，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其列为重点任务，2023 年启动《传统村落条例》立法并于 2025 年形成正式草案；同时，通过建设数字博物馆实现基础信息全覆盖，显著提升了保护工作的数字化支撑能力。在农村养老服务方面，2022 年制定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突出农村服务供给，创新提出“传统村落养老服务设施配套行动”，鼓励利用闲置民居、祠堂等改造为互助养老设施。现有研究虽涉及互助养老、村落保护等维度，但存在视角局限、资源整合意识不足等问题，尤其缺乏将二者有机融合的研究，以及在文化传承、社区参与、村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与路径探索。

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持续健全老有所养的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优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政策体系 [1]，精准对接多元养老需求，让老龄人口更充分、更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表明，2025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其中高龄老年人口超过 4500 万人，独居及空巢老人数量将增加到 1.8 亿，老年抚养比将上涨到 33.5%。农村地区老龄化现象更为严重，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29.7%，部分传统村落集中区域甚至超过 40%，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格外突出。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中青年涌入城市，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而农村养老机构普遍存在供给不足、服务水平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高龄、失能老人的专业化照护需求。我国虽已初步建立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互助式养老模式在农村推广，但城乡二元社保不完善、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传统村落保护与养老建设缺乏统筹 [2]，导致诸多难题出现。当前农村存在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慢与居家养老需求大、村落空间闲置与养老设施不足、文化传承断裂与老年精神需求不符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学者提出传统村落保护与农村养老融合是应对挑战的战略选择 [3]，也有研究建议借鉴国际经验 [4]，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缺乏文化自觉视角下的深层剖析和二者有机联系的构建。

本文运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以及案例研究法，开展对传统村落保护和农村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及实践模式的全面探究，以实现为相关政策制定

提供实证依据的目标。研究成果显示，这种协同发展模式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创新性理念和可行性计划，还有利于应对当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遭遇的双重困境，最终达成文化遗产保护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的双赢局面。

二、理论溯源及分析框架

（一）理论溯源

1. 文化自觉理论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着重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要有深刻的认知并主动建构[5]，包含本土文化系统认知、文化传统动态传承、文化要素创新转化三个维度，为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弥补了传统村落保护重物质轻文化活态传承、互助式养老重物质照料轻精神关怀的实践缺陷。

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互助式养老模式存在显著协同效应：互助养老网络依托乡村地缘亲缘形成的社会信任与情感纽带，为文化活态传承提供理想载体；村落丰富的文化资源则能弥补养老服务精神文化供给的不足。二者形成“文化—养老” 互构关系：培育村民文化主体意识，能推动其参与村落文化保护与互助养老实践；将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养老服务要素，可让老年群体在文化传承中获得精神慰藉，以养老需求驱动村落空间与资源活化利用，实现文化保护与养老服务的良性循环。

2. 统合型治理理论

统合型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资源整合优化配置，以及功能融合互促共生这三大要素[6]，能有效打破传统治理 “碎片化” 困境，构建目标协同、权责明确、资源互补、行动协调的新型治理体系。该理论聚焦公共服务供给的外源支持不足与内生动力匮乏问题，强调以治理目标为导向，通过制度机制整合分散资源与力量，形成协同合力。

统合型治理理论为二者协同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其核心价值在于发挥二者资源禀赋与主体构成的天然互补性：传统村落拥有可转化的空间、文化及经济资源，互助式养老亟须基础设施、照护服务与精神慰藉等供给，二者均涉及政府、村集体、社会团体、村民等多元主体，缺乏协同机制易导致资源错配、治理碎片化。本研究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枢纽的统合型治理框架，明确各主体权责，整合村落资源与养老需求，打造 “文化保护—养老服务—传统传承” 三位一体复合治理体系，推动二者从形式结合迈向实质性系统融合。

（二）分析框架

鉴于文化自觉理论与统合型治理理论的交叉融合，本文创新性构建“协同统合式”分析框架，借此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中的资源碎片化、目标冲突、动力匮乏、机制缺位等关键问题（见图 1）。框架围绕“目标—维度—主体 —机制”四维结构展开，各维度相对独立又有机联动：目标维度以文化自觉为价值基础，确立文化传承与养老保障双重目标，依托统合型治理实现目标均衡发展；维度层面运用统合型治理资源整合原理，推动村落空间、文化、经济要素与养老设施、服务、人文关怀有机衔接；主体层面基于多元共治原则，明确各主体职能，通过文化自觉激发村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协同参与网络；机制层面依托理论融合，设计文化价值转化、资源优化配置、主体协同互动、动态调整完善的复合型运行机制。

该框架打破传统单维度分析范式，将文化自觉理论作为价值内核，为协同发展提供文化认同的内生动力。统合型治理理论构建制度化运行机制，为协同推进提供系统性保障。该框架在理论上阐释了二者从割裂到融合的演进逻辑，也为后续实践路径的设计奠定了分析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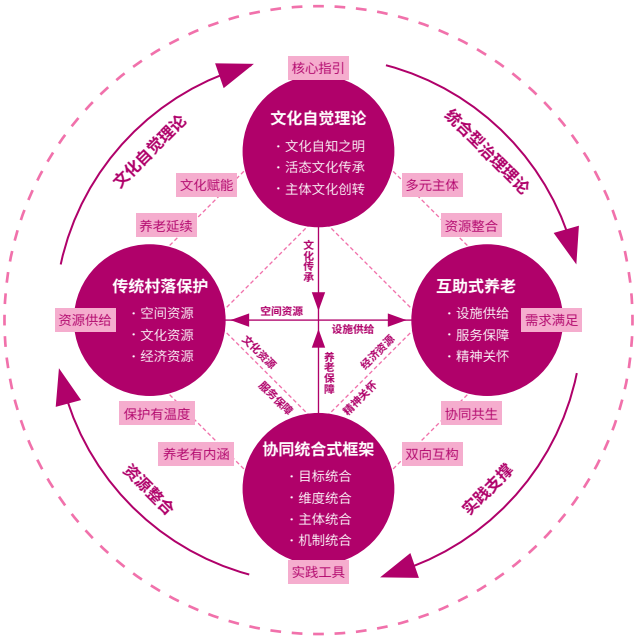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W 村位于山东省青州市西南部，是鲁中山区边缘典型传统村落，2015 年入选省级传统村落名录，荣获“潍坊市 2A 级景区化村庄”“山东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等称号。该村现有 310 户、户籍人口 980 人，老年人口占比超 35%，留存 50 多座明清传统石砌民居，整体格局完整。选取 W 村为研究对象，源于其典型性与可复制性：该村较早尝试在传统建筑保护、文化传承中融入互助养老，初步形成“遗产保护 + 养老服务”协同路径，同时保留传统村落共性特征，早期侧重物质

空间保护，养老服务零散，二者缺乏系统衔接。2020年以来，在镇政府引导下，该村通过资源整合、创新“文化嵌入养老”模式，实现从单一发展向多元协同转型，发展路径贴合多数传统村落转型趋势，具有重要研究与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与案例研究法，对村落空间形态、文化特性及养老实践进行整体性考察。资料收集采用多元化方式：开展两阶段实地调研，测绘记录村落空间格局、传统民居存况与适老设施配置，观察保护与养老的协同过程，形成150余份现场影像实证。系统整合村落保护规划、养老服务档案、村务记录、政策文件及统计数据等文献资料，同时梳理学术文献，完善理论框架。本研究聚焦跨地域的协同发展议题，通过个案分析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相关领域提供方法论参考。

四、W村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农村养老服务协同发展，已成为破解乡村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双重困境的关键。青州W村既留存50余处具有文化价值的明清石砌民居，又面临老年人口占比超35%的养老压力。该村早期通过“外部主导、项目驱动”开展建筑修缮与养老设施建设，但因缺乏文化内涵融入与内生动力激活，未能实现二者深度融合。本文依托文化自觉理论，采用“协同统合式”分析框架，从空间活化、文化赋能、互助聚力、医养融合四方面构建内生驱动型协同发展机制，推动村落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养老服务从“零散互助”向“系统保障”转变（见图2）。

（一）空间活化：筑牢“老有所依”的物质根基

空间环境作为协同发展的物质载体，亟须突破“重保护轻利用”与“重建设轻适配”的传统思维局限。W村可凭借传统石砌民居的适应性改造为切入点，通过建筑功能重构、公共空间提质以及适老化设施整合等策略，推动物质空间从“静态保护”向“活化利用”转型，使村落空间既能够传承历史记忆，又能满足老年群体现代生活需求。

其一，精准施策推进民居功能协同转型，实现保护与养老的集约利用。调研W村内50余处明清石砌民居的保存状态和闲置情况，改造过程采用差异化策略，挑选布局集中、结构完好的闲置民居，保留原有传统风貌，额外增设适老化设施，改造后可容纳互助食堂、日间照料、老年活动等多项功能，成为综合性服务空间。

其二，优化机理构建便捷服务圈，强化空间与体验双向协同适配。优化传统村落空间肌理，系统升级基础设施：拓宽村内巷道，扩大通行空间，路面更换防滑材料，添加适配老年群体使用的扶手，修建环形慢行步道网络，让普惠养老服务可覆盖更多区域。将养老服务设施接入居民日常生活区域，搭建覆盖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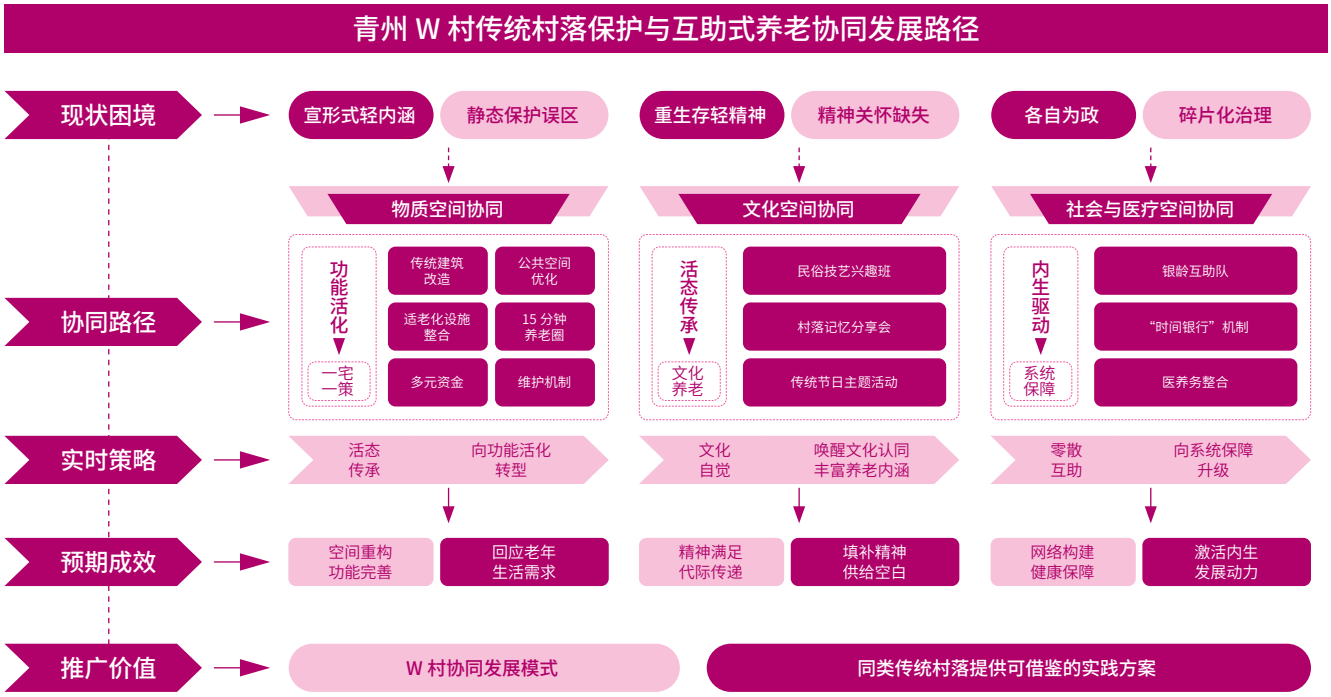


图2 青州W村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路径

为 15 分钟路程的养老服务网络[7]，这一调整可提高老年人在出行过程中的安全度，也能让老年人更快捷地获得医疗服务，让物质空间环境和养老服务需求与旅游产业形成联动发展。

其三，构建系统化保障体系，摆脱改造困境。W 村民居整体保存完整，改造投入成本偏低，村内老年人口占比偏高，改造过程可获得多个主体支持，村集体此前进行的试点已经夯实组织基础，围绕资金、产权、设施维护等方面调整，创新多元融资模式，由村集体主导整合分散存在的产权，建立村集体统一管理和志愿服务补充的维护机制，保障改造工作长期推进。

（二）文化赋能：丰富“老有所乐”的精神内涵

W 村留存古驿道这类历史遗迹，建成 4000 余平方米主题墙绘，建起乡村记忆馆、文化书房，文化养老的基础由此奠定，依托现有条件，开发文化资源，建立运行机制，营造文化氛围，可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

首先，深挖地域文化资源，筑牢文化养老内核。召集老艺人、退休教师和高龄长者，组成文化挖掘小组，整理传统叙事，充实《村落文化读本》内容，拟定《敬老公约》，将地域文化融入敬老理念，把民俗资源转化为可供公众参与的养老服务项目，开设“民俗技艺”课程，举办村落记忆交流活动，推动文化代际传承与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其次，构建“日常 + 节庆”双轨运行机制，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养老。日常运营阶段，可依托乡村文化书房开设“书法绘画”“智能设备运用”“健康管理”等课程，培育老年文艺团体，联动村域已有的研学旅游资源；在节庆期间，可结合传统节庆组织民俗技艺传承活动，依托庙会策划民俗展演和老年才艺展示，扩大乡村文化的辐射范围。

最后，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强化空间精神赋能。养老服务点公共墙体等区域，可采用彩绘浮雕等形式，呈现村落历史民俗文化、敬老相关事迹，调整乡村记忆馆展品摆放结构，建立文化认同场景，整合村广播公告栏新媒体平台，开展主题相关宣传，依托乡村书房开办专题讲座，推出民俗展演，借助网络直播拓展传播范围，强化村民文化认同[8]。

（三）互助聚力：激活“老有所为”的社会动能

借助 W 村地缘位置邻近和亲缘联结的天然条件，整合乡村文旅企业和民间文艺团体等各类组织资源，以文化自觉理念为方向，搭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助网络，唤起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动力[9]。

一是凝聚不同参与主体，搭建协同联动的互助网络。政府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扩大养老服务购买的范围，吸引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模式，安排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由党员带动普通群众，依托邻里关系进行互助。组建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对接返乡青年、村医、留守妇女，引入外部专业力量，提升服务专业水平。

二是健全闭环机制，保障互助服务规范可持续。按分级分类要求，分别建立服务培训、服务落地、效果评定各项制度，梳理需求对接、服务落地、监督评定各环节，搭建完整闭环管理路径，为老年群体建立“一人一档”数据库，精准匹配需求和供给，为参与服务的老年人制定专属方案，抽调不同领域人员组成联合监督小组，按固定周期进行服务评定，规范服务流程。

三是营造互助氛围，重塑协同共治的社区关系。从互助养老切入，搭建起邻里之间的互助网络，消除社交方面的阻碍，重构社区信任及集体认同，搭建村民互动平台，调整议事规则，培育志愿服务队伍，建立“低龄帮高龄、邻里互帮扶”的运行机制，强化村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让互助养老和乡村振兴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共同推进。

（四）医养结合：夯实“老有所养”的健康保障

当前医养服务相互割裂，健康管理呈现分散状态，这一现实矛盾仍未解决。本研究选取 W 村作为实证分析对象，调整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建立覆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的整合型医养服务模式[10]，让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实现衔接融合。

其一，夯实本土医疗基础，筑牢医养协同的硬件根基。W 村卫生室配置常规诊断工具、便携式心电图监测设备、急救药品，可完成基础检验、提供初步康复服务，卫生室内部划分出独立功能区，储备针对老年常见病的药品，依托规范管理保障用药安全。

其二，整合内外医疗资源，搭建多层级协同服务网络。W 村交通条件较好，可依托这一优势，将村域范围内分散的医疗资源梳理合并，同时对接外部专业医疗力量，联合乡镇卫生院、县级医疗机构搭建急诊急救快速响应通道，完成远程会诊和预约诊疗各环节的衔接，无流程断点，同时覆盖研学旅游群体的基础医疗需求，最终形成医疗养老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其三，健全服务机制，深化场景融合营造友好环境。为每位老人建立个性化健康档案，按固定周期收集生理指标数据，完成健康评估，搭配用药指导类服务，邀请医疗专家开设健康讲座，帮助老人掌握自主健康管理相关知识，把医疗服务融入现有文化养老项目，让医疗服务融入文化娱乐邻里互助等各类养老场景。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基于文化自觉理论框架，本研究以青州 W 村为田野调查对象，依托文化自觉与统合型治理理论，剖析了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的协同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文化自觉通过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传承责任，实现了从外源驱动向内源发展的动力转换，提升了基层参与的积极性。W 村通过构建物质空间适老

化、文化空间活态化、社会空间互助化的三维协同体系，有效化解了“空心化—养老困境—文化断层”的连锁问题。统合型治理模式依托目标协同、维度整合、主体联动、机制创新，解决了外部支持碎片化与内生动力匮乏的结构性矛盾。W 村在建筑功能更新、文化资源适老化运用、互助网络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建立了“保护—养老—传承”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同类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经验[11]。

（二）讨论

尽管 W 村在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结构性挑战。资金保障方面，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的单一模式难以为继，需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体系，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公益捐赠等拓宽渠道并建立造血机制，完善志愿服务激励与设施维护长效机制[12]。文化传承面临代际断层问题，青年参与意愿低，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适配不足，亟待创新传承方式吸引青年参与。数字化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需明晰功能定位，整合力量打造可持续服务网络。当前数字技术在相关领域的潜力未充分发挥，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协同模式升级。未来，需通过培育文化认同、创新参与机制、完善政策体系，实现二者深度融合，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发展新范式。

参考文献

[1] 石智刚，周莉莉．以社区为依托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整体性治理视角 [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3(05): 72−77.

[2] 刘晓梅，乌晓琳．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经验与政策指向 [J]. 江汉论坛，2018(01): 46−50.

[3] 李跃亮，鲁可荣．传统村落保护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协同发展效应及路径分析——以浙江三村为例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3): 158−165.

[4] 张俊峰，李金鑫．传统村落适老化改造策略研究 [J]. 安徽建筑，2022, 29(03): 22−23, 80.

[5]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3): 15−22, 158.

[6] 张丹丹．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20(05): 17−24.

[7] 孟荣芳．积极老龄化战略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4, 43(04): 33−43.

[8]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J]. 思想战线，2004(02): 1−6.

[9] 肖琳，夏柱智，黄佳琦．互助养老：农村内生型老年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的实践路径 [J]. 理论月刊，2023(06): 131−140.

[10] 邢洪涛．基于适老化需求的苏北传统村落康养景观设计研究 [J].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24(01): 42−46.

[11] 刘妮娜．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18(01): 121−131.

[12] 屈振辉，彭利娜，谭乐珅．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的需求、模式与优化路径 [J].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2026, 38(01): 66−7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传统村落保护与互助式养老协同发展路径设计研究——以青州王家辇村为例”（202510434016）；2024 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旅游场域下山东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赋能路径研究”（24CLYJ21）。

（作者：李晓琪、窦一岚，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通信作者逯海勇，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艺术健康视角下社会美育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研究

陈媛骅

摘要：该研究基于艺术健康视角，探讨社会美育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探讨了艺术创作活动作为老年人调节情绪的媒介，增强其认知能力，并在完成作品时有助于自我认同的作用，同时艺术活动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功能。进而提出四条实践路径：通过材料触摸互动触发情绪疗愈，设计小组合作项目促进社交，构建“基础技法—主题创作—成果阐释”渐进模式以提升老年人自我认同，选用美术馆、社区等非医疗环境营造舒适氛围吸引老年人参与。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美育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价值的认识，并为相关实践提供方法借鉴。

关键词：艺术健康；社会美育；老年人心理健康

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预计2035年该群体将突破4亿人，占比超30%，社会将进入重度老龄化。进而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关注。本文基于艺术健康视角，探讨社会美育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总结实践路径，为相关活动提供方法借鉴。

一、艺术健康视角下的老年人社会美育活动

当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精神需求逐渐超越物质保障，呈现“幸福发展悖论”[1]713。在基本温饱解决后，老年人更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单纯的经济改善已难以支撑其幸福感。其次是社会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落差与价值感缺失。退休导致长期承担的职责、身份及社交网络骤然丧失，形成“角色剥离”，引发失落感与自我价值困境[1]715。最后是老年人心理抑郁问题隐蔽性强，社会关注与干预不足。老年人抑郁常表现为躯体不适、兴趣减退等非典型症状，易被忽视。《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老年群体抑郁症检出率超半数，多数患者未获及时干预，反映出社会与家庭对其心理健康的普遍忽略。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社会美育，为老年人提供情感表达、社交连接、价值重塑和精神滋养平台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这也是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一条富有潜力且重要的途径。

近年来，“艺术健康”等新概念为社会美育提供新视角。“艺术健康”理念由世界卫生组织系统化推动，核心在于通过艺术活动预防心理问题、增进全民福祉。“艺术健康”与针对病后治疗的“艺术治疗”不同，更强调预防优先，面向未发病群体提前干预[2]，与我国中医“治未病”思想相契合。那么艺术健康视角下的社会美育活动应具有哪些特点呢？首先，核心功能在于心理疾病预防，关注尚未出现病症的老年群体，发挥预防性作用；其次，不具备临床治疗性质，不面向已确诊为严重心理疾病的患者，而是在社区、文化馆等非医疗环境中，通过多样化艺术体验活动维护日常心理健康。

二、社会美育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

艺术健康视角下的社会美育活动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一是艺术创作能作为老年人调节情绪的媒介，二是艺术实践活动能增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三是参与艺术活动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

（一）艺术创作能作为老年人调节情绪的媒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的研究表明，在卫生保健和社区环境中运用艺术媒介开展活动，能为健康带来多重益处。艺术活动独特的非语言表达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宣泄与自我调节途径。从神经学层面看，参与艺术活动能有效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3]，帮助老年人获得愉悦感和放松感，从而有效降低抑郁风险。

以社会美育中的陶泥活动为例，其参与过程对老年人具有独特的包容性：老年人无须受制于环境文化或认知局限等客观因素，只需通过双手触摸泥土、感知其质地，即可实现身心互动，将内在的情感灵活、多变地进行具象化表达，且陶泥的柔韧性与可塑性特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这种触觉体验能有效激活大脑皮质的触觉神经，进而促进边缘系统的情绪调节功能。当老年人揉捏、塑造陶泥时，

其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显著下降，从而有效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4]。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老年人与手工材料之间形成的“物化情感”连接，通过将难以言说的心理压力与复杂思想转化为可视化的艺术符号，陶泥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了一条实现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的部分社区实践中，针对失独老人所开展的自助式国画学习活动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参与的老年人普遍反馈，参加国画小组的活动后，其内心深处的部分负面情绪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5]。此类活动在改善老年人的生理症状、调节情绪体验、提升认知能力及增强生活意义感等方面均显现出积极作用[6]。艺术创作本身作为有效的“疗效因子”，为老年人的情绪表达提供了重要渠道。可见，社会美育中的艺术创作活动是能作为老年人调节情绪的重要媒介的。

（二）艺术实践活动能增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且专注力愈发不足并伴随精神不振、记忆力减退等问题。在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所引发的诸多病症中，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尤为突出[7]，其典型症状是记忆衰退与情绪剧烈波动，这与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损害密切相关[8]。正如 Susan Kay Nolen-Hoeksema 指出的，专注力缺陷易导致个体反复陷入负性思维循环，加剧抑郁。而在艺术活动中所形成的高度的专注力，恰恰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实现情绪转移和认知能力的提升。

心理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在其著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心流”概念。它描述了个体在强大内驱力的推动下，进行高度专注活动时所达到的状态。在这种全情投入的状态中，个体能够将自身才能与天赋发挥到极限，并体验到一种“忘我”的、充满能量且精神高度满足的感受。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对 50 位老年刺绣爱好者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 98% 的老年人在刺绣过程中达到了“心流”状态[9]118。这印证了其理论：在艺术活动中设定明确目标，能使老年人在完成每个动作后获得积极反馈，从而有效引导参与者集中注意力，潜意识进入愉悦状态[10]。可见，美育活动不仅能引导老年人进入高度专注的“心流”状态，而且能显著提升其专注力、转移负性情绪，是一种延缓老年人认知衰退、增强心理韧性的重要方式（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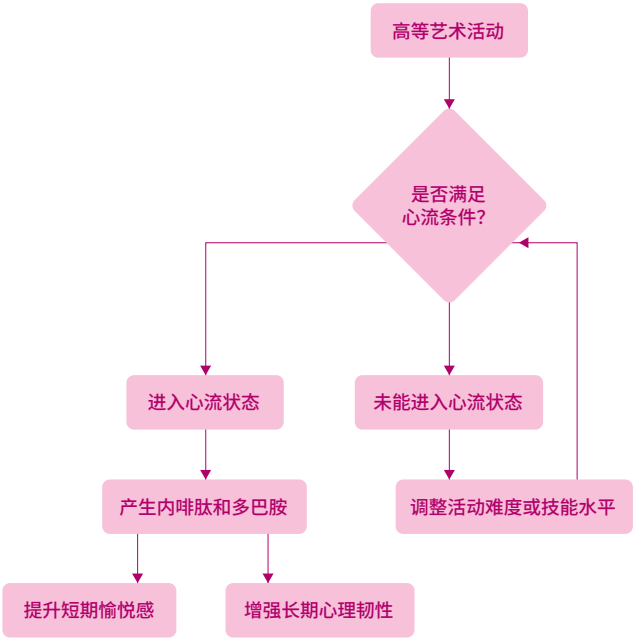


图 1 在美育活动中产生心流状态的过程

（三）参与艺术活动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

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社会身份转变以及消极心理的产生，会显著削弱其社交能力。当老年人的社交空间因环境变化而日益狭窄时，生活极易陷入单调。这种“仅为生存而活”的状态，容易使老年人难以找到生活的目的与意义，最终导致其生活归属感的缺失[11]。

老年人经常参与艺术活动能有效摆脱其面临的社交与心理困境。首先，艺术活动通常具有易学性与自发组织性，参与门槛较低。其次，活动过程中的肢体互动与情感交流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减轻社交压力。而且多数艺术活动在社区、美术馆等非医疗环境中开展，规避了“病患”标签的负面暗示，营造出轻松自然的氛围，从而降低老年人的心理防御，增强其主动交流的意愿[12]。如台湾美术馆“老当益壮”项目中“艺术处方笺”活动，通过非医疗化的艺术场域，使老年人能够在沉浸体验中敞开心扉、畅谈感受，有效搭建了安全开放的表达平台，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

（四）完成艺术作品能给老年人带来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感是精神分析学科的概念，它源于个体生理、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动态交互，其本质是对自我认知与自我实现的双重追寻[13]132。艺术创作通过从构思到实体成形的完整流程，为老年人建构自我认同提供了独特路径。在此过程中，老年人将内在情感投射于艺术行为，实践“心手相连”的本质创造力[9]120。尤为关键的是，作品成为具象化的自我语言，搭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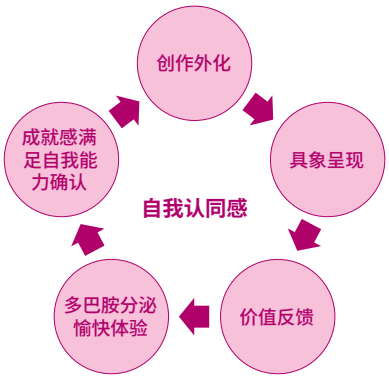


图 2 自我认同感构建的路径

内心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完成创作时的可视化成果不仅带来愉悦体验，更通过成就感强化对自我能力的确认。这一“创作外化—具象呈现—价值反馈”的闭环，促使老年人通过作品反观自身，实现从情绪表达到自我理解，并最终走向自我接纳的心理跃迁，从而锚定稳定的自我认同（见图 2）。

在艺术实践中，明确的创作目标（如完成绘画或陶艺）能够引导老年人调动专注力与创造力，每个步骤的完成均可形成积极反馈，强化其“我能创造”的主体信念。胡林慧研究指出，通过线条、色彩等将抽象情绪转化为具象作品，有助于老年人梳理内心，整合自我认知[13]134。当作品进入社区展览或手工艺市集等艺术社会场合时，老年人可凭借“艺术创作者”身份获得外界认可，从而避免“老年弱势”的标签化。这一从个体创作到社会认同的良性循环，不仅帮助老年人深化自我认同，也成为老年人促进心理健康、重建生命意义的重要机制。

三、社会美育活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践路径

那么，在艺术健康视角下开展社会美育活动，具体有哪些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呢？笔者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通过材料触摸建立身心连接

在美育活动中，引导老年人与工艺材料进行深度的触摸互动，能让老年人在触觉探索中重建起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力与控制感。首先在工艺材料选择上，优先选用陶泥、颜料等质感温和、可塑性强的材料，设计“触觉聚焦”环节：引导老年人闭目触摸材料，口头描述其温度与纹理。这种纯粹的触觉体验有助于缓解焦虑，增强身心连接。工具应尽量简化，使老年人通过双手揉捏、塑形，在材料与身体的直接对话中加强身心连接。

（二）创造老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机会

在美育活动中可嵌入小组合作环节，通过集体拼贴、合作填色等小组任务，促使老年人沟通协作，自然形成语言与肢体互动。进一步设置艺术对话环节，鼓励他们阐释创作理念，激发话题讨论。去中心化的表达方式，既规避了老年人对直接社交的焦虑，又能通过共同关注的艺术活动衍生出多层次的对话。通过上述方式，能使老年人在集体创作中获得群体归属感，而且在作品阐释中还能确认自我价值，由此满足老年人深层的社交与精神需求。

（三）构建循序渐进的参与模式

在美育活动中构建循序渐进的参与模式，能够匹配老年人的认知节奏与动手能力，使其避免产生挫败感，又能持续强化老年人“我能创造”的心理暗示，增强其自信心。首先基础阶段设置曼陀罗填色、陶泥塑形等低门槛任务，激发老年人兴趣并帮助其建立成就感；其次进阶阶段引入主题性创作，引导老年人将个人经验与艺术技法运用到创作中；最后通过作品展示与心路历程分享，既能激发老年人的叙事欲望，也能拓展他们的艺术想象力。上述三个阶段形成“技能内化—个性释放—价值外显”的闭环，可持续强化老年人的自信心，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美育活动推进模式。

（四）在非医疗环境开展美育活动

在美术馆、社区或老年大学等非医疗场所开展社会美育活动，可有效消解老年人的心理防御，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到活动中。如以“手工坊交流会”等主题弱化治疗标签，营造轻松氛围。通过轻音乐、时令茶点激活多感官体验，降低心理防御。工作人员优先招募青年志愿者，以平等关系和青春活力感染老年人，使老年人在非权威、去医疗化的环境中乐于参与，实现从心理防御到心情愉悦的转化，由此也能让老年人更加乐于参与各类社会美育活动。

四、结论

本文基于艺术健康理念，系统阐述社会美育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艺术创作不仅成为疏导负面情绪的有效媒介，还能增强专注力与认知能力，打破社交壁垒，并通过作品完成重塑自我认同、巩固心理韧性及促进社会交往。为实现上述功能，本文提出四种实践路径：首先以触觉体验激活情绪疗愈；其次通过小组合作拓展社交渠道；再次可构建“基础—创作—展示”的渐进模式，逐步建立自我认同；最后是在非医疗场景中开展活动，营造轻松参与氛围。通过以上方式，社会美育能够帮助老年人缓解心理困境，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满足其多层次的精神需求。

参考文献

[1] 傅宏，陈庆荣．积极老龄化：全球视野下的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和实践探索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 13(05): 713−720.

[2] 胡韬，郭成．心理健康教育的艺术审美陶冶模式探析 [J]. 安顺学院学报，2011, 13(04): 65−68.

[3] 田敏．现代艺术治疗理论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30(09): 257−261.

[4] 王贞，鄢婷，高艳梅．陶艺疗法在青少年压抑情绪调节中的效能研究 [J]. 心理月刊，2021, 16(21): 1−4, 9.

[5] 岑凯媚，王玉正，罗非．曼陀罗绘画疗法对负性情绪的调节效应 [J]. 医学与哲学，2022, 43(02): 65−68, 81.

[6] 尹若月，修代明，何丽．基于社区的自助式国画学习小组对失独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 26(06): 1234−1239.

[7] 刘凡，刘晓鹏，周玉．多奈哌齐联合氯氮平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观察 [J]. 中国实用医刊，2022, 49(09): 101−104.

[8] 叶美玲．老年痴呆患者精神行为症状的现状调查及因素研究 [J]. 黑龙江医学，2024,（下转 78 页）

综合支持体系管理在孤独症儿童中的效果评价

桑方方 李建梅 龙丰穗 韦 荣

摘要：目的：探究基于支持体系下的管理干预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可行性与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5 月—2024 年 6 月某医院收治的 84 例孤独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两组干预方案的不同，将患儿分为试验组（n=44）与对照组（n=40），对照组行常规治疗及干预管理，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建立支持体系实施综合管理干预，随访 12 个月比较两组的预后情况。**结果：**随访 12 个月，试验组孤独症量表评分及孤独行为量表评分均较对照组低，沟通能力评分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家长对管理干预的总满意率为 97.73%，较对照组（82.50%）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孤独症儿童的管理中，建立系统性的支持体系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疾病症状，并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孤独症；支持体系；孤独行为；中枢神经系统；生活质量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以下简称“孤独症”），与自闭症同义，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1]。患儿常伴随多动、情绪不稳定、自我伤害等异常行为，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智力障碍或感觉异常等[2]；疾病会严重影响儿童的社交适应能力和日常生活功能，并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3]。加之患者多样性和资源的不足，导致治疗效率低下和个性化治疗方案的难以实现[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孤独症的发病率均呈现出增长趋势，2020 年，中国 6~12 岁儿童的 ASD 患病率达 0.7%，患者人数超过 1000 万人，总体发病人数居全球第一[5]。欧美国家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政策与支持起步较早，涉及教育、医疗、康复等多个方面。我国针对孤独症制定的政策涵盖了康复、教育、医疗保障、家庭支持等多个方面，旨在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帮助[6]。各级政府及医疗机构在孤独症的筛查和干预服务中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梧州市针对当前孤独症管理所存在的社会认知偏差、专业服务供给不足和家庭照护压力大等客观问题制定了标准化的孤独症支持体系，为探寻该管理模式的实际效果，研究将以 2022 年 5 月—2024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孤独症患儿进行分组研究，以探究该支持体系在孤独症儿童干预管理中的效果，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5 月—2024 年 6 月某医院收治的 84 例孤独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两组干预方案的不同

（上接 77 页）

48(24):3027−3029.

[9] 韦秀玉 . 传统手工艺美育融入康养产业发展的机理及路径 [J]. 理论月刊 , 2023(12): 117−124.

[10] 吴锦锋 . 台州民间剪纸艺术融入老年大学艺术教育的研究 [J]. 造纸信息 , 2024(01): 140−141.

[11] 贾冰 , 曹煜林 . 小组工作提升社区空巢老人社交能力的作用、问题及对策 [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 2019, 36(04): 45−47.

[12] 付婧莞 , 张书铭 . 为老年人服务的美术馆艺术处方笺设计——以台湾美术馆为例 [J]. 装饰 , 2022(11): 17−22.

[13] 胡林慧 . “绘画艺术”通识课助力构建大学生自我认同感的教学设计 [J]. 品位・经典 , 2023(06): 132−137

（作者单位：澳门理工大学）

将患儿分为试验组（n=44）与对照组（n=40）。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

组别	性别（男 / 女）	年龄（岁）	病程（年）	病情 [n,%]		
				轻度	中度	重度
试验组（n=44）	33/11	5.17 ± 0.71	1.82 ± 0.33	13（29.5）	25（56.8）	6（13.6）
对照组（n=40）	32/8	5.03 ± 0.62	1.77 ± 0.45	14（35.0）	22（55.0）	4（10.0）
χ^2/t	0.299	0.958	0.584		0.439	
P	0.584	0.341	0.561		0.803	

1. 纳入标准

（1）对象均符合孤独症的诊断标准；（2）躯体功能正常；（3）家长健康状况良好；（4）患儿家长对研究过程、目的及获益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2. 排除标准

（1）存在较为明显的抵触情绪者；（2）合并视听功能障碍者；（3）家庭住址不固定者。

（二）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及管理，包括基于中枢兴奋剂及多巴胺拮抗剂的药物治疗，同时由专门的医护人员，根据患儿的基本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和病情程度给予相应的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试验组基于支持体系的建立，主要在以下方面实施干预管理。

1. 认知教育

（1）面向患儿开展“能力展示计划”，通过艺术展览、社区服务等活动提升社会可见度。（2）针对家长设计“社会融入支持包”，包含认知解释工具、社区培训课程等；（3）面向公众开发多媒体教育素材，包括科普短片《星星的孩子》、儿童绘本《我的自闭症朋友》等，所有教育内容均经专家委员会审核，以确保科学性与适宜性。

2. 优化服务供给

（1）个体层面，实施基于 PEP-3 评估的个性化康复计划，包含每周 3 次机构训练和每日家庭干预。（2）家庭层面，提供“三位一体”支持，即“家长培训 + 心理辅导 + 喘息服务”。（3）社区层面，建立融合实践基地，开展超市购物、公交出行等场景训练，服务过程采用双盲评估，由未参与干预的研究员定期测评。

3. 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

（1）政策执行方面，简化康复补贴申请流程，实施“一站式”服务。（2）资源分配方面，按患儿需求等级配置服务资源，重点保障低收入家庭。（3）质量监管方面，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审核服务效果，对政策实施情况每月汇总分析，以便动态调整执行方案。

4. 家庭支持能力建设

（1）建立“家长互助联盟”，实施阶梯式培训计划，即根据家长的认知程度和技能掌握情况，逐层进阶，以满足患儿管理的需求。（2）开发数字支持平台，集成在线课程、专家咨询、经验分享等功能，拓展家长关于孤独症相关知识的获取途径。（3）成立多学科支持团队，由心理咨询师、特教教师及医护人员为核心成立管理团队，定期进行家访，通过量化问卷和质性访谈的方式评估家庭支持效果，并给予合理的建议和帮助。

（三）观察指标

采用自闭症评定量表（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ATEC）比较两组的症状缓解情况，量表包括感觉、社交、语言、意识等 77 个方面的内容，总分 179，评分与症状程度成正比；以孤独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比较两组患儿的孤独程度，量表包括自我照顾、交往、运动等 57 个条目，总分 0~171，评分与孤独程度成正比；以社交沟通量表（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SCQ）比较两组患儿的沟通能力，量表包括互动、交流和刻板行为三项，总分 72，评分与沟通能力成正比。

以 Gesell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评分表比较两组患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状况，评分为 26~76 分提示发育迟缓，评分 <25 分提示重度迟缓；以儿童生活质量核心评定表，比较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水平，量表涵盖角色、情感、社会和生理，总分 100，评分与生活质量水平成正比。

（四）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结果差异显著。

二、结果

（一）两组症状、孤独程度及沟通能力评分比较

随访 12 个月，试验组孤独症量表评分及孤独行为量表评分均较对照组低，沟通能力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症状、孤独程度及沟通能力评分对比（$\bar{x} \pm s$，分）

组别	孤独症症状评分		孤独程度		沟通能力	
	干预前	随访 12 个月	干预前	随访 12 个月	干预前	随访 12 个月
试验组（n=44）	114.34 ± 12.10	88.53 ± 9.19	74.72 ± 5.71	65.23 ± 5.18	35.45 ± 5.31	56.74 ± 6.34
对照组（n=40）	112.37 ± 16.34	93.82 ± 10.17	73.90 ± 6.03	67.74 ± 6.22	36.21 ± 6.42	52.90 ± 7.18
t	0.632	2.504	0.640	2.016	0.593	2.603
P	0.529	0.014	0.524	0.047	0.555	0.011

（二）两组中枢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随访 12 个月，试验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评分及生

活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中枢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对比（$\bar{x} \pm s$，分）

组别	中枢神经功能		生活质量	
	干预前	随访 12 个月	干预前	随访 12 个月
试验组（n=44）	58.52 ± 6.22	67.10 ± 4.35	59.14 ± 7.45	73.92 ± 9.08
对照组（n=40）	59.07 ± 7.38	64.63 ± 5.12	60.69 ± 8.01	69.31 ± 10.25
t	0.370	2.389	0.919	2.186
P	0.712	0.019	0.361	0.032

三、讨论

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包括但不限于感知觉异常、刻板行为及社交沟通障碍等，部分患儿还伴有不同程度的癫痫和智力障碍等。由于发病机制极其复杂且缺乏特异性药物，因此单纯的医疗干预其效果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另外，由于公众在认知上的缺陷，孤独症普遍存在诊断延迟的情况，多数患儿确诊时已错过了 3 岁前的最佳干预时机，这也是孤独症治疗难度大、预后差的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被认为是应对孤独症的有效手段，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通过多学科协作的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医疗、教育、康复资源，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全方位的干预。（2）“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支持可减轻家长压力，改善患儿的社会适应。（3）依托政策支持可有效解决服务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保证干预的力度和持续性。

研究依托梧州市响应国家号召颁布的孤独症干预支持体系，对两组患儿进行了双盲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干预后症状、孤独程度、沟通能力以及神经系统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均较常规治疗管理方案效果更显著。分析认为，基于支持体系下的干预管理方案有以下优势：（1）系统性的干预机制，首先该支持体系为患儿制定了标准化的康复训练计划，持续刺激大脑社交相关神经环路的重塑和发育，通过多感官训练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改善了患儿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其次，通过“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能够为患儿创造具有较高一致性的康复与成长环境，客观上能够减轻其适应障碍，降低适应难度。（2）多维度干预，在患儿的干预管理中采用阶梯式社交训练方案，从基础到复杂的过程，可循序渐进地改善患儿的社交沟通能力，个性化干预计划针对每个患儿的特点精准施策，能够更好地改善患儿的刻板行为和感知觉异常。最后，在该干预体系下实现了针对孤独症患儿家长的持续培养和支持，既能为患儿的康复创造更好的家庭条件，也能为提升整个家庭的干预能力和韧性提供支撑；通过建立家长互助网络，形成持续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有效减轻家长的照料压力，客观上也能为患儿创造积极的康复环境。（3）干预管理的持续性，建立跨专业协作团队，整合医疗、教育、康复等多领域资源；依托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进而形成了长效保障机制。

由于孤独症对患儿家庭造成的压力普遍较大，研究还将两组家长的满意度进行了对比，并以此剖析支持体系下的干预管理方案的效果。结果显示，试验组家长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分析认为，支持体系下所实施的多学科标准化康复方案，家长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患儿在行为和沟通交流方面的持续性进步。另外，依托政策的“三位一体”支持模式系统性地提升了家长的应对能力并给予了相应的心理疏导、喘息服务等，社会性质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独自应对孤独症的孤独和无助。

综上所述，给予支持体系下的干预管理方案，能够更好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并促进神经功能的发育；同时，全方位的支持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孤独症患儿家长的压力，使之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参与到患儿病情的管理中来。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行为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 儿童保健学组 . 中国低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干预专家共识 [J]. 中华儿科杂志 , 2022, 60(05): 395−400.

[2] 陈霞玲 . 孤独症患儿照顾者负担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J]. 中国乡村医药 , 2020, 27(12): 57−58.

[3] 赵彦雅 . 自闭症患儿主要照顾者照顾体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全科护理 , 2022, 20(13): 1859−1862.

[4] 曾泳添 , 陈日玲 , 农雪艳 , 等 . 数字疗法在自闭症筛查到干预的临床研究进展与挑战 [J]. 中国全科医学 , 2025, 28(14): 1702−1708.

[5] 李进宇 , 赵太宏 . 语音识别技术在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中的研究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5, 45(04): 574−579, 587.

[6] 武丽杰 . 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政策地图及启示 [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 2025(01): 8−12, 2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梧州市科技计划项目“感觉统合训练联合综合康复治疗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中的应用研究”（202302063）。

（作者：桑方方、龙丰穗、韦荣，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李建梅，岑溪市妇幼保健院）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的研究进展

李宣萱

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共同注意缺损，作为其社会认知发展障碍的核心表现，已成为国际权威机构早期干预的关键靶点。本研究从干预形式、干预效果与结果角度系统整合了近十年国际上 ASD 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相关的实证文献。研究发现，共同注意的干预形式可分类为基于情景式干预（音乐干预、运动干预、玩具干预）、游戏互动干预（同伴干预、成人—儿童干预）及技术辅助干预（虚拟现实干预、机器人干预）。大部分研究的干预效果较为明显，干预对象的共同注意和认知与行为有明显的改善，但仍有一小部分干预效果不明显。共同注意的干预结果可体现为 ASD 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发起性共同注意反应分别增加、两者的综合改善、负面情绪行为减少及游戏技能改善。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跨情境泛化的优化路径，建议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异质性、建立生态化追踪机制，并构建共同注意质量评估体系，为设计兼具普适性与个体化的循证干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孤独症谱系障碍；共同注意；干预

一、引言

在早期发展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普遍存在共同注意缺失的问题 [1]。共同注意是指两个人同时对同一个物体或事件产生关注和兴趣，包含回应性共同注意（RJA）和发起性共同注意（IJA）两种形式。回应性共同注意指的是对他人发起的共同注意的回应，即跟随他人注意力方向的能力。而发起性共同注意则指个体主动发起共同注意的行为，更倾向于儿童的主动行为 [2]。

共同注意作为适应性人类社会功能的基石，已被国际权威机构确认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干预的核心靶点 [3]544。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无法主动开始或回应社交互动”纳入 ASD 诊断标准。有研究指出，共同注意能力在孤独症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孤独症的最早迹象之一 [3]553。ASD 儿童从 12 个月大开始，共同注意力的启动就会受损，尤其是在使用手势展示和指点时；在 24 个月大时各类共同注意行为明显减少，且与孤独症特征的发育水平和数量相关 [4]。这种障碍不仅阻碍其语言习得，更直接影响社会规则理解与同伴关系建立 [5]。

“社会脑”理论揭示，共同注意依赖前额叶—颞叶—顶叶网络的协同激活，而 ASD 儿童表现为该网络的功能连接异常 [6]1208。行为研究表明，共同注意不仅是语言发展的先导能力，更是心理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 [7]。这为研究设计共同注意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增强共同注意可能重塑 ASD 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轨迹 [8]。目前国际上对 ASD 儿童共同注意的干预呈现三大特征：（1）干预形式由传统行为干预向自然情景化拓展，如出现了游戏互动干预与技术辅助的 VR 与机器人干预 [9]1；（2）干预内容由单项技能训练转向共同注意发起与维持能力的协同培养 [6]1210；（3）干预效果大多为短期内目标行为的显著提升，但泛化与维持效果不足 [10]7。现有研究缺乏跨干预范式的长期效果比较及干预策略的系统性整合。因此，本研究旨在整合近十年实证研究，比较不同的共同注意干预形式及其干预效果与结果，希望基于此提出跨情境泛化的优化路径与循证实践建议。通过上述系统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深化对共同注意在 ASD 早期干预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机制的理解，为临床与教育实践者设计更有效、可持续、可推广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与证据支持。

表 1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的干预形式分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文献数量（篇）
基于情境式干预	音乐干预 运动干预 玩具干预	7
游戏互动干预	同伴干预 成人—儿童干预	6
技术辅助干预	虚拟现实干预 机器人干预	8

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的干预形式

本研究通过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进行共同注意干预的干预形式进行编码分析，提炼出三类干预形式，即基于情境式干预、游戏互动干预及技术辅助干预（见表 1）。

（一）基于情境式干预

基于情境式干预是指通过音乐、瑜伽、玩具等主题活动创设真实互动场景，激发 ASD 儿童训练的积极性，具体可分为音乐干预、运动干预及玩具干预三类。

音乐干预是指在乐器演奏、音乐游戏等音乐活动中加入音乐节奏和时间线索，以提供外部锚点，并根据儿童的功能水平调整音乐的复杂度，目的是帮助儿童组织、预测和应对环境 [11]。音乐干预包括个人干预和团体干预。例如，在个人干预中，4~6 岁 ASD 儿童接受一对一的简单和复杂旋律的音乐干预后，重度 ASD 儿童在简单音乐旋律活动中的共同注意反应更好，而轻度 / 中度 ASD 儿童对复杂音乐旋律活动的反应更佳 [12]442。在团体干预中，6~9 岁 ASD 儿童经过 5 周的小组音乐干预后，在同伴间的共同注意和眼神注视上比无音乐组表现出更大的进步 [13]。

运动干预融合了体操等运动元素与音乐、游戏等创意元素，以改善 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情感调节及运动功能，根据主题分为体操干预和瑜伽干预 [14]。研究者对 6 岁 ASD 儿童进行适应性韵律体操运动干预后发现，其能有效提升回应性共同注意、课堂参与度并改善情绪问题 [15]1。研究者在进行创意瑜伽干预后，发现瑜伽干预组儿童相较于对照组展现出更积极的情感和更少的负面情绪 [16]9。

玩具干预是以不同种类的玩具为材料，使用结构化教学和提示、强化手段，教授 ASD 儿童眼神交流及目光跟随的技能，以帮助其在不同情境中学习和泛化此能力。例如，研究者对 2~3 岁 ASD 幼儿使用提示和强化手段，利用拼图积木训练回应请求，用会发光 / 声音玩具等训练发起共同注意。结果发现，干预后其在回应和发起共同注意中的眼神交流行为显著改善，效果能泛化至其他社交情境中，且有维持性 [17]。

（二）游戏互动干预

游戏互动干预是指培训教师、家长或同伴，使其掌握与 ASD 儿童互动的策略（如示范、提示、强化），成为干预执行者，以便他们能够在结构化或自然的游戏活动中恰当引导 ASD 儿童出现眼神接触、分享关注等社交行为。其优势在于改善 ASD 儿童的游戏参与度与社会融入能力 [18]。根据干预执行者的不同可分为同伴干预与成人—儿童干预。首先，同伴干预是指干预执行者为与干预对象年龄相近的典型发展儿童 [19]。研究者对 6~10 岁 ASD 儿童进行每周 15 分钟的同伴一对一干预，通过儿童自主选择玩具，同伴使用互动策略主动引导互动，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行为总体增加，多方观察者均能观察到这些变化 [20]。其次，成人—儿童干预则指干预执行者为教师、父母。例如，在对幼儿园教师进行 1 小时工作坊形式的 the Joint Attention and Symbolic Play/Engagement and Regulation intervention（JASP/ER）培训后，教师在课堂上一对一地参与 ASD 儿童感兴趣的游戏活动，使用建立游戏规则、模仿儿童的游戏动作以创造机会让儿童主动发起沟通的策略，并给予及时恰当的回应。结果发现，ASD 儿童相较于干预前的共同注意发起频率增加 [21]689。

（三）技术辅助干预

技术辅助干预是指利用虚拟现实、机器人等技术手段，设计相应的互动场景和任务以辅助传统的行为干预，为 ASD 儿童提供针对性的社交技能训练。这一干预形式利用了许多孤独症患者对计算机技术以及信息传递的可预测格式的特殊兴趣，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掌控互动的节奏 [22]。根据干预媒介的不同可分为虚拟现实干预和机器人干预。具体来说，虚拟现实干预指通过传感器和头显设备构建沉浸式虚拟互动空间，建立实时交互和适应性反馈机制，为 ASD 儿童提供针对性的眼神交流及目光跟随训练 [23]。例如，有研究者对 ASD 儿童和典型发育儿童进行的 Interact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InViRS）系统干预，其中包括一名发起游戏的虚拟角色以及用于练习的唐格拉姆拼图游戏和用于前后评估的泡泡破灭游戏 . 结果发现 , 干预后 ASD 儿童组在眼神交流和眼神跟随方面有显著提高 [24]。机器人干预是指可交互机器人通过动作诱导或社交戏剧示范共同注意行为的干预形式。根据干预内容的不同可分为诱发行为的干预和戏剧示范干预，干预材料大多使用人形机器人 NAO。例如，有研究者对平均年龄为 3.46 岁的 ASD 儿童使用了诱发行为的干预，人形机器人 NAO 提供头部转动及手臂和手指的指向等提示动作引导儿童关注目标。结果发现，儿童的定向注意力有所提高，且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对人形机器人的关注持续强烈 [25]。

三、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的干预效果及结果

本研究所选取的干预研究的大部分干预效果较为明显（n=19），干预对象的共同注意和认知与行为有明显的改善，但仍有一小部分干预效果不明显（n=2）。有两篇文章报告其干预方案在统计学层面未实现共同注意的显著提升，但存在个别干预对象共同注意的提升。这两篇文章均探讨了使用社交机器人进行 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干预是否比人类更有效，结果表明，ASD 儿童在机器人条件下对机器人脸部的注视更多，但对目标的注视较少；在共同注意表现上没有显著差异。其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可能是被试个体差异性较大，机器人系统缺乏情感反馈与双向互动机制而不具备动态调整提示难度的能力，因此机器人虽然吸引了注意力，但没有显著提升其共同注意技能 [9]8。

对干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干预结果包括共同注

意提升和认知与行为改善两个方面（见表 2）。

表 2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的干预结果分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文献数量（篇）
共同注意提升	共同注意发起（IJA）	3
	共同注意反应（RJA）	6
	共同注意发起 + 反应增加（改善）	9
认知与行为改善	负面情绪行为减少	2
	游戏技能改善	3

（一）共同注意提升

作为干预的核心目标之一，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中，关于儿童共同注意能力提升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并主要从三个维度体现干预效果：共同注意发起、共同注意反应以及共同注意发起和反应的综合改善。

在共同注意发起方面，文献报告了干预后儿童主动引发他人关注、指向或展示物品分享兴趣的能力得到提升。这表明干预策略对促进 ASD 儿童主动发起社会互动性注意具有一定效果。例如，有研究在培训教师使用 JASP/ER 策略后让其使用这一策略与学龄前儿童互动，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幼儿在课堂中的共同注意发起行为显著增加，尤其是展示和指向物品的行为，这一干预效果在课堂与游戏场景中均得到维持 [21]691。

在共同注意反应方面，相关研究数量较多（n=6）。干预结果主要表现为 ASD 儿童对他人发起的共同注意线索的理解和反应能力得到改善，如能更好地追随他人视线或手指方向。例如，在对不同程度的 ASD 儿童进行简单或复杂节奏、旋律的音乐干预后，结果显示，对于重度 ASD 儿童，平稳和弦、可预测旋律的简单音乐能更有效地促进注视追随，引发反应性共同注意；对于轻度或中度 ASD 儿童，复杂音乐更能维持其注意力，缩短反应共同注意的时间 [12]445。在进行适应性韵律体操的干预后，ASD 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频率提升 40%，课堂参与度提高，共同参与状态延长 [15]6。

以共同注意发起和反应的综合改善或增加为干预结果的研究，占所有共同注意干预研究的主要部分。这反映出研究者普遍重视通过干预同时提升儿童在两个方面的能力，以实现更全面的社会沟通功能改善。在对 ASD 儿童进行同伴互动干预后发现，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发起和回应都有所增加，父母和专业人士都注意到了显著的改善 [26]。在对低功能 ASD 儿童进行的机器人戏剧干预显示，ASD 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在干预后得到改善，并且共同注意的发起行为在没有明确教授的情况下也有所提高 [27]474。

（二）认知与行为改善

本研究发现，共同注意干预对 ASD 儿童的认知与行为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情绪行为调节及游戏技能两方面的进步。

负面情绪行为的改善，表现为干预后 ASD 儿童因社交挫折引发的哭闹、攻击或自我刺激频率降低。例如，在进行创意瑜伽干预后，研究者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干预组 ASD 儿童整体表现出更高的任务投入度与更低的负面情绪。这可能是由于呼吸 / 瑜伽练习中的放松练习降低了焦虑情绪，双人瑜伽姿势增强了社交安全感 [16]10。

游戏技能的改善，具体体现为角色扮演类的象征性游戏和合作游戏能力的提升，游戏复杂性增强。例如，在机器人戏剧干预后，研究者发现，干预组 ASD 儿童的他人导向功能游戏行为（如给玩偶梳头）显著增加，从基线到后测有明显提升。而自我导向功能游戏（如给自己梳头）因基线期已高频出现，因此在干预后没有显著变化 [27]475。

四、总结与展望

研究表明，当前国际上对 ASD 儿童共同注意的干预主要呈现出三种主要干预形式：基于情境式干预（音乐干预、运动干预、玩具干预）、游戏互动干预（同伴干预、成人—儿童干预）、技术辅助干预（虚拟现实干预、机器人干预）；干预结果可体现为 ASD 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发起性共同注意反应分别增加、两者的综合改善、负面情绪行为减少及游戏技能改善。三类干预形式各具优势，基于情境式干预通过生活化场景及感官刺激有效提升共同注意并改善消极情绪，游戏互动干预增强社交参与及游戏技能 [10]6；技术辅助干预利用 ASD 儿童的偏好及精准的数据收集以训练眼神交流与眼神跟随 [28]。

未来研究可围绕四大方向深化探索：其一，扩大被试样本量，涵盖高功能、低功能等不同亚型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通过分层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干预方案的普适性，并探索不同强度（如干预频率、提示密度、任务复杂度）对共同注意和眼神交流行为的提升效果以探索最佳干预方案；其二，进行短期及长期随访，结合家庭与学校观察，探索干预后共同注意及眼神交流行为在生活情景中的维持与泛化效果；其三，全面提升共同注意数量与质量，在量化共同注意行为频率的基础上整合眼动追踪等指标检测共同注意质量；其四，融合多模态干预形式，如“VR+ 游戏”互动策略，将不同干预形式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参考文献

[1] 王娟，刘天碧，范小月．象似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对孤独症儿童动作相关词汇学习的影响 [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4, 40(03): 367−374.

[2] MUNDY P. A review of joint attention and social−cognitive brain systems in typical development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8, 47(06): 497−514.

[3] GORDON I, Eilbott J A, Feldman R, et

al.Social, reward, and attention brain networks are involved when online bids for joint attention are met with congruent versus incongruent responses[J]. Social Neuroscience, 2013, 8(06): 544−554.

[4] 王天泽，黄慧诗，刘霖如，等．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感觉反应与自发性共同注意能力发展的关系 [J]. 新医学，2024, 55(06): 430−436.

[5] 沙鹏，王志强．国外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研究综述 [J]. 中国特殊教育，2020(04): 40−45.

[6] 陈璐，张婷，李泉，等．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的神经基础及早期干预 [J]. 心理科学进展，2015, 23(07): 1205−1215.

[7] 徐云，张潘．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研究现状与进展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 28(05): 924−927, 931.

[8] 安文军，朱紫桥，丁忠冰，等．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缺陷：基于认知行为与脑机制的证据 [J]. 中国特殊教育，2025(04): 60−68.

[9] CAO W, SONG W, LI X, et al.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robots: improving gaze toward face but not necessarily joint atten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1503.

[10] SO W C, CHENG C H,LAW W W, et al. Robot dramas may improve joint attention of Chinese−speaking low−function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tepped wedge trials[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 2020, 18(02): 195−204.

[11] 李腾子．音乐治疗干预孤独症谱系障碍：机制、现状与策略 [J]. 中国特殊教育，2024(05): 52−58.

[12] KALAS A.Joint attention response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o simple versus complex music[J].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2012, 49(04): 430−448.

[13] LAGASSE A B.Effects of a music therapy group intervention on enhancing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J].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2014, 51(03): 250−275.

[14] 许晨晨，姚明焰，邱服冰，等．基于 ICF−CY 的适应性韵律体操活动对低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效果 [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1, 27(04): 412−419.

[15] DUAN G, HAN Q, YAO M, et al. Effects of rhythmic gymnastics on joint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of autistic childre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J].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2: 1−10.

[16] KAUR M, EIGSTI I M, BHAT A.Effects of a creative yoga intervention on the joint attent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well as affective state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21, 88: 101860.

[17] MUZAMMAL M S, JONES E A.Social−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for todd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ffects on initiating joint atten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mother[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2017, 29(02): 269−287.

[18] 秦鲁鑫，魏轶昕，王平．体育游戏中应用同伴介入法对孤独症儿童社会互动的干预研究 [J]. 现代特殊教育，2023(20): 70−78.

[19] 连福鑫，王雁．融合环境下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社会交往同伴介入干预研究元分析 [J]. 教育学报，2017, 13(03): 79−91.

[20] KRIER J, LAMBROS K M. Increasing joint attention and social play through peer−mediated intervention: a single case design[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21, 58(03): 494−514.

[21] LAWTON K, KASARI C. Teacher−implemented joint attention intervention: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for preschoolers with autism[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12, 80(04): 687−693.

[22] 俞蓉蓉．计算机辅助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应用进展 [J]. 中国特殊教育，2015(09): 33−40.

[23] 于新宇，陈东帆，李睿强．现代化技术在孤独症康复领域应用的研究综述 [J]. 中国特殊教育，2016(03): 17−22.

[24] AMAT A Z, ZHAO H, SWANSON A, et al. Design of an interact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 InViRS, for joint attention practice in autistic children[J].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2021(29): 1866−1876.

[25] WARREN Z E, ZHENG Z, SWANSON A R, et al. Can robotic interaction improve joint attention skills?[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15, 45(11): 3726−3734.

[26] 沙鹏，张海滨，雷江华．社区融合情境中基于同伴介入法的共同注意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影响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5, 33(01): 209−216.

[27] SO W C, CHENG C H, LAM W Y, et al. A robot−based play−drama intervention may improve the joint attention and functional play behaviors of Chinese−speaking preschoo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pilot study[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20, 50(02): 467−481.

[28] 陈东帆，李睿强，韩琨．人形机器人技术在孤独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 [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5, 21(11): 1325−1328.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

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的理论逻辑及运作机制

章一多

摘要：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是在特定区域（如乡村、社区、企业）内，探索技能型社会相关政策、功能的微观场景和实践窗口。为了克服原有研究对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缺乏统一分析框架和合适案例分析的不足，本文结合技能型社会的三层分析框架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不仅提出了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三维内涵，而且提出了以技能型企业和技能型乡村（社区）为核心基本单元的共性运行机制（即以“建设内容—制度层—功能—观念层—实体层”的架构，以“个人提技→技能型基本单元高质量发展→个人增收”为核心运行逻辑）和个性运行机制。

关键词：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技能形成；技能人才；运行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均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并提出了“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等重要要求，这均凸显了技能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当前我国“技工荒”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出现了较大背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技能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问题。自 2021 年 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以来，技能型社会就成为破题技能人才培养难题的关键抓手。如何让技能型社会建设“可知、可感、可及”？浙江省台州市正在开展技能型社会建设基本单元建设，为本文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样本。

一、文献综述

（一）技能型社会的相关研究

一是技能型社会的内涵。基于技能形成理论，张弛等认为技能社会是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1]，王星等在此基础上指出，技能型社会建设在制度安排上可以用“国家（区域）技能形成体制”进行统筹，包含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2]。徐国庆则提出技能型社会的三层级分析框架，包含实体层（社会拥有的技能人才数量或比例）、观念层（人们对待技能形成的态度）、制度层（支撑技能形成的相关制度）[3]。二是技能型社会的特征及结构。技能型社会有“三全”特征，即技能形成制度集合在技能开发对象上要覆盖全体劳动力、在开发项目上要贯穿劳动力的全生命周期、在开发内容上要囊括社会的全部产业链。霍丽娟则认为技能型社会有区域适应性、产业适配性、体系完备性、合作共生性及治理适切性五方面特征[4]。三是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技能形成及供给的基本情况。技能形成是技能型社会中的核心议题，姜蓓佳等对技能形成中技能学习、技能提供、技能使用和技能评价四个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入调研[5]。杨钋等则构建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技能供给框架，聚焦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三层次目标，即技能供给扩大且公众技能成就显著提升、技能在产业行业岗位间的配置显著优化、技能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壁垒逐步消除[6]。四是技能型社会的构建路径。张弛等指出技能型人力资本增值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路径，并从内驱力、外驱力和耦合力三方面构建路径[7]。刘娜妮等则认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应聚焦于提升技能形成效率、实现技能形成的社会公平、动员全社会的技能形成资源，建设包括技能预测、技能形成、技能使用和技能保护在内的制度[8]。

（二）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理论背景

技能型社会作为一种设想中的社会形态或者理念，最终还要靠一个个微观的应用场景去落实。为此，浙江省提出了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概念。不过，对此尚无系统性研究，就要先对“基本单元”进行学理分析，这可追溯到以帕森斯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该理论延续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似”这一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如孔德指出社会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首先是家庭，这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称之为社会的细胞”；然后是阶级或种族，这是“社会的组织”；最后是城市和社区，这是“社会的器官”。在此基础上，帕森斯强调，社会系统之所以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是因为能够满足四个功能性条件，这就是他著名的“AGIL”范式，即适应（A）、目标实现（G）、整合（I）和潜护（L）四项关键功能，并分别有经济、政治、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模式托管这四个子系统对应。这些理论为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提供了启示，如技能型企业、技能型乡村（社区）等基本单元均可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通过发挥特定的功能，共同维持技能型社会的稳定和运行。国内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了“AGIL”范式分析了技能型社会或技能型乡村，但是这些文献还是以分析技能型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地位—角色”为主，缺乏从更系统的视角思考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内部的功能分析以及四个子系统的运作。

（三）研究不足

综上所述，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研究刚起步，存在以下局限性：目前，研究尚未从技能型社会的总体视角对技能型基本单元构建一个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不同类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运行机制的相同点、不同点，缺乏相关研究。欠缺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案例研究，以至于目前的研究相对理论化和空洞化。本文致力于在台州市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试点的案例基础上，结合技能形成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建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运行机制。

二、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内涵

本文尝试借鉴徐国庆对技能型社会提出的三层框架，并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相对统一的分析架构，提出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内涵。

从政策执行来看，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既是不断实践与丰富技能型社会建设内涵的试验田，也是使技能型社会“可知、可感、可及”的重要窗口，还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示范指引的领跑者。

从理论内涵来看，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是技能型社会的微观场景，依然可以从实体层、观念层、制度层来界定。实体层是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要达成的某个子目标，如设置技能人才占比、高技能人才占比等核心指标之外，并按不同基本单元设置差异化指标；观念层是在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内各主体对待技能及发挥功能的态度及愿景；制度层是支撑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内技能形成、技能使用等相关制度。实体层涉及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目标实现，要以观念层的形成前提；观念层的形成除了文化传承、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之外，要以制度层的构建为前提。

从功能结构来看，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类似“社会细胞”，有机组成技能型社会。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作为社会系统，之所以能维持和延存自身，是因为满足 AGIL 四个功能[9]。A（Adaptation）即“适应”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由其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这些资源或能力在该系统中的配置。在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中，“适应”功能指技能在社会系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并通过技能获取外部的经济、人力、政治等资源，对应制度层中技能形成、技能使用等制度。G（Goalattainment）即“目标实现”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所具备的有助于确立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激发和调动该系统之能力与能量的功能。在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中，“目标实现”功能是指技能形成等具体目标的实现及为此目标调动的相关举措，对应实体层中的相关指标。I（Integration）即“整合”功能，主要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发挥功能，包括控制手段的建立、保持子系统的协调、防止系统发生严重混乱等。在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中，要统筹整合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各方主体的利益，维持社会系统的连贯性或一体化，这对应制度层中的技能生态制度。L（Latency）即“潜护”功能，主要指能量储存并配置于系统的过程，包括符号、观念、趣味、评价等文化供应和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维持。在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中，要构建一种“政府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塑造一种工匠文化，这对应观念层中的态度及愿景。

综上所述，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是在特定区域（如乡村、社区、企业）内，探索技能型社会相关政策、功能的微观场景和实践窗口。具体而言，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要在实体层面达成技能人才等相关子目标，具备目标实现的功能；在观念层要让各主体对技能形成、技能使用等持有积极的态度愿景，具备潜护的功能；在制度层要围绕技能构建一系列制度，具备对外适应及对内整合的功能。

三、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运行机制

（一）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分类

本文根据应用场景的适用程度和广度，将其分为两部分。

1. 核心基本单元，包括技能型企业、技能型乡村（社区）。核心基本单元的应用场景为企业、乡村（社区），是技能形成、技能使用最为广泛的空间，实体层、观念层、制度层都相对完整，而且技能在制度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技能形成和技能使用等制度完善。不过，核心基本单元的名称尚未统一：在台州，技能型企业还被称为技能创富型企业；之后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赋能省域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高质量发展导引（1.0 版）》（以下简称《导引》），在文件中这两类核心基本单元被称为技能赋能乡村（社区）和技能赋能企业，现在又被表述为技能型企业、技能型乡村（社区）。

2. 扩展基本单元，包括技能体验中心、技能赋能中心等。一方面，拓展基本单元落地的应用场景不再是企业、乡村（社区）这些相对标准化的场景，而是有更多元的形态，比如，天台和合工匠技能体验中心的应用场景就是博物院，临海市技能体验中心则是依托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的工匠学院。另一方面，拓展基本单元的功能定位侧重点不同，核心基本单元强

调技能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拓展基本单元则强调技能体验、技能就业创业等功能。

总体上，核心基本单元是研究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重点，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技能型企业和技能型乡村（社区）的运行机制

分析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运作机制，关键在于分析其在制度层是如何运作的。本文在参照《导引》和《台州市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等文件资料后，发现各类技能型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是又因建设目标的不同，也存在一定差异性。

1. 共性运行机制。首先，本文参照《标准》对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建设内容进行解构，与技能型基本单元的制度层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除了常见的技能形成、技能使用制度之外，本文增加了技能预测和技能保护两项制度。此外，为了塑造更优化的技能生态，还需建立技能生态制度。

技能形成制度主要解决有效、高质量的技能供给问题，比如，专项培训有助于形成专业技能，技能竞赛能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技能评价让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获取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技能使用制度解决技能意愿、终身技能形成氛围的问题，比如，就业促进让技能人才有施展技能的舞台，创新创业扩宽了技能人才的就业途径，技能增收提升了技能人才的薪酬水平及其他收入。技能保护制度解决了技能形成中的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普惠培训是覆盖全员的技能培训体系，就业帮扶针对弱势群体采用技能帮扶，劳动权益则是保护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共富引领是通过高技能人才带动其他弱势群体增收。技能生态制度主要是解决政策扶持、要素保障等问题，包括技能型基本单元的机构运行、相关制度的制定、场地设施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育及技能文化的塑造、技能政策的激励、公共服务的配套。技能预测制度解决技能供需不匹配引发的低效率问题，通常由政府主导、依托行业协会完成对技能需求内容、需求结构、需求规模等多个方面的预测，但是目前尚未有相对应的建设内容。

然后，本文基于技能型社会的三层内涵，运用AGIL范式，对共性运行机制进一步开展分析。技能形成制度发挥适应功能，从外部获取技能等人力资源，推动个人提技，从而促进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高质量发展；技能使用制度也发挥适应功能，从外部获取资金、政治等资源，实现个人增收（这是通过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高质量发展的反哺实现的）。此外，技能保护制度发挥整合功能，促进低收入、残疾等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发展，防止基本单元因社会矛盾而造成系统混乱，而该整合功能的发挥是由个人增收的示范作用所带动的；技能生态制度也发挥整合功能，由政府牵头统筹整合各方主体的资源、利益，进而引导支持个人增收及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高质量发展；技能预测制度同样发挥整合功能，促进系统内技能供需匹配，也引导支持个人提技的实现。其中观念层，即技能型基本单元内对待技能及技能人才的态度及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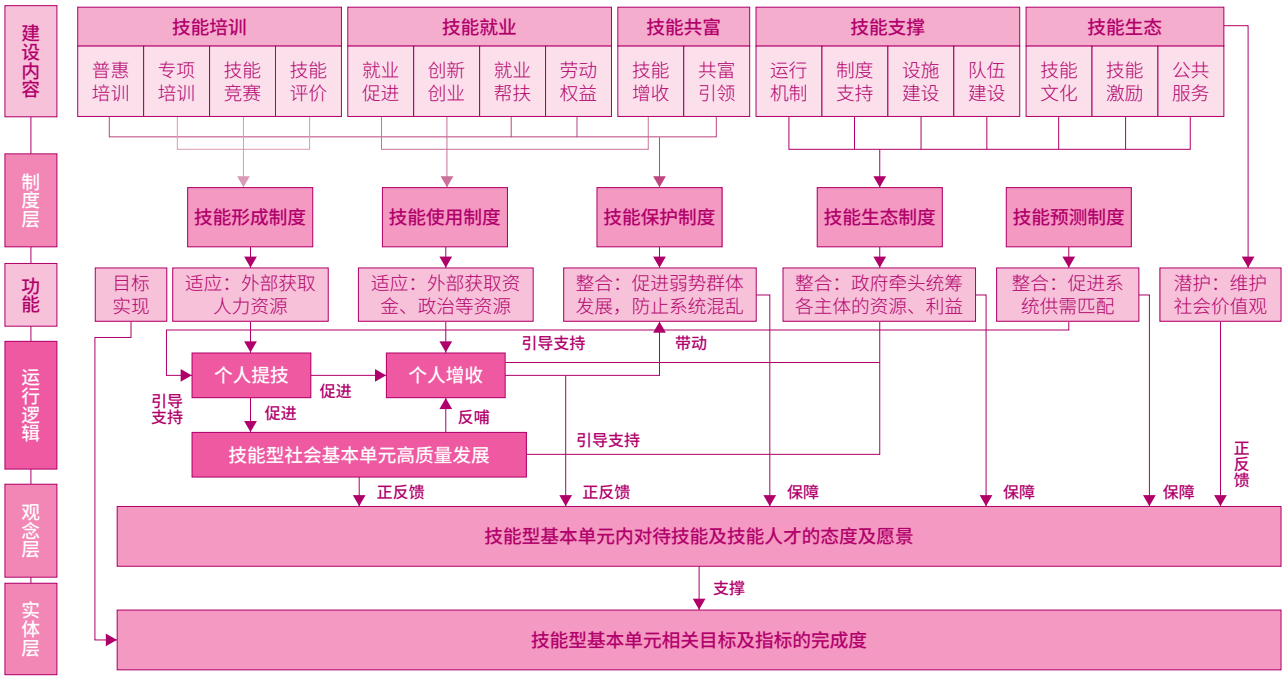


图 1 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共性运行机制

需要通过发挥潜护功能来促成共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还需要个人增收、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一种正反馈，并通过技能保护制度、技能生态制度、技能预测制度的整合功能来进一步保障。其中实体层，即技能型基本单元相关目标及指标的完成度，它以观念层形成支持，并因目标实现功能的发挥而最终实现。

综上所述，以上“建设内容—制度层—功能—观念层—实体层”的架构便是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共性运行机制（参照图 1）。其中最核心的运行逻辑就是实现“个人提技→技能型基本单元高质量发展→个人增收”的正向循环。

2. 个性运行机制。不同的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有着不同的建设目标，也意味着他们的实体层有所不同。不同的实体层决定了支撑它的观念层和制度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应的运行机制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实体层（工作目标）：技能型乡村（社区）逐步实现“党建引领、技能赋能、增技增收、不落一人、千村千样、产业支撑、生态优美、文化传承”的愿景，技能型企业要逐步实现“党建引领、重视技能、产教融合、自主优评、增技增效、以技提薪、人人参与、匠心传承”的愿景。

观念层：在技能型乡村（社区），应持有“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观念；在技能型企业，应持有“产业聚技能、技能兴产业”的观念。

核心运行逻辑：技能型乡村（社区）是“培养一支专项队伍→发展一个特色产业→促进一村（社区）百姓致富”，技能型企业是“职工增技→企业增效→职工增收”。

制度层：在技能形成制度上，技能型乡村（社区）技能形成门槛较低，技能型企业通过产教融合及企业内传帮带；在技能使用制度上，技能型乡村（社区）获取外部资源的路径较窄，主要通过薪酬激励，技能型企业通过技能薪酬挂钩、技能入股、构建 H 型职业发展通道等方式；在技能保护制度上，技能型乡村（社区）侧重就业帮扶、共富引领，技能型企业侧重劳动权益保护；在技能生态制度上，技能型乡村（社区）依托设施主要有共富工坊、文化礼堂等，政策配套集成度不够，技能型企业依托技能创富型企业，有较多政策配套。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三维内涵，且构建了以技能型企业和技能型乡村（社区）为核心基本单元的共性运行机制，并对比了两类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的个性运行机制。如何将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实践且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其运行逻辑，是本文后续研究完善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张弛，赵良伟，张磊．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2021, 42(13): 6−11.

[2] 王星，吴佳峻．迈向技能社会：理论基础、内涵特质与现实挑战 [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2, 21(03): 17−26.

[3] 徐国庆．“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专刊编者按语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 42(04): 5−8.

[4] 霍丽娟．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涵特征、测度模型及路径优化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3): 68−77.

[5] 姜蓓佳，徐国庆．建设技能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形成体系——基于中国企业用工情况的调查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11): 28−40.

[6] 杨钋，姜琳丽，徐斯沛．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技能型人才就业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 42(04): 23−38.

[7] 张弛，和震．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路径：基于技能型人力资本增值的张力转化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25(04): 112−117.

[8] 刘娜妮，张学英，张东．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政策指向、建设原则及制度体系 [J]. 职业技术教育，2024, 45(34): 29−34.

[9]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 [M]. 刘进，林午，李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7−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建设的理论逻辑及运作机制”（2025B089）。

（作者单位：中共三门县委党校）

“拓展—建构”分析模型下“红色家书”的情感驱动与行为自觉研究

白　静

摘要：以红色家书为研究对象，探索“拓展—建构”分析模型下红色文本显性的情感流动、行为自觉和隐性的情感共鸣、行为动机，激发红色资源育人潜能，实现红色资源育人价值的最大化。采用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系统分析红色家书作者的情感表达、读者的情感认同与共振，以及情感流动对行为自觉产生的能动作用。研究发现：红色文本资源正向情感较明显；红色文本资源情感化处理方式能够推动读者行为的自觉；红色文本资源育人的情感化程度能够正向影响读者行为自觉的深度。

关键词：“拓展—建构”；红色家书；情感驱动；行为自觉

情感是人类特殊的精神产物，孟昭兰在《情绪心理学》中指出，情感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是人基于主观某种需要，结合“特定主观体验和外显表现”[1]的社会性感性反应，是稳定性、深刻性和高级性的情绪。情感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是情感通常作用于人的行为中，外化为实践的动机、倾向和目标等。作为当代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包含着真情实感的“红色家书”文本，如何实现作者与读者情感的同频共振、行为的步调一致？本文通过分析“拓展—建构”模型，探索“红色家书”文本“情感—行为”的育人效果，旨在创新红色资源育人的新模式。

一、“拓展—建构”分析模型

（一）“拓展—建构”理论

Fredrickson 最早提出“拓展—建构”理论，其后与 Joiner、Tugade、Losada 等学者共同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是正向情感还是负向情感，均具有进化适应性。正向情感是在无特别压力的情况下，个体会积极、周密考虑，“从而拓展个体的注意、认知、行动的范围”[2]，尽可能用发散性思维想更多的方法解决问题。正向情绪能带来间接、长远的收益，建构其持久、稳定的身体和心理资源以及可持续的社会交往资源，提升个体社会生存与发展能力。正向情感与“拓展—建构”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贯通的，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结合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正向情感能够拓展主体认知范围，建构良好的资源内容，即使遇到不利的环境也能够化难为易，解决问题，同时个体思维更加开阔，情感更加正向，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

（二）构建“红色家书”的拓展—建构模型

1. 情感是行为的催化剂，直接影响到作者思维的拓展与资源的建构

大部分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写给亲人和家人的信件，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最真实、真挚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对民族解放的渴望、对家人的思念与嘱托、对同志的信任与鼓励等，“透过红色家书去感受革命者在艰难岁月中对家人深深的眷恋，同时也体会到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割舍亲情的伟大。”[3]红色家书里饱含的真挚的正向情感能有效激发读者的爱国情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为思维拓展和资源建构提供情感锚点。

红色家书写作中，作者处于特定的革命环境，但大多数作者有着乐观、积极的正向情感，表现在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珍视，对前途道路的坚定。情感作为催化剂，触发作者对革命价值观的深度思考，推动作者思维由即时向长远多维度拓展；而思维拓展的成果又为资源建构提供更多方向和更丰富的内容，帮助作者从容行动，应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情况；同时，行动也会反哺情感，坚定作者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形成“情感驱动—思维拓展—资源建构—情感强化”的闭环。

2. 行为是情感的润滑油，能动地反作用于读者思维的深化与资源的优化

读者对红色家书的阅读、解读、实践等行为并非被动承接作者情感，而是通过主动介入，激发同理心，通过情感经验和记忆累积，能动地调节自身情感体验的强度与方向，唤起共有情感，进而为思维深化提供持续动力，为资源优化提供实践依据。

读者因敬仰先烈、深受感动等原因主动阅读红色家书，在阅读中逐渐与作者共情，推动思维从表层认知走向深度解构。逐字批注家书、角色扮演写信、实地走访家书写作地点等，这些沉浸式阅读行为强化情感代入，促使思维从“了解家书内容”深化为“理解背后的动机与矛盾”；将家书中的精神转化为实践性行动，反思情感与现实的连接点，推动思维从“认知认同”深化为“方法论运用”，形成“情感触发行为—行为深化思维—优化资源—思维与资源反哺情感—情感再驱动行为”的动态循环。

二、“红色家书”文本的情感定性分析

（一）文本的情感甄别

选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红色家书》[4]一书中101封家书作为研究文本，约175千字。运用软件Nvivo对其进行自动情感编码，识别出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打开编码内容查看时，发现负向情感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传递负向情感，相反而是乐观的正向情感。例如，在较为负向情感编码中，杨杰给儿子的信《世道艰苦，奋斗才是出路》中写道：“幼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非常负向情感编码中，熊亨瀚在《余将别汝与父母兄弟去矣》中写道：“儿辈须严加管束，切勿因余之死而溺爱之，以致堕落。”何叔衡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不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恽代英在写给弟媳葛季膺信中提到的“人家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我料强弟及妹，能均葆持今日志行，必可免于此状”等，都是基于客观事实描述，并非负向情感。文本识别机械地将消极词语“悲伤”“死”等纳入负向情感。为了减少不当划分，采取人工编码的形式准确地把握情感导向。经过人工编码，在结合时间、事件等背景材料、仔细阅读上下文的基础上，对101封家书进行编码，对43个无明显情感倾向的客观表述的中立编码经人工审核后予以删除，得出以下划分如表1所示。

表1 101封红色家书情感编码

类别	自动识别编码数量	人工识别编码数量
正向	101	140
非常正向	15	31
较为正向	86	109
负向	121	39
较为负向	30	5
非常负向	91	34

（二）文本的情感词语分析

通过对文本情感类型分析，正向情感在红色家书中体现得较多，为深入分析，通过查询，剔除个别数字、虚拟词语等，选取前1000个词，生成词汇云如图1所示。

图1 101封红色家书文本的关键词云可视化分布

“中国”出现的次数最多，高达192次，与革命有关的词语占比较高，例如，革命地点“上海”出现125次，革命“工作”出现141次，“加入”革命出现78次，“被捕”出现78次，“牺牲”出现69次，“狱中”出现68次；家属称呼的词语也较多，“母亲”110次，“父亲”103次等。

通过对红色家书文本内容进行情感分析、关键词甄选，红色家书的正向情感主要表现在深厚的家国情怀，宋吉玲和朱敏总结出红色家书中家国情怀具体包括：“修身立德的正己情怀、行孝尽忠的无我情怀、坚守初心的人民情怀、敢于斗争的革命情怀。”[5]

三、“红色家书”情感驱动下自觉行为定量分析

选取80名受访者，覆盖大学本科各个年级和研究生，采用定量方法研究红色家书文本对读者“情感与行为”的影响，选择与该研究主题相关专业的受众，以增强研究主体的针对性，因此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史类学生作为主要样本，累计占比80%。

（一）基本信息

受访者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受访者信息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14	17.50
	大二	21	26.25
	大三	31	38.75
	大四	9	11.25
	大五、研究生	5	6.25
专业	心理学	16	20.00
	语言学	28	35.00
	文史类	20	25.00
	理工类	9	11.25
	医学类	7	8.75
合计		80	100.0

1. 关于测量工具的信度分析

问卷信度系数值大于0.9即可认可数据信度良好，

本次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8，问卷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优良。所有分析项的项 – 总相关系数（CITC）均大于 0.7，表明各题项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共同测量了情感驱动下“行为自觉”的程度，问卷的信度质量得到充分保障。

本次问卷数据的信度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本问卷 KMO 值为 0.923；Bartlett 检验各量表（题目）数据达到显著水平（χ^2= 657.304，df=66，p<0.001），表明题目间相关性极强。

2. 关于测量工具的效度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的建构效度。结果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因子分析适切性（KMO=0.943；Bartlett's 球形检验， p<0.001）。所有题项在该因子上的载荷均较高，且共同度指标范围在 0.671 至 0.848 之间。因此所有题项都能有效测量“行为自觉”维度。

整个过程是选取 80 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研，收集数据后作为前测情况；然后进行为期 101 天的追踪，采用“情感驱动”阅读法，每天限定一小时的时间投入，饱含真情地朗读、思考和领悟一封红色家书并撰写读后感。明确自身践行红色精神的具体计划，包括行动内容、实施时间与推进要求，并每周撰写实践小结，记录行动落实情况与情感变化；最后，在第 102 天要求受访者再填一份之前的问卷，与之前的问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探索情感与行为的关系。

（二）数据分析

利用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去研究 80 位读者系统阅读 101 封红色家书前后，情感流动、认同与行为的差异性，具体由四个维度组成：情感维度是 A 家国情怀，行为维度共有三个：分别是 B 红色传播、C 服务人民、D 砥砺报国，共下设八个指标即八道题目。

1. 阅读前后情感程度整体比较

四个维度总共 8 组配对数据均呈现出差异性（p<0.05），说明系统阅读前后读者的情感变化显著，其中 B 红色传播：B1 主动参与红色宣讲，讲好红色故事；C 服务人民：C1 参与志愿服务，把对人民的热爱落实到行动中；D 砥砺报国：D1 积极参与国防教育活动，这三个维度下的三个指标均表现出阅读后读者情感转化为行动自觉的能力更强烈、更正向。

2. 阅读前后情感程度深入分析

鉴于五个指标 A1 好好学习，热爱祖国；A2 结合家书内容，走访红色遗址；B2 通过新媒体，传播红色精神；C2 领会先烈精神，毕业后到祖国、人民需要的地方；D2 入伍意识很强烈，虽然各自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但是阅读前后中位数均为 4.000，在这种虽然呈现出差异，但是中位数却完全相等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描述分析和配对 t 检验方法，验证“情感驱动”阅读对“行为自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各组数据对比显示，阅读前后在“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之间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t=–3.575，p=0.001），阅读前平均值（3.16），明显低于阅读后平均值（3.89）；阅读前后“结合家书内容，走访红色遗址”之间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t=–5.069，p=0.000），阅读前平均值（3.21），明显低于阅读后平均值（4.11）；阅读前后“通过新媒体，传播红色精神”之间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t=–3.668，p=0.000），阅读前平均值（3.23），明显低于阅读后的平均值（4.01）。阅读前后“入伍动机很强烈”之间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t=–4.133，p=0.000），阅读前平均值（3.11）明显低于阅读后的平均值（3.91）；阅读前后“领会先烈精神，毕业后到祖国、人民需要的地方去”统计分析表明，阅读前后的得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4.170, p < 0.01）。阅读后的得分（4.06）相较于阅读前（3.23）有显著提升。通过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情感驱动”阅读显著增强红色家书读者的情感流动，增强情感认同，并且情感认同与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3. 情感驱动与行为关系的解析

整合阅读前后数据，以读者阅读红色家书“家国情怀”情感程度（很浅、较浅、一般、较深、很深）为自变量，三个维度：红色传播、服务人民、砥砺报国下设六个指标的总和即“行为自觉”为因变量，探索情感与行为的因果关系（见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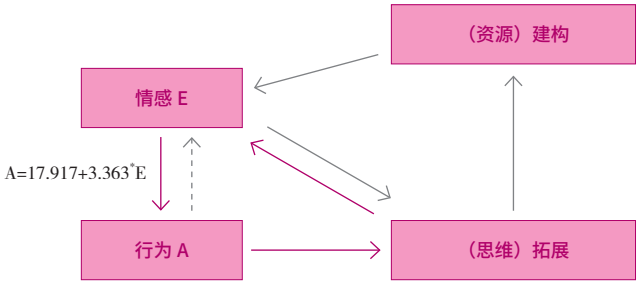
“红色家书”的“情感—行为”互动模型如图 2 所示。通过 SPSS 分析，模型公式为：行为自觉 =17.917 + 3.363 × 阅读红色家书的情感程度，模型 R 方值为 0.079，表明读者情感程度对实践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读者行为自觉改变中有 7.9% 的原因是由读者阅读红色家书情感程度引起。F=6.732，且 p=0.011<0.05，检验结果表明建立的回归模型有效，即说明阅读红色家书的情感度一定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关系。阅读红色家书的情感度回归系数值为 3.363（t=2.595，

表 3 情感与行为线性回归分析

	原始数值		标准化数值	t	显著性水平 p	共线性统计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数值			接受范围 (VIF)	接受范围（容忍度）
常数	17.917	2.948		6.077	0.000**		
阅读红色家书情感程度	3.363	1.296	0.282	2.595	0.011*	1.000	1.000
R^2				0.079			
调整 R^2				0.068			
F			F(1，78)=6.732，p=0.011				
D–W 值			0.423				

注：n=80，因变量 = 行为自觉（六个指标和）；*p<0.05， ** p<0.01。

p=0.011<0.05），表明情感与行为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注：模型情感用 E 代表，行为用 A 代表。

图 2 “情感—行为”互动模型

四、结论

（一）正向情感有助于拓展行为能力的范围，强化读者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干事创业的定力

正向情感在红色家书文本中流动，是一把有力量的行动“标尺”，在读者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校准读者选择的方向。当面对多元的路径与复杂的挑战时，这种情感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务实精神与家国情怀，会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跳出短期利益的局限，从更长远的价值维度去审视每一个选项——哪些行动契合初心、哪些选择符合大势、哪些举措能真正创造持久价值，从而在纷繁的可能性中筛选出更贴合实际需求、更具长远意义的行动方案，强化读者在更广阔领域中持续前行的定力，既能保持选择的清醒，又能保有创新的锐气，最终在干事创业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二）正向情感有益于增强个体资源的效应，提升读者在更复杂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红色家书文本中的正向情感，其价值不仅在于即时的精神共鸣，更在于为个体带来深远的间接利益，滋养着个体资源的长效增值。从深层来看，正向情感首先是个体心理资源的“放大器”。它并非直接赋予人解决问题的技能，却能通过增强心理适应性，让个体在面对复杂情况时更从容地调动自身资源：当焦虑被家书传递的坚定所化解，个体便能更清晰地梳理思路。这种由正向情感铺垫的心理状态，让个体资源的效应得到最大化发挥，进而提升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三）正向情感利于顺畅拓展建构的通道，增强读者在更多元的环境中不断进步的实力

红色家书所承载的正向情感，能有效推动读者进入正向积极状态，进而拓展其能力边界：体力上更具有耐力应对烦琐事务，思维上更易从多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心理上面对挫折时也能更快调整心态，社会交往上更愿意主动与人联结，在协作中展现出更强的包容度与沟通力。

“体验积极情绪的能力会被遗传编码，成为人类特性的一部分”[6]，红色家书这类承载着强烈正向情感的文本，当个体反复沉浸于家书传递的赤诚与希望的情感流动中，不仅能在当下获得情感认同，更在日后持续深化对正向情感的认同、共鸣，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参考文献

[1] 孟昭兰 . 情绪心理学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

[2] STRUMPFER D J W. Positive emotions, positive emotionall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fortigenic living: a review[J]. Psychologic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2006, 36(01): 144–167.

[3] 江凤艳 , 廖晶晶 . 红色家书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的实践研究 [J]. 吉林教育 , 2024(35): 3–5.

[4] 恽代英 , 邓中夏 , 赵一曼 , 等 . 红色家书 [M].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7.

[5] 宋吉玲，朱敏 . 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内涵意蕴与弘扬路径———基于 100 封红色家书的内容分析 [J]. 思想政治课研究 , 2025(02): 50.

[6] 马颖 , 李雯雯 , 刘电芝 . 国外积极情绪“拓延—建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5(01): 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百年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研究”（22AKS011）。

（作者单位：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探情感之驱动 析行为之自觉

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多维探索与优化策略

张颖颖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与信息传播技术迭代升级的背景下，公立医院集团化发展成为深化医改的重要方向，而融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核心传播载体，已成为医院集团提升品牌影响力、优化医患沟通的关键抓手。本文以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调查研究法，系统梳理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主要形式，结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的实践案例，剖析当前融媒体运用在传播力、影响力与互动性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并从内容建设、人才培养、运营管理、资源整合四个维度提出优化策略。本研究也为同类医疗机构融媒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医院集团；融媒体；传播策略；品牌建设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立医院改革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要成就，不仅显著增强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而且有效防控了重大疫情，为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构筑了坚实防线[1]。公立医院已然成为维护公众健康的中流砥柱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2]。当前，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新号角已经吹响。在此背景下，医院宣传工作不再局限于单一信息传递，更成为塑造医院品牌、改善医患关系、普及健康知识的重要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医院宣传依赖于宣传栏、纸制品等形式，因传播速度慢、覆盖范围有限、互动性缺失等问题，难以满足患者对医疗信息“即时化、精准化、个性化”的需求。新媒体平台的多渠道传播特性，如微信、微博和短视频平台等，极大地扩大了医院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并提升了影响力[3]。与此同时，公立医院集团化发展趋势显著，如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通过整合多院区资源，形成“特色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这一模式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打破单院宣传壁垒，构建覆盖全集团的统一传播体系，而融媒体恰好为这一需求提供了技术与平台支撑。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填补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系统性研究的空白，通过分析当前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现状及瓶颈，结合实践案例提炼可复制的优化路径，为医院集团融媒体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操作指南。

从实践意义来看，有效的融媒体运用可帮助医院集团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通过及时传递医疗资讯、专家资源等信息，缓解医患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患者信任度；同时，融媒体平台可作为科研成果推广与学术交流的载体，助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从“集团化”视角切入，突破单院融媒体研究的局限，聚焦多院区资源整合与协同传播，丰富了医疗领域融媒体研究的维度，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采用多方法融合的研究思路，有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实用性。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研究视角创新，从医院集团整体层面出发；二是研究内容创新，不仅分析融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还拓展至品牌建设、医患关系改善、医疗服务延伸等领域。

二、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现状

（一）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主要形式

当前医院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已成为医院进行健康知识传播、塑造医院品牌的重要阵地，让医院宣传工作者可以脱离“等记者、等见报”的模式，借助新媒体把信息更加精准、快速地传播到不同受众中[4]。

1. 网站：基础信息传播平台

网站是医院集团对外展示的核心窗口，具备信息集中、权威性强的特点。多数医院网站涵盖“医院概况”“科室介绍”“专家团队”“医疗服务”“科研

教学”“健康科普”六大板块，通过清晰的导航设计与响应式布局，满足不同终端用户需求。

2. 微信公众号：核心互动传播阵地

微信公众号是医院融媒体运用的核心平台。从内容来看，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图文消息，涵盖医院新闻、专家坐诊通知、健康科普等，在形式上采用“图文结合”“漫画解读”“信息图”等方式，降低医学知识理解门槛；从功能来看，微信公众号普遍整合“预约挂号”“在线咨询”“AI 导诊”等服务，增强用户黏性；从互动来看，通过“健康知识问答”“留言抽奖”“患者故事征集”等活动，提升用户参与度。

3. 短视频平台：新兴传播载体

随着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医院宣传逐渐将其作为传播新阵地。短视频以“短、平、快、趣”为特点，适合传递碎片化医疗信息，健康科普类短视频、医院文化类短视频、品牌推广类短视频成为主要内容类型。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可根据用户兴趣精准推送内容，扩大传播范围。2024 年某医院视频号发布的“骨科讨厌你做的三个动作，中招了吗？”短视频，单条播放量突破 120 万次，有效提升品牌曝光度。

4. 直播：实时深度传播形式

直播作为“实时互动”传播形式，近年来在医院融媒体中广泛应用。常见直播类型包括“专家讲座直播”“健康科普直播”“活动直播”。直播过程中，专家可实时解答用户提问，有效拉近医患距离；同时，直播可通过“回放功能”实现二次传播，延长信息生命周期。

（二）案例分析

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为例，该集团下设 5 个院区，2019 年成立集团宣传中心，构建“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全员参与、分工协作”的宣传体系，其融媒体实践具有代表性，主要举措包括以下方面。

1. 规范化管理：筑牢传播基础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新闻“撰稿—校对—审核—发布”全流程责任，确保信息准确合规；二是实行分级管理，各院区分中心、科室微信公众号采用“院科两级审核制”，建立“谁建立谁负责”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三是创建“网格化”通讯员队伍，覆盖各院区、科室，定期开展培训；四是强化考核激励，将宣传工作纳入各部门绩效考核，设置个人、科室奖项，激发全员参与热情。

2. 多元化传播：构建融合矩阵

一是打造核心传播矩阵，整合“服务号 + 订阅号 + 视频号 + 抖音 + 小红书”五大平台，明确各平台定位；二是加强内容顶层设计，定期召开宣传沟通会，结合重点工作规划阶段性宣传主题，保持内容风格统一；三是深化外部合作，与电视台、报纸合作制作健康节目、开设专栏，与专业传媒公司合作优化短视频内容，打造“医生 IP”；四是整合内部资源，建立宣传部门与临床科室的“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将最新内容转化为宣传素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 传播力：平台发展不均衡

调查显示，70% 的受访者通过微信公众号获取医院信息，50% 通过短视频平台，仅 30% 通过网站、20% 通过微博，表明微信公众号与短视频平台已成为主流传播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站存在“信息更新滞后”“功能入口隐蔽”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不佳；微博则因医院集团运营投入不足，难以吸引用户关注。

2. 影响力：健康科普成核心吸引力

约 60% 的受访者表示，融媒体平台内容对就医决策有影响，其中“专家团队介绍”“医疗技术展示”是主要影响因素；健康科普类内容中，“大众疾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阅读量与转发量最高，分别占科普内容总阅读量的 45% 和 30%。这表明医院集团融媒体在品牌塑造与就医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且健康科普是吸引公众关注的核心内容。

3. 互动性：功能与需求存在差距

尽管 80% 的融媒体平台设置留言、评论等互动功能，但仅 10% 的受访者参与过互动；65% 的受访者希望通过融媒体平台与医生直接沟通，获取个性化医疗建议，而目前仅 30% 的医院集团在微信公众号中设置“在线咨询”功能，且存在“回复不及时”“咨询范围有限”等问题。

三、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优化策略与建议

（一）强化内容建设，提升传播质量

1. 挖掘优质内容，精准匹配需求

一是聚焦健康科普，组建“医学专家 + 科普编辑”团队，针对不同人群定制内容；同时，结合季节、热点规划科普主题，提高内容时效性。二是讲好医患故事，收集真实案例，通过情感共鸣增强内容感染力，传递医疗人文关怀。三是传播医院动态，及时报道信息，展现医院综合实力与社会责任。

2. 创新内容形式，增强吸引力

一是丰富短视频形态，除传统科普短视频外，尝试“剧情式短视频”“直播回放剪辑”“动画短视频”，满足不同用户喜好；二是优化图文内容设计，采用“信息图”呈现复杂数据，用“漫画”解读，提升内容可读性；三是探索沉浸式体验活动，利用 VR 技术让用户获得“虚拟体验”。

（二）加强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1. 引进与培养专业人才

一是引进融媒体专业人才，招聘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充实团队力量；优先选拔兼具医疗背景与新媒体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内容专业性[5]。二是培养现有人员技能，定期组织培训。鼓励医务人员参与融

媒体内容创作，激发创作热情。

2. 建立高效协同团队

构建“医学专家 + 新媒体运营 + 内容创作 + 技术支持”的融媒体团队，明确各角色职责：医学专家负责内容审核与专业指导，新媒体运营负责平台管理与推广，内容创作负责文案、设计、视频制作，技术支持负责平台维护与功能开发。建立“周例会 + 月度总结”机制，定期沟通内容策划、运营问题，确保信息共享。推行“项目制”工作模式，针对重大宣传主题成立专项小组，集中力量完成任务，提升工作效率。

（三）优化运营管理，提高传播效果

1. 制定科学运营策略

一是明确平台定位，根据不同平台特性规划内容：微信公众号侧重“服务 + 深度科普”，每日固定时段推送；短视频平台侧重“趣味科普 + 文化展示”，选择用户活跃时段发布；网站侧重“权威信息 + 基础服务”，确保信息每日更新，优化搜索功能。二是利用数据分析优化运营，通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短视频平台数据中心，分析用户年龄、地域、兴趣偏好及内容阅读量、转发量、互动率，调整内容方向与发布时间。三是打造品牌 IP，推出“专家 IP”，通过固定人设、特色内容增强用户记忆；打造“栏目 IP”，形成内容辨识度。

2. 加强与受众的互动

一是及时响应用户需求，建立回复机制，确保公众号留言、短视频评论、私信及时回复；针对高频问题制作“常见问题解答”，方便用户快速查询。二是开展多样化互动活动，线上举办“知识竞赛”“患者故事征集”，设置奖品；线下组织“粉丝日”，邀请用户参与，增强用户黏性。三是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定期通过问卷、访谈收集用户对融媒体内容与服务的建议。

（四）加强合作与资源整合

1. 深化外部合作

一是与传统媒体合作，与地方广播电视台合作制作健康节目，与报纸、期刊合作开设健康专栏，发布深度科普文章与医院动态，借助传统媒体权威性扩大影响力。二是与新媒体平台合作，与抖音等平台合作开展“健康话题活动”，利用平台流量扶持政策提升内容曝光度；与医疗类 KOL、健康类自媒体合作，邀请其参观医院、采访专家，发布宣传内容，实现“借势传播”。三是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与社区、学校、企业合作开展“健康讲座”“科普进社区”活动，将融媒体内容推广至线下，扩大受众范围。

2. 整合内部资源

一是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宣传部门与临床科室、科研部门、护理部、门诊部建立“信息对接小组”，定期收集“新技术开展”“科研成果”“患者服务创新”等信息，确保宣传素材及时获取；如科研部门取得重大成果，宣传部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提升成果转化率。二是实现多院区资源协同，制定“集团统一宣传手册”，明确各院区宣传重点与分工；在重大宣传主题中，各院区同步发布相关内容，形成“集团宣传矩阵”，扩大传播声势；建立“院区宣传资源共享库”，整合各院区优质科普素材、视频作品，实现资源复用。

四、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医院集团融媒体运用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当前医院集团已构建的融媒体传播体系，在信息传播、品牌塑造、医患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平台发展不均衡”“互动性不足”“内容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内容—人才—运营—资源”四维优化策略：通过挖掘优质内容、创新形式，提升传播质量；通过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创建协同团队，强化人力支撑；通过科学运营策略、加强互动，提高传播效果；通过内外合作、资源整合，形成传播合力。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的实践表明，这些策略可有效提升融媒体运用成效，为其他医院集团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苏剑楠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公立医院发展的百年历程与经验 [J]. 卫生经济研究 , 2024, 41(02): 1−4, 9.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EB/OL]. (2021−06−04)[2025−10−28].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6/04/content_5615473.htm.

[3] 陈广辉 . 新媒体时代医院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实践与创新路径 [J]. 传奇故事 , 2023(34): 111−113.

[4] 于涵秋 , 王蕾 , 杜孟凯 , 等 . 新时期医院新媒体管理对策探析 [J]. 中国医院 , 2019, 23(11): 78−80.

[5] 张燕妮 . 新媒体时代医院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J]. 大众标准化 , 2020(19): 163−164.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中心）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的分析

龚　佳

摘要：当前，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普遍存在着参与“被动化”、治理“形式化”、决策“边缘化”等困境，制约着高校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以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为核心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旨在系统诊断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深层阻滞因素。研究发现，双向信任缺失削弱了参与意愿与合作基础，规范体系虚化导致参与过程失序、权责模糊，网络结构梗阻则造成参与力量碎片化与渠道不畅。三者相互交织，构成了抑制有效参与的“低社会资本陷阱”。而对社会资本进行针对性系统培育，即通过信息透明与闭环反馈重建信任，借由细化制度与培育协商文化健全规范，依托缩短沟通链路与赋能学生组织优化网络，可以有效突破这一困境。
关键词：社会资本；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的总体要求。高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高等院校作为培养具备优秀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和高度社会适应力的高水平大学生的重要阵地，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高低，直接关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更深刻影响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治理的内涵不仅包括管理者管理能力的高低、管理方法的科学水平、管理技术的日益精进，更在于师生共同参与高校治理形成民主合力[2]，以整合优化高校治理结构，重塑高校治理文化。其核心要义便是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化大学治理制度，这也是“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从价值导向走向有效实践的现实诉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学生日渐增强的自主意识促使其身份定位不再单纯拘泥于教育的单向接受者与被管理对象，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重要主体性地位愈发凸显[3]。然而，如今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却存在着参与“被动化”、治理“形式化”、决策“边缘化”这三大现实困境，成为阻碍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关键症结，制约着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远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以其独到的信任、互惠规范与社会网络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将传统研究重心由个体单位转向多元关系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逻辑，为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现实困境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视角与行之有效的突破途径。

因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聚焦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核心维度，系统剖析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生成机理，解答社会资本各维度的匮乏如何具体制约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实践，为高校优化治理格局、构建“治理共同体”提供兼具学理支撑与现实可行的路径参考。

二、社会资本理论三维分析框架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适用性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由经济学“资本”概念阐发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4]。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5]。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从功能主义出发，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6]，这一论述揭示了社会资本具有促进特定行动目标实现的生产性功能。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针对公共治理与集体行动的研究，将社会资

本阐述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7]。这一定义实现了从个体资源向集体属性的转向，强调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三者相互作用，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促成自发合作，从而提升共同体的治理绩效。自此，社会资本开始由静态“拥有”状态，转向动态“运作”过程，成为解释民主治理效能差异的关键变量。

因而，社会资本理论具有对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的内在契合性与独特解释力。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本质，是基于信任合作的多方协同及其集体行动过程，治理成效不单局限于制度本身，更依赖于高校内部关系网络、共享规范及成员间的信任水平，故而可以为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提供整合性的“关系—结构”分析框架，超越对孤立个体及静态制度的传统研究，转而聚焦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质量，以及维系互动关系的内外部资源如何有效调动，为提升治理效能创造有利条件。

（二）三维分析框架的要素解析：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

基于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经典诠释，并综合相关研究，本文以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为核心构建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用以系统检视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运行机制。

信任是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心理基础与合作前提。就本文而言，信任是指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基于理性认知与感性认同所共同促进形成的、对对方行为抱有乐观积极预期的心理状态。互惠规范是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行为规则与制度保障。互惠规范在高校这一特定场域内，主要是指各行为主体之间由互动行为产生、被普遍认同的规则体系，明确了各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对彼此的互动期望，并拥有为稳定合作而设立的奖罚机制。网络关系是学生参与治理的沟通渠道与资源平台。在高校治理中，网络关系是指将学生、学生组织及社团、学校行政机构等串联成网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关决策、资源等信息在这一网络中传递、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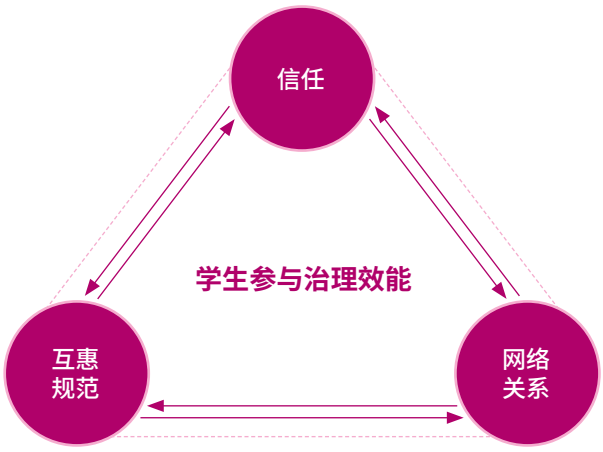


图 1 三维要素的互动逻辑与整合性分析模型

（三）三维要素的互动逻辑与整合性分析模型

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动态强化的有机系统。

如图 1 所示，通畅的网络关系与频繁的网络互动将催生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培育信任，由信任产生的持续合作又将助力于构建更为协调、稳固、公平的互惠规范，这一健全的规范进一步为网络关系的畅通提供了制度保障，鼓励更多行为体参与高校治理过程，有助于更高质量的治理行为产生，三维要素由此形成相互促进、正向增强的良性循环。

三、社会资本匮乏下大学生参与治理的三重阻滞

（一）信任缺失：参与意愿的下降与合法性危机

信任是合作的心理基石[8]。在大学生参与治理中，信任缺失表现为双向互构特征：学生对学校决策程序的公平性存疑，如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奖助学金规则修订等事前缺乏透明度、事后缺乏说明，学生通过辅导员、教研室主任、学代会提案、校长信箱等正规渠道反映问题，正规渠道反馈常如石沉大海，削弱参与信心；校方对学生能力不信任，倾向将学生参与限定于后勤、活动等边缘领域，排斥其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等核心事务中的参与。这种信任赤字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学生因不被信任而缺乏参与动力[9]，校方因学生参与不足而更加确信其能力欠缺，双方陷入相互印证却又彼此隔绝的困境。信息不对称与权责不对等是信任缺失的根源，导致“学校不放权、学生不参与”的恶性循环，参与意愿持续下降，合法性不断侵蚀。

（二）规范虚化：参与过程模糊与制度化困境

互惠规范应为参与提供规则预期与权责保障，但现实中常出现规章虚置、实践脱节。学生参与尺度取决于校领导开明程度等非制度性安排，“学生参与民主管理”条款沦为形式。师生身份结构差异使学生在协商中处于弱势，意见表达沦为“汇报”，协商成为“政策宣讲会”，形成消极文化。学生群体公共理性尚未养成，情绪化表达与功利性诉求加剧“学生能力不足”偏见，非正式规范孱弱。规则虚化使学生对参与望而却步，校方担忧失控，双方难以形成稳定博弈平衡，极大提高参与成本[10]。

（三）网络梗阻：参与渠道的梗阻与力量耗散

通畅的社会网络承载信任与规范，聚合参与力量。但当前网络结构存在“纵向隔阂、横向松散”问题。纵向层面，信息传递需经多层级，自下而上的反馈效率低下，各层级“报喜不报忧”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层难掌握真实动态。横向层面，校院两级学生会、共青团组织、社团联合会等，是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

重要平台，但其自身在参与治理方面常常存在治理表面化、代表片面化等问题[11]，学生组织间缺乏联动，力量分散。网络梗阻的深层后果在于，它切断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机制——当信息无法顺畅流动、关系无法有效联结，信任无从积累，规范无从生成，个体力量只能孤立存在而无法转化为集体行动效能。信息不畅、网络割裂不利于高质量社会资本积累，制约参与效能提升。

四、系统培育党领导下的“师生治理共同体”

如前所述，意图突破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过程中因社会资本匮乏而产生的三重现实困境，推进参与治理由形式走向实质，其关键在于系统性培育基于相互信任、遵规守纪、畅通网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高校治理体系，构筑“师生治理共同体”。

（一）形成双向互信的心理契约与参与文化

打破师生之间心理隔阂，增进可预期透明化的良性互动，夯实彼此心理契约是破解信任危机的必由之路。

第一，以“全过程公开透明”重构制度信任。校方应推动治理全流程信息公开，包括政策由来、方案选定、论证流程与意见反馈。人才培养方案等重大事项修订前应公布草案，召开听证会，形成“事前征询—事中协商—事后检验”闭环。第二，通过“闭环式反馈”兑现信任承诺。建立强制性、时限性回应机制，依托“一站式”社区、校长信箱等渠道，对学生提案生成待办工单，跟踪督办回访，做到“事事有回应”。这种机制不仅解决具体问题，更在每一次回应中累积学生对于制度可信任的感知，实现信任的再生产。第三，以“能力建设”增进主体信任。举办“治理能力提升班”等，培训学生代表，提升其提案质量与治理能力，展示参与潜力。

（二）健全刚柔并济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保障

正式规范层面，推动“原则条款”向“实施细则”转化。出台《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实施办法》，明确学生有权参与的事务清单、参与程度（知情、咨询、协商、决策等），规定各级治理机构中学生席位占比、代表产生程序、议事权限及表决权，保障提案、质询、投票等权利。非正式规范层面，培育“对话协商”常态化机制与校园治理文化。鼓励师生基于理性、尊重、互利共赢的对话协商，师长平等倾听，学生理性表达。将校领导午餐会、接待日等沟通效果显著的协商平台升格为定期机制，通过持久协商共治，内化为校园治理文化。

（三）打造纵横贯通的社会网络与赋能平台

疏通纵向网络，优化科层化信息传递流程，探索学生代表与校领导定期面对面沟通机制；建设高度集成的数字治校综合平台，实现政策发布、提案提交、进度跟踪、结果反馈等功能，打造扁平透明的信息“高速公路”。激活横向网络，保障学生组织人事与事务的相对独立性，强化其代表、管理、服务学生的本职功能。学校发挥价值引领、能力培育、资源支撑作用，避免学生组织沦为行政部门延伸，引导其成为学生权利的真正代言人与信息传导的关键节点。数字平台的引入不仅缩短信息链路，更创造了跨越层级的直接对话空间，使网络关系的重塑从理想变为现实。实现纵横网络的“枢纽式对接”，通过“横向聚合、纵向对接”，将学生理性声量汇聚放大，以高保真状态进入决策层，从根本上改变参与效能格局。

五、结语

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深化不仅依赖于正式制度的完善，更取决于高校治理场域中关键资源的丰富与互动质量的提升。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高校治理研究，可以有效超越对静态结构与个体动机的孤立考察，转向关注连接多元主体的互动生态与关系网络，这为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路。从根本上说，构建基于信任、规范与网络的“师生治理共同体”，不仅是一项治理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文化变革，对于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备坚定集体主义精神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B/OL]. (2019-11-05)[2026-03-04].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2] 袁占亭 .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证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19(22): 7-9.

[3] 曹辉 . 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学生参与 : 动因、路径及其实现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20(02): 48-55.

[4] 皮埃尔 · 布尔迪厄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 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

[5] 陈柳钦 .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J]. 东方论坛 , 2007(03): 84-121.

[6]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 95-120.

[7] 罗伯特 · D. 帕特南 .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王列 , 赖海榕 , 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01.

[8] SCHILKE O, REIMANN M, COOK K S. Trust in social rel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1, 47(01): 239-259.

[9] 孙薇 , 于翔 . 高校内部治理的学生参与机制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 2017, 35(08): 46-50.

[10] 马思腾 , 褚宏启 . 学生参与学校（下转 99 页）

数智时代异化现象的现实表征、生成根源及扬弃路径
——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张莫晗

摘要：数智时代的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在重塑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异化现象。本文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探讨数字智能背景下异化的典型表征及深层成因，重点分析技术异化方面所带来的人工具化风险和结构性剥削问题。基于这一诊断，文章进一步挖掘数智时代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主张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与创造性，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从而引导数字技术发展重回以人为本的轨道，避免技术至上导致的新异化困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数智时代；技术异化；资本异化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渗透到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在赋予便利且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激起了新的异化风险：人类的思维方式、劳动样式乃至社会关系，都有陷入被技术把持和资本统治的境地的可能。在技术滥用的条件下，人从创造者变成了工具，异化现象再次显露，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行反思批判。从马克思在早期手稿里提出“异化劳动”[1]概念起，异化理论始终是分析资本主义弊病的关键思想工具，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我们有必要再度审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现实意义，以揭示数智时代异化现象的本质，并探索摆脱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路径。本文将在梳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审视数智时代异化的根源与具体表征，进而探索扬弃异化的可行路径。

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概述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起源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状况的批判性考察，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成果。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指人类的劳动活动及其产物异化为独立于人并反过来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不再属于工人自身的本质活动，而是变成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手段，由此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劳动现象。马克思将异化劳动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劳动成果脱离劳动者而存在，反过来压迫工人；二是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是不自由的强迫劳动，劳动活动本身令工人感到压抑和痛苦；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异化为仅维持生存的手段，工人失去作为类主体的创造本性；四是人同人之间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被资本利益所扭曲，工人和资本家形成对立，两极分化的人际关系充满冷漠和疏离[2]。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生存状态：工人在劳动中感到与自己的产品和本质相隔裂，劳动的成果被剥夺，人与人之间陷入对立冲突。这一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体和社会造成的异化后果，如

（上接 98 页）治理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43(03): 110−123.

[11] 赵申苒，张昊远，赵国祥 . 高校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挑战、意义与实践路向 [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2024, 7(02): 104−1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项目“社会资本视域下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研究”（CSZ24039）。

（作者单位：四川旅游学院）

贫富悬殊加剧和社会联系异化等。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鲜明的现实批判维度。逻辑上，马克思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入手揭示异化根源：私有制是异化产生的主要根源，固定的社会分工是异化得以持续的最终根源。他指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发展路径是从物的异化扩展到人的异化，进而导致社会全面的异化，其背后根源就在于资本占有的私有财产制度。也就是说，劳动产品脱离工人引发物的异化，工人自身沦为雇佣劳动工具引发人的异化，最终全社会分裂为资本与劳动两大对立阶级，人与人的关系也陷入异化。这种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合理性，并为批判现实提供了理论武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消除异化现象，根本途径在于扬弃滋生异化的私有财产制度，实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跨越。他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这一异化根源，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才能使劳动回归人本身，从根本上解放被异化的人。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揭露了异化的现实症结，更指明了超越异化走向人类解放的方向。

二、数智时代异化现象的结构性呈现

（一）技术理性霸权与“工具人”生成

数智时代的技术异化首先表现为人在智能技术面前主体地位的退化，即“人的工具化”风险不断上升。马尔库塞早就警示过现代社会的“技术拜物教”现象：技术理性凌驾于人类价值之上，技术手段的合理性被当作普适标准，甚至异化为支配人的政治合理性。在算法广泛应用的当今社会，这一风险正变得愈发明显。智能算法作为技术理性的极致体现，被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人的思维和行为进行精密控制。其结果是，人逐渐丧失自主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沦为被算法驱动的“工具人”[3]。

在劳动领域，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深度介入则引发劳动异化的新形式。平台通过算法严密监控和调度劳动者，将外在的管理转化为劳动者内在的自我约束，迫使劳动者按照算法设定的最优方案流水线式地工作。在外卖、网约车等新型数字劳动中，平台算法以接单量、评分机制等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劳动者为迎合算法考核指标而超负荷工作，难有自主调节的余地，劳动过程被异己力量所主宰。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被挤压殆尽，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类本质逐步丧失。正如有学者指出，算法为网约工人预先规划好工作路径和节奏，劳动者只能机械执行指令。这表明，数智技术如果不受约束地运用于劳动管理，极易把工人降格为听命于数字指令的附庸，强化了劳动异化的程度。

（二）算法规训下的劳动过程重塑

数字技术并未摆脱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反而为资本扩张赋予了新的手段，使资本异化进一步加剧，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和新型剥削形式的出现。当今以平台经济、大数据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了资本向少数寡头企业集聚，造就出垄断性的数字巨头，凭借数据、算法和网络效应，这些数字资本掌控了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关键环节，实现对生产过程、市场行为乃至社会舆论的精确控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劳动者受到更严密的支配和剥削：劳动的收益进一步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被平台以数据形式无偿攫取，占有为私有财富。例如，数字平台将用户和劳动者产生的数据视为可私有占有的资产，经由算法分析整合后商品化，以换取效率和利润最大化。

垄断的平台资本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普通劳动者和用户却承担着信息被侵害、隐私被剥夺的代价。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者的价值进一步被算法系统低估，资本通过技术手段重塑了剥削关系，异化以更复杂的形式持续存在。

三、异化扬弃的实践路径与价值重塑

（一）主体性回归：数智素养与参与式设计

扬弃异化首要任务是再次申明人在数智技术面前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了财富与历史；故而只有在维系“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定位下，技术才会成为服务人类解放的手段。数智时代要攻克异化难关，必须保障人在智能人机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让技术围绕人的发展需求去开展设计与运用，而非相反。这要求从观念认知上破除对技术的迷信，防止掉进“算法崇拜”的错误区域，应引导树立理性的、批判性的技术观，引导公众懂得技术手段仅仅是服务人类意图的工具，本身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价值，才能阻止人在毫无知觉中屈服于算法权威。正如有观点着重申明的，用户应当增进对算法的批判意识，有胆量对算法的不当干预说“不”，再次拿回自身行为的掌控权，这说明教育和舆论应强化对大众数智素养的培育，使大众充分认识算法的运行机制及其潜在的偏见，从而让主体始终清醒且自主[4]。

要借助制度与技术设计来保障人的主体性不被削弱，赋予用户和劳动者更多参与数字平台规则制定与监督的权利，让他们在算法应用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与选择权。用户可以退出个性化推荐选项、掌握个人数据用途，劳动者可参与到平台算法的调整与优化环节，人对技术的主导地位得到了体现。支持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技术范式进步，在人工智能研发中植入人文关怀及用户主导思想，引导算法研发者坚守“算法服务人民”的理念，把伦理价值与用户福祉当作技术优化的关键目标，若数字技术的设计从源头上考量对人主体性的尊重与增强，技术异化风险将极大减少。

把观念启蒙、权利保障与技术改进相融合，让人们在数智时代，利用主体性去驾驭技术手段，而不是被技术牵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键是要让人们切实成为自己劳动与生活的主人。

（二）伦理共治：法规、自治与行业规范

扬弃异化的另一关键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纠正数字技术发展中“技术至上”的倾向，使科技进步重新纳入人类价值的轨道。工具理性侧重效率和手段，价值理性关乎目的和意义。当代异化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一味追求技术功利而忽视人文关怀。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在数字技术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把增进人类福祉作为科技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原则体现的正是将价值理性置于技术运用之上的基本立场[5]。共治框架应形成“强监管 + 审计 + 参与”的闭环：以个保法、反垄断与算法备案增强刚性约束；建立常态化算法影响评估与独立第三方审计；赋予用户数据可携与撤回权，赋予劳动者对考核算法的知情、协商与申诉权；行业协会制定红线与惩戒清单，强化可解释性与问责，并引入数据托管与沙盒测试，公开算法变更与风险，避免公共利益与弱势群体被边缘化。

要健全数字资本的制度性规制框架，引导技术发展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应采用法律和政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平，防止数字资本借技术垄断地位侵犯大众利益，这就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诸如针对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法规，制止平台资本借助数据和算法攫取超额收益、侵害用户权益的做法[6]。若想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真正造福人类群体，科技界和产业界要树立以伦理为先的准则，在研发及部署阶段主动评估对人的影响，防止为追求效率而舍弃基本的人道价值，倡议各国联合建立人工智能风控与伦理治理体系，增强技术的可把控性和可解说性，保障人工智能一直受到人类的监督与掌控[7]。只有当技术属性和人文价值实现统一的时候，数智技术才有望防止成为独立的异己力量，我们要给数字技术赋予价值理性的灵魂，把对人有益当作衡量技术进步的根本标准[8]，而不只是看重它的效率与利润，依靠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全球共识与共同行动，逐步瓦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逻辑[9]，使技术发展跟人类发展目标相统一，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相契合：处在真正的共同体里面，个人方可得到全面又自由的发展，技术进步才能与人类本质需求相契合[10]。

四、结语

数智时代的来临为人类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异化问题的新变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我们剖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批判武器。总而言之，数智时代异化的扬弃并非一夕之功，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初心，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不断校正技术发展的方向，我们有望逐步化解异化难题，使数智技术真正成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新契机。人类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技术命运，在数字文明中开创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尔库塞 .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王婉婉，张伟 . 视觉异化的理论谱系、现代发生与美学逻辑——兼及审视视觉异化的中国立场与方案 [J]. 河南社会科学，2025(05): 100−108.

[5] 刘洋，郭丽双 . 后弗洛伊德与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绩效逻辑——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学新释 [J]. 理论月刊，2025(04): 37−46, 158.

[6] 乔·帕特曼，赵夫鑫，王浩 . 马克思和列宁论异化 [J]. 国外理论动态，2025(02): 35−46.

[7] 陈杨 .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种本质主义吗？——评耶吉对异化概念的重构 [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4(04): 21−38.

[8] 龙其林 .“人道主义”四次论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人学属性的回归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1): 141−151.

[9] 周可 .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阐释及其意义 [J]. 理论探索，2025(01): 13−21.

[10] 朱帅 . 角色的新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为广松涉物象化论的革命性作辩护 [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3(03): 279−30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社会需求导向下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方法研究

马　娟 王秀平* 孙蓓蓓 于俊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态化，传统的卫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迅速转变的趋势。本文围绕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方法进行研究，以社会需求为根本，首先阐述研究的重要性，分析其对于卫生管理体系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保障公共卫生的意义，然后解析卫生管理动态调配中的需求识别不准确、资源共享不足、反馈效果评价不完整三大问题。最后，根据需求识别理论、协作治理理论和闭环管理理论，提出精细化需求识别机制建设、多方主体资源共享体系优化、动态成效评价机制改进等三项策略，旨在为提高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科学性与有效性提供依据，使医疗服务更加符合社会要求。

关键词：社会需求导向；卫生管理；动态调配；需求感知；协同治理

卫生管理是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环节，其资源分配的科学性与及时性直接决定健康服务的可得性与质量。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慢性病患病率的上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对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在数量、结构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出“需求总量增加、需求类型多样、需求时效紧迫”的特点。传统以行政指令为主导、以静态规划为基础的卫生资源调配模式，存在着对社会需求变化的反应滞后、资源配置与需求匹配度低、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不够等缺陷，造成部分区域卫生资源出现富余和浪费、部分区域则又存在资源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了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创新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方法，是破解当前卫生资源配置矛盾、提高卫生管理水平的关键途径。

一、社会需求导向下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研究的意义

（一）完善卫生管理体系

在社会需求动态变化的背景下，卫生管理体系需要由“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响应”，动态调配方法研究是这个转变的核心支持。传统的卫生管理体系以静态的规划为依托，调配方案大多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来制定，缺少对实时需求变化的敏感度，造成管理体系不够灵活。社会需求导向下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研究能将社会需求监测、分析与资源配置相结合，构建“需求感知—资源调配—服务供给”的动态管理链，弥补传统管理模式中“需求和调配脱节”的不足。该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卫生管理理论的内容，还能够促使卫生管理体系由“以资源为中心”转向“以需求为中心”，提高管理系统的适应性和科学性，为卫生管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二）提升卫生资源利用效率

卫生资源的稀缺是卫生管理领域长久以来的难题，供需不匹配才是资源利用低效的核心症结。目前，我国卫生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城乡、不同机构之间的配置并不均衡，优质卫生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偏远地区资源匮乏，资源调配不及时，无法满足突发需求，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季节性疾病高峰等资源调配不及时。社会需求导向下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研究，准确把握不同时空、不同人群的卫生需求差异，可指导卫生资源随着需求变化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配置，防止卫生资源在低需求区域过度积累，向高需求区域快速倾斜，实现卫生资源“按需分配”，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满足更多人的健康需求。

（三）保障公众健康权益

卫生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公众的健康权益，而社会需求导向的动态调配直接影响到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和质量。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卫生服务的要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从“基础医疗服务”转变为“预防保健、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更多方面，而且对服务的时间要求也越来越高，如突发疾病抢救、紧急医疗救援等。通过研究动态调配的方法，可以保证卫生资源随着公众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如在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加老年病护理资源，

在传染病高发季节强化公共卫生防控资源配置，在基层地区补充全科医疗资源等。这既有利于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不同的人群在需要时能获得相应的卫生服务，也有利于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的针对性，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四）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效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需求不确定性等特征，传统卫生资源管理缺少动态响应机制，往往产生应急资源“错配”或“滞后”的现象。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研究，可以构建“实时需求监测—应急资源预判—跨区域快速调配”的“循环圈”，突破资源地域“壁垒”与“储备固化”桎梏。如在流感季节性高峰到来之前，按照易感人群分布、就诊量增速等动态需求数据，预先调派发热门诊床位、抗病毒药、呼吸监护设备分配比例，联动周边城市医疗资源支援；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救援时，根据受影响地区的人口密度、中毒种类改变情况，精准投送解毒剂、重症监护小组、环境消毒器械等。这种以需求为中心的动态调配方式，可以大幅缩减应急响应时延，防止出现资源闲置或者短缺状况，从而优化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的精准度和快速反应程度，增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韧性。

二、社会需求导向下卫生管理动态调配存在的问题

（一）需求感知机制不健全

社会卫生需求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建立高效的、准确的需求感知机制，而卫生管理中的需求感知环节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方面，需求数据采集维度存在局限，目前数据大多集中在医疗机构诊疗量、住院率等常规医疗数据上，并未涵盖公众健康风险因素、潜在健康需求及特殊群体需求，缺少对公众健康的全方位了解。另一方面，需求分析的技术和手段落后，大部分地区仍旧依赖人工统计、经验分析，对多源化需求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的能力较为有限，无法实时捕捉到需求的动态变化趋势，更无法准确捕捉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需求感知机制不健全导致卫生管理机构对社会需求的判断出现偏差，进而使得动态调配缺少精准的需求依据，调配的方向偏离真实需求。

（二）资源调配协同性不足

卫生资源调配牵扯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疾控等公共卫生机构、医保部门、社区等多个主体，且调配涉及人力、设备、药品、资金等多方面，需各主体各维度协同完成。但是，目前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不足之处。一是行政壁垒，不同的地区、层级卫生管理组织间存在信息孤岛，资源调配以本区域、本部门利益为导向，缺乏跨区域统筹，资源在区域间流转不畅，难以应对跨区域的突发情况[1]。二是跨机构联动不足，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常态化的资源共享调配协议，公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医疗机构难度较大，公共卫生机构防控资源与医疗机构诊疗资源缺乏联动，资源调配低效。三是资源信息不透明，各主体掌握的资源信息不对称，卫生管理部门难以掌握区域内整体资源存量及分布，难以进行全局调配。

（三）调配效果评估机制缺失

动态调度就是一个“感知需求—调度资源—服务供给—效果反馈—优化调整”的循环过程，而效果评价是保证调度不断优化的重要环节。当下卫生管理动态调配中普遍缺少科学的、系统的调配成效评价体系。一是缺少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现存的调配效果评价多着眼于资源调配的“数量”，如调动的医护人员数量、药品数量，却忽视了调配的“品质”“成果”，如资源抵达以后对需求的满足情况，百姓健康指标改善情形、大众满意度改变状况，导致评价不能够全方位体现调配的真实意义。二是评价结果与调配调节无关，就算做了某些评价，可评价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回馈到调配决议过程之中，无法依照评价查出的问题如资源调配迟缓、资源和需求不相适应等，来优化调配方案。这就使得动态调配陷入“重调配，轻成效”的困境当中，缺少不断优化的动力，无法形成“调配—评价—优化”的闭环治理。

三、社会需求导向下卫生管理动态调配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精准化需求感知机制

需求感知理论着重体现的是利用全方位的数据收集、科学的分析方式和及时的检测方法，以准确找出用户需求的种类、数量以及其发展趋势，从而给予决策依据[2]。在卫生管理动态调配当中，需求感知是前提和基础，唯有依靠科学的需求感知理论，创建全方位、及时、准确的需求感知体系，才可做到调配方向同社会需求高度契合。该理论要求突破传统“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数据整合和数据赋能，使需求做到“可视化”“可预测”，为动态调配提供准确的需求画像。

一是拓宽需求数据采集维度，建立多源数据采集体系。整合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医保部门、社区组织等多主体的数据资源。在常规医疗数据基础上，加入公众健康监测数据、健康行为数据、环境健康数据、特殊人群数据等，形成覆盖“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全领域、“个人—群体—区域”全层级的需求数据库，确保需求数据全面完整。二是引入智能分析技术，增强需求识别和预测能力。用大数据技术做到对多种需求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和关联，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来创建需求预测模型，随时把握需求动态改变趋向，预估某个地区流感高发时节的诊疗需求规模、某个老年社区

的长期护理需求增长趋势等。三是构建需求预警机制，当需求超出常规需求阈值的地区或领域时，便能及时发出预警，从而给快速调配给予信号支撑，增强需求识别的精准度与时效性。

（二）完善跨主体协同调配体系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要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治理，需要不同的主体通过制度化的联动方式，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协同决策，来达到治理的最大化。卫生资源调配牵涉众多主体，属于典型公共事务治理范畴[3]。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创建起跨主体协同调配体系，可冲破行政层级及机构壁垒，做到资源信息互通、决策协同、行动联动，化解当前调配缺乏协同性的难题。此理论重视创建统一的协调机构，制定协同规则，完善信息共享平台，促使各个主体由“分散行动”变成“协同联动”，从而提升资源调配的总体效率。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跨主体协调机构，来协调决策。由省级或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会同医保部门、财政部门、人社部门、社区组织及各级医疗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成立卫生资源动态调配协调委员会，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和权限。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本区域卫生资源动态调配的总体规则和应急预案，统筹本区域资源信息，在日常情况下指导各主体进行资源互助，在突发情况下实施跨区域、跨机构的紧急调配，防止各主体各自为政，实现调配决策的协同性、全局性。第二，搭建一体化资源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依托云计算、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一个覆盖区域内所有卫生机构的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更新各机构的资源存量，如医护人员数量、床位数量、药品库存、设备状态、资源使用情况和需求缺口，确保卫生管理部门和各调配主体能够实时查询、共享资源信息。

（三）构建动态效果评估与反馈优化机制

闭环管理理论认为管理过程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闭合的圆圈。通过检查和评估执行的结果，将问题反馈到计划、执行环节，使管理过程不断改善[4]。在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时，依据闭环管理理论创建效果评估与反馈改良机制，可把调配效果评估融入调配流程当中，通过评估找出问题、反馈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做到“调配—评估—改良—再调配”的良性循环，保证动态调配一直契合社会需求变动，优化调配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第一，建立多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全面衡量调配的效果。从“需求满足度”“资源利用效率”“公众满意度”三个主要维度设计评价指标：需求满足度指标包括资源到达时效性、需求覆盖比例；资源利用效率指标包括资源闲置率、资源周转率；公众满意度指标包括服务质量评分、需求响应满意度等。根据不同的调配场景来调整指标权重，保证评价的针对性和全面性。第二，建立评估结果反馈和迭代优化机制，促使调配持续改进[5]。明确评估周期，常规调配每季度开展一次效果评估，应急调配在事件结束后 1 个月内完成评估；成立评估结果分析小组，对评估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识别调配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评估报告反馈给协调委员会和各调配主体；协调委员会根据评估报告制定优化方案，调整调配规则，完善需求感知机制或强化跨主体协同。例如针对“资源调配滞后”问题，优化调配流程，缩短审批时间；针对“资源与需求不匹配”问题，细化需求分类，调整资源调配类型，确保评估结果切实转化为调配优化的动力，实现动态调配的持续改进。

四、结语

社会需求导向的卫生管理动态调配，是应对卫生健康需求多元化和动态化的关键举措，不但能够完善卫生管理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且能够切实保障公众健康权益，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其研究意义的阐述，来认识动态调配在卫生管理中的重要价值；通过对需求感知不精准、协同性不足、评估机制缺失三大问题的整理，找到目前调配工作的主要问题；通过结合需求感知理论、协同治理理论、闭环管理理论提出相应对策，为动态调配优化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 鞠龙飞，王鹏，袁鹏，等. 国境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现状与优化对策研究 [J]. 口岸非传统安全学刊，2025, 2(04): 60−66.

[2] 梁欣，包曹歆，张颖. 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定位及干预方法的应用研究 [J]. 生命科学仪器，2025, 23(03): 73−75.

[3] 李业安，罗珊，张留. 医院卫生管理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干预的效果 [J]. 中国卫生产业，2025, 22(08): 52−55.

[4] 李艳红，凌宗宝. 医院公共卫生管理中使用 PDCA 模式的效果 [J]. 中国卫生产业，2025, 22(01): 105−108.

[5] 蒋树林. 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卫生管理中的应用 [J]. 管理学家，2025(07): 66−68.

（作者：马娟，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通信作者王秀平，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孙蓓蓓，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济师；于俊丽，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社会变迁背景下女性生活满意度研究

任　瑞

摘要：生活满意度是指对个人生活的综合认知判断。本文在建构中国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2017 年）有关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数据，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国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从工作、社会保障、个人特征、社会态度等核心维度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部分工作属性、单一社保类型、社会阶层自评、婚姻满意度、社会信任感及政治参与度，对女性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单位所有制、其他社保类型、健康与经济状况、生态环境及公平性认可无显著作用。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改善女性就业环境提供依据。

关键词：女性；生活满意度；个人特性；代际差异

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我们既要注重发展的效率也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关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视，女性的诉求应该得到重视。本文从多个角度探析影响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解读女性居民诉求的新变化，打破固有认知，为提升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提供思路。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界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体系的构建有不同看法。方纲等认为主观幸福是通过生活满意度来评估的，具体区分为整体（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特殊）生活满意度[1]。胡荣华等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本人生活质量作出的主观评价，是衡量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2]。徐龙顺等指出，个体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有性别、年龄、健康等，并将生活满意度归纳为个体特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心理等七个领域[3]。赵文龙等指出，社会阶层对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若忽略社会阶层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环境和收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阶层分化正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不可等量齐观[4]。朱迪提出了一个主要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质量和个体生活质量构成的分析框架，以此能够对相关政策制度作出回应，也从社会学的视角强调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环境因素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5]。洪大用指出，环境污染这一指标，通过身体健康、寿命、情绪等途径，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6]。储德银等研究发现，较高的区域空气污染程度显著降低了居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7]。关于生活满意度指标的建构研究较为充分，但少有学者关注女性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研究是对社会变迁背景下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思考，重点考察个人特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基于研究的需要，在对工作因素、社会保障、个人特征、社会特征等几个相关方面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女性居民从事全职工作，得到的保障越强，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假设 1b，在国有制单位工作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假设 2，参加社会保障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假设 3a，身体健康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假设 3b，自我评价所处社会阶层越高，女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假设 3c，婚姻满意度越高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假设 4a，对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假设 4b，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7），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对象为在现住址居住的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女性居民，不区分城乡，有效样本数 6647 个。

（二）变量

1.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指数，该项指标得分在 0~10。在该变

量中得分越高，意味着满意度就越高。

2. 自变量

第一，工作变量。①工作性质。全职工作 =0，非全职工作 =1。②管理活动。管理者 =0，被管理者 =1。③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合同 =0，签订合同 =1。④是否国企。是 =0，不是 =1。

第二，社会保障变量。①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加 =0，未参加 =1。②基本养老保险。参加 =0，没参加 =1。③商业医疗保险。参加 =0，没参加 =1。④商业养老保险。参加 =0，没参加 =1。

第三，个人特征变量。①身体健康状况。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5，得分越高说明身体越健康。②社会阶层。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10，得分越高即被访者自我界定所处社会阶层越高。③家庭经济状况。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5，得分越高说明经济状况越好。④本人经济状况。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5，得分越低说明本人经济状况越好。⑤婚姻满意度。数值型变量，反向赋值，得分在 1~5，得分越低说明婚姻满意度越高。

第四，社会态度。①社会信任。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5，得分越高说明对社会的信任感越强。②社会公平性认可。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 ~ 5，得分越高说明认可度越高。③生态环境满意度。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6，得分越高满意度越高。④政治参与度。参与 =0，不参与 =1。

3. 控制变量

①年龄分组。以出生年代为界限，设置虚拟变量。出生日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女性居民 =0，出生日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女性居民=1。②受教育程度。数值型变量，得分为 1~13，数值越高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③婚姻状况。虚拟变量（未婚 =0，已婚 =1）。为了便于统计，将未婚、离异、丧偶等婚姻状况统一定义为“未婚”。④户籍所在地。农业户口 =0，非农业户口 =1。

（三）模型

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来估计参数值。为了避免出现统计偏差，对所有回归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各变量 VIF 值均小于 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采用分步回归法，先根据不同的自变量分别做回归分析，再将所有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

三、统计结果分析

（一）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在对个人状况（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和年龄分组）进行控制后分别检验了各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模型 1 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至模型 5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添加了工作、社会保障、个体特征、社会态度变量，模型 6 包含所有自变量。

（二）工作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 2 显示，是否全职工作、是否为管理人员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讲，从事全职工作、未承担管理工作的女性居民有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假设 1a 得到验证。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与是否在国有制单位工作这一变量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假设 1b 未得到验证。

（三）社会保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模型 3 可以看出，仅参加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对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有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说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养老、医疗等服务覆盖率及保障性可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同时也说明，我国居民的风险分散意识仍有待加强，并未把保险视为一种投资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

（四）个人特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 4 表明，个人所处社会阶层及婚姻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即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以及资本背后所带来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自我社会地位评价越高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同时，婚姻越美满的女性生活满意度越高。假设 3b 和假设 3c 得到验证。此外，居民个人的身体健康及家庭整体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经济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3a 未得到验证。

（五）社会态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模型 5 提供的信息可以得知，居民对社会的信任感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信任感越高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政治参与度越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女性居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假设 4a 和假设 4b 得到验证。而自然环境满意度和对社会公平性的认可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如表 1 所示。

四、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居民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生活满意度不仅受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工作因素、社会态度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本文从多个常见维度对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系统剖析其影响逻辑，为理解女性主观福祉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多视角参考。

第一，工作因素对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职工作和非管理者角色的承担，对提升女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与以往认知不同的是，是否供职国有单位与女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并无关系。这反映出随着就业市场多元化发展，女性择业观已从“求稳”转向“求适配”，不再局限于国有单位“铁饭碗”的单一选择。在此导向下，用人单位应该规范招聘流程，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其基本权益。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发力，一方面增加女性友好型岗位供给，另一方面在职业培训、就业帮

扶中融入性别平等意识，针对城镇下岗失业女性、低收入女性等特殊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等精准服务，缓解其就业困境。

第二，社会保障是女性居民的诉求之一。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发展，居民不再将有无医保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考量因素。虽然有学者提出“高福利陷阱”理论，认为过高福利可能滋生“懒汉”，但现实中，福利保障的地区差异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保报销比例、服务便捷性差距，灵活就业女性、农村女性的社保参保率与保障水平仍低于城镇职工女性，这些差异可能间接影响女性的风险抵御能力与生活安全感，需通过统筹社保区域协调发展、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等方式，推动社会保障从“全覆盖”向“均等化”升级。

表 1 女性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自变量		生活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年龄	0.003	0.028	0.017	0.046	−0.018	0.109
		(0.006)	(0.019)	(0.006)	(0.014)	(0.013)	(0.051)
	受教育程度	−0.007	−0.049	−0.017	−0.075**	−0.007	−0.110
		(0.033)	(0.064)	(0.033)	(0.074)	(0.072)	(0.156)
	婚姻状况	−0.017*	0.003	−0.019*	−0.017*	−0.024	0.019*
		(0.184)	(0.402)	(0.184)	(0.182)	(0.399)	(0.194)
	户籍所在地	0.028**	0.063*	0.029**	0.054*	0.011	0.082
		(0.188)	(0.409)	(0.187)	(0.406)	(0.405)	(0.963)
工作变量	工作性质		0.018*				0.008*
			(0.832)				(1.638)
	管理活动		−0.121****				−0.117*
			(0.370)				(0.856)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0.037				0.058
			(0.380)				(0.869)
	单位所有制		0.047				0.041
			(0.356)				(0.817)
社会保障变量	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			0.015*			0.025*
				(0.308)			(1.910)
	基本养老保险			−0.017			−0.026
				(0.193)			(1.203)
	商业医疗保险			0.017			0.075
				(0.334)			(1.286)
个人特征变量	身体健康状况				0.015		0.061*
					(0.182)		(0.502)
	社会阶层				0.031*		0.078
					(0.137)		(0.331)
	家庭经济状况				0.011		0.043
					(0.277)		(0.653)
	本人经济状况				−0.030		−0.013
					(0.287)		(0.692)
	婚姻满意度				−0.043**		−0.052*
					(0.252)		(0.634)
社会态度变量	社会信任					0.007*	0.075**
						(0.175)	(0.362)
	社会公平性认可					0.017	0.066
						(0.173)	(0.386)
	生态环境满意度					0.028	−0.032
						(0.146)	(0.306)
	政治参与度					0.025*	0.087**
						(0.354)	(0.765)

注：（1）括号数字表示标准误；（2）*p<0.1，**p<0.05，***p<0.01，****p<0.001。

第三，个人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表明，健康因素与女性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物质资源的丰富，让居民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资本，健康也意味着有继续生存的期望，健康状况优良的女性，更有精力投入工作、经营家庭、参与社交，进而获得更高的自我认同与生活满足感；反之，健康受损可能导致收入减少、社交受限，间接降低满意度水平。没有健康作为保障，一切无从谈起。

第四，社会态度及社会认可的体现。信任是一种稳定的信念，维系着社会共享价值和稳定，是个体对他人话语、承诺和声明可信赖的整体期望。女性对周围环境和陌生人的信任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生活满意度，营造和谐的环境、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提升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女性群体对于政治参与有了新的更高的追求，这是女性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多个角度分析女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既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导向，又可以为用人单位改善女性工作环境、承担企业责任敲响警钟，为女性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宜居的环境，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女性的话语权，让女性更有获得感。

参考文献

[1] 方纲，林伯海．城乡居民幸福感研究的价值初探——以成都市为例 [J]. 社会科学研究，2009(06): 86−91.

[2] 胡荣华，陈琰．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以江苏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2012(01): 80−91.

[3] 徐龙顺，李婵，卢海阳，等．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 CGSS2013 数据实证分析 [J]. 西北人口，2017, 38(04): 87−95.

[4] 赵文龙，代红娟．显现的张力：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J]. 社会学评论，2019, 7(05): 41−54.

[5] 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社会学研究，2016, 31(03): 193−217, 246.

[6] 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下转 108 页）

论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对工资的监督检查

喻湘忠

摘要：本文聚焦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对工资的监督检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工资分配领域问题凸显，强化纪检机构监督职能至关重要。文章首先明确监督核心要点，包括工资标准制定的合规性、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控以及分配效果的公平性评估。接着阐述其关键作用，如强化纪律约束机制、推动科学分配体系建立、防范廉洁风险隐患等。然后提出优化策略，构建全过程监督闭环体系，完善差异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工资分配违规问责制度，推进监督手段的数字化升级。通过这些举措，可提升工资监督工作实效，规范分配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防范廉洁风险，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工资监督；监督机制

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经营管理规范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薪酬管理工作。工资分配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既关乎职工切身利益与企业凝聚力，又与国有资产安全运行、企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工资分配机制日趋多元，但也暴露出工资标准制定不规范、预算执行不到位、分配不公及廉洁风险凸显等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强化内部监督尤其是纪检机构对工资分配的监督检查显得尤为重要。纪检机构作为企业内部专门的监督力量，肩负维护纪律、保障合规经营等重要职责，可通过精准监督、有效约束与科学引导规范分配行为、防范风险、推动科学分配体系建立[1]。本文结合国企工资管理实际，深入探讨纪检机构监督的核心要点、关键作用及优化策略，为提升监督水平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工资监督检查的核心要点

（一）工资标准制定的合规性监督

工资标准作为分配体系的基础，其合规性直接决定分配活动的合法性与公平性。纪检机构需重点审查工资标准是否符合国家工资总额管理办法、薪酬指导线等政策要求，坚决杜绝突破政策红线的情况。审查过程中，同时需关注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仔细核查企业是否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履行民主程序，确保制定过程公开透明，充分吸收职工意见。此外，还应评估标准与企业效益、职工贡献的匹配程度，监督企业依据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和劳动强度合理确定岗位工资，防止岗位价值与薪酬水平出现脱节现象。

（二）工资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控

工资预算执行贯穿企业整个经营周期，对财务稳定与分配秩序具有直接影响。纪检机构需全面覆盖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考核的全流程。在编制阶段，需监督企业依据经营目标、人员编制和工资标准准确测算总额，避免预算虚高或不足。在执行阶段，应实时跟踪支出情况，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超预算、无预算发放行为，严厉查处擅自提高标准、扩大范围或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在预算调整环节，需严格审查调整依据、程序和幅度；在考核阶段，则监督考核过程公正性及结果与奖惩机制的衔接有效性[2]。

（上接 107 页）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12(09): 82-99,207.

[7] 储德银 , 何鹏飞 , 梁若冰 . 主观空气污染与居民幸福感——基于断点回归设计下的微观数据验证 [J]. 经济学动态 , 2017(02): 88-101.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三）工资分配效果的公平性评估

分配效果公平性是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的核心要素。纪检机构需从内部与外部公平双维度开展评估工作。内部评估重点聚焦不同岗位、层级间工资差距的合理性，监督企业是否建立科学岗位评价体系，核查是否存在同工不同酬或差距过大问题及绩效工资与工作业绩的匹配状况。外部评估需将企业工资水平与同行业、同地区国有企业进行对标，监督企业依据市场薪酬和经营状况，合理定位工资标准，避免薪酬失衡引发人才流失或企业成本过高问题。需严厉查处分配中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违规行为，通过专项检查和举报受理维护公平秩序。

三、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工资监督检查的关键作用

（一）强化工资管理的纪律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工资管理过程中，擅自提高工资标准、超出预算发放薪酬、虚报人员数量套取工资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直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纪检机构通过日常巡查与专项审计相结合的方式，对工资管理各环节实施全方位监控，及时捕捉并核实违规线索。对查证属实的违规行为，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形成有力震慑，促使管理人员和职工严格遵守纪律要求。这种约束机制有效维护了工资管理的严肃性与规范性，确保国家相关政策和企业内部制度在薪酬分配领域得到有效执行，防止利益输送和制度空转现象出现。

（二）推动建立科学规范的分配体系

部分国有企业存在分配机制不完善、工资结构不合理、绩效评价标准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职工工作积极性和企业整体活力提升。纪检机构通过监督检查，精准找出分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在此基础上督促企业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工资构成比例，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提升薪酬分配的合理性与透明度[3]。同时，推动企业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工资分配与企业发展、职工贡献的精准匹配，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

（三）防范工资管理中的廉洁风险隐患

工资管理涉及资金分配与利益调整，是廉洁风险高发领域，在工资标准制定、岗位调整、绩效评价及工资发放等关键环节均存在权力滥用风险。纪检机构通过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监督，建立健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对潜在风险点进行提前预警和主动防范。通过开展常态化廉洁教育增强从业人员纪律意识，营造廉洁从业的良好氛围。对发现的廉洁问题及时严肃查处，通过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发生，保障工资管理领域的廉洁性与公正性。

四、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对工资监督检查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全过程监督闭环体系

全过程、全方位监督闭环体系的构建要求将监督环节深度融入工资管理的各个阶段，形成覆盖全流程的监督网络。工资标准制定初期，纪检机构应提前掌握企业发展战略与市场薪酬水平，对拟定标准开展合规性预审。通过核查岗位评价报告与市场调研数据，确保工资标准既符合国家薪酬政策要求，又贴合企业实际经营能力。例如某企业制定年度工资标准时，纪检机构提前介入审核，发现拟定的薪酬增幅与行业水平存在明显偏差且未与经营目标关联，及时提出调整建议后有效规避了工资总额失控风险。

工资预算执行阶段需建立动态跟踪机制。纪检机构可依托企业现有管理系统，按月提取工资发放明细与预算执行数据开展比对分析。当监测到某部门连续多月工资支出超出预算既定比例时，立即启动专项核查程序，通过核实考勤记录与人员编制等资料，确认是否存在擅自增设津贴项目或虚报人员数量等违规行为。实践中，这种动态监控模式能够及时发现下属单位虚报工时套取工资等问题，在追回违规资金后可推动完善考勤管理制度。工资分配完成后，纪检机构应组织开展效果评估。通过发放匿名问卷与召开职工座谈会收集反馈意见，重点分析不同岗位职工的薪酬满意度与工作积极性变化[4]。将评估结果与工资调整建议一并提交企业管理层，形成“标准制定—预算执行—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的完整管理循环，这种闭环监督模式可显著降低工资投诉量并提升职工满意度。

（二）完善差异化监督检查机制

差异化监督机制的建立需充分考量国有企业在规模与行业上的固有差异。大型集团企业往往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下属单位分布在不同区域且工资管理模式各有特点。纪检机构应将监督重点放在工资总额的宏观管控与下属单位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上，构建“总部统筹规划 + 区域派驻监督”的分层监督架构。总部纪检部门按季度开展工资总额执行情况专项检查，派驻至各单位的纪检人员则负责日常监督本单位工资发放流程的规范性。这种监管模式能够及时发现下属子公司擅自调整薪酬标准等问题，通过总部统一部署整改规范全集团的工资分配秩序。

中小型国有企业人员构成相对简单，监督工作应集中在工资发放的准确性与合规性上。纪检机构可实行“半年全面检查 + 季度专项抽查”的监督模式，每半年对工资核算凭证的完整性进行全面核查，重点验证考勤记录与绩效数据的客观真实性。在实际监督过程中，通过随机抽查能够发现行政部门存在的无政策依据发放补贴等情况，在追溯资金审批流程与发放范围查实违规行为后，可督促财务部门追回违规款项并完善补贴发放的集体审议制度。行业特性决定工资监督的具体侧重点。生产制造企业一线职工占比高，监督需关注计件工资核算的准确性与一线职工同管理人员薪酬差距的合理性，通过核对生产报表与工资明细可发现车间工时统计不实问题，推动建立生产数据与

工资核算系统的直接关联机制。金融行业薪酬构成复杂且激励方式多样，纪检机构应重点审查绩效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匹配程度，通过针对性监督将高管绩效薪酬与风险指标挂钩，有效遏制因过度激励引发的激进经营行为。

（三）建立工资分配违规问责制度

工资分配违规问责制度的完善需明确责任主体与科学设定问责标准。依据工资管理各环节的职责分工，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专员与财务人员均应纳入问责范围。针对不同类型违规行为需制定阶梯式处理标准：擅自提高工资标准的，除责令违规人员退回不当所得外，还应对相关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对虚报冒领工资等严重违规行为，不仅要给予纪律处分，还应将处理结果与个人绩效考核直接挂钩。部分地方国资委出台的工资问责细则中，已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对违规发放工资承担领导责任，违规情节严重的将扣减相应比例的年度绩效薪酬。

问责程序的规范执行是保障制度效力的核心。纪检机构调查工资违规案件时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与申辩权，通过调取原始凭证、查阅相关数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处理干部违规调整薪酬案件时，纪检部门需核查考勤记录、工资调整审批单等关键证据，确保问责决定经得起复核检验。问责结果应及时在企业内部通报，详细说明违规事实、处理依据与整改要求，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问责制度运行中需与激励机制保持平衡，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区分违纪违规与工作失误，对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工资计算错误，在及时纠正且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可减轻或免除问责，这种宽严相济的方式能在规范管理的同时保持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四）推进监督手段的数字化升级

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数字化监督手段成为提升国有企业工资监督效率与精准度的重要支撑。国有企业需整合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生产经营系统的分散数据，搭建统一的工资监管信息平台。通过开发适配数据接口实现工资数据自动采集与实时更新，纪检机构可随时调取各时段工资发放明细、人员变动记录与绩效考评结果，摆脱传统手工查阅资料的限制。部分企业已建成的工资监管平台实现下属单位数据集中管理，监督响应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小时，显著提升监管时效性。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工资监督提供新方法。纪检机构运用数据挖掘算法对工资数据开展多维度分析，构建岗位薪酬偏离度模型自动识别显著高于同岗位平均水平的异常数据；通过分析工资变动与人员调整的时间关联，及时发现突击调薪等违规行为。实际应用中，这类技术曾发现某部门负责人在岗位变动前违规调薪的问题，推动企业完善薪酬调整审批流程，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发生。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监督智能化水平。开发的工资发放凭证智能审核系统运用 OCR 识别技术将纸质考勤记录、绩效数据转化为电子信息，借助规则引擎自动比对考勤时长与加班工资计算、绩效得分与绩效工资发放的一致性。发现计算错误或逻辑矛盾时系统自动标记并提示核查，大幅减少人工审核工作量与出错概率[5]。某企业引入该系统后成功识别多起因工龄统计失误导致的工资计算差错，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数字化监督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效率，更推动监督模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实现工资监督质效全方位提升，为国有企业工资管理规范化提供技术保障。

五、结语

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开展的工资监督检查，作为内部监督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对规范分配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防范廉洁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当前，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工资分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提升，对纪检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工资标准合规性审查、预算执行全过程监控与分配效果公平性评估三大核心要点，纪检机构通过强化纪律约束、推动体系建设、防控潜在风险等发挥关键作用，结合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督体系、完善差异化检查机制、建立违规问责制度与推进监督手段数字化升级等策略，能够持续提升工资监督工作的实际成效。未来，纪检机构须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以形成监督合力，深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推动工资监督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为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郎倩倩 . 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的几点思考 [J]. 活力 , 2025, 43(07): 61−63.

[2] 陈清清 .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优化策略探讨 [J]. 商业文化 , 2024(23): 107−109.

[3] 辜巧玲 . 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的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 2025(21): 121−124.

[4] 黄晓纯 . 集团型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探析与实践 [J]. 今日财富 , 2024(20): 26−28.

[5] 乔菲 , 陈艳利 , 信志鹏 . 薪酬管制政策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违规 ?[J]. 会计研究 , 2024(10): 95−109.

（作者单位：湖南古丈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癌症引发的社会文化思考

王　爽 魏　磊 牟　琳 宿胜男

摘要：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癌症患病率不断增加，而在疾病背后，社会学因素也应该引起关注。与癌症相关的社会问题、癌症对患者产生的影响、对癌症患者的照护、社会因素对癌症发生的作用，以及癌症所引发的影响，都值得关注。不仅要从生物医学角度考虑疾病所带来的影响，更应该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其深层成因，社会学问题反映出疾病不仅是生物学现象，更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折射。因此，深刻认识癌症带来的社会影响、正确认识癌症的风险，有利于减少癌症患者的恐慌，采取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以积极心态面对疾病。

关键词：癌症；患者；关怀；社会学

癌症患者在患病期间会发生身份主观性的变化。癌症患者患病期间经历了身份的重新定位，原本的生活轨迹被打乱，需要重新认识自我，由于信息量不同，不同群体获得的信息也出现不均匀的情况[1]，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对其带来积极抑或消极影响。医学社会学关注减轻疾病对患者的负面影响。此外，当前有大量文章关注癌症诊断、治疗和癌症转移或复发过程的问题，医学社会学着眼于如何重新调整癌症患者的个人身份，保持人格完整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癌症给患者带来的影响

（一）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角色变化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2]。尤其是某些恶性肿瘤，预后较差，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还会对患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影响。癌症患者患病后，工作能力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逐渐降低甚至丧失，与家属的联系和共同活动逐渐减少，由此带来的过多同情和怜悯，也可能导致患者产生迷茫、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和不适作为大部分末期癌症患者主要的身体症状，给他们的临终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均可使一些原本积极开朗的人患癌后变得寡言少语，甚至抑郁。由原本的健康人变成每日卧病在床，不仅无法继续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甚至还要增加家庭负担的病人，患者极易因此而感到沮丧、抑郁，甚至轻生，这是癌症导致的患者社会角色的转化。

癌症同时也造成了患者家属的角色变化。患者家属常常感到孤立无援、无处倾诉，患者会有关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包括关爱人与被人关爱两方面，二者缺一不可[3]。因此，在临床诊疗中认识并重视癌症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的社会学影响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有一些“抗癌明星”勇于同病魔抗争，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探索到生命的真谛，甚至有患者因强大的精神力量病愈出院，创造了生命奇迹，这是社会角色变化的积极影响，也是社会支持所带来的正向作用。

（二）癌症患者的内在改变

在疾病的应对中，癌症也可能促成患者的个人成长或带来积极的改变。癌症治疗及其预后的不确定性给患者带来长期的影响，使其在治疗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依旧需要持续地进行意义追寻。癌症患者往往需要长期治疗，其身体和心理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癌症患者不断经历着自我身份认知的重塑，甚至出现癌症的污名化可能让患者感到羞耻，导致一些患者无法承担这种痛苦选择自杀[4]。

二、照护癌症患者

Parsons 等人整理了骨癌患者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疾病、身份和职业工作，并呼吁举办这些支持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的活动。这当中就包括临床医生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倾听患者的陈述，并根据个人情况提出更契合的方案”。Moffat 和 Noble 还探讨了福利污名化，并呼吁对受癌症影响的福利索赔人应采取基于合法权利索赔的方法。这种对主流癌症治疗方法的挑战在关注疏离感的研究中也很明显。Blaxter 利用她自己的癌症经历来强调医生在没有她参与的情况下给出医学影像报告结论以及治疗决定，她感受到一种疏离感（Alienation）。Horlick Jones 探讨了他对复发的恐惧，讲述了这些感觉是如何影响具体化的经历和情绪健康的[5]。

癌症治疗过程在以往多属于医学—科学范畴。社会对癌症康复阶段的作用与反作用，其实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随着医学的进步，癌症幸存者越来

越多。放疗、化疗和手术对癌症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等多方面产生影响[6]。癌症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到接受结果，再到治疗，是一个痛苦且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医生不仅应做到个体化治疗，更应关注患者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包括患者对自己的否定、放弃与再认识。医生应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助其走出疾病阴霾，重拾希望，最终回归正常生活。全社会应该耐心、细致地对待、关心癌症患者，给予其温暖与支持，让他们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而不应苛责或者无视其诉求。社会学家应与医生联手，共同探索帮助患者提升幸福感的路径。

三、癌症的风险与责任

（一）社会文化因素对癌症的影响

应从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角度分析癌症的风险和责任，关注如何识别和管理癌症发生的风险。例如，从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及筛查如何被概念化并与生命和文化相联系，来探讨群体所在的家庭、社会文化环境对癌症发生风险及预防策略认识的影响。除此之外，个人对疾病症状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可能也会导致癌症诊断延迟。分析受访者将感觉识别为症状的复杂性，当出现衰老、更年期或个人压力过大等偏离正常状态的因素时，个人的主观意愿常常将其正常化，而只有日常生活受限或当身边人表示担忧的情况下，明显的世俗感觉才会转化为疾病的症状。同时，心理上的恐惧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女性寻求医学帮助。因此，应着重考虑个体的躯体感受，分析社会因素对其影响，正确应对癌症风险的不确定性，制定切实合理的个人应对方案。

（二）个人文化背景对癌症的影响

结合妇科肿瘤专业以及相关材料的学习，从个人层面上来看，不确定性在癌症治疗中有待被认识。人们对疾病诊断标准的认识，往往表现出不确定性、不平衡性。患者的主诉在问诊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症状描述不清往往导致鉴别诊断不明确，从而耽误患者的治疗过程。同一类型的肿瘤如卵巢癌对不同患者而言，症状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以腹痛为主，有的则以盆腔包块为主。作为临床医生，则需要把握辩证思维，从个别的、具体的现象抽象出一般的、普遍的本质，从千差万别的患者主诉中辨识患者的疾病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共同决定着这一过程的进行[7]。相比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宫颈癌患者多为55岁及以上，宫颈癌发病率明显较高，这可能与我国宫颈癌筛查程度不高有关。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中更应该注重社会层面的把控，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健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全面把控癌症风险和强化责任落实，从而更好地改善患者预后。

癌症的发展、诊断与风险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国家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作为医务工作者，利用既往医学知识不难解释癌症为何成为威胁健康的首要杀手，其症状的多样性、不典型性、复杂性是医生亟须攻克的难题。而跳出专业知识的限制可以发现，癌症的发生发展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从个人心理层面来看，个人的主观意愿和自由意志往往将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正常化，就如同观察渗透理论一样，人的观察中渗透着主观经历的影子，对自身身体状态的判断也同样受限于个人的经验与情感意愿，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对此，利用科技观与方法论，最大化达到相对客观的状态便显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社会全局来说，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有限，且医学相关科普工作并不完善成熟，所以在疾病的早期筛查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总之，癌症不仅是一种病理状态，更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这无论是对医务工作者、社会公众，还是对国家顶层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来说，都是必须认真面对、妥善应对的重要课题。

四、特殊群体的癌症应对

（一）边缘人群所面临障碍

着眼于筛查和预防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关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及部分群体在获取个人癌症风险干预措施时所面临的障碍，包括边缘群体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对筛查测试目的的误解、相关保健知识的匮乏，以及文化与宗教传统所带来的影响。Bussière 等人强调了残疾人与其他人群在获得宫颈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筛查方面，以及全科医生和护士护理方面的差距。他们发现，这些差异不是受认知能力或身体能力影响，而是受社会经济因素的严重影响。Bussière 等人提出要改变社会经济不平等，倡导采取相关措施增加社会支持力度，以改善残疾人参与筛查的情况[8]。

（二）科技发展对弱势群体参与癌症筛查的影响

社会是由人所形成的集合体，是某一阶级或某些范围的人所形成的集合体。其组合分子具有一定的关系。然而，由于性别、经济条件、健康状况、信仰等各方面存在差异，个体在医疗服务支付能力也有所不同。例如，经济条件差的人群因负担不起筛查和检测费用，往往直到肿瘤发展到晚期、症状明显时才来医院就诊，其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均较差。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健康教育、改善经济状况、加大国家基本医疗投入等途径得到改善。这表明社会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彼此相互影响。

科技进步无疑会给大众带来福祉，然而科技红利是否能够辐射到每一个个体，是有待商榷的。经济因素、教育程度、政策福祉等都是影响因素，在利用科技促进医疗水平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是否存在被边缘化的群体，尤其应注重对癌症患者的关怀。研究发现，癌症患者在确诊病情后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痛苦，

导致生命质量降低、疼痛感加重、满意度降低等负面影响[9]。

五、癌症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社会学视角下的分析

过去十年间，社会学家追踪调查了大量与癌症相关的案例，研究对象包括参与治疗与研究的患者、医护人员与监管机构人员，还包括与身份、组织形式、监管有关的社会和技术变革，并得出了三个结论[10]。

首先，这一时期的新生物医学知识和人的身份与组织实践，是通过复杂的过程形成的。生物医学的进步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癌症患者与专业人员的责任与工作与日俱增。因此，最好将癌症相关的生物医学领域创新，把对癌症的认知变化，包括患者对风险的感知变化、医患关系改变以及新的法规和组织结构形成，理解为社会广泛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而非本就复杂的社会安排和癌症身份转变的驱动力。

其次，癌症研究领域中，与护理的身份和组织等方面相关的社会研究进展与生物医学创新，对于总结癌症高危人群、癌症患者家属和癌症康复人群的经验，以及癌症研究者和护理人员的专业经验非常重要。癌症高危人群、癌症患者 / 癌症康复人群的身份变化也是一种发展。这些身份变化是由支持者通过社会学研究发展和传播的，它挑战了刻板的叙事和传统的与癌症对抗的英雄主义，患者可能因癌症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11]。

最后，研究揭示了社会学家和社会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社会学家和社会研究人员有时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重复主流的研究。例如，关注特定的癌症或社区，特别是高收入国家的乳腺癌和白人妇女，而忽略了其他人，如肺癌和边缘化人群。但是，也有文献记载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在某些情况下还参与了反身份的开发，这些反身份拒绝主流叙事，而对可能面临癌症的发生、发展或上升的不确定性，有更严格和复杂的理解[12]。

（二）对全社会的影响

癌症带来的影响是社会广泛变化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的意志也会一定程度影响研究方向，研究者可能由于过于关注特定群体，而忽略了更为普遍的群体，这一问题需要反思。总之，不应将癌症仅仅视为一种重大疾病，而应将其作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行研究。

对于专业的医护人员来说，癌症是一种以治愈率或延长生存期为目标的疾病，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癌症不仅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更是一种生活负担。癌症的治疗、患者的看护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事业等方面的变化，使得“谈癌色变”成为公众对癌症的普遍态度。但是，对于癌症的恐惧，带来的不仅是争吵、疲惫、贫穷等家庭问题，更可能导致贫富不均、自杀率增高等社会问题[13]，因此对癌症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迫在眉睫。对于癌症患者，医护人员不仅要关注其身体健康，还要重视其心理健康，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减轻癌症患者的身心痛苦。

由此可见，从对疾病的污名化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包容，从个体独自承受病痛煎熬到社会构建全方位关怀体系，从过度追求生命长度到重新审视生命质量与尊严，都在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人际联结与生命本质。同时，癌症也促使我们反思快节奏时代下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困境，提醒人们摒弃功利浮躁的生存心态，重拾对健康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他人苦难的共情与帮扶。面对癌症，人类的抗争从未停止，而这份抗争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觉醒，更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文明不仅在于攻克疾病的医学能力，更在于全社会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守护，在于从疾病的阵痛中汲取力量，构建一个更具温情、更懂包容、更珍视生命本真的社会文化生态，这便是癌症带给我们最深刻且最具长远意义的社会文化启示。

参考文献

[1] 郑大喜 . 信息不对称下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策略分析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07(01): 52−56.

[2] KERR A, ROSS E,JACQUES G, et al. The sociology of cancer: a decade of research[J].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8, 40(03): 552−576.

[3] 马斯洛 . 动机与人格 [M]. 李静文 , 朱兴媛 , 译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 , 2021.

[4] ANNA J, DA S D, JAVIER C, et al. Psychological impact,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needs for women with an abnormal Pap smear: comparative results of a questionnaire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J]. BMC Women's Health, 2011, 11(01): 1−7.

[5] 徐蕾 , 张群芳 . 人文关怀在癌症患者中的应用体会 [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2018, 22(16): 23−25.

[6] 王静 . 叙述、形塑与纾解 : 末期癌症患者的疼痛研究——身体社会学的视角 [D]. 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 , 2017.

[7] 孙玉倩 , 孙秉赋 , 李会 , 等 . 医护人员、患者、家属对癌症告知的社会学分析 [J]. 医学与哲学 , 2010, 31(23): 36−38.

[8]BUSSIÈRE C, SICSIC J, PELLETIER−FLEURY N. The effects of obesity and mobility disability in access to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France: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Disability Survey[J]. PLOS ONE, 2014, 9(08): 104901.

[9] 宋丽莉 , 唐丽丽 . 癌症相关性乏力在心理精神干预的研究进展 [J]. 医学与哲学 , 2017, 38(1B): 61−64.

[10] 蒋青青 , 陈帆 , 张春东 , 等 . 循证理念在社会医学中的应用与思考 [J]. 医学新知 , 2020,

（下转 114 页）

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影响及干预对策

杨春艳

摘要：童年逆境是个体成长发展时期的重要经历，会使儿童面临学业功能受损及其他发展功能异常等风险。本文从对学业发展成果的直接损害和自我调节学习等层面的间接破坏两方面分析了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从培养个体成长型思维模式、构建创伤知情的学校支持系统、提升教师的创伤知情教学能力及强化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干预四个方面进行干预的对策，为保护童年逆境经历个体的学习权益、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实践方案。

关键词：童年逆境；学业发展；影响；干预对策

一、童年逆境的概念

童年逆境是指个体在 0~18 岁期间经历的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以及在家庭压力环境下成长等创伤性事件。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学者 Felitti 等人首次对童年逆境问题进行了研究 [1]。其核心发现为，接近三分之二的研究对象至少有过一种童年逆境经历。这项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童年逆境问题的普遍存在性，还在后续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不断得到验证，并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在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比例约为 66.26%，突尼斯的研究结果为 74.8%，越南则为 76%。

童年逆境会对个体自身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健康层面，长期处于童年逆境的个体比其他个体，终生罹患慢性疾病、伤残乃至过早死亡的风险显著升高。不同维度的逆境均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持续高风险 [2]，患有抑郁、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与此同时，这种早期创伤导致的阴影会对个体发展的多个维度产生影响，直接使其生活满意度降低、学业成就受损等，出现广泛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童年逆境是个体成长发展时期的重要经历，而教育成就是这一时期的关键发展任务。根据交互作用理论和发展级联理论，童年逆境适应不良和应对无能可以产生多种彼此关联的级联效应，儿童会面临学业功能受损及其他发展功能异常等风险。童年逆境会引起个体的执行功能受损、智商低下以及自我调节过程不佳等认知方面的障碍，造成学业成绩、学业目标和学习动机的下降。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童年逆境与个体的教育成就呈负相关。分析童年逆境经历对个体学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建立和完善积极的干预手段，可以为保护童年逆境经历个体的学习权益，解决教育不平衡问题，并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实践方案。

二、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影响机制

（一）学术成果层面的直接损害

教育影响个体的终身发展，与童年逆境间存在明显的梯度相关关系。个体经历的童年不良事件越多，对教育成就水平影响越大。在学业水平方面，童年逆境会直接对儿童的入学准备、学业表现和学业坚持性起到消极的作用；同时，童年逆境还存在代际传递与累积效应，对处境不利群体具有更大的影响。

童年逆境经历会导致儿童在学业早期阶段出现入学准备不足等问题。童年逆境使儿童的语言、认知和

（上接 113 页）

30(03): 168−173.

[11] 黄楠楠 . 社会工作视角下癌症患者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D]. 济南 : 山东大学 , 2013.

[12] 陆群 . 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与社会支持 [J]. 中国医学创新 , 2011, 8(07): 102−103.

[13] 刘同刚 , 谢永宏 , 党永进 , 等 . 肺癌康复的心理社会学作用 [J]. 中国临床康复 , 2001, 5(24): 95.

（作者单位：民航总医院）

社会交往等基本能力发展水平明显落后。研究表明，在幼儿时期经历过多种逆境的个体，在进入小学阶段后难以快速适应课堂教学节奏，更容易出现社会适应性行为偏差。其学习参与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降低，具体表现为频繁出现旷课行为，学业成绩差等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此类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并放大。童年逆境会直接导致初中生学业拖延[3]，并显著提升高中生的旷课率及降低学业成绩。具有童年逆境经历的学生辍学概率是其他学生的 1.5 倍以上。童年逆境经历还通过代际传递效应影响个体的学业发展。照顾者的童年逆境经历能够通过家庭系统、心理机制和社会资源等中介路径传递，影响下一代。研究发现，母亲的童年逆境经历与子女的加减运算能力呈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照顾者的逆境经历通过代际传递，可能会持续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童年逆境对个体学业发展的影响还会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因童年逆境经历引发的心理困扰会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个体经历过至少一种童年逆境，会降低对大学过渡阶段和学业阶段的适应能力；每多经历一种童年逆境，大学阶段按时毕业的可能性都会相应降低；性受害等特定类型的童年逆境经历，也与最终较低的大学学业成绩相关。而童年逆境对处境不利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由于寄养儿童与残疾儿童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本就面临更多困境的学业因童年逆境进一步加剧，出现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协作障碍增多等问题，最终导致中学毕业率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显著低于普通儿童群体。

（二）自我调节学习等层面的间接破坏

自我调节学习是个体主动规划、监控与调控自身学习过程，进而达成既定学习目标的核心能力。当前学界通过系统整合自我调节理论与自我调节学习模型，为深入解析童年逆境影响个体学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自我调节能力受损是核心影响因素。自我调节能力是平衡压力性生理反应、情绪唤醒、反应性等自下而上和引导注意力、认知资源分配、情绪调节等自上而下两种调节方式的关键。童年期逆境通过影响大脑结构来塑造个体的认知功能[4]。长期暴露于童年逆境环境中的个体，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处于持续过度激活状态，导致机体应激反应模式出现异常；同时，杏仁核功能发生紊乱，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加工与调节能力；海马体结构与功能受损，对记忆的编码、存储及提取过程造成实质性破坏；前额叶皮层发育迟缓，则会显著削弱个体目标设定、冲动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由童年逆境引发的神经生理学层面的改变，会直接损害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对学业发展进程产生持续性的阻碍作用。

童年逆境经历会影响个体的学习动机和持续性学习意愿。在开展学习相关任务前，学习者需要通过设定目标调动自身资源。元认知意识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学习者明确自身具备的资源和能力。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和对任务的喜爱程度，会影响其自身的学习意愿。童年逆境经历会对个体的元认知意识与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个体会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偏离任务的行为，对后续学业发展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造成持续出现学业困难。例如，学生在设定学习目标时，受逆境经历影响，可能会偏离任务本身，将核心诉求转化为情感安全感，或形成以应对压力为导向的行为反应模式。此外，童年逆境经历还会削弱学生对学习任务难度的评估能力和对自身能力评估的准确性，影响其制订学习计划和激发内在学习动机。

个体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同样会受童年逆境经历的影响。个体借助自我控制能力，在完成学习任务时选择合适的认知调节方法、集中注意力，提升对学习任务的坚持性，保障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学习者会通过自我观察，实时掌握任务进展、策略是否有效以及目标达成情况，根据以上信息及时调整策略或合理修正目标。但童年逆境经历往往会削弱个体的认知调控能力，导致其在情绪管理方面存在困难，行为执行功能出现异常。这些改变都将对个体的学业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受童年逆境的影响，个体的压力反应系统可能发生改变，出现过度唤醒、冲动行为，伴随执行功能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和元认知监控能力不足等情况，最终影响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和持续性，阻碍学习任务的完成。

在学习任务结束后，个体会对自身的学习表现情况进行反思，这一过程将对其日后的学习行为产生影响。反思时，个体会根据自己或他人给出的评价标准来判断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并且对自己的学习是否成功作出归因。这种归因可能会归结于内部（如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等）或外部（如任务难度和课堂氛围等），而不同的归因结果会影响日后的学习行为。童年逆境经历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归因发生偏差，出现一定的学习及行为问题。例如，受到童年逆境影响的个体可能会出现自我评价偏差，出现过高的自我肯定或过度的自我否定，无法对自身的学习表现进行客观和真实的评价。当个体无法对自身遇到的学业困难做出正当的归因时，便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具体包括学业成绩下滑，入学率和中学毕业率下降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减弱等。

师生关系是影响学业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童年逆境经历可能对这一关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经历童年逆境的个体早在幼儿园阶段就可能形成较差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问题可能进一步发展，导致其在三年级时比其他同龄人出现更多的焦虑、抑郁及退缩等行为，并在其五年级时学校参与度会显著降低。童年逆境经历者早期可能缺乏照料者及时的支持，他们在与教师建立信任关系时容易对教师的支持行为

持怀疑态度，难以主动沟通，甚至对教师的指导表现出回避或抵触，使师生关系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进而间接影响其学业发展。

三、应对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不良影响的干预对策

（一）培养个体成长型思维模式

多项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相关。具有较强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儿童和青少年比固定型思维模式较强的同伴学业成绩更好，在面临困境时更愿意克服困难，并寻求可以挑战自身能力的学业体验。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有助于个体减少因为童年逆境所导致的不良学业结果。从认知方面、行为方面和情感方面对个体进行培养，有助于其建立起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在认知方面，建立“通过努力可以提升能力”的核心信念，来替代“自身能力无法改变”的固定型思维，帮助个体纠正将学业失败归因于“自身无能”的不当认知。在行为方面，激发个体面对学业挑战的主动性，减少逃避行为，提升对学习的投入性和坚持性。在情感方面，增强自我效能感，降低学业焦虑与习得性无助，帮助个体将童年逆境带来的心理压力转化为学习动力，阻断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不良影响。

（二）构建创伤知情的学校支持系统

学校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场所，在学校构建“创伤知情”的教育体系，能够有效应对童年逆境给个体学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创伤知情教育是在创伤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践的教育范式[5]。在此体系下，需要改变传统的学生管理思维，构建包容性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对全体教师的培训，使其掌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相关知识，理解学生出现的不当行为，并非对权威的故意挑衅而是创伤后应激状态下的适应性生存反应，避免教育性的二次伤害。在此基础上，需建立标准化的识别、响应与协作流程，帮助学生应对童年逆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具体包括建立科学、保密的早期筛查与风险评估机制，对识别出需要帮助的学生群体形成明确的协作帮扶模式（如班主任、心理教师和学校各级管理人员之间开展合作），并与校外医疗和心理等机构建立转接绿色通道，使此项工作的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

（三）提升教师的创伤知情教学能力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和学生发展的关键引导者。教师是否具备创伤知情的教学能力，将直接影响对具有童年逆境经历的学生群体学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教师对童年逆境作用机制的理解不仅能帮助学生应对困难，还可以为教师自身赋能，减少因逆境过度卷入引起的挫败感和职业倦怠。同时，教师还应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可迁移的课堂实践技能。例如，运用共情式对话和正念训练等情绪调节技巧帮助学生处理应激反应；通过建立熟悉的课堂反应模式为学生构建安全感体验；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和辅导计划，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等。使教师真正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压力的调节者”和“安全感的营造者”。

（四）强化家庭与社会多方面的协同干预

家庭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首要环境，在童年逆境干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家庭受到资源的局限性和知识缺乏的影响，其独立应对此类问题时会存在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帮助家庭提升应对问题的能力，构建以家庭为中心、外部多方为其“赋能”的协同工作模式至关重要，同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例如，社区可以开设“童年逆境家庭帮扶支持培训”，帮助家长识别并预防子女在心理和学业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沟通技巧和可行的干预策略。在社区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建立逆境经历个体帮扶档案，对于需要专业介入干预的家庭，通过标准化流程进行转接，建立起学校、心理咨询师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干预体系。在此干预体系下，政府应当在教育培训及心理服务等方面加大对逆境经历儿童群体的投入和支持，保障整体干预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本文系统分析了童年逆境对学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干预对策。对童年逆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干预工作，需要个体自身的成长、学校的支持、教师能力的提升，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参与，最终构建起“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政府”多维度的协同干预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减少童年逆境经历对个体学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保障每一位儿童的学习权益，助力其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霞 . 累积童年逆境对情绪调节的作用模式 [D]. 上海 : 上海师范大学 , 2025.

[2] 左敏 . 童年期多维度逆境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轨迹的影响及健康生活方式的调节效应 [D]. 合肥 : 安徽医科大学 , 2025.

[3] 刘姗姗 . 童年逆境与初中生学业拖延的关系——基于横断和纵向研究的证据 [D]. 郑州 : 郑州大学 , 2023.

[4] 崔航 , 林晓蕾 . 童年期逆境对大脑认知功能的影响——基于去偏机器学习框架的中介效应分析 [J]. 复旦学报 (医学版), 2024, 51(04): 528−535.

[5] 张天慧 . 创伤知情理论在中学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D]. 宜昌 : 三峡大学 , 2024.

（作者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的适配性评价与改进研究

盛　冬　卢　艳

摘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中，职普融通是核心发力点，纵向贯通可破解县域职普融通分层脱节、衔接不畅的痛点。作为职普融通基层落地载体，县域专业结构适配度，直接影响人才培养与县域产业需求、学生终身发展的契合度，更是撬动乡村振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结合县域教育资源与产业发展实际，从初高等教育纵向贯通视角，构建“纵向衔接、横向协同、供需匹配”的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体系，客观呈现适配成效与提升方向，为县域职普融通高质量发展及专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纵向贯通；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改进路径

一、引言

县域教育是职普衔接的关键环节，更是服务地方产业、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载体，其职普融通发展水平直接关系教育公平落地、乡村振兴推进与县域经济提质，当前县域职普融通虽逐步推进、形成职普并行态势，但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横向轻纵向”问题，未能充分发挥育人与服务效能[1]。当前学界职普融通研究多聚焦城市领域，涉及县域时仅停留在宏观模式探讨，谈及专业结构适配性时也仅关注横向供需匹配，忽略纵向贯通视角下“分层衔接、全程适配”的核心需求，且未形成科学可行的适配性评价方法与改进措施，研究深度及实践指导性不足[2]。本文从纵向贯通视角切入，聚焦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这一关键问题，通过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梳理实践成效与短板，提出具体优化办法，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县域职普融通向内涵式发展提供实用研究思路与实践参考，助力县域教育提质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二、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体系构建

结合初高等教育纵向贯通核心要求与县域职普融通实践特点，围绕“纵向衔接、横向协同、供需匹配”核心逻辑搭建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体系，兼顾科学、可操作等原则，设置 3 个一级、9 个二级、33 个三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明确权重，实现专业结构适配性全面评价，为后续路径优化筑牢基础。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纵向衔接适配性（0.35）	初等教育职业启蒙适配性（0.12）	1. 职业启蒙课程开设比例；2. 职业体验活动开展频次；3. 学生职业认知水平；4. 职业启蒙与后续专业衔接度
	中等教育职普专业衔接适配性（0.13）	1. 职普互补专业设置数量；2. 职普课程互选互通比例；3. 中职与普高学籍互转便捷度；4. 专业基础课程衔接度
	高等教育升学通道适配性（0.10）	1. 中职升高职 / 本科专业对接率；2. 普高学生职业类升学比例；3. 中高职贯通培养专业数量；4. 升学考核与专业适配度
横向供需适配性（0.40）	产业需求适配性（0.16）	1. 专业与县域主导产业对接率；2. 专业与特色产业匹配度；3. 毕业生产业就业率；4. 企业对专业人才满意度
	区域资源适配性（0.12）	1. 专业设置与县域教育资源匹配度；2. 专业布局与县域人口分布适配性；3. 专业发展与区域政策契合度；4. 实训资源与专业适配度
	社会需求适配性（0.12）	1. 专业社会认可度；2. 毕业生就业率；3. 专业薪资水平；4. 专业人才缺口填补率
个体发展适配性（0.25）	兴趣适配性（0.08）	1. 学生专业选择满意度；2. 专业与学生兴趣匹配度；3. 学生专业学习积极性
	职业规划适配性（0.09）	1. 专业与学生职业规划契合度；2. 专业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效果；3. 专业为学生终身发展提供的支撑度
	个性化需求适配性（0.08）	1. 特色专业、小众专业设置数量；2. 专业选择的多元化程度；3. 特殊群体学生专业适配度

（二）评价标准与方法

1. 评价标准

参考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及各地职普融通政策要求，结合县域职普融通一线调研实际，划分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四个评价等级，明确各三级指标衡量标准，如“专业与县域主导产业对接率”≥ 80% 为优秀、60%~80% 为良好，结合县域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设置差异化调整系数，确保评价体系规范有导向、贴合实际且灵活可调。

2. 评价方法

联合教育专家、县域教育管理者、企业代表及一线教师组建评审小组，运用层次分析法划定各层级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数据统计收集评价数据，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进行综合打分，明确适配等级与现存短板，保障研究落地性与实操价值。

三、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的实践成效与提升空间

（一）实践成效逐步显现，适配性基础不断夯实

纵向衔接体系已初步建立，全学段推进势头平稳，多数县域逐步重视初等教育阶段职业启蒙，在部分小学、初中试点开设相关启蒙课程，定期组织职业体验活动，切实提升学生职业认知，为中等教育阶段专业选择奠定基础[3]。中等教育阶段职普协同持续发力，推动中职与普高课程互选互通、探索学籍互转机制，强化专业基础课程衔接力度，打通学生教育轨道灵活切换路径，拓宽高等教育升学通道，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专业规模，提高中职与高职、本科专业对接比例，逐步打破职业教育“断头路”困境，贴合纵向贯通改革方向。

横向供需适配稳步推进，服务区域产业发展能力持续筑牢，县域职普专业设置向本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靠齐，逐步形成与区域产业发展贴合的专业体系，毕业生产业就业率稳步提高，企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满意度持续提升。专业布局持续优化，乡镇区域专业覆盖不断延伸，切实拓宽乡镇学生专业选择空间，让教育公平理念落地生根，结合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政策导向调整专业结构、增设适配专业，确保专业发展贴合区域政策与产业实际需求、同频同步。

（二）客观审视现状，明确适配性提升空间

纵向衔接协同效能未充分释放，初等教育阶段职业启蒙呈零散化，缺乏系统完整的教育体系支撑，相关课程无统一规范，职业体验活动频次不足且流于形式，导致与后续专业教育衔接不畅，难以凝聚合力推动学生深化职业认知与理解。中等教育阶段职普专业协同不足，课程互选互通比例偏低、学籍互转不畅，专业设置缺乏联动衔接；高等教育升学通道适配度不高，中职与高职、本科专业对接存在偏差，普高职业类升学占比偏低，贯通培养质量与覆盖范围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横向供需精准度需进一步提高。

部分县域专业设置同质化突出，未精准对接本地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需求，专业集群效应未充分释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不足，且专业布局与县域人口、教育资源适配度低，乡镇专业设置薄弱、资源利用低效，专业调整滞后于产业升级及区域政策导向。

四、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专业结构适配性的优化路径

（一）深化纵向贯通协同，完善全学段专业衔接体系

1. 强化初等教育职业启蒙，筑牢专业衔接基础

结合县域发展实际，职业启蒙教育需系统融入义务教育课程，需规范其课程开设标准与流程，结合本地主导及特色产业，编写贴合县域学情的本土化职业启蒙教材，丰富课程内容、优化呈现形式，提升职业启蒙课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4]。结合县域初等教育阶段职业启蒙与后续教育衔接实际，需将学生职业体验活动年均频次提升至不少于 4 次，组织学生走进本地企业及职业院校，通过沉浸式体验、岗位观摩深化职业认知，组建专职职业指导教师队伍提供个性化引导，推动职业启蒙与劳动教育、生涯规划教育深度融合，筑牢纵向衔接根基。

2. 强化中等教育职普协同，提升专业衔接质量

立足县域产业实际与学生多元成长需求，需推动中职与普高协同规划、互补设置专业，构建适配本地发展、贴合学生需求的职普互补专业体系，将两类学校课程互选互通比例提升至 50% 以上，普高增设职业技能选修课程，中职强化文化基础课程，实现两类教育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结合县域职普衔接实际调研，需健全中职与普高学籍互转机制，简化转换流程，允许高一、高二学生根据兴趣特长和学业情况灵活切换教育轨道，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固化限制，建立动态学籍管理模式，统一两类学校相关专业基础课程标准，强化课程衔接、杜绝学习断层，提升中等教育阶段职普专业衔接质量。

3. 拓宽高等教育升学通道，实现全程贯通育人

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专业覆盖范围，重点提升中职与高职、本科阶段专业对接精准度，力争将两者专业对接率稳定在 80% 以上，同步探索构建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与专业硕士循序渐进、无缝衔接的一体化培养模式，切实筑牢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基础[5]。优化升学考核机制，将专业技能、文化基础与职业素养纳入升学考核，打破“唯分数论”固有束缚，保障中职学生平等升学机会，深化县域职业院校与高等院校协同合作，建立稳定协同培养机制，推行“3+2”“3+4”贯通培养模式，兼顾学生专业素养与学历层次提升，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纵向深度融合、全学段贯通育人。

（二）精准对接多元需求，优化横向供需适配体系

1. 立足产业需求，打造特色专业体系

完善专业设置调研论证流程，定期摸排县域产业人才缺口，紧跟本地主导及特色产业发展动向，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重点增设与本地产业紧密契合的专业、打造特色专业优势，取消与产业发展脱节、无实际育人价值的专业。建立专业发展常态化“体检”机制，持续评估、动态优化，守住专业与产业需求的对接精度，确保对接率稳定在 80% 以上。围绕县域主导产业打造特色专业集群，整合优质育人与产业资源，强化专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

2. 结合区域禀赋，优化专业空间布局

统筹县域各类教育资源，优化专业空间布局，加大乡镇区域专业建设投入倾斜力度，结合乡镇实际合理增设特色与基础专业，稳步扩大乡镇专业覆盖范围，贴合乡镇学生专业选择需求，推动县域教育公平落地见效。结合县域人口分布与教育资源布局实际，科学调配专业资源，规避专业过度向县城集聚，实现专业布局与区域资源、人口分布精准契合，强化县域职普学校资源联动共享，推动实训基地、图书馆、师资等优质资源共建共用，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与专业建设整体效能。

3. 对接政策导向，推动专业升级发展

紧跟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国家和地方政策方向，推进现有专业升级改造与质量提升，新增农业技术、乡村治理等贴合乡村振兴需求的专业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产业升级配套专业，补齐相关专业领域空白和短板。抓实专业内涵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将产业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日常教学，确保人才培养紧跟产业节奏、贴合政策导向，参照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结合县域实际制定本土化教学规范，推进专业标准化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聚焦个体发展，提升专业个体适配水平

结合县域初等教育职业启蒙与后续培养衔接实际，夯实个性化培养机制，兼顾学生兴趣喜好、自身特质及未来职业构想，优化专业培养方案，搭建模块化、多样化课程体系，赋予学生课程自主选择权，推进个性化培养落地、逐步实现“一人一方案”，夯实学生职业启蒙基础、明确其发展方向。推进全程化职业指导，足额配备专职职业指导教师并强化专业能力，推行“导师制”帮扶模式，提供全方位、个性化职业指导，助力厘清职业发展思路，明确规划方向、选择契合自身的专业，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实践课时占比，锤炼专业技能、涵养职业素养，确保专业培养与后续职业发展无缝衔接。

（四）兼顾区域差异，实施差异化优化策略

拓宽中职升本科通道，围绕本地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需求，迭代升级现有专业、淘汰产业滞后传统专业，整合资源打造特色鲜明、适配产业的专业集群，强化职普专业协同联动，提升专业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契合度，规避专业同质化竞争，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专业发展标杆。

紧扣本地主导产业发展节奏，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强化职业启蒙师资培育，补齐实训资源短板，打破职普教育资源壁垒、实现双向共享，完善职普课程互选互通机制，提升专业培养质量与产业适配度，深化与高职院校务实合作，搭建顺畅多元的学生升学成长通道。抓实初等教育阶段职业启蒙，杜绝形式主义，在逐步增加专业数量的同时合理投入专项资金，重点增设贴合本地特色产业、适配学生就业需求的专业，强化常态化职业指导、引导学生理性选专业，加强社会宣传提升职普融通认可度，逐步构建“职普融通、多元成才”办学模式，优化专业结构以适应本地发展。

五、结论

从纵向衔接视角，县域职普融通中专业结构的实际贴合度与适配性，直接决定其能否突破表面化局限、实现内涵提质，更是精准对接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补齐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贴合学生成长特点、支撑其终身发展，串联教育提质、产业赋能与学生成长的关键。立足县域职普融通实际调研，从纵向贯通视角搭建涵盖纵向衔接、横向协同与个体发展的专业结构适配性评价框架，梳理专业适配实践成效、剖析现存问题与提升空间，提出可行优化路径，强化纵向协同、贴合多元需求，关注个体发展、完善保障并推行差异化做法，为该领域研究补充正向案例、为实践开展提供参考思路。

参考文献

[1] 张子航 .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县域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的路径研究 [J]. 文存阅刊 , 2025(20): 138−141.

[2] 杨易昆 , 谈建成 , 周永平 .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 [J]. 职业技术教育 , 2025, 46(24): 43−49.

[3] 冯丽 , 李玉静 .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使命担当、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基于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年会成果的分析 [J]. 职业技术教育 , 2025, 46(36): 15−20.

[4] 李政 , 胡刚 . 教育正义视角下职业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及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 2023, 44(01): 40−46.

[5] 卢俊阁 . 县域中职综合高中办学模式的实施现状与对策 [J]. 青年时代 , 2020(12): 229−2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连云港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纵向贯通’视域下县域职普融通办学的专业结构适配研究”（Y/2023/12/006）。

（作者单位：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路径研究

裴达峰

摘要：我国在低生育率、老龄化与劳动力供求矛盾叠加的情况下，生育支持系统供给资源不足、零碎化、不平衡的矛盾愈发显现。以数字政府、数字平台治理等视角作为借鉴，文章梳理国内外生育支持的政策实践，归纳数字治理优势，认为数字治理在数据、服务、跨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最后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打造全国一体化服务供给平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具体路径。数字治理赋能是实现人口生育支持体系赋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人口生育支持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数字治理；生育支持；生育支持体系

人口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国际警戒线，人口出现负增长趋势，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压力都较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对此，国家密集颁布“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要求从托育、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培育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然而，传统生育配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资源配置不均、部门协同不畅、信息传递不够顺畅等问题，不能满足家庭个性化、多样化的生育服务需求[1]。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改善体验，无论是智慧医疗卫生、数字政务还是数字救助、数字减灾等，都彰显了治理的智慧。这一治理模式有利于为纾解生育支持工作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提供借鉴，为进一步探索“数字治理 + 生育支持”发展模式提供现实参考。

在生育率较低和生育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探讨数字治理之于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赋能作用：首先，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加健全的生育支持体系，不仅是解决家庭生育矛盾的需要，而且是可持续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要。其次，从国家“三孩”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角度看，如何将国家“三孩”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协同落地，更加需要从创新治理模式着手，协同发力，增强生育支持政策可及性[2]。最后，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数字治理在数据互通、精准服务、社会共治等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能够在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对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实现赋能，推动公共服务从“泛在”走向“匹配”[3–5]。所以，探讨数字治理之于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赋能作用，可以为人口、经济社会治理提供更多借鉴，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数字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场域，现有文献从数字政府、平台治理等视角进行理论研究。数字政府理论认为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在政府组织中的融入，实现政府职能电子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等的数字政府，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的高效、透明和及时；而平台治理理论则认为数字治理时代，多元组织竞相依托平台搭建开放透明的数字空间统整资源、组织协调、相互协同，实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数据驱动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实践在数字治理理论下兴起，其主要通过数据资源的多部门整合与智慧分析来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个性化的供给服务。这为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框架。

（二）文献综述

人口问题乃全球各国治国理政的关键议题，我国应依据人口变化态势，适时对生育政策作出逐步调整完善，以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随着我国从高生育率步入低生育率阶段，生育政策重心发生转变，由以往侧重控制人口规模，调整为适度提升生育水平、积极引导群众依政策生育，同时全力促进优生优育，着力提高新生儿素质，并推动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各项政策实现有机衔接、协同共进。鉴于此，要全力激发党组织在政治引领与组织协调上的独特优势，对生育支持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高效利用，优化财政、税收、保险以及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积极生育扶持政

策，清晰界定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各方应尽的责任，切实推动生育支持政策有效制定与落地实施。

在生育支持制度建设上，国外研究者主要从生育津贴、普惠性托育、生育医疗等方面入手，在制度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经验[6]。例如北欧国家普惠性生育福利制度健全、依托普惠性托育服务使其生育养育成本极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注重产假政策的完善，配套养育津贴、医疗保障等多项生育支持制度，构建全链条生育支持制度；日本、韩国等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逐渐加强托育资源的供给和工作—家庭平衡支持举措。而随着国内“三孩”政策的提出，生育补贴、产假延长、托育服务发展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不断出台，生育支持体系逐渐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总体来看，未来学界与实践领域仍需进一步关注资源配置的系统整合，以及服务供给在普惠性与精准性层面的提升，以推动生育支持体系的持续优化。

二、数字治理与社会政策融合的研究进展

在社会政策领域，数字治理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在养老服务领域，多地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打造智慧养老平台，打通老年人物联网健康监测、紧急救援、个性化服务等渠道，提升了服务的实时性和精准性；在医疗保障领域，电子健康档案、在线医保结算等应用的普及使医疗资源更优化、居民就医更方便；在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领域，“互联网 + 政务服务”使补贴申请、资格审核、发放等流程更高效，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信息不对称。以上实践表明，数字治理有助于缓解资源不足、服务不均等问题，提升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因此，将数字治理理念 / 工具应用于生育支持不仅是可能的，且将有助于托育资源的有效连接、托育政策的精准提供和匹配家庭的服务供给[7-8]。

三、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困境

尽管国家层面在生育支持的制度供给上不断加大，但建设与运行中的问题依旧存在，具体表现在生育支持资源供给不充分、零散化、信息不对称与公共服务不均等，不仅制约着整个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顺畅运转，而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支持对育龄群体的吸引力。

（一）资源供给不足

当前，我国在托育、教育、住房、医疗等与生育直接相关的领域已经出台了很多良策，但在政策落实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在托育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明确发展‘1+N’的托育服务体系”，但 3 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供给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普惠性托育机构数量不足，很多家庭难以在市场化的较高收费价格和较高的家庭看护负担之间作出权衡。在教育方面，虽然国家大力支持民办托育服务机构发展，但是“教育内卷”“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导致家庭对未来生育成本持担忧态度，选择推迟生育甚至放弃生育。在住房方面，高房价、住房保障水平较低加重了年轻家庭经济负担，也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医疗方面，孕产妇保健体系逐渐完善，但是基层地区执行效果参差不齐，难以打消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不难看出，由于供给水平不足，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信任度和依赖度降低，难以达到政策目标。

（二）政策执行碎片化，治理效能亟待提升

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涉及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住房建设等多个部门，呈现出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特征。在政策体系逐步扩展的过程中，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与制度衔接仍需进一步完善。例如，育儿补贴、托育服务、住房保障等政策工具由不同部门主导，往往形成多元化但相对分散的格局。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力度与方式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实施效果呈现多样化。

（三）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不均衡

在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信息获取渠道和公共服务均衡性仍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政策信息传播和服务资源对接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部分家庭在知晓与获取相关支持时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城乡、区域以及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仍然不均衡，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在托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相对丰富，而中西部与农村地区则在供给充足性与服务质量方面存在差距。同一城市内部不同社区的服务条件也可能存在差异，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不平衡格局。信息可及性不足与资源分布差异的叠加效应，使得生育支持体系在公平性、可达性与整体信任度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四、数字治理赋能的路径机理

针对生育支持体系建设面临的各种困境，数字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工具、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可以通过数据赋能、智慧赋能、平台赋能，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化的服务供给。数字治理的这种赋能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信息整合与数据共享，打破资源壁垒

目前生育支持工作涉及计生、教育、人社、城建等多个部门，各职能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利用，数字治理通过大数据平台和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共建共享，打破人口、医疗、教育、社保等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如统一建设数字母婴健康数据，让孕产妇跨医院享受信息互通，避免重复检查、重复办事；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方便政府甄别哪些家庭需要政府补贴、哪些家庭需要政府托育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数据整合既支持政府宏观层面决策，也支持基层公共服务。

（二）精准服务与智能匹配，满足多元化需求

生育支持需求本身有个性化、多元化等基本特点，每个地方、每个家庭的需求有较大差异，数字治理则可以凭借大数据分析、AI 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识别和描绘家庭经济、生育支持、托育支持等方面的需求，精准实施、精准服务，例如为家庭精准推送服务申领补贴、提供托育支持、给予生育指导等；又如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家庭需求预测模型，供政府调整和分配公共资源等。精准供给不仅让家庭有获得感、满意度，也能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跨部门协同与流程优化，提升治理效能

生育支持政策落地常涉及多部门联动，条块割裂导致手续烦琐、程序冗长，数字治理可以通过数据平台和流程优化实现条块互通、信息共享，如“一网通办”“掌上政务平台”可以实现生育登记、补贴申请、医疗保障、托育资源配置等事项“一站式”办理，由居民家庭提交申请资料即可实现系列流程办理，减少了制度束缚，审批追踪等智能化流程设计也有助于加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追溯性，增强落地效果。

五、推进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的路径

因此，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数字治理不仅是技术支撑，还是制度创新与治理变革的引擎。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有效破解难题，高效、精准、公允地推进生育支持。

（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构建统一协调的治理框架

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首先需要制度性顶层设计。国家层面形成全国统一生育支持数字发展战略，卫健、教育、人社、住建、民政等部门间突破部门分割壁垒，形成跨部门跨层级的制度机制和生育登记、生育补贴发放、托育服务、医疗保障等服务链，以制度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数据共享、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边界，确保数字治理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中央和地方之间也需要形成政策和技术联动机制，既保障政策全国统一性，也促进地方探索。

（二）推进技术赋能，打造全国一体化服务平台

要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全国生育支持数字服务系统，构建“一网通办、一站到底”模式，将生育登记、医疗服务、托育服务、教育信息、住房保障等服务事项统一在一个平台，集成全周期服务，为家庭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家庭需求智能分析、精准匹配，提高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水平。要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实现平台使用的广泛性、适用性。

（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区域与群体差距

数字赋能治理不仅要重效率，更要重公平。在公共服务提供上，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宽带网、智慧政务终端等，消除“数字鸿沟”，还要对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单亲家庭等数字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的数字服务供给，保障其均等享有生育支持政策。要以财力转移、资源倾斜的形式，提升欠发达地区托育、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均衡发展。

六、结语

数字治理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新的发展思路。从整体上来看，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不仅仅是数字赋能政府全过程的政策工具供给，更是数字治理赋能公共服务从制度适配转向精准适配，是回应低生育率复杂社会需求的结果。本文研究对于人口政策和治理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对理解数字时代社会政策发展交叉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不同场景与技术适配的维度出发，为数字治理赋能生育支持体系提供理论构建与实践支撑，同时需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力度、推进人才培养工作来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确保数字治理能切实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提供助力，为我国人口事业的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艾琳 .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促进生育政策的体系化构建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62(04): 136−149.

[2] 方世南 , 潘超 . 中国式现代化境遇中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 2025(03): 59−68.

[3] 李俊蓉 , 刘智勇 , 范如国 , 等 . 数字政府何以赋能社会治理——基于“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2025, 15(04): 99−113.

[4] 赵精武 , 何傲翾 .“智能化锦标赛”下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创新——基于“DeepSeek+ 政务”实践的分析 [J]. 电子政务 , 2025(06): 16−30.

[5] 詹绍文 , 刘家明 . 平台型治理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主要范畴与价值意蕴 [J]. 行政论坛 , 2025, 32(02): 69−80.

[6] JONES G W.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policy responses and challenges[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19, 15(02): 131−149.

[7] 张瑞娟 , 高秀娟 , 刘金菊 , 等 .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现状与展望 [J]. 人口学刊 , 2025, 47(03): 9−36.

[8] 茅倬彦 . 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 国际经验及启示 [J]. 人口与发展 , 2023, 29(03): 16−1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内蒙古哲社规划项目“三孩政策背景下 Z 世代大学生的婚育观研究”（2024NDC173）。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创新模式探索

陈　虹 李　巧*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广西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与港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在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统战工作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广西特色的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创新模式，对于增强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广西经验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内在联系

（一）理论逻辑：共同体意识是统战工作的价值内核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群体认同，包含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对同胞的情感认同等多重维度。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本质，就是通过系统性的引导与互动，构建“我是中华民族一员”的认知框架，将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历史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1]。统战工作不再是“联谊活动”，而是要通过文化浸润、实践体验、利益联结等方式，让港澳青少年深刻认识到港澳的繁荣稳定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

（二）实践逻辑：统战工作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

港澳青少年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其国家认同呈现出复杂性和层次性。一方面，港澳与内地在社会制度、教育体系等上存在差异，导致部分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停留在表面。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对其民族意识形成冲击[2]。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要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创新互动方式。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特殊交融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缩影。通过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广西，感受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能够让他们直观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脉络，认识到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

（三）时代逻辑：民族复兴背景下的使命叠加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港澳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其青少年群体是参与国家建设、推动中外交流的重要力量。铸牢港澳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激发其投身国家发展的责任感，让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3]。广西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地位，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又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沿阵地。引导港澳青少年参与广西的开放发展实践，既能让他们共享国家发展机遇，又能增强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认同。

二、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现状分析

（一）工作基础与成效

1. 交流平台持续拓展

广西依托“桂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打造了一系列品牌活动。如“港澳青少年广西研学之旅”已连续举办多年，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参观民族博物馆、工业基地、革命老区，通过实地考察增进对广西发展的了解。近年来，广西与香港青年联会合作举办“桂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吸引港澳团队参赛，其中多个项目落地广西，带动百余人就业。

2. 文化纽带不断强化

广西充分发挥多民族文化优势，举办“桂港澳民族文化艺术节”，邀请港澳青少年与广西各族群众共同展演壮族歌圩、瑶族长鼓舞、侗族大歌等非遗项目。艺术节期间，港澳青少年参与的“同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汇演在港澳地区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50万人次。此外，广西还组织“民族文化传承人走进港澳”活动，让壮族织锦、苗族银饰锻造等技艺传承人赴港澳授课等。

3. 合作机制逐步完善

广西成立了“桂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统战部牵头，教育、文旅、共青团等10个部门参与，形成“季度会商、年度总结”的工作机制。2023年，该小组制定《桂港澳青少年交流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明确了“每年互访交流不少于3000人次、共建3个青少年合作基地”的目标。同时，广西与港澳的青年社团建立了常态化联系[4]。

（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 认知层面：认同度存在差异

根据广西近年来开展的“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调查”，在参与调研的港澳青少年中，大部分的青少年能够准确说出“广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表示“不了解”。部分港澳青少年受西方媒体影响，对内地发展现状存在偏见，这些认知制约统战工作的成效。

2. 形式层面：活动创新性不足

现有交流活动多以“参观考察+座谈交流”为主，同质化现象明显。例如目前多数的研学活动都包含“参观民族博物馆”“观看民族表演”等环节，缺乏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个性化设计。港澳青少年更倾向于互动性、体验性强的活动，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

3. 机制层面：长效性有待加强

尽管建立了合作机制，但多数交流活动仍停留在“短期走访”层面，缺乏后续跟踪与深度合作。例如参与研学的港澳青少年中，仅有部分在活动结束后能够与广西青少年保持联系，多数的合作项目因缺乏持续资金支持而难以推进。此外，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存在“各自为政”现象。

4. 队伍层面：专业能力需提升

从事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人员中，多为兼职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部分工作人员对港澳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在活动设计中存在“内地视角”，难以精准对接需求。同时，缺乏熟悉港澳法律、文化的专业人才，在处理跨地域合作中的矛盾时能力不足。

三、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创新模式构建

（一）“文化浸润+科技赋能”的认知重塑模式

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依托广西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验走廊”。在桂林龙脊梯田打造“壮族农耕文化体验区”，让港澳青少年参与稻田耕作、壮族织锦等生产活动，感受“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建设“侗族建筑营造工坊”，邀请港澳青少年与侗族工匠共同搭建鼓楼，理解“榫卯结构”中蕴含的团结协作精神。开发数字化文化传播产品。联合广西广电集团、港澳新媒体平台，制作《民族同心圆》系列微纪录片，以港澳青少年视角讲述广西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故事。例如，拍摄《瑶寨里的香港教师》，记录香港教师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支教的经历，制作《壮乡非遗的澳门传承者》，展现澳门青年学习壮族歌圩文化的过程。开展“民族文化共创”项目，组织港澳青少年与广西各族青少年共同开展文化创作。

（二）“产业融合+实践赋能”的发展联动模式

搭建“桂港澳青少年创新创业生态圈”。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在南宁、柳州、桂林设立“桂港澳青少年创新创业基地”，提供“办公场地+政策咨询+融资对接”一站式服务。支持港澳青少年参与广西的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跨境农业等产业，设立专项基金，对优质项目给予创业补贴。开展“职业体验+人才共育”计划。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发“边疆产业研学”课程，组织港澳青少年到广西的重点企业、乡村振兴示范点进行为期1~3个月的职业体验。同时，推行“双导师制”，由广西企业导师和港澳高校导师共同指导。建立“跨境产业协作”平台。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设立“桂港澳青少年产业合作展区”，展示三地青少年合作的产业项目。推动成立“桂港澳青少年跨境电商联盟”，整合广西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资源，通过港澳的电商渠道销往全球。

（三）“情感共鸣+社交赋能”的认同培育模式

实施“桂港澳青少年结对成长计划”。按照“年龄相近、兴趣相投”原则，组织广西与港澳青少年开展“一对一”结对，通过书信、视频、互访等方式建立长期联系。设计“共绘家乡地图”“同唱民族歌曲”等互动任务，让青少年在交流中发现两地的文化共性。打造“线上+线下”社交矩阵。建设“桂港澳青少年社交平台”App，设置“民族知识闯关”“合作项目对接”等板块，支持三地青少年实时互动。线下开展“主题营地”活动，如在北海举办“海洋文化夏令营”，组织青少年共同开展海洋环保调研，通过共同经历增强情感联结。开展“民族体育融合”活动，利用广西的民族体育资源，如壮族的抛绣球、苗族的芦笙踩堂、侗族的抢花炮等，创新设计融合三地特色的体育赛事。举办“桂港澳青少年民族体育嘉年华”，设置“混合组队”比赛项目，让青少年在竞技中学会协作。

（四）“机制创新+协同赋能”的保障支撑模式

构建“多元协同”工作体系。成立“桂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委员会”，设置专项组，统筹党委、政府、

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成立专项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建立“月调度”机制。制定《桂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考核办法》，将工作成效纳入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建立“长效资金”保障机制，设立“桂港澳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企业捐赠、社会募集。基金实行“项目化管理”，重点支持长期合作项目。建立资金使用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打造“专业人才”培育基地，与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合作设立“桂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人才培训中心”，每年培训百余名专业人才，课程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港澳青少年心理分析”等。组建“专家智库”，聘请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咨询指导，提升工作专业性。

四、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一）以“精准化”为导向，提升工作针对性

建立“港澳青少年需求数据库”。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全面了解港澳青少年的兴趣爱好、认知困惑、发展需求等，建立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侧重开展文化体验活动，针对 17~22 岁大学生，重点提供创新创业支持。根据数据库信息，制定精准服务方案，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工作模式。分类设计“认知提升路径”。对于国家认同度较低的青少年，开展“国情认知教育”，通过对比数据等方式纠正偏见。针对有一定认同但缺乏情感联结的青少年，加强“文化共情”活动，重点培养其“代言人”角色，鼓励他们向身边同学宣传广西、宣传国家。

（二）以“长效化”为目标，完善工作机制

构建“跟踪反馈”体系。对参与交流活动的港澳青少年建立“成长档案”，记录其认知变化、参与项目、发展需求等，通过定期回访，了解其动态。建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三个维度设置 20 项具体指标，科学评估工作成效。推动“政策衔接”与“制度保障”，将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纳入广西“十五五”规划和“边疆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出台《关于加强桂港澳青少年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明确在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推动与港澳地区的政策衔接，为青少年发展消除制度障碍。

（三）以“品牌化”为抓手，扩大工作影响力

打造“桂港澳青少年共同体”特色品牌。整合现有活动资源，重点培育 3~5 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利用央视、港澳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等平台，讲述品牌背后的青少年故事，扩大社会影响力。开展“品牌推广”活动，组织“桂港澳青少年优秀项目巡展”，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港澳地区展示工作成果。邀请港澳知名人士、媒体记者、社会领袖参与活动，借助其影响力扩大品牌传播。与抖音、B 站等平台合作，发起“我与桂港澳”话题挑战，鼓励青少年分享交流经历，形成“线上 + 线下”联动的宣传效应。

（四）以“国际化”为视野，拓展工作空间

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扩大影响，利用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组织桂港澳青少年共同参与中国—东盟青少年文化节、中国—东盟青年创业大赛等活动。支持他们到东盟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公益服务[5]。开展“比较研究”与“经验输出”，组织桂港澳青少年开展“中外民族政策比较研究”，通过对比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增强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总结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的探索，形成可复制的“广西经验”，向全国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推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广西智慧。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广西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在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广西通过构建“文化浸润 + 科技赋能”“产业融合 + 实践赋能”“情感共鸣 + 社交赋能”“机制创新 + 协同赋能”的创新模式，有效增强了港澳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使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底蕴，认识到自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责任与使命。目前，创新模式的落地还需要解决认知偏差、机制障碍、队伍短板等问题，这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形成合力。未来，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不断优化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广西的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宋勇，姚安怡．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与国家认同路径研究 [J]. 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2021(05): 16−19.

[2] 马戎．如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51(04): 36−46.

[3] 罗嘉楠．粤港澳大湾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J]. 南方论刊，2024(12): 110−112.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桂平市四举措加强与大湾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EB/OL]. (2024−03−01)[2025−10−15]. http://mzw.gxzf.gov.cn/gzyw/sxxx/t18027568.shtml.

[5] 谢春红．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22(06): 107−110, 124.

（下转 126 页）

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尊和特质焦虑的作用

安义飞

摘要：本研究聚焦青年教师群体，探讨职场排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重点分析自尊的中介效应及特质焦虑的调节效应。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以 378 名青年教师为调查对象，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分析发现职场排斥对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尊在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则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特质焦虑则调节职场排斥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高特质焦虑教师面对职场排斥时，职场排斥对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被增强。研究结论为学校优化职场环境、提升教师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职场排斥；主观幸福感；自尊；特质焦虑；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作为教育体系中的关键群体，是推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培育新一代栋梁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教育竞争加剧，职场排斥现象在学校中逐渐显现，如不合理任务分配背后的排挤意图、言语上的贬低与轻视、刻意营造的关系孤立氛围，以及职场系统性情感操控与精神控制（PUA）等行为，这些都对教师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诸多职场排斥相关事件频繁被曝出，可见职场排斥行为已呈现出在工作场景中广泛蔓延的态势。

在职业群体与职场环境互动研究中，教师群体因其职业特性与文化烙印，在职场排斥情境中呈现显著易感性。受高教育水平与儒家文化的影响，该群体在职场冲突中常选择策略性隐忍，以维护组织表面和谐，但这种压抑性应对反而使其成为职场隐性伤害的易感人群。

主观幸福感涵盖了认知和情感两个关键层面，它不仅是对生活总体满意度的单一评价，更包含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感体验与消极情感体验的综合权衡。职场排斥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极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主观幸福感。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职场排斥即员工在职场中被他人忽视或孤立的行为，这类行为包括员工被忽视、被拒绝以及被避免接触等相关行为，严重破坏了员工的基本需求和对组织的归属感。本文对职场排斥的研究采用国内研究的概念，即职场排斥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被同事、领导或者团队忽视、排斥和孤立的现象[1]。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照自身的评定标准，对自身的生活满意程度、正面感受及负面感受的体验，是衡量个人心理状态是否处于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体对自身所处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研究发现，受到职场排斥会降低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导致退缩行为的增加，职场排斥也会导致员工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引起情绪耗竭与家庭贬损，降低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严重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2]。青年教师每日大量时间在学校工作，工作场所中的经历自然会影响其对生活的满意度和情绪体验，若长期经历职场排斥，势必会对其主观幸福感带来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1 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上接 125 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广西高校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开展港澳青少年统战工作创新模式及思考探索”（2025GXTZ224）；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3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等七个专项课题“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下高校思政教师的发展要求与解决对策研究”（2023YZKTGM31）。

（作者：陈虹，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讲师；通信作者李巧，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二）自尊的中介作用

员工在职场中体验的排斥会降低员工的自尊感，研究证实，职场排斥会降低员工的自尊水平从而影响工作绩效[3]。职场排斥会导致更多的员工沉默行为，引发工作退缩和离职倾向[4]，因此势必对员工的自尊带来负面影响，致使受排斥员工的自信心下降、自我价值感弱化，甚至产生自我厌恶等不良情绪。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2 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自尊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自尊是一种幸福指数，也是构成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对主观幸福感势必产生显著影响[5]。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体验到的幸福感越强，自尊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6]。所以，当个体处于较高的自尊状态时，他们更倾向于以积极、接纳的视角看待自身的现状，进而产生更高的现状满意度，直接推动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3 自尊对青年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假设 H2 和 H3 可以推论出自尊的中介作用，据此得出假设：H4 自尊在职场排斥与青年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特质焦虑的调节作用

特质焦虑，指个体以导致焦虑的方式评估内部刺激或外部事件的倾向性，反映了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潜在威胁的习惯性担忧[7]。在相同情境下，不同个体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反应，这种差异往往源自个体特质焦虑水平的不同。

相较于低特质焦虑者，高特质焦虑的被试在面对周围的刺激时会更偏好将其知觉为负面的刺激，然后个体就会表现出高状态焦虑[8]。Spielberge 认为，相同处境下，相较于低特质焦虑者，高特质焦虑者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情绪，且体验到的焦虑情绪强度也更大。

具体到职场排斥这一特定情境中，高特质焦虑个体往往比低特质焦虑个体更易受到情绪与认知层面的深刻影响。部分学者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R）提出，特质焦虑作为个体差异变量，可能通过强化压力感知的“心理放大器”效应加剧职场排斥的损害，在遭遇排斥时，高特质焦虑者反刍思维频率更高，因此推测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自尊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5 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特质焦虑水平越高，职场排斥对自尊的负向作用越强；反之，越弱。H6 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特质焦虑水平越高，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大中专院校、中学的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纸质问卷与问卷星两种方式进行调查。累计发放 400 份问卷，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37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5%。

（二）变量测量

1. 职场排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Ferris 等（2008）编制的量表，通过 10 个题项来测量。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4。

2. 自尊。该变量的测量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量表由 10 个题目组成，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9。

3. 特质焦虑。该变量的测评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中的特质焦虑分量表（TAI），该量表包含 20 个题目，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6。

4. 主观幸福感。该变量的测量采用由 Diener 提出，经我国学者邢占军修改并制定中文版的主观幸福感量表（SWB），共包含 20 个题目，采用 Likert 6 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0。

5. 控制变量：本研究为探究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将性别、学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均为被试以自我报告形式填写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查，经过主成分分析，共有 5 个

表 1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自尊			主观幸福感			
职场排斥	-0.668^{***}	-0.668^{***}	-0.665^{**}	-0.943^{***}	-0.121^{**}	-0.942^{***}	-0.933^{***}
自尊					1.230^{***}		
特质焦虑		−0.028	−0.030			−0.072	−0.080
职场排斥 × 特质焦虑			-0.052^{*}				-0.134^{**}
ΔR^2	0.605	0.719	0.004	0.547	0.193	0.002	0.011
ΔF	802.645^{***}	0.663	4.753^{*}	589.117^{***}	469.849^{***}	1.700	12.096^{**}

注：* p<0.05，** p<0.01，***p<0.001。

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且最大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6.973%，低于临界值 40%。可见，该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职场排斥、自尊、特质焦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职场排斥、自尊、主观幸福感、特质焦虑相关矩阵，职场排斥与自尊（r=–0.846，p<0.001）以及主观幸福感（r=–0.803，p<0.001）均呈负相关。此外，自尊与主观幸福感（r=0.917，p<0.001）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中介效应，采用逐步层次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根据表 1 假设检验结果，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模型 6，β=–0.943，p<0.001）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对自尊（模型 2，β=–0.668，p<0.001）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结果支持假设 H1 和假设 H2。自尊对主观幸福感（模型 7，β=1.230，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假设 H3 得到支持。而在引入自尊这一中介变量后，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 7，β=–0.121，p<0.01），支持了假设 H4，自尊在职场排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1）。

（四）调节效应检验

由逐步层次回归的结果可知，职场排斥与特质焦虑的交互项对自尊（模型 4，β=–0.052，p<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示特质焦虑程度越高，职场排斥与自尊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大，假设 H5 得到支持；职场排斥与特质焦虑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模型 9，β=–0.134，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示特质焦虑程度越高，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大，假设 H6 也得到支持。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1、图 2）显示，特质焦虑程度越高，职场排斥对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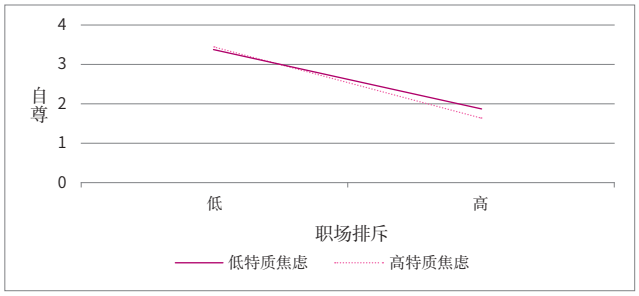


图 1 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自尊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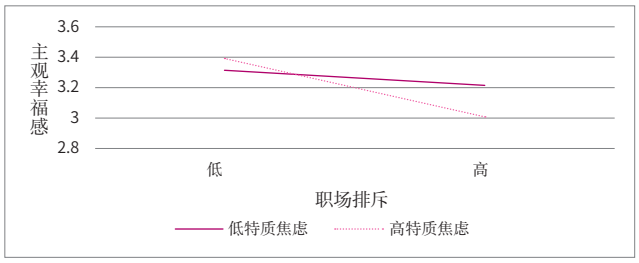


图 2 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

四、结论

（一）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围绕职场排斥对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展开深入探究，全面剖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证实职场排斥负向影响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二）自尊在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职场排斥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作用下，研究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自尊在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三）特质焦虑对职场排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引入特质焦虑作为调节变量展开探究，并实证分析了特质焦虑在增强职场排斥对自尊及主观幸福感作用效果方面的影响，即遭遇职场排斥时，特质焦虑水平较高的教师群体，其自尊受损程度更为严重，主观幸福感下降也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1] 王雅婕 . 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D]. 青岛：青岛大学，2023.

[2] 刘君 . 职场排斥对中小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组织认同和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D]. 湘潭：湘潭大学，2018.

[3] FERRIS D L, LIAN H,BROWN D J, et al. Ostracism, self-esteem, and job performance: When do we self-verify and when do we self-enh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01): 279-297.

[4] 汤亚敏 . 职场排斥与员工离职意向：工作不安全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D]. 开封：河南大学，2017.

[5] 李梁友，赵小云，井立沛 . 情绪智力对中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 39(02): 106-111.

[6] 黄禹龙，邓黎婕 . 正面管教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与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 [J]. 心理月刊，2024, 19(19): 85-89.

[7] 姚雨佳，宣雨阳，齐常辉，等 . 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特质焦虑大学生应激反应的影响 [J]. 心理科学，2019, 42(01): 209-215.

[8] 邵秀巧 . 特质焦虑者对威胁信息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8.

（作者单位：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化时代红色文创产品传播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的“三维四驱”模型构建

王嘉隽 李　丽 邝洪波 单连良 袁　博

摘要：红色文创产品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重要载体，以其具象化、生活化与互动化的特点，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广泛深入传播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有效传播对于凝聚民族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时代意义。本文结合实践案例，分析当前红色文创传播面临的挑战，构建了红色文创产品“三维四驱”传播路径模型，旨在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实现从静态陈列到动态互动、从单向灌输到双向感知、从同质化输出到个性化触达的转变，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红色文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数智化；文化传播；“三维四驱”模型

一、引言

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其核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囊括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伟大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更是新时代凝聚民族力量、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支撑。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叠加年轻群体对红色文化的兴趣攀升，为红色精神传播创造了新机遇；但数智化时代的信息爆炸、价值多元与技术快速迭代，也让传统“单向灌输＋静态陈列”的传播模式陷入困境[1]。这种模式既无法满足受众对互动性、个性化、沉浸式体验的需求，更难以让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与当代生活语境深度融合。如何让红色精神真正“活”起来、“潮”起来，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

而红色文创产品突破传统纪念品的局限，以“精神内涵＋艺术审美＋实用功能＋数智技术”的融合形态，成为红色精神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媒介。当前红色文创产业虽呈蓬勃发展态势，却仍存在内容浅层化、技术应用生硬、品牌同质化、受众定位模糊等问题。

本文基于数智化宏观背景，聚焦红色文创产品的“精神传播载体”核心功能，研究将系统阐释红色文创与精神谱系传播的关联，精准剖析当前传播实践的瓶颈，进而构建“三维四驱”（以内容创新、技术赋能、体验优化为三维，以政策、市场、文化、技术为四驱）传播路径模型，旨在探讨如何利用数智化技术优化红色文创产品的传播路径和增强传播效能，丰富红色文化传播与文创产业发展的交叉理论体系，推动红色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红色文创产品传播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传播内容浅层化，精神内核诠释不足

当前市场上许多红色文创产品仅停留在表面符号的堆砌，缺乏对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简单将革命元素印在日常用品上，未能通过设计语言传递精神价值，导致产品文化附加值低，难以引发情感共鸣。例如，某些产品仅仅将革命旧址的图片简单印制在常见的笔记本或杯子上，而未通过精妙的设计语言，将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内核进行叙事化、当代性的表达，情感穿透力弱，无法实现深层次的价值传递。

（二）传播方式传统，数智技术应用生硬

虽然有些产品引入了 VR/AR 等技术，但往往是简单的场景复原，缺乏有吸引力的叙事和互动设计，未能充分发挥数智技术的优势[2]。例如，部分 VR 红色体验项目，仅仅实现了对历史场景或文物进行简单的三维数智化复原，缺乏引人入胜的剧情设计、角色扮演和有意义的多感官互动环节，用户体验枯燥乏味。AI 技术的应用也多停留在利用算法生成红色主题图案的浅层次，未能基于细致的用户画像分析，实现内容的故事化重组、个性化推送和产品的定制化生产，技术

优势未转化为传播优势。

（三）传播品牌模糊，产品同质化严重

红色文创市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产品无品牌”。缺乏像“故宫文创”那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文创品牌，且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同地区的文创产品在设计上雷同，如冰箱贴、钥匙扣、徽章、书签等，未能充分展现地域特色和独特的精神资源，如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等[3]。这导致红色文化传播内容严重缺乏个性与地域深度，品牌影响力有限。

（四）传播对象模糊，用户体验感不佳

许多红色文创项目缺乏对目标受众的细分，未能针对大学生、年轻上班族、中老年群体、国际友人等不同群体的认知水平、知识结构、审美偏好、生活方式和功能性需求进行差异化的传播设计与产品开发。青少年产品可能缺乏趣味性与互动性，而面向年轻白领的产品又可能缺乏设计感与实用性。整体而言，未能针对不同用户，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创造沉浸式、游戏化、社交化的传播场景，影响了用户与精神内容进行深度、愉悦互动的可能性与意愿度。

三、数智化背景下红色文创传播的路径构建

数智技术的发展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AI、大数据、VR/AR、元宇宙等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也重塑了用户的体验模式[4]。将这些技术与红色文创产品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提升传播效果，实现精神价值的创造性转化。针对当前红色文创传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三维四驱”传播路径模型，旨在通过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和体验优化，在政策、市场、文化、技术四重驱动下，构建系统化的红色文创传播体系。

（一）内容维度：深化精神叙事，构建分层精准的传播体系

1. 精准提取与分层转化精神符号

建立“核心精神 + 地域特色 + 时代关切”的内容挖掘机制，避免传播内容同质化。核心层聚焦“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等共性价值，如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决策模拟”内容；地域层深耕特色资源，如江西挖掘井冈山精神的“敢闯敢试”内涵，开发“虚拟井冈山”数字 IP，设计“朱毛会师”互动剧情；时代层关联当代议题，如将“两弹一星”精神与“科技创新”结合，推出“大国重器”AI 拼装模型，用户完成拼装后可观看科学家访谈视频，实现“两弹一星”精神的当代映照。

2. 推动叙事化与情感化转化

运用“情感化设计”理论，设计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将精神内涵嵌入具体的历史故事、人物事迹和关键时刻中，构建“故事→符号→产品→体验→情感”的完整传播链条。如围绕“铁人王进喜”事迹，开发“泥浆洗礼”主题香薰：本能层采用土黄色包装，模拟油田环境；行为层设计“挖掘式”开盖方式，需手动移除“泥浆”（环保材质）才能取出香薰；反思层通过香薰气味（模拟原油淡淡清香）与附带的王进喜语录卡片，唤起对“奉献精神”的思考，实现“产品即故事”的传播效果。

3. 拓展时代化与跨界化表达

将红色精神与当代潮流文化、社会议题相结合，开发跨界产品，增强传播的时代感和吸引力[5]。如将长征精神与户外品牌合作，推出“重走长征路”主题徒步装备，印上“坚韧不拔”等精神标语；与教育结合，开发“红色文化 AI 课程包”，针对中小学生的“长征策略桌游”，通过“四渡赤水”关卡设计，让学生在游戏中理解军事智慧。又如，以延安精神为核心，与环保结合，推出 DIY 种植花盆，采用陕北黄土材质，内置种子（象征“希望”），用户种植过程中可观看南泥湾大生产视频，实现精神与生活的融合。

（二）技术维度：赋能传播形态，实现沉浸式与互动性体验

1. AI 与大数据助力精准传播

通过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实现“千人千面”传播：一是内容个性化，如针对青少年推送“红色动漫”，针对中老年推送“历史影像修复版”；二是产品定制化，某平台推出“红色记忆”AI 定制相册，用户上传老照片后，AI 自动修复并添加历史场景；三是传播精准化，通过社交媒体数据识别“红色文化兴趣用户”，定向推送文创产品信息，如在抖音向“历史博主”粉丝推送“红色数字藏品”。

2. VR/AR/MR 打造深度沉浸体验

综合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混合现实技术，重构历史场景，设计互动性强的体验项目，提升用户参与感[6]。一是 VR“角色代入”体验，如遵义会议纪念馆推出“VR 四渡赤水”，让用户扮演红军指挥员，理解“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二是 AR“虚实融合”体验，如扫描延安精神主题拼图，可在桌面生成虚拟“延安窑洞”，用户点击窑洞内物品（如纺车），可观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历史视频；三是 MR“多感官互动”体验，如某“红军过草地”MR 项目，通过震动座椅（模拟沼泽阻力）、低温风（模拟草地严寒），让用户通过“体感”体会长征艰辛，强化精神感知。

3. 数字孪生与元宇宙构建新生态

创建虚拟红色文化空间，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天候、全球化传播。对重要的红色遗址、纪念馆进行高精度数字孪生，并在元宇宙平台构建开放的、可交互的虚拟红色文化空间。用户可以通过自己定制的数字分身进入虚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与虚拟的“三湾改编”士兵委员会选举，体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大生产，甚至收藏和展示独一无

二的红色数字藏品。这将彻底打破物理时空限制，构建充满活力的红色精神传播新场域。

（三）体验维度：聚焦用户感知，构建全场景无缝传播闭环

1. 实施分众化与场景化体验设计

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设计差异化的体验路径。对青少年，重点开发游戏化、强趣味性的产品，如长征主题的策略桌游、红色城市探险 App。对中老年群体，侧重产品的实用功能、怀旧情感与收藏价值，如内置经典红歌与历史故事的智能收音机、红色主题的智能茶具。对年轻消费者，则紧密结合国潮风，开发具有高颜值、强社交分享属性的产品，如与知名插画师联名的红色主题盲盒、限量版手账套装。

2.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传播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无缝衔接的传播生态。线上建设集虚拟展览、深度讲解、社区互动、在线购买于一体的官方小程序或社交媒体矩阵；线下则在红色旅游景区、城市文化地标、校园等开设红色文创体验店、主题快闪展，并设置 VR/AR 体验区、手工制作工坊等，形成“线下体验→线上分享 / 购买→社群讨论→二次传播”的良性闭环。

3. 强化情感化互动与用户共创

通过互动设计和共创机制，提升用户的情感投入和参与度。如在纪念馆设置“红色记忆时光轴”大型互动触摸屏，用户输入自己的生日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即可生成一张专属的“历史上的今天”红色日签。设立“红色文创用户共创”线上平台，定期征集设计创意、投票决定新产品方向、邀请用户参与产品测试，将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极大地提升用户的参与感、归属感，增进对精神谱系的情感认同。

（四）四重驱动：推动“三维”创新，协同优化传播生态系统

1. 政策驱动

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完善对红色文创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将红色文创的创新发展纳入文化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方案，为红色文创传播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资金支持与方向指引。

2. 市场驱动

运用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以此反哺产品研发与迭代。优化产品设计与营销策略，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直播电商、内容平台进行精准化、场景化的整合营销传播。通过打造爆款产品、构建会员体系、开展 IP 授权合作，不断提升红色文创的市场接受度、商业价值，拓展传播覆盖面。

3. 文化驱动

加强与高校、党校、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深化对精神谱系的系统性、学理性研究与当代性阐释，为产品开发提供学术支撑。通过举办高水平的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专题展览、学术论坛、公益讲座等活动，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鉴赏能力，培育传播的肥沃土壤。

4. 技术驱动

鼓励技术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突破红色文化领域数智化应用的关键共性技术瓶颈，如低成本的沉浸式渲染、高逼真数字人、文化遗产的数智化标准等，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既深刻理解红色文化内涵，又精通数字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的复合型跨界人才。

四、结论与展望

红色文创产品作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载体，在数智化时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提出的“三维四驱”传播路径模型，以内容创新破解精神诠释浅层化问题、以技术赋能破解体验同质化问题、以体验优化破解受众模糊化问题，在政策、市场、文化、技术的协同驱动下，为红色文创产品的有效传播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

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持续迭代，红色文创需在“精神内核不变、传播形式常新”中动态优化。通过打造“地域特色 + 精神内核”的超级 IP，推动数智技术与红色精神“深度绑定”，深化红色文创与教育、旅游、科技等领域跨界融合，兼顾可持续与国际化提升长远价值等措施，政府、企业、学界协同发力，红色文创必将成为传播红色精神、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21−07−01(02).

[2] 人民日报社 .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集 [M].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24.

[3] 李宗桂 . 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 [J]. 红旗文稿 , 2017(12): 32−34.

[4] 王秀伟 . 文化创意产业视域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J]. 出版广角 , 2021(10): 76−79.

[5] 赵农 . 设计学概论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20.

[6] 陈剑 . 叙事性设计在红色文创中的应用研究 [J]. 美术大观 , 2022(03): 112−11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北方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2+3 文创新视界：解锁红色基因时代密码，跨越时空传承与创新”（202510009050S）。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企业改革期间信访稳定工作路径探索

龙美勤

摘要：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在圆满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基础上，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又一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任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集团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与集团公司组建开局任务结合起来，蹄疾步稳推进重组整合，着力释放改革红利，厚植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根基，改革三年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改革从未停滞，随着集团公司走完三年过渡期，从全面完成建企迈向立企强企阶段，改革举措将加速落地。而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员工队伍稳定，保持企业和谐稳定良好局面，才能有效解决集团公司直属企业在同一区域管理交叉重叠问题，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树立市场经营理念，推进集团公司市场化战略落实落地。

关键词：国有企业；信访稳定；改制途径；加强对策

一、导言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经营与发展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信访稳定显得尤为重要。信访制度，指的是我国公民个人或者是群体采用书信、电子产品或走访等方式和我国负责相关信访工作的政府部门或机构进行接触，以此来对某些事情或情况进行反映，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想或者是意见，并要求政府部门解决问题，政府部门根据公民所反映的情况对问题进行及时关注或解决的一种制度[1]。这种信访制度在国企改革阶段也十分重要，在一家国企中，好的信访制度能够稳定员工的情绪，促进其提升工作效率，保证企业稳定高效发展。

二、信访稳定工作对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

高效推进信访维稳工作，是提升企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更是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保障行稳致远的基础支撑。对此，信访工作者需精准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精髓要义，并将其切实融入当前工作的具体实践。牢固树立服务理念与担当精神。要精通并善用相关法规政策与规章制度，通过多元路径优化流程，切实推动职工合理诉求与实际问题的高效、妥善解决，要严格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大局。

（一）为改革攻坚筑牢“稳定基石”

改革往往伴随着利益调整，如薪酬体系重构、岗位优化配置、业务板块整合等，容易引发职工对自身权益的担忧，滋生各类诉求与矛盾。信访稳定工作通过畅通诉求表达渠道，能够及时捕捉职工对改革政策的疑虑、对利益调整的反馈，第一时间介入并化解潜在冲突。这一过程不仅避免了矛盾积累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更能为改革政策的落地扫清障碍[2]。例如，通过梳理职工对“三项制度改革”的集中诉求，可推动政策细节优化，减少执行阻力，确保改革在稳定的环境中有序推进，避免因动荡导致改革中断或偏离预期目标。

（二）为治理升级提供“民意支点”

国企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而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对职工意愿的尊重与吸纳。信访稳定工作并非简单的“问题处理”，更是企业倾听基层声音、收集治理建议的重要窗口。职工身处生产经营一线，对流程漏洞、管理短板、廉政风险等问题的感知最为直接，其通过信访渠道提出的意见，往往能为企业完善内控制度、提升决策科学性提供鲜活素材。从这个角度看，信访稳定工作实质是将“职工智慧”转化为“治理动能”的桥梁，助力企业在改革中构建更贴合实际、更具生命力的治理体系。

（三）为队伍凝聚注入“情感纽带”

改革期的国企尤其需要职工队伍的向心力与战斗力。信访稳定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职工对企业的信任度与归属感：当职工的合理诉求（如职业发展通道、安全生产保障、福利待遇改善等）得到重视并妥善解决时，会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进而增强对改革的理解与支持；反之，若诉求被忽视或推诿，则可能加

剧离心力，削弱团队凝聚力[3]。

（四）为风险防控构建“预警防线”

国企改革期面临的风险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特点，既有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风险，也有利益调整引发的合规风险，甚至可能隐藏廉政风险。信访稳定工作通过对信访数据的汇总分析，能够敏锐捕捉风险苗头：例如，某类诉求的集中爆发（如“物资采购流程不透明”的重复反映）可能指向潜在的廉政漏洞；职工对“改革政策解读不清晰”的普遍困惑，则可能预示政策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通过对这些信号的及时研判，企业可提前启动风险防控机制，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风险演变为大危机，为改革的“行稳致远”筑牢安全屏障。

三、企业信访稳定体制改革措施

维系企业大局稳定是信访维稳工作的核心价值所在，更是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信息时代背景下，企业尤需将此项工作置于突出位置，畅通渠道，精准把握职工群众的诉求、意见与建议，并采取前置性措施，力争将潜在矛盾消弭于未发之际。

（一）构建有效的信访维稳组织机构

健全且权责明晰的信访维稳组织架构，是高效组织、协调、推进相关工作并确保制度落地的基石。针对既往存在的机构不完善、人手短缺等问题，企业应着力于两方面：一是优化组织设计与权责配置。提升信访维稳部门在企业管理体系中的指挥层级，由高层管理者直接分管，以强化其跨部门资源统筹调度能力。例如：协调信息收集、研判、上报、处置等环节的部门协作，从而提升整体机制效能。二是强化专业人才梯队建设。基于实际工作负荷与专业要求，科学配置专职人员，并优先选聘德才兼备的优秀员工充实信访队伍，保障队伍的活力与专业性。

（二）强化职工群众的信访维稳意识

部分职工对信访维稳之于国有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性认知不足，在诉求表达和矛盾处理中未能充分遵循制度框架，客观上增加了工作量，在整体层面上深化全员思想教育，特别是面向有诉求的职工进行精准化政策解读，促进其基于政策理解形成理性认知。工作层面上信访人员须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向职工阐释当前工作形势、挑战及其对企业发展的潜在影响，阐明稳定与发展的共生关系，从而引导职工树立依法、理性维权的观念。

（三）提升信访维稳工作者综合素质

打造高素质信访维稳队伍，离不开系统化、常态化的能力培养。国有企业应通过定期组织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政策把握能力与实务操作水平。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深化政治教育，引导员工深刻把握工作方向，筑牢责任担当意识。二是精进政策运用，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并精准执行相关政策法规，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三是聚焦岗位赋能，依据不同岗位需求，定制化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履职效能，保障工作质量与效率。四是注重新人培养，对新入职人员，应侧重思想引导、政策学习和业务入门，加速其角色转换与工作融入。

（四）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信息化浪潮下，国有企业信访部门亟须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大力开发线上信访端口，为职工便捷反映诉求提供便利，同步实现工作人员对信息的即时捕捉与响应，缩短处置周期。依托信息技术升级平台功能，覆盖信息从采集、归集、分析到反馈的全流程管理。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科学评估，支撑问题精准研判与高效化解，确保职工诉求得到及时回应。鉴于网络信息复杂性，企业必须将信访信息的系统性汇集、梳理、评估与解析置于重要地位，最大化释放信息技术在维稳工作中的潜能。

四、国有企业改革期间信访稳定的有效措施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是硬任务、是保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强化分析，增强研判、预警、应急处置能力，对公司改革不同时期员工的思想动态要持续关注，切实将公司利益与员工合法权益统一起来，针对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开展重点分析，对思想波动较大的员工及时进行谈话谈心、思想教育、问题化解，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信息动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把隐患处置在源头、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在改革的时代洪流中，唯有全体上下凝聚共识、团结奋进，始终维护稳定局面，我们才能敏锐捕捉机遇、有效攻克难关、从容应对挑战；也只有坚守稳定这一前提，才能妥善处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类问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内外部条件[4]。

（一）全面开展稳定风险评估

建立企业改革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超前做好员工队伍稳定工作，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要把保持稳定作为各项改革的底线，把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制定重大改革方案的必要环节，科学识别、评价、应对、控制改革中的稳定风险，确保在稳定风险可预、可控的前提下推进各项改革。改革重大事项实施前，要对改革的内外部环境、利益相关方、改革方案、员工安置方案等重点环节和重要因素进行稳定风险识别，具体包含以下因素：企业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社会舆论环境、企业所在地群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企业内部环境，包括企业经营情况、管理水平、员工观念以及对改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对改革的未来预期等因素。企业管理层，包括管理层行为的合规性、对改革的执行和认识程度等。改制重组、

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方案、厂办大集体等改革方案和决策实施程序的合规性和合理性。员工切身利益，员工安置、劳动关系调整、经济补偿金支付、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偿还拖欠员工债务、补缴欠缴社会保险费以及离退休人员管理、相关待遇落实等。员工民主权利，包括维护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企业改革重大事项听取工会和员工意见，以及员工安置方案由职代会或员工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等其他可能存在不稳定风险的事项。

（二）组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全员学习，引导员工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和集团公司、公司工作会议、党的建设工作会等会议精神；开展形势任务宣讲，围绕“五个讲清楚”推进中央精神和党委部署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全员大讨论，激发全体员工谱写新时代新征程管网事业壮丽篇章的昂扬斗志；开展岗位实践活动，用实干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局起步。公司各级领导、各部门、各单位利用上站检查、月度考核、慰问座谈等机会与员工进行沟通，引导全体干部员工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牢记任务、落实责任。

（三）强化培训技能提升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制定下发竞赛方案及实施细则，并进行定期督促、阶段性考核。通过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中心工作，切实提升员工队伍履职能力，全力推进重点工作任务攻坚，确保公司年度重点工作任务顺利推进；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内容包括生产运行、安全管理、合规管理等，切实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组织开展操作岗位员工培训及考核工作，每月一考核、每月一通报、每季度一兑现，将考核成绩与绩效挂钩，倒逼操作岗位员工业务技能水平提升。

（四）积极开展基层慰问座谈及走访调研

通过开展基层走访调研、座谈会、全员调查问卷、“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多渠道、多形式了解职工所思所想，广泛征集职工意见建议，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提升服务质量，架起沟通服务职工的“连心桥”；组织开展送清凉、送温暖、节日、生日、一线员工家庭慰问等各类慰问活动，针对困难职工实施精准帮扶、组织集体观影等人文关怀活动，切实提升职工的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努力成为职工信赖的坚实后盾。

（五）不断丰富员工文体活动及设施

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精彩有趣的内容、团结进取的过程，增进企业各类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企业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各场站建造羽毛球、篮球等运动场地，添置跳绳、握力器、乒乓球、棋牌等文体用品，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增强员工身体素质；定期调整食堂菜谱，丰富餐桌，使员工保持身心愉悦，缓解思乡之情，更好地投身工作岗位[5]。

（六）多角度宣传企业薪酬改革制度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培养人才、提升素质、健全人才成长通道，才能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只有坚持打好变革劳动组织与完善薪酬分配“组合拳”，坚持向组织优化要效能、向序列转化要活力、向用工变革要实效，打造资源共享、精干高效的组织形态，才能实现管控水平和劳动效率双提升，而薪酬改革一般是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要深刻认识到“群众利益无小事”，按要求履行相应民主程序，针对部分员工存在的疑问及时向员工进行解释沟通，讲清政策条款、讲清上级要求、讲清公司所做的努力，帮助员工消除心理困惑，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企业发展环境。

五、结语

总之，随着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持续增强，在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职工在自身合法权益需要维护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信访等方式表达诉求，这也成为近年来信访量上升的核心因素。在多数情况下，职工遇到问题会优先寻求与责任方的直接沟通与协商，信访等维权手段通常是沟通无果后的后续选择。这恰恰表明，职工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多涉及其核心权益诉求，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妥善处置。企业将新发展理念融入信访维稳工作，不仅能高效解决职工的合理关切与现实困境，使其安心投入本职工作；更能揭示企业在管理、运营等环节存在的短板，通过针对性改进促进更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形成。久而久之，职工对信访工作的信任度与支持度将提升，这无疑为信访维稳工作的良性循环注入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 潘伶燕 . 基于大模型的通信信访智能处理平台设计与应用 [J]. 通信与信息技术 , 2025(03): 109−113.

[2] 刘晓光 . 供电企业信访矛盾化解机制创新实践——基于三大领域八项举措的构建研究 [J]. 办公室业务 , 2025(10): 44−46.

[3] 马飞飞 . 强化信访源头治理维护国有企业和谐稳定 [J]. 中国煤炭工业 , 2025(04): 78−79.

[4] 武群 , 冯永涛 , 姚斯傢 .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评价指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J]. 上海企业 , 2025(04): 22−24.

[5] 张睿娟 . 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思考——以安徽省旅游集团信访工作为例 [J]. 七月风 , 2025(04): 14−18.

（作者单位：国家管网集团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

“大思政课”理念引领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与实证研究

曹晓莉

摘要：本文以“大思政课”理念为引领，聚焦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以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三线三链”“大思政课”模式为实证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依托“薪火线（红色文化）、知行线（理论实践融合）、教育线（全链条育人）”三条主线，联动“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三大载体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产业链上的思政课”等典型案例，揭示“课堂—基地—产业”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总结“理论嵌入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创新经验，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大思政课”；思政课实践教学；“三线三链”模式；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从“形式化”走向“实效化”、从“知识传递”转向“价值塑造”，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1]。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课堂轻现场”“重知识轻转化”等问题，难以有效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命题[2]。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明确“163N”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紧扣“大思政课”理念——以社会生活为教材、以实践育人为导向、以协同联动为机制，创新构建“三线三链”实践教学模式：通过“薪火线”传承红色基因、“知行线”推动知行合一、“教育线”贯通育人全程，联动“产业链（企业实践）、教育链（校内外资源协同）、创新链（技术赋能与模式突破）”三大载体，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该模式以“课堂—基地—产业”协同为路径，系统破解传统实践教学的场域封闭、资源分散与评价滞后的突出问题。本文基于本校近两年“产业链上的思政课”等系列实践探索，探究其如何通过“理论嵌入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创新机制，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共生”，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参考。

二、“大思政课”理念的内涵要求与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大思政课”理念的核心要义

“大思政课”突破了传统课堂的空间局限与内容边界，其本质是以“社会生活为教材、以实践育人为导向、以协同联动为机制”，将思政教育融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行业变革的现实场景中，引导学生从“理论认知”转向“价值认同”，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践行”[3]。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场域的开放性（课堂延伸至工厂、乡村、红色基地等现实场景）；二是内容的鲜活性（以产业发展、技术攻关、民生改善等真实案例为教学素材）；三是主体的协同性（学校、企业、社会多方共同参与育人过程）。

（二）传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实瓶颈

当前，多数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形式化倾向明显，多以参观纪念馆、观影讨论等“固定动作”为主，缺乏与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的深度关联，难以激发学生的参与主动性；其二，资源整合不足，校内思政课教师与企业导师、红色基地讲解员等主体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其三，评价单一滞后，侧重“是否参与”而非“是否内化”，难以衡量学生对“工匠精神”“实业报国”等价值观的真正认同与践行程度。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思政课“铸魂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4]。

三、“三线三链”模式的构建逻辑与实践框架

针对上述困境，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以“大思政课”理念为引领，创新提出“三线三链”实践教学模式，形成“主线贯穿、多链协同、全域育人”的特色路径。

（一）“三线”：明确实践教学的价值导向

1. 薪火线：红色文化的浸润线

依托桂林及广西丰富的红色资源（如湘江战役纪念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等），通过“现场教学＋情境体验＋故事讲述”等多元方式，引导学生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例如，组织学生赴全州湘江

战役遗址开展“重走长征路”实践活动，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聆听老战士后代讲述“三年不饮湘江水”的壮烈故事，将“理想信念”“牺牲奉献”等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5]。

2. 知行线：理论实践的融合线

推动思政课教师深度参与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同时在专业实践（如实验实训、企业实习）中精准嵌入思政元素。例如，在机电专业实训中，教师结合“精密零件加工”环节，讲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工匠精神，引导学生树立严谨细致的职业态度。在软件工程专业综合实训中，思政课教师与专业教师共备共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立法精神转化为“最小必要采集”可度量指标，现场组织“工程伦理微辩”，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双向奔赴。

3. 教育线：全链条的育人线

构建“入学启蒙—专业浸润—实习强化—毕业升华”的全程育人链条，实现思政教育与学生成长全过程同频共振。一年级通过“思政第一课”“新生入学教育”等活动厚植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二年级结合专业学习开展“技能与责任”主题研讨；三年级在企业实习阶段，通过“产业链上的思政课”引导职业规划与国家需求对接，最终在毕业设计中融入“服务社会、实业报国”的价值导向，实现思政教育的闭环育人。

（二）“三链”：搭建实践教学的资源载体

1. 产业链：企业现场的实践链

以产教融合基地、产业学院为依托，打破课堂边界，将思政课堂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实现“在实践中育人、在育人中实践”。例如，与三友联众集团（电气元件制造）、亿纬锂能（新能源电池）等企业共建“思政实践基地”，学生在参与模具调试、电池封装等实际工作时，由思政课教师现场讲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青年使命”“新能源产业与国家能源安全”等专题，将“严谨细致的操作规范”升华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解决技术难题”关联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国家战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职业价值、明确时代使命。

2. 教育链：校内外资源的协同链

整合“校内思政馆 + 科技馆（展示 3D 打印、智能制造等技术成果）+ 校外红色基地 + 企业导师”等多方资源，构建“校内 + 校外”“理论 + 实践”的立体化资源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机电工程学院、企业技术骨干共同设计“产业链思政课”教案，企业导师讲解“设备操作中的安全规范”，思政教师提炼“责任意识”“敬业精神”，科技馆提供“技术创新史”背景资料，形成“技术—伦理—历史”的立体化教学内容，实现多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协同育人。

3. 创新链：模式机制的突破链

通过“数字化赋能”“评价改革”“长效机制建设”三大举措，推动实践教学模式与机制的创新突破，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与可持续性。一方面，利用 VR 技术还原红色场景（如湘江战役数字展馆），开发“产业链思政微课”（如《3D 打印技术背后的工程师日记》）；另一方面，建立“实践积分 + 企业评价 + 教师反馈”的多元考核体系，重点考查学生的“价值认同度”（如是否主动参与技术攻关）、“职业责任感”（如是否遵守操作规程）、“社会贡献度”（如是否提出优化建议），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四、实证分析：“产业链上的思政课”的典型实践与成效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近两年依托“三链”载体，开展了十几场“产业链上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覆盖电子制造、新能源、3D 打印等行业），选取其中 3 个典型案例，具体呈现创新路径的实施效果。

案例 1：东莞企业的“工匠精神”启蒙

在三友联众集团和锦美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学生实地考察生产车间时，思政教师结合“精密模具加工误差不超过 0.01 毫米”“运动护具缝合线张力需保持恒定”等具体要求，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操作需要如此严格的标准？”通过企业技术骨干分享“十年磨一剑”的成长经历（如某工程师为攻克继电器触点氧化问题，连续 3 个月蹲守生产线），将“严谨专注”的职业要求升华为“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课后调研显示，92% 的学生表示“对‘工匠精神’有了更直观的理解”，85% 的学生主动在实习日志中记录“今日最触动我的细节”，实现了工匠精神从“被动聆听”到“主动感悟”的转化。

案例 2：佛山企业的“科技报国”使命

在唐途三维科技有限公司（3D 打印技术企业），教师以“国产 3D 打印设备如何替代进口、实现自主可控”为问题导向，结合学生参与的“汽车零部件快速成型”项目，讲解“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战略意义。企业负责人展示了一组关键数据：“过去高端 3D 打印设备依赖进口，单台成本超千万；如今国产设备价格下降 60%，但精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实习生在讨论中主动提出：“我们能不能优化算法，把打印速度再提高 10%？”这种“问题—反思—行动”的引导，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口号，而是每个岗位的具体责任，是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课后，多名学生主动申请加入企业“技术改进小组”，将“科技报国”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

案例 3：亿纬锂能的“新能源与国家战略”

在成都和惠州两地的亿纬锂能生产基地，教师分别以“中国制造升级”和“新能源产业布局”为主题开展现场教学。成都基地聚焦“动力电池如何支撑新能源汽车普及”，教师结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连续 8 年全球第一”的时代背景，引导学生计算：“如果每辆电动车电池能量密度提升 10%，全国每年可减少多少碳排放？”惠州基地则通过“储能电池研发车间”的现场观察，让学生明白“新能源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更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课后，机电专业学生提出“能否设计更轻量化的电池外壳？”部分学生关注“电解液环保性改进”，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国家能源战略、生态环保需求实现了“同频共振”。

上述实践表明，“三线三链”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痛点难点：其一，场域融合让思政教育从“抽象说教”变为“具象感知”（如通过操作一台设备理解“工匠精神”，通过分析一组数据、聆听一个故事感受“国家战略”）；其二，主体协同构建了“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的局面（企业反馈“学生职业素养、责任意识明显提升”，学生反馈“找到了专业学习的意义与方向”）；其三，价值内化实现深度转化——学生不再停留于被动接受理论，而是在企业真实场景中主动关联个人成长与国家需求，将“工匠精神”“科技报国”等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行动与人生追求。

五、经验总结与推广启示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三线三链”模式的实践，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实践教学的目标

必须紧扣“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核心目标，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职业发展、国家需求紧密结合，避免“为实践而实践”。例如，针对学生“重技能轻情怀”的特点，通过产业链上的真实案例，将“技能报国”“实业兴邦”等宏大叙事转化为“做好每一次检测”“优化每一道工序”“攻克每一个技术难题”的具体行动。

（二）强化“协同联动”，整合多元主体资源

“大思政课”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共享、协同联动。需打破“学校—企业”“课堂—社会”的壁垒，建立“思政课教师 + 专业教师 + 企业导师 + 红色讲解员”的复合型教学团队，开发“理论教案 + 实践手册 + 企业案例库”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让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课堂，而是延伸到社会各个场景。

（三）注重“数字赋能”，创新实践教学的形式

利用 VR/AR 技术还原红色场景（如湘江战役数字展馆），开发“产业链思政微课”（如《一位电池工程师的 365 天》），通过短视频、互动游戏、线上研学等形式，增强思政实践教学的趣味性、参与感与代入感；同时，建立“实践大数据平台”，跟踪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如参与企业项目的次数、提出的改进建议数量与质量），为精准评价、精准育人提供依据。

（四）完善“长效机制”，保障实践教学的可持续性

需从制度层面完善保障体系，确保实践教学常态化、长效化开展：一是明确企业参与思政教育的责任（如设立“思政实践导师”岗位、明确企业在实践教学中的职责分工）；二是将实践教学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时与学分，强化实践教学的刚性约束）；三是建立“政府—学校—企业”三方投入机制（如设立思政实践专项基金），确保“产业链上的思政课”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四是建立实践教学反馈优化机制，及时收集学生、企业、教师的反馈意见，持续优化实践教学模式。

六、结语

“大思政课”理念引领下的实践教学创新，本质上是让思政教育回归“生活”“实践”与“人本身”。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三线三链”模式的探索证明，通过“红色文化浸润、理论实践融合、全链条育人”的主线贯穿，联动“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的资源协同，能够有效摆脱传统实践教学的困境，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实”起来，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协同机制的不断完善，“大思政课”必将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梅春英，李晓军．构建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的路径研究 [J]. 北京教育（德育），2023(Z1): 76−81.

[2] 梁修杰．高校“大思政课”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究——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 [J]. 大学（思政教研），2024(33): 82−85.

[3] 刘颖．新时代应用型高校以实践教学为主题的“大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探索 [J]. 北京教育（高教），2024(23): 81−85.

[4] 邹开明．新时代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探赜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 41(03): 164−166.

[5] 张路，贾婧奕，宋明亮．大连理工大学“红色薪火路线”标识系统设计解析——基于视觉系统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J]. 设计，2022, 35(04): 146−14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校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2024SJZ03）；2024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红色铸魂、双创内化、链式贯通’：理工科院校思政课与创新创业教育双向融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下转 138 页）

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路径建构研究

谭　勇 魏卓理 胡　莉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经济统计学”作为财会类专业核心的方法论课程，其课程思政建设对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价值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有机融合、实事求是、专业特色、与时俱进四大原则，从家国情怀、辩证思维、创新精神、科学伦理四个维度系统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课堂—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路径：通过案例教学、项目驱动、专题研讨等方法融入思政内容；依托实验实训、第二课堂及行业专家讲座强化实践育人；构建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实现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为“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财会专业；教学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在大数据时代，财会领域的专业人才不但要拥有坚实的数据处理及分析能力，还要始终坚守职业道德与诚信原则，以此应对越发复杂的专业难题[1]。回顾传统教学模式，不难发现存在着“侧重于技能传授、忽视价值塑造”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技术越发展，数据造假及财务舞弊等不良现象就越严重，因而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伦理教育以及社会责任培养，逐渐减少并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2]。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手段，其核心目标在于将专业教育与价值引导有机结合，致力于培养出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职业精神的高素质财会人才[3]。“经济统计学”主要围绕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展开，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因而其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该学科强调的真实准确原则与财会行业秉持的诚信严谨的职业道德高度契合，这就使得“经济统计学”成为财会类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理想载体。基于此，通过教学改革，深入挖掘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强化经济统计学理论在专业实践中的应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穿于教学过程之中，进而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质量应用型财会人才。

一、“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的文献综述

当前，“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已从政策倡导逐步迈入全面实践探索的阶段，各高校依据自身专业设置特点，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实施路径。其现状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在思政元素的挖掘上，呈现出由零散向系统化发展的趋势。早期各院校的思政融入普遍较为分散，当前许多院校已突破此局限，构建起以特定主题（运用统计学讲好中国故事）为导向的多维思政体系。该体系深度融合家国情怀、职业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等要素，形成结构化的目标矩阵，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二是在教学模式上展现出创新融合的趋势。高校教学普遍采用案例教学（如乡村振兴、新冠疫情等实时案例）、项目式学习（PBL）及校企“双导师”制等方式，通过真实数据场景分析，贯通第一与第二课堂，强化价值引领的实践导向，以提升学生参与度与认同感[4]。三是思政课程评价体系已初步建立。部分研究以 CIPP 模型和 OBE 理念为基础，构建出融合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

（上接 137 页）（2024JGB471）；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三维联动·全域浸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学改革和实践”（2025JGB539）；2025 年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2025SJZ02）。

（作者单位：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涵盖资源建设、教学过程实施及学生思政素养提升等维度，旨在通过多维度量化评价，以科学衡量思政教学成效。

然而，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硬融入与“两张皮”现象尚未根除，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点衔接不够自然，导致教学效果流于表面化；二是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与创新意识不足，部分教师因缺乏深度思政理论理解及实践培训，难以有效深入挖掘和融入思政元素[5]；三是评价体系需进一步完善，现有考核偏重知识掌握，多元化、过程性评价机制尚未健全，难以全面反映学生思政素养提升[6]。总体而言，未来需要强化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提升教师育人能力，并优化评价设计，以推动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以“经济统计学”为载体，系统探索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路径设计，为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二、“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分析

（一）“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原则

1. 有机融合原则。“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强调有机融合，围绕数据获取、分析与统计建模等核心内容，自然嵌入诚信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导向，避免生硬植入。

2. 实事求是原则。在财会类“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中，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须立足客观实际，依托数据搜集、整理与分析等专业实践，系统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要素[7]。

3. 专业特色原则。经济统计学作为经济学与统计学的交叉学科，在课程思政融入方面，着重突出其应用导向，将思政元素贯穿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的每一个环节，强化严谨求真的职业操守，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4. 与时俱进原则。在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强调思政元素应当与财税法规及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保持动态一致。借助统计分组和综合指标等分析手段，把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数据处理的各个环节。

（二）基于多维视角的“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1. 家国情怀与宏观视野维度。在理论教学中，全面且深入地讲授 GDP、CPI、财政收入及研发投入等宏观经济指标，搭建起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实践教学中，融入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实际案例，如嘉兴制造业的转型成功推动了 GDP 与财政的协同增长，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我国制度优势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此外，通过开展国际的对比分析，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并拓宽他们的全球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发展格局，最终达成专业知识教育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 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维度。辩证思维聚焦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系统思维则强调整体性，因而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总量与结构、均值与变异、相关与因果等重要概念之间的辩证或矛盾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从而培养学生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将两种思维结合起来运用，可以使学生逐渐养成全面动态分析问题的习惯，从而使其在复杂情境中准确地识别出关键变量，解决关键问题，进一步促使其由单纯记账者向战略分析者转变。

3.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维度。创新性地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有效融合已成为“经济统计学”实践教学环节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一方面，引入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模型及集成人工智能与商业智能的可视化分析平台，进而模拟现实情景，使学生在异构财务数据处理和风险预警方面的实操能力得到系统性的提升。另一方面，结合现实案例分析和学科竞赛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学生在数据挖掘、算法构建和决策优化等方面的综合素养，逐步培养出具备战略视野的高层次财务人才。

4. 科学精神与职业道德维度。从经济统计学与会计学的交叉视角审视，科学精神与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始终秉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数据是决策的重要支撑，一旦数据出现失真，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像安然事件及瑞幸事件便是典型例证。对于“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应当借助案例教学的方式，着重强化学生对于“数据真实是统计效度的根本基础，职业道德缺失是数据造假根源”的认识[8]。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最终促使学生树立起“崇法唯实”的职业信仰，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会计类专业人才。

三、“经济统计学”融合思政元素的教学路径建构

（一）构建“课堂—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路径

在“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打造“课堂—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路线，整体设计如下：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深度融入思政要素，运用案例教学法，比如，引入 1978—2024 年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数据。同时采用情境教学法，模拟社会经济问题的方式来解读统计理论，以培养学生对数据的敬畏之心、职业道德素养及坚定“四个自信”。而在实践教学部分，引导学生围绕电商经济、乡村振兴等主题展开讨论，安排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集与分析数据，从而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科学精神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学生评价体系则运用过程考核方式，融合传统测试、数据可视化报告、情景剧和综合案例分析。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全方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能力提升状况及爱国情怀、诚信品质等价值内化的实际成果。这三个环节相互有机联动，构建起价值引导、能力塑造与综合评价的闭环育人架构。

（二）创新课堂教学路径

“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的推行，需要全面且系统地整合各类教学手段，达成思政要素潜移默化地融入的效果。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开展工作：一是深挖并搭建富含思政元素的案例库。通过精心挑选诸如精准扶贫实例，以及 GDP 总量与增长数据等素材进行深度剖析。学生对这些案例展开解读时，能够直观感受国家发展成果，从而培育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四个自信”。例如，通过分析精准扶贫数据，学生可以切实看到国家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二是运用项目驱动教学法。匠心打造类似“本地小微企业生存状况调研”的小组调研项目，使学生全程参与数据收集、整理以及分析的完整流程。这样不仅有助于培育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而且能够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感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三是积极组织专题研讨与辩论活动。围绕数据伦理困境、统计陷阱、GDP 核算的局限性等前沿议题，引导学生展开深入讨论，能有效锻炼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四是推行情景模拟教学。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拟企业财报分析会议、经济政策听证会等真实场景，让学生亲身体验财会实务流程，深入领会数据背后的政策逻辑与伦理内涵，进而增强专业认同感与职业使命感。

（三）拓展实践教学路径

对“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而言，应当将数据诚信作为核心内容贯穿其实践教学的始终。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对数据处理全流程进行强化训练，以及结合真实情境案例模拟，使学生在实操中深刻理解数据真实性对科学决策的重要影响，从而培养其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与职业伦理。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第二课堂，开展数据解读及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深入解析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所学专业知识，而且能够增强其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此外，可以邀请具有一线经验的行业专家参与课堂教学，结合亲身经历分享工作时所需具备的实践技能，以明确自己的职业选择。最终通过真实情境再现，促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能将职业道德内化为自觉行为，以提升其价值理性与专业认同。

（四）改革考核评价路径

对于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的评价，须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考查，具体来说，适当提升调研报告、课堂讨论等教学环节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并重点关注学生在数据伦理、职业操守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力，这样就能够全面、细致地捕捉学生在整个学习进程中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终结性评价主要聚焦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测评。在期末考试中，设计反映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案例分析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统计知识与方法去解决，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严谨科学的价值判断。这两种评价方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以评促学、以评促育”的闭环机制，以此推动学生在专业知识与思政素养方面实现协同发展。

四、结语

本文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教育使命，从家国情怀与宏观视野维度、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维度、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维度及科学精神与职业道德维度四个层面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以润物细无声般融入“经济统计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元素系统化整理与映射。进一步通过构建“课堂—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路径、创新课堂教学路径、拓展实践教学路径及改革考核评价路径来实现融合思政元素的教学路径的建构。这四个方面的举措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为数字经济时代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能力和职业道德的高素质财会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徐丽，张振华．大数据时代经济统计专业课程思政融合教学评价研究 [J]. 应用统计与数据科学，2025, 1(02): 96−102.

[2] 委芮．大数据背景下会计专业思政教育的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J]. 高等教育探索，2025(05):101−103.

[3] 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J]. 中国高等教育，2017(01): 43−46.

[4] 吕洁．高校 PBL 教学模式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J]. 教育研究，2024(04): 124−126.

[5] 王娜．高职院校财会专业“经济法基础”课程思政案例教学设计及实施——以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和税率为例 [J]. 财务管理研究，2025(05): 54−61.

[6] 张玉梅，刘丽红．农业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J]. 中国农业教育，2025, 26(03): 28−34.

[7] 石襄莹，刘远海，高慧妮，等．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 [J]. 体育科技，2025, 46(02): 162−163, 166.

[8] 邓崔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J]. 公关世界，2025(18): 168−17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及对策研究”（Hnjg2024−139）；2025 年海口经济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财会类专业经济统计学课程思政推进路径研究”（HJYJ2025023）。

（作者：谭勇，海口经济学院副教授；魏卓理、胡莉，海口经济学院讲师）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王鎏燚

摘要：“大思政课”拓展了思政课的育人场域，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手段，增强了思政课的鲜活度和生命力，提升了思政课的育人功效。从“深化理论认知、强化价值引领、赋能职业素养、整合育人资源”四个视角，分析“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意蕴；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维度，厘清“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实践教学生成逻辑；从“构建协同联动政策保障体系、打造产教社融合实践共同体、完善校本化实践教学体系、深化‘智慧+’虚实结合场域建设”四个维度，提出“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破解实践教学与专业培养、社会需求脱节的难题，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大思政课”；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为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以“大思政课”为抓手，驱动思政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2]。近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与提质培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备受关注。思政课作为铸魂育人的主渠道，实践教学的实效性直接影响到高职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及职业精神的培育和综合素养的提升。高职院校要主动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时代大课题紧密连接，推动政策、社会、学校、场域等多重主体的协同发力与深层互动，更好地书写“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教篇章。因此，研究“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价值意蕴

“大思政课”为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宏大框架与深层指引，是传统理论知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信仰转化的重要环节，具有课程育人和实践育人的双重功能，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意蕴。

（一）深化理论认知与信仰认同的“转化器”

“大思政课”强调把思政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转化器”。课堂理论讲授具有系统性和抽象性，而社会大课堂则提供了具体、生动、直观的诠释场景。当学生带着课堂所学理论，走进改革开放展馆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深入科技企业感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访新农村体会乡村振兴，他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理论的生命力，用眼睛观察思想的实践伟力。这种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现实的映射与验证，能极大地促进学生对理论的深度消化与理解，实现从“知识接收”到“理论信服”再到“信仰坚定”的层层递进。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在技术应用和社会服务实践中体会“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更能真切领悟个人技能发展与国家强国建设的内在统一，进而升华职业理想，坚定“技能报国、匠心筑梦”的理想信念。

（二）强化价值引领与人格塑造的“淬炼场”

价值观的培育不能仅靠说教，更需要在复杂情境中的判断、选择和坚守。“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将学生置于广阔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使其直面价值冲突，进行道德抉择，承担社会责任。在志愿服务中涵养奉献精神，在实习岗位上锤炼诚信品质与工匠精神，在社会调查中培养求真务实作风，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尊重与担当。这个过程充满了情感的体验、意志的磨砺和行为的规范，是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全方位“淬炼”的过程。尤其是在与行业模范、劳动能手、大国工匠的近距离接触中，其身上蕴含的职业精神、家国情怀与人格魅力，能产生强大的榜样示范和情感感召效应，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助力学生塑造健全人格、培育优良品德，成长为德技兼备的时代新人。

（三）赋能职业素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耦合域”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最佳“耦合域”。在高职语境下，实践教学也可以与专业实训、顶岗实习及创新创业项目等紧密结合。在专业实训中同步嵌入职业道德、安全生产。保密纪律教育；在顶岗实习中引导学生观察企业管理文化、思考产业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关系；在“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中融入国情社情教育，鼓励项目服务社会需求。这种融合使思政教育具体化为可感知的职业要求和发展导向，使职业素养的提升内含着正确的价值坐标。不仅培养了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同步提升了其沟通协作、解决问题、适应变革及社会责任担当等关键能力，为其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四）整合育人资源与构建育人共同体的“连接轴”

“大思政课”的本质要求是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用于育人。实践教学在此视域下，扮演着连接校内外的“连接轴”角色。它推动高职院校主动打开校门，与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社区乡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科技馆等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汇聚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育人资源池”。通过共建实践基地、共编实践教材，共聘企业劳模、技术专家、优秀校友为实践导师，共设实践项目，实践教学成为构建“校企社政”协同育人共同体的核心纽带。这不仅极大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时空维度和资源厚度，更推动社会各界更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形成“三全育人”格局，凝聚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强大合力，共同承担起培养时代新人的社会责任。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逻辑理路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生成与发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理论渊源，承继于特定的历史传统，回应于迫切的现实需要，体现了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这一基本观点构成了思政课实践教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以价值引领为核心的特殊实践教育活动，其过程必然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单纯的理论灌输难以完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目标，必须通过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参与、体验和践行中，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鲜活的经验感知，深刻的情感认同和自觉的行为习惯。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体化、操作化的关键设计，搭建起从理论认知到行为实践的桥梁，破解了传统思政课“重理论、轻实践”的难题，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实现育人目标的必备环节。同时，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关于体验式学习、情境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为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学理支撑，强调学习应在真实的或模拟的复杂情境中发生，通过主体参与实现意义建构。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重视实践育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工、学农、学军”，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开展的各类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和生产实习等，实践始终是锤炼青年思想品格、了解国情民情、服务社会人民的重要途径。思政课作为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阵地，其教学形式始终承载着这一历史传统。进入新时代，“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继承和系统性升华。它要求思政课实践教学，不能局限于校园内部的简单活动，而要更自觉、更深入、更广泛地“开门办学”，把广阔社会作为最丰富的教材，把时代主题作为最生动的课题，让实践育人传统在新时代高职教育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必须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找准定位，将党的实践育人思想与职业教育特点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实践养成之路。

（三）现实逻辑：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与时代新人培养目标的必然选择

从现实层面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强化具有双重紧迫性。一方面，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决定的。职业教育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其人才培养过程，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思政课若脱离这一特色，局限于传统课堂，就容易与专业教学、职业情境形成“两张皮”，导致育人效果脱节。只有将思政教育嵌入顶岗实习、企业文化体验等职业实践全过程，才能培养出既有精湛技能又有高尚职业道德、家国情怀的“工匠之师”。另一方面，这是应对新时代挑战、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需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社会思潮多元，高职学生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价值观念易受冲击。通过精心设计的实践教学，引导学生深入乡村振兴一线、红色文化基地，让他们亲眼见证国家发展成就，亲身感受时代脉搏，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从而真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是提升高职思政课实效性、针对性的关键突破口和必然选择。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推进策略

“大思政课”拓展了思政课的时空向度，赋予思

政课现实温度和实践品格。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久久为功，协同推进。

（一）构建协同联动的长效政策保障体系

一是推动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宣传、文旅、农业农村及工会成立区域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协同中心，负责统筹规划区域内实践资源，发布资源图谱，搭建信息平台，协调解决校地、校企合作中的政策障碍；二是健全经费保障与风险分担机制：明确将思政课实践教学经费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并探索建立生均实践教学专项拨款标准。鼓励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力量共同设立实践教学基金。推动完善校方责任险、实习责任险等，探索引入商业保险，构建多元风险分担模式，切实解除学校和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后顾之忧，为实践教学有序开展提供坚实保障[3]；三是出台职教特色实践教学指导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结合职业教育特点，研究制定《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指南》，对教学目标、内容设计、基地标准、师资要求、评价体系等提出规范性要求，并鼓励院校结合自身专业群特色制定实施细则，推动实践教学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二）打造产教社融合的实践育人共同体

一是激发企业参与动力，实现互利共赢：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荣誉表彰、优先招聘合作院校毕业生等政策，激励企业提供实践岗位和导师。学校应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将实践教学与企业员工培训、文化建设项目、社会责任报告相结合，使企业感受到人才培养的参与感和实际收益，变“负担”为“投资”[4]；二是提升社会资源教育转化效能，联合各类场馆、乡村等，共同开发系列化、主题化、模块化的实践教学项目包或课程资源。培训一批熟悉政策理论的社会讲解员、导学员。推动建立“流动的思政课”机制，邀请劳模、工匠、优秀基层干部等进校园、进课堂，形成“校园+社会”资源双向流动、双向赋能的实践育人格局；三是构建稳定多元的战略合作网络。学校应从战略层面，选择一批在行业、地域、文化上有代表性的单位，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共建共管实践基地，明确双方权责，共同设计实践项目，定期评估合作成效，打造一批示范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稳定可靠的资源支撑网络。

（三）完善校本化实践教学体系与激励机制

一是强化校级顶层设计与系统整合。学校党委应牵头，将“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三全育人”工作格局。成立由校领导负责，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学工部、团委、科研处、产教融合处及各二级学院共同参与的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资源，制定方案，协调行动；二是深化教学模式创新与专业融合。鼓励开发“思政+专业”特色实践项目。如制药工程技术类专业开展“大国工匠精神寻访”实践；商贸类专业开展“诚信营商环境调查”；农林类专业开展“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破解“两张皮”难题；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协同指导：实施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能力提升计划，定期选派教师赴企业、基层挂职锻炼。聘请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优秀校友等担任特聘实践导师。建立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辅导员共同指导实践项目的“双导师”或“多导师”团队，明确分工，协同育人[5]。

（四）深化“智慧+”虚实结合的实践场域建设

一是推动实践基地从“挂牌”到“建实”：对现有基地进行动态评估与分级管理，淘汰“僵尸基地”，重点建设一批示范基地。与合作单位共同制定年度实践计划，开发专属实践课程，安排固定联络人员，定期开展交流研讨，确保基地“活”起来、“实”起来；二是优化基地结构，拓展新兴领域。在巩固现有基地基础上，重点拓展与国家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实践场域，如芯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企业，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示范社区、乡村振兴示范村等，使实践教学更加贴近时代脉搏、职业前沿，契合学生发展需求；三是大力建设智慧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投入资源开发或引进一批高质量的思政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重走长征路VR体验、改革开放成就数字展馆、重大工程云端参观、网络思潮辨析互动平台等。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学习轨迹与思想动态，实现线上线下实践教学的互补与融合，构建“无处不在、永不下线”的实践教学新场域，提升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N]. 人民日报, 2024-05-12(01).

[2]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 (2022-07-25)[2026-01-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4/content_5706623.htm.

[3] 郑金鹏, 赵景欣. 职业教育“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的内涵解析、现实痛点与实践策略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05): 105-112.

[4] 陶慧, 王华锋.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J]. 职教论坛, 2022, 38(09): 48-54.

[5] 张素, 冯萍, 缪炀. 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建设路径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08): 32-3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宁波高等教育学会2025年度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高校法学思政课程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高教学〔2025〕2号）。

（作者单位：浙江药科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职“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以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为例

姜晓静

摘要：本研究探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职“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选取本校护理专业2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一个班的学生（试验组）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另一个班的学生（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对比分析2个班的学生学习效果。试验组学生在各项指标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学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在中职外科护理教学中具有推广应用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职外科护理；混合式教学；教学效果

“外科护理”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涉及内容广泛，知识点较为抽象且难以理解，学生学习难度较大[1]。然而中职护理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薄弱，理解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差，学习缺乏积极性，且较少有机会接触临床，导致其在学习外科护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很难理解频繁出现的外科护理专业名词和经常涉及的临床护理情景，严重影响学习效率和效果[2]。在“外科护理”课程教学中，教师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的讲授法，学生单纯地“填鸭式”被动学习，很难真正做到消化吸收[3]。因此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合理的教学设计对提高中职“外科护理”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在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典型特征是数字化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教学质量[4]。为进一步优化中职“外科护理”教学效果，本文以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教学为例，深入探究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实践路径，通过剖析教学实施过程、量化评估教学应用成效、总结实践经验，为中职“外科护理”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与策略。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取本校中职护理专业2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每班46人。对照组学生，年龄16~17岁，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实验组学生，年龄16~17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两组学生之间的基础资料差异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1.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即通过教师课堂讲解、示范，学生听讲、练习的方式进行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的学习。

2. 实验组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方法如下。

（1）教学准备

建设线上课程。①录制微视频：教师针对胃肠疾病患者护理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如肠梗阻的护理评估要点、急性阑尾炎的手术前后护理措施等，录制时长为5~10分钟的微视频。视频中穿插临床实际案例、动画演示等，增强内容的直观性和吸引力。②制作PPT课件：将胃肠疾病患者护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制作成PPT课件，方便学生预习和复习。③创建在线测试题库：包括单选题、多选题、案例分析题等；学生可以在学习完线上内容后进行自我测试，及时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测试情况，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准备线下教学。以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外科护理》为指导，编写具有真实临床情境的胃肠疾病案例，包括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检查结果、治疗过程及护理记录等，用于线下课堂的案例讨论和分析，同时，准备实训室和实操用具，确保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护理技能。

（2）教学实施

线上自主学习，教师提前将配套的线上教学资源

上传至教学平台并明确学习任务。学生需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微视频观看、在线课件研读，并独立完成基础在线测试，以此检验自学效果。学习过程中，学生可在平台讨论区发布个人的疑问和见解，与教师、同学进行互动探讨。教师可通过平台数据，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任务完成情况，同时，对学生的在线测试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定位学生知识掌握的薄弱点和理解困惑处，如学生对如何判断绞窄性肠梗阻、如何评估急性阑尾炎患者的身体状况等知识点在测试中错误率较高，这些反馈信息为线下课堂的精准授课及重难点突破提供了数据支撑。

线下课堂教学，课堂开始时，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学生对线上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和答疑，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接下来，给出一个胃肠疾病的病例。例如，肠梗阻，引导学生思考该患者为什么会得肠梗阻，得了肠梗阻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又该如何实施护理措施？结合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发表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讨论结束，各组派代表汇报讨论结果，教师对讨论中的亮点和不足进行点评，然后一起梳理知识点，如在讨论肠梗阻的临床表现时，学生会发现患者有腹痛、恶心呕吐、腹胀、不能排气排便，为加深记忆，引导学生总结出“痛、吐、胀、闭”的口诀，使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利用线上平台进行随机选人、话题讨论、随堂测试，加强师生互动，带动课堂气氛，同时，检验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肠梗阻的患者，胃肠减压的护理是教学重难点，如何突破呢？首先随机抽取一名学生上台进行展示，教师点评并指出问题，然后进行示范操作，同时，讲解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并在示范过程中进行同步传屏，将胃管刻度、咽喉部通过技巧等细节实时展示在大屏幕上，便于学生掌握操作细节。演示完毕，学生分组进行实践操作练习并录制自己的操作视频，便于课后查漏补缺。教师巡视指导，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操作，如无菌观念不强、动作生硬、缺乏人文关怀等，操作练习结束后进行情景模拟展示，通过多方评价的方式进一步总结操作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为今后在临床实践中准确、规范地进行护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课后拓展，教师推送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相关文献等作为课后拓展资源，引导学生自主扩充知识储备。同时布置“制作胃肠疾病的科普宣讲视频”为拓展作业，促使学生在创作中通过“以讲代学”反向巩固所学知识。

（三）评价

1. 理论知识考核：在课程结束后，采用相同的试卷对试验组（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生进行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相关理论知识考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 技能考核：安排学生在模拟病房进行实践操作考核，由专业教师根据预先制定的操作评分标准进行打分，满分为 100 分。

3. 问卷调查：自行设计问卷，在课程结束后，了解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情况。分别从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团队协作、促进自主学习、提高临床思维方面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为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同意率 =（非常同意人数 + 同意人数）/ 总人数 ×100%。采取不记名方式填写问卷。共发放 92 份调查问卷，共收回 92 份，问卷回收率 100%。

（四）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进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bar{x} \pm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对比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理论考试成绩和技能考核成绩，结果显示：实验组的两项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bar{x} \pm s$）

	实验组（分）	对照组（分）	t	P
理论成绩	90.48 ± 3.06	88.70 ± 3.37	2.658	0.009
技能成绩	87.48 ± 4.56	83.17 ± 4.48	4.565	0.000

两组学生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具有明显效果，与对照组学生的问卷调查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评价项目	实验组 同意人数 同意率	对照组 同意人数 同意率	χ^2 值	P 值
激发学习兴趣	39 （84.8%）	28 （60.9%）	6.646	0.010
促进自主学习	36 （78.3%）	26 （56.5%）	4.946	0.026
提高临床思维	38 （82.6%）	25 （54.3%）	8.510	0.004
增强团队协作	37 （80.4%）	26 （56.5%）	6.093	0.014

三、讨论

“外科护理”作为中职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学生的动手能力与临床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多通过死记硬背和习题练习的方式巩固知识点，导致学生在面对胃肠减压、肠梗阻病情判断等具体临床情境时，常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无法灵活应对的困境。本研究数据显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优于传统教学，在中职外科护理

教学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与推广价值。

（一）有助于提升学业成效

本研究中，实验组学生在理论知识考试和实践操作技能考核中的成绩均优于对照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搭建了多维度的学习渠道，配套了针对性的护理教学资料，如胃肠减压的操作视频、肠梗阻的配图课件等。学生通过反复观看、研读线上教学视频和课件等资源，能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此外，在线测试的及时反馈机制，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检验，精准定位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而在课堂上更有针对性地听讲和参与讨论，有效提升学习效率。在课堂实施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习的引导者，通过设置小组讨论、临床护理案例分析、随堂小测试、护理情景模拟等教学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如症状记忆无头绪、护患沟通能力不足、操作流程生硬等，教师进行针对性梳理、讲解与实操指导，助力学生高效突破学习难点。课后学生可结合线上资源对实操内容反复观摩，完成复盘总结。学生沿着“初步了解知识—理解掌握理论—练习实际操作—巩固拓展提升”的路径开展学习，不仅夯实了理论功底，还提高了学生应对临床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

（二）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从数据来看，实验组教学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整合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设计多样的互动环节，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团队协作的培养上，教师通过课前发布学习任务，例如，“调研身边人对肠梗阻的认知情况”驱动小组合作，课堂上通过胃肠疾病的案例讨论与情景模拟使学生在明确分工、积极沟通、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知识的内化，更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强化了协作意识。部分中职学生存在基础薄弱、学习主动性不足的问题[5]，该模式能有效改善学生的自主学习效能[6]。学生要完成课前任务，如制作胃肠减压操作的流程图，必须反复翻书、查资料进行自主探究，这种任务驱动迫使他们从“听众”转变为“探究者”。线下课堂也不再是老师一个人的“满堂灌”，而是变成了师生、生生之间的思维碰撞，让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这种模式在锻炼临床思维上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学生在线上完成基础理论的初步学习，线下教学重心转向病例分析与实操演练。以肠梗阻病例为例，学生必须代入临床角色，不再是死记硬背症状，而是从错综复杂的腹痛、呕吐等临床表现和检查报告中耐心梳理，在反复论证中制定护理措施。这种从理论知识输入到临床护理决策输出的转化，为学生胜任临床岗位奠定了职业基石。因此，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从多维度提升教学效果，是优化中职“外科护理”教学的有效路径。

（三）挑战与反思

尽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职“外科护理”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教师会出现工作量焦虑问题，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变成了学习引导者，教师须具备更加专业的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能力，能够灵活运用各类信息化教学工具，并不断提升课堂组织与引导水平[7]，这使教师不仅要会讲课还要像短视频博主一样会录制微视频课、在海量教学资源中精挑细选等，这些大量的课前投入会让不少老师望而却步。其次，线上学习阶段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中职学生习惯了被动听讲，一旦脱离了老师的视线，线上学习极易流于形式，有的学生挂机刷课，有的则在讨论区复制粘贴。这种人在心不在的现象，会导致线下实操环节因理论储备不足而卡壳。因此需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设计更具吸引力的学习任务，利用教学平台数据加强对学生的学习引导和管理，不断优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四、结语

在胃肠疾病患者的护理教学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展现出显著优势，能有效提升“外科护理”的学习成绩和教学效果，但对老师也提出了新挑战，需不断提升数字化素养才能设计出真正吸引学生的课程。

参考文献

[1] 徐婷，王叙德，占婷婷．“互联网 +”背景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中应用效果评价 [J]. 长治医学院学报，2023, 37(02): 142−146.

[2] 周维春．中职外科护理学教学改革途径探索 [J]. 现代职业教育，2019(29): 108−109.

[3] 李奕欣．基于五星教学法的中职外科护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初探——以“急性乳房炎病人的护理”为例 [J].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2023(06): 77−80.

[4] 刘春玲，马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 [J]. 科技与创新，2022(16): 4−6, 9.

[5] 郭桂华．以学生为主的中职外科护理教学探究——以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教学设计为例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1(01): 110−113.

[6] 李军，朱瑞晶．浅议利用线上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J].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4, 38(03): 68−71.

[7] 刘婷．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中职《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探讨——以“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为例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21, 17(23): 221−223.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沉浸式体验视角下“MDT 联合 SST”教学法在“老年常用照护技术”课程中的行动逻辑与优化策略

陈午艳

摘要：随着老龄化社会对复合型养老护理人才需求的增长，传统教学模式面临挑战。为此，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将多学科协作（MDT）与情景模拟教学（SST）深度融合。改革以“课证融合”为导向，先整合学科知识，然后进入高仿真场景沉浸学习，在体验中产生情感共鸣，再复盘反思，最后用行业标准衡量成果。实施对照教学后的数据显示：采用新模式的班级在理论、技能，尤其在案例分析与沟通能力考核中成绩显著（P<0.01），其人文关怀意愿与团队协作表现也更为突出。实践同时暴露出师资跨学科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将系统阐述该模式的设计、实施、数据验证、现实困境及后续优化方案。

关键词：多学科协作；情景模拟；老年照护；行动逻辑；优化策略

一、引言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1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每一位老人背后，都是具体的疾病、细微的情绪和个性化的需求。“老年常用照护技术”的授课教师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课堂上，教师仍在分解着“鼻饲流程”“压疮护理”；试卷上，学生还能默写出“跌倒处理原则”。可一到实习点，反馈常常是：“学到的知识是散的，碰到真老人，手忙脚乱，处理综合性问题的能力较弱。”

问题出在哪儿？究其原因，在于教学模式过于单一。把完整的照护过程拆解成一个个标准操作，分章节讲授，虽便于教学管理，却恰恰丢失了老年照护最核心的特质：综合性与情境性。所以，将多学科协作（MDT）的理念引入课堂，让学生和教师去面对知识的真实样貌——它本来就是交织的[1]。同时，融入情景模拟（SST），为学生创设仿真工作情景，使其在手足无措、沟通卡壳、决策两难中自己去学[2]。

二、教学案例设计与实施：一场从“演”到“真”的渐进体验

（一）案例设计：基于能力进阶的梯度化情境

第一关：单一疾病情境。选取“糖尿病老人居家血糖管理”案例，场景设在模拟家庭的客厅。学生分别扮演有怨言“嫌麻烦”的“老人”、焦急却缺乏专业知识的“女儿”、严谨的护士以及给出饮食建议的营养师等角色。任务明确：测血糖、打胰岛素、做健康教育。但数据设置为动态，教师后台调高一次血糖值，观察“养老护理员”是否警觉、“家属”是否恐慌、团队是否会重新讨论方案。此关卡的目标并非熟练操作，而是让学生第一次体会到，即便只是管理血糖，也需要运用护理、营养、沟通的知识，甚至要理解老人的心理。

第二关：多病共存情境。难度提升。案例为“一位脑卒中后，还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 72 岁偏瘫老人，在社区康复中心”。学生必须以真正的 MDT 团队入场，其中包括负责评估的护士、制定康复计划的治疗师、监控用药的药师（由学生兼任）。案例中设置“隐藏剧情”：在康复训练时，“老人”突然因沮丧而哭泣[3]。事先无任何脚本，旨在考察哪个角色会最先发现其情绪异常，团队如何临时调整计划，是暂停训练还是先进行心理疏导。这一关，要求学生在有限时间里，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像拼图一样连接起来，去解决一个动态发展的问题[4]。

第三关：应急事件情境。这是最高压力测试。“养老机构走廊，一位老人突然跌倒。”规则严格：0~5 分钟，评估、呼救；5~15 分钟，初步处理、通知家属和医生；15~30 分钟，沟通转运、完成记录。不仅要观察操作是否规范，更要审视团队分工在高压下是否混乱，沟通是否清晰，记录在忙乱中是否仍能保持准确。这一关没有“标准答案”，重在检验应急流程的

熟练程度和团队信任的默契水平。

（二）教学实施：一个不断递进的四轮循环

第一轮：课前“埋线”（提前 1 周）。教师不再提供标准预习提纲，而是给学生一个“情报包”：一段病史视频、几份检查报告。告诉学生：“这是一位真实的老人（虚拟），下周你们团队接管。现在，请开始搜集情报，制定你们的护理计划。” 学生自主查阅文献，争论护理重点。教师则需要了解该案例涉及的护理、康复、心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各学科的衔接、碰撞等，做好备课准备。

第二轮：课堂“实战”（4 学时）。这 4 学时高度浓缩。第 1~3 学时进行高仿真模拟。学生穿上使关节不灵活的“老年体验装”，戴上模糊视野的眼镜，真实开展护理、沟通，教师随机引入突发状况。第 4 学时复盘，但复盘并非由教师总结，而是小组互相点评：你为什么当时那样决策？我的沟通是否过于生硬？教师只在一旁点拨，引导学生通过辩论深化理解。

第三轮：课后“沉淀”。学生必须根据课堂反馈修改照护计划，将其从一份作业变化为真正可用的方案，同时还要制作一份给家属的健康教育材料。最后提交一篇 800 字的反思日志，重点反思今天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哪个瞬间让自己真正理解了老人。

第四轮：考核“验收”。考核方式本身就在传递价值观。60% 看过程：教师在模拟中观察学生的操作、沟通、应变、团队合作等表现，以及小组那份充满修改痕迹的案例分析报告。40% 看结果：设置改良的 OSCE 考试，包括“评估站”“沟通站”“计划站”等，模拟真实工作场景的流转；再加一份理论试卷，以综合分析案例题为主。

三、实证效果

（一）学业成绩：学业表现提升显著

本研究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2024 级护理专业（养老定向班）60 名学生为对象，随机分为两组，一组采用新教学模式（实验组），一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组）。一个学期后，成绩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成绩对比

考核项目	实验组（平均分）	对照组（平均分）	提升幅度	P 值
理论考试	86.3 ± 5.2	78.1 ± 6.7	10.5%	<0.01
技能操作	88.7 ± 4.1	76.4 ± 5.9	16.1%	<0.001
案例分析	85.9 ± 4.8	72.3 ± 6.2	18.8%	<0.001
沟通能力	87.2 ± 3.9	70.8 ± 5.5	23.2%	<0.001

传统教学也能提升理论和操作分，但新教学模式在“案例分析”和“沟通能力”两项上优势更为显著（分别提升近 18.8% 和 23.2%）。这说明，学生不仅强化了记忆与操作能力，更在综合思维与沟通表达层面获得了实质性提升，而这恰恰是老年综合照护最需要的核心素养。

（二）能力成长：多维度全面发展

课程结束后的人文关怀能力测评结果如表2所示。实验组学生在量表的三个维度——“认识”（理解老人独特需求）、“勇气”（主动实施关怀）和“耐心”（持续照护的韧劲）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这一量化结果与课堂观察一致：实验组学生在模拟中表现出更多主动倾听、情感回应和非语言安慰行为，显示出更强的共情意愿和关怀内驱力[5]。

表 2 两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测评得分比较（分，$\bar{x} \pm s$）

维度	实验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认识维度	76.11 ± 4.21	72.83 ± 4.27	3.12	<0.01
勇气维度	74.09 ± 5.92	69.94 ± 5.51	2.89	<0.01
耐心维度	41.20 ± 2.42	38.96 ± 2.92	3.34	<0.01

在情景模拟课中，对小组协作过程的系统观察评分如表 3 所示。实验组学生在所有四项关键协作行为指标上的平均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其中，“决策参与度”的差异最为显著（4.7 分 vs 3.1 分）。这说明，在新教学模式下，学生更倾向于积极参与团队讨论、贡献意见并共同承担责任，协作模式从被动的“听从安排”转向主动的“共建方案”[6]。

表 3 两组学生团队协作过程观察评分比较（平均分）

观察指标	实验组（n=6 组）	对照组（n=6 组）
任务分工合理性	4.5	3.2
信息共享及时性	4.3	3.0
冲突解决有效性	4.1	2.8
决策参与度	4.7	3.1

注：评分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1= 非常差，5= 非常好）。

四、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一）师资之困：从“单科”到“跨学科”融合

理想中的 MDT 教学，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综合能力。现实是，65% 的教师坦言对非本专业领域的教学内容缺乏信心，仅有 30% 的教师具备初步的协作教学经验。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双师（多师）结对”，规定养老护理教师必须和康复、营养或心理教师共同备课，相互学习，协同开发综合案例。二是“打开校门”，邀请养老机构资深护理员、康复师担任兼职教师，用真实案例和一线工作经验丰富课堂教学；同时，安排年轻教师到养老机构实践至少一个月，积累企业工作经验。

（二）资源之困：从“分散”到“整合”

起步阶段，各学科教学资源呈信息孤岛状态，重复建设现象突出，学生使用不便。实训设备也老旧，

跟现在智慧养老的需求脱节。为此，规划筹建“老年智慧照护虚拟仿真中心”。该中心并非简单引入几台高端设备，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一体化的沉浸式教学平台。平台整合 VR/AR 技术，让学生能够“进入”虚拟的家庭、社区或机构场景进行照护实践；通过接入智能穿戴设备模拟数据，实时呈现老年人生理参数变化；并计划引入视频 AI 行为分析系统，对学生的操作流程、沟通姿态、团队配合等进行自动记录与智能评估，让学生的每个操作、每次沟通都能被记录、分析、反馈。同时，系统整理案例，形成分层次“资源包”：包括单项操作的“基础包”、应对失智等复杂情况的“综合包”以及专门应对跌倒、噎食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包”。最终目标是彻底改变资源零散、脱离实情的现状，打造贴近真实、层次分明、即取即用的“教学工具箱”，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照护能力提供坚实支撑。

（三）学生之困：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

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连基础操作尚不熟，而部分学生已具备较强学习能力。统一教学模式下，易出现“吃不饱”或“跟不上”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生在情景模拟中非常“出戏”，他们很难投入情感[7]。我们的对策是“区别对待”和“情感助攻”。根据入学评估将学生分为 A（基础薄弱）、B（中等）、C（能力较强）三个层次，给 A 层“开小灶”补基础，给 C 层“加餐”挑战案例设计，分组时采用混编方式，以先进带后进。同时，开设“共情训练工作坊”，让学生通过佩戴特制眼镜、负重背心等方式亲身体验衰老带来的不便，倾听老人的生命故事。此外，还准备了“角色准备工具包”，里面有详细的人物背景卡和沟通话术提示，帮那些“戏感”差的学生找到入口[8]。

（四）评价之困：从“注重结果”到“多元评价”

传统评价注重操作是否规范，但老年照护仅有规范远远不够。过程评价又过于依赖教师的主观判断，不同教师打分尺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尝试构建一个更为立体的评价体系尤为必要。首先，调整评价权重：理论（20%）、技能（30%）、综合能力（30%）、职业素养（20%）。后两者主要通过观察学生在模拟中的团队协作、沟通和人文关怀表现进行评判。其次，引入信息技术辅助评价，如用视频 AI 系统客观分析学生的操作流线和非语言沟通（如是否保持眼神交流）。最后，增加评价主体多元化：校内教师（40%）、同学互评（20%）、养老机构导师（30%）、学生自己（10%）。

五、结论与展望

本次 MDT 联合 SST 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展现了传统课堂难以触及的育人成效：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共情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均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本项研究亦存在局限性——仅在一所学校、一个年级里开展试点，学生毕业后的长期职业发展尚未追踪，而规划中的“智慧教学”平台也还处于蓝图阶段。

这并非研究的终点，而是持续深化的起点。后续将在以下方面持续推进：一是深化“课证融合”，实现学校教学内容与职业证书标准、岗位能力要求的精准对接；二是建设支持个性化、沉浸式学习的“智慧教学”平台；三是着眼长远，探索构建支撑养老护理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终身学习”体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致力于形成本土化的教学方案。唯有持续推进教学改革，方能培养出“懂技术、有温度、善协作”的高素质养老护理人才，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易汉杰，王侠，熊乐，等．多学科协作线上教学联合 PBL 法在泌尿系统肿瘤临床教学中应用 [J]. 延边大学医学学报，2025, 48(12): 135−137.

[2] 卢玉婷，李晶，李春花，等．“案例驱动 + 情景模拟”在生猪病理教学中提升兽医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的策略 [J]. 猪业科学，2025, 42(11): 46−47.

[3] 刘颖，吴吟晨，林晨琳，等．新医科背景下多学科协作情景模拟教学在医学影像专业实习带教的应用 [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5(04): 67−71.

[4] 邹方贞．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小儿骨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J]. 四川健康导刊，2024, 3(10): 176−179.

[5] 李孟斐．吞咽障碍课程教学中多学科协作应用的探索 [J]. 科教导刊，2024(20): 116−118.

[6] 袁葵，陈燕．基于“课赛融合”的老年护理情景模拟综合技能实训课程改革与实践 [J]. 卫生职业教育，2022, 40(14): 51−54.

[7] 张慧丽，李晓迪，张莉．体验式教学法在老年护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 科教导刊，2025(29): 58−60.

[8] 胡庆磊．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耳鼻喉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J]. 延边大学医学学报，2025, 48(11): 133−1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省级课题“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MDT 联合 SST 教学法在《老年常用照护技术》课程中的实践与研究”（JXJG−24−84−14）。

（作者单位：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正念训练融入高中心理课堂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朱馨忆

摘要：本文针对高中生因学业、社交等压力导致的情绪问题，结合教育部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探究正念训练融入高中心理课堂的实践路径及其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研究构建了“系统课程设计—教师专业引导—家校环境支持”的实施框架：课程分基础、进阶、深化三阶段，结合多样化教学方法与跨学科融入，通过教师培训与个性化指导保障实施效果，并联动家校营造训练氛围。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运用 ERQ-A 和 SCL-90 量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认知重评能力显著提升，情绪表达抑制降低，焦虑、抑郁等症状得到改善。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有效提升高中生情绪调节能力，为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正念训练；高中心理课堂；情绪调节能力

一、引言

在当下教育环境中，高中生面临着学业、社交、未来规划等多方面的压力，情绪问题日益凸显。教育部也持续强调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而情绪调节能力作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对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正念训练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调节方法，逐渐受到教育领域的关注。将其融入高中心理课堂，有望为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开辟新路径。

二、正念训练与高中生情绪调节能力概述

（一）正念训练的内涵与特点

1. 内涵：正念训练源于古老的东方禅修，如今已发展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心理干预方法。其核心在于有目的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对此时此刻所觉察到的体验不加评判。在高中心理课堂中，正念训练可帮助学生将注意力从对过去的纠结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拉回到当下，从而更好地感受和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例如，在正念呼吸练习中，学生需专注于自己的一呼一吸，感受气息在鼻腔、肺部的流动，当思绪飘走时，温和地将其拉回呼吸上[1]。这种练习看似简单，却能有效锻炼学生的注意力和觉察力。

2. 特点：正念训练具有简单易行、随时随地可开展的特点。它不需要复杂的设备或特定的场地，无论是在课堂上、课间休息，还是学生在家中，都能进行。同时，正念训练强调非评判性，鼓励学生接纳自己当下的所有感受，不做好坏、对错的评价。这种接纳的态度有助于学生减轻自我苛责，更好地与自己的情绪相处。

（二）高中生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性

1. 学业方面：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让学生在面对繁重的课业和考试压力时，保持冷静和专注。比如，当学生在考试中遇到难题感到紧张焦虑时，若能运用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如深呼吸、积极的自我暗示等，就能迅速调整状态，集中精力解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考试成绩[2]。相关研究表明，情绪稳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容易保持专注，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也更为高效。

2. 社交方面：高中生正处于社交发展的关键时期，具备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3]。在与同学发生矛盾冲突时，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冷静地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冲动行事，导致关系恶化。在集体活动中，也能更好地融入团队，发挥自己的优势。

3. 身心健康方面：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且无法有效调节，会对高中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4]。焦虑、抑郁等情绪可能引发失眠、头痛等身体症状，还会影响免疫系统功能。而善于调节情绪的学生，心理更健康，更能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身体也更具活力。

三、正念训练融入高中心理课堂的实践策略

（一）课程设计与实施

1. 制定系统课程：依据高中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设计一套系统的正念训练课程。课程可分为基础、进

阶和深化三个阶段。基础阶段，主要教授正念的基本概念和简单的练习方法，如正念呼吸、正念身体扫描等，让学生初步体验正念，培养对当下的觉察能力。进阶阶段，引入更复杂的练习，如正念冥想、正念行走等，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并引导学生将正念应用于日常生活情境中，如在学习、社交时如何运用正念保持平静的心态。深化阶段，则侧重于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自己的情绪，通过正念练习学会接纳和转化负面情绪，提升情绪调节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具体实施中，可每周安排一节专门的心理课进行正念训练，每节课设置明确的主题和目标，从理论讲解到实践练习，再到分享交流，逐步引导学生掌握正念技巧。

2. 多样化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除了传统的讲解和示范，还可运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5]。比如，在讲解如何运用正念应对考试焦虑时，先呈现一些学生考试焦虑的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案例中的学生如何运用正念方法缓解焦虑，然后每组选派代表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在考场上运用正念技巧调整情绪的过程。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正念训练的要点，同时增强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

3. 融入日常教学：将正念训练巧妙地融入其他学科的日常教学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正念练习[6]。例如，在语文课堂上，让学生在阅读优美的文章时，运用正念的方法，专注于文字所传达的情感和意境，感受作者的思想；在数学课堂上，当学生遇到难题需要思考时，引导他们先进行几次正念呼吸，放松身心，集中注意力，再去分析问题。这样，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使正念训练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二）教师培训与引导

1.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教师作为正念训练的实施者，其专业素养至关重要。学校应组织教师参加专业的正念培训课程，让教师深入了解正念训练的理论基础、实践方法和教学技巧。培训内容包括正念的历史渊源、神经科学原理、各种正念练习的指导技巧，以及如何将正念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等。通过培训，使教师自身能够熟练掌握正念练习，并且具备在课堂上有效引导学生进行正念训练的能力。例如，邀请正念领域的专家来校开展讲座和工作坊，组织教师参加线上或线下的专业培训课程，并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不断实践和探索。

2. 发挥教师榜样作用：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谈举止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进行正念训练时，教师要以身作则，展现出正念的态度和行为。比如，在课堂开始前，教师可以先进行简短的正念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以平和、专注的状态面对学生；在与学生交流时，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不打断、不评判，用正念的方式给予回应[7]。教师的这种榜样示范作用，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正念训练，激发学生参与正念练习的积极性。

3. 个性化引导：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特点都有所不同，教师在课堂上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的引导。对于一些容易分心、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教师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正念练习方法。比如，有的学生在进行正念呼吸时难以集中注意力，教师可以建议其尝试在吸气时默念“放松”，呼气时默念“平静”，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其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同时，教师要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三）营造支持性环境

1. 学校氛围营造：学校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正念训练开展的校园氛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正念训练的理念和益处，让学生和教师对正念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校园广播中开设正念专题节目，介绍正念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方法；在宣传栏张贴正念训练的海报和学生的正念体验分享；组织开展正念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正念绘画比赛、正念故事演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能让正念文化在校园中深入人心。

2. 家庭支持：家庭环境对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引导家长了解正念训练，并在家庭中为学生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可以通过举办家长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家长介绍正念训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以及家长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孩子进行正念练习。比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正念晚餐，在吃饭时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口感，享受用餐的过程；在孩子学习感到疲惫时，引导孩子进行几分钟的正念放松练习。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能让学生在家庭和学校都能持续进行正念训练，巩固训练效果。

四、正念训练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 实验设计：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选取两个平行班级，随机将其中一个班级设为实验组，另一个班级设为对照组。实验组接受为期一学期的正念训练融入心理课堂的教学干预，对照组接受传统心理课程教学。在实验前和实验后，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情绪调节能力相关量表的测量，以对比分析正念训练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2. 测量工具：运用青少年情绪调节量表（ERQ–A）来测量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该量表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估学生在情绪调节方面的策略运用和能力水平。同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辅助测量，以了解学生在实验前后整体心理状态的变化。

3. 数据收集与分析：在实验前和实验后，统一组织两组学生填写量表。对收集到的数据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后测中的差异，以判断正念训练是否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二）研究结果

1. 情绪调节量表得分变化：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ERQ-A 量表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维度得分上无显著差异。经过一学期的干预后，实验组在认知重评维度的得分均值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学生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更善于运用认知重评的策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和应对情绪。而在表达抑制维度，实验组得分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学生不再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能够以更健康、自然的方式表达情绪。相比之下，对照组在这两个维度的得分变化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2. 心理健康状况改善：从 SCL-90 量表的测量结果来看，实验组在实验后的总分及多个因子得分（如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均显著低于实验前，说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这进一步印证了正念训练通过提升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对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对照组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无显著变化。

（三）案例分析

为更直观地呈现正念训练的效果，本研究从实验组中选取两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个案分析。

1. 案例一：学生 A 原本是一个情绪容易波动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一点挫折就会陷入焦虑和沮丧的情绪中。在参与了正念训练课程后，他学会了运用正念呼吸和正念冥想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当遇到难题时，他会先进行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专注于问题本身，寻找解决办法。他表示，通过正念训练，自己能够更快地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学习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2. 案例二：学生 B 在人际交往中存在一些问题，总是因为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而压抑自己的情绪，导致内心痛苦。通过正念训练，他逐渐学会了接纳自己的情绪，不再苛求自己。在与同学发生矛盾时，他能够运用正念的方法，先觉察自己内心的情绪变化，然后以平和的心态与同学沟通，解决问题。他说，现在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了，整个人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将正念训练融入高中心理课堂，对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教师的专业培训与引导，以及支持性环境的营造，学生在认知重评和情绪表达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改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正念训练为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且有效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应对高中阶段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二）未来展望

1. 持续优化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积累，应进一步优化正念训练课程。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开发更多适合高中生的正念练习形式和主题，如正念艺术创作、正念运动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同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如在线课程、移动应用等，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正念学习资源。

2. 扩大应用范围：将正念训练推广到更多的高中学校，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加强与教育部门、学校之间的合作，开展师资培训和教学研讨活动，分享正念训练的教学经验和实践成果，推动正念训练在高中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

3. 深入研究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正念训练提升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内在机制，从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关注正念训练对学生长期发展的影响，如对学生的职业选择、人生规划等方面的影响，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 .“心理健康”课程的课堂教学探索——以考试焦虑的干预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5(28): 116-120.

[2] 王志仁 , 张燕霞 . 当黑狗遇上葡萄干——高中抑郁情绪主题活动课设计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2025(18): 41-44.

[3] 范博洋 , 刘海燕 . 将正念训练融入初中体育课程的可行性分析 [J]. 体育视野 , 2024(24): 146-148.

[4] 王秀红 . 体育活动中的正念训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J]. 体育视野 , 2024(21): 131-133.

[5] 汤文萱 . 正念训练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J]. 中学课程资源 , 2024, 20(08): 66-68.

[6] 陈志财 . 正念训练对中学生羽毛球学习的心理因素和技能表现影响研究 [D]. 鞍山 : 鞍山师范学院 , 2023.

[7] 吴晓峰 , 张慧杰 . 正念训练可缓解中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 [J]. 家庭科技 , 2022(05): 61-64.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一级教师）

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师自身发展路径探析

杨瑶瑶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在此背景下，学前教育教师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首先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学前教育领域引发的变革，包括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及教育理念的更新；在此基础上分析学前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职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如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局限以及角色定位的困惑；最后，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师发展的路径，即加强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学习、构建与人工智能协同育人的模式、开展教育研究的同时创新教学实践方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学前教育；教师发展

“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最初由约翰·麦卡锡提出。作为一门新兴技术学科，人工智能的问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如智慧教育、教育机器人、智能数据库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前教育的教师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育领域的变革

（一）教学方式的转变

1. 智能化教学工具的使用

目前学前教育阶段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智能化教学工具正在逐步引入幼儿园。这些智能化教学工具采用生动有趣的动画、游戏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幼儿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认知特点。目前市面上已出现很多类似这样的产品，比如针对幼儿语言学习的智能软件，通过互动式故事阅读、语音跟读等功能，让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人工智能产品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部分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纳入学校教育的必修课。例如，英国在 2013 年发布了计算机课程标准，要求将计算机编程课作为 5~6 岁儿童的必修课。澳大利亚也建议幼儿园通过使用可视化编程语言，以培养幼儿的创意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此外，一些民间组织也同样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日本有一些公司免费提供编程入门课程等公益性活动；美国则是从 2018 年起，每年拨款用于编程教育的普及工作 [1]。

总体而言，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在人工智能时代，幼儿无论是游戏生活还是学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计算机多媒体相关，这让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联系更加密切。

2. 基于大数据的教学决策

在课堂教学、游戏活动等场景中，教师可运用各类智能设备收集数据，如幼儿在智能学习软件上的答题情况、操作时长，以及与教育机器人互动时的表现等，从而获取丰富的幼儿学习行为数据。借助数据分析工具，教师可以精准洞察每个幼儿的学习特点 [2]。例如，有的幼儿在数学认知方面接受速度较快，但在空间感知上稍显薄弱；有的幼儿则在语言表达上具有较高天赋，但在逻辑思维训练上需要更多引导。基于这些精准分析，教师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为不同幼儿提供差异化的教学内容和指导。

（二）教育理念的更新

1. 培养幼儿人工智能素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为顺应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当下学前教育的重要使命即培养幼儿的人工智能素养。这既关乎幼儿当前的学习体验，也影响着未来他们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当前，在学前阶段培养幼儿人工智能素养，主要是让他们初步认识人工智能并知晓一些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展示图片或者进行实际演示等方式，向幼儿介绍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例如，我们一般会呼唤“小爱”“小度小度”“Siri”等语音助手帮我们查询我们想要的信息。现场就可以举例子，教师：“小度小度”，小度：“我在”，教师：“请播放国歌”。通过这样的实例让孩子们亲自体验，孩子们就能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为生

活带来的方便。

2. 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共育

虽说人工智能时代有很多智能产品可供教师们使用，但是教师应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取代教师的角色。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产品，本质上都是教育辅助工具，需要与教师的专业能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虽然人工智能产品在数据整理与分析、信息呈现等方面具有高效性和精准性，能够为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个性化的支持，但是在孩子成长教育过程中所蕴含的情感交流、价值观引导等方面，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替代教师。

二、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师面临的职业发展困境

（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欠缺

1. 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欠缺

人工智能是一门涵盖计算机科学、数学、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当前许多学前教师在专业学习阶段并未系统接触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所以对人工智能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了解不够深入，因此难以依据教学实际需求灵活调整优化[3]。例如，一些智能软件会特定地向用户推送一些内容，这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机制，如果教师不了解软件背后的机制，难以向幼儿解释为何推荐特定学习内容，也难以针对幼儿特殊需求与软件开发者进行有效沟通。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不熟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师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效融入日常教学，由此，能利用的人工智能的教育价值也就十分有限。

2.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欠缺

智能化教学工具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对学前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在现实中，教师在使用这些工具时面临不少问题。例如，在操作智能化教学设备方面，有些教师对新设备操作界面和功能不熟，使用多功能互动的智能白板时仅限于简单展示课件，未能充分利用触摸交互、实时反馈之类的高级功能加强课堂互动。同时，大数据技术虽能为教学提供大量幼儿学习数据，但是许多教师缺乏数据分析的专业技能，不知道如何筛选、整理与解读数据，因此就难以根据数据结果调整教学策略，导致大数据在教学决策中的应用效果不佳，难以达成精准教学的目标。

（二）角色定位的困惑

1. 从主导者到引导者的转变

传统学前教育教学模式下，教师主导着教学活动的节奏、内容和方式，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智能教学工具的引入和使用，幼儿能通过与工具互动自主获取知识，教师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引导幼儿与智能工具有效互动学习的引导者。然而，部分教师在适应这一角色转变时困难重重。长期形成的主导者思维让他们难以放手让幼儿自主探索，并且他们也缺乏引导幼儿与智能工具互动的策略和技巧。因此，在幼儿和智能工具互动时，他们往往不知何时介入、如何提供必要帮助和引导，导致互动学习效果不佳，智能工具在培养幼儿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应有的优势也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2. 与人工智能协同育人关系不明确

目前在幼儿园里能看到一些这样的现象，教师不知道如何与智能教学设备构建协同育人关系。一方面，部分教师过度依赖智能教学设备，把许多教学任务交由智能软件或者机器人完成，认为幼儿通过这些设备就能获得良好学习效果，从而忽略了自身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情感陪伴作用。他们不知道该何时介入，从而忽视了本该很重要的师幼互动以及同伴互动。例如，在语言教学中，有的教师完全依赖智能语言学习软件，幼儿自己操作软件学得不亦乐乎，教师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介入会更有效地帮助孩子，致使教学过程缺少情感温度，这对幼儿语言表达和情感沟通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4]。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教师则怀疑甚至排斥智能教学设备，在教学中忽视其作用。他们或是担心智能设备影响幼儿身心健康（不能否认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比如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或电子产品成瘾等），因此不愿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产品[5]。总之，在当前的幼儿园环境中，教师在智能产品协同共育方面的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难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优势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三、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师发展的路径

（一）提升专业知识

1. 加强人工智能知识学习

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者，首先应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和补充。首先，教师需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和应用，否则无法把这个技术很好地应用于课堂。补充人工智能知识的途径也灵活多样，比如参加线上培训课程，或教师自己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专业教育平台或者专业线上学习网站参与学者或专业人员开设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程。

其次，幼儿园应组织人工智能知识专题培训，在培训中让教师在深入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实际操作智能教育产品，并通过互相讨论学习，对人工智能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例如，教师可以了解智能系统如何在互动游戏中收集幼儿操作数据，并运用算法分析幼儿学习偏好与能力水平，从而推送适合每个幼儿的学习路径。

最后，主动查阅相关文献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查阅经典案例或者是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科交叉领域的权威期刊，关注最新研究成果，为自身教学创新开拓思路，通过不断学习将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融入教学实践，实现教学创新，推动教学科学化发展。

2. 强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教师有效开展教学的关键。教师应积极参加信息技术培训以提升能力。教育部门或幼儿园等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专门的信息技术培训课程，内容应比较广泛，最基础也是最必要的是智能教学设备的操作技巧以及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方法。对于智能教学设备，如智能投影仪、互动电子白板等，教师要熟练掌握其各项功能，不仅能够流畅展示教学资源，还能利用设备的互动功能，如触摸操作、实时反馈等互动功能增强幼儿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数据分析软件在教学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教师应学会运用此类软件（如 Excel 的数据分析功能、SPSS 等专业的教育数据分析软件），对幼儿在智能学习软件、课堂互动等场景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通过分析，教师能够精准了解幼儿在语言、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二）明确角色定位与转变

1. 树立正确的角色教育观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首先需要认识自身角色的复杂性以及转型的必要性。教师应成为幼儿的陪伴者，当智能设备呈现丰富的学习内容时，幼儿在学习活动中仍需要教师的陪伴与关注。教师需关注幼儿在使用智能设备时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鼓励和安慰，让幼儿体验到温暖与陪伴。同时，教师还应是智能教育材料的甄别者，是幼儿在智能教育资源方面的筛选者与整合者。面对海量的智能教育资源，教师需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兴趣特点、发展特点去选择、整合到教学活动中去。如在选择智能教育资源时，考虑是否具有教育性、趣味性以及是否契合教学目标，确保有利于幼儿的发展。

2. 构建与人工智能协同育人模式

构建与人工智能协同育人的模式，是学前教师顺应新时代教育变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应尝试与智能教学设备开展有效合作，在利用人工智能产品便利幼儿学习与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与幼儿之间的情感沟通与交流。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情感需要很热烈的阶段，也是孩子社交能力迅猛发展的阶段，教师应当注重做好与幼儿之间的情感沟通，并引导同伴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教育过程充满人文温度。

（三）开展教育研究与创新

1. 开展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学前教师要有研究意识，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成效，在实证研究的指引下探寻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借助幼儿认知发展量表等科学测评工具，定期就幼儿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等认知能力加以评估，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了解智能教学游戏对幼儿认知发展带来的具体影响，判断人工智能产品能否有效提升幼儿注意力集中度、促进思维灵活性等，从而为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实证依据。

2. 创新教学实践

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教学实践，是时代对学前教师的必然要求。教师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新技术、VR 技术、AR 技术等，开展新颖的课堂教学活动。例如：探索“海底世界”，教师可以根据课程主题“海底世界”为幼儿创设 VR 沉浸式的教学环境，让幼儿佩戴好 VR 设备，仿佛置身于海底世界，与海里的生物“亲密接触”，教师则在此过程中介绍海洋生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等，让幼儿在浸入式的教学活动中，身临其境地学习。此外，教师还可利用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不同幼儿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四、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学前教师自身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前教师应积极面对挑战，通过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明确角色定位、开展教育研究与实践创新等途径，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智能时代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孙立会，刘思远，李曼曼.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儿童编程教育行动路径——基于日本“儿童编程教育发展必要条件”调查报告 [J]. 电化教育研究，2019, 40(08): 114−120, 128.

[2] 祝智庭，戴岭. 融合创新：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的新质发展 [J]. 开放教育研究，2024, 30(03): 4−14.

[3] 杨定玉，吕玉绮. 人工智能时代学前教育教师的发展机遇、困境与应对策略：教育家精神视角 [J].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5, 46(02): 69−82.

[4] 罗万丽，王蕊，范荣.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探析 [J]. 数字教育，2018, 4(06): 79−82.

[5] 王磊，王宏宇，王傲岚，等. 人工智能系统对学前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 [J]. 教育现代化，2020, 7(42): 1−5.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

叙事重构策略：财经类专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的三重维度

张凯雯 丁春丽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也是高等教育聚焦和实现“四个服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应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一体建设。为建设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财经类专业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线，以“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为要义，运用叙事重构策略优化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路径，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其中，有效破解课程思政“表面化”“碎片化”困境，实现“育知”与“育才”深度融合，培养出经世济民、兴国安邦的复合型人才。这既是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突破，更是财经类专业回应时代之问、国家之需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叙事重构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更是契合“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战略需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益激烈，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国际关系复杂化，为避免广大青年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陷入“价值观困境”，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断增进青年“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挺膺担当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初心使命。财经类专业是经济致用之学，自创办伊始就被寄予了复兴民族的厚望，“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不仅是古代先贤的立世准则，更是现代财经人的崇高理想[1]。立足新时代，面对“新财经”，在探索中国特色高等财经教育创新发展之路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高等财经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价值。

一、财经类专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应对“两个大局”的迫切要求

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点，环境复杂性和发展挑战性急剧增强。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高校财经类专业教育就要坚持国际视野与中国道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向世界展示不同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发展路径，彰显富有中国特色的“多元一体”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广大青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增强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在感受祖国富强繁荣的同时，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国际贸易合作，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为中国经济治理注入活力[2]。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财经”建设的必然选择

财经类专业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从历史规律来看，一个国家财经类专业的影响力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它承担着为国输送治国理政和具有全球胜任力人才的重任。培养的人才是未来商业领域的主导力量，这不仅关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与担当。财经类专业若要承担起经世济民、纬国兴邦的重任，适应数字财经、智能财经的新趋势，为国家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就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出具有中国情怀、坚守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担当民族使命的新财经人才。为此“新财经”专业在探索“新文科”与“新工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更要强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理论研究，彰显财经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强化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打造爱国敬业的人才梯队；

推进学科专业优化升级，紧扣新发展格局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具有战略视野的拔尖财经人才。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财经学生成长的内在要求

强国建设离不开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财经行业与经济利益紧密相连，新财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易受西方话语体系和多元化价值观冲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面对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为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对新财经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解码新财经“人才引擎”的钥匙，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怀“国之大者”，才能增强新财经人才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中叙事重构策略的价值意蕴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叙事重构策略在理论层面确立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在实践层面贯通价值观内化的传导链，在范式层面构建教育创新的生态系统，最终实现财经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3]。首先，夯实话语主体地位，构建本土化的育人话语体系。叙事重构策略通过解构西方经济学“价值中立”的理论预设，以经济史、金融案例为载体，将诚信经营、社会责任、国家战略等思政内容融入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等课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学科知识生产的内生逻辑，推动财经教育从“知识移植”向“本土创新”转型。其次，该策略通过创设价值理性内嵌的专业实践场景，以鲜活案例为纽带，将社会责任、职业伦理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参数，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此外，叙事重构策略在数字经济伦理、全球化治理等前沿领域构建起价值观传导的底层架构，使家国情怀与专业认知形成结构性互嵌。这种创新不仅突破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二元对立，更在方法论层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经教育范式，为培养兼具政治定力、专业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战略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三、高校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的现实困境

（一）教学叙事机制的僵化

目前，教学叙事方式在财经类专业课程中多有使用，但工具理性主导的教学叙事过度强调市场效率与竞争机制，导致学生在价值判断中习惯性地忽视分配正义、社会福利等维度，形成单向的“经济至上”思维范式，弱化对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核心经济价值的系统性认知，难以建立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内在关联[4]。同时现有教学框架呈现学科壁垒与视野局限，单一经济学维度难以支撑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立体解析，加之中西方经济政策比较研究的缺位，制约着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层理解与价值认同，导致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物理叠加”却未产生“化学反应”。

（二）课程教学符号系统割裂

专业课程依赖经济学、金融学的实证性术语体系，其话语逻辑建立在技术理性之上，强调价值中立的数据建模与客观分析。而思政教育则运用“共同富裕”“国家战略安全”等承载意识形态导向的人文价值符号。二者因缺乏系统性转译路径未形成平行话语体系，导致课堂出现显著的符号解码障碍。在现实课程教学中，没有形成“术语—价值”转译机制，符号系统的互斥性不仅割裂了专业认知与价值认同的关联，弱化了学生对经济现象的政治解读能力，也制约了财经人才价值理性与家国情怀的培养，导致财经人才陷入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窠臼，成为课程思政改革亟待突破的认知壁垒。

（三）教学模式内化效能不足

传统教学模式停留于知识单向灌输层面，未能构建“理论认知—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行为践行”的完整内化路径。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平面化知识传授，缺乏历史情境嵌入与现实问题牵引，导致学生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局限于技术分析，难以形成对“共同富裕”等战略命题的深层价值认同，难以激活辩证思维，制度自信的生成缺乏认知根基。在专业实践与社会服务场域，知识应用停留于模拟推演层面，学生无法通过真实社会参与将“产业振兴”等专业概念转化为社会责任意识。

四、叙事重构策略在财经类专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的三重维度

（一）叙事逻辑重构：从“效率优先”到“共享发展”的价值转向

传统财经教育叙事多聚焦市场效率、竞争机制等工具理性，易导致学生形成“经济至上”的思维定势。叙事重构策略要求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关键举措[5]，如“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价值内核嵌入专业话语体系。一是理论叙事：将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技术演进等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进程，实现宏观叙事理论知识的活化。如讲授资源配置理论时融入“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宏观叙事，阐释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背后的共同体逻辑；通过解析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效能，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制度优势。二是学科融合叙事：重构经济发展史的教学框架，构建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体系，帮助学生在多学科中直观感受经济发展的多维原因。如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民族交往交融的经济史实从各学科角度进行阐释：历史学追溯其发展脉络，民族学

剖析参与民族群体特点，社会学探讨其对当时社会结构影响，思政课提炼其中蕴含的民族团结精神，将其转化为阐释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佐证，强化学生对“四个共同”的认知。三是比较叙事：构建“经济治理—民族关系”双元分析模型，系统解构中西发展路径的本质差异，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优越性，这是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主义伦理实践。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增长范式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对比，揭示两种制度在价值基点上的根本分野：前者以共同体建设为导向，通过“多元一体”的民族互嵌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后者依托“熔炉政策”的同化逻辑加剧结构性排斥。通过构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数理模型，可论证中国民族政策通过补偿机制实现各民族净福利增长，其制度韧性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一盘棋”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与西方个人主义导向的碎片化治理形成鲜明对比。

（二）话语体系重塑：从“学科术语”到“思政话语”的转化机制

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深层矛盾，在于专业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符号系统错位。叙事重构需构建“专业—思政”话语转译模型。一方面进行概念转译，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取价值内核，分解成可操作的经济学概念，不仅推动经济相关学科本土化转型，又能把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如将“五个认同”转化为“制度成本分析”（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人力资本增值”（文化认同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等专业命题，将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无缝植入，激发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是进行符号再造，运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视化叙事技术重构经济发展成果的呈现方式，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阐述，提升经济数据的可理解性，让学生直观感受其发展趋势。如将民族地区 GDP 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数据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指数”，量化分析双语教育对民族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度等，通过动态图谱呈现各民族共建共享的发展成果。

（三）认知框架重建：从“知识接受”到“价值内化”的实践转化

叙事重构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认知升级，突破传统知识传授的平面化局限，构建多维度认知升级通道，培育具有历史纵深感、现实洞察力和未来前瞻性的新时代人才。一是情境建构，设计“民族地区产业振兴模拟决策”等实训项目，让学生在经济效益、文化保护、生态平衡等多重约束下进行资源配置，体验共同体意识的可感知性；也可通过青海省“拉面经济”“青绣产业”的全国推广、云南楚雄双柏的光伏产业投资民族乡村建设等真实案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建立“经济—文化—社会”协同演化的系统认知模型，理解“跨域经济”与“民族交流”的内在逻辑。二是批判反思，在案例分析中嵌入价值冲突情境，能激活学生的辩证思维，突破学生价值认知的浅表化，在数据论证和价值辨析中自然而然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增强制度自信。设置“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探讨生态补偿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议题，引导学生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在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点。三是行动延伸，搭建“专业实践—社会服务”联动平台，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思政素养，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推动实践育人，既锻炼市场调研能力，又深化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如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调研，将经济模型构建与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相结合，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为自觉的升华。同时，发挥高校辅导员在隐性课堂的作用，通过“润物细无声”的行为引导和显性的行为期许促进个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形成“价值内化”。

五、结语

如今，世界大变局和高等教育大变革交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亟待具备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家国情怀和专业本领的“新财经”复合型人才提供战略支撑。“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财经类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中国大地，夯实“四个与共”“五个认同”思想根基，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邱雪静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使命担当与路径探析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 2021, 19(02): 6-8.

[2] 孙丽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体系化思考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 2021, 19(01): 1-4.

[3] 彩虹 . 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 2021, 19(03): 23-25.

[4] 李慧茹 .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 2018, 16(06): 68-71.

[5] 李慧茹 .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建设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 2020, 18(03): 38-4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青海大学 2024—2025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ZLSZ-202402）。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力学”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　博

摘要：在新工科创建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安排的大背景下，“基础力学”作为工科人才培养的关键基础课程，面临着知识体系固化、实践与理论相脱离、价值引领欠缺等现实困境。本文从新工科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出发，从育人理念重构、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思政融合、评价体系优化四个方面，对“基础力学”育人模式的改革路径进行系统研究。整合 BOPPPS 教学模型、混合式教学、差异化教学设计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实践经验，构建起“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者并重的育人体系，实现从传统知识灌输到高阶能力培养、从单一课堂教学到多维协同育人的根本性转变，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新工科；基础力学；育人模式；课程思政

一、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推进，新工科建设成为高等教育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培养未来工程技术人才的重大举措。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专业课程要构建“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双线融合的框架，育人逻辑由原来的“双线融合”提升为现在的“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基础力学”作为航空航天、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工科专业的基础课程，既承担着构建学生工程力学知识体系的任务，又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工程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面对新工科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基础力学必须突破传统教学范式，创建契合时代需求的育人新形式，实现从“教会知识”到“育成人才”的彻底转变。

二、育人理念重构：确立“三位一体”的核心导向

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要义就是实现知识、能力、价值三者的共同发展。“基础力学”育人理念的重构要冲破传统“以知识为中心”的束缚，塑造起“知识传授、能力培育、价值塑造”三者并重的中心导向，为育人模式的革新赋予思想根基。

（一）坚持成果导向（OBE）的育人逻辑

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出发点，从学生的学习成果倒推教学过程和评价体系。“基础力学”教学要围绕新工科人才的核心能力要求，确定课程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养目标，知识目标是对力学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的系统掌握，搭建起力学知识框架；能力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力学原理分析工程实际问题、建立力学模型、开展创新设计的综合能力；素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工程伦理、家国情怀、团队协作等核心素养。目标导向的育人逻辑要求教学过程由原来的“教师教什么”转变为现在的“学生学什么”，保证教学活动始终围绕人才培养的核心需求来开展。

（二）秉持“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原则

新工科人才要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和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这就要求基础力学教学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一方面加强力学基础理论的深度教学，使学生掌握力学知识的本质规律和内在逻辑，为后续的专业学习和技术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1]。另一方面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扩大力学知识的应用范围，把力学原理同材料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结合起来，融入通识性内容和跨学科案例，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跨界创新能力。

（三）践行“思政引领”的育人使命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基础力学”教学要将课程思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坚持“四个结合”的思政理念：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知识与服务相结合、个人发展与团队合作相结合、科学热情与家国情怀相结合。挖掘力学学科中的思政元素，把科学家精神、工程伦理、家国情怀等融入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严谨钻研、敬畏科学、爱国敬业的核心素质，使学生在掌握力学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教学模式创新：构建多维协同的教学新范式

教学模式的创新属于育人模式改革的主要部分。基础力学要融合现代教育技术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创建线上线下相融合、参与式学习与差异化教学相融合的多维协同教学范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一）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混合式教学

在“互联网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成了冲破传统课堂束缚的有效途径。依靠中国大学 MOOC、学习通、超星等智慧教学平台，创建起“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教学闭环[2]，课前发布教学视频、思维导图、预习任务，使学生提前梳理知识框架，用在线测验诊断学生认知盲区；课中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根据课前反馈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组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动手实践等参与式活动，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究；课后通过在线作业、拓展资源、学术讨论区等方式延续学习过程，使知识得以深化内化。既发挥了线上教学的灵活性、资源优势，又保留了线下教学的互动性、情感交流，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二）基于 BOPPPS 模型的结构化教学设计

BOPPPS 教学模型把课堂导入、学习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六个模块拆解开来，创建起“目标制定—诊断修正—效果验证”的闭环式教学质控体系，精准对接“基础力学”高认知负荷、理论同工程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特性。在“基础力学”教学中，可以结合课程核心内容灵活地将该模型融入其中，导入环节从工程实际与认知冲突出发，通过南京长江大桥桁架结构受力设计、悬索桥荷载传递原理、结构失稳引发的工程案例等，直观展示力学知识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前测环节利用学习通等平台发布在线问卷或者随堂测验，围绕静力学基本概念、受力分析方法等核心知识点，准确找到学生知识盲区和薄弱环节，为教学重难点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参与式学习环节设计有针对性的互动任务，如桁架结构受力拆解协作、梁的弯曲变形实验探究、结构稳定性分析辩论等，让学生在动手操作、思维碰撞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后测环节采用单元测验、工程案例分析等方式，全方位考查知识应用能力，总结环节用思维导图理清知识脉络、小组分享学习心得，同步植入工程伦理规范、科学家攻关故事等思政元素，强化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BOPPPS 模型的应用使基础力学教学流程更加系统、有针对性、有互动性，降低认知难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的协同增效，为课程教学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三）因材施教的差异化教学策略

不同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存在较大的差别，单一的教学模式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发展需要。“基础力学”教学要根据学情分析来开展差异化的教学，对基础好、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生采取探究式教学，设置开放性讨论题和工程设计任务，引导其深入研究力学原理的应用拓展，培养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对基础差、自信心不足的学生重视基础知识的强化和学习兴趣的激发，采用前置教学、问题汇总、二次备课等方式降低学习难度，及时肯定学生的进步，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同时，把通识内容碎片化融入教学，用科学家生平、学科发展历程等素材充实教学内容，减轻专业学习的压力，培养学生深度思考的习惯[3]。

（四）理论与实践深度耦合的教学路径

“基础力学”的工程属性决定了教学要联系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理论学习、模型构建、工程应用”的教学链条，在汇交力系平衡条件教学中结合悬索自重形状问题，在强度理论教学中引入桥梁腐蚀防护、建筑结构抗震等案例，使学生体会到力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依托实验教学、创新创业训练、学科竞赛等平台，给学生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鼓励学生参加力学创新创意竞赛、工程结构设计项目，把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课程思政融合：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协同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基础力学要深入挖掘学科中的思政元素，创建“三元融合、四维联动”的思政融入体系[4]，使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明确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与内容

“基础力学”课程思政的主要目的就是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课程工科属性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工程伦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养，促进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工程技术人才。围绕这一核心目标，需要系统挖掘三类思政元素。科学精神元素：通过回顾力学的发展史，梳理经典力学从奠基到现代发展的脉络，讲述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的实证精神、牛顿建立经典力学体系的创新思维、钱学森毅然归国投身科研的执着追求、钱伟长跨界攻关的钻研态度，传递敢于质疑权威、勇于突破局限、严谨求实治学的科学品格；工程伦理元素：结合建筑结构坍塌、桥梁安全隐患等真实的工程案例，分析违规操作、忽视标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调工程设计和实践中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安全第一、绿色环保的职业准则，培养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和责任担当；家国情怀元素：介绍南京长江大桥自主建造历程、港珠澳大桥力学技术创新、“墨子号”量子卫星力学应用突破等中国工程成就与科技成果，展现我国在力学相关领域的发展跨越，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

（二）探索多元化的思政融入路径

课程思政的融入不能生硬地植入，应该采用“隐

性渗透”的方式，把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在课程目标中明确思政要求，把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等素养目标纳入课程大纲；在理论教学中穿插思政案例，在经典力学发展史教学中融入科学家的爱国事迹，在结构力学教学中结合中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历程；在实践教学中强化价值培育，通过创新创业训练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与艰苦奋斗精神，在实验教学中强调严谨诚信的科学态度；在教材编写中嵌入思政内容，用问题导入等形式把思政元素和知识点有机结合。借助多种途径，使学生在学习力学知识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接受价值引导。

（三）强化思政与专业的深度耦合

课程思政有效实施要实现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不能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思政元素和力学知识的逻辑联系，在讲解强度理论的时候联系工程结构的安全设计，突出“敬畏科学、责任至上”的理念，在学习振动理论的时候联系我国桥梁抗震、航空航天减振等技术突破，阐释“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内涵，在讨论力学模型的简化和优化的时候渗透“抓主要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耦合式地融合进来，既保证了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又突出了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协同效应。

五、评价体系优化：构建科学全面的综合评价机制

传统的以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各方面的情况，“基础力学”需要建立多元化、过程化的综合评价体系来保障育人的效果。

（一）确立多维度的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要包含知识、能力、素养三个方面，知识维度考查力学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的掌握情况，能力维度考查问题解决、模型构建、创新设计、团队协作能力，素养维度考查科学态度、工程伦理、学习主动性、家国情怀。从多角度考查学生综合能力，克服“唯分数论”的局限。

（二）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整合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阶段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形成一个全流程的评价链条，诊断性评价用于课前学情分析，为差异化教学提供依据[5]，形成性评价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包括课堂互动参与度、作业完成质量与及时性、线上学习资源点播时长、小组讨论贡献度等各个方面的指标，采用教师点评、学生自评互评、平台客观评分相结合的方式，实时反馈学习效果，帮助师生动态调整教与学策略，阶段性评价按照课程知识模块进行，采用静力学、动力学等专项阶段测试，结合工程案例分析报告、实验操作记录等形式，系统考查学生知识内化程度和实践应用能力，终结性评价以期末考试为主，搭配课程论文、工程结构受力分析项目设计等多种形式，综合考查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问题解决和创新思维能力。

（三）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打破老师单方面评价的局限，构建“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平台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体系：学生自评能培养学生自我反思、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总结学习得失；学生互评以小组讨论、作业互评、项目评审等形式，促进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合作能力；智慧教学平台依托数据分析，提供线上学习时长、测验成绩、互动频率等客观数据，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教师评价侧重对学生能力提升、素养养成的综合研判，发挥引导和把关作用。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既能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又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六、结论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力学育人模式改革，核心就是重构“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参与式学习和差异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深化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优化多元化、过程化的评价体系。经过改革实践，有效破解了传统教学中知识体系固化、理论与实践脱节、价值引领不足等局限，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从单一课堂到多维协同、从教书到育人的转变。“基础力学”属于工科基础课程，其育人模式的改革经验不仅适用于本课程，也为其他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对推进新工科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会端，李增花，王红睿．融合 BOPPPS 模型与学习通平台的结构化学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量子力学基础”为例 [J/OL]. 大学化学，1−12[2026−02−05].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815.O6.20251216.1058.006.

[2] 刘荣梅，陈建平，李晨，等．多元化的基础力学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J]. 高教学刊，2025(29): 97−100.

[3] 李宝辉，李会军，杨艳．聚焦创新能力培养的力学类基础课程教学探索 [J]. 大学，2025(25): 127−131.

[4] 李兵，仇培涛，张连英，等．应用型大学基础力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与实践 [J]. 高教学刊，2025(08): 81−84.

[5] 燕乐纬，梁颖晶，于志伟，等．基于差异化教学的力学基础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研究 [J]. 教学学术，2025(01): 27−38.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三维服务体系构建与实践

赵良辰

摘要：当前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正全覆盖式建设，对照各类规范文件的建设指标，仍有差距，有待提质增效。本文首先立足“三全育人”理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剖析“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依托智慧校园数字化平台建设，促进高校各行政部门协同合作，形成高效的教育管理生态系统。进一步从横向协作育人、纵向追踪过程、立体数智建设对应“三全育人”的三个维度展开思考。最后，实践探索提出鼓励学生参与社区管理形成高效协同的社区主阵地、满足学生个性多元化需求提高社区服务的深度与精度、“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凝聚社区建设的校内外支持力量，并进行未来展望，以期为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三全育人”；“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体系

一、高校“三全育人”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功能定位与时代特征

“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形式，在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具备独特的功能定位以及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教育价值实现从“用人”到“为人”迭代的生动体现。在管理育人和实践育人方面，“一站式”学生社区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学生成长和生活的全过程[1]。

从功能定位来讲，“一站式”学生社区是助力学生成长的综合性平台。传统学生管理模式下，各部门之间存在明显壁垒，而“一站式”学生社区打破了这一局面，将学校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在学业支持方面，社区内可设立学习辅导中心。比如邀请优秀教师和学生志愿者，为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开展一对一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习难题，提升学业成绩。例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建立全国首个大学生居委会，不断完善以学生为主、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建设“楼宇责任学院—专职辅导员—兼职驻楼辅导员—楼长—层（厅）长—寝室长”六级学生社区工作队伍。“一站式”学生社区，设置驻楼导师工作站、心理健康工作站、就业创业工作站、退役军人服务站等，推动教授、科研骨干、教学名师、关工委老同志等进社区，满足学生多元需求，不断提高社区“三全育人”质效，打造社区育人工作品牌。

从时代特征来看，“一站式”学生社区具有显著的信息化、智能化特点。学生社区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实现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的转型升级，更好满足了学生成长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社区的管理和服务逐渐实现了信息化与智能化。学生通过手机App或网上平台就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水电费缴纳、报修申请、活动报名等，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三全育人”对“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引领作用

“一站式”学生社区，成为高校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重要载体，对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重要意义。“三全育人”理念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依据，推动学生社区成为育人的主要阵地。全员育人强调育人主体不能单一，不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要育人，学校里的每位教职工都需承担起育人责任，如教师、辅导员、行政人员、宿管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全程育人突出育人过程的连贯，从学生迈进大学校门起，从入学教育到毕业就业，全过程跟踪和引导，大学阶段的每个环节都要开展育人工作。全方位育人注重育人空间要开阔，育人不只是体现在课堂教学，还需拓展到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空间等领域[2]。

“三全育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突破传统育人的空间限制。以往高校育人常局限于课堂、宿舍等相对独立的空间，各空间缺乏紧密联系。“一站式”学生社区整合教学、生活、娱乐等多方面资源。比如，在社区内设置学习交流区域、文化活动场地、心理咨询室等，让学生在社区的任何一处都能得到教育和引导，实现育人空间的无缝对接，全方位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例如荆楚理工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构

建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管理力量、服务力量和思政力量下沉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通过健全社区党建体系、优化服务流程、丰富育人活动，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治理体系更加完备，教育管理更加高效，学生满意度、获得感不断增强。

“一站式”学生社区已逐渐成为集教育、管理、服务于一体的育人平台，重构了教育的时间观、空间观和过程观，为学生全面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实际的学生社区建设过程中，教师、辅导员和宿管人员能够及时交流学生的情况，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共同制定更有效的育人策略。如今，各种思潮文化相互碰撞，高校学生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站式”学生社区在价值引领上能够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对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三维服务体系的构建

（一）横向多方协作夯实育人服务的基础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涉及学校多个部门和人员，各方要想高效协同合作，首先要消除部门间的隔阂，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业务互联。学工、教务、后勤、团委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尤其在校区多、占地面积大的综合性院校，在学生社区开通线上预约、审批等功能可以减少学生办事时间与精力。高等院校不同部门间有的仅靠 OA 系统、办公电话或个人交际关系来协调沟通，缺乏统一规划与行动，影响了学生社区服务的质量和效果。若将涉及学生服务管理的部门下沉到学生社区，积极响应国家行政服务体制改革，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学生社区一级，教师或学生面临紧急或需要快速响应的事务时，就能避免层级过多造成的问题，及时把握最佳处理时机。尤其在学业支持方面，需要多部门协作才能形成良好效果。教师管理部门可以明确有效的激励措施，邀请教师全身心投入到社区进行学业辅导，解答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学保障部门可以建立学习资源共享平台，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在线学习课程；科研部门可以举办学科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学生管理部门可以举办学习方法讲座和经验分享会，也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后勤管理部门要确保学生方便预约图书馆座位、开通多类自习室等，维护并营造整洁、舒适的学习环境。

（二）纵向深入追踪把握育人过程的环节

学生是“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主体，服务体系构建要从学生需求和发展要求出发。要充分了解学生实际需求，纵向关注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服务。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广泛听取学生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例如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分层分类的学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服务；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等个性化服务[3]。

目前对“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的监督主要关注表面的工作完成情况，对于服务质量、学生满意度等深层次指标缺乏有效评估。这就使得一些服务可能只是在形式上完成，并未真正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对于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兴的网络文化、学生社团活动，传统的管理方式可能出现管理不当的情况，不能一味回避，尝试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做法，有助于学生社区和谐稳定发展。尤其在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因其具有个人隐私属性，应该探索尊重与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法，提供关怀式心理咨询服务，并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相关职能部门面对学生诉求时，回复应规范及时，形成纾困解忧议事的惯例，保证权威性。清华大学就已开展试点建设，以书院为载体，践行“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通过党建引领、队伍驻区、学生自治、条件支撑“四大支柱”，打造“四位一体”学生社区教育管理新范式，最终孕育出师生“从游”的独特社区文化，使得社区育人效果显著提升。

（三）立体数智建设拓宽精准服务的维度

要想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好，功能用好，就要将横向与纵向进行融合，形成立体、智能化的服务平台，积极引入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数智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平台，让服务在线化、便捷化，使得其在思想引领、学业指导、生活服务和文化浸润等方面形成有机整体，拓宽精准服务的维度。

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数据赋能精准把握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增强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将各个分散的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如教学管理、党委团委、后勤服务、维权申诉等）进行流程化，并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综合化处理，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荆楚理工学院融合网络要素，拓展社区育人新空间就是典型模范。学校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一方面着力提升网络育人水平与社区治理效率，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线上“一网通办”信息综合体系的建设与应用。这一体系打破了传统以部门为核心的信息运转模式，转而构建起以学生为中心的全息大数据平台，全面覆盖学生的学习状况、党团及社团活动参与情况、校园行为表现与社区生活动态等。依托学生社区的综合服务平台，学校实现了社区民意在线集中收集、公共服务线上整合优化、学生诉求全网快速办理、矛盾问题联网协同调处及治安事务联网联动处置，能在生活保障、学业支持、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安全防护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及时且精准的帮助与支持，真正做到靶向施策、精准服务[4]。

三、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实践探索的突破路径

（一）鼓励学生参与社区管理，形成高效协同的社区主阵地

高校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下沉教师力量，下放

行政权力，形成“小学校 + 大社区”的服务格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体系下学生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难点在于学生社区建设涉及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信息反馈又都不全面，需要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学工、后勤、保卫等各部门在学生社区建设中的具体职责与分工，让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应对学生在社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不能仅凭借领导、教师的发号施令开展实践，需要学生的切实参与以及对学生想法和诉求的切实考虑。亟待唤醒学生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引导他们深度参与社区建设，一方面推动朋辈辅导机制化运行，另一方面实现志愿服务全域覆盖，最终构建起“党委领导、社区搭台、学生唱戏”的良性工作格局。形成师生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同分享的良好局面。在学生社区的一些政策制定和事务决策方面，鼓励学生充分参与，明确自身在社区中的主体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增强学生在社区建设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高校学生社区应突破单向灌输模式，基于管理制度为学生创造成长的物理与精神空间。社区主阵地还表现在学生间的互助合作，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营造学生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提高社区服务的深度与精度

当前，学生社区服务只满足了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却没有关注到学生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以及成长发展需求。以心理健康服务为例，社区虽然设置了心理咨询室，也安排了定期的心理讲座，但对于一些可能存在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缺乏主动筛查和深度干预。再如学业指导服务，通常只是提供一些通用的学习方法和课程资源，没有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辅导，很难真正解决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学生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成为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才能使社区服务契合学生的需求与意愿，充分给予他们在社区中自我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传统教育模式的“规模化”“批量化”培养，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挖掘学习潜力不充分，资源分配未精准匹配学生多样化需求。要加强对服务资源的统筹规划，让后台数据跑起来，精准分析潜在学生潜在需求，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资源。建立学生信息数据库，全面掌握学生的需求和特点，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学业辅导，为有创业想法的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具体实践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社区学生管理中心，让学生团队自主负责交流空间的运营、维护、装饰与管理。南京理工大学通过对学生在食堂的消费数据，能够精准分析出生活困难学生，不用学生个人提出申请直接给予生活补助，体现了学校的人文关怀与育人温度[5]。

（三）“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凝聚社区建设的校内外支持力量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是新事物，必然需要更多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要争取政策支持，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引进专业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同时，拓宽教师、校友赞助等渠道，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比如社区中学习空间、活动场地的装修以及设备采购等基础设施的更新完善，都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学校的资金预算通常有限，可以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和企业、社会组织等展开合作，开展各类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项目，为学生创造更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从长远来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应把握信息技术机遇，持续创新服务模式和管理机制，推动了学生在思想道德、学业发展、身心健康等多个方面的成长，培养出更多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朱鹂，张朝晖，魏琳．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化建设思路的探究 [J]. 中国信息界，2025(01): 108−110.

[2] 武建斌，胡娜娜．高校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治理模式建设初探——以荆楚理工学院为例 [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2, 37(04): 1−4.

[3] 宋兵波．“三全育人”的理论基石及其时代价值 [J]. 中国德育，2024(21): 32−36.

[4] 徐初娜．精准思政视域下高校学生成长智慧社区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24: 11−13.

[5] 周峰．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 159−1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南京警察学院 2025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支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数智化建设实践研究——以南京警察学院为例”（RWYB202512）。

（作者单位：南京警察学院特警学院）

数智赋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研究

苗园园 尤澜涛 苏文燕

摘要：数智时代教育生态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高职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通过数智赋能深化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题中之义。研究分析了当前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在需求识别、教育供给、育人合力、效果评估等环节的突出问题，从数智平台搭建、教学供给重构、数智生态协同及科学评估闭环四个方面提出了精准施策的实施路径，以期汇聚“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新动能，助力心理健康教育由粗放式向精细化、由普适性向个性化跃升。

关键词：数智赋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心理健康教育数智化转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将“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列为战略重点，要求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普及心理健康教育，以教育数字化开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强调全面推进智能化，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推动心理健康等领域专题大模型垂直应用，培育应用生态。特别是在职教领域，《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行动，大力推进“互联网+”“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创新。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数智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需求，系统剖析传统教育教学的困境，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供给侧改革贡献解决方案。

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现实困境

当前技术载体的迭代更新推动学生需求日趋多元化、动态化，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固有局限日益凸显。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在教学实践的关键环节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严重制约了心理育人的发展。

（一）识别之困：静态经验依赖与动态研判错位

传统需求识别手段主要依赖新生入学心理普查、教师日常观察及学生主动求助。其中，心理普查多为一测定终身，无法动态捕捉学生在学习、生活、实践等多场景中的心理行为特征；教师的日常观察受限于主观判断，难以实现全时空覆盖，导致识别存在盲区；主动求助的学生仅为少数，大量潜在困扰的学生受病耻感及认知偏差影响往往会选择求助隐匿，造成需求识别周期过长问题。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跨部门协同研判机制尚未完善，学生数据分散存储于各职能部门，无法进行多维度一体化数据关联分析，难以形成全域统筹的动态研判，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二）供给之难：供给内容同质与供需匹配失衡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供给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教学资源同质化与学生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当前教育供给明显出现去职业化倾向，教育内容大多局限于通用性心理知识，未能将其深度融入“岗课赛证”融合育人模式及产教融合的动态实践场景。在教学形式上，仍以教师主导的灌输式讲授为主，沉浸式与交互式数字化资源利用率较低，这严重削弱了课堂场域下的情感联结与认知内化。此外，多数院校数智技术的应用仍停留在分散化、浅层次阶段，尚未完全搭建起多部门、多功能于一体的数智化平台，且缺乏动态全量的原始信息数据库，难以呼应学生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导致育人效能边际递减。

（三）联动之阻：育人网络破碎与干预响应滞后

生态化育人理念的欠缺及联动机制的局限，导致心理育人容易陷入单兵作战的境地。当前多数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核心应用场景较为碎片化，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效联动；育人主体协作之间存在壁垒，校内各自为战，校外联动匮乏，难以凝聚育人合力。传统干预模式往往以事后响应为主，仅在学生出现明显心理危机或极端事件后才启动紧急干预，这种亡羊补牢式干预不仅增加了干预成本，还导致问题累积，极易演变为更严重的心理危机。

（四）评价之短：效果评估弱化与闭环改进缺失

心理健康教育效果评估长期弱化，已成为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现行评估指标倾向于显性结果的量化考核，却忽视了学生隐性核心素养的考量，且与专业特色、职业发展需求相契合的个性化指标配比存在不足。同时在评价主体与手段上多由心理健康教师单方面完成，而其他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且缺乏数智技术支撑的动态、长效过程监测。此外，评估结果多存档闲置，未能及时反馈至教学设计、内容优化、方案调整等教学环节，难以形成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容易使教学改革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

三、数智赋能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

尽管当下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数智技术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共生共长已成为职业教育不可逆转的迭代方向，将数智技术作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改革的战略抓手，必将为教育教学的发展带来颠覆性变革。

（一）搭建一体化数智平台，激活教育新质生产力

高职院校应以数智技术、教育云服务为支撑，架构集多模态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于一体的数智化平台中枢。该平台的技术逻辑在于通过物联网感知终端、标准化 API 接口及移动端交互，全方位捕捉学生的全场景数据，涵盖心理状态数据、学习行为数据、社交互动数据及生理指标数据等多源信息，可以实现心理状态、学习路径、社交文本、生理体征及实训反馈等数据的全天候实时采集，从而汇聚成大数据资源池。基于采集的多模态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算法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深度剖析挖掘数据价值构建动态预测模型。通过引入关联规则挖掘学习行为与心理状态的深层联系，融合行为序列分析与情感计算技术提取核心心理行为特征，利用聚类算法梳理心理行为特征分类，采用自然语言处理（NLP）识别语义背后的潜在倾向，配合机器学习算法，将碎片化的数据转化为涵盖认知特征、情绪模式、压力源、职业心理倾向等维度的全域学情，并最终生成个性化数字画像。

平台搭载多终端应用，嵌入用户界面、协作支持工具、学习支持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和智能辅导系统等多个关键组件，旨在共同打造无缝、全面的交互式教学体验[1]；且集成心理测评、课程学习、AI 助手、在线咨询、危机预警、职业规划、协同管理等功能，搭载自适应测评与学习、个性化课程推荐、分层分类预警与干预、人机协同在线咨询、干预效果追踪等精准化干预策略，可实现心理健康服务的一站式动态供给。

（二）重构教育教学供给，实现供需精准适配

改革着力点在教育供给，改革出发点在学生需求[2]。高职院校教育供给侧改革应紧扣学生心理、技能培养、职业发展等多元需求，涵盖不同年级学生成长全周期，重构兼具通用知识、专业特色、职业导向的分层分类的教学内容。同时结合“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将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培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全过程，使育心与育德有机统一。教育者还可借助大语言模型、智能体辅助教学设计与实施，但必须强化人工的逻辑校验，警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偏见[3]。

教学模式的创新是提升供给效能的关键。高职院校应积极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线上通过数智化平台实现个性化资源分发与自主化学习路径的定制；线下则侧重 VR/AR 虚拟仿真实训、企业实践、团体辅导等互动式、沉浸式分众教学，通过真实场景下的具身化交互，提升学生的职业韧性。重点依托企业真实项目，邀请行业专家、企业导师参与项目教学实训，根据岗位典型特征，突出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针对现代学徒制特点，通过以岗定课、以证融课、以赛促课等方式，锻炼学生的职业能力，增强职业心理调适技能。同时创新教学应用载体，善用 AI 助教对学生线上学习数据进行颗粒化挖掘，精准定位个体认知难点；构建动态更新的数字资源库，涵盖 3D 仿真实训室、数字化交互式课件、精品微课、Flash 动画等教学资源，解决课程教学内容抽象枯燥、实验操作重复演示等问题，让教育教学更贴近学生需求、更喜闻乐见。

（三）构建数智化协同干预机制，凝聚全域育人合力

数智化协同育人的深层逻辑在于人机协同、交互共生、系统推进。高职院校应以一体化平台为枢纽，搭建校内统筹、校外联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全域协同网络。校内应完善跨部门协同，利用数智平台厘清校内各部门育人主体的职责边界，构建起心理健康中心统筹协调、各部门协同配合、全员广泛参与的人机协同工作格局。重点通过数据共享机制和线上线下联合研判，实现教育教学、学生心理、风险管理等的精准干预。校外则应利用数智技术搭建专属资源共享端口，实现家、校、社、医、企的多域数据联通与多方联动。一方面，通过数据互通链路建立动态家校沟通机制，了解学生家庭生长背景，主动为学生家长提供专业指导，溯源、澄清原生家庭问题症结，改善家庭支持环境[5]；另一方面，与企业、社区、医疗机构等建立一体化智慧链通合作，畅通校医绿色转介诊疗通道，融合企业行业、政府与社会教学共同体，使校内外产学研医教育支持资源深度整合，实现全域资源的优势互补。

依托数智研判能力搭建覆盖全体学生的分级干预网络，可以扭转传统事后补救的滞后干预局面。高职院校应借助大数据实时监测与深度学习算法构建危机预警模型，细化高、中、低三级风险响应标准，明确各层级责任主体与处置时限，通过预警信号实现风险信息的精准推送与快速响应，保障预警处置高效落地。

同时兼顾全体学生普适性发展引导、亚健康群体针对性疏导、高危群体应急处置三级干预需求，通过全天候智能 AI 心理服务终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供基础情绪支持，贴合职教特色增设职业心理调适、虚拟仿真实训脱敏等发展性资源，强化全体学生心理素养培育；针对识别出的心理亚健康群体，精准匹配正念调适、微课学习、自助心理训练、团体辅导等个性化调适方案，化解潜在心理隐患；高危预警触发后即刻启动应急绿色通道，联动校内干预小组与校外医疗机构同步介入，第一时间对接学生监护人，实现多方力量协同处置、科学诊治，全方位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安全。

（四）优化科学评估与闭环反馈，持续推进改革

数智背景下的精准教学改革并非静态的、一次性的模式重塑，而是基于闭环逻辑，不断实时反馈、自我完善的螺旋式迭代上升。高职院校应紧扣德技并修育人导向，结合自身人才培养定位，凭借数智技术对学生全量信息的动态抓取，搭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全域科学评估。评估内容要覆盖知识、能力、素养三维度，其中知识维度主要聚焦学生对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的习得情况；能力维度涵盖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职场适应等核心能力；素养维度则包含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职业伦理、生命认知等关键素养。还应结合各专业特色及职业发展诉求，针对性地增设岗位适应性、实训压力应对、职业心理韧性等个性化指标，并根据专业属性动态调整权重分配。评估过程要有机统一过程性评估、结果性评估和增值性评估，其中过程性评估借助智慧平台实时采集的学生信息，生成可视化的个人成长档案，直观呈现学生的成长变化轨迹；结果性评估综合运用标准化量表、案例剖析、实践考核、职业心理测评等手段；增值性评估则重点研判学生阶段性学习态度、成效及心理与职业素养的达成水平，确保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此外，数智平台要嵌入多主体评估界面，并结合学生需求变化与技术迭代，不断调整评估指标与算法权重，通过横、纵向数据对比分析评估改革成效与趋势，将数据结论实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改进建议，使干预策略回流至教学内容、干预方案、资源库建设等关键环节，形成教育教学动态更新的应用闭环。

四、结语

高职院校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转型，是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与教育数字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数智赋能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持续更新，且深刻影响教育理念、教育文化和教育生态[6]；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技术与教育的浅层叠加，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实证、从同质供给到个性适配、从碎片运作到全域协同、从静态评估到动态迭代的根本性转变，这既契合高职院校“岗课赛证”融合育人特点，又精准对接学生职业发展与心理成长双重需求。但数智赋能只是有益工具而非终身替代品，精准化教学改革仍面临技术鸿沟、算法偏见、人文关怀弱化、数据安全伦理等严峻挑战，且不同区域高职院校的实施基础存在差异，后续需有计划地针对各院校实际部署本地大模型，开展试点实践并持续优化实施路径。未来，高职院校应继续坚守育人初心，秉持以人为本、伦理先行、技术向善的原则，以技术迭代持续推动改革深化，重塑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新样态，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蓄力赋能。

参考文献

[1] 叶新东，刘泽民．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精准教学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J]. 远程教育杂志，2024, 42(01): 84−93.

[2] 刘艳萍，田金闪．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精准教学改革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36(06): 11−16.

[3] 穆肃，陈孝然，周德青．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需求、方法和发展 [J]. 开放教育研究，2025, 31(01): 61−72.

[4] 隆丽林，刘海妹，周逞丽．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健康安全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岗课赛证”融通教学改革 [J]. 现代职业教育，2025(16): 137−140.

[5] 苗园园．联动、贯通、融合：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 38(21): 55−57, 61.

[6] 尤晓燕．数智赋能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5, 40(05): 97−10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数智赋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C/2025/02/25）；苏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重点课题“数智赋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2025/JK/01/013/11）；2025 年度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校级教研教改课题“数智赋能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教学改革研究”（JG−202507）；2025 年度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委员会专项课题“数智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新生困境和对策研究”（25FYHZD026）。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研究

白金莉 程丽杰

摘要：新时代国家能源战略对石油石化装备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拔尖学生需兼具专业能力与家国情怀。本研究立足社会视域，聚焦西安石油大学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探讨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构建，分析其意义在于服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培养行业领军人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梳理现存问题为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不深、行业精神与家国情怀培育不足、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不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重专业轻素养。最后，提出构建“专业＋思政”双融课程体系、打造行业特色文化育人平台、建立校企协同实践创新基地、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建设高水平导师团队等路径，为培养有担当的行业拔尖人才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社会视域；石油石化装备；拔尖学生；铸魂育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多次强调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部署，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石油石化装备专业肩负着为行业输送领军人才的重任，拔尖学生的铸魂育人，不仅是专业技能的培养，更在于引导其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需求，比如未来参与油气勘探装备研发，需明白背后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当前，学校在培养中存在专业与思政“两张皮”、行业精神浸润不足等问题，部分学生对“为何学石油装备”“如何做行业领军者”缺乏深刻认知。

一、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意义

（一）服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的必然要求

国家能源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底线，石油石化装备作为能源勘探、开发与利用的核心支撑，其技术突破直接影响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西安石油大学石油石化装备专业的拔尖学生，未来将深度参与高端装备研发、关键技术攻关等任务[1]。铸魂育人体系通过强化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将个人专业追求与国家能源战略紧密结合，明白所学装备技术关乎油气田高效开发、关乎能源进口依赖度降低，从而在学习和实践中主动对标国家需求，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储备能力，成为支撑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实人才力量。

（二）培养行业领军人才的重要途径

石油石化装备行业对领军人才的要求，不仅是技术精湛，更须具备战略视野、创新魄力与行业担当，拔尖学生的铸魂育人，注重在专业教育中融入行业精神传承。比如通过学习老一辈石油装备专家“啃硬骨头”的攻关故事，激发学生“引领行业发展”的使命感。同时，通过实践创新训练与跨学科协作培养，提升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助力学生成长为既能突破技术瓶颈又能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填补行业领军人才缺口[2]。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

拔尖学生的成长，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更需要健全的人格与价值追求，铸魂育人体系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化浸润、实践体验等方式，帮助其在专业学习中理解“技术为何服务社会”。比如参与油田装备调研时，看到自己的设计如何改善一线作业条件，从而深化对“责任”的认知；在与行业前辈交流中，体会“奉献”对职业成长的意义，使学生不仅成为技术骨干，更成为有情怀、有格局的行业人才，满足其自我实现与奉献社会的双重需求，实现从“专业尖子”到“行业栋梁”的跃升[3]。

二、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一）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不够深入

西安石油大学石油石化装备专业的教学体系中，专业课程聚焦技术参数、设计原理等技术维度，思政课程侧重理论概念灌输，两者缺乏实质性衔接。比如“石油机械设计”讲解零件强度计算时，未关联“铁人精神”中“艰苦创业”的实践内核；思政课阐述“爱国”内涵时，未能结合石油工人扎根戈壁、守护油井的具体故事，让学生误以为专业学习与价值追求是两回事，难以将思政要求内化为专业行动的动力，导致“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

（二）行业精神与家国情怀培育不足

行业精神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多以抽象概念呈现，未深入挖掘背后的真实场景，如老石油人背着帐篷找油、在冰天雪地中抢修钻机的细节，学生感受不到那种“把生命融入石油”的坚守。再加上家国情怀未与行业使命绑定，没讲清楚石油装备技术对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作用，学生不清楚自己的专业如何服务国家需求，情怀培育流于口号，难以让学生产生“为行业担当”的情感共鸣。

（三）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不完善

实践环节中，大学生多为参观油田、观摩装备，缺乏让学生参与实际问题解决的设计环节，比如去长庆油田实习，只看钻井流程，未让学生尝试优化一个钻井工具的小部件。创新训练项目多为虚拟命题，未对接油田真实需求，开展“智能钻井系统”项目时，未考虑油田井下高温高压的工况。再加上指导教师多为校内教师，缺乏企业一线经验，无法指导学生将创新想法落地为可实施的方案，实践创新沦为“纸上谈兵”。

（四）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停留在“提供实习岗位”的浅层次，企业未参与课程体系设计，比如未把油田的“卡脖子”技术问题融入专业课程。同时，学校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把握不准，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不符合企业“能解决现场问题”的要求。究其原因，是协同育人的制度不完善，没有明确学生实践的学分认定标准，企业参与育人的动力不足，导致校企协同仅停留在“挂名合作”，未形成育人合力[4]。

（五）评价体系重专业轻素养

评价主要依据考试成绩、实验报告的完成质量，很少关注学生的家国情怀、团队协作能力，比如学生考试分数高，但对“石油人的责任”理解不深，也没参与过“能源科普进社区”的志愿服务。素养评价缺乏具体指标，“敬业”“友善”等品质没有可衡量的标准，导致学生重专业学习、轻素养提升，难以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行业人才。

三、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构建“专业＋思政”双融课程体系

聚焦石油石化装备专业特性与国家能源战略需求，以课程为载体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其一，推进课程内容重构，围绕机械设计制造、材料科学与工程、过程装备控制等核心课程模块，系统挖掘蕴含的思政元素。例如在“石油机械原理”课程中，结合我国高端钻井装备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突破的历史进程，解析关键部件设计中的工程伦理与科技自立自强精神；在“油气储运设备”教学中，融入“西气东输”“深海油气开发”等国家重大工程案例，引导学生理解能源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关联，通过将行业发展痛点、技术攻关故事转化为教学素材，使思政教育摆脱抽象说教，嵌入专业知识逻辑链条。其二，创新教学实施方法，采用问题导向式、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设计“技术难题破解—社会责任担当”的双轨任务。如在“压力容器设计”课程实践中，设置“高含硫气田设备抗腐蚀设计”课题，要求学生在完成强度计算、材料选型等技术任务的同时，分析设备失效对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的影响，撰写技术伦理分析报告，教师需同步提升思政转化能力，通过定期参加行业政策解读培训、企业实地调研等方式，精准把握专业领域的前沿动态与价值导向，确保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自然贴切[5]。

（二）打造行业特色文化育人平台

一方面，建设校内行业文化载体，依托学院展厅、实训基地等物理空间，系统展示石油装备发展历程、典型技术突破及行业楷模事迹，例如设置“装备强国”主题展区，陈列不同年代的钻井设备模型、关键部件实物，配套二维码链接技术攻关纪录片与人物访谈；在实训车间墙面嵌入“铁人精神”“苦干实干”等标语，结合设备操作规范讲解标语背后的奋斗故事。同时开发线上文化资源库，整合行业标准、技术史、劳模访谈等数字化内容，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还原老一代工程师在艰苦条件下研发装备的场景，增强文化感知的沉浸感。另一方面，建立文化实践活动机制，组织“行业前辈进课堂”“装备工匠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参与过重大装备研发的企业专家分享研发过程中的技术挑战与团队协作经历；开展“装备文化月”主题活动，组织技术史知识竞赛、“我的装备梦”主题演讲等活动，引导学生从行业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理论与实践结合，使行业精神内化为学生的职业信仰与价值追求。

（三）建立校企协同实践创新基地

首先，明确校企权责划分与合作机制，企业开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等真实场景，提供设备故障诊断、新产品测试等实践课题；高校负责组织学生团队、配备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实践方案。例如与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合作设立“智能钻井装备研发”实践项目，企业提供现场数据与技术需求，师生团队需完成传感器选型、控制系统调试等任务，过程中企业工程师全程参与指导，实时反馈工程实践中的规范要求与质量标准。其次，强化实践过程的育人功能，在项目中嵌入团队协作、责任意识培养环节，如要求学生以项目组形式开展工作，明确分工并定期汇报进展，企业导师重点考核任务完成的严谨性、沟通效率及面对技术瓶颈时的抗压能力。同时建立实践成果转化通道，优秀项目可纳入企业技术改进方案，或推荐参加行业竞赛，让学生在真实成果中获得成就感，通过校企资源的深度整合，使学生在实践中既提升专业能力，又深化对行业责任与职业素养的认知[6]。

（四）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机制

一方面，设定分层分类评价指标，专业能力维度重点考核知识掌握深度与技术创新潜力，通过课程考核、项目答辩等方式评估；思政素养维度关注价值认同与责任意识，依据学生在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参与度、技术伦理分析报告质量、团队协作表现等进行综合评判；实践创新维度侧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企业导师评价、项目成果转化情况为核心依据。另一方面，建立动态成长档案，全程记录学生课程学习、实践活动、竞赛获奖等数据，运用信息化平台实现评价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评价主体引入多元参与，除校内教师外，企业导师、项目合作方均需提供反馈，重点关注学生在工程实践中的职业态度与社会责任表现，评价结果不仅用于评优评先，更作为个性化培养的重要依据。针对思政素养薄弱的学生，推送行业文化课程与典型案例学习；针对实践能力不足的学生，匹配企业导师进行专项指导，通过评价机制的导向作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相统一。

（五）建设高水平导师团队

其一，优化导师选拔标准，优先选聘具有企业工程背景或参与过重大装备研发项目的教师，要求具备五年以上行业实践经历或主持过省部级以上产学研合作课题，同时建立校外导师库，吸纳企业技术骨干、劳模工匠担任兼职导师，重点考察其技术水平、育人意愿与沟通能力。其二，强化导师能力建设，定期组织校内导师参加企业实践培训，深入装备制造车间、油田现场参与技术攻关，了解行业最新技术与人才需求；面向全体导师开设“课程思政设计”“工程伦理教育”等专题研修班，提升将行业元素融入教学的能力；针对校外导师，开展教育教学方法培训，帮助其掌握课堂互动、项目指导的技巧。其三，完善导师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教学、科研、育人”三位一体评价体系，将指导学生成长、参与课程建设、推动校企合作等纳入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与职称晋升、绩效奖励直接挂钩，通过选拔、培养与考核的全链条管理，确保导师团队既能传授前沿专业知识，又能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7]。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围绕社会视域下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构建，分析了意义、问题与路径，强调需通过“专业 + 思政”双融课程强化价值引领，这些路径紧扣行业需求与学生特点，既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也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研究结果为西安石油大学深化铸魂育人改革提供了方向，也为同类高校培养“懂专业、有情怀、能担当”的行业拔尖人才提供了参考，助力为国家输送更多支撑能源安全的领军力量。

参考文献

[1] 崔静，周红飞．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大思政课”铸魂育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 [J]. 河南教育（高教），2025(09): 33−34.

[2] 张琪，魏守宽，徐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铸魂育人的时代价值、问题分析与路径探究 [J]. 卫生职业教育，2025, 43(18): 24−27.

[3] 龚宪芳，张华．“时代新人”视域下高校铸魂育人实践研究 [J]. 成才之路，2025(26): 1−4.

[4] 白馨月，李时平．“艺术 + 思政”铸魂育人发展路径研究——以平塘县平里河小学为例 [J]. 中国军转民，2025(17): 134−136.

[5] 夏正清，沈正虎，韩志刚．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铸魂强师与铸魂育人在立德树人事业发展中的有机联动 [J]. 甘肃教育研究，2025(17): 120−122.

[6] 韦积华，赖文芳，付红珍，等．基于铸魂育人的“一坚持、三融入、四覆盖”实践育人模式探索 [J]. 科学咨询，2025(16): 14−17.

[7] 倾情关爱下一代 铸魂育人担使命 走进黑龙江职业学院关工委 [J]. 心系下一代，2025(08): 64−6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西安石油大学 2024 年度“立德树人”研究课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及养成路径研究——以西安石油大学为例”（LD202413）；西安石油大学 2024 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石油石化装备专业拔尖学生铸魂育人体系”（XYYB202404）。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与教学管理协同机制构建研究

何采霏 林咏君

摘要：在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高职院校职业生涯教育面临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教学管理机制僵化、实训资源不足等现实挑战。本研究分析了课程滞后产业迭代、实训平台资源不足和管理制度僵化等现状，揭示了教学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脱节的核心矛盾，以协同理论为指导，提出要构建“四位一体”教学管理协同机制，通过产业导师动态管理、课程进阶式重构、实训基地生产化改造和数字化资源共享四大核心策略，强化学生职业认同感，提高岗位适应能力，推动职业生涯教育从“理论主导”向“实践赋能”转型，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产教融合；教学管理；协同理论；高职教育；职业生涯规划

一、职业生涯教育的现状与教学管理协同理论

传统模式下，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往往偏重理论传授，缺乏与真实职业环境的深度融合。因此，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理论学习中，难以对职业岗位形成清晰的认知，容易对个人职业发展方向感到模糊。与此同时，现有的教学管理机制相对固化，对产业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反应较慢，造成人才培养与岗位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学生对企业实际工作流程、岗位能力要求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认识上；另一方面，教学管理系统在资源整合、过程设计和质量监控等方面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制约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

协同理论强调系统内各子系统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间相互影响、制约与协作而逐渐趋向有序整合，最终产生“1+1>2”的整体效应[1]。协同理论应用于教学管理的机制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就业能力。本研究以构建教学管理协同下校企合作驱动模式（见图 1），畅通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实训基地等方面协同合作为目标，通过制定产业导师管理机制、课程动态重构机制、实训基地改造机制和数字资源共享机制四大核心机制实现协同效应，产出高质量的合作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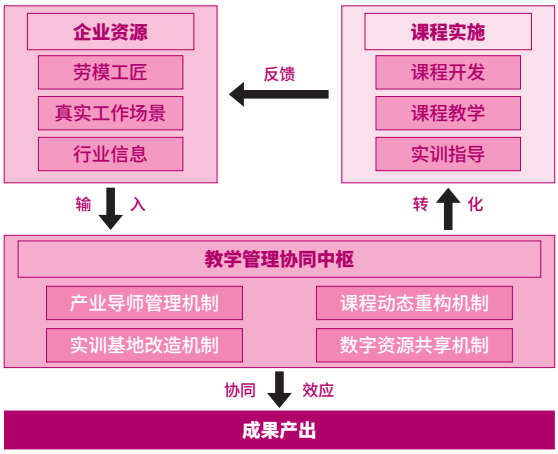


图 1 教学管理协同下校企合作驱动模式

因此，本研究通过探索“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与教学管理协同机制系统化构建，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实施路径设计，推动职业生涯教育从“理论主导”向“实践赋能”转型。

二、问题分析：教学管理与课程体系的协同失效

（一）“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目前高职院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中，仍然存在注重理念知识讲授而忽略真实职业岗位介绍的现状。这种教学方式让许多学生难以形成明确的职业目标认知，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无法形成清晰认知。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单纯依靠课堂理论讲解，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行业岗位群一无所知，往往容易违背职业生涯教育的初衷。因此，造成课程教学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课程内容滞后于新兴产业群的迭代变革

传统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仍以 MBTI、兴趣岛、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生涯理论和通用性技能为主，对智能机器人、区块链、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群的岗位链变化、岗位能力需求分析严重不足。因此，

从某“双高”职业院校经验可知，课程更新速度需要快于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否则学生面对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时，在传统职业课程中所学的知识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求职工具。

2. 课程教学模式仍是单向灌输

目前，高职院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模式仍然存在“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向知识灌输问题[2]。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这种单向传递的教学方式效果并不理想。课堂教学缺乏情景模拟、岗位体验等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参与学习环节，学生只能机械地记忆知识，这样既没有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也没有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导致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场景[3]。学生认为缺乏互动和实践的课堂，学习积极性容易大打折扣。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为例，虽然教师会指导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设定职业发展目标，但由于缺乏真实职业环境体验，学生对职业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最终难以适应实际岗位的需求。

3. 课程评价方式单一，缺乏实践引导

目前职业课程的评价体系仍存在明显问题。学校主要采用书面考试来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仍然以试卷分数作为学生评价的标准，却往往忽略对他们进行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胜任力的考核。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评价方式，导致很多学生出现“高分低能”状况，虽然考试成绩不错，但实际工作能力不达标，导致无法胜任岗位工作[4]。因此，高职院校需要改革评价体系，增加实践考核比重，全面评估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产业需求侧与教学供给侧脱节

部分高职院校由于长期与产业发展信息不通，人才培养的成效很不理想，往往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明显差距。企业在招收毕业生后，发现其就业能力与企业岗位需求不匹配，缺乏实战经验和岗位胜任能力。相反，毕业生则反馈在学习就业课程时，发现课程提供的就业岗位信息与实际工作岗位能力需求有偏差，导致他们难以快速适应工作。这种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校企双方岗位信息传递不畅

校企合作的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校企双方信息传递不到位。一方面，企业提供的招聘信息过于简单，没有详细说明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另一方面，学校就业网站更新不及时，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求职指导。由于缺乏精准的岗位信息，学生在求职时难以有针对性地投递简历，最终影响了就业成功率。

2. 校企对能力标准要求不一致

校企双方对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要求存在差异。由于高职院校与企业缺乏深度的校企合作和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作为支撑，往往课程目标未能融入行业论证体系，如智能制造岗位的工业机器人操作认证等体系。因此，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技能培养要求有差别，企业需求与教学内容脱节，学生难以获得工作岗位所需技能，进一步加剧就业难题。

3. 实训平台资源不足

实训基地是连通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的重要平台，但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实训资源建设明显跟不上学生的实训需求。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硬件投入与产业升级的矛盾

当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比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生产线每2~3年就会升级一次。但很多职业院校的实训设备更新周期要长达5~8年，导致出现学生学习的操作标准在企业已被淘汰的情况。

（2）空间隔离与情境缺失的矛盾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都设在校内，实训环境与生产一线真实环境存在一定差距，缺少真实生产环境的噪声、跨部门团队协作等关键工作要素。学生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实操学习，就如“温室育苗”进入企业后容易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需要更长的岗位适应期。

（3）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

头部企业合作基地集中在少数热门专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对应的专业群，相比之下，传统专业的实训机会明显不足，导致这些专业学生的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加剧就业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化校企合作，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实训平台建设。同时要建立实训资源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实训设备与产业更新同步，以缩短学生岗位适应周期，提高就业竞争力。

4. 固化教学管理制度约束

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制度与产业动态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专业调整机制僵化

部分高职院校自办学以来，专业设置基本没有变化，部分专业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未能及时满足新兴行业的发展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同时，院校行政管理制度僵化，流程复杂，专业调整需要经过层层多级审批，往往耗时过长，错失开设适应市场需求专业的最佳时机。因此，这种行政机制也大大约束了教师在跨学科领域的流动，对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优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2）师资评聘导向偏差

教师职称晋升评定过程中，学校过于看重论文发表、科研课题等学术性指标，往往对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开展教学改革等实际工作重视不够。此评价导向容易导致很多教师缺乏深入产业一线进行实践锻炼的动力。

（3）实习管理浮于表面

部分高职院校的实习管理缺乏统一标准和有效监督，产业导师对学生开展实训指导质量参差不齐[5]。部分企业为实习生制定了系统化的培养计划，仍有企业在学生实习期间只安排其从事基础性工作，使他们难以获得真正的岗位锻炼。

三、构建“四位一体”教学管理协同机制

（一）构建产业导师管理机制，打通“双导师”协同通道

解决传统师资脱离产业发展的问题，需要建立完整“选拔—管理—激励—评价”全流程产业导师管理体系，以实现产业导师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首先，建立产业导师库，制定产业导师动态入库机制和分类管理机制，以资历、专长、教学能力等多个维度选拔适配专业（群）发展的产业导师，根据产业导师的产业领域、岗位类别、专业方向等进行分类管理，确保各产业导师技能领域能覆盖专业群对应的岗位群。其次，推行“双导师”教学模式。让校企导师双方共同参与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和生涯规划等环节，使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再次，完善激励措施。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导师开展产学研项目，将企业实践成果纳入职称评定，对考核优秀的导师给予奖励，提高参与积极性。最后，建立导师评价体系。通过校企双向反馈机制定期评估导师教学质量，并将评估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持续优化导师队伍。

（二）构建课程重构机制，培养三层进阶式能力

基于舒伯生涯发展理论，通过建立“认知—探索—决策”三层进阶式能力培养模式，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课程重构，以此帮助学生系统全面了解职业生涯路径。首先，大一阶段，培养学生对职业岗位的认知能力。在课程设置方面，引导学生参与企业体验周、行业分析报告讲座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探索认识产业全流程，逐步构建起自身的职业规划生涯图。另外，在学生竞赛方面，举办职业规划大赛，鼓励学生以赛促学，在参赛过程中提高对产业理解和职业目标的认知能力。其次，大二阶段，探索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模式。以职业岗位技能为切口，对专业课程进行模块化重构，搭建“通识教育—专业基础—岗位技能—综合技能—岗位实操”五级岗位能力培养模型。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使课程内容与岗位要求高度匹配，让学生能通过岗位能力培养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最后，大三阶段，强化学生的决策执行力。大部分学生在真实岗位完成真实项目，接受企业真实考核后，他们的就业决策执行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通过这三个阶段的递进培养，形成完整的“认知—能力—实践”培养闭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三）构建实训基地改造机制，打造真实教学场景

实训基地的转型升级需实现从模拟操作区到生产教学复合体的本质跨越，通过硬件升级与资源优化联动，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流程的深度嵌合[6]。第一，硬件升级层面，构建“生产区—教学区—研讨区”三区联动空间，生产区配置真实产线设备，教学区嵌入理论讲解节点，研讨区开展反思优化活动，形成“实操—认知—升华”的闭环学习场景。第二，资源优化，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和开发跨专业共享平台，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让学生可直接参与项目实践，提升实践能力，同时实训平台的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

（四）构建数字化资源共享机制，智能匹配人才供需

建设“产业数据库 + 人才供需平台”双核驱动的数字化生态系统，通过数据融合与智能应用破解人才供需信息壁垒。第一，数据整合层面，产业端接入企业岗位数据库，教育端构建涵盖学业成绩、实践记录、素质测评的学生能力画像，形成双向数据流。第二，智能应用层面，实施资源精准推送，当学生定位新能源岗位时，资源引擎自动关联对应企业案例库；针对技能缺口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料。通过数字化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学生能力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有效缩短人才培养周期。

四、实施成效

通过构建“四位一体”教学管理协同机制，职业院校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学生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毕业生职业目标、就业竞争力和职业认同感均有所提高。其次，实习就业成效突出。实习生岗位适应周期明显缩短，录用率不断提高。最后，校企合作实现质的飞跃。合作项目总量、毕业生就业率和企业满意度均持续攀升。

五、结语

在产教融合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为更好地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质量，探索构建“四位一体”教学管理协同机制是有效的路径。本研究通过提出构建教学管理协同机制，主要通过产业导师深度参与、课程进阶式重构、实训基地生产化改造及数字化平台智能匹配四大协同机制，助力教育教学改革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实践证明，协同机制为高职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有效促进学生职业能力与岗位需求的对接，同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推动了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实现了学生、院校与企业的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 刘晶晶 . 基于协同理论的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 [D].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 , 2019.

[2] 耿鹏，包永强，童莹 .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实践教育策略研究 [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 2024(05): 176−179.

[3] 王建 , 陆颖 . 协同理论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拓展机理研究 [J]. 江苏科技信息 , 2025, 42(01): 74−78.

[4] 齐媛媛 . 协同理论视角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机制的建构 [J]. 黑龙江科学 , 2022(05): 47−49.

[5] 梅瑜娟 , 朱华兵 . 基于协同理论的高职产教融合创业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J]. 职教论坛 ,（下转 174 页）

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路径
——以华为公司案例融入数字化教材为例

王汝泉 王贤辰 何健标 *

摘要：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是破解课程思政“碎片化、不聚焦”困境的关键载体。本研究聚焦于“跨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企业文化视角下构建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思路，以华为公司为典型案例，探索企业文化中的思政元素融入数字化教材的实践路径。通过构建国家、行业、公司、个人的“四维遴选”标准，全方位、系统性地挖掘企业文化中的思政元素。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库、思政元素库与教材案例库“三库联动”的跨课程思政案例库，为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不聚焦”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关键词：企业文化；跨课程；思政案例库；华为公司；数字化教材

一、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实践背景与必要性

（一）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实践背景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深入实施，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1]。以往课程思政建设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各专业课程的思政案例分散、缺乏遴选标准，难以形成思政合力。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环节，更需要从单一课程思政向跨课程思政教育转变，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思政教育应更加突出产业技术变革、更加贴近行业实践[2]。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其课程思政必须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在信息技术领域，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新技术为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典型案例，从企业文化视角提炼思政元素、遴选思政案例，能够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行业实践，更加符合职业教育的特色定位。

（二）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必要性

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不聚焦”问题[3]。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类专业中，由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更新，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提炼面临更大挑战。因此，本文提出构建以企业文化为视角的跨课程思政案例库，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构建跨课程思政案例库是破解课程思政“碎片化”困境的关键路径。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应用特征和行业特征，其课程体系由多门专业课程有机组成，各课程之间存在关联性[4]。构建跨课程思政案例库，能够打破课程之间的壁垒，将分散的思政元素融合为有机的整体，形成思政育人的协同效应[5]。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华为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其企业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

（上接 173 页）2021, 37(06): 78−83.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EB/OL]. (2023−06−13)[2025−09−19].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306/t20230613_1357514.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研究课题“‘慢就业’背景下高职院校提升就业指导效果和效率的策略研究”（2023SQ01）。

（作者单位：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为本，长期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自我批判”的管理思想，以及“不断超越”的精神追求。这些元素与国家战略、行业发展、企业创新、个人职业素养高度契合，为构建跨课程思政案例库提供了典型素材。

二、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关键问题

（一）企业文化遴选标准的缺失

现有课程思政案例库多聚焦于新闻事件、历史典故、英雄事迹等传统素材，缺乏对企业文化中思政元素的全方位、系统性挖掘和提炼，导致案例没有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行业性。与此同时，课程思政案例库缺少统一的遴选标准，难以涵盖国家、行业、企业和个人等多个维度。

（二）跨课程思政案例整合的困境

专业课程之间的思政案例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形成思政育人的协同效应。在信息技术类专业中，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移动 App 开发、小程序等相关的课程均为独立开设，课程思政案例极易出现重复性建设，学生在不同专业课程中接触到的思政内容“零散、失焦”，难以形成对“科技自立自强”“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的系统性、整体性认知。

（三）思政案例融入数字化教材的难点

数字化教材作为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重要载体，如何将思政元素恰当地融入数字教材，避免生硬地融合，实现“隐性思政”效果，是编写教材的主要难点。因此，不同于传统教材，数字化教材的思政案例要包含在演示视频、交互式动画、虚拟仿真平台等数字资源之中，这对教材编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路径

数字化转化，构建多维度案例呈现体系。将华为案例转化为“文字 + 视频 + 互动模块”的数字化形态，文字部分提炼技术突破背后的文化逻辑，视频嵌入华为研发场景实录，互动模块设计“如果我是华为研发者”等讨论题，适配线上线下跨课程教学场景。

跨课程适配，实现案例与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在计算机专业课程中，结合华为技术案例讲解技术原理，渗透“科技报国”理念；在通识类课程中，分析华为管理模式，传递“诚信经营”价值观；在思政课中，以华为案例为切入点，深化学生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形成跨课程协同育人闭环。

动态更新，建立案例库长效优化机制。跟踪华为最新技术成果与文化实践，定期更新案例内容，同时收集师生使用反馈，调整案例呈现形式与融合方式，确保案例库始终贴合教学需求与时代发展。

（一）华为公司企业文化提炼

华为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公司近四十年的创业史紧密交织。自 1987 年创立以来，华为公司从代理香港公司交换机起步，到 1990 年推出首款自研交换机 BH01，标志着其从代理向自主研发的转型，奠定了“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化基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华为公司开启了系统性的管理变革。1997 年，引入 IBM 公司 IPD（集成产品开发）体系，推动研发管理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变。1998 年，《华为公司基本法》正式通过，将公司核心价值观和管理原则制度化，为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2000 年，华为公司举办“发放呆死料与反思交流大会”，通过将积压物料当众销毁，深刻反思质量与管理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客户负责的质量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2009 年，华为公司推出首款智能手机 U8220，并启动麒麟芯片的研发，标志着其向自主核心技术领域进军。2019 年，面临巨大的外部环境挑战，正式发布鸿蒙操作系统，体现了华为公司在逆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的企业文化。

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始终与企业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紧密相连。从早期拼搏创业，到引入 IPD 体系实现规范化管理，再到遭遇制裁后加速孵化自研技术，其文化内涵一直在不断地演进，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资源，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企业成长与国家战略、行业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

（二）构建“四维遴选”标准

构建国家、行业、公司、个人“四维遴选”标准是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关键路径。依据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特点制定出一套遴选标准，确保入选的思政案例既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特色，又能突出信息技术领域的特点。

国家维度遴选标准。要求体现国家战略，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聚焦国家战略，选取体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等战略举措的实践案例。在华为公司案例中，选取仓颉编程语言、鸿蒙操作系统等信息技术领域的“根技术”，这些案例直接反映出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志。

行业维度遴选标准。要求聚焦行业发展，具有示范性和创新性，关注产业变革和技术创新，选取体现“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等具体行业的实践案例。在华为公司案例中，选取鸿蒙系统在政务、金融等行业的应用方案，这些案例生动诠释出“万物互联”在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公司维度遴选标准。要求聚焦企业文化，具有思想性和精神性，挖掘企业保持创新活力的管理实践。在华为公司案例中，选取“自我批判”“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等公司经营理念，这些案例充分体现出“自我批判”的管理思想和“不断超越”的精神追求。

个人维度遴选标准。要求聚焦职业素养，具有教育性和实践性，注重塑造学生的职业素养，选取体现“服务意识”“工匠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实践案例。

在华为公司案例中，选取“客户至上”“艰苦奋斗”等公司文化，这些案例展示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价值塑造。

四维标准有机一体、关联互补，确保思政案例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四维评估表”对案例进行综合评估，确保遴选出高质量的思政元素。

（三）“三库联动”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构建企业文化库、思政元素库与教材案例库，实现三者深度融合，提出“三库联动”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企业文化库。广泛收集华为公司等信息技术头部企业的发展历程、管理实践、社会影响等资料。在实践中，建立若干个企业文化库，涵盖企业历史、管理变革、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内容。

思政元素库。按照“四维遴选”标准对企业文化库进行分析，挖掘思政元素。从华为企业文化库中提炼出百余个思政元素，涵盖国家维度、行业维度、公司维度和个人维度，构成全方位、系统化的思政元素库。

教材案例库。将思政元素库与数字教材融合，设计出“隐性思政”的教学案例。通过《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鸿蒙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和《微信小程序开发（AI 版）》等专业教材，开发出数十个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每个案例都由案例背景、思政元素、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等要素构成。

通过“企业文化库→思政元素库→教材案例库”的转化流程，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例如，在《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中，从企业文化库中挖掘出“华为将‘二战’时期的飞机作为逆境奋斗的精神象征”，经思政元素库遴选之后，转化为公司维度的思政案例，最终融入教材的序言章节。

“三库联动”的课程思政案例库，确保入选的思政案例既有职业教育的特色，又有信息技术领域的特点，使思政元素更自然地融入专业课程，达到“隐性思政”的教学效果。

（四）跨课程的数字化思政资源

数字教材可嵌入演示视频、交互式动画、虚拟仿真平台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开发一系列的跨课程数字化思政资源，形成完整的教学资源共享包，实现在信息技术领域多门课程之间共享使用。

《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与《鸿蒙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共享“科技自立自强”数字化资源。两本教材均使用“仓颉编程语言”和“鸿蒙操作系统发展历程”案例视频，但侧重点不同。《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侧重国家维度，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鸿蒙软件开发综合实训》侧重行业维度，展示鸿蒙系统如何赋能多个行业数字化转型。两本教材通过共享数字化资源，从不同维度诠释“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形成跨课程的育人合力。

《鸿蒙软件开发综合实训》与《微信小程序开发（AI 版）》共享“客户至上”数字化资源。两本教材均使用“华为终端客户服务小程序迭代”交互式动画，但教学设计不同。《鸿蒙软件开发综合实训》从公司维度，展示华为公司通过迭代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微信小程序开发（AI 版）》从个人维度，引导学生理解“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驱动产品保持创新力。两本教材通过共用数字化资源，从不同角度诠释“客户至上”的思政案例，达成协同育人效应。

《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与《微信小程序开发（AI 版）》共享“开发者职业素养”数字化资源。两本教材均使用“AI 智能编程”虚拟仿真平台，但教学目标不同。《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培养程序设计的基本素养；《微信小程序开发（AI 版）》培养 AI 辅助开发的基本技能。两本教材通过使用数字化资源，从不同技术维度阐释“开发者职业素养”的思政内涵，培养信息技术领域的通用技术技能人才。

四、结语

本文通过企业文化视角下跨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实践，构建“四维遴选”标准、提出“三库联动”机制、开发跨课程的数字化思政资源，使思政元素更自然地融入专业课程，达到“隐性思政”的教学效果。为解决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碎片化、不聚焦”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进一步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邱仁富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理论阐释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18(04): 109−113.

[2] 殷哲浩 .“三教”改革视域下高职院校实施课程思政的探索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2021(14): 76−80.

[3] 于歆杰 . 理工科核心课中的课程思政——为什么做与怎么做 [J]. 中国大学教学 , 2019(09): 56−60.

[4] 余江涛 , 王文起 , 徐晏清 . 专业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逻辑及其要领——以理工科课程为例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18(01): 64−66.

[5] 陆道坤 . 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18(03): 64−6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基于‘五金’联动的信创产业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2025GXJK0723）；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2025 年校级重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企业文化的课程思政要素体系建构问题研究”。

（作者：王汝泉、王贤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专任教师；通信作者何健标，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教育学院副院长）

“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究
——以山东省村（社区）干部学历教育为例

刘炳男

摘要：“社会学概论”是（社区）干部学历教育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其教学改革对培养有社会学想象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实践创新能力的（社区）干部意义重大。本文依据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从需求与供给、组织与技术、守正与创新、成效与评价、素养与能力、服务与保障六个方面，系统搭建了“社会学概论”课程改革的策略体系。改革策略注重借助精准的学情分析来优化教学内容供给，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强化教学互动，在传承学科经典之际创新教学方法，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衡量真实学习成效，并且依靠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以及改善教学条件为改革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借助这一全面且可操作的改革框架，推动“社会学概论”课程从“知识灌输”转变为“素养与能力赋能”，为达成（社区）干部学历、能力双提升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村（社区）干部学历教育

一、引言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转型，数字化浪潮、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基层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学概论”课程作为山东省村（社区）干部专科学历教育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引导学生系统认识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与社会问题的入门钥匙，承担着训练理论思维、培养社会洞察力的重要使命。然而，面对村（社区）干部复杂的工学矛盾，传统的教学模式面临显著挑战：教学内容往往偏重西方理论而与基层社会现实脱节；教学方法多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难以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教学评价侧重于期末知识的记忆性考核，无法有效衡量学生分析、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些困境导致课程教学与学生成长需求、岗位履职能力提升需要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教学改革。

二、“能力＋学历”双重培养目标下“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逻辑起点

（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的需要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迈进，社会工作作为改善民生服务以及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结构性要素，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全面规划之中。当下“大社会工作”格局正逐步构建，这为该领域的发展营造出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也对相关的教育体系、研究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1]。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系统以及问题领域正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像数字弱势群体的出现、服务形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离现象，以及服务需求的瞬间变化等新型业态，这些变化急切需要基层干部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达成知识互构以及能力对接[2]。根据政策导向与社会需求这两个维度，把“能力、学历同步提升”确定为课程体系改革的核心原则，既要推动学员的全面发展，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社会进步以及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达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资源的系统性革新与整体性提升。

（二）新发展阶段调整“社会学概论”课程目标的要求

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学概论”是其基础必修课程，为学生后续专业学习搭建起系统的认知架构，在培养学生解读社会现象的能力、分析社会问题的技巧以及社会工作实务技能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这门课程把“社会运行论”当作理论主线，结合“社会转型论”的分析角度，借助“微观—中观—宏观”以及“静态—动态”的双维分析框架，系统地阐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演变趋向。针对村干部教育这

特殊培养对象，该课程在保持理论深度的同时，更要重视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的协调发展，将价值引领、品德培育和能力提升有机融合到教学目标中。课程设计要培养学生对社会问题成因与现状的系统分析能力，又要借助引入前沿研究成果、开展田野调查等实践环节，提升学生的感性认知水平，培育其科学严谨的实证精神，并且引导其深入思考社区服务领域面临的新挑战、新趋势以及创新实践路径。

三、“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路径

（一）需求与供给：基于学生需求优化教学设计

在需求分析这一环节，任课教师可运用多种方式展开全面调研。比如说，借助开学之前进行的学情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学习期望以及兴趣点，采用小组座谈的形式，收集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特定需求，依靠“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的数据分析，追踪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遇到的难点。依据这些调研所得到的结果，教师可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作出调整，以此保证课程供给与学生需求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同时，教学设计可以参考成果导向教育模式，将其作为教学设计的有效框架。从期望学生达成的学习成果着手，去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以及方式。以《社会分层与流动》这一章节为例，期望学生达成的学习成果有：有条理地阐释社会分层的主要理论，可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现象展开分析，还可运用相关概念工具去解读社会不平等问题。依据这些预期成果，教师可以设计一个覆盖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以及研究实践这三个环节的教学单元，让学生在知识、能力以及素养这三个维度实现均衡发展。

（二）组织与技术：瞄准教学过程加强教学互动

教学过程当中的组织以及互动属于达成“社会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关键要点，它的核心之处在于借助科学的教学组织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打破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构建起双向互动的学习共同体[4]。这样的转变需要教师对课堂结构以及教学流程加以优化，并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来提升互动的质量和效率。传统的讲授式课堂大多时候会出现“教、研、用空间分离”这种情况，也就是理论教学、研究探讨以及实践应用相互之间出现脱节。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采用“对分课堂”模式，把课堂时间合理地划分为讲授、内化以及讨论这三个环节。以《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这一章为例，先是由教师详细讲解核心概念以及理论，接着学生独立进行内化吸收，并且借助绘制个人社会网络图等形式来加深理解，最后在小组讨论中分享见解以及应用实例。这种有条理的课堂组织保证了知识传递、思维训练以及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让学生在每个环节都可保持较高的参与度。

教学互动质量提升，还需依靠情境化教学场景的构建。社会学的概念以及理论大多来源于对真实社会生活的观察，教学互动应当尽可能还原社会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理解社会运行的逻辑。比如在讲授“社会制度与政策”相关内容时，可以设计模拟听证会活动，将学生分成小组扮演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方、社会学家等不同的角色，针对某一社会政策（如三孩政策、住房政策）展开辩论协商。这样的角色扮演和模拟，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制度运作机制的理解，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思维以及表达能力。

（三）守正与创新：依循传统基础革新教学方法

守正就是坚守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以及方法，以此来保证学生可以掌握学科的基础知识体系，创新则是要求教师依据时代的变化以及村（社区）干部的学习特点，持续革新教学的方法与手段，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案例教学法是实现守正以及创新的有效办法。经过精心挑选的案例可以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形象的内容，让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易懂，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领会社会学知识。在“社会学概论”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可以构建起本土化的案例库，收纳那些反映中国社会特征的典型案例。比如，在讲解“社会分层与流动”相关内容时，可以引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机会平等以及职业地位获得等本土研究；在探讨“社会制度与政策”时，可以对中国基层治理制度的演变以及创新展开分析。

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创新是培育学生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所在。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理论知识唯有经由实践应用才可切实实现内化。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多层次的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引入到课堂中，同时也将课堂拓展至社会场域。举例来说，在《社区与城市化》这一章节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区漫步活动，让他们去观察社区的空间布局、设施配置以及人群活动情况，还可以对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最终形成社区分析报告。这种依靠实践的学习方式可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应用理论知识，培养他们发现、分析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四）成效与评价：根据学习行为构建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在课程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会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投入程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以“学历 + 能力”双提升作为培养目标的村（社区）干部学历教育课程评价改革而言，应构建关注学习过程、能力发展以及实际成效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借助评价引导并激励学生深度参与学习活动。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为教学评价改革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指引。成果导向教育模式着重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及“注重产出”，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经过学习实际所能达到的能力水准上。参考这一理念，“社会学概论”的评价设计应当从预期的学习成果着手，反向设计评价的内容与方式。举例来说，如果把“可运用社会学概念去分析社会现象”作为核心学习成果之一，那么评价就不应局限于概念记忆，而应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概念阐释

现实的能力。如在《社会分层与流动》这一章节中，可让学生去收集以及分析本村（社区）的社会流动数据，撰写小型的分析报告。在“社会问题与治理”模块，可设计情境模拟题目，以此考查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问题以及提出治理对策的能力。这种以能力为基础的评价更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效，而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会促使学生把学习重心转移至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上。

（五）素养与能力：始于教学实践建设教师团队

教师在课程改革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教师的专业素养以及教学能力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效[5]。“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的改革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掌握现代教学理念与方法，并且可以把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强化教师团队建设，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成为推进课程改革的关键措施。

教师团队建设应当把教学能力的提升作为核心要点，要定期开展教师培训以及集体备课等教学活动，邀请该学科方面的专家或者具有丰富经验的同行来分享教学理念和方法。比如，针对“社会分层与流动”这个教学难点，可组织专题教研活动，探讨怎样借助案例教学、数据可视化等方式来增强教学效果。对于《社会制度与政策》等理论性比较强的章节，可以交流怎样依靠情境模拟、政策分析等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这样有针对性的培训有利于教师持续更新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校际合作以及资源共享是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关键途径。省内各个教学点可构建教师发展联盟，定期举办教学观摩以及经验交流等活动。比如“跨校教学团队”的建设工作，各教学点的教师可共同建设案例库、共享视频资源、合作编写教材等，以此来达成优势互补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服务与保障：依照教学需求改善教学条件

教学条件得以改善是支撑“社会学概论”课程改革可顺利推行的物质基础及制度保障。学校需要依据课程改革实际产生的需求，对教学资源配置展开系统的规划并持续进行优化，构建有利于师生之间互动、实践教学以及技术应用的教学环境，为课程改革提供全面的支持。

硬件设施实现升级是改善教学条件的最为关键的任务。传统布局中配备固定座椅对于开展小组讨论以及互动教学存在着诸多不利之处，有相应条件的教学点可优先考虑对一批智慧教室、案例讨论室以及社会模拟实验室进行改造或者建设。智慧教室当中配备可移动桌椅、多屏显示以及无线投屏等设备，支持学生灵活进行分组以及教师开展多种教学活动。案例讨论室应当采用圆桌式的布局方式，以此营造出一种平等交流的良好氛围。社会模拟实验室可以配备虚拟现实（VR）设备，借助这些设备来模拟社会场景以及相关过程。举例来说，当讲解“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相关内容时，学生可在模拟实验室里观察群体动力学现象；而在探讨“社区与城市化”相关内容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漫游不同社区类型，直观感受城乡空间的差异。这些现代化教学空间在提高教学技术含量的同时，还为互动式教学提供了场所保障。

实践教学基地的构建对于强化社会学的应用性是极为关键的保障。社会学作为一门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多呈现出“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态势。为了扭转此种情形，学校应当主动和社区、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等构建长期的合作关系，打造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举例来说，可以和学员所在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委会展开合作，创建社区研究基地，以供学生开展实地调研；还可以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设立服务学习基地，促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四、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改革属于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需求分析、教学互动、方法创新、评价改革、团队建设以及条件保障等多个不同方面共同推进，从而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学想象力、社会责任感以及社会实践能力，达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以及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为培育新时代所需的社会学人才筑牢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1] 严骏夫，康会杰．新文科建设视域下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5, 8(06): 57−59.

[2] 严骏夫，康会杰．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课程改革中的应用探索——以“社会服务管理”课程为例 [J]. 科教文汇，2024(09): 115−118.

[3] 杜培培．基于“三社联动”的“社会学概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以安徽大学为例 [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09): 56−58.

[4] 姜梅．基于课程思政视角的“社会学概论”考核改革实践 [J].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24, 32(01): 102−112.

[5] 陆斌．基于“职业岗位培养模式”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J]. 信息与电脑，2025, 37(20): 182−1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山东开放大学2023年科研发展项目“基层干部学历教育‘能力＋学历’双驱动下的‘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2023JCJC006Z）；2024年度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指委科研课题“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基层干部人才培养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2024045）。

（作者单位：山东开放大学）

思政引领下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

秦　奇　吴　媛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数字营销行业的蓬勃兴起，在高校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中，强化思政引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针对思政引领下高校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相关情况展开探讨，明确筑牢思想根基、锚定育人方向、提升行业服务效能的核心价值，同时提出目标锚定、内容融入、方法创新、平台搭建、评价完善的实施路径。为高校开展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改革实践提供参考借鉴，进而推动数字营销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和数字经济高质量推进。

关键词：思政引领；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围绕国家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数字营销行业的发展得到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企业运营模式的重塑以及营销策略的创新。高校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目前已难以满足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企业对数字营销人才的需求，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高校必须积极应对这一趋势，加快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步伐，以满足社会对高质量、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1]。

一、思政引领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价值

（一）筑牢创业人才思想根基

思政引领是高校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其核心作用为创业人才筑牢思想基础。高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以及诚信经营理念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价值观和义利观，抛弃急功近利的短浅眼光，坚守创业的初心及行为底线。在数字营销行业迅速迭代、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坚定的理想信念可以帮助学生抵御创业中的风险诱惑，增强克服险阻的韧性与自制力，确保其在创业道路上保持正确的方向，为长久进步夯实思想基础[2]。在以流量为上、信息过载的数字环境中，思政教育给予的诚信、坚守与担当理念，培养细致打磨的匠心与坚韧不拔的定力，为创业之路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驱动力。

（二）锚定数字营销育人方向

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兼具技术性与社会性，思政引领可以精准锚定育人方向，防止人才培养陷入重技术轻价值的误区。高校以思政方向为指引，将社会责任感、行业使命感以及数字营销专业教育进行深度融合，明确人才培养不仅需要传授流量运营、内容策划、数据分析等专业技能，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洞察力以及价值判断能力[3]。同时引导学生将创业实践与社会需求相配合，借助数字营销手段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此导向使人才培养更具温度与深度，为行业输送兼具专业能力及家国情怀的优秀创业人才。思政引领下的育人路径方向，更加重视技术向善的价值指引，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字营销技术不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载体。

（三）提升行业人才服务效能

思政引领可以有效提升数字营销创业人才的综合素养，进而增强人才在行业发展中的服务效能。高校依靠思政教育赋力，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协同精神与责任担当，使其在创业过程中不仅重视经济效益，更关注行业规范和社会效益。拥有思政素养的数字营销创业类人才，可自觉遵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抵制不实宣传、恶意竞争等不良行为，助力行业生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4]。此类人才更易把握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契机，使创业项目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匹配，为行业创新进步注入新动力，实现个人价值与行业价值同步提升。在数字经济全球化与规范化的双重趋势背景下，具有思政素养的数字营销创业开拓者，可以更迅速地把握国家政策，其创业项目往往较容易得到政策助力、市场认可以及社会的信赖，进而推动社会效益、行业效益、个人效益形成良性循环，切实增强人才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能。

二、思政引领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

（一）锚定思政目标，明晰创业导向

思政目标为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根本指引，

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与高度。教师可以将数字营销专业特性与创业人才成长规律相结合，构建分层分类的思政目标体系，按照价值观念、职业素养、社会责任三个维度设定明确要求。就价值观念维度而言，围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义利意识，明确创业不仅是追求经济效益的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价值的载体。就职业素养的维度而言，明确诚信经营、合规操作的基本底线，符合数字营销行业数据公开、内容真实的发展走向。就社会责任的维度而言，凸显家国情怀及行业担当，助力学生将创业项目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教师需针对各类创业方向，细化思政目标。比如，针对跨境电商营销创业方向，须提升学生的民族品牌意识及国际合规认知，引导学生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凸显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将思政目标与创业导向进行有机结合，须将思政要求转化为可实施的创业能力培养要点。教师须梳理数字营销创业的核心环节，将思政目标添加到市场调研、产品推广、用户维护等关键步骤中，使学生在创业实践的各阶段感知思政要求。同时，高校可以建立思政目标与创业能力的对应关系，如将社会责任目标与公益营销项目策划能力相对应，将诚信经营目标与合规营销方案制定能力相对应。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创业思政方向的目标研讨活动，引导学生依据自身感兴趣的数字营销创业领域，自主分析该领域须坚守的思政准则，加大学生对思政目标的认同与执行力。凭借精准锚定目标，使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既具有专业深度，又有思想温度，为学生的长远发展筑牢基础[5]。

（二）融入思政元素，精研营销内容

融入思政元素是使数字营销的教学内容既具专业深度又有价值温度的重要举措。教师可以深挖数字营销核心课程的思政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责任意识等元素自然融入到课程内容各个模块。就内容策划模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质 IP，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营销品牌宣传内容，防止盲目追求流量而忽略内容的文化价值。针对用户运营模块，教师可以强调将用户放在中心的服务理念，引导学生重视用户权益，杜绝虚假宣传、过度营销等损害用户利益的行为。针对数据分析模块，教师需突出数据伦理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生坚守数据真实的底线，不篡改、不盲目滥用用户数据。教师还可以针对直播营销的热门走向，在内容设计中添加诚信带货要求，引导学生抵制夸大其词宣传和虚假“种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教师需要优化教学内容体系，破除传统课程内容的壁垒，使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深度结合，形成融合思想性与实践性的教学内容。教师可对课程内容的逻辑框架予以重构，将思政要求作为主线贯穿学习全过程，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思政教育。同时，教师可以补充具有思政价值的教学资料，比如，选取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数字营销的成功范例，引导学生凭借专业技能促进农产品上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效共赢。教师还可以根据行业发展新趋势动态调整教学内容，比如，将绿色营销、低碳营销等新兴理念添加到教学内容中，指导学生在创业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思政元素的精准融入，使数字营销教学内容更具生命力，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有温度的专业支撑[6]。在开展思政元素融入的过程中，须重视场景化与具象化，比如，内容营销场景当中，引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案例，使学生在学习内容策划技巧的同时感知文化传承的责任。将思政元素切实融入专业学习中，避免空洞式说教。

（三）创新教学方法，赋能创业实践

创新教学方法是打通思政教育与创业实践壁垒的主要路径，教师可以借助项目驱动教学法，将真实数字营销创业项目作为载体，将思政要求贯穿项目设计、落实与复盘的全过程。教师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创业项目小队，引导每个小组围绕特定的数字营销创业方向开展实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掌握沟通、包容及互助的技巧，提升团队意识及集体主义精神。教师也可以采纳问题导向教学法，围绕数字营销创业中遇到的伦理困境以及社会责任问题设置研讨话题，使学生经过思辨后进一步深化对思政要求的理解。比如，教师可以提出“怎样平衡营销效果与用户隐私保护”的议题，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使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明晰合规操作的重要意义。

教师可采用案例教学法以及情景模拟教学法，既能丰富思政教育形式，也能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教师需选取兼具思政价值和专业代表性的数字营销创业实例，引导学生解析案例内的思政元素及创业逻辑，使学生在成功案例中习得将社会责任融入创业实践的方法，从失败案例中反思忽视思政要求带来的负面影响。教师还可以创设真实的创业场景，比如，模拟直播带货的全流程，组织学生分别充当主播、运营、客服等角色，在情景模拟当中践行诚信经营要求，解决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高校可以借助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方式，搭建跨越时空的教学平台，使学生与行业导师实现实时交流，获取行业先进经验及思政理念。借助教学方法的创新，思政教育为创业实践赋予活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四）搭建实践平台，锤炼专业本领

实践平台是思政教育落地实施与创业能力锤炼提升的重要载体。高校可与行业企业共同建设校内外一体化实践平台，将企业实际项目引入平台，同时添加思政考核指标，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教师可借助学校的创业孵化基地，打造数字营销创业实训专区，为学生提供场地保障、技术指导以及资源对接等服务，在实训过程中突出合规经营以及社会责

任，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商业场景中开展创业实操。学校可与本地电商企业、文化传媒公司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将企业数字营销业务转化成学生的实践项目。教师须引导学生在参与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循行业规范与思政要求，比如，为农产品企业做营销推广时，坚持如实宣传，帮扶农产品拓展销路。

教师可以组织开展多元化创业实践活动，通过活动锤炼学生的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学校可牵头组织“数字营销创业策划大赛”，创设专用的思政评分体系，评价须涵盖学生创业方案是否体现社会责任、是否契合行业规范，引导学生将创业项目与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等主题进行结合。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乡村、社区开展数字营销帮扶行动，比如，帮助乡村合作社搭建线上销售途径，帮助社区小微企业优化营销方案等，使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创业的社会价值，增强担当精神。学校可邀请行业内杰出创业者举办讲座分享，使学生近距离汲取创业者的思政理念与创业经验，学习创业中坚守初心、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利用实践平台的搭建以及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锤炼专业能力，使思政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

（五）完善评价体系，保障育人实效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保障思政引领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标的重要保障。学校可以创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打破传统单一的考试评价模式，将知识掌握、能力提升、思政素养三个方面纳入评价体系，全面测评学生综合能力。针对知识维度，重点考查学生对数字营销专业理论及思政相关理念的掌握熟练程度。针对能力维度，聚焦评价学生营销策划、项目执行、团队协作等创业核心能力。针对思政素养维度，重视发掘学生在实践中展示的诚信意识、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教师可以将学生创业项目中的思政表现细化为具体的评价指标，比如，是否遵守营销伦理的标准、是否关心社会效益的体现、是否拥有团队合作的素养，使思政评价有据可循。

教师可以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完善评价反馈机制，及时对人才培养策略进行调整优化。在过程性评估环节，教师可以凭借课堂观察、项目研讨、实践记录等方式，实时掌握学生的思政表现和专业能力发展情况，定期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协助学生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学校可引入多方评价主体，除教师评价外，也可邀请企业导师、同学、合作方共同参与评价，从不同角度全面评估学生的表现。比如，学生结束企业合作项目后，邀请企业导师针对职业素养和思政表现开展评价，邀请合作方针对服务质量、诚信履约给出反馈。学校还可以建立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与学生评优评先、创新创业奖学金的评定相关联，鼓励学生提升思政素养的积极性。依靠完善评价体系形成育人闭环，切实保证思政引领下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实效。

三、结语

思政引领下开展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是一项需要长久深耕的系统工程，其价值与策略的实现离不开理念更新和实践探索的相互配合。未来还可进一步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体系，使行业前沿需求与思政教育实现更紧密地结合，同时需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创造思政元素融入新载体。借助多方配合、动态优化，持续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数字经济领域输送更多既有专业技能又有责任担当以及家国情怀的创业人才，为产业升级及社会发展注入长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闫丽霞 .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校数字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商展经济 , 2025(13): 163−166.

[2] 王帅 . 数字赋能市场营销核心内容的创新探索 [J]. 中国管理信息化 , 2025, 28(13): 234−237.

[3] 蓝保原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03): 55−58.

[4] 张洁 . 应用型高校市场营销专业一流课程教学改革路径研究 [J]. 巢湖学院学报 , 2024, 26(01): 121−128.

[5] 郭国庆 . 中国特色市场营销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实践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5(01): 141−149.

[6] 韩玺 , 闫泽斌 , 张莉 .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校市场营销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研究 [J]. 大学教育 , 2023(01): 101−103, 10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浙江省高职教育“十四五”第二批教学改革项目“思政引领、三融一体，新双高背景下数字营销创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jg20240233）。

（作者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理论支撑和内化路径

王　蒙 陈　旭

摘要：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成效、使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呼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工匠精神。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生活德育理论，探讨青年学生群体中工匠精神的内化路径。遵循“理论认知—价值认同—实践内化”的逻辑演进，通过把握知识建构规律，深化个体理论认知；贴近青年思想特点，塑造学生价值认同；创设心理内化环境，探索实践育人体系，推动工匠精神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内化于心。

关键词：工匠精神；内化；逻辑演进；思想政治教育

一、工匠精神融入高校学生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在市场经济功利化思潮蔓延、青年职业规划趋于短视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迫切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将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坚定青年学生的职业理想与信念，凝聚青年学生投身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共识，还可以帮助塑造精益求精、执着专注的职业价值观。

（一）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成效的迫切需求

工匠精神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核与广泛的应用场景。通过科学举措引导高校学生内化工匠精神，能够增强当代大学生在职前培养过程中的职业认同感，能够催生高校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精神特质，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大国工匠扎根岗位、深耕细作，用精湛技艺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其奋斗历程彰显了工匠精神的职业价值。培养工匠精神、讲好工匠精神、内化工匠精神，对于拓宽高校学生职业视野、增强高校学生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培养高校学生的职业品行具有深远价值。为提升高校思政育人效果，实现以文化人，高校需引入“沉浸式体验”的工匠精神育人理念，挖掘和利用课程中的工匠精神元素，构建崇尚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环境，以引领学生对劳动、职业、职业道德、职业价值的正确认知，陶冶学生的职业情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理念和职业信仰等综合素质[1]。

（二）树立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必然选择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当代青年大学生受互联网及网络新媒体的影响显著。当代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的范围广、兴趣高、程度深。受益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普惠性的同时，青年大学生在浸入式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其思想观念也极易受到网络世界中多元思潮的影响。尤其在当前“躺平”文化、“摆烂”文化、“佛系”思想等不良网络文化的冲击下，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定位易发生偏移扭曲。工匠精神以其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了精神养分，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精湛的专业技能、塑造其健全的职业道德观、培养其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2]。工匠精神以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为高校大学生树立了思想标杆，成为抵制不良思潮、树立科学职业价值观的精神源泉。

（三）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现实需求

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贺信中指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凸显了工匠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时代价值，同时凸显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的人才战略价值。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实体制造工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时代需求下，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才能为创新型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和工业化强国建设提供人才培养的精神动力。对于高校青年学生而言，工匠精神有助于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助于提升其综合素养，工匠精神的内涵价值与新质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匹配[4]。

二、工匠精神融入高校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支撑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将工匠精神内化为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自觉，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生活德育论为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启示。

（一）社会认知理论揭示认知行为环境三方互动影响

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出了基于认知、行为和环境三个因素的“三元互动”决定模型，并详细论述了组成该模型的个体的认知、行为和环境三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即认知、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决定因素。该理论中，三因素的互动影响过程表现为：个体认知通过行为实践作用于环境；个人通过行为实践作用于环境，对个体的认知产生影响；通过将环境因素作用于个体的认知，以影响个体行为[5]。在该理论中，班杜拉认为，通过塑造、指导和说服，环境因素可以促进个体认知能力的形成、提升以及期望、信念的形成和变化；行为因素也对个体认知的形成和改变产生影响。该模型为工匠精神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培养带来如下启示：通过环境的创设可以促进工匠精神的培育，通过行为实践可以助推工匠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互动作用和心理重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内化是个体形成内在心理结构的动态过程，它是一系列长期事件的结果。内化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认知、精神、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社会文化理论指出，基于社会互动，通过模仿、合作和来自他人的引导，个体可以内化社会共享的文化规则，并吸收来自他人的外部经验。同时，个体在逐渐吸收外部经验的过程中，通过内部的思维活动和自我反思，可以重构并转化外部经验[6]。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社会互动和个人的内在思维活动，例如自我反思，在学习和转化外部经验中的积极意义。此外，社会文化理论强调在促进个体认知发展的过程中，需考虑最近发展区，因为最近发展区为新知识和新的间接经验的学习创造了条件。社会文化理论为工匠精神的培养带来启示，即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个体与社会和他人进行互动，需要为青年学生创造条件助推其获得有关工匠精神的外部经验；工匠精神的内化和转化，需要个体对外部经验进行内部心理重构和自我反思；工匠精神的学习还需着眼于青年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三）生活德育论强调将教学融入日常生活

生活德育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强调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教育要与真实的社会和实际的生活密切联系。生活德育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内化的教育带来启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依照课本教学，它需要以真实生活为中心、做素材；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它需要结合实际生活开展教育和实践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社会环境中的鲜活资源，充实教育材料，丰富教育方法和教育工具；精神内化的教育应结合实际生活，从实际生活中取材教学，用好、用活生活中的教育情境、教育素材、教育方法和教育工具，精神的内化教育要结合在实际生活中的教、学、做。精神的学习要杜绝死记硬背，要避免把精神当作纯粹的知识来教，精神的学习内化需要融入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

三、工匠精神融入高校学生思政教育的内化路径

将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心理内化，还应立足于理论认知、价值认同和实践内化三个维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工作。三个维度中，理论认知是基础，价值认同是条件，实践内化是关键。

（一）把握知识建构规律，深化个体理论认知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外部经验在认知学习和助推精神内化中的重要性，为此，应创设条件引导青年学生学习外部经验。外部经验的重要性凸显了教师、行业能手、行业专家等群体在引导青年学生深化理论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除教师的课堂教学或实践教学以外，还可以通过邀请行业专家、行业内的能工巧匠为青年学生开展交流座谈和技能示范，助推青年学生学习有关工匠精神的外部经验。思政课堂是青年学生学习关于工匠精神的外部经验的主渠道，课程思政是助推青年学生学习有关工匠精神的外部经验的催化剂。对于青年学生外部经验的学习吸收，需守好思政课堂，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化青年学生对工匠精神的理论认知。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精神的内化需强调社会互动和自我心理建构，高校应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社会互动和自我心理建构，以实现工匠精神的吸收内化和有关工匠精神的行为转化。可考虑的措施包括深化校企合作，建立数量足、质量高的教学实践基地，为青年学生走入岗位一线感悟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匠精神搭建平台。大力开展研讨式的专业见习实践，一线教师带领青年学生走入企业一线，适度设置小组合作任务，让青年学生在岗位实践中学习专业技能、分享专业知识、开展自我反思、领悟工匠精神。高校鼓励开展行业导师制，通过行业导师的引导，深化专业实践认知和工匠精神的内化。

（二）贴近青年思想特点，塑造学生价值认同

基于生活德育的理论视角，精神的内化需要融入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创设“生活教育”环境，引导青年学生形成对工匠精神的情感体验、塑造青年学生的工匠精神信念。校本资源挖掘、校园文化建设和网络文化阵地建设是融入青年学生生活教育的可行途径。对校本资源进行挖掘，挖掘高校校史中的行业名师、优秀校友的工匠事迹，结合不同专业的职业发展特点，开展同伴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到“个人职业成长与国家产业发展的紧密关联性”，

激发其对职业理想的追求，有利于青年学生形成对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针对校园文化建设，可依托行业资源，构建情感共鸣触发机制，引导青年学生形成价值认同。可通过邀请大国工匠或行业优秀从业者走进校园，分享真实的职业成长经历与工匠精神践行经历，从个体叙事的角度触发学生情感，促进青年学生对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还可通过组织观看工匠精神主题影片、举办大国工匠技艺展等活动，以直观的文化载体形式，唤醒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与使命感；还可开展工匠精神主题技能竞赛、职业规划大赛等活动，将工匠精神教育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还可通过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打造“可感知”的工匠精神载体，如设立工匠精神主题文化长廊、优秀学子技艺展示区或工匠文化展览室。针对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可利用高校“两微一端”、短视频平台制作推送大国工匠事迹解读、专业技艺科普等内容，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增强其对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

（三）创设心理内化环境，探索实践育人体系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带来的启示，要促使青年学生形成和内化工匠精神，离不开科学的环境创设和行为实践。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要促使青年学生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认知和行为自觉，离不开学习他人经验和与他人互动开展合作学习的环境创设。首先，思政课堂是青年学生认识和获得工匠精神间接经验的主渠道，守好思政课堂、讲好思政课堂、深挖课程思政建设是创设内化工匠精神的科学环境的基础。在思政课教授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运用案例教学法，以深度剖析真实案例的方式，使青年学生感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还可以将合作探究、项目化、任务驱动等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教学，促使青年学生真切地领悟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7]。针对课程思政的建设要求，需要将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程和职业教学。可通过系列实训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深度感悟工匠精神[8]。

其次，构建“校内—校外”联动的实践平台体系也是创设科学环境的题中之义。校内可依托思政实践课程与专业实践课程，组织工匠精神主题模拟教学；校外可与企业、行业协会、工匠精神教育基地等合作教学，通过参观研学、组织学生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观摩工匠操作、参与企业技术攻关辅助工作等方式，促进青年学生在实地体验中获得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还可以通过搭建学术实践平台，组织学生参与工匠精神相关课题研究、整理行业工匠口述史等途径，引导青年学生在学术实践中强化理论认知。

另外，建立“实践—反思—指导”的闭环机制。在实践前，通过专题培训明确实践目标与要求，帮助学生建立实践认知；在实践中，引导学生通过撰写实践日志、开展小组分享等方式进行阶段性反思，梳理实践中的认知收获与情感体验；在实践后，组织实践总结会，邀请思政教师、行业专家提供专业指导，帮助学生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认知，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困惑提供心理支持与解决方案，确保实践与理论的深度结合，推动工匠精神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精神动力与行为自觉。

参考文献

[1] 巴曾锐 . 高职院校构建工匠精神培育话语体系的对策研究 [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27(04): 141−145.

[2] 严培 .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5, 25(06): 44−48.

[3]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强调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N]. 光明日报 , 2020−12−11(01).

[4] 苏蔷 , 杨兆山 .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5(40): 172−175.

[5]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1986.

[6]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7] 于小涵 . 工匠精神融入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 2025(02): 222−224.

[8] 李赟 . 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及路径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22(32): 97−98.

（作者：王蒙，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陈旭，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施策略

杨　佳

摘要：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与价值支撑。将文化自信有机融入思政教育，有助于筑牢青年学生的中华文化根基，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归属，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本文从价值意蕴与实施策略双重维度展开探讨，系统分析文化自信在涵育健全人格、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方面的深层意义，结合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系统性策略。研究强调，唯有通过制度保障、协同机制与青年主体性激活，方能实现文化自信从外在到内在自觉的转化，切实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

关键词：文化自信；思政教育；价值意蕴；实施策略

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面临多重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亟须超越单纯的政治灌输或理论说教，转向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深层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厚资源，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独特而坚实的价值依托。然而，当前文化自信融入思政课仍存在重形式轻内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机制，具有理论必要性，更关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目标。本文旨在系统厘清其价值意蕴，并提出可操作、可持续的实施策略。

一、文化自信的源泉

（一）筑牢文化根基

将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首要价值在于筑牢青年学生的中华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通过系统阐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天下为公的治理理念等思想精髓，帮助学生超越碎片化认知，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理解与情感认同。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激荡易导致价值迷失，唯有深植文化根脉，才能增强青年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殖民的能力。文化根基的夯实并非简单复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滋养现代人格的精神沃土。因此，在思政教育中融入文化自信，实质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过程，为青年成长提供稳定而深厚的价值坐标[1]。

（二）强化国家认同

文化自信是国家认同的情感基础与精神纽带，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能有效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国家认同不仅依赖制度认同与政治认同，更深层次地植根于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符号、价值伦理与集体情感。思政课通过讲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发展史，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特别是革命文化中蕴含的各种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历史逻辑，极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在此过程中，文化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成为凝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根本问题的答案载体。文化自信的培育直接转化为对国家的归属感，增强学生的使命认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政治心理基础[2]。

（三）推动文化创新

文化自信绝非封闭保守的自我固守，更不是脱离时代的墨守成规，其核心要义在于唤醒文化主体的创新意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而高校思政教育正是促成这一转化、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与关键抓手。高校思政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髓，摒弃简单灌输的教育模式，引导学生以辩证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新时代的视角解读经典，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守正与创新深度融合。通过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剖析传

统民本思想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让学生深刻领会文化并非静止不变的遗产，而是具有动态发展、开放包容特质的活态体系，进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筑牢文化自信的思想根基。

当代青年作为伴随数字技术成长的“数字原住民”，对数字化传播、创新性表达有着天然的敏感度和接受度，这也为高校思政教育与文化自信培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突破口。高校思政教育主动贴合青年成长特点，打破思政课与现实生活的壁垒，激发青年学生的文化创造热情与创新潜能。在思政课堂上，引导学生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土根基，运用数字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表达形式与传播载体。这种融合不仅有效提升了思政课的现实解读力与时代吸引力，让思政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还在实践中培育了青年学生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力，推动文化自信在青年一代中落地生根。

二、实施策略探索

（一）深化内容整合

思政课程体系突破将文化元素作为点缀性素材的惯性，转向以价值融通为导向的内容重构。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契合的思想资源，实现概念对接与逻辑互嵌。在讲授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时，可引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厚历史根基，在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彰显中国方案的文化渊源。这种整合强调内在一致性而非外在拼接，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视野与文本解读能力。同时，鼓励高校开发校本文化教学模块，结合地域特色或行业背景，增强内容的贴近性与认同感，使文化自信真正内嵌于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全过程[3]。

（二）创新教学方法

1. 案例探究教学

选取具有时代张力与文化深度的真实案例，能够有效激活学生对文化价值的主动探究。教师可围绕国产影视等热点现象，设计教学任务，如分析电影《长安三万里》如何通过诗歌重构盛唐气象，或探讨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节目对传统节俗的审美转译。课堂中，引导学生从多维度展开讨论，追问“为何这些表达能引发共鸣”“传统资源如何被赋予当代意义”。进一步可设置角色模拟，让学生分别扮演文化创作者，就某一文化产品的价值导向进行辩论。此类教学强调证据支撑与逻辑推演，避免情绪化评判，促使学生在比较中理解中华文化独特标识及其现代转化路径。案例不仅是教学媒介，更成为连接历史智慧与现实关切的认知桥梁，使文化自信在理性辨析与情感共振中自然生成。

2. 实践体验教学

实践体验教学通过“做中学”“行中悟”的方式，将文化自信由认知层面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高校应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设计沉浸式、参与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情景模拟，在实地踏访中感悟革命精神；或联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设工作坊，让学生在动手制作中体会工匠精神与审美智慧。结合专业特色，开展文化调研，如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记录乡村口述史，建筑专业学生测绘传统民居，实现文化传承与专业能力培养的双向赋能。关键在于通过系统设计，将学生的文化体验、深度反思与价值内化有机贯通，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育人闭环。活动前设置文化背景导学，活动中引导观察与互动，活动后组织分享会或撰写文化日志，促使学生从感性触动上升为理性认同。实践体验教学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空间边界，以具身化方式让文化可触可感，切实增强育人感染力。

（三）激励机制建立

当前部分教师受限于考核导向或文化素养储备，在推动文化自信融入思政课教学时，存在动力不足与能力短板。将文化育人成效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设立文化融合创新专项评价维度，有助于认可其在课程重构中的实质性投入。高校可同步设立教改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围绕“文化自信 + 思政课”主题，开展课题研究，孵化具有推广价值的教学案例。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同样依赖制度引导，将参与传统文化研习、红色实践等活动纳入第二课堂学分与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使文化实践从可选项变为成长必修项。校院两级还可定期评选文化育人示范团队，遴选优秀教案与典型做法进行辐射推广，营造互鉴共进的教研生态。当激励机制从临时性鼓励转向结构性支撑，文化自信教育便能突破零散尝试，逐步迈向常态化、专业化与深度化发展[4]。

（四）搭建实践平台

1. 社团活动组织

社团作为自主性、兴趣导向的组织载体，在文化自信培育中具有天然亲和力与持续渗透力。高校应加强对红色文化类、公益服务类社团的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其从娱乐性活动向价值性实践转型。国学社可不再局限于诵读经典，而是开展儒家伦理与当代青年责任主题研讨；红色理论研习社可组织口述史采集项目，将地方党史转化为鲜活教学素材；非遗保护协会则可联合社区开展传统技艺传习，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的融合。关键在于构建由思政教师提供价值引领、专业导师给予学术或技术支撑、学生骨干负责组织动员的三方协同机制，保障社团活动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契合青年话语，通过推动跨社团联动，辅以制度化的资源扶持、项目化的运行管理以及成果化的展示推广，使社团活动突破零散化和娱乐化的局限，真正转化为

文化自信在校园中日常浸润和持续生长的重要载体。

2. 节日活动举办

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民族集体记忆与价值观念，特有的仪式感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天然的情感入口，高校应当超越以文艺汇演或节日福利为主的表层形式，转向注重文化内涵阐释与价值导向引领的育人实践。在清明节，可组织英烈家书诵读与精神对话活动，引导学生从烈士书信中体悟家国情怀，将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有机联结；端午节则围绕屈原所象征的爱国、求索与清廉品格，举办主题论坛，探讨传统士人风骨在新时代语境下的转化路径。为提升参与深度，可设置节日文化策展任务，由学生团队自主完成史料搜集、公众讲解。在此过程中，尤其需重视少数民族节日的有机融入，通过共庆共享，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传统节日真正成为年复一年的文化再生产仪式，在持续的情感共鸣与行为参与中涵养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案例分析

（一）沉浸式研学

2023 年暑期，“行读中国·红色江山”思政课实践教学项目在全国百余所高校同步展开，项目由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组织实施。学生团队分赴延安、井冈山、遵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在旧址院落中聆听历史回响，于田间地头访谈老党员与英烈后代，系统梳理地方党史文献与口述资料。这种深度在场的学习方式，使抽象的革命精神具象为可触可感的生命叙事。项目特别强调从“看”到“创”的转化，要求学生将实地体悟转化为短视频、Vlog 或交互式 H5 等新媒体作品。武汉大学学生在大别山调研时发现一封烈士未寄出的家书，随即运用 AI 技术修复手稿影像，配以青年朗读、动画复原与当代回应，制作成微纪录片《一封未寄出的家书——重走大别山》，上线 B 站一周播放量突破 300 万次，评论区高频出现“这封信是写给今天的我们”此类留言。文化认同由此在行走、对话与再创作中悄然生成，而非单向灌输的结果[5]。

（二）以数字创作实现文化价值外化

学生在项目中不仅是文化接收者，更成为主动的叙事主体。他们通过镜头、脚本与交互设计，将革命记忆转化为契合同龄人审美与传播习惯的数字文本。2023 年项目累计产出原创作品 2800 余件，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总播放量超 2.1 亿次，“# 行读中国”“# 红色家书”等话题多次进入热搜榜单，形成青年讲给青年听的传播生态。一位参与学生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当我把爷爷讲的支前故事剪进视频，才真正理解‘人民江山’不是口号。”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表达，使宏大叙事获得情感支点与生活质感。技术在此并非炫技工具，而是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人与国家的媒介。文化自信不再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是在创作实践中被确认、被传递、被强化。青年用自身话语诠释何以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归属。

四、结论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本质上是一场唤醒价值自觉、筑牢精神根基的深层育人工程，它既回应了全球化语境下，青年群体在文化认同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惑与价值焦虑，也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高素质人才在道德品格、文化担当等方面的内在要求。本文对价值意蕴的剖析表明，文化自信不仅体现为对五千多年文明传统的尊重与赓续，更蕴含着面向未来推动文化创新与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所提出的实施策略则进一步表明，唯有将文化自信深度融入思政教育各环节，才能让文化真正活化于课堂教学之中，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并最终扎根于其精神世界。面向未来，高校需进一步强化文化育人的整体性思维，在尊重青年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善用数字技术赋能，着力构建知、情、意、行有机统一的文化自信培育生态，使青年学生在持续的文化浸润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坚定对民族复兴的信心，从而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培根铸魂与启智润心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1] 柳莲君 . 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N]. 新华日报 , 2023-12-10(12).

[2] 蔡凯文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方法与理路 [J]. 江苏高教 , 2023(12): 131-136.

[3] 李丹 , 陈雪珍 , 李江涛 . 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3, 23(04): 86-91.

[4] 殷欣禾 . 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创新途径 [J]. 大众文艺 , 2023(22): 160-162.

[5] 袁汪洋 . 短视频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J]. 时代报告 , 2023(11): 122-124.

（作者系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大思政格局下心理育人的路径探索

秦　霖

摘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心理育人与思政育人的共同目标。心理育人作为思政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载体，在“大思政”育人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首先立足“大思政”育人格局，阐述心理育人的基本理念，进而分析心理育人与大思政育人融合的政策导向、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最后提出大思政视域下心理育人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抓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推动心理课程与思政课程双向渗透融合；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教师素养，夯实“心理—思政”融合育人的队伍基础；探索更具本土特色、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育人方式；强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本文旨在为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提供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大思政；心理育人；路径

随着技术演进与社会变迁加速，青年学生正面临学习生活节奏骤增、心理压力源日益复杂的现实挑战。同时，成长于多元文化环境的他们，主体意识鲜明、价值追求多样，这使得其价值观塑造与心理品质养成的难度倍增。传统以灌输说教为主的思政教育模式，在回应学生深层心理需求、实现有效价值引领上面临着实效性不足的突出困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时代思政与心理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将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落实“三全育人”，叮嘱教育工作者关注青年诉求、培育其健康心态、做青年知心人，为心理育人与思政育人的融合创新指明方向、提出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思政教育与心理育人长期存在的“各自为战”状态，将心理育人的科学方法与资源优势，系统地融入“大思政”育人格局，从而构建协同增效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已成为提升立德树人实效的关键课题。本文即旨在探讨“大思政”格局下心理育人的融合路径。

一、思政育人—大思政育人格局

思政育人的核心阵地是思想政治课，关键在于系统传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教育对象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与公共参与素养，助力其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根基[1]。思想政治教育，关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局，其核心要义绝非简单地增设理论课程，而在于将价值塑造、政治引领与精神锻造有机融入育人全链条、全过程。

“大思政”的核心是整合各类育人资源、凝聚多方合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立足学校育人实际，将教师教书育人职责、学生成长发展诉求与学校思政教育内在规律深度结合，通过实践反馈持续优化学生思想教育工作[2]。

从“思政”到“大思政”的提出与构建，这一转变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一次更新，更是育人视野从局部到全局、育人格局从单线到系统整合的跨越，也为切实提升育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实效性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破解突出问题、提升育人实效有着显著的推进作用。

二、心理育人

“心理育人”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关文献中，学者张圻海的《心理育人——高校育人新理念》一文，首次对心理育人的理念、意识和途径进行了详细阐述[3]。

心理育人的核心是通过心理教育落实育人任务，教育者需结合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特点，兼顾心理成长与教育双重规律，以多元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引导其化解心理困惑、挖掘心理潜能、提升心理素养、塑造健全人格，培育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的时代新人[4]。

心理健康是个体成长成才的基础，个体只有保持心理健康才能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培育青年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引导他们养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5]，助力其实现身心和谐发展。

这条实践路径既贴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是助力青年健康成长、切实落实育人使命的关键支撑。

三、心理育人与大思政育人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关于人的工作，是围绕学生的工作，培养学生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与健全的人格，是有效开展一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根本前提。在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的宏观背景下，心理育人已然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对个体心理问题的干预与辅导，上升为关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系统性工程。心理育人被明确列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一环，这一定位标志着心理育人从边缘辅助迈向核心协同，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

（一）政策导向

在国家推进德育与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关联不断被清晰界定。1995 年国家教委相关大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核心范畴，2004 年中央相关意见更明确其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路径，这一脉络直观体现二者不可分割的协同关系 [7]；2005 年，教育部、卫生部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并做好思想引导；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需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完善二者融合路径；2011 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标准，将心理健康教育明确纳入高校思政教育重要任务，2017 年起印发的实施纲要更将“心理育人”纳入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十大”育人体系 [6]，清晰呈现二者逐步融合深化的发展路径。

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为心理育人融入大思政育人格局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了政策依据和顶层设计。

（二）理论与实践依据

1. 关系密切

从理论上说，个体的思想与心理同属主观意识范畴，均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作为意识的一体两面，二者存在着深刻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心理活动是思想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基础，而观念体系一旦形成（如人生观、价值观）又会反过来构成支配心理活动方向的框架性力量，深刻调节和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对健康心态的养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因此，实践中思想问题与心理问题往往互为表里、彼此交织：许多显性的思想困惑植根于深层的心理冲突，而不少心理困扰的溯源又指向价值观模糊、理想信念缺失等根本性的思想命题 [8]。

2. 目标一致

心理育人主要聚焦于个体内在世界的建构，旨在通过情绪调节、认知优化等途径，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与健全人格，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内在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导向是正向引领学生外在价值观念，根本在于培育其政治认同、锤炼思想道德素养，能潜移默化帮助学生筑牢正确三观，进而塑造适应时代需求的社会型人格 [9]。二者虽路径不同、各有侧重，但其深层目标高度统一，即通过“育心”与“育德”的相辅相成，共同达致学生内在人格完善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统一，培养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形式互鉴

形式互鉴是推动心理育人与思政教育深度协同的实践关键。一方面，心理育人可主动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框架，借助主题教育、志愿服务等思政品牌活动，有意识地开发与嵌入心理体验环节，注重在活动过程中引导学生完成价值认知的内心转化，从而增强活动的体验深度与育人实效；另一方面，思政育人可积极吸纳心理育人的专业方法与载体，将团体辅导、沙盘游戏、朋辈互助等心理育人形式，创造性地转化为思政教育的新情境与新载体，同时，注重在思政教学与日常引导中，运用心理学知识把握学生认知与情感规律，创设更能触及心灵的育人情境，提升价值引领的亲和力与穿透力。通过这种双向互鉴，打破方法论上的壁垒，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为一体化育人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

4. 效果互补

“效果互补”根植于“育心”与“育德”在育人机理上的深度互嵌。思政育人重在推动价值观念的内化与行为转化，这一过程密切关联于个体的认知接纳、情感认同与意志调节——其成效实质上建构于健康的心理基础之上。心理育人则通过调适情绪、塑造积极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为价值引领扫清内在障碍、构建情感认同的“心理场”，使思政教育不仅入耳，更易入心。与此同时，思政教育所蕴含的价值内核与意义框架，反过来为心理成长提供精神的“坐标”与意义的“灯塔”。当心理育人融入思政底色，便超越了对一般性心理适应的追求，进而引导学生在面对困惑、空虚或意义感缺失时，获得向上向善的价值依托 [10]。在“人”的整体发展层面上实现价值引导与人格培育的系统性协同。

综上，个体人格健全与价值塑造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心理育人与大思政育人的融合成为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心理健康是价值认同与政治引领得以有效内化的心理基础，而正确的价值观又是塑造积极心态、促进人格完整发展的根本导向。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破解传统思政教育中可能存在的认知与情感脱节、理论与体验分离等问题，更能系统构建“育心”与“育德”相统一的全过程育人生态，从而真正实现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到价值引领的贯通，培养出人格健全、信念坚定、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大思政背景下心理育人的路径措施

（一）抓好课堂育人主渠道，促进心理与思政课程的双向渗透融合

课堂主渠道是实现心理育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其核心在于推动两类课程的双向渗透与内容重构：一是促进课程体系的互融，既要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有机融入思政的价值引领，也要在思政教育中科学运用心理学方法，遵循学生认知与心理发展规律；二是深度挖掘各学科资源，通过系统提炼各门课程中蕴含的心理育人元素（如语文、历史科目中豪放诗词的性情陶冶、英模成长史的心志启迪），将其转化为促进学生心灵成长的契机。三是强化实践环节的体验设计，在思政实践教学中精心融入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环节，引导学生在行动中实现认知深化、情感认同与行为养成等知情意行的统一。

（二）以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筑牢“心理—思政”融合育人的主体支撑

教师的育人作用远不止于知识传授，其自身的心理素养、人格魅力与情绪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教育影响，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学生。因此，以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提升全体教师（尤其是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骨干）开展心理与思政融合育人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关键在于构建“普及—深化”分层培训的一体化育人体系：面向全体教师普及学生心理规律与初步应对策略，对骨干教师进行深度培养，锻造一批精通思政并掌握心理治疗方法的“双师型”核心力量，最终使教师能于课堂内外敏锐把握“教育时机”，依情境在互动中给予学生情理交融的复合引导，真正实现从“经师”到“人师”的升华。

（三）强化显性和隐性育人的融合

在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心理育人应推动显性教育与隐性熏陶的深度协同。显性教育依托课程、讲座等途径，提供系统知识与直接引导，筑牢“主阵地”；隐性熏陶则重在通过校园文化、制度环境、管理服务与数字媒体的整体构建，将积极心理品质与正确价值观念“润物无声”地渗透其中。二者的协同，旨在建构一种浸润式育人生态，使心理育人不再局限于一项专门工作，而能够转化为一种全员参与、全过程渗透、全方位覆盖的教育实践，最终在持续而整体的熏陶中，促进学生实现价值认同、人格完善与行为养成的内在统一，从而夯实立德树人的心理根基。

（四）利用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融合教育平台

结合青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信息获取特点，打造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新媒体矩阵。通过创新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网络内容，将知识内容与新媒体、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育人内容的趣味性、时代感和吸引力，精准触达并有效引导青年学生，强化价值引领，筑牢网络育人阵地。

（五）探索更适合本土的、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育人方法

探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育人方法，是“大思政”格局下构建中国特色育人体系的内在要求。现代心理学理论起源于个体主义文化盛行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应用于有着集体主义传统的东方国家语境时，一味“拿来主义”易有“水土不服”的局限。因此，应超越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单向借鉴，确立以文化主体性为本位的育人视角，系统梳理、发掘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心性修养智慧并转化为本土特色育人方式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应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心理育人路径的多维融合：在内容上，将“仁爱”“诚信”“中和”“自强”等观念融入情绪管理、人格塑造与社会适应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书法、国画、民乐、经典诵读等修身方式作为心理调适与积极品质培养的载体。最终，通过构建“中国式心理育人”的校本化实践范式，将价值观引领扎根于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实现文化传承、价值塑造与心理成长的有机统一，为立德树人筑牢深沉而持久的本土文化根基。

五、结语

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需树立系统整体思维，统筹立德树人各环节、凝聚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力量，心理育人应主动适配这一格局，夯实思政育人心理基础，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双向助力，提升育人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未来需进一步结合政策导向与实践需求，丰富融合路径、创新育人载体，推动心理育人在大思政教育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培育人格健全、信念坚定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解读 [N]. 中国教育报 , 2021-12-03(09).

[2] 黄群芳 , 方建斌 . 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的实现路径探析 [J]. 西北素质教育 , 2019(03): 24-26.

[3] 张圻海 . 心理育人——高校育人新理念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01(12): 44-45.

[4] 马建青 , 杨肖 . 心理育人的内涵、功能与实施 [J]. 心理健康教育 , 2018(09): 87-90.

[5]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 [EB/OL]. (2023-04-20)[2026-02-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57361.htm.

[6]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 [EB/ OL]. (2017-12-06)[2020-12-01]. http://www.moe.gov.cn/（下转192页）

大数据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探析

王静静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依托大数据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可以为高校思政育人改革创新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提升育人实效性，让辅导员能够腾出精力做更具价值的个性化价值观引领工作。本文对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并详细阐述大数据时代思政教育精准化的必要性，探索思政育人精准化路径，以促进大数据时代思政育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

一、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辅导员利用新媒体，发挥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作用，将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素养等传播给大学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各种交流平台，同时互联网信息的裂变式传播，使得信息越来越碎片化。如何帮助学生甄别海量的网络信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提高素质素养，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教育水平和学校发展提升速度相对较为缓慢，进而对整体的人才教学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积极改革和发展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帮助学生调整思想观念，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长远稳定发展。辅导员可协同运用好大数据技术教育资源，创新“线上＋线下”思政教育教学形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思政教育，实现数智共享，学生随时随地进行互动，使思政教育从传统教学一元走向互动分享多元，虚拟和现实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新媒体平台以及大数据分析，发挥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作用，将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素养等传播给大学生，关注学生的“虚拟课堂”。同时，衔接好“理论课堂”“实践课堂”和“虚拟课堂”，形成“三位一体”的思政协同育人工作模式，共融共促，最大限度发挥新时代智慧教学的育人功效。

二、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精准利用资源让思政教育“智”起来

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大学生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研判、动态跟踪、精准预测，从而勾勒出多维、立体的“学生画像”[1]。辅导员的工作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营造沉浸体验式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深度理解、深度体验，真正做到思政教育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只有将数据技术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方面数据资源，再精准利用资源开展教育并形成闭环，才能真正使思政教育“活起来”“潮起来”“智起来”，实现同频共振协同育人。

大数据技术是新时代的科技生产力，具有规模性、

（上接 191 页）

srcsite/A12/ s7060/201712/ t20171206_320698.html.

[7] 林双 .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J]. 中国行政管理 , 2004(11): 94.

[8] 王琴 , 董春辉 , 费白露 . 心理健康教育视域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路径探究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8, 31(07): 20−23.

[9] 张苗 , 桓明慧 . 心理辅导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分析 [J]. 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06): 103−104.

[10] 徐辉 .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14(06): 116−119.

（作者单位：山西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多样性、高速性、价值型、可靠性等特征，可优化资源配置，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2]。辅导员可以利用数据采集和深度学习算法，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性格特征和家庭成长轨迹，全方位助学、助教、助管，实现精准施教和教育个性化，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使学生在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中找准定位，精准把握人生“方向盘”，让每个学生看见社会需求和自身成长的结合点。在育人工作中充分应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分析学生的专业盲区、人生困惑和发展需求，实现和大学生的多元互动，助力思政育人资源的精准分发，切实提升启智润心的育人实效。

（二）有利于思政教育从“量”向“质”的提升

随着教育系统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学生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被广泛收集和分析，以用于优化教育过程和提高教学质量[3]。辅导员要想精准掌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基本情况，需要利用大数据攻准难点、瞄准痛点、疏准堵点，实现思政教育从“量”向“质”的提升。“攻准难点”是精准定位新生入学、每学期开学、期末考试、毕业季以及大事件节点；“瞄准痛点”是精准把脉经济困难、心理问题、学业预警、就业困难重点学生；“疏通堵点”是找准学生突发事件的原因，从而进行精准施策，思想引领。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学生的日常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可以使辅导员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人际交往、成长状况，帮助辅导员实现从“事务型”向“育人型”转变，腾出精力做“难事”“急事”和“要事”，增强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辅导员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生动的“智能大思政”，形成“入学—学习—毕业”全学段的资源库，将数据技术资源有效转化为启迪青年学子的育人力量，并融入学校特色思政育人元素，推动高校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

（三）有利于教育场域“虚拟 + 现实” 双重融合

辅导员是高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助推器”，是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桥梁，大数据赋能使辅导员思政教育更具可行性，驱动育人工作更加科学化和精准化。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巨大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的挑战。大学生的生活场域逐渐向“虚拟 + 现实”的双重融合空间延伸，新技术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灵活有趣、打破时间空间限制，辅导员要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育人作为抓手，精准捕捉并分析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例如，数据采集可以使辅导员快速掌握学生的各方面信息，形成完整的学生信息库，可通过数据筛选问题，再辅以深度介入，为学生提供高情感浓度的服务。

传统的辅导员思政育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面对面交流，对学生进行“单向输出”。实践育人当前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线下实践场景受时、空、资源限制，重形式轻内化，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大数据时代通过融合各种数据技术、数据平台、数据工具，辅导员可以利用大数据赋能“大思政教育”，使线上和线下互补，理论与实践同频共振、虚拟与现实同向发力，使思政育人“创新”又“走心”。大数据技术可为辅导员提供精准的学生发展情况分析，形成数据共享、目标递进、场域融合的思政育人智能体。

三、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探析

大数据技术方兴未艾，以培养应用技术型技能人才为核心的高职院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辅导员需要着眼于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从中汲取智慧，将立德树人、培根育魂转化为生动的教育场景，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辅导员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创新精准化思政育人新路径。通过大数据技术有效提升思政育人的效率和针对性，在现有的育人体系上整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育人生态。

（一）数智驱动打破虚实边界

只有进行一场深刻的思维大变革，高职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利用互联网的“跨时空性”，突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依靠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依靠开会学习的地域局限，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线上线下的无边界性[4]。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网剧、手机游戏等碎片化信息广泛传播，抖音、小红书、B 站等平台内容层出不穷，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深度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将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将浅表性理解变为深度体验，这些都对辅导员的综合素养和管理服务方式带来了挑战。要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线上线下协同教育，打破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从数字到数据，从智能到智慧，丰富教育资源，建立科技和人文教育协同机制。

依托信息技术，通过线上平台提供实时教学和互动，通过线下活动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体验，这种双向融合的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5]。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可以使用 DeepSeek、豆包、Kimi 等 AI 工具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整合，再进行学生日常主题教育，驱动育人方式内涵式升级。利用数据软件、数字平台汇集所带学生各项数据，强化对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成长成才数据的采集和挖掘分析，建立学生综合数据库。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动态掌握学生体验度高、传播范围广、评价反馈高的育人方式和活动，点对点精准化为学生提供在校适应、学业帮扶、心理健康、就业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二）数智联动构建育人场景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具有“思政引领力”。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思政育人拓展成为能够厚植爱国情、传播主旋律、重塑价值观的“大思政”教育体系。辅导员通过采集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行为信息，可将育人全过程转化为“可视化”数据，通过数据构建一个个育人场景，可以精准了解学生的优势与不足。大数据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解锁育人新范式，助力思政育人扩优提质。

聚焦数智联动，协同育人合力。一是班团干部联动服务学生管理。形成“辅导员—班团干部”协同管理模式，畅通学生咨询问题渠道。协调校内各类资源处理学生生活服务、学业提升、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提升育人实效。二是家校联动共育学生成长。辅导员依托数据智能技术，构建家校共育模式。在日常管理育人中，形成辅导员和家长实时互联、实时沟通、实时反馈的共育场景。在入学、考试、期末、毕业等重要节点自动反馈学生在校数据，形成共育学生发展局面。三是优秀校友联动提供优质资源。利用大数据推送校友经验分享、校友答疑、校园招聘、校内宣讲等一系列活动信息，提升学生服务水平。

（三）数智融合助力“靶向教育”

“智能时代，教育何为”，是需要大家共同解答的时代命题。作为新时代的“数字原住民”，大学生兴趣广泛，对网络技术的依赖达到顶峰，在学习生活中语言表达更具个性，更注重自我感受和体验。辅导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智慧化工具，收集分析他们的网络“思想动态”，精准把握他们的思想行为特点，实施个性化教育，引导学生从知识理论的接受到信仰信念的确立，激活学生的创新创造潜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精准施策、靶向供给。

辅导员在思政育人中可利用大数据构建“学生画像”，精准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性格能力，形成科学的学生成长数据库，再结合日常服务、谈心谈话等给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服务找人、服务对人、服务育人的精准育人模式。精准识别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发展规划的学生，让价值观引导链接学生“小需求”，打造思政教育“精准施策”新形式。精准研判学生预警信息、异常数据，做好分析干预，降低学生危机事件发生率，维护好学校安全稳定。

（四）数智赋能拓宽育人空间

大数据时代，空间布局带来的知识鸿沟和差距正在不断减小。数智技术将传统教育内容转化成智能化数字资源，扩大优质资源的传播广度，拓宽育人空间。辅导员在数智赋能下能有效拓展和灵活利用教育资源，将理论文字转变为灵活的可视化动态资源，实现思政育人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将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施的“滴灌”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思政育人入脑入心入行[6]。运用在线教育平台，实时推送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合适的学习资源，实现育人场域纵深、内涵式拓展。

辅导员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学生培养、党团发展、创新创业、主题活动、心灵治愈、学业发展等育人空间，形成分类式学生思想教育、生活服务、校内活动、成才就业于一体的智慧育人模式。不断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形式，构建“大思政”育人场域，拓展“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育人空间，为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结语

2025年5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办十场平行会议，中外教育界人士共同探讨“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时代课题，吸引了全球目光聚焦数字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运用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依赖？是否会让学生失去创新力？如何重塑职业教育学习方式？如何优化职业院校智慧化育人模式？”这些都成为现场讨论的焦点问题。大数据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让高校育人更加智能高效，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辅导员管理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高职院校辅导员要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数智思维、数智素养、数智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缩小数字鸿沟，将技术语言转化为教育决策的能力，从数据中发现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潜在问题，把复杂单调的数据转化为有深度、有思想、有温情的教育行动。

参考文献

[1] 张晓燕 .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J].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04): 99−102.

[2] 李瑞玲 . 大数据时代融媒体矩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38(01): 174−176.

[3] 孟雷，刘念 . 大数据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转型策略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4(06): 137−141.

[4] 任禾 , 殷黎月 . 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及路径创新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4(05): 158−160.

[5] 王英姿 .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创新研究 [J]. 电脑校园 , 2025(04): 140−142.

[6] 孙婵 . 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策略 [J]. 大学 , 2025(22): 184−18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大数据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及实效性研究”（2025SJSZ0361）。

（作者单位：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实践探析

王晨瑄

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更迭发展，智能媒体已经深度融入了高校校园生活，深度重塑了大学生信息获取的方式和思维认知的习惯。传统的大水漫灌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适配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成长需求。本文立足智能媒体的数据驱动、沉浸式互动等技术特性，结合多所高校思政教育的鲜活实践案例，从精准识别需求、精准供给内容、精准优化过程、精准强化保障四个维度，深度探索思政教育精准化的可操作实现路径，破解传统思政教育供需错位、互动不足等突出问题，让思政教育真正走进学生心里，引发情感共鸣。

关键词：智能媒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技术赋能

一、引言

刷短视频填充碎片化时间、用校园 App 查课表、缴学费、预约场馆，通过智能推荐获取感兴趣的学术干货、热点资讯或兴趣内容，这些场景早已深度融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媒体恰似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凭借便捷性、即时性与个性化优势，逐步渗透到学生课堂学习、课后科研、日常生活、社交娱乐乃至价值认知的各个场景，重塑着他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不同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内容同质化的局限，智能媒体依托大数据分析与算法迭代，能够精准捕捉用户兴趣偏好、行为习惯，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推送，同时支持评论、互动、分享等实时双向交流。这种兼顾个性化与互动性的核心特性，恰好与高校思政教育因材施教、按需施教、注重情感共鸣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为破解传统思政教育“一刀切”的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在智能媒体时代，学生深深陷入信息过载、价值多元的双重冲击中，传统思政教育千人一面的讲授模式、同质化的内容供给，难以真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精准化育人，正是要依托智能媒体技术，精准地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成长需求，将合适的内容以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精准推送给合适的人。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减轻教师的课时与进度压力，也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与认知特点，能够带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升[1]。本文结合高校实际实践，深度探析智能媒体怎样让思政教育从被动灌输转变为主动适配，提升育人实效。

二、智能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精准化的现实条件与突出问题

（一）现实条件：技术能支撑，学生有需求

智能媒体为思政教育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大数据能够充分整合学生的学习、行为、网络浏览等多个维度的数据，帮助教师精准把握学生的兴趣偏好和思想困惑；人工智能可对这些数据进行自动分析，为每个学生构建出个性化的思想画像；VR/AR 技术可以打造出沉浸式教育场景，赋予思政教育更强的感染力；实时互动工具则能打破师生在沟通交流时的壁垒，充分实现教育反馈即时化。

同时，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对思政教育的需求早已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课堂上单一的理论说教，更想要获取贴合自己专业、兴趣与生活实际的内容，期望能按自己的学习节奏自主学习，并且能和老师、同学实现即时互动交流。如此一来，高校思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时提升学生对信息的敏感度[2]。这种个性化、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正是精准化育人的出发点。

（二）突出问题：传统模式跟不上智能时代

尽管有了好的技术和需求基础，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制约了精准化落地。

一是需求识别模糊化。很多教师依赖经验去预判学生的思想状况，缺乏对学生多方面的数据系统收集和分析，比如学生关注的一些社会热点、存在哪些思想困惑、更偏好的内容形式，导致教育内容和学生的真实需求脱节。

二是内容供给同质化、一刀切。思政课程和主题活动多采用统一设计和统一开展模式，忽视了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思想层次学生的差异。比如给理工科学生讲纯理论内容，给新生讲解毕业择业话题，这些都很难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三是互动反馈滞后化。传统思政教育大多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有效双向互动。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理解程度和认同态度，而且就算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办法及时地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与方式。

四是技术应用表层化。有部分高校虽然引进了智能媒体工具，比如把线下课程转移到线上、制作少量的思政短视频，但并未真正激活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等核心功能，只是停留在形式上，教育效果并未得到本质上的提升。

三、智能媒体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精准化的实践路径

（一）精准识别需求：给每个学生建立思想动态档案

精准化的前提，主要是摸清学生的真实需求。这就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给每个学生建立一份实时更新的思想档案。利用数据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兴趣点，从而提供更加贴合个人需求的教学内容[3]。

多维度数据采集整合。全面整合校园各类场景的数据，内容涵盖思政课的作业、课堂发言、考试成绩，学生社团活动参与、志愿服务时长，还包括校园 App 的使用轨迹，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以及心理健康测评结果等，全面立体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

智能化算法深度解析。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这些归集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精准找到学生的兴趣偏好、价值倾向与成长困惑。比如，通过分析浏览的内容，发现学生对大国工匠、科技报国的社会热点话题感兴趣；通过统计志愿服务时长，评估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监测情绪类言论，及时发现有焦虑、抑郁等心理倾向的学生。

动态化档案实时更新。学生的思想和需求会随着年级进阶、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所以需要建立思想档案动态化实时更新机制。在新生刚进入学校时，需要重点关注他们的校园适应问题；到了大二大三，要关注专业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毕业前，侧重关注职业规划和社会责任的培养。

某师范高校构建学生思想动态大数据平台，整合十类校园场景的相关数据，为全校 3 万多名学生建立个性化的思想档案。平台通过算法能够精准识别出关注红色文化但理论基础薄弱、担心就业压力、喜欢互动式学习等六类典型学生群体，为后续思政教育的顺利开展明确了方向。

（二）精准供给内容：定制千人千面的思政内容

摸清需求后，就要为学生提供他们真正需要、喜欢的内容，了解这些差异可以使教师更有效地设计课程，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更合适的学习资源[4]，让思政教育有的放矢。

内容设计分层分类。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特质，定制差异化的思政内容。比如，为新生侧重推送校园适应指南和理想信念教育相关的内容；为理工科学生设计专属的科技伦理、科学家精神主题相关的内容；为经管类学生定向推送金融廉洁、乡村振兴中的经济责任担当相关的内容；为毕业班学生重点推送职业规划、基层就业相关的典型案例。

内容推送精准直达。借助智能推荐算法，通过校园 App、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等多元载体，实现内容推送精准直达。比如，向关注红色文化的学生推送 VR 红色研学视频、革命先辈事迹；为有就业焦虑的学生推送学长学姐的求职经验、心理疏导文章；给偏好互动的学生定向推送思政问答小游戏、在线辩论赛链接。

形式创新激发兴趣。以学生喜欢的形式去呈现思政教育内容，比如开发重走长征路的 VR 课程，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沉浸式体验红军长征路途中的艰辛，比单纯听讲座更具有感染力；开展“思政直播 + 连麦互动”活动，邀请行业榜样、思政名师在线解答学生疑问；拍摄一批接地气的思政短视频，比如用情景剧的方式讲述诚信故事、用动画解读政策理论，让学生不仅能看得进，而且能认同。

某理工高校立足于工科学生特质，打造科技思政系列的专属内容体系：借助 AR 技术还原“两弹一星”研发场景，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科学家的爱国情怀；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开展直播分享技术报国的实践经历；通过智能推荐算法，为不同专业学生推送相关领域内的正能量的典型案例，比如给计算机专业学生推送国产操作系统研发的故事，给土木专业的学生推送大国工程建设的案例，相关内容的学生完播率比传统思政内容提升 70%。

（三）精准优化过程：打造实时互动闭环

思政教育绝非单向传输，要构成“发现问题—调整优化—再反馈”的实时互动闭环，确保教育效果动态化提升。

实时监测学习效果。借助智能媒体工具，动态追踪学生对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比如，学生在看思政短视频时的观看时长、完播率，做互动答题时的正确率以及在评论区的发言倾向等数据，这些数据均能及时反馈至教师端。

智能分析找问题。对这些反馈数据进行深度解析，精准定位找出教育过程中的短板。比如，某段内容的完播率偏低，可能是因为内容形式过于枯燥乏味；学生在评论区频繁追问某个理论问题，就说明讲解不够透彻。

快速调整优化内容。根据分析结果，及时调整教育内容与形式。比如，将枯燥的理论内容转化为动画短片；针对学生的高频疑问补充专题答疑视频；如果

学生偏好互动多一些，就多开展在线辩论赛、主题讨论等活动。

某职业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依靠学习平台监测学习数据，发现学生对劳动教育章节的互动率偏低。随后教师迅速调整优化教学方案，并邀请企业技能大师做直播分享劳动创造价值的实践感悟，同时还组织学生开展“技能比武 + 思政感悟”的主题活动，学生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四）精准强化保障：筑牢技术、制度、队伍三大支撑

要让精准化育人落地见效，离不开技术、制度、队伍的协同发力与保障。

一是技术保障。搭建安全且高效的智能思政平台，保证数据采集、分析、推送全流程顺畅运行。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明确数据采集范围，采用加密技术，严防学生隐私泄露。

二是制度保障。制定数据管理相关制度规范，比如数据管理办法、内容审核机制、教师职责清单等制度规范，明确数据的使用、内容的审核、教师履职的具体内容，确保精准化育人能够有序推进。

三是队伍保障。提升思政教师的智能媒体应用能力。通过各类专题培训，让教师学会使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智能推荐平台，掌握 VR/AR 技术的基本操作技能；组建“思政教师 + 技术人员 + 学生骨干”的协同团队，思政教师负责内容设计，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学生骨干反馈需求，凝聚育人合力。

四、智能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精准化的实践挑战与优化对策

（一）主要挑战

技术落地有难度。在资源较少的地区和学校，学生可能无法充分享受先进教育技术带来的好处[5]，技术赋能难以实现。

隐私保护有风险。多维度收集和分析学生数据，不但可能会泄露学生隐私，若数据使用不当，还可能引发学生觉得被监控的抵触情绪，影响教育接受度。

内容质量难把控。有部分内容为了追求流量与趣味性，忽视思想性和价值引领的核心要素，把内容变得娱乐化，严重背离了思政教育的本质初衷。

教师能力跟不上。部分思政教师受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智能媒体技术欠缺，难以熟练地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等工具开展教学。

（二）优化对策

降低技术应用门槛。鼓励高校和科技企业合作，依托企业技术优势，搭建低成本、易操作的智能思政平台；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地方院校的资金扶持和技术赋能，推动智能媒体工具的普遍应用。

健全隐私保护机制。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仅收集和思政教育相关的必要数据，不涉及学生私人信息；采用数据匿名化处理、加密存储等技术手段来保障数据安全；明确数据的用途并向学生进行公示，赋予学生数据查看与删除的自主权利。

严把内容质量关。建立“思想性 + 趣味性”的双重审核机制，所有思政内容必须先审核，要确保既符合学生兴趣，又传递正确价值观；鼓励思政教师、专家学者参与创作，增强理论深度；邀请学生参与内容策划，让内容更贴近校园实际与生活需求。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将智能媒体技术应用、大数据分析等内容纳入思政教师的常态化培训体系，通过线上课程、线下实操、案例研讨等多种方式，助力教师掌握相关技能；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探索智能媒体赋能思政教育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五、结论

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蓝海，更为精准化育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能。精准化育人绝非以技术简单替代传统教学模式，而是要始终坚守“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导向，将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智能媒体技术的赋能优势，与思政育人铸魂育人的本质要求深度融合。通过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学生思想困惑、价值诉求与成长痛点，依托个性化内容供给满足差异化学习需求，借助动态化过程优化实现全周期育人闭环，依靠系统化保障机制筑牢育人根基，多维度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与感染力。

面向未来，高校要突破技术应用表层化、形式化的现实困境，以问题为导向妥善应对智能时代的多重挑战：在隐私保护层面，需建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实现技术应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协同推进；在内容质量层面，要强化价值引领内核，打造兼具思想深度、时代温度与技术精度的优质思政资源；在教师能力层面，应构建常态化培训机制，提升教师技术应用、内容创新与互动引导的综合素养。唯有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建“技术 + 内容 + 互动”三位一体的精准化思政新生态，才能让思政教育真正穿透屏幕、抵达学生内心深处，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陈华，何林智 . 新媒体时代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 36(17): 94−96.

[2] 李盈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协同育人路径探索：基于新媒体环境特点 [J]. 快乐阅读，2023(08): 106−108.

[3] 周权，冯松，余慧娟 . 人工智能时代湖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遇与风险 [J]. 湖北（下转 198 页）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创新探索

汪秀霞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当前高校教育“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割裂问题的关键举措。本文立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深入剖析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探索打造“目标协同、内容协同、方法协同、评价协同、主体协同”五个维度的创新实践路径，旨在打破课程壁垒，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内在融合，为高校构建“三全育人”体系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协同育人；人工智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1]，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前进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肩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专业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两者不可或缺[2]。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思政课与专业课“各自为战”的现象普遍存在：思政课上习得的价值理念难以转化为专业实践中的行为准则，专业课中掌握的技能工具也缺乏价值引导。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内容生成、个性化定制服务等能力为打破二者壁垒、推动协同育人提供新可能与契机。

一、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时代召唤与学理根基

（一）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时代必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技术内核 + 人文底色 + 跨界能力”等特征，如制造业要求将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升级、国家需要对接，强调技术创新力与社会责任感统一。不难看出人工智能时代的育人目标，是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打破课程壁垒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为协同育人指明方向。如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3]，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为协同育人明确政策导向。2024 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为协同育人的评价机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2025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指出“探索‘人工智能 + 教育’应用场景新范式”，为协同育人明确时代方向。

（二）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学理根基

1.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协同育人提供哲学支撑

《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未来社会教育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充分地发展其才能的机会”[4]，

（上接 197 页）

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3, 36(20): 149−151.

[4] 刘明龙 .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智慧思政建设研究 [D].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 , 2021.

[5] 肖艳 .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思考 [J]. 教育现代化 , 2020, 7(04): 98−99.

（作者系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这里的“才能”既包括智力（科学、技能），也包括道德（集体精神、社会责任感），二者共同服务于“自由而全面的人”的培养。德育与智育作为人的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脱离德育的智育将导致技能异化，缺乏智育的德育则是空洞说教。这一理论直接要求教育必须打破思政与专业课程壁垒，既重视专业知识传授（智育），又强化思想道德培育（德育），二者有机融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2. 新时代教育理论为协同育人提供思想引领

教育的根本问题、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鲜明指出教育的政治属性。我们的教育就要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有用人才，这要求思政教育必须深度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确保人才培养方向正确；“怎样培养人”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规划育人各个环节，整合资源统筹各方，发挥协同育人作用。而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正是创新育人方式的关键路径，能让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形成合力；“为谁培养人”则明确了教育服务的根本指向——为人民、为治国理政、为制度巩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从根本上凸显协同育人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复合型人才的必要性。

二、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

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目前虽在理念层面形成共识，但在落实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

（一）教学目标协同性匮乏

思政课和专业课的目标缺乏统一规划，思政课侧重于价值引导和意识形态教育，专业课教师更注重知识和技能培养，两者在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差异，缺乏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的系统规划，协同育人从源头就陷入“各说各话”的状态。

（二）教学内容融合度不足

思政课的内容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为主，案例多选取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与专业领域的前沿问题、实践场景联系不够。反观专业课则局限于知识传授，对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不足，往往将思政内容简化为“课程导入时的几句口号”等，内容缺乏有效整合。

（三）教学方法协同性缺失

思政课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要教学模式，虽然近年来也引入情景体验等新方法，但仍缺乏与专业实践的深度结合，思政理论转化为专业行为准则的力度不够。而专业课注重实验、项目式学习等实践教学，重点聚焦技能训练，缺乏价值引导。即使部分课程尝试联动，也多为形式上的拼接，方法上缺少有机呼应。

（四）教学评价关联性匮乏

教学评价存在多种问题。一是评价维度单一化，主要考核知识掌握和技能应用，忽视政治素养等育人维度的评估。二是评价主体局限化，评价主体主要为教师，缺乏学生、行业专家参与，缺乏思政与专业教师交叉互评。三是过度强调结果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价，评价多聚焦理论与知识点考核，忽视过程中团队协作、价值判断等素养考核。四是评价标准上缺乏统一性，思政课与专业课评价各有标准，关联性缺失等多个问题。

（五）教师能力适配性不足

思政课教师大多缺乏专业领域的系统知识，难以将思政理论转化为贴合专业场景的教学内容；专业课教师则缺乏思政教育的方法论训练，对“如何挖掘专业中的思政元素”感到困惑，存在“想做却不会做”现象。同时教师均存在数字化素养不够问题，缺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

三、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教学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从技术层面为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提供工具支撑，更从理念层面拓展协同的可能性边界，为摆脱现实困境注入新动能。

（一）目标协同：从“各说各话”到“同向同行”

教学目标是推动教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进行统一规划，构建科学教学目标体系。一是锚定顶层总目标，聚焦学生“德才兼备”培养核心，设定顶层育人目标，避免思政课与专业课“两张皮”。二是设立中层分目标，根据思政课与专业课不同定位，拆解二者协同维度，明确各自育人的侧重点与衔接点。三是细化底层子目标，将中层目标拆解为可落地的具体课堂任务。思政教育结合专业案例设计教学，专业教育挖掘知识点中的思政元素，设计个性化定制化的专属课堂。

（二）内容协同：从“简单叠加”到“互嵌互融”

一是思政元素的专业化转化。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取“大思政”核心知识点和共性价值内核，建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智能关联数据库，同时深入挖掘二者融合点、切入点，提炼“专业 + 思政”特色知识点，形成具有学科辨识度的思政教学内容体系。二是专业内容价值化挖掘。结合各行业需要的人才需求，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各专业对应的价值内涵，将思政元素转化为专业素养表达。如讲述“芯片技术”，可挖掘我国芯片产业“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的历程，培育学生的科技自信。三是跨学科内容的共创共享。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思政 + 专业”融合共创平台，打造动态更新的线上课程资源库，促进思政与专业共创互融。

（三）方法协同：从“单向传授”到“互动共生”

思政课与专业课教师双方要善于学习对方的教学优势，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方法互鉴。如思

政课可借鉴专业课的实践教学方法，增强思政课实践性和趣味性。专业课也可引入思政课的讨论法等，共同开发智能化教学平台，实现教学方法融合。

一是思政课与专业课融合打造问题链。核心是根据课程任务，进行课程衔接，精心设计一系列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问题，构成问题链，启发思考。如在思政与机械制造专业融合教学中，运用 AI 生成问题："机械制造过程中，应秉持什么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需要储备哪些专业素养""若企业为降低成本，拟采用不符合标准的材料，作为工程师，你会采取哪些行动"等。由此激发探索兴趣，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发力打造任务链。核心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和专业特点设计一系列进阶式实践任务，以阶梯化实践深化认知。例如，在林学专业中布置三项任务：基础任务，分组调研当地濒危树种现状，分析传统培育技术存在的问题；进阶任务，模拟科研团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树种改良方案；拓展任务，撰写《林业科技自立自强倡议书》，讲述创新对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重要性，并发起倡议。通过"调研—设计—倡议"逐步进阶任务，深度融合创新精神培养与专业实践。

三是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创新设置情境链。核心是借助 AI 构建一系列相互关联、逐步深入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探索，实现知识内化与能力提升。如课前采用新技术创设与专业相关情境，让学生在真实业务环境中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带着问题学习平台资源[5]。课中模拟真实场景（如打造高度仿真"导游服务场景"，扮演导游处理游客投诉、行程安排等问题）在虚拟与真实情境交互中感受未来的职业处境。课后布置情景剧表演等沉浸式作业，提升职业素养。除此之外还可探讨更多系统发力的教学方法、模式，通过互学互鉴，实现互动共生。

（四）评价协同：从"单一评判"到"立体画像"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师生力量，采用"线上 + 线下""课内 + 课外"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科学全面的教学评价体系。一是构建"思政 + 专业"双维度评价标准，将专业成绩与社会责任感表现、技能水平与职业伦理认知等相结合，评价学生综合素质。二是拓展评价主体。采用"学生自评、教师点评、生生互评、师生互评"等方式多元考评。三是丰富评价内容。既评价知识掌握程度，也考查实践中团队协作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伦理等素养，理论考查与素质考核并重。四是"过程考核 + 结果考核"同步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时反馈学习过程，既评估学习情况，也评估学习态度和价值倾向。结果考核检验核心能力。二者同步开展，打造兼顾学习轨迹与最终成效的立体评价体系，助力全面发展。

（五）主体协同：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共创"

教师是教学创新的主体，是推进协同育人的关键力量。一是加强教师数字化素养培训，提高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二是加强双方合作，建立协同育人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强化专业了解，了解行业动态，储备"专业知识"，避免思政内容与专业脱节，使思政教育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开展专业课教师"思政素养提升活动"，结合课程思政项目，采用专题培训、思政课旁听、红色教育实践等强化育人意识。三是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开发融合型教学资源。组建团队跨专业联合备课、共同授课、教学研究等探索适合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实现团队共创共用。

四、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推进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教学创新，是时代所趋，更是国家培育人才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时代推进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教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从"目标、主体、内容、方法、评价"等五个维度构建协同育人的教学创新体系，提升协同育人教学实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 2020(17): 26−3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633.

[3] 刘慧 , 曹洁 .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问题研究 [J]. 陕西教育 (高教), 2023(09): 10−12.

[4] 邹国振 .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022(05): 81−85.

[5] 何红娟 .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建构策略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017(05): 60−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一般项目"'大思政课'视阈下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研究"（JAS24241）。

（作者系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工智能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开放教育思政课研究

蔡焕培

摘要：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已成为新时代提升开放教育思政育人实效的重要途径。鉴于当前开放教育在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中存在资源建设分散、过程支持不足及课堂形式单一的情况，本文对红色文化的价值定位进行了系统分析，阐述了其在认知、情感与能力培养中的多重作用。研究介绍了在智能化背景下进行资源数字化生成与平台共享的方法，探讨了通过个性化推送与学习行为分析实现过程支持的策略，并结合虚拟仿真与互动引导提出了课堂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构建语义化资源体系、建立数据驱动的学习反馈机制以及优化评价框架，是推动红色文化在开放教育思政课教学中实现深度融入的关键。

关键词：红色文化；开放教育；思政课；智能化教学

开放教育作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任务。在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中，其育人功能虽与普通高校一致，但因学员年龄、学历和工作背景差异，思政教育更具复杂性。在“大思政”体系建设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同时有效融入红色文化以强化价值引领，成为开放教育体系思政课创新发展的关键议题。当前课堂普遍存在资源零散、过程支持不足、教学方式单一等局限，难以实现认知、情感与能力的系统培养。借助智能化手段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精准支持学习过程并创新课堂形态，已成为提升课程质量的突破口。本研究以资源建设、过程支持和课堂设计为主线，探讨红色文化在开放教育中的深度融入路径，提出可操作的教学改进方案，为价值认同与学习效果提升提供实践依据与理论支撑。

一、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价值定位

红色文化融入开放教育体系思政课，并非历史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价值体系与学习方式的重塑，其核心在于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认知、情感与能力的协同架构[1]。在认知层面，数据处理与语义建模使红色文化资源结构化、关联化呈现，帮助学习者把握历史逻辑与价值脉络；在情感层面，虚拟仿真和沉浸式交互将理想信念与情感体验具象化，推动价值认同；在能力层面，智能化分析与反馈将学习转化为实践过程，促进基于证据的推理和立场表达，推动思政课价值目标的精准落实。

价值定位还体现在对学习者自主性与批判性的激发。传统课堂偏重单向灌输，而人工智能支持的个性化推送与多模态任务，使不同背景学习者能结合经验与实践达成认同[2]。这种个体化建构与群体共识的张力，是红色文化教育的深层价值。借助行为证据、文本表达与讨论网络等指标，价值认同可被度量与验证，从而将抽象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可检验的学习成效。由此，红色文化的价值定位不仅是理念的引领，更是方法的再造，实现教育内容、学习方式与评价机制的统一，使思政课由知识传授走向价值生成与过程建构，凸显新时代的独特意义。

二、红色文化融入开放教育体系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资源建设的碎片化与单一化

目前红色文化资源多是由新闻稿、纪念馆图文以及短视频构成，呈现的状态分散、重复且版本不一致。平台侧缺少统一的元数据与语义标签，常常按时间线或地点实施粗粒度归档，人物、事件与精神要素之间的关联未予编码，较难支持跨资源检索及任务化整合。大量素材未做来源的校验与版本管理，图像清晰度、文本标注的规范度、口述史可信水平不一致，让课程包只能停留在“阅读 + 观看”的单模态堆积状态，缺少 SCORM/xAPI 兼容相关和知识图谱的支撑点，资源不易被跟踪利用及复用迭代，更没办法按难度、情感目标跟职业背景来分层，最终形成“有数量却无有效利用价值”的供给结构[3]。

（二）学习过程支持的弱化

开放教育学员的学习节律不稳定，现有学习平台记录多数停留在播放次数、测验分数这类浅显事

件上，缺失反思文本、讨论贡献和情境判断等过程证据的精准采集，学情画像长期存在偏差，导师端不能及时发现“低投入—低掌握—低反思”的风险链，干预落后于退课断学的时间节点。讨论区话题常常被口号化表态所淹没，欠缺以证据作支撑的追问与同伴互证；作业批改看重事实重新叙述，未顾及价值推理质量，造成个体化反馈不足且不可溯源，数据在多个平台及工具间呈分散状态，难以构建起用于再教学决策的证据链，当下预警阈值依靠完成率与停留时长的粗陋指标，难以区分“被动播放”“高速刷题”等形式的伪学习。

（三）课堂教学方式的局限

混合式环境下，课堂的形态依然以“教师讲述—学生汇报”为主要模式，任务往往停留在表明观点与资料复述，缺少围绕关键史实进行立场对话与情境抉择。面对成人在职人群时间碎片化的现象，线下研讨和线上分组讨论难以长久开展，讨论深度被会议化流程稀释。课堂在证据使用上偏重二手资料的展示，对原始史料的比对以及证据链构建的训练欠缺，价值判断易落入同质化认同。由于设备差异与教学组织成本，沉浸式资源常被置于边缘化境地，无法形成稳定的体验阶段，评价主要借助知识点测验与心得的字数，难以有效体现论证质量、证据采用与情境判断的综合情形，课堂活动和学习成效之间未形成明确映射。

三、人工智能支持下的红色文化融入路径

（一）智能化资源建设

1. 红色文化数字化内容生成

把“史料还原—语义建模—任务化生成”作为主线来构建内容生产流水线，原始档案、口述史和地方志先推进版面复原与 OCR/HTR 识别进程，依照段落、事件、证据出处开展对齐工作，随后实施人物、地点、时间、概念和精神要素的命名实体抽取与关系连接，形成以“人物—事件—地点—史证—价值意涵”为内容的知识图谱。依托检索增强开展脚本生成，将史实素材转化为时长 5~8 分钟的微课脚本、时序时间线及情境讨论题，并附上能溯源的证据标识及版本号码，杜绝“故事化改写”引发的信息失真。影像与语音采用多模态一致性校验，保障口述史与书面材料彼此证明一致；对关键图像制作可缩放的 IIIF 图层，支持细节放大后比对。产出统一以 xAPI/SCORM 格式打包，可直接接入开大学习平台，记录学情数据；同时生成移动端与离线轻包，适应在岗学习者零碎时间段的使用场景，依靠教师工作台提供“脚本—素材—任务”联动模板，便于开展二次编辑与本地化改良。

2. 开放教育平台资源共享

按照“可发现—可复用—可迭代”打造共享模式，所有资源在上架之前做好元数据编目，除主题与难度以外，额外标明情感目标、适配人群、学习时长及所需的设备，检索端支持按“史证类型”“任务要求”“情境标签”进行组合查询，教师可迅速组合形成课时包。资源库引入使用轨迹与学习成效的综合评价，制定“资源信用分”，把低命中、低完成素材的权重自动降低，再推送改进建议；对高价值资源开放“衍生模板”，便于在不同课上复用以及多校共建，完成平台侧的开放接口开发，实现校内课程中心、虚拟仿真库与素材库的打通，教师上课授课时可一键拽取历史版本与证据链，杜绝重复开发。针对低带宽环境给出自适应码率与图片渐进式加载，又内置了“离线缓存—在线回传”这样的队列，保障学情数据不遗失；对小规模试用课程布置 A/B 变体，上线前基于学习数据抉择更恰当的呈现方式及任务构造。该共享模式通过元数据标准化编目与动态信用评价机制，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平台复用与迭代优化，既契合开放教育“体系化建设—个性化适配”的内容开发逻辑，又通过使用轨迹分析与衍生模板共建，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教学适配精准度。

（二）学习过程智能支持

1. 智能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

把学习者画像当作进入途径，将职业背景、可用时段、历史掌握度与兴趣线索转变为动态向量，通过短测与反思片段相结合完成冷启动诊断，内容路由借助知识追踪与多臂老虎机协同的机制，以“史实理解—证据使用—价值论证—情境判断”这四类能力为核心，按照掌握度和节奏，推送不同类型的材料与任务；针对高频移动端用户，优先给出短时段任务与音频化摘要，对符合深阅读条件的学员安排史料比对及跨证据写作事项[4]。干预策略突出“简便又及时”，若出现投入不高或反思不够的迹象，推送与当前主题具有强相关性的微任务与同伴提示，防止借大作业增添负担，教师端能把所有推送及干预解释为“因果链”，方便在教研工作中复盘修正，面向学习节奏长期呈现不稳定的个体，系统将制定“固化时段建议”及提醒方案，让自适应路径切实落实到具体日程。

2. 数据驱动学习行为分析

借助“行为—文本—网络”三维证据打造学情分析框架，行为层记录学习的有效时长、连贯程度以及任务按时完成状况，区分“被动播放”“高速刷题”等看似投入的假象；文本层对反思与论证作业进行证据引用密度、论证链完整性以及价值关键词覆盖情况的细评；网络层对讨论时的互动图谱与观点多样性指数加以分析，识别出沉默节点与意见领袖[5]。三类证据汇聚到教师仪表盘，生成“后续教学触发卡片”，好比“史证使用能力弱——建议补充原始档案比对任务”“情境判断失稳——建议引入对立案例”，预警模型不是凭借单一阈值判定，而是联合个体基线的偏离幅度进行柔性提醒，杜绝误报引发的干扰。所有指标更可视化兼具课程级与个体级双视角，教师只点击

就能回溯到具体学习片段与讨论语境，作出针对性的反馈，对改进举措安排前后测与小规模准实验，借助数据对设计有效性进行验证，构建稳定的改进循环。

（三）课堂教学创新设计

1. 虚拟仿真与沉浸式体验

沉浸式“思政课”要融入更为真实生动的现实素材，开放教育可用“真实史境—角色抉择—证据链”作为教学的组织模块，创建可于 PC 与手机端运行的轻量化沉浸式课程。如笔者所在的开放大学结合本地资源海丰红宫红场旧址与彭湃农运史实重建关键场景，学员从“地方干部—青年学生—农会骨干”等角色中挑选，经由翻阅档案、聆听口述片段与查看当期的舆情资料，落实立场说明及行动规划[6]。系统在关键节点处安排多路径分支及后果测算，要求学员提交证据链的截图、原始文献的选段与价值论证的文本，防止产生“情绪化表态”，仿真资源提供的 2D/360° 双通道支持与低端设备兼容模式，保障普遍能抵达；课堂组织选用“个体探索—小组共证—全班复盘”的节奏方式，小组展示要指明“证据—推理—结论”的链路以及未解决的状况，教师按照这个进行针对性讲评，仿真结束后的反思环节不把情感抒发当作主要内容，而是对证据运用与立场一致性加以剖析，带动价值认同在可核验的事实根基上构建。

2. 智能助教与互动讨论引导

把对话式引导融入讨论的整个流程，智能助教借助课程知识库与证据库，对发言实行“问题聚焦—证据追问—对立重述—价值升维”的链式推进过程，对于仅呈现结论的表态情形，系统要求添加出处及材料截屏；就单一立场的论断而言，自动选出对立材料的最强论点，引导“钢人化”复述且加以对照；就高质量的论证而言，建议延伸至现实局面的价值冲突辨析，推动“历史—当下”的过渡。若置信度低，助教就把问题升级到教师端，同时附上候选的追问方向与可能的错误区域，减少教师备课与当场检索的压力，互动以“匿名同伴互评和公开辨析”的组合样式推进，评分维度涉及证据充分与否、论证结构形式、观点独立性与公共表达，课堂记录沉淀成论证树与案例卡，供后续班级再度复用；教师可一键将讨论的发展脉络和高质量回答导出，回归资源库打造“可教的案例”，达成从一次性讨论到可积累资源的转变[7]。

四、结语

红色文化在开放教育体系思政课教学中的融入，已从单一资源供给转向认知、情感与能力协同建构的复合过程，其价值定位在于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实现深度认同与思维品质的养成。当前实践仍存在资源结构失衡、过程支持滞后与课堂形态单薄等问题，但在智能化资源建设、个性化学习支持与沉浸式教学设计的推动下，已展现出系统化改进的路径。未来的研究需在跨平台资源共建、基于证据的学习评价和价值导向一致性审查方面持续探索，以推动红色文化育人与开放教育形态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孙苓，梁晓晖．高校思政课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探析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32): 59−62.

[2] 江圆，徐永利．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三重论域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32): 54−59.

[3] 胡英敏．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改革探析 [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25, 27(04): 68−72.

[4] 王驰．政治认同视域下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J]. 理论观察，2025(08): 92−97.

[5] 钟英．本土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职思政课教学新探 [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35(04): 17−21.

[6] 张晓丽．苏州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的实践探究 [J]. 中国教育学刊，2025(08): 131.

[7] 朱碧茵．需求分类理论视角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研究——以汕尾老年大学白字戏培训班为例 [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24, 33(05): 22−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广东开放大学体系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开放教育思政课教学实践研究——以汕尾开放大学为例”（2025TXJ020）；国家开放大学 2024 年度科研课题“需求分类理论视角下基层开放大学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Y24A28111）；2024 年度学习型社会建设（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终身教育‘一体双管五维融合’创新教学模式助推‘双百行动’实践研究”（JXJYGC2024G325）。

（作者单位：汕尾开放大学）

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陈彩云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推进，民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其课程思政质效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方向。本研究立足民办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际，结合学生职业迷茫、自我认同不足、社交焦虑等心理特点，先分条梳理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再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机制三个方面分析质效提升的现实困境，最后针对性提出突破路径，以期为民办高校完善课程思政体系、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心理关怀”三重目标、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学生心理；心理关怀

课程思政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与改革各环节，让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步推进的重要教育理念。民办高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贴近市场的专业设置，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上有独特优势。但受办学定位、资源配置、学生群体特征等影响，其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还存在质效不均的问题。不少民办高校学生有鲜明的心理特征，有的因高考成绩不如公办高校学生而自我否定，有的因家庭经济压力焦虑就业，还有的因缺乏社交技巧陷入孤独。如果忽视这些心理需求开展课程思政，既难引发情感共鸣，还可能让学生觉得“思政和自己无关”，导致课程思政流于形式。因此，把学生心理关怀融入课程思政质效提升全过程，是民办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

一、民办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

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课程思政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它不只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还能给专业学习增添精神内核，让人才培养有温度也有深度。明确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既是民办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也能为后续解决建设难题、找提升路径定好方向。

（一）助力人才培养目标落地，契合行业需求与学生心理期待

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如今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早已从“单一技能型”转向“德才兼备型”，对学生而言，大多希望通过教育缓解职业焦虑、建立职业自信。课程思政恰好能把“社会责任”这类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树立起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避免出现“重技能、轻素养”的培养偏差[1]。这种模式不仅能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还能通过讲解专业领域的榜样事迹，帮助学生破除“民办高校学生竞争力弱”的自我否定想法，增强职业自信心，缓解因未来不确定带来的焦虑。

（二）突出学校办学特色，增强竞争力与学生归属感

当下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民办高校要想突围，需依靠特色发展，课程思政正是打造办学特色的重要抓手。民办高校可以结合自身专业布局的优势，构建“专业＋思政＋心理关怀”的特色课程体系，形成独特的教育品牌。比如艺术类专业融入“文化传承”元素时，让学生通过创作表达自我，增强自我认同。这样的课程思政体系，既能提高学校的社会认可度，又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关注”，强化对学校的归属感，改善因自我认同不足产生的心理疏离。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缓解成长困惑与心理压力

民办高校学生正处在价值观成型、探索职业的关键阶段，心理矛盾较突出，既想依靠专业学习实现自我价值，又会因学习难度产生畏难情绪；既期待拓展社交圈，又因缺乏技巧陷入孤独。课程思政能弥补民办高校在人文教育和心理疏导上的短板，通过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理认知。比如团队项目教学中，借“协作共赢”的思政引导，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沟通能力，缓解社交焦虑；讲专业难点时，融入“坚持不懈”的案例，帮学生克服畏难心理[2]。同时，课程思政还能通过价值观引导，让学生理性看待家庭经济压力、社会评价这些问题，减少心理内耗，为他们未

来适应职场、个人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二、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的现实困境

（一）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融合不够，未回应学生心理诉求

课程思政的关键在“融”，要把思政元素、专业知识和学生心理需求拧成一股绳。但现在部分民办高校的课程思政，明显存在“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有些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到位，把思政元素当成“口号”硬塞，在专业课中突然插入思想政治内容，却不结合专业本身的内涵进行设计；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完全未考虑学生的心理需求，民办高校学生常有的自我不认同、找工作焦虑、不会社交这些问题，并未被关注[3]。比如讲“职业规划”，只说行业趋势，不帮学生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使学生“怕找不到好工作”的焦虑难以缓解；上团队协作课，只催着完成任务，却不教学生怎么沟通，社交能力弱的学生还是难以融进集体，这样的课程思政无法让学生有共鸣、真心认同。

（二）单一化教学模式主导，加剧学生抵触情绪

民办高校的学生思维灵活、愿意动手实践，但也比较敏感。有的学生怕回答错被笑话，上课不敢主动说话；有的长期被动学习，对教师单向灌输本来就反感。可现在不少民办高校的课程思政，还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缺少互动和体验感：理工科教师大多依靠 PPT 播放思政案例，学生被动听，案例和自己生活关联不大，很容易走神；文科课虽然有小组讨论，但话题离学生心理困惑太远，比如只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不说“怎么运用所学理论缓解学习压力”，而且分组较为随意，社交弱的学生被冷落，孤独感更强，对课程也更抵触。这种单一模式满足不了学生“主动探索”“想有情感共鸣”的需求，还不顾学生的心理感受，最后课程思政只能是“学生表面应付、心里不接受”的形式主义。

（三）单一化评价标准为主，不重视心理转化效果

科学的评价机制对提升课程思政质效很重要，而现在民办高校的课程思政评价，大多只看结果，标准单一，未完全考虑心理层面的变化。一方面，评价只关注教师的教学行为，比如“有无增加思政元素”“案例是否够多”，却不关注学生认不认同、价值观有无变化、心理状态有无改善[4]。另一方面，评价多是定性描述，没有量化和动态跟踪，比如让学生填满意度问卷，只问“教师态度好不好”“课程难度如何”“课件怎么样”，并未问“思政内容有没有帮到自己调整心理”“社交焦虑有无减轻”“学习畏难的心态有无好转”，无法全面体现课程思政“教知识、引领价值观、关怀心理”的综合效果。这样的评价机制给不了精准反馈，课程思政要提升质效也很难。

三、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的突破路径

当前民办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内容融合不深入、教学模式较单一、评价机制不全面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让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出现脱节，还没能充分关注学生在自我认同、职业焦虑、社交适应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导致课程思政难以真正走进学生心里。要改变这种状况、提升育人实效，民办高校需始终把“以学生为中心”放在首位，将心理关怀切实融入解决办法，从教学内容重塑、教学方法改进、评价体系完善三个关键方向共同发力。只有这样，才能精准破解现有难题，为具体突破路径的推进做好铺垫，让课程思政真正发挥好知识传授、价值引领与心理关怀的三重作用。

（一）立足学生需求，深化“思政 + 专业 + 心理”三维融合

首先要做的是挖掘“专业 + 职业 + 心理”多导向的思政元素。民办高校可以组织教师先做学生心理调研，摸清学生的心理痛点，再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课程知识中提炼多维度的思政内容。比如财务管理专业的“财务风险防控”课，不只要找到“职业操守”这类思政点，还需考虑学生“怕将来工作出错”的焦虑，所以要加入“既严谨细致又有容错意识”的引导内容，既向学生强调财务工作必须规范，也帮助他们学会理性看待工作中的失误，缓解因为追求完美带来的心理压力；又如护理学专业的“人际沟通”课，在挖掘“同理心”这个思政元素时，要教给学生实用的沟通技巧，让他们既能提升医患沟通能力，也能减轻因为社交能力弱产生的焦虑。

其次是设计“分阶段 + 心理适配”的教学内容。民办高校学生不同年级的学习目标和心理状态不一样，课程思政内容也要跟着分层设计。大一学生刚进校园，处于“适应期”，重点要放在“理想信念 + 集体融入”上，比如组织“校园文化分享会”，帮他们快速适应大学生活，减少因为环境陌生带来的孤独感；大二、大三学生进入“专业深耕期”，主要抓“专业伦理 + 抗挫折”教育，讲专业难点的时候，穿插一些“研发团队攻克技术难题”这类体现“坚持”“创新”的思政案例，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中的畏难心理；大四学生面临毕业，处于“就业准备期”，要侧重“职业素养 + 心理调适”，邀请企业 HR 来开分享会、组织职业模拟面试，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就业压力，缓解“怕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焦虑，帮他们树立积极的就业心态。

（二）适配学生特点，创新“互动 + 体验 + 心理关怀”教学方法

一方面要推广“小范围 + 个性化”的互动体验式教学。民办高校学生心理比较敏感，所以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小组互助学习”的模式，开展案例教学、情境模拟、项目式学习这些有互动、有体验的教学活动[5]。比如法学专业的“劳动合同法”课，围绕“职

场纠纷”案例，把学生分成 5~6 人的小组实施模拟法庭，让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避免社交能力弱的学生被冷落；市场营销专业的“消费者行为学”课，组织“校园公益营销”项目，让学生分组设计公益活动方案并实际执行，使他们在实践中既能提升沟通协作能力，也能缓解社交焦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学生发言紧张就多鼓励，学生沉默寡言就主动引导，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舒适的心理状态下参与学习。

另一方面要利用“数字化 + 匿名化”的教学手段。现在学生喜欢线上交流，民办高校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虚拟仿真这些数字化工具，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优化教学。比如思政类公共课，制作“抗挫折心理疏导”“职业焦虑缓解”这类主题的微视频，通过校园 App 推送给学生，方便他们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搭建“思政 + 心理”的线上互动平台，设置匿名讨论区，让学生用昵称分享“学习压力”“职业困惑”“社交烦恼”，教师用“学长 / 学姐”这种亲切的身份匿名回复，避免学生因为“怕被说”不敢讲心里话；还可以用虚拟仿真技术还原“职场沟通”“团队协作”的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里反复练习，减少“怕出错”的心理负担，逐步提升实践能力。

（三）优化评价体系，开展“知识 + 价值 + 心理”三维评价

第一是设计“多元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民办高校不能再用单一的标准评价课程思政，要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价值与心理转化”三个维度设计指标。“教师教学”维度，要看思政元素融入得是否自然、教学方法是否符合学生心理特点、心理关怀措施有无效果；“学生学习”维度，设置“课堂参与度”“线上互动频率”“小组协作贡献度”这些指标，尤其要关注平时沉默的学生有没有更多参与；“价值与心理转化”维度，既要有量化指标，比如“职业焦虑量表得分有没有下降”“自我认同量表得分有没有提高”“社交焦虑量表得分有没有减少”，也要有质性指标；学生心理日记里积极情绪占比、职业规划书里有没有体现自信、实践报告里对协作的感悟是否深入。要通过“学生心理状态问卷”“深度访谈”“分析学生作品”这些方式收集数据，全面衡量课程思政的综合效果[6]。

第二是采用“全过程 + 个性化”的动态评价方式。民办高校要改变“一次性评价”的传统模式，进行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评价。课前通过“学生心理需求问卷”，摸清学生当前的心理痛点，为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供依据；课中使用“课堂观察记录表”“即时反馈二维码”，实时收集学生对教学的感受，如果发现学生普遍走神、烦躁，就临时增加心理放松小互动，及时调整教学节奏；课后让学生写“课程学习反思报告”，再用“心理状态追踪问卷”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对效果不好的教学环节进行优化。同时，评价标准也要因人而异——对社交能力弱的学生，重点看他们“参与次数有没有增加”，而不是“发言质量高不高”；对学习有畏难心理的学生，重点看他们“有没有坚持完成任务”，而不是“成绩排名好不好”，通过这种差异化评价，鼓励学生一点点进步。

四、结语

民办高校课程思政质效提升，是“价值引领与心理关怀并重”的系统工作，需立足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和学生心理特点，从教学内容、方法、评价多维度一起发力。当前面临的“融合不深”“方法单一”“评价片面”等问题，实际上是未能透彻理解课程思政内涵、未能抓准学生心理需求。未来，民办高校要更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把心理关怀贯穿始终，通过深化“思政 + 专业 + 心理”融合、创新教学方法、开展三维评价，推动课程思政从“有形”到“有效”，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与心理关怀统一，既帮学生解困惑、健康心理，培养高素质人才，也为高校课程思政提供“心理融入”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 刘金典，吴春燕．数字化赋能高校课程思政育人质效提升的路径研究 [J]. 中国农业教育，2025, 26(01): 61−68.

[2] 翟怀宇．强化学习研究赋能 提升课程思政质效 [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3(22): 123−124, 132.

[3] 韩丹，李秋实．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3(23): 38−41.

[4] 孙艳，于华民，于丹．以课程思政建设推进《大学物理实验》课程高质效发展 [J]. 大学物理实验，2023, 36(01): 144−148.

[5] 刘永立，原亚宁，贾同振，等．深化课程思政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效 [J]. 中国电力教育，2020(S1): 115.

[6] 白向龙，李亚婷．提升高校课程思政质效的思考 [J]. 河南教育（职成教），2020(11): 9−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南昌工学院 2023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民办高校课程思政提质增效研究”（NGJG−2023−51）。

（作者单位：南昌工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李　青

摘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当中，是当前教育革新的关键方向，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核心理念和思政育人目标存在天然共鸣，为提升思政课堂实效性开辟了新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内容体系零散、教学模式固化和实践平台不足等瓶颈。立足文化价值和教育目标的内在关联，可以从内容整合、方法革新和载体拓展这三个方面入手，构建起长效融合机制。实践证明，科学的融合策略既可以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还可以助力学生文化自信与价值观念的培育，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重要支撑。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政教育；融入路径；教学创新；文化认同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不匹配、教学方法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等现实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承载着深厚的价值内涵和教育功能，与思政教育在育人目标、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当前，虽然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内容体系不够完善、方法手段相对单一、实践载体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了融入效果的充分发挥。如何准确把握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深入分析融入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构建科学有效的实现路径，已成为提升思政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结合不是表面拼凑，而是深层次价值逻辑的有机整合——从文化基因的内在一致性到智慧理论体系的相互贯通，再到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的当代契合，传统文化为思政教育注入了宝贵的精神养分和价值观依据。

（一）文化基因与思政内核的契合性

深入探析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可以发现两者在文化基因层面呈现出深度契合的价值逻辑。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与思政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标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均体现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1]。《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理念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价值呼应，展现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追求。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理论主张在本质上相通相融，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二）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融通性

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来看，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相通性与互补性[2]。《周易》强调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演进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发展规律的阐释有着深刻的思想共鸣，能为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鲜活的文化解读。传统文化倡导的“协和万邦”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反映出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立场。《礼记·礼运》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愿景，与共产主义理想在核心精神上相互契合，展现了中华文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能够为学生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搭建文化桥梁和认知框架。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方法论高度契合，《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形成呼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文化强调的“知行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方法论上相互印证，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的统一性

从现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学生文化自信与价值导向，推动文化传承和思想引领深度融合[3]。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的传统文化，凝聚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印记，能够为学生构建文化身份认同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深入剖析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怀、民族品格及时代精神，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归属感，以文化认同为基石坚定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的自觉拥护。传统文化蕴含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奉献理念等价值取向，和当代青年应有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高度一致，这保证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能够实现文化熏陶与思想教育无缝对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

虽然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理念方面高度一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挑战[4]——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融入传统文化时，暴露出内容体系零散无序的明显弊端，还存在教学方式陈旧单一的突出问题，并且实践平台建设滞后等情况也很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融合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一）教学内容碎片化与系统性缺失

目前高校思政教育在整合传统文化方面存在内容零散的问题，缺少系统化的顶层规划和科学的布局安排。多数院校引入传统文化时采用孤立式拼接方法，只是在思政课程中穿插一些零星的古语格言或历史片段，没有构建起贯通的知识框架和价值体系，这种碎片化的教学手段让传统文化和思政理论相互脱节，学生很难认识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另外，各思政课程之间缺乏协同机制，传统文化植入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教学纲领，导致出现内容交叉或疏漏的情况。更为突出的是，当前传统文化融入缺乏跨学科整合视野，各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缺乏有效对接，未能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格局。

教学内容的时代性转化不足，许多教师仍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历史层面阐释，缺乏对其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度挖掘，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联性。教学内容的选择标准比较模糊，缺少客观的评估体系，常常依靠教师个人文化认知随意取舍，融入的内容缺乏严谨性。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只是浅尝辄止，仅仅停留在文化符号的表层展示，没有揭示其深层思想内核和当代意义，阻碍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度领悟。

（二）教学方法单一化与学生需求多元化

目前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时，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的方式比较单一，这与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和认知规律存在差距。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模式仍很普遍，师生之间缺少有效互动，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很难培养自主探究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数字化教学手段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不够，大多数高校还是依靠传统板书或 PPT 展示，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搭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体验式、情境化和案例教学等创新模式推广不足，还没有形成符合传统文化特质的特色教学方法体系。教学方法没有重视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缺少针对性设计，很难兼顾不同专业背景和文化基础学生的实际需要，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

（三）实践载体匮乏与育人环境有待优化

高校在构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载体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育人环境的营造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校园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程度较低，许多高校的校园建设和文化氛围营造缺乏传统文化特色，在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中传统文化的体现不够充分，难以形成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实践教学基地和平台建设滞后，缺乏专门的传统文化体验场所和实践空间，学生缺乏亲身感受和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和条件。校外实践资源的整合利用不够充分，与博物馆、文化遗址、非遗传承基地等社会文化资源的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实践活动的组织和开展缺乏规范性和持续性。网络文化载体的建设和运用水平有待提高，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和网络化展示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学生社团、文化活动等第二课堂载体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缺乏系统的指导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了传统文化融入的广度和深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现路径

面对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遇到的现实挑战，需要从教学内容、方法创新和载体建设等层面搭建系统化的应对策略——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形成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体系，革新教学方法拓展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实践途径，丰富实践载体营造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育人氛围，以此推动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整合教学内容，构建融合体系

解决教学内容碎片化问题的核心办法是构建系统化的内容整合模式，打造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体系。高校可以构建“经典文本—时代价值—实践案例”的三维内容架构，通过系统挖掘《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中的思政要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当代理论实现有机衔接。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可以运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发展观来阐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将《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融合；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程中，借助《论语》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理念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

应该建立跨课程协同机制，制定统一的传统文化融入标准与评价体系，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整理与教学转化，构建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库，定期评估融入成效并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各思政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需要构建传统文化融入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教师培养与学生反馈的双向评价机制，通过量化评估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升内容整合效能。

（二）创新教学方法，丰富实践形式

摆脱教学模式固化的困境，关键在于构建丰富多元的教学体系，以此契合当代大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与认知特点，高校需要整合“知识传授 + 情境模拟 + 实践探索”的三维教学框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情境，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领悟传统思想孕育的文化背景[5]。推行探究式教学方法时，应围绕“和为贵”理念解决国际冲突，以“仁政”思想对接现代治理等现实议题，引导学生运用思政理论进行深度思辨，在辩证分析中深化文化认知。同时还应着力开发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数字化素材，通过短视频、在线课程以及 VR 互动等新媒体形式，契合学生碎片化学习的特点。

针对不同专业背景设计个性化教学路径，理工科课程着重做好传统科技成就和当代科研理念衔接，在人文社科领域推动实现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思想价值有机结合，构建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互动平台，依托学生主导开展的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等活动激发学习主动性，同时设立教学创新方面的激励制度，并定期组织经验交流活动来推广成功模式。完善教学质量方面的监控体系，采用课堂观察和师生对话等多维评价方式，动态调整教学策略从而提升教学措施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

（三）拓展实践载体，营造育人环境

解决实践载体匮乏问题需要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平台，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育人环境。高校应当在校园物质空间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建设“文化长廊”展示二十四节气文化、传统艺术作品，在教学楼、图书馆等场所设置传统文化主题展区，营造“处处有文化、时时受熏陶”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合作网络，与当地博物馆、非遗工作室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组织学生开展“红色文物中的传统文化”“非遗技艺传承体验”等实践活动。开展“书法文化进社区”“普通话进乡村”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传承创新实践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构建数字化文化传播平台，开设“国学经典”“红色故事”等网络栏目，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交流平台。建立常态化传统文化育人机制，系统开展文化竞答、诗歌展演、书法比赛等主题活动，支持学生成立传统文化社团，建立实践成果展示平台，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和评价标准，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育人格局。建立实践载体建设的长效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传统文化实践项目，构建校内外协同的实践网络体系，确保实践载体的可持续发展和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深刻把握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正视现实困境，通过科学的路径构建实现有效融入。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在文化基因、教育功能、时代要求等方面的深度契合为融入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教学内容、方法和载体等方面的困境制约了融入效果的充分发挥。通过整合教学内容构建融合体系，创新教学方法丰富实践形式，拓展实践载体营造育人环境，能够形成协同育人的良性机制。这一实现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能在文化传承与价值塑造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王勇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J]. 塑料包装 , 2025, 35(05): 501−503.

[2] 贾晨 , 杨利英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维度 [J]. 安阳工学院学报 , 2025, 24(05): 44−47.

[3] 邱影悦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路径 [J]. 四川劳动保障 , 2025(17): 119−120.

[4] 程涛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探究 [J]. 公关世界 , 2025(18): 165−167.

[5] 陈微 , 高星 .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J]. 中国教育学刊 , 2025(09): 1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质量工程项目暨 2025 年度校级教研项目“高校思政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2025xjszjyxm03）。

（作者系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分析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实效性

符敏霞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组织保障功能作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功能和重要支撑，公立医院需要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为推动医院发展、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供精神力量。为提升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果以及公立医院的品牌形象，需要树立全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实现实效性提升。基于新媒体背景，公立医院可借助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地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项工作，始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本文介绍公立医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新媒体背景下对其产生的影响，并阐述提升其实效性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公立医院；新媒体背景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是引领思想、凝聚人心的重要工具。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能引导医护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还能为医院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其宗旨是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和奋斗目标的实现，主要任务是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并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具体内容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最终目的是激发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和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在新媒体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面临新要求，为提高教育效果，需要及时推进改革与创新。新媒体发展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能充分发挥重要价值，为其开展提供多元环境，既拓宽实施路径，又丰富传播内容，为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重要支撑。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公立医院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为提升实效性、增强影响力提供有力依据。本文就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实效性展开研究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提升措施。

一、公立医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一）提升医护人员职业素养

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要有不断提高效率的决心和勇气，而思想政治工作与医德医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密切相关，是提升医护人员思想觉悟的重要策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医护人员职业素养，在思想道德方面坚持把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学习作为提高政治信念、思想素质、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提升医护人员职业道德与责任感。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助于使医护人员能够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在工作中获得职业荣誉感，不断加强自身全面素质，还有助于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帮助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医护人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下，坚守医疗卫生行业的信念和操守，明确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心，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态度端正，为维护患者的健康发挥重要的作用[1]。

（二）提高医院健康服务水平

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助于提高医院健康服务水平，医护人员的思想觉悟和职业素养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思想政治工作还能作为公立医院发展的重要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从而对促进公立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发挥重要的意义。公立医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让医护人员更加热爱医疗事业，对工作充满热情和责任感，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在日常服务中树立正确的职业信念。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医护人员的思想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为重要支撑，助力公立医院健康服务质量提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和专业能力，为患者提供更精准、高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并且医护人员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后，还能帮助其在工作时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时，拥有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来积极解决问题，避免消极情绪与行为出现，让服务质量水平得到提高。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医护人员对医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医疗氛围，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提高医院社会效益。

（三）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发展

医院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环境与重要载体，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发展合力、引领价值导向、提升服务效能的重点，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动力支撑，在公立医院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助于让医院管理层坚定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制度重构与流程再造，面对医改深化、需求升级、技术迭代的新形势，能够明确改革建设需求，将医德医风建设与医疗质量考核同步落实。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能推动管理体制不断改革，优化运行机制，以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来指引医护人员进步，进而转化为发展优势，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下，培养出高素质、有远见的团队，突出思政与专业融合，将医学伦理、沟通技巧纳入必修课，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复盘提升实践能力，为医院的改革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资源，实现医院的现代化改革[2]。

二、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影响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医院通过新媒体运营可以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建立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力，其丰富的信息资源能对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多方面正面影响。其中新媒体能够为公立医院与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沟通渠道，医院借助新媒体能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和反馈，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方向[3]。公立医院能够借助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推动思想理论传播优势和信息深度融合，为医护人员随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借助新媒体平台提高整体工作效率。此外，公立医院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医护人员的思想动态与需求，加强与创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运用图像、音频、视频等媒体形式来增加丰富多样的内容，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提高医护人员的接受度，进而提升工作实效。医院的医护人员通过新媒体获得所需要的思政知识，以便充分理解和把握有关理论，从而准确了解、参与思政活动与实践，更有利于医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医护人员的思想性并提高实效性[4]。

三、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实效性的措施

（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医护人员原有的思想观念，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创新，积极树立新媒体思维，让公立医院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重要生产力，加强医院管理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并加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力度，积极适应新媒体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同时要求工作人员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能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思维方式，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媒体相融合，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公立医院的文化背景，作为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从而形成良好的凝聚力与向心力[5]。再利用多种新媒体平台，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行创新，多种新媒体平台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通过发布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同时方便医护人员开展线上讨论，提高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兴趣并加强理解。同时，以新媒体技术丰富思想政治活动，促进医护人员主动学习先进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思想引导和帮助，提升其政治素养并强化法律意识。

（二）拓宽思想政治工作渠道

以新媒体赋能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探索精准化、场景化、协同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渠道，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新媒体技术创造多元化、沉浸式、互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参与度与实效性，提高医护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6]。同时利用网络直播、在线会议等虚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网上网下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依托新媒体的互动性探索更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感的教育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易于被医护人员接受和理解。配合新媒体平台定期发布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文章与视频，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半径并提升可达性，使思想政治学习能够灵活嵌入工作间隙，提高参与的便捷性，潜移默化地实现教育目标。利用服务融合，突破教育实践的割裂性，举办互动性强的思想政治相关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与医护人员群体偏好形式相结合，对思想政治内容进行个性化定制，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疏离感，增强医护人员的情感共鸣[7]。

（三）提高医护人员整体素养

在新媒体背景下，为强化医护人员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通过提高医护人员的整体素养，掌握对网络信息的识别与应对能力，切实提升医院整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效能，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同时也促进医护人员相关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加强医护人员在新媒体技术方面的掌握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平台，同时能够正确识别新媒体上的虚假信息，能够结合社会环境现象了解信息传播规律，提升认知水平，增强信息处理分辨能力[8]。同时公立医院需要从各新媒体平台的架构入手，剖析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加强新媒体阵地建设，加强正能量宣传，从切实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深度丰富医疗服务内涵等核心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树立公立医院专业、亲和、负责的良好形象，增强医护人员对医院的认同感。同时还需要医护人员保持理性思考，能够从多角度分析新媒体信息，提高媒介素养与辨别能力，从而对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更为系统、深入的认识[9]。

（四）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

公立医院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打破以往纸上谈兵的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融入人才建设，同时鼓励思政工作人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让医护人员能够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政策法规，让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使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进而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与进步[10]。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将多媒体平台作为载体，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任务。同时在开展工作期间需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制定困难人员帮扶机制，了解各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遭遇的困难与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思想引导以及帮助，调动工作积极性，帮助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以及职业使命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11]。

（五）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将传统的教育与基于新媒体的工作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的思政工作体系，将思政工作与行风建设深度融合。面对医改深化、需求升级、技术迭代的新形势，加强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学习，根据医护人员的思想需求，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依据[12]。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题讲座、文化活动等，在现实生活中与医护人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医护人员的需求相符，更能被全体医护人员所接受，助力医院形成良好氛围。通过制度化学习机制，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深入人心，推动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13]。

（六）关注新媒体环境舆情

公立医院在新媒体背景下需要密切关注舆情，一旦遭遇突发舆情，需借助新媒体完成舆情监管、责任追溯、医疗运营和信息公布等多层面的应对举措。面对新媒体环境舆情需要采用多样化途径与多种方式，实现全方位立体式传播，积极引导公众舆论转向积极向上的议题。同时，加强对群众诉求的收集和整理，及时回应诉求，增强群众的信任感与满意度[14]。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信息观念，降低负面舆论影响，维护医院形象和社会效益，推动医院健康和谐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实效性，需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积极拓宽思想政治工作渠道，着力提升医护人员整体素养，充分发挥工作优势，持续完善工作体系，密切关注新媒体环境舆情。通过以上举措，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不断深化，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红玲 . 新媒体时代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探讨——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公众号新闻标题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3, 14(22): 125−127.

[2] 崔敏 . 新媒体视阈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 2021, 32(12): 1641−1644.

[3] 何炜 , 潘蕾 . 医院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教育的融合研究——评《职业道德与法治》[J]. 世界中医药 , 2023, 18(14): 2104.

[4] 黄鑫 . 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应用研究——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机制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 2021, 41(23): 2.

[5] 王蕾 , 杜孟凯 , 管仲军 , 等 . 新时代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使命及实践探索 [J]. 中国医院管理 , 2025, 45(02): 93−96.

[6] 张鸿雁 , 季文平 . 新时代高校附属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 [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5, 18(02): 85−90.

[7] YAN Y, CHEN F.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4(04): 137−144.

[8] 袁成 , 张翠 , 王艳 , 等 . 新时代公立医院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探析 [J].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 2025, 28(01): 84−88.

[9] 芦青 , 张文玥 , 戎斌 , 等 . 新媒体环境下的医院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初探 [J]. 中国卫生产业 , 2021, 18(34): 194−198.

[10] ZHU Q, YUAN J.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J]. Creative Education, 2023, 14(12): 11.

[11] 梁中亚 . 新媒体环境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 [J]. 心血管外科杂志 , 2020, 9(02): 248−248.

[12] 杨福彪 , 顾春燕 , 顾炜 , 等 . 基于员工满意度的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实践 [J]. 中国现代医生 , 2025, 63(11): 71−74.

[13] 何炜 , 潘蕾 . 医院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教育的融合研究——评《职业道德与法治》[J]. 世界中医药 , 2023, 18(14): 2104.

[14] 焦静 , 管淳 , 董琳 , 等 .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加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J]. 现代医院 , 2024, 24(07): 1031−1033.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教育家精神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实践探索

孙维佳

摘要：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德技并修”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质量，但当前提升这一能力面临多重困境。教育家精神是教育领域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以生为本”的育人初心、“守正创新”的实践智慧与“深耕专业”的使命担当，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本文立足高职教育特色与辅导员工作实践，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结合思政育人需求，探索创新思政引领力的实施路径，这是高职院校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赋能路径

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地位。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育人质量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与国家人才战略密切关联[1]。辅导员是高职思政教育的“一线执行者”，肩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助力职业成长与全面发展的职责，提升其思政引领力是应对高职教育发展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履行教育职能的必然选择。但面对学生思想多元化、职业需求个性化的挑战，其思政引领力仍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实践载体单一、机制保障不完善等问题。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领域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其赋能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提升，是当前高职思政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教育家精神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重要意义

厘清教育家精神与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核心内涵，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教育家精神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融合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与使命担当的有机整体，其核心在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这一精神内核与高职院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宗旨高度契合，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辅导员是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教育者，其言谈举止、教育理念对学生的思想认知、行为习惯乃至职业选择的影响更直接、更深远[2]。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教育家精神的落地不仅需要专业课教师在技术技能传授中融入价值引领，更需要辅导员在日常管理与成长指导中践行育人使命。然而，面对学生思想多元化、职业需求个性化的新挑战，辅导员队伍建设仍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实践载体单一、机制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思政引领效能的发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定位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3]，为深化落实这一重要指示，2023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将“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引领[4]。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领域传承已久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破解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提升难题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结合高职院校办学特点与辅导员职业属性，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思政引领力的赋能路径，旨在为新时代高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推动思政育人工作提质增效。

二、教育家精神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具体路径

以教育家精神为核心引领，提升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应立足其精神内涵，针对辅导员“一线育人”的职业属性，从精神铸魂、能力提升、情感联结、实践淬炼、协同联动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辅导员育人全过程、各环节。

（一）以理想信念为根脉，筑牢思政引领的精神基石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这是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精神原初动力”。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辅导员作为“铸魂时代新人的骨干力量”[5]，首先要筑牢自身理想信念之基，如此方能在思政引领中传递“大我”情怀，引

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方面，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内涵，将“立德树人”内化为职业信仰；另一方面，要从教育家精神的历史传承中汲取营养，如重温陶行知“爱满天下”、黄炎培“职业教育救国”等理念，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教育事业、高职学生成长紧密结合。

（二）以育人智慧为支撑，提升思政引领的专业能力

教育家精神强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这是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专业核心能力”。高职学生生源多样化，导致思想认知、学习需求、职业规划差异显著，辅导员应具备“精准施策”的育人智慧。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理论转化能力”，将思政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用“小切口”讲“大道理”，如通过“身边榜样”“职业故事”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要强化“因材施教能力”，针对不同背景学生的特点设计个性化引导方案，如对中职升学学生重点加强“职业认同”引导，对普高毕业学生重点加强“技能适应”指导；三是要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结合高职“产教融合”特色，将思政引领融入“大思政课”，实现“思政小课堂”与“职业大课堂”同频共振。

（三）以仁爱之心为底色，厚植思政引领的情感纽带

教育家精神的“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情感联结密码”。辅导员与学生接触最密切，其“仁爱之心”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这种“仁爱”不是泛泛的关怀，而是“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精准付出：一是要关注学生的“成长痛点”，如针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模糊”“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通过一对一谈心、成长陪伴小组等方式，给予情感支持；二是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接纳不同背景学生的思想认知差异，用“平等对话”替代“说教”，用“理解包容”替代“批评指责”；三是要践行“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言行传递“仁爱”理念，如在学生遇到困难时主动帮助，在日常管理中体现“温度”，让学生在“被爱”中学会“自爱”“爱人”，进而实现行为转化。

（四）以躬耕态度为驱动，强化思政引领的实践担当

教育家精神倡导“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这是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实践落地保障”。高职教育强调“工学结合”，辅导员的思政引领更应“扎根实践”：一是要“勤学”，主动学习高职教育理论、职业发展知识、心理辅导技能等，提升跨学科能力，如学习职业教育学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职业规划，学习心理学以更好地应对学生心理问题；二是要“笃实”，深入学生生活、学习、实践的各个环节，如参与学生实习实训、班级活动、社团建设，在“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躬耕”不应局限于校园围墙之内，更应延伸至企业车间与行业一线。高职辅导员要敢于走出舒适区，主动下沉到校企合作的深水区，去了解行业前沿对人才职业素养的真实需求，去感受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面临的现实困惑。只有双脚沾满泥土，思政引领才能沉淀出真情实感；只有亲身体验过“工匠”的磨砺过程，才能在开展劳动教育与职业精神培育时，讲出有热度、有力度、有深度的“行家”话语。三是要“创新”，结合高职特色探索思政引领新载体，如打造“工匠精神工作坊”“产教融合思政课”，通过创新提升思政引领的实效性。

（五）以使命担当为导向，构建思政引领的协同格局

教育家精神要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使命担当”，这是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格局优化方向”。辅导员的思政引领不是“单打独斗”，需融入“三全育人”格局，与各方形成合力：一是要与专业课教师协同，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二是要与思政课教师协同，共同设计“大思政课”，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要与企业导师协同，在学生实习中引导遵守行业规范，将思政引领延伸至“职业场景”；四是要与家长协同，通过“家长课堂”传递“家校共育”理念，形成“学校—企业—家庭”协同育人网络，将思政引领融入学生学业发展、技能提升、职业成长的全过程，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三、教育家精神赋能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有效策略

为突破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提升在资源匹配、机制运行、特色融合等维度的现实瓶颈，切实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要义转化为系统性、创新性、实操性强的赋能策略。基于精神引领、能力锻造、场景构建、制度保障的逻辑主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赋能体系，推动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持续提升。

（一）构建资源协同体系，破解赋能基础薄弱问题

教育家精神的“躬耕态度”要求辅导员具备持续学习的实践自觉，而资源供给不足常导致其能力提升缺乏系统性支撑。对此，应构建多维资源协同体系，解决基础薄弱问题：一是完善理论研修资源库，整合教育家精神文献、职业教育政策、心理学与管理学经典理论等核心内容，开发模块化线上学习课程与案例手册；二是打造实践培育资源池，遴选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思政实践基地，如红色工匠纪念馆、智能制造企业文化展馆等，构建“观摩—模拟—实操”递进式实践课程体系；三是建设校际资源共享平台，联合多所高职院校建立辅导员发展联盟，通过“教育家精神

工作坊”“优秀思政引领案例库”“辅导员技能大赛”等形式，实现优质资源校际流转、经验互鉴，拓宽辅导员成长视野。

（二）健全动态反馈机制，消除评价激励脱节困境

教育家精神的“使命担当”要求建立科学评价机制以激发辅导员内生动力。针对现行考评中重事务性工作、轻育人成效的弊端，可构建“目标引领—过程追踪—成效反馈—持续改进”的动态机制，促成评价激励之间的有效对接：在指标设计上，设置“思政引领效能指数”，如学生职业认同度提升率、核心价值践行案例数，纳入考核体系；在过程监控中，采用“双轨记录法”——辅导员撰写“育人实践反思日志”，学生管理部门留存“价值引导成效跟踪表”，实现双向印证；在反馈改进环节，依托数字化平台生成辅导员能力“雷达图”，定位薄弱项并推送定制化培训资源，如创新能力不足者定向开放“产教融合思政设计”课程，实现“精准赋能、靶向提升”。

（三）创新特色育人载体，弥合职教特质融合裂痕

教育家精神的“育人智慧”强调思政引领需与育人场景深度融合。针对高职思政与专业“两张皮”问题，可设计三类特色载体，使得价值引领可触可感：一是开发“职业精神淬炼”项目，如开设“工匠精神研习社”，邀请劳模工匠解析职业伦理；组织“技能大师思政课”，在实训车间开展“技术报国”主题讨论；二是创设“产教融合型”思政课例，指导辅导员联动企业开发《职场诚信经营案例集》《新兴产业劳动者素养指南》等校本教材，并将典型案例植入课堂教学；同时，要善于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展思政引领的“云端场域”。依托大数据画像技术，精准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与行为轨迹，构建“指尖上的思政平台”。例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重现大国工匠的奋斗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产生情感共鸣；开发“微思政”数字资源包，将抽象的理论碎片化、生动化，以适应高职学生“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的全时空覆盖与全要素渗透。三是推行“成长画像”精准引导模式，依据高职生源差异建立“思想—学业—职业”三维数据库，生成个性化成长干预方案，实现教育家精神“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目标。

（四）构建多元协同网络，避免育人主体各自为战

教育家精神的“弘道追求”要求构建育人共同体。可建立三级协同网络，打造目标同向、资源共享的协同生态：校内层面推行“双辅导员”制度，专业课教师兼任职业导师，专职辅导员负责价值引导，在实训课程中嵌入“行业规范认知”“技术伦理思辨”等思政模块；校企层面设立“联合思政导师团”，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定期开展“职业精神讲堂”，在“顶岗实习”阶段实施“思政实践学分”认证；家校层面开通“云上思政课堂”，推送《大国工匠》纪录片等学习资源，组织家长参与“职业价值观”主题讨论，明确各方育人责任，如企业提供思政实践岗位、家长参与职业观培育、学校做好统筹协调，形成“学校主导、企业参与、家长配合”的协同育人格局。

四、结语

教育家精神作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精神坐标，其蕴含的“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启智润心的育人智慧、躬耕教坛的职业担当”，为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的提升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高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已形成一系列贴合辅导员“一线育人”属性的实践探索，既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辅导员队伍是铸魂时代新人的骨干力量”的重要指示，这也体现了教育家精神“以生为本、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通过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数字化的工具赋能，将抽象的“精神引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让辅导员能够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职业”的场景中，真正发挥“引路人”的作用，不断提升思政引领力，推动高职思政育人工作提质增效，为培育更多德技并修、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霍亚苹 .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三融”发展机制研究 [J]. 河北职业教育 , 2025, 9(01): 10−14.

[2] 张莉 . 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J]. 职业技术教育 , 2021(12): 56−60.

[3] 简红江 , 汪军 . 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学——价值意蕴、切入点与理路取向 [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 2024, 24(06): 73−80.

[4] 杨燕楠 , 陈建录 . 教育家精神融入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25, 45(24): 26−31.

[5] 李立国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2(05): 123−12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政专项’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思政引领力赋能路径研究”（2025SJSZ0351）。

（作者单位：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的协同优化研究

于　菲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深度调整，思想文化呈现多元碰撞交汇的态势，信息技术变革推动思政教育的环境与任务迭代升级。传统思政教育中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较为突出，制约了育人效能的提升。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内涵价值、现存问题及成因，明确目标、内容、方法、主体四大关键协同要素，探索适配性的协同优化策略。该研究旨在厘清理论与实践协同的内在逻辑，破解二者脱节的难题，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系统化操作指导，既充实思政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助力提升育人质量，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见效。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协同优化；育人效能

一、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思想文化多元激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成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对象和肩负的任务均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已难以完全适配新时代的育人需求。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实效，就必须推动理论与实践路径的协同优化。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来看，有利于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律的理解，厘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对理论的反哺价值的内在逻辑，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从实践意义来看，可为思政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化的协同优化方案，推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与教育方法创新融合，让思想政治教育更精准地对接时代需求与受教育者成长需求，切实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与感染力，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内涵与价值

（一）核心概念界定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涵盖本质、规律、原则等核心知识，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教育内容，为教育实践提供方向指引与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是理论落地的载体，包括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网络教育等形式，承担着理论传递与实践体悟的双重功能[1]。协同优化是将二者视为有机整体，通过资源整合与配置优化实现相互促进，破除“两张皮”壁垒，凝聚教育要素合力，最终达成最优育人效果。

（二）协同优化的内在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一方面，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与指引，明确了教育的目标方向与根本问题，为实践路径设计提供科学方法与策略，保障实践不偏离育人核心方向；另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检验标准与发展动力，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使理论反思与优化，实践经验也为理论体系充实提供了鲜活素材，推动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唯有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互动，才能夯实协同优化的逻辑根基。

（三）协同优化的重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具有多重重要价值。从教育效果来看，可破解理论教学枯燥、实践活动无方向的难题，二者结合能激活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认识实践意义，在实践中加深理论理解，有效提升育人实效；从人才培养来看，契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将理论转化为思想道德品质，在实践中锤炼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与社会责任感，助力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从社会发展来看，培养具备正确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凝聚共同价值追求，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2]。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的成效分析

（一）理念引领与目标协同成效显著

在理念层面，“知行合一”核心思想深度融入思

政教育全过程，彻底摒弃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体悟的单一模式，普遍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导向，引导学生在学思践悟中深化理论认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践行的思想转变。在目标层面，协同育人体系日趋完善，打破理论考核与实践评价割裂的局面，将实践内容正式纳入教学考核与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理论教学目标精准呼应，构建起“理论有考核、实践有评估、成效有导向”的闭环机制，共同服务于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二）内容衔接与方法创新稳步推进

在内容衔接上，理论教学紧密对接时代发展，及时融入党的创新理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实践成果，让理论知识更具时代感；实践活动以理论为遵循，围绕核心观点设计具体任务，形成“理论选题—实践探索—成果反哺”的协同链条，强化二者关联性[3]。在方法创新上，理论教学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互动形式，实践教学构建“理论铺垫—实施推进—总结升华”系统化流程，结合信息技术搭建虚拟实践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大幅提升教育吸引力与实效性。

（三）主体联动与技术赋能形成合力

在主体联动方面，构建起校内校外协同育人格局。校内实现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联动，分别承担理论传授、课程思政、日常引导职责；校外联动家庭、企业、社区等资源，搭建多元化实践场景，形成“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撑”的育人网络。在技术赋能方面，依托网络平台整合各类教学资源，运用大数据精准跟踪学情，借助新媒体拓宽传播渠道，为理论与实践协同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有效扩大教育覆盖面与影响力。

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关键要素

（一）目标协同

目标协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首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良好思想道德素质与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理论教学需通过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正确政治方向；实践教学则要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开展活动，成为理论教学目标的有益补充[4]。目标协同需契合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紧跟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步伐，在理论与实践中融入创新精神、国际合作等内容——理论教学补充科技创新伦理、全球治理等知识，实践教学组织科技创新、国际交流等活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时俱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精准协同。

（二）内容协同

内容协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基础。要构建理论与实践协同的知识链，理论内容的阐释需紧贴社会现实，采用通顺生动的语言，吸收前沿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杜绝教条式阐释与空话套话；实践活动的开展需以理论为根本遵循，将理论指南转化为具体明确的实践任务，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呼应与印证。同时，要破除学科壁垒，打破学科藩篱，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嵌入”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既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内容，又提升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与匹配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三）方法协同

方法协同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核心在于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方法的融合创新。理论教学必须突破单一讲授模式，建立互动式、探究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体系，通过课堂讨论、自主探究等形式提高学生主动性，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实践教学则应丰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虚拟实践等新型活动，拓宽实践教学的广度并深化深度。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方法的衔接融合：实践活动开展前，理论教学需做好铺垫，帮助学生明确实践目标与方法；在实践过程中，要及时进行总结反思，实现理论认识的升华，提炼教育教学规律，使二者有机协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四）主体协同

主体协同能够凝聚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需统筹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主体，共同构筑育人共同体。学校作为主阵地，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协同合作，构建全员育人格局：思政课教师专注传授理论知识，专业课教师扎实落实课程思政，辅导员做好日常思想引导。家庭是育人第一阵地，家长需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树立道德榜样，加强与孩子的思想沟通，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与家庭担当。社会要提供多元实践支撑，企业、社区、媒体等各界协同发力，通过实践实习、志愿服务、舆论引导等形式搭建教育平台，营造正向教育氛围[5]。多主体精准协同，形成全方位育人网络，为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提供合力保障。

五、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策略与举措

（一）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关键保障，需从管理、交流、评定三方面发力。在管理机制上，应创建独立的协同管理机构，明晰各部门责任范围，统筹规划全校思政教育工作，推动理论与实践教学部门联合作业，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交流机制上，设立定期交流协调会议，邀

请教师、学生代表等多方参与，分享教学经验、探讨现存问题；同时构筑信息交流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实践任务布置与心得交流的及时沟通，深化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进程。在评定机制上，构建多元化综合评定体系，将学生的理论知识吸收、实践能力提升、创新成果产出、思想道德素质改善等纳入考核；融合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实践基地评价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评估育人效果；同时强化对教育者参与协同育人的督促与引导，确保机制落地见效。

（二）加强教育资源整合

加强教育资源整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协同优化的有力支撑，需创建校内外资源统筹共享平台，形成育人合力。在校内，要打破部门资源壁垒，整合图书馆文献资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案例库、实践实训基地等资源，优化资源分配，满足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的双重需求。在校外，要密切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联系与合作，共同建设实践锻炼基地，通过政策咨询、实习锻炼、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拓宽实践路径，丰富教育内容与形式。此外，可依托互联网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各类校内外理论与实践资源，方便师生高效检索与使用，推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与优化，为理论与实践协同优化提供坚实保障。

（三）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需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三方面协同发力。在课程设置上，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适当加大实践课程比例并将其纳入教学计划，明确实践课程的目标、内容及考核标准；同时在理论课程中嵌入实践环节，增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模式上，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时空，实现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堂互动研讨的有机结合；推行项目式教学，以项目为载体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在互动式、探究式教学的基础上，积极尝试情景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新方法，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认知深度，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推动理论与实践双轨并行、协同发展。

（四）提升教育者能力素质

提升教育者能力素质是理论与实践协同优化的人才支撑，需从培训、实践、协作三方面齐发力。在培训层面，学校应定期开展专题培训，帮助教育者更新理论知识、创新实践教学方法、熟练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升专业素养。在实践层面，安排理论教师深入基层，参与企业调研、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积累实践经验；或组织教师到实践基地挂职锻炼，熟悉实践教学各环节，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协作层面，建立教育者交流合作机制，组建理论与实践教师协作团队，开展校际教学观摩、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经验共享、优势互补，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6]。

六、结论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路径协同优化的内涵价值，全面审视了当前协同发展的成效、现存问题及成因，深入探究了目标、内容、方法、主体四大关键协同要素，并提出了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教育资源整合、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者能力素质等针对性优化策略。研究厘清了理论与实践协同的内在逻辑，丰富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规律的认识，充实了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同时也给予教育工作者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生根。未来，随着时代发展与教育改革的深入，还需持续关注理论与实践协同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优化协同策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 林骁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J]. 大众文艺 , 2025(23): 196−198.

[2] 王帅 . 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优化路径研究 [J]. 法制博览 , 2019(12): 42−43.

[3] 朱敏 , 钟骥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创新——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 热带作物学报 , 2021, 42(09): 2847−2848.

[4] 岳馨钰 , 戴毅斌 , 刘雪姣 . 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路径 [J]. 黑龙江教育 (理论与实践), 2020(12): 50−51.

[5] 边玉芳 , 张馨宇 . 新时代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 2023(02): 40−46, 54.

[6] 郑勤勤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能力提升研究 [J]. 大学 , 2022(01): 132−135.

（作者单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艺术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张丛丽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自身修养和文艺行风的重要性，艺术类高职高专大学生作为文艺事业的继承者和推动者，其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当前“思政＋艺术”育人实践虽有探索，但学术研究存在理论建构滞后、育人实效性核心要素缺乏系统化阐释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在“思政＋艺术”育人现状、实效性概念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情况，指出当前融合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并从理论体系建构、关键问题诊断、评估体系创新、实证研究深化及复合研究方法论构建等方面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强调考察“思政＋艺术”实效对指导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育人实践、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艺术”；育人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艺术类高职高专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继承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全媒体时代具有能见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既有艺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也有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艺术的必要。近年来，艺术类院校围绕“思政＋艺术”育人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探索，但当前学术领域对“思政＋艺术”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呈现理论建构滞后于实践探索的特征。尽管已有研究普遍关注育人实效性概念，但对其核心要素包括本质属性、特征维度、关键矛盾、运行机理及评估体系等，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阐释，多数学者将实效性视为无须论证的先验性概念，导致该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缺失。如何构建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艺术”育人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发挥评价体系的鉴定、诊断、激励、导向等功能，助力“思政＋艺术”育人模式良性运转，切实提升艺术类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围绕艺术类高职高专“思政＋艺术”育人已形成课程、实践、校园文化三条主要研究路径，并在实效性概念阐释与评价体系建构方面有所探索。但需指出，目前尚无聚焦该类院校“思政＋艺术”育人实效性的专项研究成果，现有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核心概念缺乏系统化操作定义。以下分五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思政＋艺术”课程育人

在思政课程方面，研究多以艺术化形式赋能思想政治课程，用艺术化形式促进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内容的理解[1–4]。研究者充分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以思想政治思维甄选优秀艺术作品，形成艺术与思想政治理论之间的跨界交流与融合[5–6]。在课程思政方面，研究者注重挖掘艺术专业课程中的思政资源，设计合理的教育教学内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高校艺术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案例分析、名画赏析、故事讲解等多种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艺术专业教育课程之中[7–8]。

（二）“思政＋艺术”实践育人

研究者多结合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与专业实践，加强学生文艺创作指导，发挥新时代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文化艺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同频共振[9–10]。比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演出、比赛等艺术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师生创作有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将思政教育与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在思政铸魂和艺术教育融合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精神。将德育教育蕴含在作品的表演中，大力推出红色作品音乐会，创作中华美德故事音乐剧，使学生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三）“思政＋艺术”校园文化育人

艺术类院校通过构建特色化校园文化生态实现三

重育人目标：其一，突破技艺本位局限，将艺术认知维度从专业技能拓展至道德修养与国家意识层面；其二，重塑学生发展定位，引导其将职业规划与国家战略需求相衔接；其三，推进审美范式转型，促使专业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美学修养的复合型艺术人才[11]。

（四）实效性概念的多维阐释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理论认知呈现多元视角：代黎明[12]（2018）从实践论角度将其界定为教育效果、效能与效率的三维统一体；宫福清[13]（2022）构建“个体发展，社会需求，教育目标”分析框架，强调教育成效与预期目标的契合度；戴焰军[14]（2012）运用系统论方法解构实效性构成要素，提出观念导向、结构设计、功能实现与方法创新四维互动模型。

（五）评价体系理论建构

在评估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三大范式：张红霞[15]（2011）创立五维评估模型，涵盖认知建构、情感认同、意志强化、信念确立及行为外化等核心指标；李伟东[16]（2008）提出“五位一体”评价原则体系，强调政策导向与教育规律、专家评估与公众参与、定性与定量方法、显性与隐性效果、过程与结果评价的系统整合；白显良[17]（2021）构建六维动态评价标准，包含政治素养、知识体系、实践能力、心理素质、品德修养及行为规范等评价维度。史巍[18]（2023）的研究突破方法论局限，系统解构评价定位、认知偏差及实施路径等基础理论问题。

总体而言，当前艺术类高职院校的融合教育实践面临三重发展困境：理论层面尚未厘清育人实效性的本质属性与评估标准；研究范式偏重理论推演而缺乏实证支撑；方法论层面存在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割裂现象。这些症结导致现有实践多停留于形式嫁接层面，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基础理论建构滞后

核心概念的操作化定义缺失，使得不同研究者对“思政 + 艺术” 育人实效性等概念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差异，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一致性。

2. 应用性研究严重不足

理论成果转化率低下，大量的理论研究未能转化为实际的教育教学策略和方法，无法有效指导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3. 研究方法单一化

缺乏混合研究设计，单纯的质性研究或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揭示 “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准确把握育人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三、后续研究展望

后续研究应构建“理论奠基，实证支撑，策略输出”三维研究框架，重点突破以下关键领域。

（一）理论体系建构

系统解构“思政 + 艺术”育人实效性的本体论认知，确立包含概念谱系、类型划分、特征属性的理论分析模型，明确“思政 + 艺术”育人实效性的内涵和外延，重点阐释其区别于传统思政教育的特殊属性与运行规律。着力构建具有艺术教育特质的“思政 + 艺术”理论范式，创建“价值引领，审美创造，德行培养”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拓展实效性内涵研究边界。重点阐释艺术教育情境中意识形态内化的特殊规律，揭示审美体验与价值认同的转化机理开发类型学研究新范式，建立基于艺术门类差异的实效性分类标准体系，形成差异化理论解释框架。

（二）关键问题诊断

深入剖析育人实效性的生成机制与阻滞因素，解构制度设计、实施路径与保障体系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揭示艺术教育规律与思政教育要求的融合平衡点。构建“教育主体，实践载体，制度环境”三维分析模型，系统考察专业教师思政转化能力、课程思政创新度、院校支持政策的协同效应，开展历时性比较研究，追踪艺术教育改革进程中实效性要素的演变轨迹，识别关键转折点与影响因素，探索特殊矛盾化解路径，重点突破艺术创作自由与意识形态导向、专业技能培养与价值塑造、个性表达与集体主义教育等二元张力平衡机制。

（三）评估体系创新

构建三级评估系统：确立政治导向、专业特性、发展需求三位一体的评价原则。政治导向确保“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专业特性体现在要根据艺术专业的特点设计评价指标；发展需求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使评价体系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研发包含认知内化度、价值认同度、行为外显度的复合评估工具；设计覆盖课程教学（显性维度）与校园文化（隐性维度）的双轨评估方案。

评估理论研究需向智能化、专业化方向突破：创建动态评估理论模型，整合过程性数据追踪与终结性效果评估，建立“输入—过程—输出—反馈”全链条监测体系开发艺术素养导向的评估标准，运用扩展现实技术创设沉浸式评估情境，精准检测价值内化程度与行为外显特征实证研究深化维度，揭示教育成效的持续度与衰减规律。

（四）实证研究深化

实施混合方法研究：通过量化分析测量课程教学的认知转化效果，运用质性研究解析校园文化的影响机制，最终建立动态诊断模型揭示成效差异的深层动因。

1. 建立多模态实证研究体系

构建全国性艺术院校教育质量数据库，开发包含课程实录、创作成果、行为日志等多源数据的分析平台设计纵向追踪研究方案，观测教育成效的持续性与

延展效应，建立成效生命周期模型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的成效差异与适配性条件实践转化创新维度。

2. 创建动态知识生产系统

建立“院校实践，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协同创新机制，形成理论实践交互验证的闭环开发智慧决策支持平台，整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等技术，实现教育策略的精准推送与动态优化，构建成果扩散生态系统，促进最佳实践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改造。

（五）复合研究方法论构建

1. 混合研究范式创新

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验证法，重点突破三大技术环节：其一，开发适配艺术教育特性的多维度评估量表。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和“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的要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评估量表，准确测量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其二，解构育人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建立价值导向、专业特性、发展效能三维评价基准。明确每个维度的具体评价指标和权重，使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其三，构建基于实证数据的动态优化模型，形成“问题识别—归因分析—策略迭代”的闭环机制。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不断优化“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

2. 评价体系优化路径

研究实施需遵循三项核心原则：在价值维度实现政治导向与学术规律的辩证统一，既要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又要遵循艺术教育的学术规律；在方法论层面达成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价的系统整合，不仅关注教育教学的最终结果，还要重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实践向度注重教育效能与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使“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既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艺术素养，又能够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人才。通过建立包含认知转化度、价值内化度、行为外显度的三级评价指标，最终形成具有专业适配性的评估模型，为新时代艺术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四、“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的实践意义

“思政 + 艺术”育人模式的实施对艺术类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一方面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能，促进育人要素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能精准把握育人重点，创新培养策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培育德艺双馨人才：通过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在提升艺术类大学生艺术技能的同时，培养其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价值观，满足社会对高素质艺术人才的需求。

助推文化事业发展：引导未来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兼顾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促进全面素质提升：在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同步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审美能力和创新精神，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彬 . 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升初探 [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1, 34(12): 115−116.

[2] 曹泓 . 艺术类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结合构建的探讨 [J]. 中国文艺家 , 2021(08): 113−114.

[3] 张香君 . 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美育的相互渗透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1(40): 157−160.

[4] 何周宇 . 艺术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 [J]. 决策探索 (下), 2021(02): 54−55.

[5] 包可方 .《音乐教育学》课程思政的美育目标与实现策略 [J]. 铜陵学院学报 , 2020, 19(03): 70−73.

[6] 任伟 , 于丹 . 艺术类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吉林艺术学院为例 [J].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 2022(06): 78−82.

[7] 梁维康 . 红色文化融入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 [D]. 武汉 : 武汉音乐学院 , 2022.

[8] 王金婷 . 高校艺术门类“课程思政”基本问题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3.

[9] 卢秀峰 . 精神形态隐性教育方法及其运用——以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对象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014, 30(05): 92−94.

[10] 刘海沁 , 朱绍勇 . 地方红色文化艺术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工作的思考——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12): 148−150.

[11] 杨春红 , 陈俊伊 . 高等艺术院校品牌校园文化育人模式探索——以山东艺术学院为例 [J]. 齐鲁艺苑 , 2023(03): 120−124.

[12] 代黎明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M].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18.

[13] 宫福清 .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22.

[14] 戴焰军 . 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导论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2012.

[15] 张红霞 .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标准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11(10): 43−46.

[16] 李伟东 .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J]. 茂名学院学报 , 2008(05): 10−13,56.

[17] 白显良 , 章瀚丹 .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改革需把握十对关系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21(03): 11−17.

[18] 史巍 , 秦瑞苹 . 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若干基础问题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3

（下转 222 页）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策略探究

曹正春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校思政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环节，也需要随之转型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将逐渐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高校思政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本文将基于大数据背景，对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策略进行探究。

关键词：大数据；信息技术；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策略

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应用，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借助信息技术，高校能够应用更智能的手段管理教育资源，提供兼具个性与多样的教学服务，同时也能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广泛且深层次的教学资源，开拓学生的思维方式[1]。在高校思政教育当中，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入，不仅有利于提高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素养，为促进学生全面进步筑牢坚实根基。

一、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一）改变了学生以往的学习方式

传统的思政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及书本知识的传授，学生只能通过被动接受的方式获取信息，缺乏互动和参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开始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思政教育与现代科技有效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化的学习体验。信息技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传统的思政教学以课堂为主，学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坐在教室听讲；而现在，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就能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信息技术还能通过数据分析与个性化推荐，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特点，为其量身定制学习计划，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学生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课堂讲解，而是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进行学习，拓宽视野，深入了解各种文化思想，从而有利于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2]。

（二）凸显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学习模式。高校的思政教育作为塑造学生综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关键环节，应加快与信息技术融合的脚步，如此才能有效提升教学实效与教育质量，也能进一步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此外，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为高校思政教育注入了更多趣味性和吸引力。例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学生能够沉浸式地体验历史情境或伦理道德冲突，从而更深刻地把握思想教育内涵。与此同时，师生、生生之间还能进行实时互动讨论，形成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最为重要的是，依托大数据分析，高校教师能够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心理特征，进而实施精准教学，使思政教育更贴合学生的实际需要。这种个性化引导也有助于促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深化对理论的理解与应用[3]。

（三）提高了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

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例如，借助在线教育平台、虚

（上接 221 页）(08): 141−14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艺术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CEFA2024016）。

（作者单位：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拟实验室、数字化图书馆等工具，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料，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政理论知识，这既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又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再者，通过在线讨论平台、网络课堂、协作工具等，学生还能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从而深入理解思政理论知识，并培养沟通技巧和团队合作能力。信息技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校教育的教学形式。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多媒体教学平台、在线评估系统等工具，教师能设计出更加生动有趣、具有实践性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参与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探讨思政理论知识。这种新颖的教学形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对思政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现状分析

（一）传统思政教育与大数据技术之间的融合障碍

传统思政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强调的是思想的引导和道德塑造，而大数据技术则更注重数据的分析与利用，这种差异导致了两者在理念和目标上存在一定冲突。另外，传统思政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强调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启发，大数据技术则更多地借助机器学习或算法分析，缺少人文关怀及情感因素。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教学模式差异，才使得传统思政教育和大数据之间的融合障碍更加显而易见。传统思政教育的内容相对固化，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并不友好，导致传统思政教育在融合大数据技术方面进展缓慢。再加上有些教师和学生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抵触情绪，这也成为二者融合的障碍之一[4]。

（二）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难点

一方面，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时需要收集并分析学生的个人数据，以把握其思想状况与发展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引导；另一方面，学生的个人数据隐私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高校必须依法操作，防止任何泄露或滥用行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数据采集过程中的合规性与透明性的问题。高校应主动、明确地告知学生数据采集的目的、范围及方式，只有在获取知情同意后，才能建立相应的数据采集、存储及处理流程。另外，数据安全防护也是一大挑战。学生信息往往包含个人身份信息、思想倾向等敏感内容，一旦遭遇泄露或网络攻击，将对学生的个人安全甚至高校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高校为实现教育资源有效整合而有时需要与外部机构或平台进行数据共享时，也面临着数据被违规使用或扩散的风险。所以，高校应建立严格的数据共享机制，切实保障学生数据隐私不受侵害。

（三）教师信息化水平不足的困境

当前，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依然缺乏足够的信息技术素养，难以熟练地将现代技术手段融入教学实践。他们对新型教学工具的认识有限，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教学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这种信息化能力的欠缺，将会导致教师无法及时高效地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使个性化教学的推进面临困难，也使高校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质量管理难以提升，进而直接影响到整个高校的思政教育评估。此外，教师信息技能的薄弱还限制了其开展数据驱动的教学研究，也难以参与教育技术的改革创新，从而导致高校在思政教育领域的教学方法更新缓慢，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5]。

三、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策略

（一）构建大数据支撑的思政教育智慧平台

大数据支撑的思政教育智慧平台，不仅有助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还能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思政教育，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的长远发展。建立大数据支撑的思政教育智慧平台，需要整合多方资源。高校应整合教师、学生、校友等多方数据资源，利用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技术，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为个性化思政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整合各类教学资源、相关政策文件等，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智慧平台需要具备个性化定制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为其量身定制思政教育方案，推荐适合其发展的学习资料和活动，并提供个性化指导，从而大幅提升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参与度。同时，该平台也要具备数据可视化呈现功能，以便更加直观地展示学生的学习状况、成长轨迹等信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直观反馈。通过可视化分析，及时发现学生在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和指导。建立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平台，还需要具备开放式的互动交流机制。该平台能够为学生、教师等提供互动交流的空间，促进信息共享、经验交流，打破信息壁垒，激发更多思想火花。在互动交流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学生成长的全过程跟踪机制，实现对学生成长的全方位支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奠定坚实基础[6]。

（二）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和高校思政教育深度结合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全面实施深度融合策略，应制定严密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助力教育信息化与数据安全双重目标的同步实现。做好数据保护意识培训工作，定期开办数据隐私保护的培训课程及宣传活动，提高广大师生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强化保护个人信息的自主认知；建立健全的数据权限管理体系，规定不同角色的数据访问权限，保证数据仅在获得授权的范围内被访问与使用。高校要积极开拓数据隐私保护的技术手段，采用数据加密、身

份认证、访问控制等技术，进一步强化数据的安全性及完整性，避免数据遭到泄露或者被篡改；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数据隐私保护的智能监管，快速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高校还需要构建数据隐私保护监督体系，按规定周期对数据安全管理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问题，保证数据隐私保护政策有效落地执行；建立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应对机制，若发生数据泄露以及其他安全事件，能够迅速响应，把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推进教育教学工作的不断创新与优化[7]。

（三）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

做好师资培训是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的有效途径。高校应通过组织专业的信息技术培训班、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开展集体研讨或交流等方式，帮助教师了解最新的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提升他们的信息化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还需建立师资培训档案，记录每位教师的培训经历及成果，以便及时跟进培训效果。建立专门的信息化教学团队，通过选拔具有信息技术专长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组建信息化教学团队，负责指导其他教师在思政教学中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这些团队成员可以定期组织教学案例分享会、编写信息化教学指南、开发教学资源库等，促使全校教师积极融入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中。同时，需为教师提供专门的信息技术支撑与服务，构建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解决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提供教学软件使用指导与教学资源获取等相关服务；定期举办信息技术应用案例展示，引导教师分享自己在信息化教学中的实践经验，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建立信息技术和思政教育融合的评价体系，推动教师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教师绩效考核中，把信息化教学成果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并设置相应的奖励措施；开展针对信息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教学评估，帮助教师持续改进教学设计，改善教学实效，从而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向更高层次提升。

（四）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化思政教育内容和方法

通过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化思政教育内容和方法，既能提升教学效果，又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习惯、兴趣爱好、社交圈子等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学生的个性化画像，有针对性地设计个性化思政教育教学内容，逐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教学资源，摸排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思政教育资源，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或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优质教学资源能够被更多学生共享，提高教学资源利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建立大数据支持的智能评估系统，包括学生成绩、思想品德、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指标，既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客观评价，同时还能及时发现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并给予针对性的帮助。另外，高校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跨学科合作，将思政教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推动思政教育内容的不断创新[8]。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必然趋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着教育方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环节，需要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因此，各高校应与教育管理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发展策略；教师需不断提升自身信息技术水平，积极探索教学方法的创新应用；学生也要主动融入信息技术学习当中，逐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只有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汤梦姣，唐海，高峰，等．高职院校智慧校园建设管理评价指标研究 [J]. 科技与创新，2025(03): 161-164.

[2] 王军健．数字赋能职教发展 多措共建智慧校园 [J]. 山西教育（管理），2025(02): 14-16.

[3] 闫俊山．塑造产教融合新形态 打造职教发展新高地 [J]. 河南教育（高教），2025(04): 5.

[4] 姜大从．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J]. 中国新通信，2025, 27(02): 71-73.

[5] 刘志峰，陈艳芳．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效性提升探析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4(11): 69-71.

[6] 丛建民，陈静，黄威剑．高职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基于 477 名高职教师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教育与职业，2024(22): 83-90.

[7] 李康．信息技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3(12): 34-36.

[8] 陈永平．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路径及技术实现研究 [J].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5(03): 125-127.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探讨

聂　娟 唐凌云*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活动的不断创新，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在教育中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实现积极发展，并且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维度。在此路径中，网络思政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延伸与创新形态，已成为辅导员开展育人工作的关键阵地。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进行分析与探讨，进而在增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吸引力的过程中持续构建自身优势，确保思政教育得到持续落实。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传播、大学生接触知识路径、思想交流等发生了很大转变，为大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路径。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网络时代学生思想动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破解网络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难题，成为当前高校辅导员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的核心优势

（一）突破传统教学局限

在传统网络思政教育中，辅导员多依赖已有教学内容进行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教学效果。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辅导员可以精准了解学生兴趣爱好，构建更为精确的学生画像，促使学生在“精准滴灌”中达到良好教学效果[1]。在精确的教学模式当中，学生的诉求也能得到及时满足，将网络思政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保障人工智能作为教学途径有效发挥自身优势，调动学生参与兴趣。

（二）创新思政教育载体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前主流的新型教学赋能手段，正逐步重塑思政教学形态，衍生出短视频科普、虚拟仿真实践、智能互动问答等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思政教学创新提供了丰富路径与全新可能。在内容呈现层面，辅导员可借助 AI 智能剪辑、智能字幕生成等工具，将抽象的思政理论、厚重的红色故事转化为碎片化、可视化的短视频内容，通过动态画面剪辑、情感化配音演绎、关键知识点呈现等鲜活形式，降低学生理解门槛，逐步增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度与理解深度。

（三）提升教育管理效率

高校辅导员日常工作繁杂多元，需同时兼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思想动态引导、学业帮扶指导、突发问题处置等多重任务，常常面临时间碎片化、精力分散的困境，难以集中力量深耕核心育人环节。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赋能下，诸如学生信息统计、常规通知推送、考勤数据整理等重复性、事务性工作可由智能系统高效承接，大幅减轻辅导员的事务性负担。在此基础上，辅导员能够将工作重心聚焦于舆情动态监测与引导、思政教育内容深化设计、特殊学生精准帮扶等综合性核心工作，更专注于与学生的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价值引领等关键育人环节，进而实现学生思维成长、日常行为规范、学业能力提升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确保思政教育工作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智能分析体系，实现精准育人

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为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使得学生在探究、感知的过程中持续优化自身能力，保障高校思政教育达到预期效果。与此同时，高校辅导员需要针对学校实际情况，对教学路径进行优化与创新，保障学生在更加契合自身发展路径中得到精确发展[2]。

以某高校为例，该校为破解传统思政教育难题，采用以辅导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积极牵头联合信息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校内单位，为学生积极搭建思想动态智能分析平台。该平台通过 API 接口对学生进行统一身份认证，同时整合主流学习平台、微信企

业号班级群、校园论坛等校内常用平台的行为数据，记录并更新学生登录、发言等关键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学生综合能力“雷达图”，便于辅导员了解学生短板。在平台建设中，搭载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能自动对学生网络言论进行关键词提取，同时做情感倾向判断，当言论中出现负面词汇内容时，系统会自动生成预警报告并推送至对应年级辅导员，便于辅导员对该学生思想动态进行深层追踪，达到思政教育效果。

基于平台分析结果，辅导员需要为本专业学生建立个性化思政教育电子档案，记录内容需要涵盖学生思想成长轨迹、专业成绩、获奖情况等关键信息，同时还可以添加学生的兴趣与特长标签，便于信息的精准化推送。例如，该高校针对关注人工智能的理工科学生，定期推送科技伦理相关专题文章，并且对校内或其他学校举办的相关活动进行推送，保障学生需求得到满足。在精准引导环节，该校开发“思政小助手”智能聊天机器人，嵌入常用校园平台，能够及时解答学生关于入党流程、奖助政策、思政活动报名等常见问题，不仅减少了辅导员的工作量，同时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加精确的指导，凸显思政教育在智能化背景下的深层创新。

（二）创新内容生产模式，增强德育实效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教育教学的重要推动力，在思政教学过程中，辅导员需要从内容生产维度对教学路径进行优化，保障德育满足不同专业、就业方向学生的实际诉求，从而在日常教学中为教学路径注入持续动力[3]。

以某高校为例，该校将“为思政内容注入活力”作为主要教学目标，由辅导员团队联合新媒体中心、专业教师打造“人工智能 + 思政”形成内容矩阵，积极构建多形态、全覆盖的内容供给体系，注重教学模式的综合构建。基于此，在短视频内容创作方面，该校辅导员利用智能剪辑工具中字幕生成、模板化剪辑功能，将已有的思政素材进行剪辑，形成贴合学生发展的微课，并且通过校内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同步更新，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常用的路径学习相应内容。除此之外，在互动式课程开发上，辅导员可以开发答题互动路径，学生可以利用弹幕互动形式深化自身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且实现与他人交流的教学目的，更有利于学生对思政课程产生深刻感知，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该校在虚拟仿真内容建设上积极设立专项经费，同时利用 VR 技术还原红色革命场景，采用沉浸式模式为学生营造更加真实的教学氛围，学生佩戴相应设备即可进入场景中，通过对话、互动等方式呈现思政故事，有效提升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在综合类大学，辅导员可以积极结合校内各专业优势，将学生的作业、创新等内容与人工智能教学路径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成为思政教学素材的提供者，保障人工智能在相应教学背景中得到综合发展。大学教育相对于中学教育而言较为宽松，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也能得以发挥，更有利于学生结合自身优势创造、创新表现形式，优化整体教学路径。因此在网络思想教育当中，辅导员可以在发挥各专业学生优势的同时，也将优秀案例进行整合，上传至校内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实现校内教育的过程中，也能向社会传递本校学生风貌。

（三）拓展智能传播载体，打造教学多元阵地

在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辅导员可以采用线上线下协同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具体的教学路径，保障学生在思想层面得到优化与落实，凸显阵地建设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价值[4]。

以某高校为例，该校在改革前进行充分调查，并且从学生情况着手，采用“传统升级、新型开发、协同联动”三个维度进行教学升级，积极构建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智能思政传播阵地，从多角度落实教育教学路径。首先在传统载体优化维度上，该校对校园官网已有的思政教育版块进行改造与升级，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模块，支持关键词与模糊搜索，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应信息，系统方面也可以根据历史搜索记录推荐关联内容，形成动态引导与循环。其次，辅导员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学生每日浏览的平台，开设“每周热点讨论”等思政专栏，利用舆情监测工具跟踪学生关注的热门话题，辅导员每周选取典型话题带领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讨论与分析，并且结合讨论结果撰写思政报告，将思政教学从抽象的教学内容转为可知、可感的具体内容，使得学生从多维路径优化个人思想。最后，在线下讨论过程中，学生可以结合线上学习内容以及思考过程，积极阐述自身思想，并且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经过多种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能够对思政内容产生深层次理解与认知，确保思政教学内容在学生思想引领、价值发挥等角度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辅导员后续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四）提升队伍数字素养，强化思政育人保障

人才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关键所在，在思政教学中同样不可忽视。在数字化教学模式中，辅导员作为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自身教学能力高低、数字素养情况等维度影响网络思政工作的开展，也影响到学生的综合发展。因此在当前辅导员队伍建设中，需要将数字化教育放在首位，保障辅导员在数字化模式中实现深层发展。

某高校将辅导员数字素养提升作为网络思政工作的核心保障，将培训、交流、激励三方面紧密结合，形成综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在人工智能技术培训方面，该校每年更新相应教学方案，并结合当下时政热点开展专题培训，持续优化辅导员数字能力。其次，高校可以积极邀请信息专家进入学校，并针对辅导员

工作特点，结合大数据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培训，确保学生能够在更加有效的路径中得到能力提升。在教学过程中，辅导员可以在工作坊中完成短视频制作、文章排版等实操任务，将相应的人工智能教学内容内化为能力，确保掌握实用技能。再次，该校还建立“1+1”导师制，每位新人辅导员搭配一位教育经验丰富的辅导员，新人辅导员由于年纪较小，对于新媒体、大数据等接受能力良好，而经验丰富的辅导员自身具有较多的管理与教学经验，两者形成有效互补路径，共同推动思政工作实现深层次创新与落实。最后，该校积极组织辅导员参与外部交流，回到高校后可以请参与校外交流的辅导员进行经验分享，促使高校内部实现交流与学习，保障人员自身实现均衡发展。通过多种人才培育路径与方案的协同推进，高校辅导员自身思想层次以及教育能力得到明显优化与发展，能够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业、就业、生活等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的同时，也能深层优化网络思政教育成效。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

（一）学生思想认知得到强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中，高校辅导员借助更为精准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对思政理论产生深刻理解，进而在教学模式中实现深层融合。尤其是在理论学习层面，人工智能的定向推送功能使得思政内容更贴合学生兴趣与需求，使得学生在此路径中实现主动学习与探究，突破传统思政教育局限性，让学生在自身兴趣驱动下能够深层次感知思政内容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关联，为当下网络思政教育提供明确方向[5]。

（二）学生参与主动性提高

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式教学，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单一的课堂讲授局限，将抽象的思政教学内容借助短视频、直播互动、虚拟仿真体验等新型载体进行具象化呈现，通过动态画面、情景模拟、实时互动等多元形式，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互动性与趣味性，有效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保障教学活动达到预期效果。与此同时，高校辅导员可以依托 AI 技术搭建在线答题竞赛、虚拟红色场景研学、主题互动研讨等特色教学模式，强化师生间、生生间的互动交流，进一步优化教学活动效果。

（三）辅导员思政工作针对性增强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生的学习体验上进行优化，也使得辅导员的思政工作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在教育教学维度上实现均衡发展与落实。在教育目标达成上，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能够精准了解学生思想发展情况，并且制定精确化引导语境，注重解决学生切实问题，将教学效果与学生诉求相互结合，形成更加有效的教学模式。在工作成效评估上，人工智能工具积极记录学生参与、反馈、行为等关键内容，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的温度与深度，形成技术与人文协同教育路径，保障网络思政工作的开展与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形成紧密关联，凸显网络教育在思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革新与教育变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正积极突破传统范式、探究数字化新教学路径，同时也对辅导员的媒介素养、技术应用与育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此，高校辅导员应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学习并灵活运用智能技术丰富思政教育模式，在优化育人场景、提升育人实效、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等路径中，持续拓展智能传播载体、打造线上线下多元育人阵地，让网络思政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李波 . 高校辅导员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4, 45(17): 144−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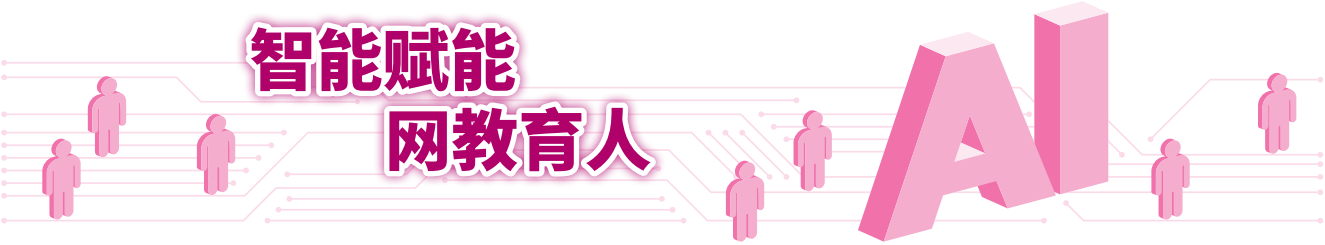
[2] 廉紫阳 . 新媒体时代辅导员思政教育创新路径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4, 15(05): 191−193.

[3] 王振文 . 融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引导力提升策略探究 [J]. 文教资料 , 2024(19): 99−102.

[4] 陈恳 , 苗胜立 , 陈安琪 , 等 .“三全育人”模式下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能力提升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4, 23(14): 222−224.

[5] 钟丹丹 , 魏艳阳 .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工作的创新研究 [J]. 高教学刊 , 2022, 8(24): 43−46.

（作者：聂娟，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通信作者唐凌云，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何　静 赵亚军

摘要：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的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存在一些挑战，主要是教学目标缺乏整体性与衔接性、法治教育内容一体化有待优化以及教学方法缺乏多样性与针对性。针对现实情况，全面把握法治教育课程目标，系统整合各学段法治教育资源，实现教学内容的贯通衔接，并革新教学方法，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

法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法治教育的主阵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大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这一要求为推进法治教育、培育青少年法治素养提供了重要指导。由此可见，法治教育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的现实意义

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是对当前思政课法治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作出的新回应。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有利于促进学生法治素养的系统培育和思政课改革创新，更有利于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一）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法治素养

学生的法治素养培育是需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具备长期性和系统性，所以仅在某一个阶段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各学段协同工作联合发力，才能实现对学生法治素养的系统培育。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充分衔接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之间法治教育各要素，打破四个阶段教育相互独立的发展现状。而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能够立足整体，统筹规划，通过完善思政课法治教育教学体系，落实教学实施过程，自上而下地形成思政课法治教育整体布局，以不断增强法治教育的阶段性与衔接性。

（二）有利于推动思政课程的改革创新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需要高质量的思政课作为保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必须遵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科学发展路径，保证法治教育的系统性和衔接性才能使各学段紧密衔接，不断推动思政课改革进程。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需要深化”，同时强调要“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1]。因此，法治教育在思政课中地位关键，推进一体化建设，不仅是内在要求，也是驱动思政课整体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

（三）有利于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 建设法治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保障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建设。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目前的思政课法治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教育目标缺乏整体性与衔接性、教育内容一体化有待优化、教学方法缺乏多样性与针对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促进思政课法治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教学目标缺乏整体性与衔接性

教学目标是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中

期望学生达成的学习效果，教学目标需要参考总体目标和课程目标，结合教材内容和实际学情来制定。其一，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教学目标主要依托各学段的思政课课程标准来呈现，但思政课课程标准的颁布与修订都一定程度存在制约一体化建设发展的问题，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制定内容不一致、各学段课程标准颁布更新节奏不一致、课程标准修订步调不一致等问题仍然存在，而且相关的指导性文件也多按学段制定，思政课课程目标缺乏整体性设计。其二，由于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缺乏一体化教学观念，侧重关注本学段的思政课教学任务，极大程度忽视学段间法治教育教学目标的关联性，导致思政课法治教学目标缺乏衔接性[3]。比如在中小学阶段法治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容易忽视对学生法治意识的过渡与延伸。高中阶段容易忽视从深化法治观念到系统学习法治知识教学目标的有效衔接。大学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性较强，思政课教师综合水平相对较高，根据法治教育目标设计教学时，难度深度均较中学阶段大幅增加，在从法治意识培养到促进学生形成法治素养这一目标的过渡上与上一学段的衔接还不够。

（二）法治教育内容一体化有待优化

教育内容的一体化是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法治教育内容一体化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教材内容层次性有待优化。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各阶段的教材中部分法治教育内容设置存在层次不够清晰，甚至顺序倒置的问题。例如小学和初中教材中对国家基本制度的知识点有些许罗列，但教师教学点到即止，导致学生对这一阶段法治学习内容难以理解和消化。初中阶段涉及了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深层次的抽象概念的理解和思辨，反观高中思政课教材中却涉及的只是一些浅层次的法治概念和意义等内容，在部分教材内容设置上暴露出了从复杂到简单、从抽象到具体的层次倒置问题[4]。第二，教材内容完整性有待增强。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各阶段的教材中部分法治教育内容衔接过渡不到位，甚至存在缺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育教学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进而造成法治教育断层现象。例如大学阶段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在中小学阶段并未做铺垫，容易使学生学习脱节。小学和初中教材中设置了较多的基本法律常识和宪法知识，但是这类知识点在高中被安排在选修课中，很多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更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论述法治知识内容，因此造成高中阶段思政课法治教育部分内容的缺失。

（三）教学方法缺乏多样性与针对性

在思政课法治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存在形式单一问题。目前来看，思政课法治教育往往局限于学校课堂教学之中，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普遍不足，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居多，专注于讲解法治知识点，“满堂灌”的现象仍然存在。此外，受功利化观念影响，思政课教师更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和自身的考核指标，侧重于对法治知识的灌输式讲解，忽视了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性。比如在大中小学各学段不加区分地采用同一类教学方法，忽视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各异的现实情况，一定程度割裂了学段间教学活动的层次性。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主要是指教学方法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身心发展特点适配性不强，一定程度上存在超出认知或低于认知的情况。目前在思政课法治教学中，受学校资源统筹分配和课时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思政课教师以自己主观教学习惯为主，倾向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法治教学方法，有时会忽视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比如采用灌输式教学法来启发小学生的法治意识，运用辨析式方法对初中生进行法治观念培养，运用演示法和角色扮演等体验性较强的方法深化高中生法治意识培育，运用传统讲授法为大学生讲解法治知识等，都未能精准匹配与学生发展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三、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推进路径

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程，横跨不同学段，纵贯学生成长周期，是一项涉及面宽广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构建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方法体系，不断加强教师队伍这一主体部分的建设，形成各部门协同配合各要素紧密衔接的一体化工作格局，让“法治素养”在思政课教学中落地生根。

（一）全面把握法治教育课程目标

思政课课程目标是思政课法治教育总体目标与学段教学阶段性目标的中介与桥梁，在整个目标体系中处于中间位置。课程目标又是制定课程内容、进行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是教材编撰与修订的重要基础，推动思政课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必然要从这一基础做起，全面把握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从优化顶层设计和强化学段衔接上着手实现思政课法治教育目标一体化。首先，要在思政课课程目标设计时设置专职部门负责法治教育目标设计工作。注意吸纳法律专家、法治教学带头人、教育部门有关领导、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等多层面人员，参与到课程目标设计工作中，确保制定出具有进阶性的目标体系并形成长效跟踪机制，保证各学段思政课法治教育在系统内整体有序推进。其次，要采用螺旋上升的方式做好思政课法治教育目标衔接工作。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乎于一串圆圈，近乎于螺旋的曲线。”[5]螺旋式的课程内容设计顺序可用于在小学阶段教授某一学科的某些方面，并为学生后续阶段学习同一学科做好准备[6]。螺旋上升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不断向前的，最终指向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将螺旋式上升理论运用到思政课课程目标一体化设计中。这就要求我们

仔细研读课程标准，做好思政课法治教育目标之间的梯度进阶，确保教学目标彼此关照和呼应，但要处理好衔接巩固与机械重复的界限问题，把握好小学启蒙法治情感、中学培育法治观念、大学形成法治认同和责任担当的进阶关系，采用螺旋上升的方式推进思政课法治教育目标一体化建设。

（二）有序衔接和丰富各学段法治教学内容

教材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工具，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和使用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尽管在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思政课教材中法治教育的内容在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可以发现许多关联之处，这就需要我们找好法治教学内容的契合点以实现学段之间的衔接过渡。首先，要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教师应明确教学目的、重点、方法和任务，充分考虑到上下学段法治内容的拓展和延伸，要体现正向指引，把培育法治素养作为主要内容。其次，要不断创新载体，开设线上思政微课，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组织教学活动、研讨交流，丰富法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最后，要注重教学内容的实效性，邀请相关单位和法律从业人员现场观摩授课，征求意见建议，汇聚多元力量，优化教学设计，深化法治教育教学内容。

（三）创新法治教育一体化的教学方法

要开展多样化教学，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要立足教材内容，利用好思政课教材多样化的呈现形式，采用讲授法、讨论法和直观教学法等共性方法开展法治教学，促进学生对法治知识的基础性掌握。根据学生兴趣，采用案例教学法、游戏化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个性化方法开展法治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入。立足实践活动，开展“模拟法庭”“法治知识竞赛”“法治教育周”等法治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参与法治生活，以自主性、探究性、体验性的法治教育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在法治学习方面做到知行合一。另一方面，要开展针对性教学，做到精准施策。例如小学阶段采用情感启蒙式、案例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小学生的法治行为习惯；初中阶段可以将常用的讲授法与活动教学、社会实践相结合；高中阶段可以采用翻转课堂、议题式教学法等方式引导学生对法治问题进行深入学习和思考，还可以采用专题式教学将零散的法治知识串联成较为完整的知识链条；在大学阶段可以采用辨析式、研讨式等思辨性较强的教学方法展开法治教学，从而实现大学生对法治教育的情感共鸣和深层次的法治认同。在保证教学方法针对性的基础上，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从基本的启发式教育到加深理解的案例式学习，再到培养法治思维能力的辩证式学习。

四、结语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遵循法治教育的相关政策要求，按照整体谋划与突出重点的原则，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和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创新发展，这既是推进思政课程改革的发展需要，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保障。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构建一体化的思政课法治教学体系，以促进学生逐步提升法治素养，最终实现法治层面的知行合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9(09): 2−7.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40.

[3] 李尚明，周锦涛．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展的研究综述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4(06): 41−53.

[4] 王景云，杨晨光．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的有序推进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01): 112−121.

[5] 列宁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0.

[6] 檀传宝．教育新论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0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齐齐哈尔大学 2024 年党建研究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QQHRUDJ2024−31）。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健全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格局的路径探析

柴　斐

摘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高校离退休工作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要求，本文从新时代工作要求出发，结合高校离退休教职工的特点和需求，着重阐述如何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校内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推进高校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开展，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最终形成“党建引领有力度、服务保障有温度、文化养老有深度、作用发挥有广度”的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新格局，助力离退休教职工安享幸福晚年，为高校高质量发展凝聚银发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格局

根据《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 2024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10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2.0%；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02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6%。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2.8%。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0 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基本国情。我国人口老龄化交织叠加人口负增长、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复杂艰巨，要求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交织的背景下，要汇聚社会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老龄人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人口红利，转化成积极养老。要把握离退休职工相对年轻这几年，多创造项目和平台载体，在他们积极养老的同时也对离退休工作实现牵引促进作用。

近年来，高校离退休教职工体量逐年增大，这类群体兼具“知识分子”和“老年群体”双重属性，普遍具有高学历、高职称，他们学识深厚、经验丰富，是学校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科研、管理经验，是学校的宝贵财富。高校离退休部门承担着党和国家以及学校关心爱护离退休教职工的光荣使命，随着时代发展，其工作也面临挑战。我国退休高峰期来临，新退休教职工也逐渐增多，离休和退休人群是显著的一减一增趋势，服务对象呈现年轻化态势，他们能力更全面、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相对年轻的退休教职工精神需求高，“价值感”和“归属感”需求强烈，角色转换与需求存在落差，部分“价值延续”的需求未满足，离退休教职工的优势资源未能充分挖掘。但对于老年群体生活而言，当前智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改变生活带来一系列便利，技术应用与群体适配存在断层，他们很难跟上时代快速发展，存在数字鸿沟，影响生活幸福指数。不同群体的差异对离退休工作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注重分类管理，实施精准化管理，离休干部一人一策，退休人员一类一策，以不同需求人群的方式，分类施策，从而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离退休工作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全局性、战略性、多元性、复杂性，根据新时代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工作要求，结合高校离退休教职工的特点和需求，本文着重阐述如何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校内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643”工作格局，共同推进高校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开展，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

一、加强党委统一领导，突出抓好六大建设

老干部工作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一个特色。离退休人员为社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干部就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学校党委要从这个高度重视和认识离退休工作，夯实党委领导，健全组织架构。设立学校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离退休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单位由校内有关部门组成，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全校离退休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大局，紧盯中央部署，紧密结合基层所需、离退休教职工所盼，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有关离退休工作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向校党委汇报。离退休部门负责具体贯彻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离退休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根据统一指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找准工作定位，创新工作方法，做好离退休教职

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学校层面突出抓好六大体系建设：完善制度体系，要立足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在党建引领、发挥作用、服务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规范的系列制度，推动离退休工作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夯实组织体系，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载体（老党员之家、老党员先锋队和老党员工作室）立体式建设，不断提升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体系整体效能。聚焦服务体系，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整合校内外为老服务资源，在实现品质养老和激发银发力量上打造服务矩阵，不断满足离退休教职工基础性和发展性需求。注重项目体系，以项目推动为抓手，围绕离退休教职工最关心、最迫切的事，谋划切口小、离退休教职工感受度高的项目，以项目建设为牵引，赋能高校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发展[1]。加强队伍体系，双向发力，对标新时代要求和组织工作标准激扬干的动力，全力打造模范部门和过硬的工作队伍，同时吸引有能力、有热情、有经验的离退休教职工加入为老服务骨干队伍，作为工作人员的有力补充，厚实紧密层。抓好品牌体系，对标中央部署要求，对标老干部工作集成实践，对标基层和离退休教职工切身需求，结合高校文化或地方特色等内涵，凝练形成系列工作品牌，把“盆景”变成满园风景，增强工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针对离退休教职工较多的高校，实施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离休干部的管理服务以离退休工作部门为主，院级单位协同；退休教职工的管理服务以院级单位为主，离退休部门做好指导和协调工作。校内各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职责积极协同，安保处协助做好离退休教职工防范诈骗宣传，校医院进行医疗服务保障，计财处优化涉老经费使用，工会共享活动空间和老年教育等软硬件资源，信息中心纳入学校统一信息数据平台，宣传部协助营造正能量氛围加强宣传引导。一体推进、多维发展，形成工作合力。

二、夯实院系主体责任，着力推动四个聚焦

院级单位作为退休教职工的管理服务主体，负责具体落实离退休工作任务，要着重四个聚焦上发力。

聚焦党建引领，确保离退休党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院级单位要能够深刻认识到老干部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组织引导离退休党员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开展座谈会、专题学习会以及走访慰问、宣传宣讲等活动，增强离退休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结合实际落实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定期集中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以“组织设置好、班子建设好、党员队伍好、学习活动好、作用发挥好、制度建设好”为标准，开展规范化党支部建设[2]。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建立退休党支部，健全退休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机制，每位退休党员负责联系几位群众，经常家访或电话联系，定期向学院党委汇报联系情况，积极完善以老助老、服务群众的方式。

聚焦急难愁盼，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院级单位要做到离退休人员家底清、底数明，在落实好离退休教职工生活待遇、政治待遇的同时，持续推进“暖心爱心”工程。建立重点关注人员信息库，对孤寡、空巢老人进行结对、定期关心和上门慰问。在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院、突发重大变故、去世等关键节点，要及时探望慰问，积极协助解决离退休教职工实际困难。有条件的学院在学校经费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配套经费支持或设立专项基金。

聚焦作用发挥，为高校发展增添正能量。各二级单位结合本单位特色，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充分挖掘离退休教职工特色优势，引导离退休教职工聚力服务中心，呈现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态势。设置多样化的“乐龄”平台和项目，实现离退休教职工作用发挥的多渠道齐头并进。开展以铸魂育人为目标的“银龄讲堂”“院士面对面”各类主题教育活动。收集、积累离退休教职工的音视频素材，开展史料挖掘和文化传承活动。发挥离退休教职工在招生、校友联络、教学督导、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培育先进典型，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推广，通过以点带面，形成浓厚的积极作用发挥氛围。

聚焦专班统筹，打造素质过硬的离退休干部队伍。离退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各二级单位更加重视离退休工作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纪律严明的过硬队伍。由单位主要领导担任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发挥“头雁”作用，并配备副组长、联络员等，完善队伍体系，优化队伍结构。突出发挥离退休工作联络员的作用，与学校职能部门保持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离退休工作相关业务培训，保持一定的敏锐度和专业性，并深入离退休教职工中协助开展退休支部建设、各项活动和慰问服务等。

三、凝聚为老工作合力，重点关注三个资源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离退休工作要善于开源，通过开放资源、共建共享、协同联动，让更多离退休教职工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工作效能最大化。

关注养老资源，高校高龄老人占比较高，普遍关心养老问题。我国目前开展的养老服务以社区为主体、以居家为基础，积极推行老年友好社区项目，加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和多功能融合场景建设，加强无障碍、适老化设施建设，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大力发展老年助残服务，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积极开展各类老年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倡导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社区提供

了种类繁多的智慧养老服务项目，涵盖家庭护理、生活支持、设施设备的适老化改造等。学校要加强与社区联动，配合建设“十五分钟养老圈”，做好“四就近服务”，对重点人群做好对接联动工作，重点关注生活困难、身患重病以及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离退休教职工，及时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关注社会化养老资源，绘制养老地图，甄选养老机构，为离退休教职工提供多渠道养老选择。

关注专业资源，根据离退休教职工年龄特征，结合当下离退休教职工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主动对接相关机构提供针对性服务。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建立合作关系，协助保障老年人赡养、财产、婚姻等合法权益，提供遗嘱公证、意定监护协议、财产公证等服务。加强医疗支撑服务，可以定期开展线上线下健康讲座、与附属医院联合开展义诊活动等，通过现场医疗咨询、健康检查和专业指导等形式，为离退休教职工送上贴心的健康服务和温暖的关怀。在每年重阳节期间举办敬老月系列活动，整合养老机构、社区服务站等社会资源集中走进校园，为离退休教职工提供一些必要的上门服务。

关注赋能资源，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高校离退休教职工高知特点，60 岁“低龄活力老人”与 90 岁“高龄失能老人”需求截然不同。对于相对年轻的退休教职工，更加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追求实现自身价值[3]。积极对接相关部门的资源项目，为离退休教职工提供更多的平台支撑。落实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行动计划，利用高校退休教师的独特优势和突出作用，助力西部高校提升立德树人、队伍建设和科研创新的能力，在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中彰显离退休教职工的时代价值和使命担当。与国家老年大学共享资源，构建学习型老年生态，积极开展老年教育活动，让离退休教职工有机会不断接受教育、学习新生事物，丰富他们的生活，提升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四、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提升两项水平

高校离退休工作格局中应重视两项水平的提升，聚焦需求导向，通过深入了解离退休人员在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多元诉求，提供精细化服务。

第一，提高精准化服务水平。做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和相关调研工作，将数据整合、分类，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相关部门通过针对年龄结构、健康情况、兴趣特长、服务需求等方面建立服务矩阵，通过对矩阵数据的交叉分析，可将离退休教职工科学划分为“活力贡献型”“文化康乐型”“生活照料型”等类别，根据不同矩阵服务对象需求提供专项服务内容。例如，在“活力贡献型”服务矩阵构建中，为离退休教职工搭建发挥余热的平台，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参与教学督导、教学研究支持等工作，担任“传帮带”导师，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与科研素养，让其在教育传承中继续发光发热；在“文化康乐型”服务矩阵中，建设离退休教职工活动中心，并开设书法、绘画、声乐、舞蹈、象棋、摄影、智能设备使用等多样化的课程，并定期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为离退休教职工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切实增强离退休教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生活照料型”服务矩阵建设中，为离退休职工做好“老有所养”的服务保障[4]。

第二，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离退休工作应实现技术赋能、数字赋能，逐步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为精细化服务提供技术保障与支持。一方面，应建设智能信息管理平台，将相关管理工作的数据整合到同一平台中，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将人事、财务、组织、后勤等多部门数据整合到平台中，建立离退休教职工数据库，以此完善离退休教职工的动态电子档案，并针对离退休教职工服务需求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借助智慧平台完成线上业务办理，减少线下奔波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学决策[5]。

五、结语

本文围绕离退休工作的实践路径、现存挑战及优化策略展开系统研究，通过梳理政策演进、分析现实需求、总结实践经验，探讨与回应了离退休工作有关核心问题。研究旨在为提升离退休工作服务保障质量、完善相关工作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1] 朱培培 , 陈彦艳 . 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路径研究——以苏州大学为例 [J]. 高校后勤研究 , 2025(07): 51−53.

[2] 胡佳玲 . 加强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4, 23(12): 222−225.

[3] 张伟娟 . 高校离退休工作管理信息化探析 [J]. 办公室业务 , 2023(24): 116−118.

[4] 郑雅宾 . 新时期高校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J]. 办公室业务 , 2024(06): 165−168.

[5] 张淑娟 . 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的几点思考 [J]. 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 2022, 20(04): 122−1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大学 2024 年党建研究离退休工作课题“新时代高校离退休工作治理体系创新研究”（2024DJ−ZX704Y）。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分析及对策

孙　宁

摘要：随着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对护理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提升，护理专业毕业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面临就业问题时，很多毕业生存在就业意向不成熟、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情况，教师应当深度分析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特点，并制定符合学生就业需求的辅导措施，让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本文分析了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辅导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就业意向

就业意向是护理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时重要的思考内容，既体现了他们对未来岗位、就业环境的需求，也反映出对待遇的要求。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学生的就业意向易出现两类明显偏差：一是过度追求三甲医院，忽略其他适配的就业场景；二是就业意向与护理行业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对此，教师需全面分析毕业生的就业意向，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与行业实际需求开展科学合理的就业指导，从而保障学生就业意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切实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一、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特点

为明确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特点，本研究对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和就业目标进行了调查分析，确保能够结合学生的就业意向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方案。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河南省某高等职业院校护理专业 2022—2024 年毕业的学生，共 170 人。其中 2022 年和 2023 年毕业的学生占比均为 11.76%，2024 年毕业的学生占比为 76.48%，调查报告中的男生占比为 17.65%，女生占比为 82.35%。本调查报告主要调查了学生的就业单位现状、岗位与专业的匹配情况、能力欠缺情况、就业满意度、就业待遇需求及工资状况，为本课题深度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毕业生求职单位意向特点

目前高职护理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意向单位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从调查可以得知，选择传统医疗机构的学生占比为 41.17%，尤其是三级医院占比为 17.65%、私立医院或诊所占比为 11.76%，二级医院、乡镇医院占比仅为 5.88%，选择一级医院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护理机构、康复医疗中心等单位的学生为 0，由此得知，大多数毕业生更倾向求职于高等级医院，或待遇更高的私立医院，更重视就业单位提供的丰富资源与发展平台，而基层医疗机构及部分专业护理机构的低选择率则表明这类单位对毕业生吸引力不足，难以得到毕业生关注。此外，有 5.88% 的学生会选择医疗器械、护理培训等相关单位，甚至有高达 52.95% 的学生会选择护理之外的行业。由此可见，当前很多毕业生的求职意向并没有局限于传统护理的相关医疗机构，而是展现出向非典型护理单位或其他领域延伸的倾向，例如选择符合自身综合需求的单位，同时也反映出毕业生在单位选择上的灵活性与多元化需求 [1]。

（二）毕业生求职岗位意向特点

在求职岗位意向方面，从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有 39.5% 的护理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后所选择的岗位与护理专业无关，另有 46.5% 的学生进入了临床护理、护理管理等核心岗位，14% 的学生进入了护理咨询、健康管理等辅助岗位。由此可见，当前依然有多数学生在就业时面临岗位与专业无关或者无强相关的情况。同时，从当前学生认为自身最欠缺的能力方面，其中认为自己应急处置能力、职业规划能力缺失的学生占比为 41.8%、认为自己护理文书书写能力缺失的学生占比 35.3%、认为自己应急处置能力缺失的学生达到了 22.9%，进而导致很多学生担心自己能力与岗位需求不符的情况。由此可见，职业能力和素养的欠缺对学生求职自信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此外，针对就业满意度方面，有 58.82% 的学生表示当前岗位相对一般，有 5.88% 的学生并不满意当前的岗位，此外还有 20.35% 的学生想转行从事其他行业，只有 17.65% 的学生对当前岗位表示满意。由此得知，对岗位的认可

程度以及技能与岗位匹配程度成为当前毕业生就业方面的显著困境[2]。

（三）毕业生待遇需求意向特点

在待遇需求方面，目前，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呈现出以物质待遇为导向、兼顾隐性劳动平衡的特点（见图 1）。从物质待遇方面，对薪资福利的需求在毕业生求职因素中高达 82.35%，不过该数据与毕业生的实际收入情况存在强烈反差，有 64.71% 的毕业生月均收入处于 3000 元以下，较低的收入水平与极高的薪资福利重视度形成鲜明对比。从隐性待遇需求来看，工作强度同样以 82.35% 的占比与薪资福利并列成为毕业生最看重的因素。由此可见，毕业生对待遇的需求不仅注重物质需求，同时对劳动付出和工作强度也有着更多要求，而且还存在主动规避“低薪资、高强度”岗位的情况。鉴于当前大多数护理岗存在工作强度较大、针对毕业生薪资较低等问题，很多学生毕业后面临岗位与待遇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也是部分毕业生选择其他行业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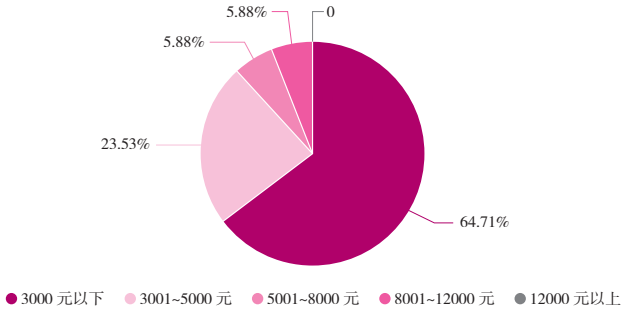


图 1 高职护理类毕业生就业工资情况

二、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特点进行分析后可得知，很多学生在就业目标、方向上存在显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就业选择范围，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也会带来干扰。

（一）缺乏对自身能力的深度理解

学生缺乏对自身能力的深度理解，是导致学生就业意向存在能力与岗位需求偏差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学生因“人岗不匹配”而造成就业困境的关键。很多学生在分析自身能力时存在只了解静脉穿刺、无菌技术、生命体征监测等操作技能的掌握熟练度，但难以精准界定专业技能的掌握深度和熟练度，也无法明确自身的优势领域以及技能短板，此外，很多学生还忽视了人文关怀、护患沟通、应急状态下的责任担当等职业素养在就业意向规划方面的重要性，进而造成学生就业定位盲目的问题。

（二）求职目标不切实际

部分学生在制定求职目标时面临不切实际的困境，由于缺乏对护理行业市场规模、发展前景的深入了解，造成很多学生更注重综合医院、三甲医院等热门的就业方向，忽视了基层医疗单位、养老护理等潜力领域的岗位缺口，而且大多数毕业生不了解不同岗位对技能、资质的具体要求以及地域的供需差异，很容易导致就业目标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情况，造成大量学生去竞争少数岗位的就业困境。此外，很多毕业生在职业需求的权衡方面缺乏理性，尤其是在薪资待遇、工作地点、工作强度、晋升速度等方面的需求过高，例如，既需要高薪资待遇，又期望工作强度低、节奏轻松，还希望晋升路径短，却忽视需求与现实的矛盾以及行业特点和规律，导致容易因为目标过于理想化而被打击就业自信。

（三）缺乏职业规划意识

职业规划意识不足、对护理职业发展路径缺乏科学认知，也是影响学生就业意向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很多学生并没有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自身特点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方向，也缺乏职业发展方向对资质、能力的需求，导致学生的职业发展目标过于短视，只注重当前利益，忽视了长远发展。

（四）存在较大的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大是影响学生就业动力的重要心理因素，目前多数毕业生对就业市场存在心理偏差，不仅面临能力和岗位适配性不足方面的压力，还会因为岗位竞争压力大、对未来成长的担忧导致求职心态不佳的问题。而且部分学生存在求职技能不足的情况，缺乏简历优化、面试技巧等核心能力，同时，还面临对就业挫折等方面的恐惧，这些心理因素均影响着学生的就业意向。

三、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指导措施

为解决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存在的问题，教师必须结合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方案，确保学生能够转变固有的就业意向，以更加合理、科学的角度明确自身的就业方向，以及促进自身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一）帮助学生学会分析自身能力

学生自身能力是保障其就业竞争力的基础，在求职期间，学生必须了解自己的特长、性格、技能特点，才能保障就业意向、求职目标符合实际情况，避免因能力和岗位不匹配导致的就业困境。基于此，教师应协助学生学会分析自己的专业能力掌握程度。首先，教师应当从护理职业技能入手，引导学生系统梳理在校期间的核心护理技能体系，其中既包含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也包含基础医学、护理药理学、护理程序等相对应的理论知识，进而结合实训考核成绩、带教老师阶段性评价、技能竞赛表现等客观考核依据，让学生逐一分析并标注自身对各项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明确自身的职业优势、技能短板，如有的学生擅长内科护理，而有的学生更擅长妇产科护理等，以此帮助学生对自身职业能力形

成量化认知，让学生在制定就业方向、岗位目标时能从自身能力方面考虑[3]。

除了要考虑技能水平，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分析自身的非技能素养，让学生对日常学习实训中的行为表现进行深度复盘，如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职业同理心、服务水平等。通过模拟实践的方式让学生明确自身在职业素养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之处，确保学生在明确就业意向时也能考虑职业素养的影响。

（二）帮助学生合理制定求职目标

求职目标的合理性是满足学生长远发展需求的关键，为解决学生求职意向过高、不符合行业结构的情况，教师应当让学生在了解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合理制定求职目标，让学生意识到不同岗位的发展空间，确保既能够实现能力与岗位的匹配，也能满足行业需求。基于此，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梳理护理市场行业的就业市场动态，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场景的特点，除了对技能的需求，还需要明确不同地域就业市场的供需差异以及发展前景。例如，一线城市对高学历、高端护理人才的需求，基层地区对复合型护理人才的需求，以及不同级别单位的岗位数量、薪资待遇、晋升路径等核心信息，确保学生能够在掌握市场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成长需求初步圈定求职范围，避免学生因为缺乏对就业市场的认知而导致目标制定过高的情况[4]。

其次，教师需要指导学生进行岗位与能力的适配，对照前期梳理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优势和短板，结合学生个人对工作强度、薪资水平、职业成长速度、工作地点等方面的期待，进行需求的权衡与排序。例如，若学生的技能优势偏向老年照护领域，且对工作的需求倾向于节奏平稳，则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养老机构与社区岗位；若学生的静脉输液等急症护理技能突出且适应能力强，并且对未来发展有更高期待，则可以鼓励学生关注综合医院的急诊科、内科等岗位，以此帮助学生实现个人与岗位的初步匹配。

最后，教师还需要帮助学生将求职意向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帮助学生在明确求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针对性培训强化学生的求职竞争力。例如，教师可以将求职短期目标放在简历优化、护士资格证备考、面试技能打磨等准备工作方面；将中期目标放在投递岗位的数量、类型与地域范围等方面，并制定面试跟进计划；长期目标则放在岗位晋升、未来发展方面，确保能够帮助学生将求职目标转化为可行动的方案，以此实现对学生的精准指引。

（三）帮助学生进行科学职业规划

科学的职业规划也是避免学生盲目选择就业意向的重要措施，教师要引导学生将护理行业发展与个人特点进行绑定，系统梳理护理领域的细分发展方向，比如专科护士、护理管理、护理教育、社区护理、老年护理等核心赛道，并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帮助学生明确各方向的行业需求缺口、核心能力要求与长远发展前景，并结合学生的优势、特点以及职业观念展开合理规划，如擅长应急处置的学生可以向急诊专科方向发展、沟通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则可以向护理管理方向发展，有效帮助学生摆脱职业发展方向盲目的问题[5]。

（四）帮助学生缓解就业压力

帮助学生调节就业心态、缓解学生就业压力，也是保障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以及就业意向的重要措施。教师应当以认知引导为基础，帮助学生调整面临就业时的心态，纠正学生“只有综合医院才算优质就业方向”的单一认知，通过全面解读护理行业的就业市场帮助学生明确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护理岗位的价值与发展空间，进而结合前期求职目标以及职业规划的分析结果，确保学生能够正确、客观看待自身优势和就业市场的匹配逻辑，避免学生因为过高期待或者自我否定产生较高的心理负担。而且教师还需要普及就业政策中基层岗位的扶持福利、护理职业后期的成长潜力等内容，帮助学生建立理性就业的认知框架，减少学生因为认知偏差造成的就业压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求职意向的调查可以得知，大多数学生的求职意向与自身特点以及行业需求存在明显偏差，为解决毕业生就业困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分析，并根据自身特点、行业需求制定合理的求职目标、长远的职业规划，进而协助学生缓解就业压力，确保求职历程更加顺利。

参考文献

[1] 杨婷婷 .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2024, 7(09): 72−75.

[2] 赵月霞 .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社区就业对策分析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2, 21(05): 279−280.

[3] 杨建 , 张玉领 .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对策分析 [J]. 卫生职业教育 , 2022, 40(01): 144−146.

[4] 任历 , 李州平 , 李宁 . 护理专业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及对策分析 [J]. 卫生职业教育 , 2021, 39(24): 41−42.

[5] 曹雪楠 . 高职院校老年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分析 [J]. 黑龙江科学 , 2020, 11(23): 160−16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校级一般项目“高职护理毕业生就业现状调研及对策分析”（2025020）。

（作者单位：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对个体身体欣赏的影响：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石　怡 黄　辛* 艾靖爵 李武恒 石子帆

摘要：本研究基于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量表（SNSBICS）、身体欣赏量表（BAS-2）、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S）对广西某高职学校32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重点探讨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大学生性别对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有一定预测作用，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提示高校可以通过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交网络体像认知、降低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从而提升个体身体欣赏水平，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

关键词：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身体欣赏；心理健康

随着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进步，网络社交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社交平台不仅重构了人际交往模式，更为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呈现空间，这种便利性和隐匿性深刻影响着大学生心理和价值观的塑造。社交网络中大量营造的“完美身材”标签，以瘦为美的照片、视频分享、畸形审美风格等营销文案及广告宣传，都在引导个体无意识地进行体像比较。这些内容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形成“信息茧房”，持续强化特定审美标准，加剧个体对外貌的过度关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指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络的过程中与网络呈现的个体比较其身体外貌，或者与网络上理想化的身体形象作比较的行为。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社会比较，会对个体的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及心理社会适应等产生重要影响。Thompson等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家人、同伴、媒体等三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向上比较及内化对个体的负面身体意象产生影响[1]。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行为引发了大众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等问题。体像比较倾向高的人，通常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负面的情绪[2]。

有研究显示，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会使个体对自己身体外貌产生负面评价，引发负面评价恐惧[3]。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评价的预期”。负面评价恐惧越强烈的个体，更加在意别人对自己体像的评价。个体身体欣赏可以理解为个体自己本身对身体保持积极评价态度。Homan等提出，身体欣赏包含三个核心维度：关注身体需求、重视身体机能及维护身体健康[4]。其核心机制并非旨在完全消除身体不满，而是通过引导个体进行认知重构与自我关怀，建立一种积极的身心认知模式。该模式促使个体学会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将自我价值与身体形象解绑，从而构建起更具包容性与弹性的身体意象，并促进整体身心健康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个体身体欣赏之间的关系[5]，并把负面评价恐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个体身体欣赏的中介效应，为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从广西某高职院校3个专业中随机抽取5个自然班。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93.14%）。被试年龄18~20岁[（18.78±1.22）岁]，其中男生158人、女生168人。

（二）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维度测评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一般情况调查表（研究者自行编制），用于收集年龄、性别、年级等人口学资料；（2）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量表（Social Networking Site Body Image Comparison Scale，SNSBICS），该量表由Thompson等（1991）编制，经魏祺等（2017）修订，适用于测量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体像比较倾向（Cronbach's α=0.809），采用5级计分[6]；（3）身体欣赏量表-2（Body Appreciation Scale-2，BAS-2），由Tylka（2015）在Avalos等编制的BAS基础上修订，包含10个5级计分项目，用于评估身体尊重、接受和欣赏水平（Cronbach's α=0.884）；（4）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BFNES），该量表由Leary编制并经陈祉妍修订，包含

12 个题目用于测量对消极评价的恐惧程度（Cronbach's α=0.827）。所有量表均采用标准化计分方式，得分高低分别反映相应心理特质的强度水平。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7.00 系统、process4.1 插件进行数据录入统计与分析。

二、结果

（一）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 t 检验分析大学生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身体欣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性别在负面评价恐惧上的得分差异显著（$t=-3.017$，$p<0.01$），女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得分 [（38.86 ± 8.34）分] 显著高于男生 [（36.17 ± 7.65）分]。

（二）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身体欣赏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对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身体欣赏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呈显著负相关（$r=-0.235$，$p<0.001$），说明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频率越高，身体欣赏水平越低。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呈显著正相关（$r=0.399$，$p<0.001$），说明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频率越高，负面评价恐惧越低；负面评价恐惧与身体欣赏呈显著负相关（$r=-0.378$，$p<0.001$），说明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越高，个体身体欣赏水平越低。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和身体欣赏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首先以社交网络体像为预测变量，身体欣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可以负向预测身体欣赏（$\beta=-0.239$，$p<0.001$），F 值为 19.197（$p<0.001$），调整后的 R^2 为 0.054。然后，以社交网络体像为预测变量，负面评价恐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可以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beta=0.399$，$p<0.001$），F 值为 60.615（$p<0.001$），调整后的 R^2 为 0.157。最后，以社交网络体像、负面评价恐惧为预测变量，身体欣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仍然对身体欣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beta=-0.335$，$p<0.001$），但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对身体欣赏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beta=-0.106$，$p>0.05$），F 值为 28.219（$p<0.001$），调整后的 R^2 为 0.147。

（三）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身体欣赏的中介作用

为了验证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采用 process4.1 插件，选择点估计 95%CI，重复抽取 5000 个样本。结果显示，间接效应 CI 为 [–0.43，–0.18] 不经过 0，中介作用显著；直接效应 CI 为 [–0.48，0.01] 经过 0，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对个体身体欣赏的影响都是通过负面评价恐惧起作用。

三、讨论

（一）人口学变量与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及身体欣赏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行为平均得分为 7.40 分。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平均得分为 37.54 分，且女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显著高于男生。关于性别在负面评价恐惧的差异目前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许多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消极影响，还需日后再验证。大学生身体欣赏水平平均得分为 37.76 分，说明部分大学生较能正确认识自我体像，对自我身体接纳度较高。

（二）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及个体身体欣赏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性

本研究显示，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能负向预测个体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网络已成为个体展示表达自我的重要平台，也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社交网站上呈现的信息大部分经过美化更具有“吸引力”，使个体持续接收社会理想化的体像信息，容易产生上行比较。负面评价恐惧源于先天与后天经验。家庭教养方式、自尊等因素长期作用下能对个体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已有研究显示，负面评价恐惧高的个体，更容易投入网络营造的隐秘的安全的社交环境 [7]。在高频率的手机使用下，上行比较下对自己外貌的负面评价更多，产生他人对自己消极评价的预期。

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呈显著负相关，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能负向预测个体身体欣赏水平。社交网络通过算法推送的信息及相关评论区内容虽然有一定的筛选审核机制，但仍充斥大量单一化、畸形的审美观念，这些内容刻意引导或放大观看者的社会比较倾向，从而引发其焦虑。已有研究表明，频繁使用与外观呈现密切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更容易使用户产生负面身体意象 [8]。

负面评价恐惧与身体欣赏呈负相关，负面评价恐惧负向预测个体身体欣赏水平。人际交往中，负面评价恐惧高的个体更容易感觉到他人正在评论自己，容易对自己的外貌体形产生不满意，在消极的认知偏差下，导致个体身体欣赏水平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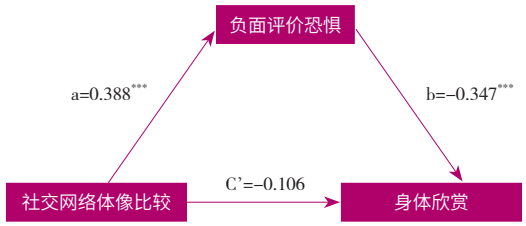
（三）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身体欣赏的中介作用

负面评价恐惧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其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见表 1、图 1）。已有研究显示，负面评价恐惧与个体的体像烦恼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9]，而社会网络体像比较也是引发个体体像烦恼的因素，与个体身体欣赏水平显著相关。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完全中介作用能预测大学生的体像欣赏水平，支持了以往研究的观点。社交网

络体像比较行为越频繁，其负面评价恐惧越多，从而降低了个体的身体欣赏水平。

表 1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身体欣赏的中介作用分析

项目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总效应	−0.53	0.12	−0.77	−0.29
直接效应	−0.23	0.12	−0.48	0.01
间接效应	−0.30	0.06	−0.43	−0.18



注：***p<0.05。

图 1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和身体欣赏之间的中介模型

（四）启示及建议

“自我认同”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都应不断增加个体的经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身体自我是大学生自我的重要成分，对自身过多的负面评价容易引发心理问题。身体欣赏作为一种积极的身体意象，不仅体现个体对外观的看法，更是对自我身体的尊重、赞赏。正确认识自我的身体，接纳尊重自己的身体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体现，能改善个体情绪以及心理健康状态。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高校要多措并举，关注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偏差现象，提升大学生身体欣赏水平。通过观念引导、知识传播、技能训练、实践体验培养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大学生。

一是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进行社交网络体像比较。首先，引导学生使用和搜集信息时，要多关注能促进身体欣赏、鼓励健康的多样化身材的图文及视频等身体积极内容。通过关注身体积极内容，以正面的案例强化正确的健康观念。另外，社交网络作为大学生展示自我的阵地，要引导大学生勇于展现自我真实的身体形象，更多表现自我“生命力”和“真实感”，而不是过多地表现“滤镜”下的偏离真实的自我形象呈现。同时，可以给学生推荐注重内在成长性而非注重外观的社交媒体平台。高校要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培养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理解、分辨、运用、评估的能力，不盲目跟风，通过独立思考与分析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二是要树立大学生正确的健康观念。追求美、认识美能帮助人更好地热爱生活，正确的审美观、健康观能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积极的身体意象，具有高身体欣赏水平的个体，能更好地进行自我调适，缓解身体不满意等引起的焦虑、抑郁情绪。高校要通过营造美的环境、传播美的观念、展示美的作品，通过环境育人、课堂育人以及活动育人相结合，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美、自然美、自信美的审美取向。三是树立大学生的自尊自信。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将学生正确自我认识的培养贯穿全过程，不仅要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等课堂主渠道影响学生，更要通过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良好互动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大学生对于自我的积极体验，增强其自信心，降低其负面评价恐惧。训练学生将人际互动中的评价与反馈，赋予更多成长性的积极意义的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负面评价恐惧在社交网络体像比较与身体欣赏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通过降低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可以减轻社会网络体像比较行为对个体欣赏的影响，提升个体身体欣赏水平，从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取样自单一职业院校，其在生源背景、专业培养模式等方面与普通高校存在差异，限制了研究结论向更广大大学生群体的推广。其次，采用横断面数据难以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无法明确社交网络体像比较、负面评价恐惧与身体欣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影响路径。基于此，未来研究应开展分层抽样的大样本调查，并结合纵向追踪设计，以增强结果的普适性。同时，可引入质性访谈等方法深入探究个体的主观体验，在此基础上开发并验证针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具体心理干预方案，为有效提升大学生身体欣赏与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1] THOMPSON J K, HEINBERG L J, ALTABE M, et al. Exacting beauty: theor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body image disturbanc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2] 马骊，张玉芳，秦荣臻，等．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进展 [J]. 职业与健康，2024, 40(07): 1000−1004.

[3] 姚良爽，连帅磊，孙晓军．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 26(04): 780−783, 787.

[4] 刘慧莹．社交媒体使用对年轻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3.

[5] 魏祺，孙晓军，连帅磊，等．社交网站使用对体像满意度的影响：体像比较的中介作用和自我客体化的调节作用 [J]. 心理科学，2017, 40(04): 920−926.

[6] 徐扬，刘海燕，刘慧敏．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并行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4, 32(06): 926−933.

[7] 徐扬，刘海燕，刘慧敏．大学生（下转 240 页）

数字化赋能高校学风建设途径探究

宋伟皓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校学风建设正经历系统性重塑，在迎来精准化、智能化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需应对学术伦理、数据管理与技术运用等多重考验。当前，高校学风建设工作面临传统积弊与时代新题交织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学生学习目标模糊、方法失当等固有难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受限于沟通壁垒与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各育人主体间协同不畅，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尤其在学术规范引导、学业过程监测与个性化学习指导等方面，凸显出日益强烈的数字化、智能化需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五维数字化”学风建设模式，紧扣学生实际需求，推动育人机制转向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现代化范式，为涵养优良学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高校学风建设；数据驱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建设优良学风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高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和学习方式发生巨变，数字技术影响着学习生活各个方面，传统的学风建设模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高校学风建设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基于此，高校需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将数字技术运用在学风建设中，构建科学有效的学风建设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一、高校学风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学生目标意识淡薄，学习方向有待明晰

一方面，部分学生未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欠缺自主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业规划的意识和能力[1]；另一方面，在高考结束后学生经历了由“电子产品使用管控”到“电子产品使用自由”的快速转变，致使部分学生迅速沉迷其中。此外，过往取得的成绩会成为个别学生的“沉重包袱”，难以适应大学阶段面临的全新竞争，甚至会沉迷于游戏所构建的虚拟环境逃避现实压力，导致学业出现危机。

（二）学生学习方法欠佳，学习投入亟待提升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普遍存在听课效率低、课后复习不及时、依赖考前突击等问题，未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随着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部分学生产生了对 AI 工具的依赖，缺少独立思考，未能真正掌握知识，学习效率低下。

（三）育人体系协同不足，教育合力尚需强化

除去学生的主观因素外，高校育人体系各环节缺少协同联动，也是导致学风建设成效不足的主要因素。

（上接 239 页）

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并行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2024, 32(06): 926−933.

[8] FAELENS L, HOORELBEKE K, CAMBIER 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agram use and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 2021(04): 100121.

[9] 冯刘沙 . 社交网络体像比较对女大学生外表焦虑的影响 [D].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 , 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课题“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弹性干预的研究与实践”（Z−A20221012）；2023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对阈下抑郁大学生干预的研究与实践”（2023KY1423）；2023 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心理育人的实践研究”（2023SZ087）；2024 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自助式认知行为疗法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中的研究与应用”（2024LSZ034）。

（作者：石怡，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讲师；通信作者黄辛，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基础部副教授；艾靖爵，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讲师；李武恒、石子帆，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辅导员难以及时获取学生课堂表现、考试成绩等信息；家长较难了解学生在校的真实状况，难以提供有效督促。此外，对企业、校友等优质教育资源利用不足，致使学生职业规划缺乏明确方向，在面对未来就业市场时准备不足，竞争力下降。

二、学风建设的数字化需求分析

（一）学术规范性检查与学术不端防范需求

部分学生过分依赖于AI工具，逐渐放弃独立思考，甚至出现了完全借助AI工具完成课程报告、学术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需进一步加强引导，明确AI工具正确使用范围、规范使用方式，依托制度约束引导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培养学术素养。

（二）学生学习全过程管理的动态监测需求

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动态监测，统筹协调各部门资源，采集学生的课堂表现、自主学习情况、平时测验成绩等数据，了解学生学习状态，及时对学业困难学生进行精准预警和帮扶。与此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通讯手段，打破家校联系壁垒。

（三）个性化学业指导与智慧服务需求

借助数字化工具为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推送适当的学习资料与学业规划建议，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指导；利用数字工具整合学习资源，结合新媒体技术提供在线学业指导与答疑服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发挥教师、校友、朋辈引领作用，提升学习资源利用效率。

三、“五维数字化”赋能高校学风建设

结合当前学风问题与数字化学风建设需求，通过实现数字化工具规范、数字化学业监测、数字化家校协同、数字化资源整合、数字化互动答疑，形成“五维数字化”学风建设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数字化工具规范，筑牢学术诚信根基

一是开展数字化工具使用教学。引入数字化工具使用教学，为学生提供网课视频、使用教程等线上学习资源，邀请专业教师、优秀学生开展专题分享，通过互动交流帮助学生掌握数字化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此外，组织AI工具应用能力竞赛，提升学生的AI工具使用能力，养成创新意识。

二是强化学术规范教育。将学术诚信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每学期开展学术诚信主题班会、主题团日活动各一次，通过对学术不端警示案例以及学校相关纪律处分规定的宣传教育提醒学生遵守学术规范；在期末考试前组织全体学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营造风清气正的学习氛围和“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不想作弊”的学术诚信环境。

三是加强学术不端检测。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学生行为，着力构建覆盖多类型、学习全过程的学术诚信监督体系，大力防范、检查、整治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建立学术诚信数据库，对检测结果和违规记录进行归档管理，定期生成学术规范性检查统计报告，实现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转变，维护学术诚信良好氛围。

（二）数字化学业监测，实现精准预警干预

一是统计学习行为数据[2]。加强辅导员与任课教师的沟通，及时获取学生课堂出勤、测验、作业完成情况等数据，为学生制作课堂表现档案，对连续出现两次以上或累计三次以上缺勤的学生采取监督措施，及时干预潜在学业问题；通过定期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每天手机使用时间及各应用使用时间占比，分析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通过一对一谈心谈话，对学习投入度较低的学生进行督促；加强对自习的管理，在学生养成自主学习意识前，严格晚自习考勤，通过对学生出勤率的监测，及时发现缺勤与迟到早退现象，借助纪律约束逐步引导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的意识，营造集体良好学习氛围[3]。

二是严格过程考核管理。一方面，利用晚自习时间组织周测、月考，根据课程重要知识点、考点编制试卷，严格测试流程，要求学生限时、规范作答，测试结束后记录成绩，对学生错误率较高的题目进行集中答疑，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纠正不良学习习惯。另一方面，增加学业预警频次，制定“期中期末双预警制度”，为学生调整学习状态提供充足时间，实现学业问题的早预警、早干预。

三是分析成绩变化趋势。为学生建立学业成绩档案，及时分析、了解学生学习状态，以此为基础构建动态更新的个人学业画像，依托数字化工具为每名学生绘制每学期平均绩点、各科目阶段性考核成绩的走势曲线，构建多维度数据分析体系，激发学生自我调整、自我激励的内在动力，为辅导员开展精准化学业指导提供有力保障。

（三）数字化家校协同，构建共育沟通桥梁

一是实现学业数据共享。与家长共享学业数据，提供可视化的学生成长报告，帮助家长及时发现学生的进步与不足，便于家长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情感关注以及合理的学业规划建议，避免因信息不对等导致家长与学生的沟通出现矛盾，增强家庭教育的持续性，激发家长参与大学生学业教育的主动性。

二是搭建家校交流平台。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学风建设，充分发挥家长育人作用[4]。通过微信等应用程序建立家长联络群，向家长同步学校学籍管理制度、放假安排、考试安排等重要信息，打破信息隔阂。每学期召开一次线上家长会，基于学生所处成长阶段的特点，梳理学生当前在学业、生活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为家长提供合理化建议，引导家长帮助学生作出切合实际的学业规划。此外，在推进普遍宣讲的同时开展个性化指导，及时提醒家长关注学生心理状态，与家长共同分析学生所面临的成长困境，共商解决方案。

三是创建互动合作场景。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向家长展示学生校园生活，提升教育过程的透明度，增强家长在学生大学生活中的参与感；在

每学期结束前向家长发放调查问卷，吸取家长对于学校发展的可行性建议，及时完善学风建设工作模式，提升育人实效；假期组织“亲子打卡”线上活动，设置“共读一本好书”“运动健身”“外出游玩”等专题打卡活动，帮助学生在假期养成自律生活习惯，增进与家长的情感交流[5]。

（四）数字化资源整合，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一是共享专业就业数据。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专业认同感教育，定期发布行业前沿信息，引导学生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充实知识储备，不断增强就业竞争力；系统梳理各专业近年来不同学习层次学生的就业、升学去向，使学生直观了解当前就业形势，对自身的未来发展进行理性研判，进而选择正确的努力方向，明确学习目标。

二是充分发挥校友企业育人功能。利用校友教育资源优势为学生开展专业学习指导与职业引航教育，创立“校友在线讲堂”，邀请校友通过直播、视频会议等形式开展讲座、交流会，为学生搭建与校友交流互动的平台，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前景、招聘需求等信息，引导学生增强求职本领。与优质用人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邀请企业开展“云开放日”“线上实习”等活动，为学生创造了解未来工作环境的宝贵机遇；邀请企业招聘负责人召开线上宣讲会，为学生详细讲解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内容，力争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三是创建线上学习资源库。利用网盘、云盘等数字化工具为学生汇总、整理课程学习资料，上传电子版教材、习题册、网课视频、重要知识点汇编等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减少获取学习资料的时间成本，避免因花费过多时间筛选无效学习资料而影响学习效率；为学生开辟线上反馈渠道，收集学生对学习资料的需求，动态更新学习资料，保证所提供的学习资源的实效性与准确性；开展“学霸笔记在线分享”活动，评选“最美笔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同时将优质笔记上传至在线资源库，为学生期末复习提供有效参考。

（五）数字化互动答疑，保障教学交互实效

一是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利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大对优秀学生的宣传力度，分享先进事迹，为学生提供可供参考的奋斗道路，引导广大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营造见贤思齐、奋发向上的优良学风[6]。充分发挥朋辈导师力量，组织开展学业和科创朋辈讲堂，由优秀学生向同学们讲解课程学习方法与科创竞赛注意事项，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智慧。定期召开“优秀学长学姐经验分享会”，向低年级学生传授学习、科研、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宝贵经验，赓续优良传统，涵养学习志趣。

二是打造在线答疑平台。创建 AI 数据库，利用课程学习资料、专业常见问题等内容对 AI 工具进行数据训练，开发专属的教学大模型，为学生提供问题答疑、作业批改等服务，提高学习效率。借助 AI 工具分析学生的学业情况、在校表现、性格特点等信息，形成动态更新的“数字生涯画像”，为学生提供精准化职业生涯规划建议，帮助学生匹配适合岗位，实现个人价值。

三是探索师生深度互动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教师、辅导员、学生、家长间的交流联系，构建多方交流沟通网络[7]。打造“名师直播间”，定期邀请任课教师、辅导员围绕课程学习、学业规划、日常管理等内容进行直播授课，通过直播连麦、弹幕互动等方式解答问题，提高服务效率。创建“线上工作坊”，聚焦学生提出的特定需求，提供专属答疑服务，实现个性化辅导。形成智能反馈机制，学生、家长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等方式提出问题，公众号运营人员精准解决个体关切，从中了解学生、家长对于学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而不断优化工作方法，增强学风建设实效。

四、结语

本文基于高校学风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系统分析了学术规范引导、学业过程监测与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对数字化技术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以“五维数字化”为核心的学风建设模式。通过数字化工具规范、学业监测、家校协同、资源整合与互动答疑五个维度协同推进，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育人机制，切实提升学风建设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未来，高校需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与学风建设的融合创新，推动学风建设向智能化、个性化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南坤，张钰，麻帅．从认知到实践：大学生优良学风建设路径的构建——以 H 大学为例 [J]. 大学教育，2024(04): 1−5, 17.

[2] 徐岳．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精准学风建设实践研究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4(10): 123−126.

[3] 初金哲，周丹．数字技术赋能高校学风建设的价值、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 [J]. 长春大学学报，2025, 35(02): 58−63.

[4] 霍霄，李冬梅．新时代下学风现状的分析与培育优良学风的创新性举措 [J]. 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24, 41(12): 54−58.

[5] 赵云龙．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学风建设具体策略探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 33(19): 63−65.

[6] 程琼，刘宏达．高校学风建设的数字赋能及其实现路径 [J]. 高校辅导员，2022(05): 67−71.

[7] 杨沐霖．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学风建设探析 [J]. 中国报业，2024(04): 122−123.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下高校劳动教育路径探析

张　楠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聚焦高校学生劳动教育问题，深入挖掘劳动教育“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下大学生劳动教育新路径。通过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理念、打造高质量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形成校内校外协同运作的劳动育人机制等路径探索，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升高校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实现知识理论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劳动育人新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高校；劳动教育；“五育并举”

一、高校劳动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

劳动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在我国现代教育中，高校劳动教育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该指示首次把生产劳动纳入学校培养方案，确立为学校的正式课程。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以强调体力劳动为主要特点，对其“综合育人”效果重视不够。1978—1982年，高校劳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更加强调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另一方面，提出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1]。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方针政策，顺应了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后，社会实践逐渐成为高校贯彻落实劳动教育方针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高校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要求将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实验、实习、调查等实践教学环节中，这一举措与国家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要求相吻合。进入21世纪，劳动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机，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劳动教育成为继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之外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

由此可见，高校劳动教育的发展与其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息息相关，高校劳动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既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也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那么，面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时代要求，如何在把握教育本身内在发展规律的同时，聚焦劳动教育发展的内驱力量，挖掘其内在的教育规律和内涵，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新时代教育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具有讨论和研究的价值。

二、高校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协同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3]。劳动教育作为一项综合性、实践性的教育活动，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与生命、知识、道德和审美四个发展维度息息相关，而这四个维度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是辩证统一的，因此，“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赋予了高校劳动教育新的内涵，准确把握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劳动教育与修德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精神的迫切需求，这与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相辅相成，换言之，培养学生高素质健全人格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教育的应有之义。

当今，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一些极端思潮，有人奉行“一夜暴富”，妄想不劳而获，通过各种“噱头”夺人眼球，做着“流量变现”的美梦；还有人在各行各业的“内卷”中无所适从，奉行“奋斗无用论”，最终选择彻底“躺平”，从此

过上“佛系”人生。可见，劳动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对劳动技能、体能体力等方面的训练，还应当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经由劳动所达成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方面。要鼓励青年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在劳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各种劳动实践中，享受劳动的成果和喜悦，从中获得人生的真谛，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不怕吃苦、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劳动价值观。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于青年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其步入社会、形成健全人格、追求“真善美”优良德行的基础。

（二）劳动教育与启智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该是劳动性和教育性的统一，人类的大多数知识都来源于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大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得，不仅来源于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还源自劳动过程中积累的实践认知。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正是在体力劳动过程中形成了我的学生们的最为重要的智能方面的品质——好奇心、求知欲、思想的灵活性、鲜明的想象力。”[4]

一方面，实践活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洞察力，敏锐的洞察力是人类思维变革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亲身参与劳动活动，学生获得了主动观察身边事物的机会，产生了浓厚的求知欲望，获取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劳动实践有利于启发大学生的科技创造力，促使学生将已掌握的科学理论知识与当下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展现和释放，一次次的“头脑风暴”孕育出多种多样的“巧思”，这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反过来又提高了学生的劳动效率，高效的劳动与积极的探索形成良性循环。

（三）劳动教育与健体

身体健康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劳动教育必须将强健学生体魄纳入其教育要求和目标中，只有“体劳结合”，学生才能健康成长。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大学生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动手实践机会。一方面，适当的劳动需要耗费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对于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大脑发育、增强新陈代谢都具有良好的作用。学生在劳动训练过程中，可以增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提升精神风貌，塑造年轻、活力、向上、阳光的青年形象。另一方面，规律的劳动节奏和多样的劳动环境，可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意识，在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中形成规律的作息，良好的运动习惯，强大的抗压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四）劳动教育与审美

“美感”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更高的精神体验。劳动虽然起源于体能消耗，但终于人类对于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审美追求。学生在接受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体验着劳动之美，同时也在创造着劳动之美[5]。

开展劳动实践的过程，正是学生将自己的审美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为了提升劳动成果的美感，学生往往发挥个人审美的创造力和才能，使得劳动成果被赋予了劳动者个性化的内容。相比于机械性的体力消耗，劳动教育与美育相结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增强其对劳动成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学生在彼此的审美交流过程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综上，无论是德育、智育、体育还是美育，都与现实的生产、生活劳动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启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应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改变德智体美教育过于单一化的形式，增强大学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形成知识理论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新路径。

三、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活依托均源于人的劳动活动。第二，劳动是人类各种社会关系形成、发展和维系的基础和前提，人类通过参加劳动活动，不仅与自然产生联结，还互相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关系。第三，劳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本质力量，社会的进步不可能靠人类的意志和想象，而是靠其实实在在的劳动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当代高校实现劳动育人目标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认为，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教育活动，必将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唯有将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学生才能获得全面的解放。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从而有机会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当前的高校劳动教育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劳动者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在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新路径。

第一，把劳动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的全体系、全过程，与德、智、体、美教育融合发展。高校作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实施主体，必须结合自身办学优势和特色，系统设计出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对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课时安排、过程考核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予以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首先，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的协调关系，设置劳动课程要将“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和劳动铸魂等基本理论”与“参加实践活动，掌握多样化劳动技能，培养良好劳动习惯”结合起来，二者兼顾，才能真正实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本领”的劳动教学目标。其次，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劳动教育不仅可以通过大

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劳动，传授其一系列的生活实践技能，还可以通过专业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生产、服务、管理技能。最后，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要注重结合当下社会的新产业、新领域，挖掘新的劳动实践资源，与时俱进，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切实增强学生的创造性劳动思维和劳动能力。

第二，组建优秀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统筹校内校外高质量育人资源，形成劳动教育育人文化。首先，将劳动教育培训纳入高校教师培训中，通过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考核等多方面的专项培训，提升劳动教育专任教师的劳动意识和观念，增强其开展劳动教育教学的专业性和主动性。其次，除了依托校内教师教学资源，高校劳动教育还可以邀请社会各行业的优秀企业导师对大学生的劳动实践活动予以指导，通过搭建多行业实践基地和平台，给学生提供更多适应社会劳动生产的实践机会，有利于学生将学到的劳动理论知识运用于真实的生产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提升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效性。最后，在培养专任和行业兼职教师的同时，高校还要注重提升全校教师的劳动教育意识和思维，将劳动教育元素纳入各门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打造“五育融合”的“三全育人”新格局。例如，在音乐教学中，寻找歌颂劳动精神和劳动模范的音乐素材作为教学资料；在思政课程中，插入更多以劳动元素为核心的英雄人物故事；在体育教学中，开展一些经由人们生产劳动活动衍生而来的体育运动项目，挖掘这些项目背后体现的劳动精神和竞技精神。

第三，培育高校、家庭、社会协同管理的劳动教育实施机制。作为一项系统综合的教育工程，劳动教育应当建立高校、家庭、社会多方协同、共同管理的育人实施机制。一方面，家庭在大学生劳动教育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家庭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引导，营造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家庭氛围，家庭可以为大学生衣食住行提供多种多样的劳动实践机会，通过亲自动手、积极参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劳动意识和习惯。具体而言，可以将每位大学生寒暑假在家里的劳动情况以及生活技能获得情况，分“优秀、良好、合格”三个等级纳入每一学年学校的劳动教育档案之中，以保证每位学生均能通过家务劳动实践，在每学年获得一至两项新的生活劳动技能。另一方面，社会也应积极承担大学生劳动教育责任。政府要统筹协调企业、园区、社区等多元主体，搭建覆盖生产劳动、服务劳动、创新劳动的实践平台，引导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力所能及的社会生产劳动以及服务型劳动，尤其鼓励学生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利用新兴技术开展各类生产实践。通过与普通劳动者一起参与生产活动，增强大学生责任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为步入社会、求职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劳动教育并非仅局限于单一化、固定化的发展路径，在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劳动教育”等总的育人理念基础上，不同高校应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定位，形成具有其发展特色和优势的劳动教育模式。

综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深刻影响着我国青年一代精神风貌和综合实践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劳动育人成效显著，但部分高校仍存在劳动教育理念弱化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展现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一方面，劳动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向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引导学生认清劳动本质，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国家高质量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这就对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高校开展劳动教育，必须立足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战略需要，推动劳动教育从传统体力劳作向创造性劳动、创新性实践拓展，使其契合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 汪萍 . 高校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与进路选择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 2020(12): 12−16.

[2]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 2018−09−11(01).

[3]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EB/OL]. (2020−03−20)[2025−11−04].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4] 苏霍姆林斯基 . 育人三部曲 [M]. 毕淑芝 , 译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8: 133.

[5] 赵荣辉 . 劳动教育的内涵、主旨与功用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24, 44(05): 3−6.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教务处）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呈现出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翟洪利

摘要：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高职院校毕业生数量逐渐增多，而初涉职场的高校毕业生思想单纯、防范意识淡薄、求职经验不足，再加上一些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聘用毕业生的过程中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对于毕业生而言，就业权益的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入手，在初步解析就业权益保护呈现问题的前提下，从多角度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探究，提出了有效开展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的建议，力求能提升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工作的整体质量，让毕业生能和谐稳定地参与到岗位工作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权益保护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的保障关系到学生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学生的未来发展，只有能保障学生权益，促使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以学生的力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维护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在当前高职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中，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工作受到冲击，学生就业风险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制约了毕业生的有效就业和良好发展。鉴于此，高职院校在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还应该关注毕业生就业权益的保护，使毕业生能积极投身社会建设，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一、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学生就业权益被侵犯的问题比较明显，并且这些问题从不同的维度表现出来。

（一）传销陷阱，威胁学生安全

高职院校毕业生因社会经验不足、辨识能力较弱，在求职过程中易陷入传销陷阱，这会严重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威胁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具体分析，一些隐匿性比较强的传销组织常以诱人工作机会为幌子，利用毕业生急于就业心理，采用虚假宣传、夸大收益等手段诱骗其加入[1]。一旦毕业生在求职阶段没有系统地鉴别而进入传销性质的工作，他们会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强制要求发展下线，甚至会要求毕业生不断拉人头获取所谓“收益”。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个别隐匿性比较强的传销活动，会使毕业生经济上遭受损失，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无实际回报，更严重的会威胁其人身安全，不利于大学生顺利就业，限制大学生的职业发展。

（二）滥用试用期，违法违规用工

在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层面，部分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会滥用试用期制度，也会使毕业生的就业权益受到侵犯。一方面，一些企业随意延长试用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所设定的试用期远超法定时长，使毕业生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不稳定工作状态，无法享受正式员工待遇，却承担与正式员工相近甚至相同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所提供的试用期工资过低，仅支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远低于同岗位正式员工工资水平，甚至不提供必要福利待遇。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在招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过程中，会在试用期满后以各种不合理理由辞退毕业生，使毕业生群体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应有回报，严重损害毕业生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权益，对职业规划和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三）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

在毕业生就业方面，一些企业为逃避法律责任，不与高职院校毕业生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造成毕业生劳动权益缺乏法律保障，在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在实际就业市场中，一些个体企业或小微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在招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过程中可能会随意变更劳动报酬、工作岗位等，造成毕业生难以维权。同时，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工资现象，以资金周转困难、经营不善等为由，长期拖欠毕业生工资，甚至恶意欠薪，从而影响毕业生合法权益的维护，不利于毕业生有效就业，甚至会对毕业生工作生活产生消极影响[2]。

（四）入职前违规缴纳各种费用

一些企业在招聘高职院校毕业生过程中，会以各种名义要求高职院校毕业生入职前缴纳费用，如培训费、服装费、押金、保证金等。这些费用缴纳缺乏合理依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也有一些企业以虚假承诺诱导毕业生缴费，如承诺提供专业培训、优质工作岗位等，但毕业生缴费后，若因各种原因未能入职或对企业不满意要求退款，企业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使毕业生遭受经济损失。此外，企业在毕业生招聘环节的违规收费行为，会破坏公平就业环境，增加毕业生求职成本，加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经济负担，也会影响他们顺利就业，不利于毕业生合法权益的保护。

（五）以高薪为诱饵虚假招聘

从高职院校毕业生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看，一些不法机构或企业以高薪为诱饵进行虚假招聘，吸引高职院校毕业生应聘，他们甚至会在招聘环节夸大岗位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虚构企业规模和实力，制作虚假招聘信息，误导毕业生。这就造成高职院校部分信息辨别能力不足的学生可能会被高薪吸引，投入时间和精力应聘，甚至在应聘环节可能被要求缴纳各种费用，或参加高价培训课程，最终在实际入职后发现自己所应聘的岗位根本不存在，或者一些岗位实际情况与宣传严重不符，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相差甚远，造成毕业生的心理遭受巨大打击，不仅会侵犯毕业生合法权益，也会影响毕业生顺利就业[3]。

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问题解决办法

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高校的支持，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应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强权益保护，减少毕业生就业风险，使他们在毕业后能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

（一）健全立法保护，严格执法

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中高职院校毕业生权益保障方面的内容已经比较完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往往会面临新的问题。因此在开展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保障的过程中，应与时俱进地对毕业生权益加以保障，并严格执法，促进各项法律法规深入落实，使毕业生权益能得到有效维护[4]。然而，在推进立法保护工作中，法律的静态文本与动态执行之间往往会出现偏差，因此在严格执法过程中，必须明确执法主体的权责清单、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确保每一项规定都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具体分析，我国毕业生就业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但是在实际执行方面往往缺乏细节指导，比如针对用人单位设置职业院校毕业生歧视性录用条件行为，现行法律仅规定“不得设置妨碍平等就业条件”，却未明确处罚标准与执行主体，会影响法律的有效执行。为弥补制度短板，可以根据工作需求，系统化地推动出台配套的行政裁量基准，明确不同违法情形的处罚梯度与责任部门，确保能系统地消除执法盲区。因此在开展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工作的过程中，建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法律条款，细化对就业歧视行为的处罚措施，将职业院校毕业生纳入“同工同酬”保护范围，明确企业若未提供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同等薪酬待遇，需按差额支付赔偿金。同时，为了保障各项法律法规得到系统性的贯彻落实，可以建立区域性就业权益保障联动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职业院校毕业生集中就业区域，由省级人社部门牵头制定《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实施细则》，逐步将企业劳动纠纷率、社保缴纳完整性等指标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连续两年评分不达标的企业实施融资限制、政府采购禁入等联合惩戒，进而使企业能主动参与毕业生就业权益的保护工作，减少毕业生权益侵犯问题的出现。

（二）改进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优化维权程序

当前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工作中，劳动仲裁能很好地保护毕业生的权益，但是部分地区劳动争议处置时间长、手续烦琐，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毕业生维权的积极性。具体分析，职业院校毕业生劳动争议案件平均处理周期相对较长，无法促进权益保障工作系统落实，也会对毕业生维权工作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当着力构建专业化、快速化的劳动争议处理通道，针对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特点，简化立案审查环节，推行线上预约、远程调解等便民措施。针对毕业生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高职院校在开展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建议构建“调解—仲裁—诉讼”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企业层面，强制要求企业设立内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对薪资纠纷、试用期违法等简易案件实施高效率调解；在区域层面，则可以发挥市级人社部门牵头作用，逐步建立跨行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整合工会、行业协会、法律援助机构资源，对群体性争议案件快速仲裁，维护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层面，从劳动争议处置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毕业生权益保障工作中，可以适当推行“劳动争议案件绿色通道”，对涉案金额低于5万元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针对性、便民性仲裁，优化仲裁程序，同时引入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程序引导，帮助毕业生清晰了解各环节时限与所需材料，减少毕业生维权的经济投入和精力投入，降低毕业生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风险。

（三）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宏观调控

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情况进行分析，能看出现有就业服务平台存在信息碎片化、服务割裂化问题，不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权益意识，会对权益保障工作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从保护高职院校毕业生合法权益的视角，高校在开展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建议构建“政府—企业—院校—毕业生”四方联动综合服务平台，从宏观视角为毕业生权益保护的开展提

供坚实的保障，降低大学生出现权益侵犯风险的概率。其一，学校可综合分析毕业生权益保障的需求，引入智能匹配系统，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毕业生专业能力、求职偏好与企业岗位需求，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同时学校还可以嵌入合同条款比对功能，自动识别试用期设置、薪资结构等关键条款中的潜在风险点，增强服务的精准性和系统性。其二，结合毕业生权益保障的要点，可以构建风险预警系统，整合工商注册、劳动仲裁、司法判决等数据，对存在欠薪记录、劳动纠纷的企业自动标注风险等级，切实提升权益保护工作的综合发展成效。此外，系统还应定期生成就业权益监测报告，为政府部门调整宏观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其三，应面向就业权益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建构和应用政策执行系统，将基层就业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等 12 类政策纳入平台，实现“申报—审核—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减少毕业生的压力，使毕业生在就业阶段可以借助平台的支持，更好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为大学生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从侧面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增强用人单位法律意识，深化改革

中小企业劳动法律意识淡薄，是权益侵害高发区，要加强用工权益保障宣传，提升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深化用人单位改革，使毕业生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保护。一方面，应组织企业负责人参与培训，将劳动法律法规纳入企业工商年检前置程序，未完成规定企业暂缓年检；培训内容应突出职业院校毕业生用工特点，如学徒制协议、实习转正规范等，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从毕业生权益保障视角，应建立企业用工风险评估机制，由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用工制度进行合规审查，出具包含法律风险点、整改建议的《用工健康诊断报告》，与此同时可以积极鼓励企业根据诊断报告主动优化管理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然后将整改成效作为后续评估的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在权益保障工作中，可以积极推行“用工合规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对连续三年无劳动纠纷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政府采购加分等激励，保障和减少劳动纠纷问题，提升权益保护工作的效果，为大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强化高校教育职能，增强毕业生法律意识

职业院校法治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问题，因此为了全面优化毕业生权益保护工作，高职院校就应该主动承担教育职能，增强毕业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权益维护能力和法律意识。在实际开展毕业生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构建“三位一体”法治教育体系[5]。第一，针对毕业生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的问题，高职院校可以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纳入专业核心课程，开发“法律知识 + 典型案例 + 模拟仲裁”三维教学模块，对毕业生群体实施比较专业的教育指导，增强毕业生群体的法律保障意识。第二，注重强化实践教育，从毕业生权益保护的层面，逐步建立校内劳动争议模拟法庭，联合法院、仲裁机构开展真实案件庭审观摩，要求毕业生完成至少 2 次模拟仲裁实战训练，使学生能对权益保障产生全新的理解，全面增强大学生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第三，高职院校在开展毕业生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应注重服务延伸，设立毕业生就业法律援助中心，配备专职律师提供合同审查、纠纷咨询等服务，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实行法律援助全覆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建设和发展中，学生就业权益的保障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影响学生顺利就业，甚至会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在高职发展过程中应综合采用多种措施，从不同的方面保障毕业生权益，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顺利就业，使他们能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吴婷婷，张森林．新形势下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J]. 法制博览，2024(11): 136−138.

[2] 安健．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法律属性研究——兼论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 [J]. 法制博览，2023(18): 127−129.

[3] 麦智杰．灵活用工趋势下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探析——基于毕业生就业协议适用 [J]. 教育教学论坛，2023(03): 37−40.

[4] 李英儒．高职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及劳动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探讨 [J]. 就业与保障，2022(01): 94−96.

[5] 徐颖．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研究 [J]. 中国大学生就业，2021(24): 40−44.

（作者单位：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梁惠媛

摘要：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长，就业压力持续攀升，大学生就业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宏观上体现为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与高校培养机制同社会需求脱节的困境；微观上则表现为毕业生个体在就业认知与就业能力方面亟待补齐的短板。社会工作以利他主义为基本价值，坚持助人自助，通过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专业工作方法，帮助大学生实现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激发主体潜能，促进大学生个体层面的就业能力提升和资源获取，推动群体互动、社会环境等支持体系的构建，进而有效增能，有助于实现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社会工作；增能；大学生就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长，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1222万人，同比增长43万人，就业压力持续攀升，大学生就业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基本原则为助人自助[1]。增能理论是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内容。增能理论认为，尊重个人、每个人具有自我发展的潜能，并从人与环境互构的角度推动实现人与环境的良好匹配，进而实现生存、发展和再生产[2]。大学毕业生在社会经验、就业能力、就业心态方面都处于弱势，但是他们有较强的个人发展潜能，所以在增能理论视角下，通过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意义重大。

一、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增能理论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因为其个人潜力没有被充分激发或者外在环境限制了主体的潜能。他们与周围环境互动过程中缺乏能力或者资源，从而无法与社会环境产生良性互动，陷入“失能”的恶性循环中。由于社会就业环境的严峻与个人能力的不匹配，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缺乏一定的能力或资源，无法顺利适应就业环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从而形成就业“失能”[3]。

（一）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不均衡、差异大，出现了“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双重困境。

从就业行业分布来看，根据麦可思2025年就业蓝皮书2024届本科毕业生行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的吸引力较弱，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处于现代化升级发展阶段，需要专业人才，但受限于职业认知偏差、薪酬水平、行业配套、职业发展等因素，毕业生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相对较低。第二产业供需结构性矛盾显著，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就业中更加看重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制造业、建筑业等产业就业规模较大，对大学生就业吸纳能力较强。但是传统行业因转型较慢，资源滞后，难以形成吸引力，形成“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情况。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医疗等第三产业行业规模较大、岗位类型多样，吸纳了大量毕业生。但是由于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和就业保障限制等因素，第三产业吸纳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呈现不稳定态势。

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毕业生就业主要地区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人数比例超过全部应届毕业生比例的一半，且就业人数远高于本地区培养人数，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就业比例低且向东部地区外流情况较多。从毕业生就业城市分布情况来看，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五线城市就业的累计比重较低。从整体发展来看，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分布与就业地域配置与流动方向上的不均衡依然显著。

（二）高校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脱节

部分大学生在校园中学习的专业知识和综合技能较为落后和单薄，其内容与实践、市场所需相脱节。部分学生的专业学习以应试为主要目标，缺乏专业的

深入探究与实践锻炼。多数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主要是由兼职老师承担，就业工作专职人员少，就业指导教学和研究的时间、精力有限，同时缺少系统的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学科知识，难以形成教育专业化体系。而且就业指导老师多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实际的就业求职经验和职场经验。

（三）大学生就业认知与就业能力不足

就业期望较高，当面临工作现状不匹配时容易陷入就业失落。“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学生工作经验丰富，在校期间多次拿奖，足以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心仪工作。而当真正面临就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认为优秀的履历跟企业要求完全不搭边，就业期望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偏差，感觉自己怀才不遇，甚至怨天尤人。

就业压力过大，陷入过度焦虑。有的学生在了解到就业市场情况时，感受到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情况感到担忧，既想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又担心自己的条件不够，但是对于就业形势缺乏合理和全面的判断，对于自我求职能力没有理性的思考，处于过度焦虑和心急的状态。

“求稳”心态居高。疫情之后，大学生对于就业的“稳定”追求较高，考研、考公、考编热度居高不下，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情况增多，在家安心备考，“一年不行考两年，两年不行考三年”，当编制类考试结束才去考虑其他就业形式。而在备考期间与社会脱节，学生缺少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和自身就业能力的提升，错失诸多优秀的就业机会。

就业能力不足，对于市场形势和就业环境的认知较为浅薄，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有限。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只关注自身的成绩、学分、绩点等量化表现的学习成果，对于实习实践、沟通协作、人际交往、时间管理等自主延伸锻炼的能力认知薄弱、定位模糊，缺乏主动探索，多数流于形式。学历不等于能力，“软技能”不足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缺口[4]。

二、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

增能理论既强调外部帮助拓展弱势群体的权力，又注重内部激发出来的个人潜能。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以社会工作专业的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方法提升大学毕业生个人能力、形成全社会就业合力体系，促进它们之间的匹配和相互转化，有效推动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5]。

（一）以个案社会工作实现个人增能，提升毕业生个人价值

开展个案辅导，以“一对一”的工作方法掌握个体信息和给予个性化帮扶。辅导员是大学生就业工作的一线人员，在就业工作中，由辅导员牵头，通过谈心谈话、走访课堂和宿舍等方式对学生展开精准的“一对一”个案工作，引导大学生对自身进行合理职业定位。通过个案辅导，辅导员掌握学生基本情况与环境情况的分析。在学生自身情况方面，了解学生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关于毕业去向选择、行业选择、企业岗位偏好等信息，利用 MBTI 性格测试、霍兰德职业兴趣类型正式评估、职业兴趣探索非正式评估、个体辅导等方式方法了解学生的性格、兴趣和基本能力。在学生环境情况方面，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包括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网络等，学生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影响人。通过以上信息的把握，建立学生基本档案，实现“一生一档、一生一策”。

在个案工作过程中，增权需要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来赋予其权力，挖掘其内在的潜能。辅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质，给学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就业指导，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就业信息和对接不同就业资源。同时，在个案服务过程中关注学生就业心理和就业意识，引导学生认清就业形势，给予情绪疏导，鼓励积极就业，增强他们的就业内驱力。发掘他们的能力优势，打破其内在的无权定型，使其主动增能。

（二）以小组社会工作实现群体增能，促进支持网络建设

通过就业小组等方式开展就业能力指导，构建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的课程体系，不断提升同学们的就业素养。

在“一生一档”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生进行分层分类。首先，根据学生就业意向进行分类，如根据就业类别分为考研组、考公组、创业组等。其次，按照学生求职意愿和求职能力情况，将学生分为冲刺层、稳定层、进步层。其中，冲刺层为个人意愿强烈、能力优异的拔尖人才；稳定层为拥有一定的求职能力，能够符合一般就业市场需求的传统型人才；进步层为能力欠缺、意识淡薄，需要进行提升的困难学生。最后，整合学生的分类分层情况，这样在每一类别的小组中，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给予针对性的资源对接，进行分层次的指导与推荐，如就业信息推荐、简历指导、模拟面试、实习实践等，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兴趣、特长等，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和岗位，提高就业供需关系的匹配。

推动“产学融合”课程体系建设，以课程小组为导向，引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首先，强化师资力量建设。高校就业工作要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师资队伍，落深落细就业指导，加强对领导班子、就业专员、教师的针对性指导，加强系统的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专业知识的培训和研究，从而有效保障就业工作的开展。其次，进行课程建设改革，将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融入学生发展的每一阶段。在大一时，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自我，如理想目标、个人决策能力、个

人性格、人际交往能力等。大二时，做好就业指导，分析就业市场，剖析就业信息，提升就业素养。大三时，注重就业训练，拓展实习实践活动。大四时，加强实战提升和过程指导，在求职备考的关键时间节点进行专项指导和讲座，加强反馈评估，不断提升，达到理想目标。

（三）以社区工作实现社会增能，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社区工作是以整个社区和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提供利他的助人服务的社会工作方法。近年来，为加强党建和思政建设，各高校着力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就业育人体系建设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中，从上而下，学校、院系、各职能部门联合，整合多方资源，构建融合就业共同体。高校领导依据学校、地域、学生特色持续深入开展 “访企拓岗”，拓展校际、校企、校政、校所合作，构建多样性实习、实践和创新创业平台；二级院系要结合专业特色匹配实习、就业岗位，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相关专业证书考试培训。其他各部门联合推动建立全面的就业帮扶平台，共建共享就业信息，如招聘信息、招聘会、宣讲会、论坛、培训等。加强各部门联动性、精准性，调动全校力量形成全员促就业工作合力[6]。

在增能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就业，构建专业的服务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伴随着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高校要积极推动建设多维度动态服务与跟踪评估体系，“扶上马再送一程”，了解市场趋向和人才满意度，实时掌握毕业生就业动态，进一步优化就业指导和人才培养方案，有机融合教育链和就业链，推动高质量人才培育。同时，毕业生也是高校社区工作中重要的资源和参与角色，为后续的毕业生就业提供就业经验和就业资源的支持。

三、社会行政

社会行政对于社会工作的开展起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社会行政就是按照行政程序，妥善利用各种资源，实施社会政策，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社会服务的活动。在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就业工作的合作与反馈，相关部门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性支持。

（一）健全就业相关政策，强化制度支撑保障

提供就业补贴和政策支持。对已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和租房补贴，对吸纳应届毕业生较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补助。同时，完善灵活就业和创新创业等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鼓励发展新型业态。

合理开发岗位，发挥政策性岗位的引领和调节作用。加强政策性岗位拓展，加大西部计划、西部专项、基层服务等岗位的宣传和补贴力度，鼓励引导毕业生投身西部、服务基层，缓解地域、行业间的结构性矛盾。

加强人力监管，完善就业法律法规。普及就业权益和法律知识，警示求职陷阱，强化审核招聘企业资质及岗位，重点惩处就业侵权行为，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

（二）拓宽就业信息渠道

创新技术手段，推动 AI 技术在就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建立人才供求信息系统，聚合高校、用人单位、毕业生的供求，收集、整合、分析和发布各类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信息，实现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精准匹配，为三方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服务。同时，进一步拓展 AI 智能画像、数据档案建立、AI 模拟面试、AI 职业角色体验等数字化、智能化的就业能力拓展方式的研发与应用，提升高质量就业水平。

四、结语

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能够有效地助力大学生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调节就业心态，帮助毕业生提升自我认知，作出合理的职业选择，实现毕业生增能。同时有效地促进高校就业指导体系和社会就业支持体系的构建，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 . 社会工作概论 [M].4 版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23.

[2] 袁蓓 . 增能视角下大学生就业心理困境、原因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D]. 济南 : 山东大学 , 2018.

[3] 胡善平 .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帮扶机制构建——基于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的经验总结 [J]. 劳动保障世界 , 2020(02): 15−17.

[4] 麦可思研究院 . 2025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5.

[5] 冯腾飞 .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指导 [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0, 23(03): 42−44.

[6] 黄国庆 .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新特征、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38(10): 52−54.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1+4+N”校社协同模式下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析

曾　勋

摘要：初中阶段为学生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仅在校园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无法满足初中生的多元分化、深层演进需求，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1+4+N”校社协同模式，以全员积极心理培育为核心导向，以学校、家庭、社区、专业机构为核心载体，对多元社会资源、专项服务项目进行整合，并通过机制革新、场景延展、队伍融合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单一化供给模式转为多元化共治生态。立足多地实践经验，紧扣初中生心理发展特质，从内核重构、路径优化、保障搭建三维发力，探寻校社协同育人新范式，提炼可复用推广成果，切实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质效。

关键词：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校社协同；“1+4+N”模式

一、引言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深入推进过程中，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愈发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关键命题。青春期心理起伏、学业负荷与人际相处难题相互缠绕，其心理状态始终受校园、家庭、社会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当下仍存在校园主导过度、社会协同不足，重危机处置轻前期预防培育，各类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联动合力的突出问题[1]。

现有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常局限于单一服务场景与局部机制设计，未能精准对接初中生青春期心理发展的特殊规律与复杂需求。基于此，本文搭建“1+4+N”协同框架，依托明确核心导向、整合多元参与主体、激活各类资源效能摆脱现有困境，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贯穿全程、补齐短板，为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二、“1+4+N”校社协同模式的内核重构

传统校社协同多是表层叠加、各成体系。“1+4+N”模式立足生态系统理论，紧扣初中生青春期心理发展的阶段特点、互动需求与可塑空间，打破以往主体分散、资源脱节的老问题，推动各方深度融合、功能互补，搭建起核心引领、主体支撑、资源赋能、数字衔接的四维架构，让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与系统性[2]。对现有的资源浅层堆砌模式进行改革，立足于校社协同育人内在逻辑重构、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在初中生成长全场景中融入教育引导，避免知识碎片化，全周期培育学生健康心理，使单向资源供给转型为双向互动赋能，解决群体共性诉求、个体差异化心理需求。

（一）“1”个核心导向

打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重危机干预、轻预防培育的固有认知，以全员积极心理培育为核心，围绕初中生心理韧性塑造、情绪管理能力提升及人际交往素养培育，搭建“预防—发展—干预”三级递进服务体系。在守住心理风险防控底线的同时挖掘学生心理发展潜力，促成治未病与促成长的深度融合，精准匹配初中生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成长的阶段心理特质。

（二）“4”大主体支撑

整合学校、家庭、社区、专业机构四大主体资源，明确各个主体的功能定位、权责边界，共同构建出高效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学校负责日常心理教学、风险排查、校园心理氛围培育；家庭以科学教养为支撑，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社区需拓展社会化心理实践场景。专业机构跟进个案指导、危机处置、专项培训，四大主体形成心理健康育人合力。

（三）“N”类资源赋能

以四大主体为纽带整合各方资源，在校社协同体系中融入政府政策扶持、高校专家指导、企业公益支持、新媒体传播力量。构建动态资源池，按照学生需求及时调整资源，开发社工介入课程、朋辈互助计划、亲子成长活动、社区实践项目，促进资源之间的流通，与初中生心理需求相匹配，进而破解之前心理教育中存在的资源分散、供需错位问题。

三、“1+4+N”校社协同模式的实施路径

结合初中生心理发展特质与校社协同实操积淀，聚焦场景融合、队伍共建、服务创新三大核心，打造可落地且灵活适配的实施路径，推动协同育人效能落

地见效。

（一）场景延伸

校园是初中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打破单一课时局限，在校本课程体系中自然融入心理教育，构建“基础课程 + 特色模块 + 微课堂”架构。基础课程内容为情绪调控、压力疏导，特色模块主要与青春期心理、生涯规划等需求对接，微课堂在课堂、班会中使用心理漫画、短视频解读相关内容，实现潜移默化的教育。心理教学需避免生硬说教，在课堂中融入情境模拟、心理沙盘、小组叙事等体验式环节，引导学生主动敞开心扉、表达自我情绪。组建“专业社工 + 心理教师 + 班主任 + 朋辈观察员”队伍，学生经过系统培训后，以朋辈身份、同龄共情力捕捉同学的心理波动，搭配专业工具为其建立动态档案，早期识别、介入心理风险。参考太仓市“一校一社工”实践经验，在校园内设立驻校社工站，配套建成感统室、团辅室、情绪宣泄室等专业功能空间，整合形成“心理咨询 + 社工服务 + 朋辈陪伴”三位一体融合模式，精准破解初中生面对心理困扰时“不愿求助、不敢求助”的隐性壁垒[3]。

家庭端着重激活家庭教育的核心效能，以生态体验式家长课程为抓手，依靠家长成长坊、亲子训练营等实景活动，手把手传递青春期孩子心理特点与亲子沟通方法，联合驻校社工、班主任开展个性化家访，重点关注单亲、留守儿童家庭，借鉴荆州四叶草社工中心实践经验编制《家校联络手册》，筑牢家校协同的育人纽带[4]。

社区侧聚焦实践赋能与氛围培育，深耕初中生心理成长场景，打造专属志愿服务品牌，通过社区公益服务、邻里互助等实景体验，锤炼学生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能力，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设立心理服务站，联动专业力量开展科普与团辅，搭建“30 分钟心理服务圈”，融入文化资源打造特色空间，筑牢全员关注心理健康的社区基础[5]。

（二）队伍融合

整合专业社工、心理教师、班主任、家长志愿者、专家顾问、朋辈导师力量组建六级队伍，理顺分层培育机制与各角色权责边界，打通联动壁垒，切实解决传统队伍专业能力不均、定位不清、合力不足的问题，充分激活每类参与者的专业效能[6]。专业社工主要负责统筹个案帮扶、小组活动策划、队伍赋能培训、危机事件应对；心理教师负责课堂教学、日常心理疏导，同步更新学生的心理档案，指导班主任、朋辈导师的具体实践操作；班主任立足于观察岗，动态捕捉学生心理、完成风险初筛、联动对接家校社；家长志愿者完成系统化培训后，深入参与到亲子心理科普、家庭支持服务、校园心理活动中；由高校心理教授、医院心理医生、资深社工督导组成专家顾问团，聚焦实际需求提供专项督导、技术支撑与政策咨询；高年级朋辈导师经过专项培训，凭同龄共情力陪伴低年级学生、倾听困惑，牵头组织各类校园心理活动。

围绕队伍成长搭建分层赋能体系，组织专业社工与心理教师开展跨领域实操集训，打通校园教育与专业服务的衔接堵点，为班主任、家长志愿者讲授心理基础与实操方法，给朋辈导师搭配专属心理教师或社工做一对一督导，全程跟进校准服务细节，守住规范服务的核心底线。构建校社人才轮岗机制，推动教师到社工机构、心理医疗机构研修，专业社工深度参与到校园日常教学管理中，突破不同领域间的壁垒，通过具体的实践操作促进教育理念、专业技术深度融合，强化校社协同育人效能[7]。

构建校社人才常态化交流、社工教师联席会议制度，通过研讨案例、分享实战经验突破跨领域专业之间的壁垒，邀请高校、医院心理专家组建顾问团，为其提供精准督导、技术支持，家长参与系统培训后，组成志愿者队伍，连接家校社，深度参与到心理科普、亲子活动统筹中。

（三）服务创新

精准化服务聚焦初中生心理发展的个体差异，以分层分类帮扶和个体画像为支撑，串联起从需求识别、服务适配到成效追踪的全流程服务链路，精准对接不同学段、不同特质学生的心理需求，让服务更具针对性与落地成效[8]。搭建“三维需求画像”，从心理素养、成长环境及个性化困惑三个层面入手，通过问卷调查、日常观察、访谈座谈与档案梳理等多元方式摸清学生实际情况，划分不同干预等级群体，为后续精准化服务提供扎实依据。面向全体心理状态平稳的初中生，持续开展心理科普、团体辅导及素养提升相关活动，围绕情绪调控、压力疏导、人际相处与生涯规划等关键方向做实做细，结合初中生成长认知特点设计贴合实际的内容，稳步夯实学生心理发展的基础[9]。对出现轻度心理困扰的学生，逐一建立“一人一策”个性化档案，融合动机式访谈、小组辅导与家庭协同支持等干预方式推进精准帮扶，借助朋辈导师的同龄共情优势搭建陪伴桥梁，逐步引导学生纾解心理压力、重建积极心理状态。对于需重点干预的高危学生群体，专门打通“校—医—家—社”四方联动通道，由专业社工牵头统筹协调，联合心理医生、班主任、学生家长及社区工作人员组建专项干预小组，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确保心理危机事件能快速响应、规范处置并全程跟踪。

参考河南科技学院“三个清单”实践经验，搭建“需求—资源—服务”三维动态对接模式，结合前期完成的学生三维心理需求画像梳理诉求形成需求清单，联动校社双方资源库厘清可调配资源，精准匹配后制定个性化服务清单，通过回访评估与反馈优化不断调整服务内容，切实让精准化心理服务落地见效。聚焦单亲、留守、重组等特殊家庭学生，结合其成长环境的独特

性推进家庭支持服务定制化，联合社区与专业机构为这类家庭提供心理疏导、科学育儿建议及社会资源对接等帮扶举措，从家庭层面精准排查并化解学生潜藏的心理隐患。

特色化服务立足初中生成长规律打造专属品牌，围绕自我认知、两性交往、生涯探索等核心主题，开发青春期心理成长社工课程并梳理成可推广范式。依托心理情景剧社团、朋辈互助小组开展互动式培育提升学生心理素养，通过新媒体“心理成长驿站”线上平台推送科普内容，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高效联动[10]。

四、“1+4+N”校社协同模式的保障体系

要让该模式持续落地见效，需围绕机制建设、政策保障、评价完善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打通制度壁垒与执行堵点。

（一）机制保障

以政府牵头统筹、校社深度联动为核心，搭建权责分明、动态调整的运行机制，破解协同主体各自为战、缺乏统合的问题。由政府组建协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教育、民政、卫健、团委、妇联等部门，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教育部门负责校内心理教育、校社资源对接，民政部门引导社工、社区力量融入初中生心理教育，卫健部门联合心理医疗机构为学生提供诊疗支持，团委、妇联组织相关组织、家庭参与其中，形成多元联动格局。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每月碰头沟通、每季度集中分析情况、年底全面梳理总结，将协同中的资源调配、服务衔接、危机处置等实际问题摆到桌面，及时打通堵点、解决难题，为校社协同育人筑牢沟通保障。制定《校社协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细则》与《危机事件处置预案》两项配套文件，聚焦服务流转、资源统筹、个案跟进及隐私防护等核心环节并明确具体操作标准，进一步厘清校社双方在服务供给、风险把控和责任界定上的具体分工，为这项工作有序推进筑牢制度根基。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资源共享模式，搭建区域性的校社协同心理健康服务平台，把各类资源信息、服务项目和专业人才都整合进来，推动资源高效流通、精准匹配。线下设立资源对接工作站，安排专人负责，确保日常协调顺畅、服务衔接不脱节。

（二）政策保障

将初中生心理健康校社协同工作纳入地方教育发展布局，出台配套扶持举措吸引社工机构、心理医疗机构深度参与。通过政府财政投入、社会公益捐助等多元渠道筹措资金，保障驻校社工配备、专业能力培训及场地搭建等核心需求，借鉴太仓市经验，将项目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夯实长效运行的物质基础。

（三）评价保障

摒弃单一评价思维，建立过程与结果并重、定量与定性互补的多元评价模式。吸纳学校、家庭、社区、专业机构及学生多方参与评判，围绕协同机制运转效率、服务落地质量和学生心理素养提升效果等核心方面，通过问卷调研、案例分析、访谈交流等方式常态化评价；建立评价结果反馈与落地机制，依托评价数据优化服务、调配资源，形成“评价—优化—提效”的良性循环。借鉴濮湖小学经验开发专属评价工具，将亲子关系、朋辈互动、心理韧性等关键维度纳入评价体系。

五、结语

初中阶段是学生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心理健康教育是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初中学校应对心理健康教育引起高度重视，立足学生实际心理状态，确定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推动工作落地见效。“1+4+N”校社协同模式通过系统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渗透到校园日常教育、家庭亲子互动、社区实践体验全场景，既强化专业力量的支撑效能，又激活家校社育人动能，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从被动应对问题向主动培育心理素养转型。未来需持续深化校社协同，优化模式运行机制，为初中生心理健康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殷晓斌 .“1+4+N”：小学体育课堂中的享受乐趣之径 [J]. 中国学校体育 , 2024(11): 77−78.

[2] 刘琤 , 谭倩文 .“1+4+N”模式下地方工科院校党史教育路径探索 [J]. 时代报告 , 2023(07): 48−50.

[3] 蒋冬梅 . 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及实施路径探索 [J]. 家长 (上旬刊), 2021(08): 51−52.

[4] 谢春静 . 班本课程 : 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路径 [J]. 教书育人 , 2024(31): 39−41.

[5] 王焕霞 . 初中思政课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J]. 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 , 2024, 9(16): 26−28.

[6] 王霞 . 在班主任工作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及路径 [J]. 华夏教师 , 2025(25): 50−52.

[7] 李洁 .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J]. 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 , 2025, 10(10): 58−61.

[8] 丁薇 . 初中生生命态度分析及积极生命态度培养路径探索 [J]. 江苏教育 , 2025(24): 49−52.

[9] 成蒋钻 . 校园心理剧融入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应用 [J]. 中学教学参考 , 2023(27): 84−86.

[10] 王欢 . 家校共育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 [J]. 学周刊 , 2025, 2(02): 155−15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心理健康教育专项课题“乡村振兴视阈下‘学校 + 社工’心育工作模式的实践与研究”（2024ZJY674）。

（作者单位：柳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李崇馨

摘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品牌塑造，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支点，是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关键引擎，更是提升思政育人实效的核心载体。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当前不少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在品牌塑造过程中陷入诸多困境：部分高校定位模糊、特色缺失，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部分高校受资源条件限制，支撑体系薄弱，严重制约品牌可持续发展，还有部分高校品牌传播低效，导致品牌辐射力不足，社会认同偏低。基于此，高校需通过精准定位构建特色品牌内核、整合资源搭建协同支撑网络，创新传播打造立体式叙事体系，多措并举推动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提质增效。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困境；创新路径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承担着培育优秀辅导员、提炼特色育人经验、输出优质思政成果的重要使命。其品牌塑造并非表面化、简单化的“挂牌命名”或“宣传造势”，而是一项关乎思政工作质量提升、辅导员队伍发展、学生全面成长及高校社会影响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然而，在实际品牌塑造过程中，多数高校普遍遭遇同质化竞争、资源约束、传播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须探索一条特色化、可持续的品牌塑造创新路径。

一、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重要性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支点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高校的核心使命，辅导员作为落实这一使命的一线执行者，其育人能力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成效。名师工作室的品牌塑造，本质是将分散的育人经验转化为体系化的育人能力，将个体的“点”串联成全局的“面”。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支点[1]。

1. 整合多元资源，形成育人合力

通过品牌化运作，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能够有效汇聚学工、教务、团委等内部优质资源，同时链接企业、社会机构等外部资源，围绕学生思想引领、学业指导、生涯规划等核心任务，打造“红色基因传承工作坊”“网络思政育人矩阵”等可复制、可推广的育人模式，为立德树人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源支撑。

2. 发挥示范引领，强化价值传导

品牌工作室本身是高校“优质思政产品”的生产者，其输出的特色课程、典型案例、育人标准等成果能直接作用于学生，传递主流价值观。同时，高校还可通过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辅导员参与学习，形成“头雁领飞、群雁齐追”的思政工作生态。

（二）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关键引擎

当前时代背景下，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但现实中仍存在“事务性工作挤压专业时间”“经验依赖大于系统研究”等现实困境。品牌塑造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是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关键引擎[2]。

1. 品牌塑造有助于倒逼能力升级

品牌建设要求辅导员工作室从“经验型”向“研究型”转型，需围绕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特定领域开展课题研究、提炼工作规律，形成专著、论文、标准等理论成果，推动辅导员从“做事”向“做学问”转变。

2. 品牌塑造有益于构建成长共同体

通过“名师领衔 + 团队攻坚”模式，有效打破了辅导员“单兵作战”的局限。同时，在参与品牌项目建设中，团队成员合理分工，部分负责理论研究、部分负责实践落地、部分负责传播推广，既能发挥个人专长，又能在互动协作中实现能力互补，加速青年辅导员的专业成长。

（三）提升思政育人实效的核心载体

“Z 世代”学生思想活跃、价值多元、需求多样，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思政育人模式已难以满足其成

长需求。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通过精准定位、特色创新，能够精准对接学生需求，显著提升思政育人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1. 聚焦育人痛点，破解实际难题

品牌塑造要求辅导员工作室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痛点、堵点、卡点问题，如“躺平”现象、网络舆情应对、就业焦虑等，特色解决方案通过实证调研形成针对性强、可操作的特色解决方案，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

2. 强化品牌效应，增强学生认同

新生代大学生对有口碑、有特色的育人项目接受度更高。例如，部分网红辅导员工作室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思政教育，传递价值观，参与度与转化率远超传统讲座。

二、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困境

（一）定位模糊，特色化不足，同质化竞争突出

尽管品牌塑造早已成为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工作重点与要点之一，然而，受主客观层面多种因素制约，部分高校的品牌塑造实践仍然存在各种缺陷与弊端。其中定位模糊、特色化不足、同质化竞争突出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性问题。

这些工作室缺乏清晰的差异化定位，或简单复制“经验总结—成果推广”的传统模式，或盲目跟风“网络思政”“心理健康”等热点，未充分结合所在高校的办学特色、辅导员个人专长或学生群体特点，导致品牌辨识度低，难以形成“人无我有”的核心竞争力[3]。如行业类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未充分结合职业导向，师范类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未强调师德培育等。部分工作室品牌未彰显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党团建设等特色、专长；部分工作室品牌未突出少数民族学生、研究生等不同群体差异性特点等。

（二）资源约束，支撑体系薄弱，可持续发展受限

除了定位不明，部分高校还存在资源整合能力差、基础薄弱等问题，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深受资源约束，支撑体系薄弱，可持续发展受限。

一方面，部分高校平台资源不足，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依托二级学院建设，缺乏校级统筹，场地、经费、设备等硬件支持不稳定。同时，这些高校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跨学院、跨校、跨区域的合作机制，难以整合学工系统、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机构的外部资源。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智力资源较为分散，辅导员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多为兼职辅导员，日常事务性工作繁重，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品牌建设。部分工作室仅依赖“名师”个人影响力，团队成员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形成梯队化协作成果。

（三）传播低效，品牌辐射力弱，社会认同不足

受定位及资源等方面因素限制，一些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还面临传播低效、品牌辐射力弱、社会认同不足的困境。

一方面，这些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传播渠道较为单一，仍以线下汇报、论文发表、校内会议为主，对微信视频号、抖音、B 站等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停留在“内容搬运”层面，缺乏故事化、互动化的品牌叙事[4]。

另一方面，一些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构建成果转化不足，部分工作室产出停留在研究报告、培训课件等“内部资料”，未形成可推广的标准、课程或品牌活动。由于缺乏相对系统、规范的育人流程、工具包、慕课、工作坊、公益项目、跨校论坛等实际内容，工作室品牌难以扩大社会影响力。

三、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创新路径

（一）以“特色基因”构建品牌内核实现精准定位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的成功率取决于定位的准确性。只有定位清晰、明确、精准，品牌塑造才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潜在风险，从而在浩如烟海的同类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最具排他性的有效成果。因此，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首先需要的就是以“特色基因”构建品牌内核实现精准定位。

1. 聚焦“三维坐标”，明确品牌构建方向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需结合“高校类型 + 学生需求 + 辅导员专长”确定核心领域，立足于本院校所处类别（行业类、综合类、师范类等），围绕学生差异化需求（新生适应、就业创业、网络素养等），突出辅导员专业特长（心理咨询、党团建设、学业指导等），明晰品牌塑造的正确方向。例如，行业类高校可围绕“产业人才培养”打造职业发展辅导品牌；师范类高校可聚焦“师德养成”设计辅导员工作室品牌项目[5]。

2.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强化特色提炼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构建要始终针对学生工作的痛点、堵点、卡点问题，如“躺平”现象、网络舆情应对等。同时，基于实证调研手法形成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解决方案，将“解决问题”转化为品牌标签，如“Z 世代网络思政工作法”“困难生精准帮扶模型”等。

（二）构建“内外协同”的支撑网络强化资源整合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不是一所高校或一个辅导员工作室的单打独斗、闭门造车，而是需要校内校外互联互通、协调联动形成集合效应，要最大限度挖掘各类渠道、各种资源的品牌构建潜能，使品牌塑造成为覆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体系，从而推动工作室从“经验集合”走向“价值创造”，并使品牌

构建的“名气”跃升到产生更大教育“影响力”的更高水平。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还需构建“内外协同”的支撑网络以强化资源整合。

1. 要不断深化校内联动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要积极争取党委学工部、教务处、团委等部门支持，将工作室纳入“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体系，共享课程、实践基地、师资培训等资源。同时，要大力推动“工作室 + 学院 + 班级”三级联动，通过“导师制”“项目制”吸纳优秀辅导员、学生骨干参与，形成“名师领衔 + 团队攻坚 + 全员实践”的生态。

2. 要持续强化校外拓展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应与地方教育局、中小学、企业、媒体等建立合作，推动高等教育、中小学基础教育思政、企业职业素养、媒体文化传播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实现引入外部需求倒逼品牌升级的目标。例如，可探索与中小学合作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既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又反哺校内育人。

（三）打造“立体式”品牌叙事体系促进多维传播

无论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打造品牌的目的无非是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影响力。这就需要品牌建设不断提升叙事能力，以体系化叙事结构实现对外宣传“横到边、纵到底”，由此达到无缝覆盖、全面传播的目的。因此，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还要打造“立体式”品牌叙事体系从而促进多维传播[6]。

1. 要实现品牌塑造内容 IP 化

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需围绕核心特色设计系列品牌产品，形成可识别的内容符号。譬如“辅导员说”短视频品牌需聚焦学生问题解答；“育人手账”品牌要记录典型案例；“年度白皮书”品牌应当输出行业报告等。

2. 要加快实现品牌传播平台矩阵化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需构建“两微一端一抖 +B 站”新媒体矩阵，结合毕业季、国庆节等重要节点策划开展主题传播。同时，要充分利用 H5、小程序等工具开发互动产品，增强用户参与感，如开发“学生心理自测工具”“辅导员能力挑战赛”等。

3. 深化品牌口碑场景化

借助“开放日”“工作坊”“跨校论坛”等活动，高校应主动邀请师生、家长、社会人士体验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项目。同时，应积极联合媒体推出“名师访谈”“工作室纪实”等相关专题报道，提升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的社会公信力。

（四）构建“动态生长”式的品牌维护体系

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品牌塑造，需要高校着力加强品牌维护，建立健全更具长效性、动态化、有弹性的品牌维护体系。

1. 构建分层式考核评价机制

打造名师工作室品牌需要得到来自学生、教职员工乃至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这就需要高校立足本地实际建立健全分层、立体、全方位的品牌塑造考评体系。比如，高校可着眼于基础指标与发展指标两个维度考核品牌塑造的针对性、有效性。例如，基础指标可包括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中团队建设、成果数量等要素；发展指标可涵盖品牌塑造产生的辐射范围、社会影响等要素，从而最大限度提升品牌考评维度的全面性、完整性。

2. 创新品牌传承机制

在人员流动加剧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品牌塑造也面临人员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因此，创新品牌传承机制不仅有助于稳固传承人队伍、夯实传承基础，也有利于汲取创新灵感、激发创新生命力。例如，高校可探索梯队培养体系，打造“核心成员—后备成员—学员”的梯形传承队伍，同时借助“名师工作坊”“成果转化营”“案例库共建”等实现代际传承与经验沉淀和积累。

四、结语

从本质上讲，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品牌塑造就是通过特色定位、资源整合、立体传播、机制创新，将“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能力”，将“工作成果”升华为“育人品牌”。这既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需要，也是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的关键抓手，还是高等教育育人实效提升的核心载体，更是学校影响力扩大的重要窗口。品牌塑造不仅关乎某个辅导员工作室的“名气”，更关乎高校思政工作的“底气”、学生成长的“福气”和社会认同的“正气”。唯有立足学生需求、扎根实践土壤、强化社会联结，推动工作室从“经验集合”走向“价值创造”，才能实现从“有名气”到“有影响力”、从“短期项目”到“长期品牌”的跨越，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润物无声、育人有痕”的至高境界，最终成为高校思政工作的“金字招牌”。

参考文献

[1] 吴光梅，刘宏达．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建设：历程、成效与经验 [J]. 思想教育研究，2024(12): 130−136.

[2] 郑思．高职院校辅导员特色工作坊与名师工作室的耦合研究 [J]. 教育观察，2024, 13(34): 88−91.

[3] 郭海棠，黄春．基于“师生成长共同体”理念的辅导员工作室建设路径——以海棠工作室为例 [J]. 品位・经典，2024(13): 99−102.

[4] 莫书娅，杨明，蒋小均．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建设实践研究——以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四川水利，2024, 45(S1): 137−140.

[5] 马雅芬．高职院校辅导员“名师（下转 258 页）

强基工程视域下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优化路径研究

刘　平

摘要：强基工程作为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为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实践指引。广东民办高校作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其组织员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在民办高校的贯彻落实，影响着高校党建工作质量与人才培养成效。本文立足强基工程建设要求，结合广东民办高校发展实际，创新构建“队伍建设—保障机制—管理体系—协同治理”四位一体优化框架，探索适配民办高校特点的实践路径，为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提升组织员队伍履职效能、构建“党建＋治理”双轮驱动模式提供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强基工程；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三维度评价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强基工程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短板，着力提升基层党建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而组织员队伍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力量，其建设质量直接决定着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落地成效。广东作为民办高等教育大省，民办高校在推动教育多元化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承担着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党建督导等重要职责，是连接党组织与师生党员的关键纽带，其履职能力与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民办高校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的发挥[1]。在强基工程视域下，加强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不仅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党对民办高校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民办高校党建工作难题、促进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理论价值

丰富民办高校组织员实践经验提炼与党建理论创新。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具有独特性，其人员构成多元化、管理机制市场化、党建资源有限性等特征，为党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样本。通过总结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中“党建—业务双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等实践经验，能够突破传统党建理论框架，推动党建理论在民办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

完善民办高校组织员职能作用机制研究与“党建＋治理”理论模型构建。组织员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办高校组织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职业规划指导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揭示党的组织路线与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构建“党建＋治理”双轮驱动理论模型，创新民办高校组织发展研究范式；同时，深化组织员专业发展理论研究，拓展胜任力理论在民办高校的应用维度。

（二）实践价值

提升民办高校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增强党组织在民办高校中的政治引领力。高素质组织员队伍是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通过建立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进一步优化组织员队伍结构，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组织员作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政治引路人”，依托常态化思想引领工作与职业

（上接 257 页）工作室”模式建设路径探析 [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 37(06): 51−53.

[6] 郑思 . 高职院校辅导员“特色工作坊＋名师工作室”双模式建设路径探析——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广西教育 , 2023(27): 109−112.

（作者系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生涯规划指导机制，旨在有效引导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认同，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并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目标。

三、强基工程视域下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提升专职化水平，筑牢专业素养

提升专职化水平是优化组织员队伍建设的基础。广东民办高校应按照强基工程要求与相关政策标准，根据学校规模、党员数量等实际情况，合理配备专职组织员，确保专职组织员师生比达到规定要求，明确专职组织员的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确保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党建工作。对于兼职组织员，应合理界定其工作范围与时间投入，落实岗位补贴与激励措施，避免因兼职过多影响工作质量[2]。同时，建立组织员准入制度，制定民办高校组织员岗位胜任力模型，建立“公开选拔 + 专业测评”的选聘机制，严格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热爱党建工作、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员充实到组织员队伍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与党务资质持有率。

筑牢专业素养基础是提升组织员履职能力的核心。构建分层分类的“理论 + 实践”双轨制培训体系，针对新入职组织员开展岗前培训，重点培训党建基础知识、业务流程与工作方法；针对在岗组织员开展常态化培训，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法规、党建实务、新媒体技术、跨域协同等热点难点问题。创新培训方式，采用专题讲座、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线上学习、跨校交流等多种形式，组织参与党建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学习公办高校先进经验与典型案例，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组织员“传帮带”机制，由经验丰富的骨干组织员对年轻组织员进行指导，帮助其快速提升工作能力。

（二）优化薪酬待遇，拓宽职业发展

优化薪酬待遇是稳定组织员队伍的关键。广东民办高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将组织员薪酬待遇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对待，根据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等因素合理确定薪酬水平[3]。优化薪酬结构，增设党建工作专项奖励，落实兼职组织员岗位补贴，完善福利保障体系，确保组织员在社保、公积金缴纳、健康体检、带薪休假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岗位人员同等的待遇。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党建经费占学费收入比例达到合理水平，为组织员开展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障党建活动的顺利开展。建立组织员岗位激励制度，对工作表现突出的组织员给予表彰奖励，并在薪酬调整、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倾斜。

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是促进组织员队伍长远发展的保障。民办高校应结合学校实际，为组织员建立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党务与行政序列互通的双线晋升机制，在职称评审中设立党建工作业绩专项指标，将党建工作业绩作为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4]。建立组织员与行政部门、教学科研部门之间的交流轮岗机制，为组织员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推荐优秀组织员参与上级党组织的培训、挂职锻炼等活动，提升其综合能力与发展潜力。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将组织员岗位作为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重要平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党建工作。

（三）明确权责边界，优化考核激励

明确权责边界是规范组织员队伍管理的基础。广东民办高校应依据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组织员岗位职责说明书，明确组织员在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党建督导、政策宣传等工作中的具体权责。健全党组织参与决策机制，提高党委进入董事会比例，建立党组织参与学校决策与监督的常态化机制，明确组织员在学校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工作推进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路径。厘清组织员与基层党支部、行政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建立协同配合机制，确保党建工作有序开展。

优化考核激励是提升组织员工作效能的关键。引入组织力、影响力、创新力“三维度”评价模型，构建包含 15 项核心指标的量化考核体系，制定以工作实绩为核心的考核指标，包含队伍结构优化、制度嵌入深度、队伍稳定性等多个评价指标（见表 1）。

表 1 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三维度”评价模型

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定义及评价方法	权重
组织力	队伍结构化	专职组织员师生比（达标值≥ 1:100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目标≥ 50%）、党务资质持有率（目标≥ 40%）	15%
	制度嵌入深度	党组织参与决策机制（如党委进入董事会比例）、党建经费占学费收入比例（目标≥ 1%）	10%
	队伍稳定性	两年内组织员离职率（目标≤ 20%）、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度	10%
影响力	学生成长引领	学生党员志愿服务参与率（目标≥ 80%）、毕业生党员服务国家战略领域就业比例（目标≥ 30%）	10%
	社会服务效能	校企党建合作项目数量、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率	10%
	文化品牌辐射	全国 / 省级党建示范项目数量、党建文化品牌传播力	15%
创新力	方法模式创新	特色党建品牌数量、标准化流程创新	10%
	技术应用深度	智慧党建平台覆盖率（目标 100%）、大数据分析应用水平（如舆情监测精准度）	10%
	跨域协同能力	公办—民办结对帮扶项目数量、跨学科党建研究课题数量（年度≥ 3 项）	10%

创新考核方式，采用“过程考核 + 结果评估”的动态考核模式，结合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自我评估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评价组织员的工作表现。

（四）整合内外资源，强化联动合作

整合内外资源是提升组织员队伍工作保障水平的重要途径。广东民办高校应加强党建工作资源统筹规划，建立党建工作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学校内部的场地、设备、师资等资源，为组织员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持[5]。加大党建工作经费投入，保障组织员队伍建设与党建工作开展的各项需求。推进公办—民办高校党建结对帮扶，每年开展跨校交流与实地考察活动，联合申报跨学科党建研究课题，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化校企党建合作，共建党建实践基地与实验室，提升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率与校企合作项目数量，拓展外部资源渠道，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社区党组织等的联系合作，为组织员开展党建活动提供丰富载体。

强化联动合作是提升组织员队伍工作效能的重要保障。在学校内部，建立组织员与教学科研部门、学生管理部门、行政后勤部门之间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统筹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学生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将党建要求融入学校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在学校外部，构建组织员与地方党组织、企业党组织、社区党组织之间的联动工作机制，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拓宽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并扩大影响力。

四、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成效与示范价值

（一）队伍建设提质增效，筑牢党建核心力量

各民办高校严格落实专职化建设要求，通过科学选聘机制筛选政治过硬、热爱党建事业的优秀人才加入组织员队伍，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人员稳定性显著增强。专职组织员全身心投入党建主业，兼职组织员通过明确职责与激励保障实现权责对等，形成“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协同发力”的队伍格局。队伍整体政治素养与专业背景实现双向提升，为党建工作高质量推进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让党组织在民办高校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二）专业能力持续精进，履职效能全面提升

分层分类的“理论 + 实践”双轨制培训体系落地见效，让新入职组织员快速掌握党建基础业务与工作方法，在岗组织员通过多元化培训形式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实务能力[6]。“传帮带”机制有效传承党建工作经验，年轻组织员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组织员队伍整体履职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在党员发展、教育管理、主题教育等重点工作中，组织员以专业素养推动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具针对性与感染力，切实发挥了“政治引路人”的关键作用。

（三）协同机制深度运转，聚合发展强大合力

校内协同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组织员与教学科研、学生管理、行政后勤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校园管理、文化建设等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的良性互动。校外联动合作不断深化，公办与民办高校通过结对帮扶共享党建经验、共建优质资源，有效破解民办高校党建资源短板；校企党建合作搭建实践平台，将党建工作与产业需求、技术创新相结合，丰富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载体与社会价值；与地方党组织、社区党组织的联动让党建活动更接地气，进一步拓宽了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并扩大了影响力。

五、结语

强基工程视域下，加强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党对民办高校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广东民办高校应立足强基工程建设要求，结合学校实际，通过强化队伍建设、完善保障机制、健全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机制等路径，构建“三位一体”的组织员队伍建设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不断提升组织员队伍的专职化水平、专业素养、工作效能与保障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组织员队伍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夯实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基础，推动党的教育方针在民办高校落地生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 + 治理”双轮驱动模式，为广东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强基工程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刘艳 . 民办高校机关党组织政治和组织功能提升路径研究 [J]. 大学 , 2025(24): 177−180.

[2] 刘军 . 健全民办高校党组织参与决策和监督机制的路径研究 [J]. 红岩春秋 , 2025(10): 149−152.

[3] 刘秋云 . 广州市民办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研究——以广东 PZ 学院为例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5(15): 113−115.

[4] 李伟杉 . 四川民办高校教师组织承诺提升路径研究 [J]. 市场周刊 , 2025, 38(31): 166−170.

[5] 李帅卫 . 民办高校院系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路径研究 [J]. 高教论坛 , 2025(01): 17−20.

[6] 刘菁儿 , 张泽雄 . 民办高校组织机构设置创新研究 [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 2025, 27(02): 22−2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党建研究专项）“强基工程视域下广东民办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现状、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2025JKDJ145）。

（作者单位：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研究

徐吴缘圆

摘要：劳动教育是“五育并举”的核心载体，大学生的参与意愿关乎其育人成效，然而现有研究多以单一视角分析影响因素，缺乏对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组态探究。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运用 fsQCA 方法对 302 份大学生样本展开组态分析，探究内外因协同影响其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机制。研究发现单一影响因素不构成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识别出 4 条组态路径。本研究从组态思维解析前因组合，深化了多因素联合效应认知，拓展了研究视角，也为高校优化劳动教育实践、提升大学生参与意愿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归因理论；组态路径

随着“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深入落地，劳动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载体被正式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构成[1]。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其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直接关乎劳动知识习得、劳动技能提升与劳动价值观塑造，对个人全面发展及社会劳动文明传承具有深远意义[2]。当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虽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大学生参与积极性不足、参与深度欠缺等现实困境[3]，部分学生存在“重智育轻劳动”的认知偏差，甚至对劳动教育产生抵触心理[4]，因此如何提升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和参与实效已成为高校劳动教育改革的核心命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文献综述

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是认识劳动教育价值后主动参与相关课程与实践的主观倾向，是参与态度、决策及行为的前置心理状态[5]，核心特征为价值认同性、主动选择性与情境依赖性，受个体认知评价与外部环境约束激励的双重作用[6]。归因理论作为一种阐释个体行为因果推断的认知理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个体行为是能力、动机等内部因素以及环境、机遇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对行为原因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其后续的态度与行为选择[7]。鉴于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作为响应教育政策、关乎个人发展的重要行为倾向，其行为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实践意义与归因理论的适用条件高度契合，为研究提供了适宜的理论视角。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探究其影响因素，可归为个体内部与外部环境两类：个体内部因素中，劳动价值观作为核心认知基础影响接受度与参与动力[8]，自我效能感经劳动能力判断作用于参与意愿，高自我效能感者更愿尝试劳动实践[9]，技能提升、素质发展等参与动机为参与行为提供内在推力[10]；外部环境因素中，课程设计合理性为关键诱因，实践性强、内容新颖的课程更具吸引力[11]，校园劳动氛围借群体规范与示范效应影响态度，积极氛围可强化参与意愿，家庭引导、政策支持等社会支持为参与行为提供外部保障[12]。

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视角分散，多聚焦单一或少数变量独立影响，缺乏多因素组合效应的系统探讨；二是方法单一，以线性分析为主，难以揭示复杂因果关系；三是缺乏系统性理论框架，对内外因协同机制阐释不足。基于上述缺口，本研究以归因理论为基础，从内外因双重视角选取 6 个关键条件变量，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系统探讨多重前因条件对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为高校优化劳动教育体系、提升育人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研究框架

根据归因理论，个体行为是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现有研究，本研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选取 6 个核心前因条件。

在个体内部因素方面，劳动价值观是学生对劳动本质、价值的根本看法，是参与劳动教育的认知基础，直接影响参与意愿的强弱；自我效能感反映学生对自身劳动能力的信心，高自我效能感能降低参与顾虑，强化参与意愿；参与动机是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内在驱动力，明确的动机能激发主动参与行为。因此，选取劳动价值观、自我效能感、参与动机作为内因要素。

在外部环境因素方面，课程设计合理性直接影响劳动教育的吸引力，内容实用、形式多样的课程能提升参与意愿；校园劳动氛围通过群体影响塑造学生态度，弥漫劳动文化的校园环境能潜移默化地强化参与倾向；社会支持包括家庭鼓励、政策保障等，为学生参与劳动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因此，选取课程设计合理性、校园劳动氛围、社会支持力度作为外因要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fsQCA 分析方法，原因如下：fsQCA 适用于多因素协同的复杂因果分析[13]，可识别多组态路径，契合本研究内外因组合效应探究需求，且其支持连续型数据与大样本研究，本研究 302 份样本符合应用条件；fsQCA 的组态分析可以有效缓解传统相关分析中固有的内生性、传统假设检验中的抽样偏差以及数据转换过程中的信息丢失的问题，能够全面揭示影响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复杂形成机制。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安徽省多所高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研法收集数据。发放问卷 380 份，剔除甄别未通过、答题时长不足 120 秒及填写错误等无效问卷后，获有效问卷 3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79.5%。样本涵盖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及学校类型，以本科生为主，具有广泛性与代表性。

（三）变量测量

本研究基于成熟量表设计问卷，结合劳动教育场景进行适当调整，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计分，测量关键变量，即劳动教育参与意愿、劳动价值观、自我效能感、参与动机、课程设计合理性、校园劳动氛围、社会支持力度。

（四）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以 SPSS 检验信度，各变量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7，量表信度良好；经 AMOS 做验证性因子分析，七因子模型拟合度最优，各项适配指标均达标，且变量因子载荷在 0.69~0.85 之间，AVE 均大于 0.5、CR 均大于 0.7，数据效度良好。

三、数据分析

（一）变量校准

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参考已有研究[14]，以 95%、50%、5% 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同时，将数值为 0.5 的数据修改为 0.501，确保校准后数据的有效性。

（二）必要条件分析

使用 fsQCA 3.0 软件对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单个前因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表 1 显示，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数值均小于 0.9，表明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单独驱动。

表 1 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高参与意愿		非高参与意愿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课程设计合理性	0.68	0.73	0.59	0.56
~ 课程设计合理性	0.61	0.62	0.71	0.65
校园劳动氛围	0.72	0.76	0.57	0.55
~ 校园劳动氛围	0.58	0.61	0.73	0.7
社会支持力度	0.7	0.74	0.56	0.54
~ 社会支持力度	0.57	0.6	0.74	0.71
劳动价值观	0.75	0.77	0.6	0.55
~ 劳动价值观	0.59	0.63	0.62	0.6
自我效能感	0.67	0.72	0.58	0.57
~ 自我效能感	0.6	0.61	0.72	0.67
参与动机	0.77	0.78	0.62	0.56
~ 参与动机	0.58	0.6	0.75	0.69

注：~ 表示逻辑非。

（三）组态分析

参考相关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 0.8，PRI 一致性阈值设为 0.70，案例频数阈值设为 2，进行组态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

表 2 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参与意愿			
	H_1	H_2	H_3	H_4
课程设计合理性	●	⊗	●	●
校园劳动氛围	●	●	●	
社会支持力度	⊗	●	●	●
劳动价值观	⊗	⊗	⊗	⊗
自我效能感	●	·		·
参与动机	●	●	●	●
一致性	0.935	0.931	0.948	0.917
原始覆盖度	0.332	0.389	0.271	0.356
唯一覆盖度	0.025	0.089	0.026	0.115
总体覆盖度	0.553			
总体一致性	0.905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研究发现，导致大学生高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组态路径共有 4 条，各组态一致性均高于 0.9，总体一致性为 0.905，总体覆盖度为 0.553，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这些组态能有效解释高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

组态 H_1（课程—内因驱动型）：以高课程设计合理性、高自我效能感、高参与动机为核心条件。这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实用、形式新颖，能有效吸引其参与；同时，他们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明确的参与动机，相信自己能通过劳动教育获得成长，因此主动参与意愿强烈。

组态 H_2（氛围—动机驱动型）：以浓厚校园劳动氛围、高社会支持力度、高自我效能感、高参与动机为核心条件。这类大学生所处的校园重视劳动教育，经常组织劳动实践活动，同学间形成崇尚劳动的良好风气；同时，家庭和社会给予积极支持，自身具有明确的参与动机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高参与意愿。

组态 H_3（外因驱动型）：以高课程设计合理性、高校园劳动氛围、高社会支持力度、高参与动机为核心条件。这一组态表明，即使学生劳动价值观不够成熟，但若外部环境提供充足支持，仍能激发高参与意愿。这类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优势明显，课程有吸引力、校园氛围积极、社会支持充足，参与动机明确，外部推力弥补了内部认知的不足。

组态 H_4（内外因协同型）：以高课程设计合理性、高社会支持力度、高参与动机为核心条件。该组态体现了内外因的协同作用，即使劳动价值观不够成熟，但在优质课程、充足社会支持的外部条件与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明确参与动机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仍能形成高参与意愿。该组态体现了内外因的协同作用，即使劳动价值观不够成熟，但在优质课程、充足社会支持的外部条件与高自我效能感、明确参与动机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仍能形成高参与意愿。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构建大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意愿前因组态框架，采用两阶段问卷调研法收集 302 份样本，运用 fsQCA 方法，从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分析影响参与意愿的组合路径，得出如下结论。

1. 单一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构成大学生劳动教育高参与意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劳动教育参与意愿是劳动价值观、课程设计合理性等 6 个因素协同联动、交互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这验证了多因素协同影响的重要性。

2. 劳动教育参与意愿的形成存在 4 条路径：课程—内因驱动型、氛围—动机驱动型、外因驱动型和内外因协同型。参与动机在所有路径中均以核心条件出现，是影响参与意愿的核心要素；课程设计合理性、校园劳动氛围等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关键作用，表明外部环境和内部特质的组合具有多样性。

（二）对策建议

1. 强化参与动机激发，塑造正确劳动价值观。参与动机是高参与意愿的核心要素，劳动价值观是重要导向。高校应加强劳动教育宣传，明确劳动教育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通过案例教学、劳动模范进校园等形式，纠正大学生错误的劳动认知，塑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正确价值观。

2. 优化课程设计，提升劳动教育吸引力。课程设计合理性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高校应改革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内容上贴近生活实际和专业需求，增加实用劳动技能培训；形式上采用项目式教学、实践体验等多样化方法；实践环节上加强校企合作，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提升课程吸引力和教育实效。

3. 营造良好氛围，完善社会支持体系。校园劳动氛围和社会支持是重要的外部保障。高校应重视劳动教育，定期组织劳动实践活动，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氛围；加强与家庭、社会的协同，引导家长鼓励学生参与劳动，争取社会支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参考文献

[1] 郝志军，郑红娜．五育融合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J]. 人民教育，2025(22): 6−10.

[2] 乔丹，李忠．劳动教育驱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优化的路径研究 [J]. 教学与管理，2026(03): 18−23.

[3] 张琳，李辉．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 41(10): 99−105.

[4] 陈明霞．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究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 161−169, 172.

[5] GUI R.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J]. Frontier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 4(06): 999.

[6] ZHANG W, LI D.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4, 7(01): 45−51.

[7]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Oxford: Psychology Press, 2013.

[8] 史海霞，王超柱．高校劳动教育实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学生视角的实证分析 [J]. 教育科学，2025, 41(04): 90−96.

[9] 徐新华．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的同构共生研究 [J]. 江苏高教，2024(10): 107−112.

[10] SIQIAO W. An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llege labo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Whole Education” [J]. Highe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024, 1(09): 51−54.

[11] 郭甜甜，张菁，孙懿宏．我国基础教育课堂形态变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J]. 当代教育论坛，2024(05): 66−73.

[12] 吴潜涛，刘露．劳动教育一体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J]. 思想政治课教学，2025(12):13−16.

[1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管理世界，2017(06): 155−167.

[14] 吴大伟，赵宇翔．工作情境下数字（下转 264 页）

高校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及影响因素探析

郑思佳 赵 帅*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教育部第 43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界定了新时代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要求，各地高校逐步完善的职前培训体系，充分彰显了国家与社会对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核心学科，是辅导员职前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对提升辅导员育人能力、优化工作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探析高校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状况及核心影响因素，旨在为高校精准设计职前教育方案、强化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认知状况；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阶段，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得大学生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显著特征，对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与此同时，伴随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出现了学生规模逐渐扩大、群体结构趋于多元等新变化。此外，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教育模式形成强烈冲击，进一步拓展了辅导员的工作边界，加剧了工作任务的复杂性与实施难度。在此背景下，帮助学生辨别信息真伪、建立正确的价值认知体系，成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面临的核心工作挑战。教育社会学以独特的宏观视角，聚焦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等深层成因，其形成的系统知识体系能够为辅导员破解工作难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厘清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逻辑，剖析影响认知形成的关键因素，对推动辅导员队伍从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型、提升高等教育育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社会学知识对高校辅导员的核心价值

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以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与科学研究方法为核心工具，深度探究教育现象产生、发展的社会根源，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维度。作为高校辅导员职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对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该知识体系能够帮助辅导员突破“就学生论学生”的认知局限，引导其从社会结构、文化传递、教育公平等宏观视角切入，精准把握学生思想行为问题的深层成因，进而针对不同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帮扶服务。另一方面，教育社会学知识能够为辅导员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助力其实现从经验化管理向专业化育人的转型，通过结合社会发展趋势为学生提供前瞻性的成长指导，有效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与针对性，更好地契合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1]。

二、高校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维度

教育社会学包含的多元学习理论与职业发展理论，为辅导员开展精准化的学业与职业指导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支撑。在学业指导场景中，辅导员可依托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摒弃传统的被动灌输式指导模式，引导学生

（上接 263 页）

囤积行为影响机理的组态研究——基于两步 fsQCA 方法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25, 48(06): 1−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池州学院 2025 年度校级科学研究项目“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高校劳动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索”（CZ2025DJ01）；池州学院 2025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构建与实践研究”（2025XJYXM27）。

（作者单位：池州学院体育学院）

主动参与知识建构过程，通过设计问题导向学习、项目式学习等多元任务，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在职业指导环节，辅导员能够结合社会产业发展趋势，依托职业发展理论，通过组织专题讲座、邀请行业专家与校友分享经验、对接实习实践资源等多样化方式，帮助学生清晰认知就业市场现状与职业发展路径，明确自身职业定位，切实提升就业竞争力[2]。

（一）助力精准开展学业与职业指导

教育社会学中的个体差异理论，深刻揭示了学生在认知特征、学习能力、兴趣潜能等方面的多元差异，为辅导员实施因材施教提供了科学依据。辅导员可借鉴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突破传统以学业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局限，全面识别不同学生的优势与短板，制定差异化的培育方案。具体而言，辅导员需要全面了解每一名学生的优势和劣势，精准施策。为学业优异、具备科研潜力的学生对接挑战性课程与科研项目资源；为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组建互助学习小组、提供针对性辅导；为具备艺术、体育等特殊天赋的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助力其充分释放自身潜能，实现个性化发展。

（二）支撑因材施教与个性化培育

教育社会学强调人的多元智能的协调发展，然而当前单一化的教育评价制度限制了学生多元智能的开发。“唯考试论”“唯分数论”的观念仍然是中国教育难以回避的话题，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每个人都至少具备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音乐智力、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关系智力和内省智力。后来，加德纳又添加了自然智力，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方式开发大脑的资源。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在面对即将成年和刚刚成年的大学生时，要认识到学生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因材施教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真正落实到教育教学实践中[3]。

（三）推动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落地

教育社会学的整体教育理论，与高校倡导的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理念高度契合，为素质教育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素质教育是根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旨在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其核心就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目前，我国仍在大力推动素质教育落地，然而在教育社会学背景下，我国的素质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教育机会不均等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尤为突出。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的学生由于地域的优势和城市的发展，能够天然地享受更先进更国际化的教育。而偏远山区的学生由于地域的劣势和信息的闭塞，所获得的教育资源也相对匮乏和落后。换句话说，即使在同样的地区和城市，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从而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要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给予关心、鼓励和帮助。例如，鼓励从小接受双语教学的同学积极参加外研社杯等英语类的竞赛；为山区的学生提供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帮助其申请助学金等。此外，辅导员以整体教育理论为指引，将育人工作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通过精心组织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学术交流、社会实践调研等多元化活动，为学生搭建实践育人平台。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锤炼创新精神、提升实践能力，同时强化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担当，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三、高校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认知的影响因素

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受专业背景、工作经验、学习意识与能力、职前培训体系四大核心因素的综合作用与深度影响。这四大因素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分别构成了认知形成的先天基础、实践驱动、内在动力与外部保障，协同塑造了辅导员对该知识价值的完整认知形态。

（一）专业背景：认知基础的先天差异

辅导员专业背景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其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认知的先天差异。具备教育学、社会学及相关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因前期积累了扎实理论基础与思维训练，可快速精准把握教育社会学核心概念与逻辑，实现理论与学生工作实践的自然衔接，深刻认知其应用价值。而理工科背景辅导员则因长期接受逻辑化、实证化训练，人文社科知识储备薄弱，初期接触教育社会学知识时易因理论抽象难懂而认知模糊，处理学生问题更倾向于直接干预，忽视深层社会文化因素。但该差异可通过系统培训、主动学习与实践突破，理工科背景辅导员可结合自身数据分析优势与“学生群体与个体发展”理论，精准识别学生需求，制定科学学业指导方案，实现理论与专业优势的互补增效[4]。

（二）工作经验：认知深化的实践驱动

工作经验的丰富度与实践场景的积累程度，对辅导员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有着直接影响。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在长期的工作中接触到的各种学生问题以及教育情境，使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社会学知识的重要性。这种在实践中的困惑与反思，促使他们主动寻求理论知识支撑，进而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产生更深刻的认知。例如，在处理学生群体内部的冲突时，部分辅导员发现单纯处理表面问题的效果并不好，甚至会加剧冲突。因此，他们运用教育社会学中的“社会互动理论”，研究分析互动模式、权力结构以及成员文化不同等问题，找到冲突的根源，通过组织交流活动引导学生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需要，最终妥善处理冲突。由此可见，教育社会学知识可以为处理复杂的学生

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而新入职辅导员因工作时间短、工作经验不足，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往往依靠传统方法或者个人的直觉，很少主动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例如，在处理学生人际关系问题时，新任辅导员可能仅进行简单调解，而未能深入考虑潜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学生群体特征。他们通常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体会到教育社会学知识的价值。此时才会开始主动学习并尝试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以更好地理解与处理学生的问题。

（三）学习意识与能力：认知提升的内在动力

学习意识与能力是辅导员认知并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的核心内驱动力。具有强烈学习意识和较强学习能力的辅导员会更加主动，能够清晰地感知自身与工作要求的差距，会积极参与各种培训课程、学术研讨会和讲座，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精准挖掘教育社会学知识的实践价值并将其转化应用。例如，有辅导员在参加一次教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后深受启发，并将所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应用到优化学生评定工作中，综合考虑了学业成绩、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努力等多种因素，提升了评定工作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具备出色学习能力的辅导员可以很快掌握教育社会学知识并将其与工作相结合，能用理论知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精准对接学生工作的各个环节。比如在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过程中，有学习能力的辅导员可以运用“社会化理论”剖析学生心理问题的社会性原因，并通过团体辅导、个性化帮扶等方式，帮助学生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实现源头治理。反之，学习意识薄弱的辅导员，往往将目标定位于完成日常工作，缺乏主动学习动力，对教育社会学知识持“被动接受”甚至“排斥”态度，难以主动挖掘知识的实践价值，更无法实现有效转化，对知识价值的认知始终停留在表面层面，无法发挥理论对工作的支撑作用[5]。

（四）职前培训体系：认知塑造的外部保障

高校辅导员职前培训体系是引导其正确认知、系统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的关键外部保障，体系完备程度直接决定认知的起点与深度。部分高校高度重视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将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知识、研究方法及工作案例等内容纳入培训内容，通过专家授课、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环节设置、多元化教学模式及综合评价机制，保障学习效果，推动辅导员更好地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在培训体系完善的高校，多数辅导员会主动运用教育社会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用“社会互动理论”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等，普遍认可其对提升工作效率、优化育人效果的价值。而培训体系缺失或不完善的高校，其辅导员往往认为教育社会学知识难以应用于实践，对其价值的认识程度也相对较低。这一对比充分证明，系统完善的职前培训体系是辅导员认知知识价值、提升应用能力的关键，对推动队伍专业化发展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教育社会学知识对高校辅导员开展精准化学业指导、个性化培育、就业帮扶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辅导员对其价值的认知核心聚焦于理论知识对实际工作的支撑作用。而专业背景、工作经验、学习意识与能力、职前培训体系四大因素，从先天基础、实践驱动、内在动力、外部保障四个维度，共同影响着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认知的形成与深化过程，四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当前，学界关于教育社会学知识与辅导员工作的关联性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多为经验性探讨或一般性论述，缺乏基于大样本调研的系统性、实证性研究，对认知形成的内在机制、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需求的不断增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要求愈发迫切，未来亟须加强相关实证研究。建议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追踪等多种研究方法，扩大调研样本范围，精准把握不同类型辅导员对教育社会学知识价值的认知规律与差异特征，深入剖析影响认知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关键节点。在此基础上，高校应结合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优化辅导员职前培训体系，根据辅导员的专业背景、工作经验差异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搭建常态化学习交流平台，如建立理论学习小组、开展工作案例研讨、组织跨校交流活动等，持续激发辅导员的学习意识与创新思维，推动教育社会学知识与学生工作深度融合，助力辅导员队伍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为提升高等教育育人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赵洪萍 .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论迈向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8(02): 53−70.

[2] 朱以财 , 江南 , 丁夏芸 . 教育社会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 为何、可为与何为 [J]. 教育探索 , 2023(12): 1−5.

[3] 岳泊帆 . 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解读——评《教育社会学 (第三版)》[J]. 中国教育学刊 , 2024(11): 122.

[4] 李晓萱 , 程天君 . 再制与超越 : 教育社会学“文化再生产”研究前沿比较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 2025, 46(03): 28−36.

[5] 杨丽佳 . 从社会学视角探析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现象 [J]. 贵州教育 , 2022(06): 18−21.

（作者：郑思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通信作者赵帅，沈阳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效果评估

师昊华 刘茂盛 陈光英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大学生就业焦虑在认知、情绪、行为及社会支持层面的核心表现，深入剖析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大学生就业焦虑的作用机制，并从情绪状态、认知模式、行为表现与社会支持四个维度，综合评估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效果。研究发现，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有效识别并修正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偏差，调节负面情绪，转化消极就业行为，提升社会支持感知与利用能力，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促进其顺利就业提供科学有效的干预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焦虑；认知行为疗法；干预机制；效果评估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就业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不少大学生面临着就业焦虑的困扰。这种焦虑不仅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还对其求职行动和职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探索有效的干预方法，帮助大学生缓解就业焦虑，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认知行为疗法，以认知为起点，帮助大学生重建认知结构，更加理性地评价自己、他人、事件。改变大学生的不良认知，从而进一步改善不良情绪和行为，增强自信，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过科学评估认知行为疗法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干预效果，能够深入了解其作用机制和实际成效，为改善大学生就业焦虑状况提供实证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大学生就业焦虑的核心表现

（一）认知层面：就业认知偏差普遍存在

大学生在就业认知层面的偏差呈现多维度且普遍化特征，主要体现为对就业市场规律的理解和现实存在偏差，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评估缺乏客观理性。多数学生过度放大就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把部分地区或特定行业的就业困境，不精准地扩大到整个就业环境中，进而产生对未来就业形势的焦虑。在自我认知层面，要么无视自身专业积累与实践经验的价值，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沼；要么过度自信，设定超出自身能力的就业目标，造成对就业机会的误判，进一步加剧了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

（二）情绪层面：负面情绪体验强烈且持久

从情绪类型来看，焦虑情绪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对求职结果的过度忧虑，进而引发身心紧张、焦躁等反应。这种焦虑并非只在求职关键阶段集中爆发，而是随时间推移，慢慢渗透进日常学习与生活，导致学生注意力涣散，睡眠质量显著下滑。除焦虑外，抑郁情绪也较为常见。学生若多次求职碰壁，或长时间求职无果，易滋生自我否定的心理，伴有情绪低迷、动力不足等情况，且难以在短期内凭借自身调节改善。此外，部分学生将就业压力归咎于外部因素，对就业环境感到不满而产生愤怒情绪，久之会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

（三）行为层面：就业行为模式消极且低效

就业准备、求职行动及挫折应对行为反应，这三个维度集中体现了大学生就业行为的消极性与低效性。就业准备阶段，不少学生职业规划模糊，收集就业信息时态度敷衍，途径单一。他们多局限于学校就业指导部门提供的信息，未充分挖掘企业官网、行业报告、职场人脉等资源，对岗位需求与行业走向了解匮乏。求职行动阶段，拖延与盲目投简历问题突出，因怕失败错失机会，陷入恶性循环，简历投放无针对性，面试成功率低[1]。在挫折应对上，多数学生无有效应对之策，面试失败后不反思，反而回避后续机会，难以提升求职效率。

（四）社会支持层面：支持感知不足与利用度低

对不同类型支持资源的认知和使用情况，反映了大学生对社会支持方面的感知与利用程度的不足。在情感支持方面，学生虽清楚家人、朋友能给予情感慰藉，但在就业压力之下，因害怕被否定、怕给他人增添负担，常不愿主动吐露内心焦虑，导致难以有效获取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上，学生对学校、企业等发布的就业信息利用情况不充分，仍依赖传统求职途径，信息获取受限，求职成效欠佳。在实际支持方面，学生对学校职业咨询、企业实习等资源利用率不高，致使就业压力难以缓解，焦虑之感日益加剧。

二、认知行为疗法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干预机制

（一）识别自动思维，打破认知偏差循环

认知行为疗法在干预大学生就业焦虑时，精准识别自动思维是首要任务，也是打破认知偏差循环的关键环节。自动思维是大学生处于就业情境中，潜意识里瞬间闪现的念头。这些念头往往与就业认知偏差相互交织，且个体难以通过自我反思察觉，进而长期、深刻地影响其认知判断与情绪反应。干预过程中，教师会引领学生运用结构化自我观察与记录手段，深度探寻就业场景中瞬时浮现的自动思维，例如求职受挫后随即产生的消极想法。随后，教师助力学生对这些思维加以系统梳理与深度剖析，明确想法与现实的界限，挖掘其中隐匿的认知偏差，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想象等类型。经过多次针对性训练，可提升学生对自身自动思维的感知力，迅速察觉并中止基于认知偏差的思维活动，打破认知偏差与焦虑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为后续认知层面的改善筑牢根基。

（二）重构合理认知，建立积极就业信念

完成自动思维识别后，认知行为疗法借认知重构帮助大学生建立合理就业认知与积极就业信念。具体实施中，教师采用苏格拉底式提问等专业手段，引导学生主动批判性审视自身有偏差的就业认知，而非机械接受引导[2]。若发现学生对就业市场规律理解不足，或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存在偏差，教师会与学生开展全面深入的交流。交流时始终以客观事实为判断依据，凭严谨逻辑展开分析，逐步修正认知层面的错误与偏差。例如，部分学生过度强调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教师会引导他们剖析不同行业、地区的就业数据，帮助学生从客观视角把握就业市场整体状况，准确认识自身优势。同时，教师协助学生搭建符合实际的就业认知框架，具体要引导学生做好职业方向规划、客观评判自身能力水平，同时帮助其妥善处理就业中的挫折问题。经过长期认知调适与针对性实践训练，助力学生逐步纠正认知偏差，树立积极理性的就业观念，切实减轻就业焦虑。

（三）训练应对行为，提升就业适应能力

认知行为疗法缓解就业焦虑时，行为训练的支撑价值需重点强调。设计针对性应对行为训练方案，能切实提升学生就业适应能力。就业准备阶段，教师需履行引导职责，指导学生开展系统性职业规划，实现职业目标精准定位。同时，教师应传授多元就业信息搜集路径，拓宽信息渠道，注重培养学生筛选、深度分析就业信息的能力，改善过往信息搜集粗放、渠道单一的问题。求职实施阶段，针对部分学生拖延、盲目投递简历现象，教师需协助制定详细可操作的求职计划，明确时间节点与任务要求，保障求职有序推进。以行为强化为依托，引导学生按预设规划推进求职各环节，结合目标岗位能力要求与职责特点，协助优化简历，提升投递适配度[3]。学生求职受挫时，帮助其树立积极应对意识，及时分析面试失败的关键原因，总结经验、调整策略，避免再次错失就业机会。系统训练可推动就业行为模式转向高效，切实增强就业适应能力与岗位竞争力。

（四）调节情绪反应，增强社会支持感知

认知行为疗法借助多元技术调节学生就业相关情绪反应，同时提升学生感知社会支持的能力，最终实现就业焦虑缓解。在情绪调节层面，以情绪识别与表达技巧作为教学核心。通过教学活动，学生可精准捕捉求职期自身情绪波动，焦虑、消沉、烦闷等负面情绪出现时，能及时察觉并通过恰当途径宣泄，避免情绪持续累积恶化。放松训练在情绪调节中亦起到关键作用，教师可指导学生开展深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实操训练，帮助学生平复情绪，减轻就业焦虑实际影响[4]。就业压力冲击下，学生需及时做好身心调适，才能切实减轻焦虑情绪。在强化社会支持感知环节，应引导学生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评判社会支持资源的实际价值，扭转因担心被否定、怕给他人增添负担而不愿求助的固有认知。借助角色扮演、社交技能训练等多样活动，提升学生主动求助的意识与能力，促使其与亲友深入探讨就业问题，充分挖掘并运用各类可用资源，最终实现就业焦虑的有效缓解。

三、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大学生就业焦虑的效果评估

为科学验证认知行为疗法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干预效果，研究特设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的对照框架。选取存在明显就业焦虑症状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接受为期八周的认知行为疗法，对照组则维持常态。通过量表、深度访谈及行为观察，从情绪、认知、行为、社会支持四个方面，深度分析干预前后的数据，客观评估其效用。

（一）情绪状态：就业焦虑水平显著降低

干预后，依据量表测评结果分析，实验组学生就业焦虑整体得分较干预前显著降低，下降趋势明显。与对照组相比较，其降幅更为显著。学生对求职结果的过度忧虑大幅缓解，不再频繁被“求职碰壁担忧”“面试失利惧怕”等负面思绪困扰[5]。在平日学习生活里，因就业压力引发的身心紧绷、烦躁不安状态明显减轻。先前注意力涣散、学习成效欠佳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善，睡眠状况也大幅改善，夜间失眠、多梦等与焦虑相关的睡眠问题显著减少。

对抑郁情绪展开的深度调研评估表明，因求职受阻而自我贬低、情绪萎靡的学生占比大幅下降。调研中，多数学生提及，在干预举措实施期间，通过学习深呼吸放松、记录情绪日记等调节手段，能在负面情绪初现之时就加以处理，成功阻断“焦虑—抑郁”的恶化链条。不仅如此，学生对就业状况的抵触情绪明显降低，不再简单地把就业压力全归咎于外界因素，对就业压

力的承受力显著增强，能以更沉稳的姿态应对岗位调整、招聘延迟等就业过程中的各类变动。

（二）认知模式：负面认知偏差明显改善

在认知层面，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认知偏差评估量表分析发现，实验组学生就业认知偏差有了明显积极的变化。干预前，许多学生陷入对就业市场过度宽泛的认知误区，轻易断言“所有行业求职都难如登天”“自身毫无竞争优势”。干预后，这类错误认知大幅降低。学生开始主动探究不同行业、地域的就业实情，依据具体案例与确切信息，客观分析就业市场的复杂状况，不再将局部难题，比如热门行业的激烈竞争，扩大到整体就业局面，逐步形成“各行业机遇不同”的理性认知。

在自我认知方面，过往学生群体中常见的自我否定与过度自负情形已大幅改善。以往部分学生无视自身专业积累与实践成效，妄自菲薄称“毫无专长”；或高估自身能力，定下不切实际的就业目标[6]。经专业指导，多数学生能以客观、审慎之态，剖析自身优势劣势，系统梳理学业与实践所得，合理规划适配个人能力的职业方向。如此，既规避了目标过高带来的挫败感，又防止了目标过低导致的自我价值感降低，且对求职失利归因更务实，有效阻断了负面认知与焦虑的交互作用。

（三）行为表现：消极就业行为得到有效转化

从就业行为表现来看，实验组学生消极就业情况显著改善，就业主动性与实际成效提升趋势清晰。就业准备阶段，曾受职业规划模糊、方向不明困扰的学生逐渐减少。多数学生能结合专业偏好与职业长远规划，精心制定阶段性职业计划，明确短、中期就业目标。信息收集环节，学生不再局限于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主动探索企业官网等多元途径，扩大了信息收集范围，提升了精准度，对目标岗位与行业的认知加深。

在求职行动阶段，学生拖延求职的现象明显改善，不再以“准备不足”“等待时机”等借口拖延。他们精心规划求职路径，明确简历投递与面试准备的时间节点并付诸实践。投递时有的放矢，依岗位特性调整简历，突出匹配能力，获邀面试概率大增。面对求职挫折，学生不再一味回避，未因单次面试失利就错失后续机会。多数学生在面试结束后会主动反思，查摆答题逻辑、礼仪等方面的不足，据此调整策略，提升特定问题应对能力后继续求职，就业韧性增强。

（四）社会支持：支持感知与利用能力双维提升

实验组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及利用能力有了显著进步。情感支持层面，以往因担忧“被否定”、顾虑“给他人添麻烦”，而对就业焦虑闭口不谈的学生数量大幅降低。不少学生曾忧虑亲友难以体察自身压力，又怕负面情绪波及他人，于是独自隐忍。当下，学生态度逐渐转变，主动与亲友交流求职情绪，如讲述面试后的惶惑、求职失利后的懊丧，情感支持获取与满意程度显著提高。

在信息支持方面，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所公布的招聘资讯、企业宣讲会消息等资源的运用成效显著增强。学生不再被动等待信息推送上门，而是主动探寻平台新变化，踊跃参与契合个人职业发展方向的招聘活动，持续开拓信息获取路径，以搜索更精准优质的求职信息。在实际支持层面，学生对学校职业咨询服务的重视程度持续加深，关注度不断提高。学生常主动预约，围绕职业蓝图设计、简历深度润色、面试实战技巧等，认真向专业教师请教意见。参与实习与培训的积极性也大幅提升，借实习增阅历、强技能，靠培训补弱项。

四、结语

大学生就业焦虑问题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稳定，有效干预至关重要。认知行为疗法凭借其科学系统的干预机制，在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方面展现出显著成效，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改善情绪状态、纠正认知偏差，还可促使其就业行为更加积极高效，提升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与利用能力。未来，可进一步优化干预方案，扩大应用范围，结合数字化技术提升干预便捷性与针对性，为更多大学生缓解就业焦虑、实现顺利就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白雪 . 认知行为疗法介入大学生就业焦虑实务研究——以 N 校“驱散焦虑，自我成长”小组为例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5.

[2] 刘云 , 韩东伯 , 宫文迪 .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应对策略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5(03): 41−44.

[3] 吴彩霞 . 认知行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危机中的靶向干预研究 [J]. 甘肃教育研究 , 2025(20): 31−34.

[4] 吴静 . 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构建基于循证理论的认知行为疗法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3(03): 155−160.

[5] 苏星 . 认知行为疗法对“内卷”环境下高校本科生毕业季焦虑心理调适的小组干预研究 [D]. 南京 : 南京理工大学 , 2023.

[6] 徐贺 . 大学生就业期待对择业焦虑的影响研究——以上行社会比较为中介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5.

（作者：师昊华，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初级教师；刘茂盛，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讲师；陈光英，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全科医学主任医师）

中学生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情绪知觉的中介作用

解　卉

摘要：目的：调查中学生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方法：**采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情绪知觉问卷（EAQ）和青少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量表（AICSE）对520名中学生施测。**结果：**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情绪知觉呈显著正相关（r=0.37，p<0.001），与人际交往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0.39，p<0.001）；情绪知觉与人际交往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0.57，p<0.001）；且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情绪知觉在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情绪知觉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家庭亲密度越高的个体人际交往效能感越强，通过情绪知觉能够进一步解释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人际交往效能感；情绪知觉

一、引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10~19岁青少年网民占比增至13.7%，相比2024年又增加0.7%。数字化时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学生的社交边界，但也催生了碎片化的互动交往模式，这促使教育工作者更加重视学生掌握积极正确的沟通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增强。人际交往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完成人际互动任务能力的主观信念。国外学者Connolly（1989）认为，具有较高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个体在参与社交活动时会更有自信，他们能够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且更有可能在必要时得到帮助[1]。反之，较低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也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班杜拉（1982）曾指出，若个体认为自身社交效能感水平较低，则该个体将会在社交过程中遇到更多困境[2]。

家庭亲密度是促进中学生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Cumsiell等人（1994）研究发现，较低的家庭亲密度更容易使个体产生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和社交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3]。刘海东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较低的家庭亲密度会导致个体产生社交焦虑，并间接使个体产生抑郁情绪[4]。

情绪知觉是个体对自身及他人情绪状态的感知与识别能力。在情绪知觉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中，齐建芳（2024）曾证实，良好的情绪知觉水平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建立人际关系，使人际互动更加具有灵活性[5]。此外，关于情绪知觉与家庭亲密度的研究中，王思宇等人（2021）还指出，情绪智力当中的情绪知觉与个体的家庭亲密度呈正向相关，即个体家庭亲密度越高，情绪知觉水平越高[6]。

综上所述，家庭亲密度和人际交往效能感皆为中学生成长阶段中的关键要素，且两者存在相关。与此同时，情绪知觉作为个体识别、理解自身与他人情绪信息的核心能力，在两变量之间起中介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揭示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潍坊市的3所初中与3所高中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52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08份，有效回收率为97.69%。

（二）研究工具

1. 青少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量表（AICSE）

采用刘逊等人于2004年编制的青少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量表[7]。该量表包含交往能力和交往策略两个维度，共36道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被试最终在各个维度的得分以及总分越高，表明该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

2. 家庭亲密度量表（FACES）

采用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8]。该量表包含亲密度与适应性两个分量表，本研究仅采用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共16道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最终得分越高，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1。

3. 情绪知觉问卷（EAQ）

采用赵思琦等人于2022年修订的情绪知觉问卷[9]。该问卷包含区分情绪、言语分享、不隐藏情绪、躯体意识、关注他人情绪和分析情绪 6 个维度，量表共有 24 道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问卷最终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情绪知觉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3。

（三）统计分析

采用 SPSS30.0 和 Process 插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特点

由于本研究中的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无官方常模，故根据量表计分规则计算其理论中值作为参照标准。经计算，该变量整体理论中值为 87。随之使用 SPSS30.0 对回收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本研究样本中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实测均值为 87.29（SD=0.24），相比之下略高于该变量的理论中值，表明当前中学生群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还收集了中学生的性别、年级、就读学校属性和是否担任班干部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首先，以是否担任班干部为分组变量，以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检验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担任班干部与非班干部（t=2.33，P<0.01）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差异显著。其中，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比非班干部学生更强。

以不同学校属性为因子，以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 ANOVA 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不同学校属性（F=4.06，P<0.01）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差异显著。目前来看，重点中学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最强，普通中学学生次之，私立中学学生位列最后。

此外，本研究还以不同性别为分组变量，以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检验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及以不同年级为因子，以人际交往效能感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 ANOVA 分析，但结果显示不同性别（t=1.703，P=0.089）或年级（F=2.717，P=0.058）的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差异都并不显著。

（二）中学生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中学生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和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总均分为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的数据结果显示，中学生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三者关系密切，且两两间均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情绪知觉在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以家庭亲密度的总均分为自变量，以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旨在检测中学生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情况。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9，P<0.001），即中学生的家庭亲密度越高，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越强。

此外，为证实情绪知觉是否在中学生家庭亲密度

表 1 班干部与非班干部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差异检验结果表（N=508）

	班干部 (n=161) M±SD	非班干部 (n=347) M±SD	t
总均分	3.24 ± 0.17	2.90 ± 0.22	2.33**
交往能力	3.18 ± 0.24	2.89 ± 0.27	2.25**
交往策略	3.29 ± 0.15	2.91 ± 0.18	2.39**

注：*P<0.05，**P<0.01，***P<0.001。

表 2 不同学校属性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差异检验结果表（N=508）

	重点中学 (n=148) M±SD	普通中学 (n=240) M±SD	私立中学 (n=120) M±SD	F
总均分	3.18 ± 0.25	2.99 ± 0.27	2.82 ± 0.15	4.06**
交往能力	3.13 ± 0.21	2.98 ± 0.17	2.76 ± 0.26	4.67**
交往策略	3.23 ± 0.23	3.01 ± 0.26	2.87 ± 0.19	3.55**

注：*P<0.05，**P<0.01，***P<0.001。

表 3 中学生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1	2	3
1. 家庭亲密度	–	–	–
2. 情绪知觉	0.37**	–	–
3. 人际交往效能感	0.39**	0.57**	–

注：表中数值为皮尔逊相关系数（r）；采用双侧检验，**P<0.01。

表 4 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B	SE	β
家庭亲密度	0.33	0.03	0.39***
常数项	2.13	0.12	—

注：***P<0.001。

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以家庭亲密度总均分为自变量，以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均分为因变量，以情绪知觉总均分为中介变量，运用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4 对情绪知觉的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情绪知觉在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

路径	β	Boot SE	BootLL CI	BootUL 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183	0.042	0.101	0.266	–
直接效应	0.059	0.031	0.005	0.118	32.48
中介效应	0.124	0.038	0.048	0.199	67.52

注：***P<0.001；括号内为总效应值。

图 1 情绪知觉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由表 5 和图 1 可知，当以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因变量，情绪知觉作为中介变量时，家庭亲密度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直接效应（β=0.059，SE=0.031，95%CI：[0.005，0.118]）与情绪知觉所起到的中介效应（β=0.124，SE=0.038，95%CI：[0.048，0.199]）都比较显著，且中介效应量占比为 67.52%。由此可知，情绪知觉在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起到一定中介作用。

四、讨论

（一）不同人口学变量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

本研究最终得出的数据结果显示，学生是否担任班干部与就读学校的属性会对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首先，从表 1 数据结果来看，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要强于非班干部学生，这与学者陈燕芳（2025）的研究结果一致。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往往比较活跃、自信且乐于社交，在担任班干部的过程中也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10]。因而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会受个体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双重影响。

其次，表 2 数据结果显示，重点中学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要强于其他学校学生，这与学者汪洋（2024）的研究结果相符。重点中学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且在交往过程中也常常得到积极的反馈和回应，从而有利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提升[11]。由此可知，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发展也可能与学生自身素质及学校教学理念相关。

（二）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

表 3 中的数据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家庭亲密度、情绪知觉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国内许多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高的家庭往往拥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与高质量的日常亲子互动，这有利于个体提升其情绪知觉[12]。申雨凡（2015）曾在其研究中证实，个体的情绪知觉越强，在管理与调节自身情绪、发现与识别他人情绪时也更为敏感，致使其拥有较高的人际交往效能感[13]。此外，柯治南等人（2025）也在研究中指出，高亲密度的家庭能够给予个体更多的情感支持，为个体积极地应对社交建立了心理基础，从而使个体在面对人际交往时更加自信[14]。

（三）情绪知觉对家庭亲密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表 4 数据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且表 5 和图 1 中的数据结果还说明情绪知觉在家庭亲密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这也验证了 Gross（1998）的情绪调节过程理论的核心观点[15]。亲密度较高的家庭通过民主开放的沟通交流与情感支持，让个体明晰如何正确地应对社交冲突。个体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观察与学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模式，进而对其人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五、建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是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发展的重要基础，情绪知觉则是二者间的关键桥梁。为有效提升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家庭中，家长应注重营造亲密和谐的家庭氛围，在互动中引导孩子识别、理解自身与他人情绪，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其情绪知觉水平。第二，在学校中，教师应关注不同群体学生的差异，学校与教师都要提供更多人际实践机会，不断强化学生的情绪知觉与人际交往体验。第三，学生自身可以通过观察学习、人际实践反思等方式，增强对情绪的感知与运用能力，其次也要更多地参与各类人际互动活动，以此来不断提升自身的人际交往效能感。

六、结语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数字原住民”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他们大多依赖于线上社交，线下互动能力逐渐弱化，这一现象充分显示出学生在人际方面出现的危机与面临的挑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从培育积极心理品质做起，即从提升个体的情绪知觉做起，以家庭亲密度为情感根基，筑牢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发展基石，为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长效培育提供内在心理支撑。

参考文献

[1] CONNOLLY J. Social self-efficacy （下转 273 页）

高校辅导员法治教育路径研究

张锦绣

摘要：为持续探索高校辅导员开展法治教育的有效路径，文章以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普法宣传为核心，围绕如何引导大学生从法治教育的接受者转变为传播者展开分析。研究显示，通过优化教育内容体系，围绕大学生关注的校园安全、就业权益、网络治理等热点问题，逐步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变成具象化内容；丰富教育形式载体，运用短视频创作、法治情景剧展演、校园普法直播间等新媒体载体，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法律知识内涵；构建学生参与机制，组织开展宣传和实践等一系列活动，协助学生在传播中实现自我教育的目标；强化自身队伍建设，形成完善的法治教育生态体系，在大学生整个成长阶段渗透法治精神。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法治教育；大学生法治素养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大学生理解法治精神内涵和掌握法律知识的程度，既和自身成长密切相关，还会影响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领域，高校辅导员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教育形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关乎法治教育的实践成效。因此，高校辅导员如何有效开展法治教育工作，是当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一、高校辅导员开展法治教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教育内容与学生需求相适配原则

高校辅导员在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要重视教育内容同学生实际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不断加强教育

（上接 272 页）

in adolescence: Relations with self-concept, social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J].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1989, 21(03): 258-269.

[2] BANDURA A.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2, 37(02): 122-147.

[3] CUMSIELL P E, EPSTEIN N B. Family cohesion, family adaptability,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utpatient clinic families[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4, 8(02): 202-214.

[4] 刘海东，虞芷筠，叶宝娟，等．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23, 21(04): 556-563.

[5] 齐建芳．情绪觉察能力要素探析：概念重构与四要素框架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4(14): 4-7.

[6] 王思宇，李佳铃，糜灿，等．医学生网络游戏行为对情绪智力和正念注意觉知水平的影响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 29(10): 1581-1585.

[7] 刘逊．青少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8] 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正常家庭与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对照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05): 198-202, 238.

[9] 赵思琦，张守臣，王宏．情绪知觉问卷测评中学生的效度和信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 36(07): 597-602.

[10] 陈燕芳．社会支持对高中生积极社会适应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 [D]. 广州：广州大学，2025.

[11] 汪洋．提升专门学校初中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实务研究 [D]. 昆明：云南大学，2024.

[12] 刘梦璇．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其干预研究 [D]. 合肥：合肥师范学院，2023.

[13] 申雨凡．大学生情绪智力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J]. 科教导刊，2015(07): 170-171.

[14] 柯治南，杨海波．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J]. 心理月刊，2025, 20(10): 79-82, 91.

[15] GROSS J J. 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03): 271-299.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

的吸引力。一是在法治教育层面，以讲解法律条文为基础，在回答青年学生关心现实问题的同时，使教育内容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进而产生情感层面的共鸣和思想层面的认同。二是在教育内容层面，要把法律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准则相结合，使学生真正领会法律的内在价值内涵，自觉接受法治理念的主动接受，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三是在法治教育内容层面，逐步延伸到实践场景中，让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高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使教育活动具有实效性，真正发挥出法治教育的育人作用。

（二）教育形式多元互动原则

高校辅导员在开展法治教育的时候，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和互动形式，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的要求和实践育人参与的理念。首先，法治教育要冲破单向输出的模式，创建以学生为主导的双向交流体系，支持学生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对话。其次，教育形式要充分融入到实践中，让学生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体会法律的应用逻辑，在实践锻炼的过程中，使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深度融合法治教育和学生生活实践的目标。最后，辅导员利用短视频、直播、在线互动问答等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新媒体形式，提高法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渗透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亲和力[1]。

（三）学生主体参与原则

在高校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普法宣传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教育活动的整体效果。具体来说，引导学生把普法宣传当作提升自己的重要方式，积极参与普法实践活动，使法治教育深入到思想层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倡导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目标。此外，给学生留出自主设计宣传内容和创新宣传形式的空间，在实践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同时，增强学生对法治建设的主体意识，使法治精神从个体层面向群体层面延伸。特别是一些综合类高校，同样可以利用校内法学专业资源，依托法学专业学生组建“法学社”等社团，由专业学生带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大幅提高普法的实效性。

（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原则

高校辅导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法治素养与专业水平，保证整个教育质量与成果提高的同时，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要求以及实践育人的指导性需求。一是辅导员要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了解复杂法律条文和法治精神的内涵，保证教育内容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二是辅导员要具有将法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意识、能力，在法治案例中挖掘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使教育环节更有深度。三是辅导员要灵活掌握实践场景，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并制定出合适的实践方案，推动实践育人的活动顺利开展，以此高度契合新时代高校法治教育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要求[2]。

二、高校辅导员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夯实成长成才法治根基

新时代青年成长和成才阶段，法治素养是核心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内容。在培养学生的整个过程中渗透法治教育，既能稳固青年思想方向，还能为其参与实践提供基本原则。首先，开展系统性法治教育，能引导学生在认知层面准确把握法治的精神内涵，逐步将外在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法治依据。其次，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渗透法治精神，可激励其在处理人际关系、参与集体事务、应对社会现象时，主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应尽义务，进而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最后，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具备扎实的法治素养，学生才能明辨是非、保持理性清醒。特别是通过深刻理解法治精神内涵，能够强化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既能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实现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协同进步。

（二）营造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

在高校法治教育领域，营造出高度契合思政教育和实践育人理念且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不仅能夯实学生健康成长的根基，还能促使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下成长为高质量人才。其一，通过向青年学生阐述法律权威和规则意识，可以引导学生在思想领域尊重秩序，逐步将遵守法律的规则转变成对法治价值的主动追求，从而保障校园环境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其二，在法治教育领域中实践育人理念的渗透，不仅能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还能规避校园内部违规行为，持续维护育人环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三，在法治教育环境下，通过培育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能够在校园内营造良好沟通、互相尊重的氛围，在保证学生学习和生活有序进行的同时，推动校园逐步成为法治精神培育的重要场域，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实现协同提升育人环境质量和育人价值的目标[3]。

三、高校辅导员开展法治教育的具体策略

（一）创新教育内容体系，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设计普法主题

教育内容体系的创新，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才能设计出高度适配的普法主题，这既加深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还能锻炼其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法治教育逐步由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培养层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实现协同增效的目标。

以“校园生活中的法律边界”为例，辅导员围绕学生关心的有关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普法内容展开设计工作。首先，辅导员选取一些宿舍噪声干扰、物品借用纠纷、照片随意拍摄传播等易产生矛盾的场景，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引导学生分析其中涉及的法律条文，使其认识到侵犯他人休息权利等行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

任。其次，在场景模拟环节，组织开展“宿舍矛盾调解会”活动，激励学生扮演不同角色，深刻体会在解决纠纷层面应用法律的思维逻辑。最后，在案例讨论环节，辅导员引用室友长期霸占洗衣机产生争执的真实案例，带领学生以小组形式探讨此类行为需要承担哪种法律责任，以帮助其真正理解法律法规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性。实践表明，这种主题设计方式，让学生不仅能清醒认识自身行为在法律层面的界限，还能掌握处理纠纷的合法途径，凸显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深度融合的价值。

（二）丰富教育形式载体，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互动平台

丰富教育形式载体，可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互动平台，这既能激发学生参与主动性，又能让其在互动中深化对法治精神内涵的认知，逐步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的有效衔接[4]。

以“法治青春说”系列教育活动为例，辅导员搭建了融合线上话题互动和线下情景实践的平台。在线上环节，依托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构建互动矩阵：微信公众号开设“法治微课堂”专栏，定期推送聚焦学生关注的网络诈骗防范、实习协议签订等话题的简短普法短视频，视频中增设弹幕提问、课后小测等互动功能；抖音账号发起“我的法治小故事”话题挑战，鼓励学生制作短视频分享身边法治案例，辅导员对优质作品进行专业点评，切实激发其创作和参与热情。在线下环节，组织配套的“法治情景剧工坊”实践活动，结合线上热议话题，精准锁定租房纠纷调解、校园贷陷阱规避等主题，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剧本编写和角色扮演任务。活动结束后，辅导员将优秀情景剧录像同步至线上平台，供其他同学观看学习。线上线下融合平台实施以来，既契合学生兴趣偏好，又增强了实践活动体验，便于学生在互动中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有效提升了法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构建学生参与机制，激发青年主动投身普法宣传的热情

构建完善的学生参与机制，有助于维持法治教育和实践育人的良性循环，既拓展法律教育覆盖范围，又激发青年参与普法宣传的热情，逐步强化学生主体意识，推动普法宣传从任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以“法治宣讲团”为例，辅导员搭建了涵盖选拔、培训、实践、反馈等环节的全链条学生参与机制。一是选拔环节，要求学生提交面向特定群体、包含主题设计、形式构想的普法宣传方案，辅导员联合评审小组围绕方案的针对性、创新性、可行性进行筛选。二是培训环节，邀请法学专业教师开设“法律知识精讲工作坊”，结合各小组所选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宣传方案的知识重点和易错点；采用模拟宣讲与现场点评方式，帮助学生将专业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逐步掌握运用故事化、场景化手段传递法治理念的技巧。三是实践环节，赋予各小分队自主权，要求其独立完成系列活动策划，让学生直观感知法律的保护作用。四是反馈环节，组织受众填写满意度问卷，真实反馈宣传内容的实用性和形式的吸引力；小组成员还需编写《普法实践反思报告》，总结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及知识运用的感悟。五是在第二课堂学分认证中融入参与和表现，创设“普法先锋”荣誉称号，采用激励手段深化学生的成就感和责任感。六是搭建校地联动渠道，带领学生前往社区、乡村组织开展定制化普法活动，以便青年在真实场景下切实感知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使其自身普法热情逐步由校园延伸至社会层面。可见，学生参与机制的构建，使学生在普法宣传中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在实践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有效延伸了法治教育的影响力。

（四）强化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法治教育专业指导能力

为了进一步保障高校法治教育的质量，必须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以提升其法治教育专业指导能力。换言之，采取系统化培训和专业化发展手段，打造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这样不仅能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要求，还能真正贯彻实践育人价值，促进高校法治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

以“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计划”为例，辅导员队伍构建了涵盖系统培训、实践研修、结对帮扶的能力提升体系。首先，在系统培训环节，将辅导员法律知识和教育方法作为一项必修课程，增设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解读、法治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技巧等内容，邀请高校法学教授和资深法官参与，辅导员则参照工作重点选择进阶内容，切实提高自身的个性化能力。其次，在实践研修环节，定期组织开展主题研修活动，凭借情景模拟研讨的手段，分析在学生管理中遇到的真实法律问题。并且还要求辅导员完成《法治教育实践反思日志》编写任务，其中需要涵盖经典案例的处理思维和改进方向。最后，在结对帮扶环节，为每位辅导员搭配一位匹配度较高的法学专业教师，通过定期座谈、线上咨询等形式，激励辅导员积极参与法学专业教师课题研究活动，对法律教育发展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事实证明，该培训体系实施以来，显著提升了辅导员的法治素养和指导能力，使其在日常管理中能够规范化处理学生问题的同时，还能推动法治实践活动顺利开展，进一步保障高校法治教育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青年大学生法治教育领域，高校辅导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引导角色，其中教育形式的创新，关乎未来培育青年群体法治精神的成效。展望未来，辅导员还应不断探索开展法治教育的新途径，既要满足新时代环境下高校法治教育对实践性、主体性的要求，也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融合的思维落实，最终培养出法治信仰、法治素养、法治能力并存的时代新人。 （下转 276 页）

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优化与心理育人策略探析

叶慧伶

摘要：高校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第二课堂，以环境优化、空间布局的调整、海量阅读资源的整合及阅读活动的创新，为调适心理健康打造前沿阵地。对此，本文从设置灵活多变的区域满足不同社交需求，营造积极氛围缓解学生焦虑心理，增设互动协作功能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等方面，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导向完成对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的优化，并提出从资源建设、服务协同及评估反馈等方面着手，发挥高校图书馆的心理育人功能，可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与顽强意志力，培育心理韧性。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心理育人；优化策略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高校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教育媒介，属于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传统图书馆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理论支撑不足，服务形式较单一，弱化了高校图书馆的心理育人功能。通过将积极心理学作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理论支撑，在不断优化功能布局，构建“课程 + 资源 + 环境”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的同时，有效提升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一、积极心理学概述及其应用价值

（一）理论概述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积极人格特质的形成，更多关注人情层面的理解和尊重，研究如何培养积极品质。不同于传统心理学旨在发现人们心理上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积极心理学相信人的心理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即激发人性中的积极面，发挥主体自主修复的功能。该理论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充分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心理特点和发展需求，对学生心理健康及个人成长心理状况进行干预，从积极社会环境的营造、积极主观体验的感受及潜在能力的激发等角度着手，以此来帮助学生形成正向情绪，应对社交关系处理及学业问题等，提升其心理素质水平[1]。

（二）积极心理学在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与心理育人中的导向作用

1. 优化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

积极心理学在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中的应用，可设置心理健康阅读专栏，该区域涵盖情绪管理、压力应对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书籍，丰富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能帮助学生在专门区域选择阅读。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建设还可规划出专门的心理书籍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及视听阅览室等，优化室内环境，并在室内设置安静阅读角落，或是通过环境设计等，为学生打

（上接 275 页）

参考文献

[1] 刘楠楠 . 高校辅导员提升青年法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思考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4(24): 176−178.

[2] 梁旭 , 郝传策 , 夏辰雪 , 等 . 辅导员视角下法治教育融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研究 [J]. 大学教育 , 2023(14): 16−18.

[3] 叶剑强 , 吴欣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教育管理工作法治化路径探析 [J].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 2021(02): 77−80.

[4] 郭若昕 . 高校辅导员工作法治化路径研究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 2020(14): 139−141.

[5] 张海燕 .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使命与担当——基于五种思维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J]. 西部学刊 , 2020(10): 89−92.

（作者系陕西理工大学助教）

造沉浸式心理教育空间，增强阅读体验的同时，能在阅读中调适心理。在此基础上，通过阅读专栏的设计、专项阅读区域的创设等，不断优化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让学生在特定区域内快速找到对应书籍并完成自我调适，建立起积极心理。

2. 塑造健全人格与顽强意志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学生多面临就业压力、升学压力和情感压力，难免受不良心理影响增加心理和思想上的负担，影响综合素养全面发展。这一阶段，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便显得极为关键，而高校图书馆建设，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落实心育工作，能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锤炼顽强意志力。可以开设心理素质教育必修课，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作为调节心理的理论指导，并结合图书馆资源开展实践训练等。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帮助学生建立积极情感，提升自我认知能力，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心，提高心理素质，稳定情绪，提高学生处理不良情绪的能力，能够以良好的心理素质应对即将面临的问题[2]。

二、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优化

（一）设置灵活多变区域，满足不同社交需求

分析高校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图书馆功能布局应当基于学生不同学习场景需求，设置灵活多变的功能区，在这一过程中，可采取移动隔断将特定区域划分为阅读区、学习区、交流区，能满足学生独立阅读、小组讨论等学习需求，学生可在专门区域开展多元学习行为。此外，灵活布局还能优化图书馆的空间使用率，将开放式书架与活动区相结合，在开放式书架中间设置小型阅读角，让学生在小组讨论互动的同时能够随手取书获得相应资源，为学生合作探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丰富资源支持，能满足学生小组互动讨论时的需求。另外，积极心理学导向下的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还可以以动静分区，设置安静的阅读区与讨论区，将其与活动区位置保持一定距离，如讲座厅、展览区等多功能活动区域的设置，可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区域，采用可移动隔断、可变家具，以确保灵活调整座椅的情况下能满足讲座、研讨会等小型活动开展。如此一来，高校图书馆在调研学生阅读心理和行为后，设计符合其认知特点、学习需求的不同功能区，以此来确保图书馆功能布局的创新调整，能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社交需求。

（二）营造积极氛围，缓解学生焦虑心理

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一是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学生自身的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像学习心理问题、情感心理问题、自我心理问题等，给学生造成一定困扰。而高校图书馆的建立，通过将图书馆环境及阅读氛围进行调整，以多维度环境设计带给学生良好的感官体验，能全方位地向学生传递积极心理暗示，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形成良好心理[3]。例如图书馆良好氛围的营造，除了上述的开放式与私密性空间设置外，还可根据学校特色或学科领域设置主题装饰，以环境装饰（艺术造型）、自然元素融入（绿化景观、假山流水等），激发学生情感共鸣，提升学生心理舒适度。另外，还可以在空间中融入隐性教育内容，如在图书馆的墙面、书架、阅读区等显著位置悬挂校训、名人名言等，或是打造以校训命名的阅读区域，既可以通过环境装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品格的塑造。此外，图书馆内还可设置心理健康书籍专区，精选一些和情绪管理、压力调适等相关的专业书籍，并通过暖色调灯光、舒适座椅以及隔音材料的应用，营造安全、安静的阅读环境，缓解学生的心理焦虑情绪。最后，还可设置情绪疏导互动区及“暖心驿站”，在情绪疏导互动区提供印有励志标语的解压卡片，学生可通过撕纸作画的方式缓解压力；在“暖心驿站”，学生则可以以暖心留言互动等形式，写下祝福并随机传递，这种方式能为学生提供长效情感支持，强化学生心理素质。

（三）增设互动协作功能，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

传统的图书馆建设多以单向借阅书籍为主，其功能布局的单调性导致图书馆的建设难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难以满足其复杂需求。而互动协作功能，则能支持师生远程访问、在线检索信息等，可形成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对此，高校图书馆功能布局的优化设计，可增设共享白板、讨论室等协作互动工具，学生可在讨论区利用共享白板进行课题汇报、方案设计，或是围绕学术观点进行互动交流等。各专业学生能就同一课题展开跨学科讨论，不断拓展学生创新思维领域，并用白板记录研究讨论过程，有助于促进学生间的有效互动交流，能满足学生多元社交需求[4]。另外，还可在图书馆设置专门的导师咨询室，学生可在阅读学习过程中就课程学习、论文写作、课题研究等学术问题向导师咨询，并根据导师提供的研究思路，利用高效检索工具和数据库服务获得最新文献资料。在此情形下，学生能获得从自主学习到专业辅导的连续支持，在小组互动讨论和向导师咨询过程中减少孤独感，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还可融合 AI 情感计算技术设置“情绪书库”“心境交响”等互动功能区，通过 AI 系统进行情绪状态评估，系统可根据情绪评估结果寻找与当前情绪相契合的书籍，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情感慰藉，有助于积极情绪的形成。

三、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心理育人策略

（一）建立积极心理阅读体系

积极心理学导向下，高校图书馆实施心理育人，可从资源建设方面着手，以大型藏书和电子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建立积极心理阅读体系[5]。这一过程，可整合资源设置专门的心理书籍与专题书展，

根据“情绪书库”所获得的学生情绪数据，了解现阶段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定期更新心理健康书目，以确保书籍的筛选能满足学生阅读需求。与此同时，还可构建主题藏馆，系统构建不同主题的纸质与数字资源，编制积极心理阅读推荐书目，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阅读形式，对自我情绪进行调控。如“抗逆力提升”主题阅读资源，提供与心理韧性、逆商、挫折应对与成长等相关的资源。学生检索该类型书籍，可在图书馆联机公共检索系统（OPAC）系统或微信小程序中，使用“抗逆力”“心理韧性”“逆商”“挫折应对”“韧性”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系统可根据关键词搜索展示相关书目，支持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阅读。并在图书馆读书俱乐部或线上平台分享阅读心得、读书笔记等，关注图书馆组织的主题讨论会，积极参与讨论会并与其他学生交流抗逆力提升的经验，能通过经验分享与心得体会交流，掌握适合自己的心理调适技巧，实现心理育人目的[6]。

（二）构建心理育人共同体

心理健康教育并非学校的单向教育，而是需要多方协同、系统推进，构建全员参与的教育体系，实现从单向传授到双向互动的转变。对此，高校图书馆落实心理育人教育工作，还需要从服务协同方面着手，构建“图书馆 +”心理育人共同体，需要图书馆管理员与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合作建立“转介—反馈”绿色通道。此时，图书馆管理员可根据学生借阅书情况及“情绪书库”所提供的精准数据，分析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能根据反馈，开发融入积极心理学的阅读疗愈课程。该课程主要是通过阅读活动帮助学生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可与图书馆馆员协作为学生提供具有积极引导性的书籍，并结合阅读内容开展以积极品质培养为主题的讲座，让学生在读疗法和积极心理学讲座的双向引导下，发现自身优势，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有助于学生正视挑战并实现自我调适。另外，为了提升高校图书馆服务效果，还需要培训馆员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让馆员系统学习心理学基础理论，掌握情绪管理与压力调适方法及技巧。同时，还鼓励馆员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断树立“心理导师”角色认知，能在日常图书管理过程中以尊重、信任和共情的态度服务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被接纳和理解，更愿意主动向馆员寻求帮助，从而能增强对图书馆的归属感和信任感[7]。馆员凭借自身专业性还能及时发现学生情绪低落、焦虑等心理困扰，为其推荐相关图书或进行简单疏导，能预防学生心理问题恶化，从而更好地构建全员心育体系。

（三）以多元反馈驱动持续改进

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心理育人，还需要对图书馆心育效果进行持续监测和改进，通过问卷调查、心理测评等方式，评估学生对图书馆现有心理健康服务（如讲座、咨询等）的满意度，了解学生是否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心理调适，调查图书馆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是否能满足学生需求等。对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服务满意度进行定期调查，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及心理测评结果，了解当前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心育服务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可针对心理育人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结合具体需求调整问题细节，以确保高校图书馆建设能更好地服务学生健康心理形成。例如经调查研究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反映希望学校图书馆能增加线上心理课程、心理测评等，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完善线上心理课程体系，开发涵盖心理健康基础、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在内的系统化课程。与此同时，还可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健康领域的学者进行不定期授课，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提供心理指导，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此外，校图书馆还可根据学生建议不断完善线上咨询平台，在线上平台增加实时互动、预约服务、资源库查询等功能，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在线查阅资料或互动交流，获得一手资源，能增强用户体验，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最后，还适应学生需求引入心理测评工具，如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并建立测评结果跟踪机制，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合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建议或转介服务，能帮助学生在自我评估心理健康状况的同时，使得高校图书馆教育功能最大化[8]。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积极心理学导向的高校图书馆心理育人，通过针对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实践调查，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对馆内功能布局进行不断优化，并建立起育人共同体，以多方协同合作的形式实现全员育人目标，为学生提供积极心理支持，在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同时，能帮助学生形成顽强意志力，从而更好地解决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心理辅导支持，提升学生心理素养。

参考文献

[1] 李虹 . 基于 IBSA 的高校图书馆布局优化设计 [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 2022, 39(04): 124−132.

[2] 杨晶 . 正念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心理育人服务的思考——基于 36 所 A 类“双一流”高校的调研 [J]. 情报探索 , 2024(01): 113−118.

[3] 颜伟光 . 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助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以黑龙江东方学院图书馆为例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 2021, 41(10): 42−44.

[4] 叶玲 .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高校图书馆育人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 2021, 41(04): 56−62.

[5] 尚坤 , 韩晓冬 , 雷池 , 等 . 现代高校（下转 279 页）

由孤独引发的危机：大学生心理风险演化的内在机制与预防措施

郑嘉木

摘要：本文聚焦大学生孤独情绪向心理危机转化的内在机制以及预防路径，分析了大学生孤独情绪演化为心理危机的三条主要路径：其一，负向认知循环，即个体陷入自我否定与消极归因的恶性闭环；其二，不当代偿行为，表现为网络依赖或其他成瘾行为；其三，社会支持网络瓦解，表现为因人际疏离而逐渐削弱抗逆力。据此，本文提出应从个体、群体与系统三个层面构建预防及干预体系，具体包括通过正念训练提升心理韧性、建立校园多层次反馈机制以及发展有效的朋辈支持网络，以期从源头上降低大学生心理风险，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孤独情绪；演化机制；危机干预；预防措施

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其身心发展始终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呈现出普遍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成为教育领域和公共心理健康领域的一大议题。各高校虽陆续设立专门的机制，试图通过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方式来应对问题。但这些补救性措施在实施的同时，更应关注问题产生的源头，完善预防性措施才能治本。

孤独作为一种常见的情感体验，几乎无人能完全幸免。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他们告别原有熟悉的环境，面对学业、社交等多重未知挑战，更容易陷入孤独情绪的泥沼。在较早的调查中，已经有22.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最近几天内常感到孤独[1]，而较新的数据显示，有86%的大学生正处于中高孤独情绪的状态中[2]，这实在不是一个乐观的数据，反映了高校学生共同的心理困境，也预示了他们潜在的心理危机风险。那么，大学生飙升的孤独感是否会导致他们越来越常见的心理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孤独情绪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行的预防性策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一、大学生孤独情绪

孤独，一般被阐释为一种孤单寂寞的心理状态，大多时候伴随着强烈的交往渴望，从本质来讲，孤独是个体的一种纯粹主观的体验感受，其根源在于个体对人际连接的期望与实际境况之间存在落差[3]，如果仅仅依据社交关系的广泛程度来评判孤独情绪，显然是片面且有失公允的，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个体也可能因无法获得心灵共鸣而感到孤独。这就是很多大学生虽身处集体生活，内心却依旧感到疏离与孤独的深层缘由。

依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大学生正处于“成年早期”，个体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避免被孤立后产生孤独感，在这个阶段，个体需要找寻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实现情感寄托和自我认同的延续。如果个体在这个过程中遭遇挫折，经历人际冲突或者无法融入群体，就会失去“爱的美德”，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可能在后续的人生发展中持续体验到孤独。

大学生产生孤独情绪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诱因主要源自以下几个层面。青春期

（上接278页）

图书馆规划设计重点分析 [J]. 工程建设与设计 , 2020(22): 18−19.

[6] 刘宠 , 贺建民 , 于伟 . 图书馆经典阅读助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在逻辑、价值与路径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 2025, 9(08): 125−129.

[7] 杨鲜艳 . 读者积极情绪融入高校阅读推广中的初步探索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 2021, 41(06): 54−55, 62.

[8] 李虹 . 基于 AHP−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图书馆布局优化设计 [J]. 信息技术 , 2022(01): 62−67, 74.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特有的心理发展让大学生自我意识明显提高，他们对人际交往的深度和质量有着更高期望。身处全新的生活环境、学习模式与社交圈子中，适应过程本身就充满挑战，此外新生活往往伴随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挫败感容易引发心理失衡，而且持续的学业压力与情感困扰等现实问题，也在不断消耗着他们的心理资源。不可忽视的是，个体特质作为内在基础起着关键作用，比如性格内向、自尊水平较低或者习惯回避社交的学生，其体验到孤独的风险会比同龄人高[4]。

大学生孤独情绪既源于其特定发展阶段的心理社会挑战，也受环境适应、现实压力与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了解这一情绪的来源，有助于研究该群体的特殊心理发展模式。

二、大学生孤独情绪演化为心理危机的路径分析

大学生孤独情绪作为一种常见的负性心理体验，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可能通过特定的心理行为机制逐步演化，最终导致严重的心理危机。

（一）孤独情绪积压易产生心理危机

研究显示 UCLA 孤独量表得分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抑郁、人际敏感、偏执等维度上相关性格外明显。这意味着孤独感越强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越容易出现抑郁危机，从而形成“孤独情绪—负向认知—抑郁心理—加深孤独情绪”的恶性循环。

同时，一项关于述情障碍和孤独感关系的研究发现，高孤独特质的大学生群体述情障碍得分普遍比低孤独特质的同龄人要高[5]，述情障碍指个体在识别、描述以及表达自身情绪方面存在障碍，这反映出高孤独者大多时候习惯压抑内心感受，而不是依靠合适的情感表达来释放压力或者寻求外界支持。这种表达能力的缺陷会使孤独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在内心不断积累，增加个体的心理内耗，最终使其陷入更严重的心理困境。

可见，无论孤独情绪通过何种机制演变成心理危机，其路径都包含“认知—情感”的交互影响，识别并调整孤独情绪背后的认知模式才是跳出恶性循环的关键，大学生正处在心理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帮助他们建立起对孤独情绪的理性认知，就可有效转化由此带来的情绪痛苦。

（二）不当排解孤独情绪易产生成瘾行为

当大学生体会到强烈的孤独感时，大多时候会主动寻觅各种办法来舒缓这种不良情绪，然而一旦选用了不合适的排解方式，就有可能渐渐形成依赖，最终转变为成瘾行为，在诸多成瘾行为当中，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是当下最为典型的问题。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和孤独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智能手机因其便捷特性，使大学生可轻松获取大量娱乐内容，接触到多样的社交平台，这些信息所给予的即时、浅层的快乐，可以迅速遮蔽孤独情绪，带来短暂的心理放松，而且网络世界的低准入门槛以及一定的匿名性，为在现实中社交受挫的学生提供了替代性的社交空间，使其感受到强烈的即时快感。

然而，这种快感的实质是一种“代偿性满足”，它无法真正解决孤独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习惯线上互动的大学生在面对现实人际挑战时，往往会采取不够成熟的应对策略，他们倾向于采用自责、回避和幻想等消极手段，而非积极主动地去培养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更为糟糕的是，成瘾行为与孤独情绪会形成双向的恶性循环：孤独感促使个体寻求慰藉，成瘾行为提供虚幻的满足感作为代偿，同时削弱个体应对现实的能力，而现实功能的退化会加重其孤独情绪，当这一循环不断加深，个体可能会完全陷入虚拟世界以获取情感支持，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外部的压力或挫折都可能成为触发心理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三）人际疏离导致社会支持网络崩解

据量表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支持→自尊→孤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是十分明确的。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孤独状态时，大多时候很难正确识别或者接纳外界所给予的支持性资源，甚至会对人际关系采取消极的解读方式，这种对社会支持的疏离与回避行为，会直接削减个体的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的降低又会加重孤独体验，形成一种双向强化的负面循环，低自尊的人往往对社交活动缺乏信心，在人际互动中容易预期失败或者被拒绝，从而选择主动退缩。这一路径清楚地显示，孤独情绪对社会支持网络有着持续性的侵蚀作用，它一般是从人际关系的逐渐疏离开始的，接着社交圈会不断萎缩，若不进行干预，最终可能致使支持系统出现结构性瓦解，让个体陷入孤立无援的心理困境。

现代社会的数字化交往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复杂影响。现代的网络与通信日益发达，大学生在互联网中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然而这种“连接”可能伴随着“解离”的风险，因为网络中的虚拟互动终究无法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情感支撑，故难以补足大学生在真实交往中所能获取的社会支持。有研究将这种矛盾的社交称为“孤独社交”，即个体过多地使用网络交往来满足社交需求，从而导致现实社交质量下降，人际关系淡漠，最后在数字媒体环境下产生孤独感的一种心理状态。

三、基于演化路径的预防性措施

综合上述分析，大学生群体面对着各种压力，包括但不限于生理与心理的矛盾带来的压力、竞争压力、人际关系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产生焦虑危机、失恋危机、成瘾危机、自杀危机等。为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监测反馈机制和预防介入体系；同时，还应着力于消除公众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明确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

界限区分，提高学生的求助率。此外，就大学生群体来说，应呼吁其多关注自身情绪波动，主动学习自我调节的方法，并关注身边同学的精神状态。

（一）正念增强心理韧性，实现自我赋能

正念体现的是一种觉察并接纳当下内心状态的能力，通过系统培养这种能力，个体可有效提高心理韧性，以更健康的方式缓解孤独感，实现内在力量的提升。相关问卷调查显示，正念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较少陷入反复思索的循环，同时具有较高的心理恢复能力，可较快地从负面情境中调整过来，较少受到强烈孤独情绪的困扰。因此，高校应将正念训练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通过开展正念课程，或以定期团体辅导的形式，系统培养学生的情绪觉察与自我调节能力。正念课程可采用开放式流动课堂的模式，鼓励学生自由参加，运用冥想、身体扫描等技术，指导学生减少对负面情绪的过度反应。团体辅导则采用封闭式成长小组的模式，学生在报名后定期参加，邀请专业人员加以引导，这一形式适合孤独程度较高的，甚至已经出现躯体化障碍的学生。

（二）调动大学生身边群体，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

要构建一个真正行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系统，不能仅靠单一力量，而是要充分调动大学生身边的各类群体，形成多层次、反应迅捷的观察和反馈网络。

通过班委了解学生近况，是掌握班级整体动态的重要渠道，但这并不是要求班委成为监视者，而是希望他们秉持善意去发现问题，在同学需要帮助时能够伸出援手。与此同时，辅导员、任课教师与心理咨询中心需要建立协同工作机制。辅导员负责关注学生的生活情况，与宿舍长和班委保持顺畅的联系和沟通；任课教师需留意观察学生的出勤情况和课堂表现，发现异常及时反馈；心理咨询中心则提供专业支持，对被预警的学生进行评估和及时干预。

高校需要着手构建便捷且低门槛的信息传递通道，制定各类情形下的对接流程，以此保证信息可迅速汇总并得以妥善处置，只有当这些环节准备妥当之后，预防系统方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三）建立朋辈支持网络，增强现实获得感

大学生孤独感产生的根源，大多时候不是社交机会少，而是难以寻觅到真正能理解自己、值得信赖的深度关系。高校如果主动搭建起系统化的朋辈支持网络，便可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心理孤立感。朋辈支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同龄人之间天然存在相似的语境和情感共鸣，这种平等、非权威的关系更易让学生敞开心扉。借助朋辈力量互助，学生既能得到情感上的接纳与安慰，又能在学业适应、生活信息等方面获得实用支持，在现实中重建归属感和获得感。

构建朋辈支持网络不能仅依赖热情，还需着重关注专业性、系统性以及持续性，高校在选拔人员时，应当优先选取情绪稳定、善于倾听且有责任感的学生志愿者，并针对他们展开相关专业培训，既要保证这支队伍在助人过程中能有效地支持他人，又要维持自身心理健康。朋辈支持网络拥有清晰的组织架构、明确的服务范围以及工作流程，这是体现系统性的主要标志，也意味着该体系契合管理规范并能持续发展。持续性是这一体系能否长期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高校应将其视为一项长期工作，而非短期项目，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持，鼓励朋辈支持团队进行内部传承与迭代。唯有持续运作，方能逐步营造出互相关怀、主动支持的良好校园氛围，切实帮助那些长期处于孤独中的学生走出阴影，重建有温度的现实人际关系。

四、总结与讨论

经本研究梳理可知，大学生的孤独感并非单纯的情绪波动，而是一种潜在的心理风险起点，会悄然影响其精神状态、行为模式甚至整个社交网络。这些因孤独衍生的问题大多时候相互交织，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更复杂的心理困境。对于高校来说，关注学生孤独感不应只是被动应对，更应将其视为关键的预防性工作。若在孤独情绪萌芽阶段给予充分重视和恰当引导，便有较大机会避免后续一系列更棘手的心理危机。

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主要依据某一特定时间点的调查数据以及已有的文献资料展开，要完整地还原孤独感随时间不断推移并最终对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的动态过程存在一定困难。此外，该研究没有对偶尔感到孤独的学生和长期深陷孤独状态的学生进行细致区分，也较少留意不同专业、不同性格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另外，文中所提出的预防思路大多来源于理论推导，在真实的校园情境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未来研究需进一步验证演化机制，并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差异性分析，并在实践中推动预防策略的落地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李传银 . 549 名大学生孤独心理及相关因素分析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 2000(06): 33−34, 39.

[2] 李云峰 , 帅煜朦 . 大学生网络交往和孤独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2016, 24(02): 239−243.

[3] 张琳 . 国内大学生孤独感研究进展 [J]. 心理月刊 , 2023, 18(12): 228−232.

[4] 李传银 . 大学生的孤独心理探析 [J]. 淄博师专学报 , 1998(03): 79−81.

[5] 黎兆康 , 石利娟 , 欧建君 . 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和调节与述情障碍特质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2022, 36(12): 1057−1062.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关联路径研究

宋维维

摘要：目的：探讨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的关联路径，为高职院校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参考。**方法：**于 2025 年 6 月，对 410 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某高职院校在校学生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自尊量表（SES）、社交焦虑量表进行现场调查。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采用 Amos 24.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通过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能直接预测攻击性行为，学生的自尊与社交焦虑起中介作用；消极教养方式既可直接影响，也可间接通过降低自尊、增加社交焦虑导致攻击性行为，呈机制递进关系。**结论：**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有密切关联，不同教养方式关联路径有别，三者对攻击性行为影响显著。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攻击性行为；路径分析

攻击性行为是一种攻击或伤害他人的行为，主要以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等表现形式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发生主要与家庭、环境及遗传等因素有关，国内外研究均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起着重要影响，如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包容）有利于子女培养健康的心理适应能力，而消极教养方式（如拒绝、过度保护）则可能增加子女的情绪与行为问题风险[1]。

研究表明[2]，父母如果经常体罚孩子，孩子则会用相应的方式回应他人的攻击行为，而父母对孩子提供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则对其攻击行为起到缓冲作用；同时父母较低的情感温暖及较高的过度保护和专制，会导致其子女的社交焦虑和低自尊。自尊水平的高低不但影响着个体的社交焦虑程度，还与攻击行为的发生程度密切相关[3]。社会认知模式理论认为，存在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因在社交互动中的自我负面评估、对危险情况的关注以及对自己的能力和表现的期望过低，所以在认知情境中，不清楚或模棱两可的信息往往都被当成具有挑衅性意义的信息，从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4]。

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将这些变量纳入同一路径模型、系统分析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仍较为缺乏。高职院校学生处于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期，面临学业、职业与人际多重压力，其心理行为特征更具复杂性[5]。因此，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攻击性行为为因变量、自尊与社交焦虑为中介变量的路径模型，以揭示高职学生攻击性行为的心理形成路径。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要求，2025 年 6 月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某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现场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 410 份，收回有效问卷共 380 份，有效率达到 93%。

（二）研究工具

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月收入情况。

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问卷共 25 题，由楚艳民等人验证了适合国内大学生适用的 PBI 三因素结构：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将父亲与母亲维度合为父母维度，维度总分越高表示程度越强。

3. 社交焦虑量表

调查量表是基于 Fergus 等人编制的社会焦虑和社会恐惧表格改编的中文版。表格包含 12 个问题，其中 6 个是关于衡量社会焦虑的问题。

4.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中文版，用于测量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 高分代表高自尊。本研究自尊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849 。

5. 攻击性行为问卷

采用 Buss 和 Perry 所编制的攻击性行为问卷开展调查，此问卷设置了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 4 个维度，一共包含 29 道题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攻击倾向越强。本研究攻击性行为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874。

（三）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得分的关系。使用 Amos 24.0 软件对关联路径进行建模。

二、结果

（一）不同特征高职学生攻击性行为差异性分析

对不同特征高职院校学生攻击性行为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特征高职学生攻击性行为差异性分析

项目		攻击性行为（X±s）	T/F	P
年级	一年级	57.419 ± 12.887	−3.520	<0.001
	二年级	62.439 ± 14.220		
父母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7.159 ± 12.743	3.246	0.022
	初中	61.607 ± 14.293		
	高中及中专	58.467 ± 12.378		
	大专及以上	62.900 ± 16.520		
父母月收入情况	≤ 1000	58.645 ± 13.996	0.653	0.582
	1000–2999	59.377 ± 13.422		
	3000–4999	58.395 ± 13.192		
	≥ 5000	61.053 ± 14.255		

（二）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以及攻击性行为 Pearson 相关分析

表 2 呈现了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及攻击性行为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表 2 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以及攻击性行为 Pearson 相关分析

	积极教养方式	消极教养方式	自尊	社交焦虑	攻击性行为
积极教养方式	1				
消极教养方式	−0.321***	1			
自尊	0.315***	−0.256***	1		
社交焦虑	−0.083	0.174**	−0.230***	1	
攻击性行为	−0.231***	0.333***	−0.192***	0.250***	1

注：*P<0.05，**P<0.01，***P<0.001。

（三）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

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结果如表 3 所示。以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路径关系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关系图如图 1（模型 1 与模型 2），模型拟合良好（表 4 中模型 1 与模型 2）。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P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攻击性行为	积极教养方式	−0.120	0.051	−2.337	0.020	−0.220	−0.019
	消极教养方式	0.250	0.110	4.900	0.000	0.321	0.752
	自尊	−0.048	0.181	−0.929	0.353	−0.524	0.188
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	0.186	1.020	3.813	<0.001	1.884	5.896
	消极教养方式	0.123	0.005	2.385	0.018	0.002	0.023
	自尊	−0.198	0.009	−3.854	<0.001	−0.050	−0.016
自尊	积极教养方式	0.260	0.014	5.112	<0.001	0.045	0.101
	消极教养方式	−0.173	0.031	−3.402	0.001	−0.167	−0.045

注：95%CI，95% 偏差校正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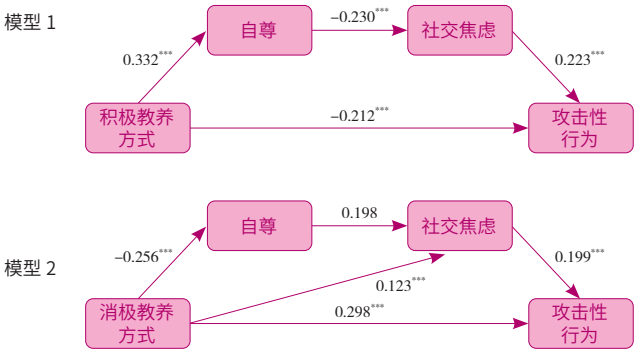


图 1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的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关系图（所有路径均为标准化的路径回归系数）

表 4 模型拟合优度指标

测试指标	相对卡方	增量拟合指数	Tucker Lewis 指数	比较拟合指数	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逼近的均方根误差
适应指标	< 3	> 0.90	> 0.90	> 0.90	< 0.08	< 0.08
模型 1	1.318	0.975	0.981	0.994	0.023	0.029
模型 2	2.460	0.979	0.920	0.987	0.019	0.062

三、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联路径。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能直接预测攻击性行为，其中高职院校学生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是其攻击性行

为的保护因素，而消极教养方式为风险因素。同时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的关联是通过自尊和社交焦虑介导的。本研究的发现为高职院校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研究结果显示，高职院校二年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得分高于高职院校一年级学生。研究发现高年级学生发生攻击性行为高于低年级学生，与本研究结论相似。可能是因为高年级学生因社会认知和情绪发展的变化，他们更容易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攻击性行为。高职院校学生父母不同文化程度与攻击性行为有关。研究发现，随着父母教育水平提高，青少年攻击行为呈阶梯式下降。例如，非西班牙裔白人青少年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攻击行为发生率越低。低教育水平父母更可能采用消极（高控制、低要求）的教养方式，使孩子表现出更多行为问题。

研究结果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直接负向预测攻击性行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直接正向预测攻击性行为[6]。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导致孩子自我认同困难、产生自我否定、增加行为偏差甚至增加攻击性行为。而积极教养方式是能有效降低攻击性行为倾向的保护因素，这种积极的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通过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和情感联结，为孩子提供了行为调节的榜样。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社交焦虑在高职院校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关于青少年自我评价与父母养育风格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当青少年感受到积极的养育，如父母的热情理解时，自我评价水平会显著提高，并具有积极的相关性；面对负面的教育，如严厉的惩罚、拒绝否认、过度的保护等，自我评价水平将大大降低，产生消极的结果。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父母接受—拒绝”理论认为，感知到父母拒绝的个体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子女难以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和积极的互动行为，子女会感到不被接受并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自尊水平降低，从而发生心理危机。低自尊的人经常质疑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自尊感到不舒服。这种消极的自我意识会使他们情绪紧张，行为更加克制，在交流过程中对他人的反应更加敏感。这种高敏感会加剧人际焦虑，推高社交焦虑水平。而自尊高的人通常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有积极的看法，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这种积极的自我意识可以增强解决问题的信心，而这反过来又会提高社交的效率。因此，虽然父母教养方式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以直接路径为主，但心理中介机制仍不可忽视，尤其是消极教养方式通过降低自尊和增加社交焦虑间接导致攻击性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是通过社交焦虑间接与攻击性行为关联。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在青少年人际交往中，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在心理和行为上，其实会成为模仿的对象。父母对孩子管教太多或过于消极的教育方式往往导致个体感到冷漠、不受尊重和被误解，变得冷漠或以自我为中心，进而害怕人际关系中的社会互动。研究表明，积极的育儿方式可以更早地预测孩子的积极情绪、正面发展和更好地适应社会。

四、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社交焦虑中介了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性行为的关联，且不同的教养方式间，两者有不同的关联路径。高职高专学生家长要减少管束和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增进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在良好的氛围中受到教育，推动孩子的社会性发育。

五、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可以采用队列研究进一步确定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攻击性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继续深入分析和探讨。最后，本研究对象主要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高职院校在校学生，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人群时需谨慎。

参考文献

[1] 罗贵明 .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水平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008(02): 198−199.

[2] 郭志英 . 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自我控制的关系 : 家庭功能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23, 21(04): 503−509.

[3] 关诗情 , 张野 , 臧晓莉 . 沈阳市高校大学生自尊与攻击性研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9(09): 5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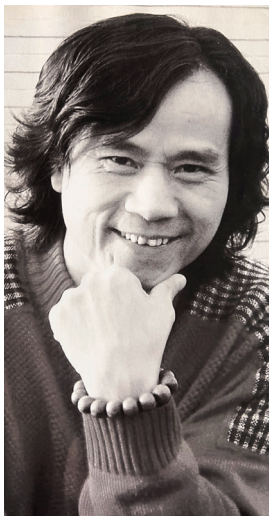
[4] 张瑾 . 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团体辅导实验研究 [D]. 苏州 : 苏州大学 , 2006.

[5] 刘国庆 , 陈维 , 程刚 , 等 .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嫉妒的影响 :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20, 18(03): 376−382.

[6] 吴鹏 , 马桑妮 , 方紫琼 , 等 .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 : 潜在剖面分析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16, 14(04): 523−5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阿坝职业学院 2024 年校级科研课题“高职院校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焦虑与攻击性行为的路径研究”（AZYKY2024209）。

（作者系阿坝职业学院讲师）



陈羲明，1955年生，福建南平人，一级美术师，湖南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现任湖南省文艺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七届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原评审委员会、行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原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草书委员会主任。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六、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全国首届『三百工程』书法作品展等数十次大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机关相关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策划并实施拍摄传统文化题材电视剧《书堂少年》。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陈羲明（2010）》，荣宝斋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湖南书法院艺术丛书·陈羲明卷》等。

五体兼擅 别具风姿

——记著名书法家陈羲明

邓剑昆

陈羲明是当今湖南书法界最具代表性的书家、全国著名书法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也是首批作品进入国家档案馆的书法家。他连续四届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多次担任各项书法国展评委；自1996年担任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并主持工作，一直到2015年退休仍担任常务副主席。这些颇具分量的头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

当然，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只有作品才能真正证明他的价值，创作水平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素，若无作品质量做支撑，其他靠外部条件构成的光环终会被时间所消退，而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在创作方面，陈羲明却显得很有底气，他的书法创作实践长达50余年，早期遍临名帖，日不间断，楷、行、隶、草、篆五体兼擅，各尽其力，各得其味，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人到中年以后，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他曾迎合时代潮流，探索了一段时间的流行书风，从而更多地展现出他的一些创作个性和审美取向，更加生动地抒发他的书艺情感，这些探索性的书写方式，开阔了他的艺术思路，使得他的书风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我见过很多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受急功近利的心态驱使，还没很认真地练过字，不深入传统打好书法的基本功，就拿起毛笔任性挥洒，自我感觉很好，实际是将作品搞成了自由体，却想赖此博得一些名利，降低了书法的门槛，败坏了书坛风气。还有一些书家，一味钻进传统里出不来，字是写得不错，却丝毫没有个性，如同复印机一般地重复制造作品，对书法艺术缺乏深层次的思考，更谈不上一点突破，所以就失去了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

笔法、结字、章法是书法的基础，唯有创造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动力，思想是赋予艺术的灵魂，三者之间，缺一不可；否则，只能算个字匠，称不上书家。比照上面三个条件，陈羲明数十年坚持不懈的艺术实践，完成了他的艺术人生蜕变，从而达到了非同寻常的书法创作高度。

陈羲明精通五种书体，经过多年的锤炼，他做到了碑学和帖学的融合，楷、行、隶、草、篆信手写来，毫不费力。而在这五种书体中，他又能融会贯通，驾驭得恰到好处，体现出了良好的艺术悟性。他在笔法上运用丰富，藏露恰当，拙巧合一，妙入毫巅，在尺幅之内展现大千世界；结构上有情趣，生动出奇，寓意深远；章法上锐意突破，表现形式多样，特别是在满章法布局和斗方创作方面一度引领书法艺术潮流。

在书法的谋篇布局上，陈羲明创造出了鲜明的“陈氏风格”，他的书法错落有致，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机杼独具；特别是落款，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以正文全篇定位，辅之以恰到好处的落款钤印，使得文款混融一体。

在对书法理论的研究方面，陈羲明结合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逢二则变”的书学命题，这种针对书法创作的精细要求，源于他长期的实践和思考。所以他一提出这个命题，就在书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构成了他书法理论上较为精辟的论点，提升了他书法作品的学术价值。

陈羲明习书追求禅境，讲求意趣，用笔结体，融入了很多的个人感受，潇洒自然又不囿于常规，其书法创作颇多天真之趣。他自号“九闲道人”，有闲情，得逸趣；更是将道家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引入到书法创作当中，用笔丰富，点画生动，在临场的创作中注入了个体对书法内容的认识和感受。他是书坛的多面手，书法创作五体皆能，各得其味，相互贯通，别具风姿，又加上他具有独特的书法禀赋，堪称书法界的全能型书家，常被业界专家所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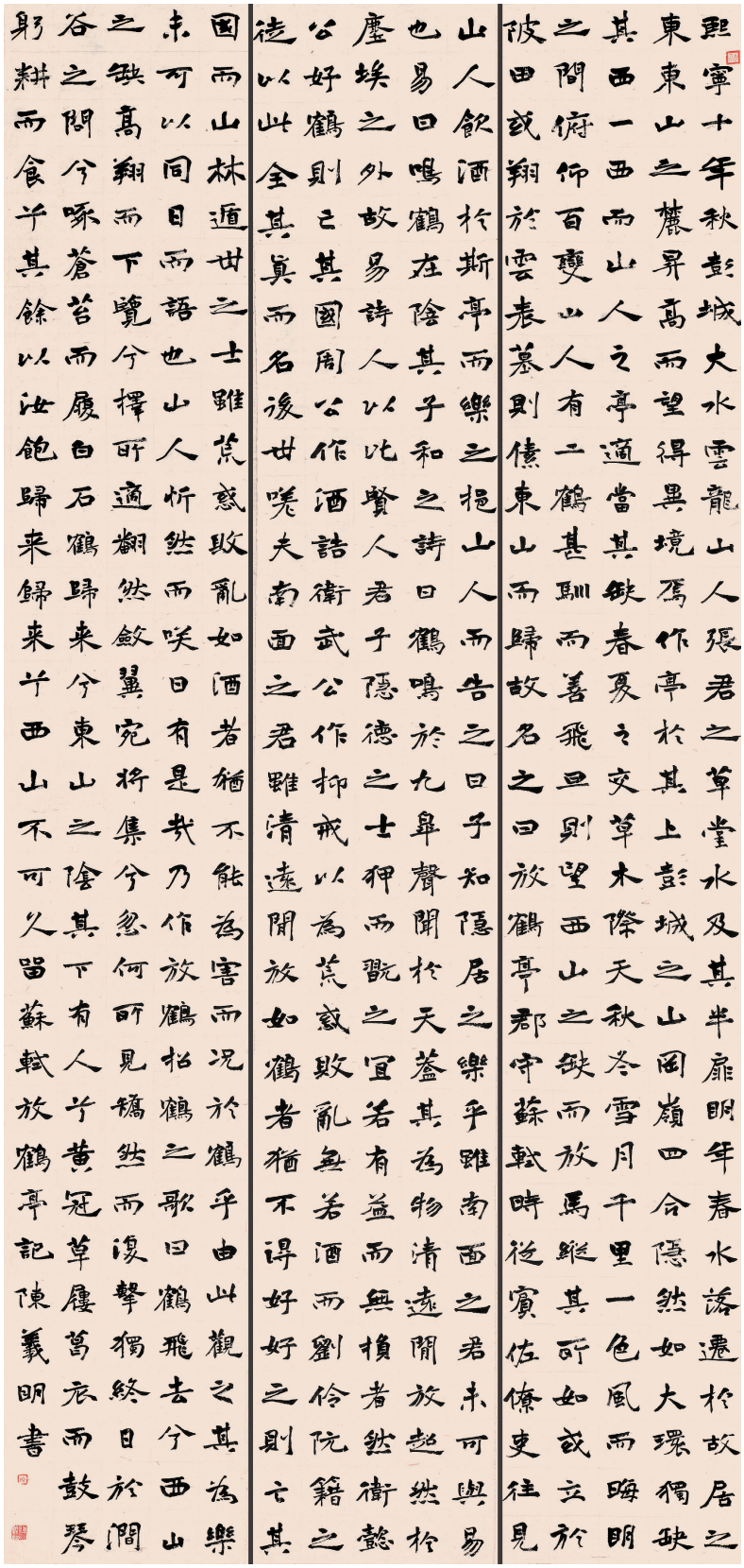
陈羲明是一个真性情的艺术家，待人接物，恭敬有礼，从不因为自己在书法界的名头大而恃才傲物。相反，他还乐于提携新人，对于后辈的请教，他从来不端架子，总是进行通俗易懂的解答。所以，这种乐于帮人的性格让他拥有一大批铁杆“粉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便开展书法教育，培养书法人才，至今，已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明白一个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书法艺术的春天需要千千万万的艺术播种者、砥砺者，中华文明的延续更需要下一代的传承和发展。

在书法研习之余，陈羲明还特别崇尚国学，热心公益，他长期担任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院长，2015 年他全年开办了“每周一说”公益讲堂，不定期开展公益“书法问诊”，社会反响良好；他还策划实施两届“家文化中国书画作品展”。针对当前诸多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他提出了文化传家的主张，重构家文化的理念。他在 2015 年至 2019 年间，成功举办两届“家文化·中国书画作品展”，以书法艺术诠释兴家智慧，让更多家庭重视文化建设，从而获得创造幸福的能力；陈羲明从六个维度制定了自家的家训：“本领养家，勤俭持家，克己为家，和鸣旺家，慈孝正家，文化传家”，更为社会作出了表率。当年湖南卫视《晚间新闻》重点报道第二届展览开幕式盛况。他还主张“古为今用、学以致用”，提出了“国学力”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滋养了他的书法艺术，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他的书法不生硬不呆板，似乎流动着一种情怀，一丝浪漫的书卷气质，这些都属于字外功夫。

如今，已迈入“从心所欲之年”的陈羲明，已经完成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无数字”的人生目标。对一个书法家而言，70 岁正是黄金创作时期，也到了一个做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从艺术的探索期到了总揽提纲的时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贵在有我。”这个“我”就是“我的个性，我的面貌，我的追求”。以陈羲明的书学知识、人生阅历和德行，他无疑可以攀登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成为一个在中国书法历史中留下印迹的人。

人生不过百年，而美好的艺术是永恒的。对于艺术家而言，作品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在此衷心祝愿陈羲明能够把艺术的生命延伸至遥远的未来，成为经典，成为传奇。

△陈羲明 行书李文金11言联『法古崇文，莫不千年成万卷；修身养性，方知一纸阅三秋。』260cm×30cm×2



△ 陈羲明 楷书三条屏 苏轼《放鹤亭记》280cm×40cm×3

△ 陈羲明 隶书斗方《一诺千金》33cm×33cm

△ 陈羲明 草书圆光《自撰论书一则》35cm×35cm

▷ 陈羲明 篆书 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280cm×105cm

△ 陈羲明 隶书横批《凿井开石》45cm×180cm

笔绘山川 宏大高远

——观衣惠春山水画创作有感

席小平

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走进万里河山，融入万家灯火；他历经数度春秋，挥毫泼墨，相继绘制出了数十幅几十米乃至百余米长度的系列山水长卷，数十组山水抒情的系列画卷。当这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画卷先后问世、出版，一时间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引来画界的诸多关注。他便是实力派山水画家衣惠春。

衣惠春是一位善于营造宏大场面，并能创作深远意境的专业画家。他多以比、兴的手法，将自己灵魂深处的精神思想、理想中的文化光芒反射到自己所绘制的作品之中，反射到自己作品的自然山川之中，使其具有律动感、神圣感，从而激发人们对生活与生命的激情。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面对每一幅作品，他不仅能够时时强调画面的真实生动，强调对物象的表达和刻画，更能够注重抒写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意象。灵魂深处的真切顿悟，对人生、对艺术理想的真挚追求和向往，乃至对是非善恶、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真诚表达和表现。故欣赏他的作品，尽管其艺术语言不尽朴实无华，笔墨技法不无潇洒明快，却往往能够体现意境宏大高远、内涵深邃、格调高雅质朴的风格。其画面却往往能够将峻拔与雅秀、奇险与绚丽、苍莽与温润、渺远与古拙、恬静与超逸等多种丰富的内容，鲜明、新颖地表现出来，从而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使得作品具有浓浓的艺术感染力。

衣惠春巨幅山水的代表之作《万里河山入画图》是一幅长 1500 厘米、宽 180 厘米的全景式巨幅山水。作品画面沿用了北方山水的传统布局，上下宏阔、构图饱满，整个画面笔墨酣畅淋漓，气势磅礴，纵横交错，潇洒自如，用笔遒劲雄阔，气韵恢弘生动，情感真诚激扬，于严谨中彰显绚丽灵动之状。如作品《圣地井冈山图卷》以波澜起伏的构图、精致的笔墨、朴实的色调，叙说着红色圣地井冈山的故事。作品《与山河同在》则用焦墨画荷树，以显荷树历风霜而弥坚的风骨，用淡墨画黄洋界更凸显黄洋界白云浩茫的雄姿。

纵观衣惠春的画作，综合其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承传统，得宋、元绘画之精髓。中国画历来崇尚典雅的笔墨和臻美至正的形式。衣惠春的系列山水，特别是那些巨幅山水，无论是对局部山

衣惠春，1940 年生于辽宁丹东，祖籍山东蓬莱。1961 年毕业于师范艺术专科，1988 年结业于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李可染画院研究员。曾任徐悲鸿画院艺委会副主任，辽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诗书画公益行艺术总监等职。

其山水画作品被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原国家文化部、中央美院、中国国家画院等机构收藏。公开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丛书·衣惠春作品精选》（天津杨柳青画社，2005 年 5 月）、《中国高等艺术学院教学模范·衣惠春中国画作品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年 7 月）、《荣宝斋画谱·482 衣惠春绘山水部分》（荣宝斋出版社，2018 年 4 月）、《百虎图卷》（与石丹合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多年来，与其夫人石丹、女儿衣阳共建衣惠春艺术工作室，活跃在北京画坛。由三人合作设计的花岗岩高浮雕《群虎和谐·山水相依》，高 3 米至 7 米、长 103 米，巍然壁立于北京房山区卧虎山。

水、园林山水的绘制，还是就群山远水的创作，其山势皆横亘而出，不遮不掩。其谋篇布局均方正阳刚，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气，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正脉与画家个人品德修养的有机结合。笔墨错落有序，平中见奇，点线折落有势，山石勾线，皴擦起伏，层次清晰纯澈，水墨淋漓。于是，雄旷、宏远、遒劲、坚毅的艺术感觉便跃然纸上。加之作者不时以诗入画，以长跋配之，更彰显画面的宏大气象，每每平添出几分林壑清幽，澄澈清静的诗情画意来。

二是继往开来，笔正墨活，宏大中现清雅秀润之感。这些年的山水画坛，不乏重彩浓墨之画家，但往往笔枯墨燥者众，笔难圆，墨难活。观衣惠春的系列山水画，其笔墨劲健蕴藉，清雅秀润，遒劲中和，实乃画家几十年苦学传统、继往开来所得。是在大量写生基础上的以意成型。在画家的腕下，笔墨灵动而不板滞，施墨层层而相积；所谓笔生气、墨生韵，全在一个“写”字上。因此，其作品自然达到虚实结合、笔酣墨畅、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

三是水墨交融，色彩绚丽。衣惠春的系列山水，一直强调笔墨的厚重、丰富，且其用墨效果却始终体现着一个洁净、清纯的原则，用色效果也体现着一种清丽明净的神韵。这缘于衣惠春在不断研究学习和对传统水墨的运用和色彩把握的实践中，自觉继承古人和前贤的艺术精髓，自觉掌握水墨和色彩对绘画气氛营造所具有的规律，努力挖掘和提升水墨和色彩对绘画艺术的表现力度。观其笔下祖国万里河山的雄浑壮丽，气象万千，亘古苍茫，以及那幽远深邃的山山水水，便自然地生发出浩瀚与博大、巍峨与莽然、澎湃与激情的审阅愉悦。

四是追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语）。这些年，衣惠春经常深入生活，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塞北江南。作为何海霞的弟子，他对文人画、青绿山水早年就曾苦下功夫。而且坚持清人石涛提出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主张，并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进而不断地创新，做到既秉持笔墨精神与中国文化纯正性的深度融合，又注重向南派山水的技法和精神学习，将一些局部山水、小品山水融合更多的寓意和雅趣，从而赋予作品新的人文内涵，新的时代精神。这便是衣惠春的系列山水画之精神气象，灵魂皈依，成功所在。

衣惠春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于翰墨丹青，他的艺术创作自觉与社会公益同行，乐于为社会奉献爱心。2007 年 10 月，捐献山水画作品《一峰独秀万峰涌起》，参加“彩墨英华·中国当代书画家优秀作品公益展”，义售所得善款捐赠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2008 年 5 月，在中华慈善总会协同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院组织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名人名家书画捐赠活动中，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山水画作品一幅；同年 6 月，为“心系灾区·救助残疾人”慈善拍卖会捐助作品一幅，善款捐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10 年 6 月，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景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捐献山水画作品一件；同年 11 月，为湖南炎帝陵基金会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山水画一幅；2012 年 1 月，为筹建中国航空博物馆捐赠山水画一幅；2013 年 9 月，为“迎全运、爱家乡、建沈阳”辽沈地区百名书画艺术家百米长卷创作并捐献书画作品；2014 年 10 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授予“大爱中原”全国书画名家爱心助残艺术展“德艺双馨爱心艺术家”荣誉称号；同年 11 月，在全国大型公益文化中国行活动中，被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授予“公益文化艺术之家”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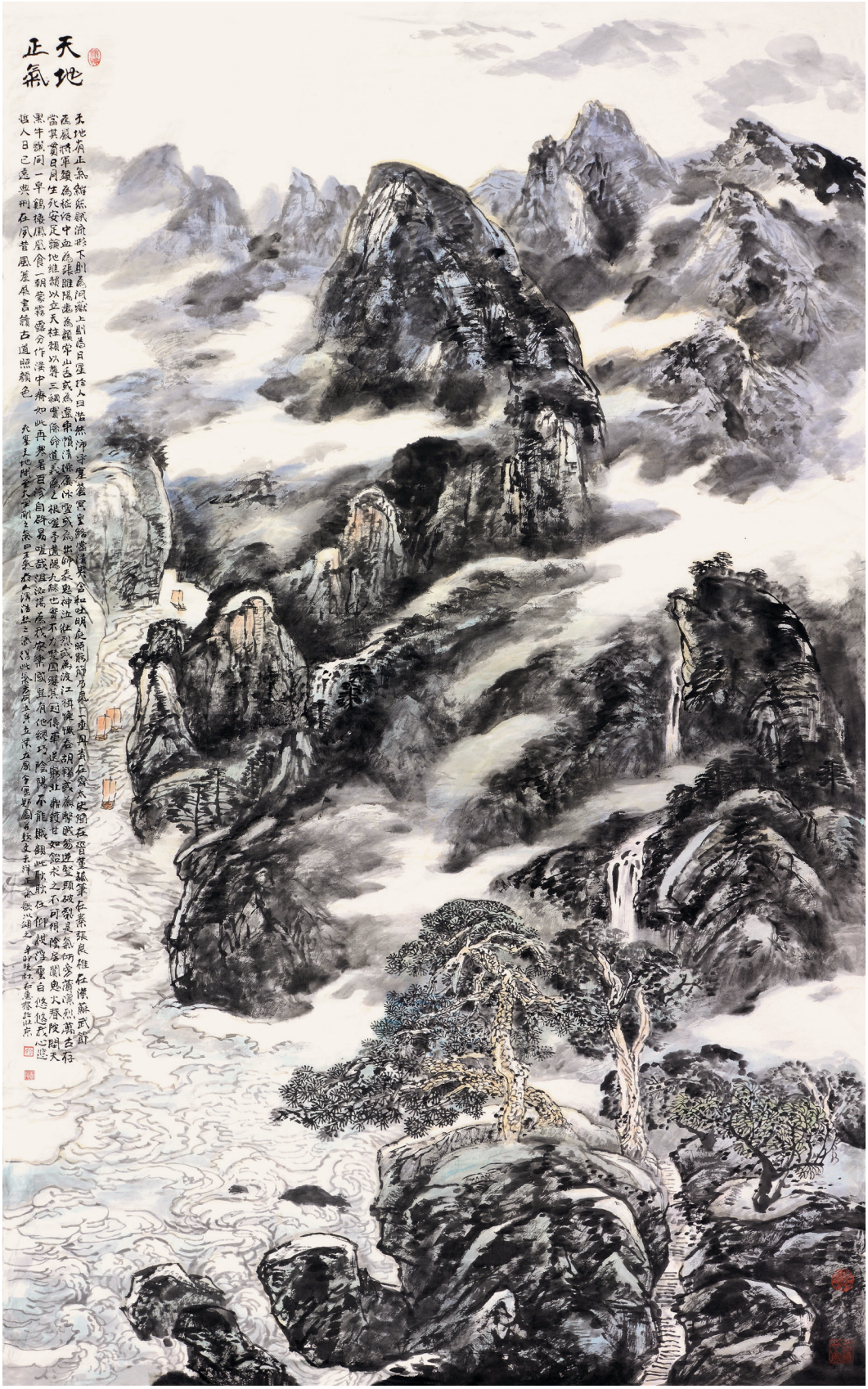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系高级编辑、作家）

衣惠春山水画作品选刊

△ 衣惠春 《魂系黄河图卷》3100cm×52cm（局部）

▽ 衣惠春 《黄山脚下度春风》140cm×68cm

▽ 衣惠春 《云壑观瀑图》140cm×68cm



◁ 衣惠春《天地正气》180cm×90cm

2026
4.2
世界
自闭
症日
孤独症与人类——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
Autism and Humanity—Every Life Has Value
公益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2026年4月上 总第195期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07>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元